

是， 首相

〈英〉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编著

杨立义 娄炳坤 译

学林出版社

YES
PRIME
MINISTER



版权信息



书名 / 是，首相——詹姆斯·哈克阁下的日记

作者 / 乔纳森·林恩/安东尼·杰伊

译者 / 杨立义 娄炳坤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

<http://www.ireadweek.com>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上卷

编者的话

1. 党派之戏
2. 伟大的计划
3. 大臣级的广播
4. 钥匙
5. 真正的伙伴关系
6. 民主的胜利
7. 烟幕
8. 选主教这一着
9. 咱们的人

下卷

编者的话

1. 落水之人
2. 官方秘密
3. 外交事件
4. 利益冲突
5. 权归人民
6. 蛛网缠结
7. 恩泽艺术
8. 国民教育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编者的话

哈克出乎意料地提升首相一职（见本书第一章末），对编者和英国来说，引起了几乎同样众多的问题。哈克在写日记时决心要使它成为能够把他在任的那一段时期描述为一系列凯旋式的胜利史，尽管这项任务甚至会难倒一位非常高超的日记作者。历史对待作为首相的哈克有点粗率；但是他的全部日记的读者会从中看到某些公正合理之处，虽然哈克作为一个著者，对待历史甚至更加粗率从事。这也许是由于首相一职助长了他——正如助长别人一样——越来越脱离现实和打破事实与想象之间的壁垒。他就是在这种心境下，一边口授当天的事件（他的习惯是手里拿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单独地对着他的盒式录音机），一边重温他获得的成功和重新解释他遭到的失败。

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消逝，哈克似乎在他录音带上的回忆录里找到了像一位中世纪的君主从自白忏悔中获得的某种慰藉，而毋需为难地承认犯了什么罪，更谈不上必须悔罪这一说。这也许是有有效的疗法，但是并不造成真的历史。为了这个缘故，编者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求助于对各事件的矫正性的说法，其来源则出自另外一些人的文件，他们的回忆也许比哈克的更可靠些。幸亏

这些文件许多是已经根据《三十年规则》[\[1\]](#)开放了的，其他文件则是由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慷慨地向我们提供的。

同以前一样，我们大量地利用了阿普尔比文件，我们也一如既往感激伯纳德·伍利爵士，他是在唐宁街十号的哈克的前首席私人秘书，他向我们提供了他关于那个时期的详细回忆并且为我们大量地核对了初稿。但是，如有任何不正确或不适当之处，其责任依旧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哈克学院，牛津

公元2022年8月

[\[1\]](#)指国家档案30年后可供公众查阅的法则。

1. 党派之戏

12月6日

汉弗莱爵士一定在搞什么名堂。昨天我在行政事务部见到他时，他似乎还在梦中，思想很不集中，不那么注意我谈的欧洲香肠问题。这是我最近不得不同我们的欧洲仇敌（也可以说是欧洲伙伴，哈克在公开场合对他们这样称呼的——编者。）进行的一场关于标准化的愚蠢的战斗。

过了一会儿我却另有发现。汉弗莱爵士素来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怀有真诚的兴趣和热情，奇怪的是近来却有所减退。不用说，他是在策划些什么。我想，不用多久我会探听到的——不然的话，我就会碰上麻烦了！

我今天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日常公事上。上午我在办公室里吃力地看国防部文件，伯纳德却进来打断了我的阅读。

“请原谅，大臣。遗憾的是，您得先处理一件更为迫切的事。”我问是什么事。

“您的圣诞贺卡，大臣。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伯纳德说得对，发圣诞卡是比读国防部文件重要得多——除非你是国防大臣，那就另当别论

了。

（正如许多政治家那样，哈克也显然不能区别“迫切”和“重要”。伯纳德说圣诞卡是“迫切”的，哈克当然认为他指的是“重要”的。另一方面，话又得说回来了，哈克把圣诞卡说成是更为重要的事，有可能他是对的。他仅仅是一个内阁阁员，他对国防事务所能施加的影响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送呈给他过目的文件所包含的信息同样地无所谓——编者。）

伯纳德已经把行政事务部要发的大堆大堆圣诞卡在会议桌上安放好了；一堆一堆大小不同。很明显，分开堆放是有理由的。

伯纳德提供了这个理由：“大臣，卡片都清楚地给标明了。”他沿着会议桌，一边漫步一边顺手依次指出每一堆的不同点，犹如他在检阅三军仪仗队。“这些您该签上吉姆，这些您该签上吉姆·哈克，这些写上爱你的安妮和吉姆，这些须让哈克夫人来签，您就在后面附上您的名字。”

我发现还有两堆他没提。“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印好的，上面的签名是复印好的，所以您不用写上什么。只须检查一下是发给谁的，看看是否发错了。比如说，把本来应该发亲笔签名的卡片却发给了别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您知道我指的是签上吉姆或吉姆·哈克，或吉姆和安

妮或安妮和吉姆·哈克的各类卡片。”在桌子那一头还有一大捆，也分成了好几堆。“那些是什么？”伯纳德完全神态自如地说：“那些是发给选民的卡片，是您的竞选代理人今天早上放在这里的。”

我从未想到卡片要分成这么多不同类别。当然，发给选民的邮件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不是政府官方性质的，文官部门从不插手此事，因为它在党派政治中决不偏袒一方，至少这是它的一种藉口。

可是伯纳德却非常乐于说明一下发给选民圣诞卡的分类。“这些您签上吉姆，这些签上吉姆·哈克，这些签上吉姆和安妮，这些签上爱你的安妮和吉姆……”

我对他说，要点我抓住了，不用说了。但是明摆着，做起来差不多要花一天的时间，多么烦人！

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这项任务的总量哩！突然之间，伯纳德拎出一个鼓鼓囊囊的手提袋。

他以同情的口吻低声地说：“还有哈克夫人留下的这些卡片，是您个人的卡片。不过，这些花不了多少时间。一共只有一千一百七十二张。”我不禁大吃一惊：“一千一百七十二张？”

伯纳德添上一句说：“在党总部等着您去签发的卡片还没算进去。”

我一听，心直往下沉。党总部！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年我没签过一张党总部发送的圣诞卡。可是去年我还不是党主席。今年我当上了主席。

我开始在卡片上签起名来。突然我发现有两种卡片：行政事务部的和下议院的，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伯纳德解释道：“光发一张下议院的贺卡不及行政部发的那张可以略微提高收受者的地位。”这也很对——行政部的卡片只能由其成员发送，而下议院的卡片任何一个普通后座议员都可以发送。

我问为什么我们行政部不给每个人发一张贺卡呢。

“那要多花十个便士，大臣。”

“可是只收到下议院贺卡的人，身份就降低了，难道不会感到生气和受到冒犯吗？”

“不会的，大臣，我们已经十分细致地考虑过了。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收到一张下议院的卡片也可以对付过去，只要您在上面只签吉姆而不签吉姆·哈克，或者光签吉姆和安妮而不签吉姆和

安妮·哈克，或者加上‘我或我们爱你’字样，或者亲笔签名而不复印签名，或者……。”

我望了他一眼，叫他不要再说了。

有一张卡片，我看到之后，特别反感，不愿意签发，那是送给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专员的。我心想，倒不如发给他一张裁员通知更好呢。他比他的同事更坏，坏透了，我也说不上有谁比他更坏。他就是那个硬要实行欧洲香肠标准化的蠢货。到明年底，咱们将对英国香肠说声好老弟，再见了，咱们不得不接受一些邋邋遢遢的德国小泥肠和意大利蒜肠了。

当然，他们实际上无法阻止咱们吃英国香肠，但他们能阻止咱们把英国香肠称为香肠。看来不得不把它改称为“乳化高脂下脚管子”，而且我还得把它硬吞下去！我的意思是，这个名称是对这种食物的完美的、正确无误的描述，可是它并不非常开胃。还有，这东西赖在舌头上不易滑下去；说实在的，卡在喉咙口，还造成极大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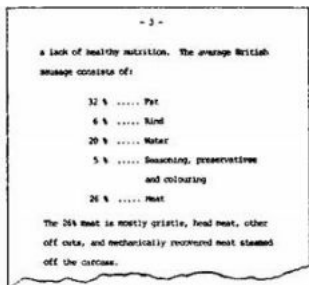
但是，我的职务是执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规定。而且为了在农产品价格和减少英国对共同体预算的负担方面换得一宗新的有利交易，还必须作出这样的让步。看来首相对这事并不在乎，外交部也不在乎，农业部也不在乎——大概向英国

人民试销这个东西的担子要落在我的头上了吧！搞得不好，要毁我的前程。

伯纳德问我，欧洲经济共同体反对咱们的香肠有什么理由。显然，他没有看过他放在我红匣里的文件。[\[1\]](#)

“你没有读过分析报告吗？”

“我看了一眼，大臣，可是使我很泄气。”我当场又重读了一下。



常规英国香肠含有：

32.5%脂肪；

6.5%猪皮；

20%清水；

10%面包干；

5%调料、色素和防腐剂；

仅含有26%肉类：主要包括软骨、头部、下脚料以及用蒸汽从畜体上剥离的机械脱骨肉渣。

我感到有些恶心。今天早餐我还吃了一根香肠。伯纳德把分析报告细看了一下并说道：“欧洲经济共同体专员要废除英国香肠或许是对的。”

伯纳德有时候会完全抓不住要点。我不耐烦地解释道：“他也许是对的，可是对废除一举，选民们会非常反感的。”伯纳德沮丧地点点头。我加上一句：“好吧，看来咱们只能咬咬牙关忍了吧！”

（我们在这个文件的正文里保留了哈克的混杂隐喻之词，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可以深入了解一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编者。）

伯纳德机敏地建议我，应该发一张圣诞贺卡给莫里斯专员。我自己在想搞一个儿戏，祝贺他一个“下脚”圣诞快乐和“德国香肠”新年好，可是伯纳德劝我不要这样做。

（对此事保守绝对秘密，不让政府各位大臣知道的一个理由是：不保密的话，不出几天——至多不出几个星期——他们都将使自己变成笑柄。伯纳德在这一点上的劝告，很清楚是明智的

——编者。)

我问伯纳德，送圣诞礼物给私人专用办公室的人员，什么东西合适。

伯纳德说那完全由我自己来决定。但是他又建议给那些助理私人秘书送雪梨酒，给日志秘书和信函秘书送大盒薄荷糖，给其他人员送小盒下议院普赠的薄荷糖。

“那么，给首席私人秘书呢？”我随口问道。

“那是我啊！”他回答说，微微吃惊。我说，我知道是谁，可是我不知道该送他什么。

“大臣，那就不必了。”

“我知道不一定要送什么，”我怀着真诚的热情说，“可是我愿意送。”

伯纳德看来很受感动。他回答说：“啊，大臣。”

“唔？”我问。

“好吧，那就什么都行。”

他显然不想说是什么东西。可是他喜欢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譬如说？”我鼓动他一下。

“说真的，”他说，“我喜欢收到一件意想不到

的礼物，好让我吃惊。”

我还是没有得到什么线索：“那么我该给你什么样的意外呢？”

“那好吧，”他说，显得小心谨慎。“通常的意外礼品是一瓶香槟。”

今天余下的时间我就得在这些该死的卡片上签名。根据安排，我本来该与汉弗莱有一个重要的会晤，但是由于他突然要会见阿诺德爵士[2]，会晤就取消了。我认为伯纳德知道汉弗莱爵士在搞什么名堂，因为当我问他那个会见是否涉及我应当知道的事的时候，他给我的答复是他老一套的吞吞吐吐之词。

他含糊其词地答道：我敢肯定——您知道——如果涉及您该知道的事，假定——您很清楚——您还不知道其内容，那么很清楚，当您能知道的时候也就是当汉弗莱爵士真正知道的时候。”

“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我抱怨说。

“那么好吧，大臣，非常坦率地说，汉弗莱爵士也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阿诺德爵士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他俩的确多次会见过，可并不涉及我们这个部门。”

伯纳德也许是对的。不过阿诺德爵士这个人

总是使我感到紧张，在某些方面，内阁秘书是这个国家有权力的人。他是首相的得力助手。内阁议程全由他控制，他能控制谁可以接近首相，谁不可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同国内有权力的人物会见，对下面这些人的前程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哈克、阿普尔比和伯纳德·伍利，在汉弗莱的私人文件里已找到这次会见的记录——编者。）

今天同阿诺德·鲁宾逊有了一次惊人和伤脑筋的会见。这位内阁秘书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我一眼。

“汉弗莱，”他轻声地说，“我对早日退休一事一直在考虑。”

我感到震惊，我从没有退休的意思。我看不出我干了什么错事。但是他似乎很坚定。“到时候了，汉弗莱。要适可而止。”

我对他说这对我有点像一颗炸弹，完全出乎我意料。

“我十分明白，汉弗莱，”他坚定地回答道，“可是没有少不了的人么。”

我在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应当为自己最近的行为展开辩护，指出一个人如果碰上像哈克那样的大臣，必须同他斗争的话，他的成就就会遭到严重的限

制，这时候阿诺德添上一句，“汉弗莱，不要向我劝说，事已定局。我将提早六个月退休，在新的一年里。”

我一听，就想到我多么幸运啊！当了三十年文官，训练有素，有助于我克服了开始时的鲁莽；结论是只要不说话也能获得好处，总比说任何什么话来得强。

但是为什么阿诺德把我当作知己？答案马上清楚了——“汉弗莱，我的继承者必须是一个对我们那些政治老爷能够坚定的人。”我马上表示同意。我们不能容忍那批人胡说八道得没有边。我也照样说了。但是我们两人都同意阿诺德的继承者一方面固然不能容忍任何胡说八道，另一方面还必须是机敏、温文、有魅力和能起抚慰和润滑的作用。可是重要的，他必须健全可靠。我毫不怀疑我充分具备了这一切必要的素质。果然，阿诺德接下去说他的重大责任是向首相递呈推荐书，说明现任常任秘书中哪一位符合这一些严格的标准[3]。

他谈到点子上来了。他说在他的职位里，难题的真正所在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寻找问题。“我们需要能找出关键

问题的人。”

事情原来是这样！这是对我的考验。由于事前没有人提醒我须经受这样的口试，我现在务须思想敏捷。亏得我在几秒中内把思想集中起来，那个关键问题就跃入我的脑子。

不过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必须文雅和谨慎。因此我说我想完全转一下话题，接着我询问他退休后有何打算。

阿诺德感到高兴。他祝贺我能提出这样好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立刻明白他会有好多可以为国家服务的渠道[4]。他的内阁秘书职位的继承者可以劝他从事这个或那个[5]。

当时我得知阿诺德爵士对这件事早已有考虑，而且有人向他提出过，请他去当西方银行的董事长，还有英国石油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董事等等。

我仔细记下阿诺德所提出的可以为国家服务、心里想着的其他几个途径。皇家剧院信托基金的董事长的职位下一年对他虚位以待，还有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一职。我们认为英格兰银行副董事长一职是大有可为的，正如当安全委员会的头头一样。英国—加勒比协会的主

席一职也会向阿诺德招手，特别是在冬季的几个月里。

我向阿诺德保证任何一个胜任的继承者一定能够作出这些令他满意的安排。我可以看出我的积极态度和方式给阿诺德以非常大的安慰和鼓励。

可是，我又得知阿诺德还有其他事务挂在心上。他担心过去他也许曾经向首相提出过某种劝告，要是透露出来的话，会被人误解的。[\[6\]](#)我们这些当文官的人，自然人人都担心自己曾经提过什么劝告。如果公开出来的话，是会被人误解的。

阿诺德特别担忧，因为有些文件还存在，其中记录了他曾经提过的合理和明智的意见，如谈到在罢工工潮中可以使用军队，以及建议这批军队应当武装起来等等合理的防范措施。当然断章取义的话，[\[7\]](#)这种资料就可能对他非常有害。

很久很久以前，他也曾经提议我们应当保证对罗得西亚[\[8\]](#)的制裁[\[9\]](#)永不发生；不多日子以前，他提议就重振西蒙斯敦海军基地问题与南非进行谈判。这一点在战略上是完完全全明智的，当

然同时也对福克兰群岛[\[10\]](#)大有帮助。但是这一点对正在竞争和可能当上不列颠联邦秘书长的某个人是一件难堪的事。而我能证实阿诺德[行将](#)竞争和可能当上不列颠联邦的秘书长。

阿诺德感到满意，尤其是我建议说，合适的继承者会把有关档案捆扎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他很高兴。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讨论的题目上来，即阿诺德的退休问题。他对我说现在他发觉他可以进一步把我的名字放在名单的首位。好消息——马上更佳的消息随之而来，因为经我仔细询问，我得到了一个暗示：名单上没有其他人的名字。

当我感到极为幸福而同他告别时，阿诺德提到他已经接受了“争取信息资料自由运动”的主席一职。我听了之后颇为震惊。可是接着我很快地看出此举是明智的。该项运动总是受到反对党的欢迎的，而今天的反对党也就是明天的执政党。再者，他当上该运动的主席将保证信息资料的自由不会滥用。但愿他有很好的条件从中协助，将那些给首相——和大臣们——提意见和劝告的档案

捆扎妥当。

我们举杯共祝健全政府永远长存，
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愿信息资料永保
自由。

（阿普尔比文件PPC/MPAA）

12月9日

今天一开始就发生对汉弗莱前途一事的严重误解。所形成的窘境，如果不是我以惯常的熟练手段把它掩盖过去的话，真可以说是糟透了。

他今天早上第一件事便是来看我。他告诉我他有十分严重的消息；他说话的语调非常阴沉。事实上，接下来发生的误解完全由于他的冗长而费解的语言所致，他说的不是清楚易懂的英语。

今天晚些时候，我问伯纳德，汉弗莱早上说了些什么。他记得非常清楚。显然，汉弗莱曾经严肃地说过：“我也许敢冒不讳地坚称所谓关系并不是一直没有若干程度的相互利用之处，甚至说不定偶然还产生过一定程度的满足；这个关系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分叉点，说得简单一些，正在接近——很遗憾——它后的结束。”我请汉弗莱是否可把他所说的那句话用单音节词归纳一下。他点点头，忧心忡忡地默许了。他解释道：“我将退出了。”我以为我听错了。我对他所说的话的理解，正是他的意思。

“总有一个时间，”他继续说，“一个人必须接受命运为他安排好的一切，当他Pass on.....[\[11\]](#)”

“去世？”我为之一怔，轻声地打断了他。

“.....转移到新的牧草地时，”他继续说道，“那里牧草也许更绿嫩，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奉献给我们中间伟大的一个人，为他服务。”

我简直大吃一惊。我对他说我感到非常难过。他对我说声谢谢。我问他他的夫人是不是知道这事。他说，显然她已经起疑了好久了。我问他，他们什么时候通知他的。他说是今天下午。后，我问他他们给他多少时间。

“只是几个星期，”他说。

我为之一怔，而且十分激动。当时我的印象是他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我只不过这样认为罢了。

“汉弗莱，你表现得非常勇敢，”我说。

“唔，我得承认我有一点焦虑——人总是惧怕不可知的事物的——但是我有信心。不管怎么样，我会应付过去的。”

我太激动了，简直不知所措。事实上，我不怕难为情，我承认我流泪了。幸亏汉弗莱没有看清楚，因为我很明智，赶快拿出手绢遮住了眼睛。

不过他肯定看出我感到苦恼，他问我怎么回事。我实在说不出话来。我试图解释我是多么难受；我们之间发生过波折，可是那实在算不上什么。随后我有些注意到汉弗莱对我看了一眼，好像说我这人感情脆弱。

“大臣，不要激动，”他规劝道。“咱们会经常见面的——至少一星期一次。”

我以为我没有听准。但是他满有信心地微笑了一下。我的思绪一片混乱。他可能有所指？难道我对他完全误解了？

“我还没有告诉你我去哪里哩。”我的眼睛直瞪着他。

“我已被任命为内阁秘书。”

我恍然大悟，我**一直**完全误解他了。“内阁秘书？”

“对。”他现在看来有些迷惑不解，一定同我刚才表现过的一模一样。“嗨，你以为我指什么呢？”

我简直无法说，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以为……我以为……”于是我不想说下去了，而是试图对我的举止解释一下，隐约地说我自己感到非常疲倦，过于劳累，如此这般。老实说，在我一生中我的确没有这样受窘过。

汉弗莱爵士的同情，不像我的同情，无论如何必须摒弃。他轻声说非常抱歉，作为已受委任而尚未上任的内阁秘书，我也许该向首相提出减轻你一些工作负担。”

这一说使我得到启发，我对他应怀友好和蔼的感情。我不能再犯刚才所犯那个错误了！我连忙消除他的疑虑说，我很好，绝对没有问题。我热烈地祝贺他高升，甚至非常热情。也许我过份热情了，不过我不这样认为。我甚至对他稍加奉承地说，失去了他我怎么办呢？

“没有了我，你可能搞得更好哩，”他以难得的诚实作答。我差不多要热情地表示同意，可是马上体会到这样做有些不策略，故而及时停止。

再者，我现在已经明白，等到实行改组和调动时，汉弗莱必然会就首相挑选阁僚问题向首相提出意见。首相也必然会向汉弗莱问到我的。

所以我对他大大地奉承一番，说他过去多么好，我对他所作的事又多么敬仰，他的工作，按文官的优秀的传统来说是多么出色。讲的都是些溢美之词、过份的恭维话，可是他照单全收并且说我太好了。说得太对了！

我谨慎地给他回报的机会，我说在我看来，我们曾经一起干得很好。“大臣，我不能妄想求得一个比你更好的大臣了，”他说。这，简直好

极了！我想他说的确实是这个意思。汉弗莱是很狡猾的，不过我从未戳穿过他真正的谎言。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日记展示了与哈克在前面所描述的谈话略微不同的说法——编者。）

我对大臣说我必须转移到新的牧草地，让自己为首相服务。我试图以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的难过心情来表达之，为了不让哈克看出我眼下体验到的高兴和宽慰，既然我曾经被判决与他共事几年的苦役快满期了。在此期间我一直未曾盼望获得假释。

他作出反响的方式真正使我怀疑他的情绪是否平衡。他似乎在哭泣。很明显他是一个严重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前我对这一点并不清楚。

让他理解我有了新的职位要费不少时间，由于他一想起我将离他而去他就心绪烦乱。随后他以尴尬的姿态卑躬屈膝起来。他问我会不会为首相干事，[\[12\]](#)像我对待[\[13\]](#)他一样。他的意思是像我为他干事一样。[\[14\]](#)他就讨好巴结起来，使用奉承的词句，说他多么敬仰我以及我一贯是多么好的人，以便滑过去。当然，他说的完全是实在的，

但是他的动机是完全昭然若揭的。

他给我机会向他回敬赞词。我能竭力设法做到的是向他保证我不可能盼望获得一个比他更好的大臣。他看来非常兴奋激动。出奇的是，他仍然把我说的每句话从表面来理解而信以为真。

我们两人同意我将在星期五晚上向行政事务部的职员宣布离任，赶在我的新委任状公布之前。这样我可以在圣诞酒会上向他们告别。

哈克说那无疑将是一个高兴的场合。显然他指的是“对我来说”。当然“对他来说”，将是悲哀伤心的。

（阿普尔比文件 928/2033/NT）

12月18日

这是一个非常兴奋激动的周末。一切均在星期五晚上开始。那天结束时，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个小规模酒会。我们把我的私人专用办公室里以及汉弗莱的私人专用办公室里的所有家伙都请来热闹热闹，庆祝圣诞节，参加者还有我的司机罗伊和几个送信员和清洁人员。现在是平等的时代。

我送给他们每个人下议院习惯送的薄荷糖或者瓶装酒，他们看来很高兴，尽管感到有一点点

意外。随后我们大家喝了几杯，不太多；我发表了短短的动人的演讲，提议为汉弗莱的健康干杯，这一举动（尽管我自己心里这样想）进行得非常之好。他也向我致意和祝福作为回敬。酒会散了我们两人都各自驾车回家。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15\]](#)：

哈克的日记对那次圣诞酒会的叙述不太正确。我记得很清楚。通常开始总是有些窘的——我们大家围成一个圆圈站着不说话，手里紧握着粘手的装着雪梨酒的酒杯，屋子冰凉，因为圣诞放假暖气已经停止供应。正如在所有办公室里的聚会一样，拿社交来说，我们相互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傻里傻气地露着牙齿笑嘻嘻，一直等到我们发觉那位大臣预料要显露醉意时我们才收敛笑容。

他过分大方地为我们倒酒，后问我们大家（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高兴不高兴，愉快不愉快。

我记得他问过汉弗莱爵士是否期待去内阁办公室工作。汉弗莱爵士听了兴奋起来，但是富于同情地添上一句说，大家对欧洲香肠这个烦人的问题群情还是激昂的。

“啊，对！”大臣咕嘟地喝了一口，说道，“那欧洲香肠！”

汉弗莱爵士禁不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尽管明知对哈克可能是嘲笑，他回答说那欧洲香肠肯定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的战术导弹。

“是吗？”哈克被搞糊涂了，没有领会这个玩笑而问道。一下子，引起大家局促不安的因素增强了十倍。

最后，我们大家惧怕的时刻到来了：哈克向汉弗莱爵士致告别词。哈克在他日记里说他认为他讲得很好，即使按他自己独特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弥天大谎，十足的自欺欺人。

他在开始时，先说他不得不说“几句话”——我敢说这是一贯的套话。随后他喋喋不休地谈到圣诞节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平安和幸福归于世人如此等等，然后说举行一个小小的节日叙会总是一种愉快，把为他服务的人聚在一起。说了之后马上笨拙地予以改正说是帮助他的人[16]。

他对大家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谢谢所有的人，“从常任秘书起一直下至我的通信员、我的司机、清洁人员……我

不是指上下的下，而是说至少仅仅指的是楼上楼下，汉弗莱在这楼上面的四层楼，喔，不，不！我们这里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他一定已经注意到我们都带着一些不信任的神情瞪着眼睛看他，他就急忙进一步为自己解释：“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他明明说话不老实。“是一个小队，像内阁一样，不过我们都站在同一条线上。没有在背后说人坏话，没有向报界透露什么。”他忽然体会到他的话可能被人引用来说明他不忠于他的内阁同事，也体会到即使他在表明我们都站在一条线上，没有背后说人坏话和没有透露什么，可是也许在这个集会里有一个非官方发言人或消息灵通人士，或者也许存在着一种感觉，认为他是队伍中一个坏球员，因为他批评他的内阁同事……他马上添上一句：“我意思是指‘影子’内阁。”然后他甚至连这一点也收回，他说，“不，不，今晚‘不谈政治’。祝大家平安和幸福，包括当官的在内，特别是那些将要离去的。因此……为汉弗莱干杯。”他手有些哆嗦地举起酒杯。

哈克演讲完了，给整个冰凉的屋子带来一阵松口气的感觉，此情此景实在难以形容。我们大家抿着酒，汉弗莱爵士作简短的答词并大方地感谢每个人在过去的岁月里所做的艰苦工作。他说这样的场合产生一种百感交集的心境和个人的情绪矛盾，因为尽管他的离去是一件荣誉事，可是心中不免黯然。

他补充说他特别感到难受，为了离此他去，不能再为在他一生经历中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一位大臣服务。大概就是这句话使哈克误解为赞美之词。

我们大家都承认一种极其独特的伙伴关系已经结束了。

我在酒会开始前已把咱们的警卫侦探打发回家去了。按理他们不能下班，但是我坚持这样做。是友好、亲善等等的节日。所以当警察拦住我时，他们不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拦我。我驶得非常平稳，绝对安全，慢慢地小心地回到我的选民区去。我模糊地记得有一个中年妇女，骑着自行车超越我的车，这也许使人觉得我的安全做过了头，只顾安全而不及其他，但是这算不上一条理由来控告我醉酒开车。我的意思是，喝醉酒没有错——我指的当然是道德上，不

是法律上。危险在于你喝醉酒而成为危险人物，不过我从来没有。

不管怎么说，突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一辆巡逻车，里面坐着两个警察。我说我有银色证章，就没有事了。我知道安妮不是一个好的驾驶员，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让她开车驶回家去。

（我们在研究工作中还未发现那天晚上拦住哈克的警察的记录本。不过我们有幸在内政部档案里发现警察厅长的一封信，里面摘引了警察的报告。我们把它复印出来，见下页——编者。）

新苏格兰场[\[17\]](#)

布罗德大道，伦敦，SW1HOBG
常任秘书
内政部
怀特霍尔伦敦 SW1

12月19日

亲爱的理查德：

我们遗憾地向您报告，行政事务部大臣、国会议员詹姆斯·哈克阁下，在星期五晚上开车回家路上被我们的警察拦住。他正以每小时约九英里的速度开车前进，并且酒味很重。由于他马上出示银色证章，我们的警察没有对他进行呼

气测醉检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只能归罪于缺乏经验。

警察报告说他们走近哈克先生时，他第一句话是“晚上好，辛斯泰伯尔[18]，克罗斯默斯[19]快乐。”问他为什么车子开得那么慢，他回答说：“我不想叫路边镶石碰撞我。”显然没有喝酒的哈克夫人提出由她接着把车开回家去。

如果您能使大臣觉得这件事的严重性并警告他下次再违法，他的银色证章将起不了保护作用的话，我将不胜感激。在我这一方面，我将给予负责“保护”他的警卫侦探以纪律惩戒并保证以后他们必须懂得他们的职责包括政治家们自我保护在内。您的诚挚的，

签名



NEW SCOTLAND YARD
BROADWAY, LONDON, SW1H 9BS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Home Office
Whitehall
London SW1

19 December

Dear Richard,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the Rt Hon. John Baker, MP, Minister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was stopped while driving home on Friday night. He was driving at approximately nine miles an hour, and his breath smelled strongly of alcohol. Since he immediately produced his Silver Badge, my two officers did not breathalysise him, a serious error which I can only apologise for.

They reported that when they approached Mr Baker he began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 words 'Good evening, Constable, Merry Christmas.' When asked why he was driving so slowly he replied, 'I didn't want the car to hit me.' Mr Baker, who had apparently not been drinking, offered to drive the rest of the way home.

I would be obliged if you would make the Minister aware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matter and warn him that, in the event of a further breach of the law, his Silver Badge will afford him no protection. For my part, I shall be maintaining the detectives responsible for his 'protection', and ensuring that in future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ir job includes protecting politicians from themselves.

Yours sincerely

12月20日

想一想我是多么感到意外呀！在下次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对汉弗莱来说是他当上内阁秘书以后的第一次——当我们走出内阁会议室时，他把我强留下来，要我顺道去他办公室同他谈谈。

我向他祝贺他第一次主持内阁会议进行得很好并问他坐在首相的右边有何感受。

他不理睬我的问题，请我坐在长椅上，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甚至也不歇一下请我喝些什么，直对我说他要谈谈一件交通事故。

晤，我心领神会，马上知道他指的必然是我的那一件小事故。

“我收到内政部一份报告。当然，这完全是您的私事……”我坚决地打断他，我说：“正是如此。”

“但是，”他接下去说，“内政部把这件事看得十分严重。他们认为大臣们应树立榜样。如果一个人有了事可以逃脱，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正巧担任一个应该不负众望的职位，不管是暂时的也一样，那么对警察的士气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说不管暂时不暂时，这几个词无疑带着威胁。我简直不能相信是否听错了。才当了两天的内阁秘书，说真的他可骄横起来啦！

“汉弗莱，”我带着些微怀疑的神情问他，“您是不是想数说我一番，还是什么？”

他立刻缩了回去。“大臣，我远不是这样的人！我只是内阁成员的仆人。一个卑微的公务员。但是有人要求我向内政部保证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我知道我有保障，碰不到我。我高傲地问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银色证章呢？”

“为了得到警察的合作，让我们通过警察包围圈和安全障碍物等等。不是为了保护喝醉了的人开汽车。”

我不为这句话所动。“汉弗莱，我不让公务员们来教训我，即使像你本人那样卑微的公务员。我是女王陛下的大臣。”

“那当然，大臣，”他和气地答道。“如果这是您的愿望，我会向女王陛下报告这件事的。”

那**不是**我的愿望，这一点他完全明白。我开始解释我纯粹是技术性地说我是女王陛下的大臣，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他办事的正当程序实际是应向首相报告。说到这里，我思考了一下，决定表示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去对内政部说我已接受意见。

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我问他内政大臣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如果这次的指责是由我的一位同事批准的，那显然是相当丢脸的。

汉弗莱说不知道。“这件事直接从内政部常任秘书那儿捅下来的。”

我松了口气。“这样就不需要向内政大臣……我意思是说一个人不愿意他的……同事（我差一点要说敌人）知道。”

汉弗莱猜到我的意思。毕竟我对雷这个人的

看法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我认为内政大臣不可能加以利用。”我奇怪为什么不可能。我突然想起雷没有出席内阁会议。这时汉弗莱给我看伦敦《旗帜晚报》上的一个标题：



内政大臣被控醉后开车

记者：彼特·金斯利
惊天变故，内政大臣今日被控驾
驶……

总而言之，内政大臣亲自发动了“圣诞节时切勿饮酒后开车”运动，并且与警察说好对此要采取强硬政策，结果自己在他的选民区里被人发现醉倒在车子里。

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我问汉弗莱为啥安全警卫员没有同他在一起。

“很明显，”汉弗莱爵士尖锐地回答。“他甩掉了他。您要知道那些醉汉说有多机智就有多机

智。”

后来得知内政大臣的运气比我差远了。他同一辆满载核废物的卡车相撞。更倒霉的是，随即给卡车弹出去猛烈撞上由本地报纸编辑所驾驶的那辆汽车。原来非常可能把这件事遮掩过去，不张扬出去。现在自然是泄漏出去了。（指事故，不是指核废物——编者。）

雷就这样完蛋了。到那一天结束时，他将离开职位了。

我看看汉弗莱。“他以后怎么办？”

“我猜想，”他轻蔑地回答，“既然他醉得像一位王公[20]——所以为了慎重行事，隔一段时期之后他们大概会让他当上王公的。”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21]：

我记得很清楚两天以后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我驱车去大臣在伦敦的公寓，接他去赴一个我必须作陪的晚宴。

他从办公室回家已经晚了。安妮·哈克在签发圣诞卡，问我是否可以一边等他，一边帮她贴上邮票。

我说明我不能，并且马上解释道，不是因为我做不来而是因为我猜想这些卡片是要发给选民的。这样的卡片被认

为是政治性的活动而不是政府的事务；当然我作为一个文官，是不允许参与大臣的政治活动的。

“我只是请你舔一些邮票[\[22\]](#)罢了，”她哀求地说道。

我说明那么这个舔是为政府而干的。

（伯纳德·伍利的谨慎和迂腐的态度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无疑也说明为什么相对来讲，他在文职中升迁到顶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编者。）

哈克夫人找到了她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的巧妙的解决办法。她问道：“假定所有这些卡片是发给记者的，你看如何？”

“那就没有问题，”我表示同意。

“都是发给记者的，”她再肯定一下，当然我不能怀疑她所说的。于是我坐在沙发上舔贴邮票，私下暗称这个舔贴行动是同报界搞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无疑，伯纳德·伍利和哈克夫人为了调剂一下，很高兴只舔贴给记者们的信封——编者。）

我们就那天早上已经发给各报的民意测验表进行了讨论。大臣对此异常高

兴。看来内政大臣的不幸在国内对政府没有造成什么害处，即使他是副党魁。

我们讨论了必然要来的人事调动，尽管哈克夫人似乎不感兴趣。她所关心的唯一一件事是哈克也许会得到北爱尔兰的职位，不过我们都一致认为首相看来并没有太不喜欢哈克，不至于作出这种决定。当然大多数人觉得乌尔斯特是一条死胡同，虽然总是有可能在那里在一片赞扬荣誉声中结束此任。

（我们肯定地觉得伯纳德爵士在这一点上没有诙谐之意——编者。）

最终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节目。安妮像大多数政府官员的妻子一样，喜欢观看电视的新闻节目，因为这是佳的机会可以知道她丈夫在何处。

一条简讯使我们大吃一惊，它报道说唐宁街十号刚宣布首相将在新年时退休。

根据新闻稿所说的，首相不愿呆到另一届议会结束之后，所以现在提出辞呈，以便使他的继承者得以顺利执政直至下次大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12月22日

我到家时，安妮和伯纳德都在，显然被那条首相辞职的消息吓昏了。我早已知道——首相为了告诉我们，在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用比喻的说法，真可以把我们所有二十四人都击倒在地——使我们目瞪口呆[\[23\]](#)。

安妮问我他为什么辞职。这是我们**大家**都在问的问题。他曾经对我们和报界说过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的继承者能顺利执政直到下次大选。所以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理由。

在怀特霍尔街上也传播着一些惊人的谣传。左翼说首相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右翼说他是一个克格勃的特务。

伯纳德和我讨论了这些谣传，伯纳德听到十分不同的谣言。

“大臣，我听说在唐宁街的保险箱里存有价值一百万英镑的南非钻石[\[24\]](#)。”他加上一句，“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谣言。”

“是真的吗？”我问。

“唷，是的，”他似有权威地说道。

我吃了一惊。“原来在唐宁街**是有**那批钻石。”伯纳德看来也感到惊奇。“是有吗？”

我给弄糊涂了。“你刚才说是有的呀！”我说。

“我没有说，”他气愤地回答。

“你确实说过！”我不想让他滑过去。“你说过那是谣言。我说：是真的吗？而你说是的！”

“我说是的，那确实是个谣言。”

“不，你是说你听到那是真的。”

“不，我是说我真的听到过。”

安妮打断了我们。“很抱歉我插入这个重要的讨论，但是你们都相信那批钻石的传说？”

我不相信，伯纳德也不信（据我得知）。不是不可能，但是从未正式否认过，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不信。政治的第一条规则是“在未正式否认以前决不要相信任何事情”。

我们讨论了各种可能性。很清楚不会举行大选。我们的党拥有很大的多数。将要发生的只有一件事：党必须挑选一位新领袖。

安妮问我是否要担任这件工作。

我没有认真考虑过。没有可能。新领袖或者是埃里克，（埃里克·杰弗里斯，财政大臣——编者。）或者是邓肯，（邓肯·肖特，外交大臣——编者。）我开始向安妮解释为什么。“你瞧，原来**可能**是雷，他是副领袖，但是由于他必须辞去内政部一职……”

我完全停止，不再说下去。我突然想到，**那就是**首相辞职的原因！他一直不喜欢雷，而雷是他的当然继承者。所以他一直抓住不放，直等到他肯定雷当不上这个职位为止。

（首相大概从克莱门特·艾德礼那里学到了这个窍门，艾德礼无疑地紧紧握住首相一职直到赫伯特·莫里森没有当选的希望时为止。也有人暗示哈罗德·威尔逊选择了他本人突然辞职的时间，以便与丹尼斯·希利不再受工党左翼的欢迎的时期吻合，从而保证詹姆斯·卡拉汉得以继承。当然这种说法没有证据——编者。）

我向安妮和伯纳德作了解释。伯纳德表示由衷地高兴，首相向报界发表的声明是真实的。“所以辞职**是**让新的领袖有时间在下次大选以前被推入执政。”

“现下内政大臣已经被拘留，”安妮轻声微笑地说。自然而然我们开始讨论两个可能的候选人。他们两人今天下午在内阁会议散会后都强要留我同他们说话。

“埃里克要求支持他，”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是可以担任此职的人，他一直是有相当政绩的财政大臣。我已经表示我站在他一边。”

安妮感到惊奇。“那么邓肯呢？”

邓肯说来实在是真正非常可能的人选。我点头同意。“也许他应该获得此职。在外交部他毕竟干得很好么。对，他可以胜任，我认为也许支持他为好。”

“所以你在支持埃里克和邓肯两人？”她天真地问道。

我生气了。明摆着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选择。“注意！”我对她说，“如果我支持邓肯而埃里克获得此职……那么，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一切都完了。但是如果我支持埃里克而邓肯获得此职……事情也就是这样了！”

“那么两个谁都不支持，”她建议说。

但愿事情是这样的简单就好了。“那么，不论他们中间哪一个胜利，事情就是这样！”

她懂得我的心思。于是她问我实际上将支持哪一个。我对她说了。

我将支持埃里克。

或者邓肯。

12月23日

埃里克很快来向我游说，分秒必争。午饭时间，我在办公室，他打来电话说他要顺道来访并喝些什么。

埃里克是一个可爱的人物。身材高大，举止文雅，头发灰白，机灵聪颖。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向选民推荐的有吸引力的党的领袖。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另一面——卑鄙、狡猾和恶毒。他人还没有踏进会议室就开始诋毁起邓肯。

“他那么善于制造分裂，所以说实在对党没有好处，或对国家没有好处。”

我依旧没有打定主意，我正在竭力寻找一个办法避免使自己卷入。我正要说我不知道如何公开向埃里克表示支持这句话时，他更加详细地解释起他的态度。

他的论点——十分简单——我的支持对他起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我普遍地受人欢迎。我必须承认我能够体会这个说法有道理。他还强调我的公众形象好而且人人都认为我是健全可靠的。

我把我的问题解释了一下。好吧，至少我没有说明我之所以尚未作出决定是由于理所当然的焦虑——怕下错了赌注。可是我确实充分地、坦率地说明过，作为党的主席，我必须让人看来是不偏不倚的。（我们注意到哈克对“充分地、坦率地”二词所下的定义（尽管在政治上是普遍使用的）同牛津英语词典所给的定义不相符合——编者。）

埃里克利用我对党忠诚的感情。他提醒说我

们俩都是温和派，总是具有同党一样的目标，如果邓肯获胜，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知道他会说这些话。可是他接着给我来了一个意外。他坚定地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不会把邓肯留在外交部的，我会找一个新的外交大臣。”

我加以推断，结论是清楚的，他指的是我！非常兴奋的信息！可是还存在着危险——如果他输了，那怎么办？然而我必须抓住我的机会。因此结束时我对埃里克说，虽然我必须**看起来**不偏不倚，我还得想法子暗示我是支持他的——当然完全是公正无私的方式。

于是我想我或许要支持埃里克。

12月24日

邓肯昨晚到我的公寓来看我。我的印象是他已经听到了我同埃里克的短短的晤谈。

邓肯与埃里克迥然不同。他也很聪明，他不狡猾，不恶毒或奸诈——他是一个直爽、粗鲁的同伴。我开始说明作为党的主席，我应当不偏不倚，或者至少应该**看起来**不偏不倚。

他以通常不假思索的姿态置这句话于不顾。他说：“作为党的主席，你比以前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你没有任何真正的敌人。至今还没

有。”

这是个威胁，没错。然后他接着说明如果埃里克进入十号，那将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我点点头，我认为点头可以被解释为完全同意，但是事实上也可以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表示——表示我听见了他在说些什么。

然后像埃里克一样，他试试忠诚策略。他露着牙笑了一下（他认为这是一个热情友好的微笑），他说：“吉姆，我们是站在一边的，是不是？”

我说是，因为我觉得说一个“是”字仅仅表示作为同一个党的成员，我们必然是站在一边的。（不一定——编者。）我是非常审慎，严格地不说谎话的。（当然，在“不说谎话”与“不讲真话”之间是有一个明显和重要的差别的。在政治上所谓“真话”意味着任何一句无从证明为虚假的话——编者。）

“好，”邓肯说。但是我担心他会看出我对他的支持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添上一句话：“我将赢得胜利。你要知道，我从不饶恕任何使我失望和丢脸的人。”真的，邓肯不是异常狡诈的人。我向他指出如果我给他支持，我不能太公开。

“用不着公开，”他回答道，“就是那样，只要

人人皆知就可以了。然后，我进了十号，埃里克去北爱尔兰，”说到这儿他带着恶意格格地笑着，“我们就会知道谁将担任下一任的财政大臣，不是吗？”另一个向我提出的职位！他指的是我！但是正如我预料到的，他在谈话结束时总要说句带威胁性的话。“除非你自己向往北爱尔兰，嗯？”

我想我或许要支持邓肯。

（事情就搁下了，直到圣诞节假期过去以后。哈克给自己放了一个假，这是他应该享受的假期，甚至停止为他的日记口授记录。有一两盘难辨清的、有些模糊的磁带也许是在圣诞连新年的假期中口授的，但是我们认为不清晰的缘故是录音机有毛病。

新年之初，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雅典娜俱乐部与阿诺德·鲁宾逊爵士见了面，共进午餐。阿普尔比在他的私人日记里提到了这次午餐——编者。）

自从阿诺德在内阁办公室退休以来我第一次同他见面。他已担任起新的沉重的职务。我淘气地问他在信息自由运动那边的工作怎么样。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谈这个。”

理所当然，阿诺德想知道新首相可

能是咱们杰出的财政大臣呢，还是咱们卓越的外交大臣[25]？有趣得很，这正是我要同阿诺德讨论的问题：按他的意见，谁应该进入十号？

他对这两位都采取模糊的看法。他是对的，这是一项困难的选择，很像提出哪一个疯子该来办理精神病院这样的问题。

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两个人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是干涉主义者，他们对如何管理国家（如果他们当上首相）都有愚蠢的观念。

阿诺德问我，咱们有否什么同盟者[26]。当然有，总组织秘书。他所担心的是不论谁当上此职，都会竭力反对对方的支持者而分裂党。在我看来，这种忧惧是十分现实的。

由于这可以导致一段时期的真正不稳定的局面和变动[27]，显然，明智可取的办法是去找一个起妥协作用的候选人。

我们一致认为这样一个候选人必须具有下列素质：他必须能适应顺从，灵活变通，随和可亲，没有坚定的意见，没有出色的好主意，不专讲书卷知识以

及缺乏强有力目的意图来改变任何事物。首先，他必须是一个我们知道可以接受业务指导的人。[\[28\]](#)而且是愿意把政府事务交给专家去处理的人。

只有一个人似乎具有所有这些素质……哈克！但是由他去当首相的想法，在表面上，看来是完全可笑的。而且更有甚者，这也难办到。

然而，我们认为应当予以认真的考虑，这样做有几个理由。政府中许多人会欢迎一个不那么信奉干涉主义的领导。真正的障碍无疑将来自两个竞争领先者，但是阿诺德认为这两个人也许可以说服他们退出。

这件事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安全局档案。我还没有机会看这些档案，可是阿诺德劝告我说，一个人应当常常把关于内阁各大臣的安全局档案调来看看，如果他要好好乐一乐的话。

（内阁秘书是所有安全活动的中心，内阁办公室有好多房间满藏着绝密的安全信息——编者。）

伯纳德·伍利走了过来加入我们，他喝了一杯咖啡因为他有一些最终定档的DAA档案要我过目。我们互祝新年快

乐，随后我向他提出这件事。

当我问他对他现在的主人担任下一届首相有些什么看法时，他颇为惊愕。事实上，他看来猛然一下子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他不断问我的意思是否指他的大臣哈克先生？

阿诺德要知道伯纳德是否暗示哈克不能胜任首相一职。伯纳德看来不能构想出一个适当的答复。于是我们说明有不少人认为作出这样的委任有许多好处。对英国有好处。

（汉弗莱爵士这么说，意思是对文官部门有好处，在他看来文官部门代表英国最佳的一切。还要值得注意的是，阿诺德·鲁宾逊说有不少人表示赞成这一点，也许在目前还不是真实的，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将肯定地成为真实的——编者。）

我们在会晤结束时，对伯纳德提出一些坚定和明确的劝告：如果哈克成功的话，在近几个星期里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做。主要地，伯纳德·伍利必须保证他的大臣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不要干给人刺激或制造分裂的事，避免一切争执并且对任何事情一点也不表示肯定的意见。

伯纳德认为这没有问题。他相信这也许正是哈克反正打算要做到的事。

1月2日

今天晚上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也同样有一个酒会。那是招待我们四个欧洲朋友的。有了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我遇见了一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官员，他看来是十足的条顿味儿[\[29\]](#)，我问他是什么地方的[\[30\]](#)。

“我刚从布鲁塞尔到达这里，”他告诉我。

我感到意外。“从比利时来？”

“布鲁塞尔是在比利时。这是对的。”条顿的脑子！

伯纳德前来解救。“我想大臣在问你是不是比利时人？”那位官员点点头，微笑地说，“不，我是德国人。”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那里你是干什么的？”[\[31\]](#)我愉快地问。

“我还是德国人。”

我提醒自己，耐心是一种美德。“我[知道](#)你是德国人，”我说，对伯纳德看了一眼，希望他再来解救。

“我想大臣，”伯纳德小心谨慎地说，“意思是指你的职业或工作是什么？”

“啊！”那个德国佬说，“我是一个部的头头。”

“有些像助理秘书，”伯纳德低声对我说。

我对伯纳德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德国朋友（我不得不这样称呼他）能否在我们的香肠问题上帮助我们一下。伯纳德点点头，就问他他的工作**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

他非常愿意说明。“我的工作与共同农业政策有关。我务必保证农民得到足够的钱去生产更多的粮食。”

这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意外。我认为我们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里已经生产了太多的粮食——因此有过剩。我就这么说了。

那位德国人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吃**的粮食是太多了。对！”我搞不懂。“粮食不吃，还有什么别的用处？”我问他。他的眼睛一亮，高兴起来。

“我们生产粮食并不是为了吃。粮食是一种武器！”

我不能完全懂得他的意思。“一种武器？”我说。“你的意思是……”我在搜索正确的回答，但

是没有答案。“你的意思是……确切地说，你指的是什么？”

对他来说这很明显。“粮食是力量。绿色力量。”

我问他是否意指我们依靠粮食去打俄国人。他不耐烦了，解释道：我们不打俄国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顾客。我们打美国人！”

我请他对这个主题再发挥一下。他很高兴。他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因为他在谈论他的国家所爱好的题目作为消遣。他开始谈了，“那是一场战争。一场贸易战。利用粮食，我们就能够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扩大势力范围。当我们发出威胁，要向埃及出售小麦时，你应当看看基辛格的脸部表情。”他高兴地格格笑起来。“他想包揽埃及，据为己有。如果第三世界从美国转向欧洲去购买小麦，你要知道，美国总统的背心[\[32\]](#)里要失去几百万张选票哩。”我须花一些时间才能明白他说的是地理上的西部而不是裁缝制的背心。

他进一步说明：“是中西部。所以共同农业政策使我们对美国产生影响，你看出了吗？上一次战争——大炮。这场战争——黄油。”

“黄油，那好一些，”[\[33\]](#)我开玩笑地说，同时也笑了一笑。他没有领会这个玩笑。（玩笑也不过尔尔——编者。）于是我问，精确地说，他

在粮食战中干了些什么。

“我保证我们的农民得到补贴，来尽他们可能生产更多的粮食。我们有地下粮仓，塞满了农业导弹。”我们站在冷餐桌旁边，他就开始在餐桌上摆一战场作为一个实例。“我们运输一个师的黄油去孟加拉；我们以三个旅的小麦威胁埃及。但是那是一个诱饵，你懂吗？”他胜利地叫了起来。“我们六个空运师的牛肉等着飞向中国。还有……”

他突然停顿，然后放声大笑。伯纳德和我都盯着他看，困惑不解。最后，我问他好笑在哪里。

“黄油，那好一些，”他格格地欢笑起来。“很有趣。很有趣。”伯纳德拉着我的手，不声不响地领我到招待会的另一角去，在那里他把一位让·邦格莱先生介绍给我，他也是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部当头头。

我不会说德语，但我试着同邦先生讲一点点法语，“邦格莱先生，您说英语吗？”我以诗的声调问道。

“我说英语，”他以冷淡的礼貌作答。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

“我的工作，”他颇有耐心地微笑一下，“是处

理过剩的粮食。”

“你意思是把它们输出或储存？”

他搞糊涂了。“不——我付钱给农民，叫他们保证把所有过剩的粮食毁掉。”

现在轮到我糊涂了。“毁掉？”我重复他使用的词。

“不过当然，”他带着优越感来了一个高卢[34]式的耸肩并说道：

“难道你不知道共同体生产了太多的粮食？”我捺住性子，不发脾气。

“不过注意，对不起，我不想被人家看出我是笨拙的，可是那边那个家伙”——我指指我们那位幽默和友好的德国人——“他付钱给农民去生产过剩粮食。他说是绿色力量。”

“我知道，”他点点头。“他干得不坏。粮食是一种武器。”这样一说就愈来愈讲不通了。我问道，“那么，为什么你要付钱给人们去毁掉它呢？”

对我们的法国朋友来说，这里没有矛盾之处。“所有武器都得废弃。然后你能付钱给人们去生产更多的粮食。简单得很。”

“难道你不能继续把它储存起来？”

他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主张。“不，毁掉粮食，都比使粮食变为流质或者使它脱水或加以储存来得便宜。”

“或者把它运往全世界呢？”伯纳德问道。

“一点不错，也不便宜。”

那个“正好相反的”全部处理方式对我来说，渐渐清楚了。我说：“我料想你不能按市场价格出售粮食，因为这样价格会下跌，农民会赚不足钱。”那位法国人很高兴看见我懂了。他说：“正是如此。”

我决定总结一下。“所以，**他**付钱给法国农民去生产过多的粮食——**你**付钱给法国农民去毁掉粮食！”他现在咧着嘴巴笑笑：“正是如此。”

还留下一点我不理解。我问：“为什么我们不付钱给农民，叫他们光坐在那里不动，不要费力去种什么粮食呢？”

那位法国人感到受到冒犯了。“哈克先生，”他傲慢地回答说，

“法国农民不愿意白拿钱。我们不要施舍。”

（哈克的恐外症[\[35\]](#)从上面一段里看得很清楚。只按民族的陈旧的老一套来看德国人和法国人，这种不可取的能力既是个人的弱点，又是政治上的力量。我们将看到在他向上爬那油滑的柱

杆过程中的关键时刻，这一点是如何成为他的王牌的——编者。）

1月3日

今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才到办公室。虽然我有许多事要办，不知如何我就是思想不能集中。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官僚机构面前（甚至比在我们自己本国所产的官僚机构面前更无意义），我只觉得一味的无聊，完全无益无效，我们干的每一件事都是白费劲儿。

我坐在办公桌那里在默思，出了神。随后我发觉伯纳德站在我的面前，以他特有的方式引起我的注意。

“嗯，”他满怀希望地说话了。

我却情绪低落地注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伯纳德？”我问。“咱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一切的一切，有什么意思？”

他看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臣，我没有学过神学。”

我试图向他说明我的忧虑。“我的意思是，伯纳德，一切都是**白费**。付给人们大量的钱去生产成堆的粮食。付出另外一大笔钱去毁掉粮食。而且还付钱给官僚主义者，叫他们摆弄文件，使这一切能付诸实现。难道这一切的无聊没有使你

消沉吗？”

“事实上没有，”他回答道，有些困惑。“我是一个文官。”

“可是这一切都是那么毫无意义？我进入政界是要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一些。”

“啊，可是他们是幸福的，大臣。”此时此刻他是在关心我，想办法使我振作起来。“忙碌的人比闲得厌烦的人幸福得多。”

“即使他干的工作是无效的？”我沮丧地问道。

“没错，是这样，”他以鼓励的口吻回答我。“拿您的私人专用办公室来说，只要您在这里，他们在忙着，他们就幸福得多。”我不懂他在指什么。我指出我这个私人专用办公室的工作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

伯纳德有点儿不以为然。“唔，工作大多数是一些您后来不发表的声明的草稿和演讲词、没有谁采用的新闻稿、没有谁阅读的文件以及没有谁向您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这个评语，不是没有真实性的评语，使我更加沮丧。我对伯纳德说，他等于在说我的工作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样地白费。

他否认这一点，着重地否认说：“完全不是

这么回事，大臣。您踏进政治是为了使人们幸福。您是在使人们幸福。这个私人专用办公室里的人都十分欢迎您。当然，到处都是一样，”他急忙添上后一句话。

我们两人坐在交谈室里，讨论首相一职的竞争。“伯纳德，”我先开腔，“我近同埃里克和邓肯交谈过。我感到我已经答应要支持埃里克当候选人。”

“我明白，”他颇有兴味地说。

“后来，”我继续讲下去，“我感到我也答应支持邓肯。”

伯纳德看来是赞成的。“听起来非常公正，不偏不倚，大臣。”他没有抓住要点。我解释道，我不能全然遵守对他们两人许下的诺言。

他似乎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以发愁的。“那些不过是政治诺言罢了，大臣，是不是？”我点头承认。他说那好吧，正像您宣言中的那些诺言，是不是？人们会理解的。”

他说的也许是对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我在回想我同埃里克和邓肯进行的谈话，我感到有一点不太肯定！他们俩中有谁对**我**明确地许下过什么诺言。

我把这一点也讲给伯纳德听了，些微地担心

这会不会使我显得有些无能。但是伯纳德认为如果他们都没有答应我什么，那么我与两位都没有真正达成什么交易。即使伯纳德是对的，我还得决定支持他们中间的哪一位。这不单单是挑头马下赌注的问题，因为我的支持也许能举足轻重，起决定性的作用。“伯纳德，所以问题是：我要当外交大臣呢，还是财政大臣？”我必须承认他的答复“两个都不当”真正使我大吃一惊。

“哪个都不当？为什么不？”

“两个都是非常令人头痛的职位。”

我起先以为伯纳德是相当愚蠢的。毕竟他谈的是关于内阁里三个高职位中的两个的看法。我向他说明由于他只是一位文官，他并不真正懂得政治。

他看来有些羞愧，道了歉。

“伯纳德，”我继续说下去，“要成功，你得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假如你是财政大臣，你就具有一个十分高大的政治形象。这必然对获得选票有利。现在你懂了吗？”

结果他理解得十分透彻。他能看到好些我尚未看到的事。我后悔对他摆出神气十足的样子，因此而感到难为情，可是我但愿他没有看出我的窘境。

“财政大臣是‘扫兴先生’[\[36\]](#)，”伯纳德说，“他提高啤酒税和香烟税，使选民大为不满，搞得非常不好。”他说得对。他继续说，“而且，大臣，您有没有考虑过同财政部那些常任官员一起工作的问题？如果我提醒您，当汉弗莱爵士还在这里当常任秘书的时候，你有时候觉得他并不总是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的，我想我的说法不会错吧？”

英国传统的低调说法，他说得多好呀！但是我向伯纳德指出，通常还是按我的意思行事的。（这里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哈克具有相信自己的幻想的习性，这是所有政治家们都具有的基本才能——编者。）伯纳德问我是否一点也不怕去应付和处置财政部的官员，我正要回答他一点也不怕时，突然体会到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就是说他们这班人可以大大胜过我，比我强。还有，我突然想到任何一项新的经济政策至少在两年里都不可能显出什么可观的效果——这意味着你当上财政大臣后的头两年时间里，实际上你是在为你的前任所犯下的错误受苦，付出代价。没有谁能体会到经济一旦搞坏了，通常你是**毫无**办法的，特别由于我们的经济是受美国经济管辖的，对此我作为财政大臣是没法控制的。

伯纳德表示同意，并且加上一句说，内幕消息认为还有冲击波将来自美国。

现在对我来说是完全清楚了，我不应当担任下一届的财政大臣。我对伯纳德说，“在这个职位上没有什么可供逃避之处，是不是？”

“是，大臣。当然啰，除非您被派到外交部去，作为一个惩罚。”我不懂他的意思。“一个惩罚？”

“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这个职位更糟。”

喔，这就是他的意思。我不再想立即摒弃伯纳德的见解；我暂不说话，我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他还有别的意思，就是说在外交事务上得不到选票？

“不光是这一点，大臣。政府不得不对外国人客气些，可是选民要你对他们凶一些。例如，他们厌恶给那些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以援助，尽管在英格兰中部有人失业。”

我的选民区在英格兰中部！（伯纳德·伍利举这一个例子很难说是偶然巧合——编者。）我一开始想这个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避开外交部。外交大臣务须周游世界而内阁其他人员则在参与政府政策的机要事务。失业者会在新闻节目里看到我在我国驻巴黎的大使馆里吃高档饭的画面，而他们的医院却在闹关门大吉。

再者，就世界政治来说，外交部实际上不太

相干、不太重要。我们没有实权，我们只是一种所谓美国的导弹基地罢了，就是这么回事。

伯纳德发表议论说，凡是一切棘手的外交使命，首相就派遣外交大臣出去担当——可是如果有什么风头可出的地方，首相就亲自出国，好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人物。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财政大臣来说，也是一样。人人都认为财政大臣们落选，首相才会中选。财政大臣们从来无功，只有过。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真是进退两难，”我对伯纳德说。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异常光芒。“除非……”他吞吞吐吐地回答说，“……嗯，当然，有一个选择余地。”我想不出是什么选择。

“当上一个中间的职务。”

“不，伯纳德，”我说。“内政大臣？不要犯傻。去负责所有行凶抢劫案、越狱案和种族骚乱案？太谢谢了。”

“不，大臣，当上一个一切功劳归于己的职务。”

起先，我不懂他指的是什么。然后我懂得了！**首相**！伯纳德为了我，比我自己还有雄心！这是超过我敢期望的，或者说甚至我想也不敢想

的。但是既然伯纳德已经向我提示，我说什么也不能去掉这个想法。

我羞怯地问他是不是说正经话。他肯定他是正经的。“为什么不呢，大臣？您既然已经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似乎一切都指着一个方向。”

主要问题是我现在是不折不扣地深深陷入了欧洲香肠问题。（不是不折不扣，我们推想——编者。）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

不管怎样，我谢谢伯纳德。我对他说这是一次有益的谈话，我务须考虑我的候选资格是否确实有胜利的可能性。

伯纳德说，因为他不过是一介文官，当然他不能说什么。但是他建议我应当考虑是否请我自己的政务次官代我出席明天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的典礼。看来在到达时有可能在街上发生一个反政府的抗议行动；他还提醒现在也许不是时候，不应当出现在一个有争论性的场合或有敌意的环境里。

他是绝对正确的，我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我对他说他现在越来越像汉弗莱爵士了。

“谢谢您，大臣。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褒奖。”

“你一定具有非常之好的眼光，”我打趣说。

但是他是正确的。

确实如此。

（一方面伯纳德·伍利遵照汉弗莱爵士的指示在哈克的头脑那块肥沃丰腴的田地里撒下当首相的雄心的种籽并保证哈克避开一切争论，另一方面汉弗莱自己也并不闲着。他打电话给杰弗里·皮尔逊，那位党的总组织秘书，邀请他来内阁办公室秘密会晤。在汉弗莱私人文件中找不到这次谈话的记录，大概因为这次谈话具有敏感性和涉及安全问题，由于杰弗里·皮尔逊是一个政治家，他没有什么顾虑，那次谈话载在他的典雅的回忆录《吸一口瞧瞧》里——编者。）

我接到内阁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电话，问我组织秘书办公室对竞选领袖一职如何看法。

他深知前景阴暗无情。如果埃里克进入十号，在三个月里党内会有分裂。如果邓肯进入，在三个星期里要产生分裂。

他向我提供了一些惊人的信息。他透露说对两个候选人都存在着涉及安全的问号。我要他讲得详细些，但是他说他不能多说什么了。只有一个人他可以向他透露，那就是党的主席[\[37\]](#)，因为

首相不在[\[38\]](#)，而且由于基本上这是党内的事。

他已请哈克参加在内阁办公室里举行的会谈，并请我也参加。我自然接受他的邀请。他还要我提出一位折中的候选人。我首先想到了约有半打人选，从中可以挑任何一个。

汉弗莱爵士问我是否曾经考虑过党主席本人。吉姆·哈克当首相这个主意，虽然开始时对我的印象是荒唐可笑，可是很快地变成一个实际上并不坏的主意，不见得比任何其他主意来得坏。毕竟问题是，谁适合这个职位？你永不会知道，直到你吸一口瞧瞧才能明白。

汉弗莱爵士指出已经有些不那么可能当首相的首相人选。我不知道是些谁。

（广泛的调研提示说，汉弗莱爵士一定在指比特侯爵[\[39\]](#)——编者。）

1月4日

我收到一个通知，要我马上去汉弗莱爵士的办公室见他。使我惊奇的是，党的总组织秘书杰弗里·皮尔逊也在场。他的身材高大魁梧，眼睛闪亮，戴着一副架框很粗重的眼镜，透过它刚好看

得见他的那双眼珠，发亮的秃顶光头，与头顶上的枝形吊灯相辉映。我觉得我应该带一副太阳眼镜在身上。

汉弗莱谦恭有礼，殷勤之极。“您能来到真是太好了，大臣。我有一个问题。我需要您的帮助。”

“难道您一个人管理不了这个国家？”我问道。

他没有被逗乐。“是，恐怕那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我马上也严肃起来。

“那是关于选举领袖的事。首相认为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请您来。”

原来糟到如此地步。我点点头并且静候。然后他说了一件我不能十分了解其意义的事——也许是我没有好好地集中思想。

（哈克所不能懂得的汉弗莱的那些话载在会议记录里——现复印如下——汉弗莱在与哈克会见后不久把这个记录送给了首相——编者。）



70 WHITEHALL, LONDON SW1A 2AS

Memorandum

To: The Prime Minis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I informed Mr Hacker that there are certain items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hich while they are in theory susceptible of innocent interpretation do nevertheless contain a sufficient element of ambiguity, so that, should they be presented in a less than generous manner to an uncharitable mind, they might be a source of considerable embarrassment, and even - conceivably - hazard, were they to impinge upon the deliberations of an office of more than usual sensitivity.

怀特霍尔70号，伦敦SW1A2AS

备忘录

致 首相

发自 内阁秘书

我知照哈克先生；某几项在理论上允许率真地解释的保密信息，然而的确含有足够模糊的成份；所以如果以不大方的方式提供给一个有苛评意识的人，这些信息可能成为大量难堪的麻烦之源，甚至——可以想象得到的——危险之源，假使它们影响了要求具有异常敏感性的职务持有者的思考的话。

杰弗里·皮尔逊解释道，汉弗莱是在谈安全问

题。

“安全问题？”我重复其词，感到困惑不解。“你指的是什么？”

“秘密，”他说。

我试图掩盖我的不耐烦。显然，我是知道安全是什么意思的。

但是汉弗莱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让我知道，”杰弗里说。

“为什么不？”我问。

“为了安全，”他答道。

我转向汉弗莱要求澄清。就此一次，他满足了我。他向我解释由于首相不在，我在党务上充当代表，他需要我去看看关于财政大臣的安全档案。他没有得到应许可以把整个档案全交给我，只能给我看有关的项目。

他然后给我看了一些惊人的文件。安全官员和政治保安处关于埃里克的报告、对他的司机的访问报道以及从首相本人那里来的保密备忘录。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说个详细。信息太爆炸性了，如果这盒录音带落到不应该拿到的人手里，（哈克总是把它的日记口授到盒式录音机的——编者。）对埃里克将是灾难。只要说埃里克从没

有给我一个印象说他是一个性欲狂者或者一个下流的老家伙就够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像他那样的工作迷竟然有时间去干我今天读到的所有那些事。

汉弗莱有一个解释。“我的经验是：一个在生活某一领域里非常活跃的人在所有其他领域里很可能同样地活跃。”

“我的意思是，光看他的表面，你不可能想到他会爱好……”我一时讲不出话，因为想找一个足够文雅的词语。

汉弗莱提供了一个。“我认为流行的用语是‘横向慢跑’，大臣。”

我指出这一套“横向慢跑”刚发生不久，而且它一点儿没有确证埃里克曾经违反了安全。

汉弗莱马上表示同意。“这就是为什么首相认为他当财政大臣没错。可是看到南斯拉夫那一个……以及南非那几个……那个来自阿根廷的可疑的女士更不必说了……顺便说说，据称她只是一个掩护。”

这可更令人难以想象的了。一个掩护？那究竟目的何在？如果这些“女士们”都是掩护身份，我就想象不出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显然，汉弗莱也想象不出。但是很清楚，国

防部或外交部对这样一个大臣来说也许稍微脆弱了一些。如果埃里克当上首相，他还须同时当安全局的头头。我能看出为什么汉弗莱在担忧。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说，“你要说的是，此人必须是邓肯。”

汉弗莱犹豫了。随后他伸手去拿桌子那头的另一宗绝密档案。“我正要谈这个，”他谨慎地回答道：“这是外交大臣的档案。”又是骇人的高高一叠纸张！比政治保安处的还要厚。还有来自诈骗检查队和国内税收局的，还有秘密审计员的报告，以及英格兰银行外汇部的信件。

要读完和抓住这个档案的要点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不知道其中透露出来的每一件事是否都严格地合法。

汉弗莱明智和审慎地点点头。“**严格**地说，也许是。但是把他排除出去，不予考虑去财政部工作那是肯定的了。”

我突然有些犯起多疑症了。我不知道在内阁办公室有没有关于我的这样的报告。（肯定有——编者。）没有谁可以怀疑我有这一类的不正当行为。（这也几乎肯定是真实的。哈克的私人生活是相当单调的——编者。）我问汉弗莱他们怎么能发现这么多关于邓肯的经济情况。

他避开这个问题。“让咱们就这么说吧——这一切已经调查研究得够多的了。”我料想就像对待那个可疑的女士那样。

我猜想安全局在主持所有这一切的调查。尽管照汉弗莱爵士的说法，安全局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并不承认它存在。但是假定它存在的话（当然它并不存在），它的名称实际上该是DI5[40]。而既然它无论怎样并不存在，这个名称也从未使用过。”

我对此一点也不相信。我敢肯定安全局是存在的。（哈克是对的。汉弗莱爵士是在向哈克提供官方假信息，这个假信息的设计是为了把注视安全局的人搞糊涂——编者。）

我必须承认，我所读的关于我的同事埃里克和邓肯的一切使我完全困惑了。我转向总组织秘书，我说，“这不是令人吃惊吗？”他现在看来仍然油光发亮，可是也烦躁不安。“我不知道，”他厉声说。“我没有看到。”

我对他表示抱歉，回过头来向着汉弗莱。我说：“汉弗莱，我不愿意让你把我看成愚蠢……”

“快不要这样想，大臣，”他答道。我认为他有些赶不上时候。

我继续说：“但是既然不让总组织秘书看这

些机密档案，那么为什么他来这儿？”

杰弗里本人给了我回答：“我们党不敢冒让这些丑闻被发现的险——既然它们像你们两位所认为的使人难堪的话。对国家和对党都可以造成极大的难堪，假如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当上政府头头的话。我们不愿冷不防地被人抓住把柄。”

像埃里克那样的人不会。但是我没有这样说，因为事情过于严重了。我只议论说，情况非常严重。

“十分严重，”杰弗里表示同意。

“十分严重，”汉弗莱爵士重复说。

我们互相凝视，陷入深思。我问道，“那么，如果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当选首相，那事情会怎样呢？”

“那实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汉弗莱谨慎地答道。

“十分严重，”杰弗里表示同意。

“我明白，”我说完后等着。

“严重的反响，”总组织秘书咕哝地说。

汉弗莱爵士点点头。“**严重**的反响，”他强调地附和一声。

“严重之极，”杰弗里补充一句，阐明局面极

端严重。“说实在，”汉弗莱爵士认真地说，“我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局面了。”

我们都默然不语。于是我决定来一个总结。“那么，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有统一的想法了，”我说。“这可是严肃的事。”他们都点点头。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杰弗里有一个答案。“我们务须另找一个候选人。马上。”

汉弗莱小声地说：“总组织秘书想知道你有什么主意。”

“因为你是党的主席么，”杰弗里解释道。

很自然，伯纳德说过的话在我的耳朵里反复响着。为什么不去争那高的职位呢？去干一切功劳归于己的职务？但是我自己不能马上提出。他们也许认为我患自大狂。因此我装出在深思的样子。

“那太难了，”我说。“我们要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将来是要当首相的。一个健全的人物。”

“灵活变通的，”汉弗莱添上一个条件。

“对，”我表示同意。“而且要正常的，”我评议说，脑子里记住埃里克的所好并且自信在这一点上我是无懈可击的。

“而且，”杰弗里以总组织秘书的身份有力地提醒我们说，“是要被党的两翼都接受的人。”

“还有他是一个能接受别人劝告的人，大臣，”汉弗莱后肯定地说。

内阁秘书和总组织秘书有礼貌地看着我，等候我的建议。但是我不愿自己提出，生怕我误解了这些示意。

后杰弗里开口了：“您有否考虑过由您自己来担任这个职务？”我假装完全大吃一惊的样子：“**我**？”

“为什么不？”汉弗莱爵士问道。

“难道您不想当首相？”杰弗里问道。

我想我应该谦虚。我解释道，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肯定我实际上能当不能当。

汉弗莱似乎太轻易地把我的话当真了。他转向杰弗里说道，“也许毕竟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不得不问汉弗莱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大臣，也许您不认为您完全是当首相的才。”

我非常坚定地对汉弗莱说，我认为我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必须谦虚谨慎，但是我深信无疑我有担任

这个职务的能力。

不过汉弗莱说有一点美中不足。“您多少是一个局外人。除非您能在近几天里暗中作些安排，公开取得一些成功。

我建议我只能开始竞选运动，让人们知道我要当上这个职务。

“我认为，正好相反，”杰弗里说。“好让人们知道您不要当。”我不知道这样做够不够。杰弗里和汉弗莱爵士十分肯定一切都会安排好的——好让人人知道我不要当。杰弗里自己提出他可以掌管我的竞选运动。如果有人问我，我只要说我在这方面没有雄心。

还有，如果有谁来问我会不会拒绝参加竞选来使您陷入圈套的话，汉弗莱忠告我说，在以前好几次这样的场合下，一个总的可取的答复一直是：“一个人虽然不求官职，可是他发誓要效忠祖国，为它服务；如果一个人的同事劝说他，这是一个人服务祖国的好途径，他也许会勉强地不得不接受这个责任而顾不得他个人的私愿了（我当时都把它记了下来）。 ”

后，我们谈到选举问题。据我看来，不可避免地须是三方选举，不过总组织秘书有不同的想法。他想的是没有对手的选举。团结总是会受公众欢迎的，党也要欢迎有一点点团结。

但是还有两件使人扫兴的事，即埃里克和邓肯。我突然体会到安全档案的重大关系——我的两个对手必须接受劝告退出竞选。我问杰弗里他是否打算同他们两人谈谈。

“我不能。”他坚持说不能。“我没有看过那些档案。”我问汉弗莱行不行。

“不，大臣。那是党内事务。由我去将非常不适当。”

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桩事糟极了。他们要我去迫使埃里克和邓肯退出。他们要我去对我的一个同事说他是一个诈骗者，对我的另一个同事说他是一个性变态者。我不干。

汉弗莱说我毋须说什么，不用多说话。“您可以让他们知道您知道一些情况，这就行了。”看来是不行的。“他们俩会对我说该死，管你自己的事去吧。”杰弗里插嘴说：“如果他们这么说，你一定要说，作为党的主席，你有责任做到！如果他们要参加竞选的话，这些信息必须告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们——党的执行委员、党的主要捐献支持者和政治元老。也许还有朝廷。您必须对他们每一个人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退出并支持将……给他保护的某一个人。”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杰弗里要我去保护他们？

汉弗莱表示同意，并且说：他们的私生活谁也管不着，只要不涉及安全问题。

我真的不那么想去作这样的谈话。很遗憾地我对汉弗莱和杰弗里说我不愿去.....不能干这个。可是汉弗莱听不进去。他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他们这些事，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由于没有其他人知道我知道这些事，”我坚定地说，“我想把这事全忘掉。”于是汉弗莱就使出他的杀手锏。“大臣，去干的话，说明您非常勇敢。”

我吓了一跳！勇敢？我不想干什么勇敢的事！那是要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事业的事啊！

汉弗莱爵士依然心平气和。“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后来透露出来，说你早知道那些信息而又加以压制.....”

我打断他的话。“你的意思是你会透露出去？”我吓得目瞪口呆！

汉弗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将被认为是掩护包庇您的好友。‘没有人的爱比这个更大了’[\[41\]](#)，他肯牺牲他的事业.....”我对他说不要再威胁我。

他试图安抚我。“不，大臣，我在帮助您。”

杰弗里拭拭他那发光的前额并遮住他的秃

顶。“你要明白，吉姆，凡是当首相的人需要另外一种素质。杀手的本性。”

他说得对。杀手的本性。但是我有吗？让我们等着瞧。既然我知道埃里克和邓肯的那些事，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他们背后捅一刀了。

或者当面捅！

嗨，我的上帝！

1月5日

我认为现在是好的时间了。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邓肯，对他说关于竞选首相一职，我有非常迫切的事要同他讨论。我不愿在电话中谈出这件事。说实在的，我几乎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我必须说的话。但是我力图让声音显得很高兴，让他以为我有好消息告诉他。

他取消了一些约会，晚饭后就来到我的公寓。我给他倒了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我们坐在火炉前。我事前告诉安妮和露茜[\[42\]](#)不要露面。

邓肯异常高兴。他举起酒杯。“为十号干杯，嗯？”

“谢谢，”我不加思索地说。他古怪地瞥了我一眼。我不知怎么地对此作了纠正，把酒喝干，再为自己斟了一大杯。我在餐具柜那里转身看到

邓肯带着怀疑的神气在看我。

“怎么啦，吉姆？”

“邓肯，我有一……一个问题。”

“你不打算支持我了？”

谈话在失去控制而且仅仅刚开始。我喝干了第二杯，告诉他有些信息传到我那里。严重的信息。同他的个人经济活动有关。

当然，他假装不懂我的意思。于是我提到大陆和通用公司的倒闭，这件事他说不过是运气欠佳。我又提到早些时候把经费转到董事会提名的一些公司的事，他回答说那没有什么不对。

我回答说按法律规定是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把它同近海证券公司这个类似的情况连在一起看……我把要说的话留在嘴边，没说完。

邓肯倒抽一口气。“你从哪里搞到这一切的？”

我没回答。但是我表示如果他仍要竞选首相的话，我有义务去向党内老党员、税务局、诈骗检查队等等托出真情。“如果一切都光明正大，就没有问题，”我天真地补充说，“你说是什么，我就相信是什么。但是美国人还须知道这事。还有女王陛下……”

他喝了一口，考虑他的处境。“没有什么不正当之处，”他说。这个否认是不十分令人信服的。

“好，”我高兴地说。“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我就感到轻松了，可以对他们大家这样说了。把事情都摊开来。”

他感到惊慌。“等一下！经济事务是可以被错误地理解的。人们完全误解了。”

我啜了一口酒，等着。毋须多久。按邓肯自己的说法，据知他并不真正要进入十号。他说他从未真正要过。他认为在许多方面，外交部的职务好得多。他想使我确信他要进十号不过是为了不让埃里克进去。“我只不过要把一点说清楚——我不会支持埃里克！”他情绪强烈地坚称他决不会。

我暗示埃里克也许当不上。“你把一切力量转为支持另外一个人，怎么样？”

邓肯显得茫然。“谁？”

“问题是要找一个能够认识你的素质的人。一个要你继续当外交大臣的人。一个会谨慎处理大陆和通用公司的人。一个你信赖的人，一个老朋友。”

我想了一下，我做过头了吧。我是邓肯的一

个老相识，可是很难说是一个老朋友。而且很明显，没有他信赖的人。一个都没有。

但是他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我，我回之以微笑，逐渐地我看出他明白过来了。

“你意思是——你自己？”他问道。

我假装感到吃惊，“我？我在这方面从来没有雄心，绝对没有。”

“你的确是指你自己，”他轻声地说。他懂得这个代码。

也许我的确具有杀手的本性。

1月6日

今天我处理了我的另一个同事和对手。一切都经证明比我想象的来得容易。

埃里克前来下议院，想喝些什么。这一次我发现自己能够比较迅速地谈到正题。我已经尝过血的滋味。我当然相信一个谋杀者已经杀过人，要他再杀一个人是容易得多的事。

不管怎样，我大致上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事。他脸色发白，一口喝完威士忌。我又给他倒了一杯。

“好，再来一杯，”他轻声地说。“我需要一杯烈性的。”实际上，喝什么酒看来不是他的问题

所在。我问他是否体会到他自己的处境是……严重的。

他阴森地说他看得太清楚了。他痛苦地看着我说：“你不打算帮助我，对吗？”

“是，”我说。

他搞糊涂了。“是，你打算帮；或者是，你不打算帮？”

“是，”我说，并且急忙添上“是，我打算帮助你。不过不是帮你选上首相。”

“你说过你打算这样做的。”

说真的，他怎么看不出现在事情是大不相同了呢？我耐心地指出我曾经表示过要帮他，但这是在我知道阿根廷那个可疑的女士以前。还有其他几个。

“要知道，埃里克，作为党的主席我有我的责任。如果你成为首相而事情透露出来，那对党将是一场大灾难。”我理会到这句话里含有非故意的暗示，所以我急忙讲下去。“我的意思是，我不愿意向女王陛下述说你的私生活，你愿意吗？”

“我要撤退，”他咕哝地说道。

我认为也到火候了。如果他过去经常多实行

一些退缩克制的手段，他现在也不至于处在这样的困境了。但是我肯定地对他说我们不会再提起这事。对谁都不说。

他不快地说了声谢谢，还咆哮地说他料想那该死的邓肯要进入十号了。

“除非我做不到，他是不会的，”我对他说。

“那么是谁呢？”我向他举杯，微微一笑地说：干杯！”

最后明白了。他张口结舌。他吃了一惊！“你该不是指——你吧？”他喘着气说。

我又一次假装感到意外。“我？”我天真地说道。“我们的孩子都快到年龄了，安妮和我都在想多花一些时间——比以前多得多的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哩。”

他完全理解。“你**的确**指的是你。”

真是有趣！

1月9日

事情在迅速发展。虽然埃里克和邓肯两人都退出竞选，除了我、汉弗莱和伯纳德之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麻烦的问题是，尽管他俩已经退出，我**还没有进入**竞选。我的确需要一些哄动公众的成就，在关键时刻能使党转向我的一边，

这样其他人可以貌似有理地退出竞选。

我的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被那个糟糕和棘手的欧洲香肠问题拖住了，我总得想些什么办法从中搞出一些名堂来。或者说从这个熟食中搞出一些什么来。

但是我们今天顺着这条道走了一大步；我必须说，该赞扬的还得赞扬，汉弗莱这老家伙十分得力。

显然，把我陷入困境的欧洲专员莫里斯昨天还在伦敦。汉弗莱打听出他所乘的那架飞机延迟起飞，于是设法约定同他进行一个简短的会晤。

我接到通知，召我去内阁办公室汉弗莱的密室开紧急会议。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切都是在这样短时间内安排的，而且通知又局促，因此我到那里时仅仅比莫里斯早几分钟。我对汉弗莱的战略一无所知，或者说完全不知道我要不要讲话或者讲些什么。汉弗莱仅仅低声地对我说他希望能劝说莫里斯来解决我们那个小小的香肠问题，并且要我让他一手主持会谈，让他一人说话，只要在他要求支持的时候给他支持就行了。

莫里斯笑容满面地来到了，用发音不正确的英语说：“吉姆，我有幸被邀，该谢谁呢？”

当然我不知道如何作答，可是汉弗莱马上前

来解救。

汉弗莱请我们都在他的密室里坐下后，他开始解释道（完全不是真话），是我要他安排这个会晤来探讨一下专员能否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真谎言——实际上宁可以说，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因为我国政府的整个惯例是公务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总归功于大臣。同时也理所当然地，他们犯错误，由我们承担一切责任，他们偶然想出了好主意，我们当然应该得到功劳！

不管怎样，我点点头并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是有一个问题，莫里斯说他当然会予以帮助。

“问题是，”汉弗莱平和地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这里越来越不受欢迎，很不欢迎。”他转首问我不是这样吗，大臣？”至此没有问题。“是，”我说。

莫里斯早已知道这一点。他问道：“而你们想恢复它的形象？”

“是，”我说，但过早了一些。

“不，”汉弗莱坚定地说。

“不，”我急忙纠正我自己，并下决心在没有弄得很清楚汉弗莱要我说些什么之前，我不再开口。

汉弗莱继续说下去。“问题是大臣觉得可以得到多一些选票——就是说，他能更好地表达英国人民的意见——如果会同人民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一起进行抨击而不是一跃而起为它辩护的话。”他对我看看。我很高兴地同意他的说法。再者，实际上那是真实的情况！

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威胁会这样使他心烦意乱。对他来说，这不应该是一桩新闻。可是他似乎大大地吃了一惊。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进行规劝地说：“可是……你们政府已经答应支持我们。”我没有把握，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一点，因为我尚未懂得汉弗莱的主旨。不过汉弗莱又来解救。

“据我的理解，大臣的要点是，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是针对概念和条约的。”

“条约，”我坚定地重复一下。

汉弗莱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固执不让的，他说：“但是它并不是在制度上，或者具体做法上，或者个别的政策上，承担义务。大臣，您刚才正在向我举一个例子，是不是？”

他对我看了一眼。这就是对我的暗示。可是我想象不出他要我说些什么。他一定从我的目光中看出有些恐慌，他提示说：“关于食物生产。”

我突然懂得了他的计划！“是。”我以坚韧锐利的目光凝视着莫里斯。“我近发现你们的一个职员花了全部时间付钱给人，叫他们去生产粮食而他隔壁办公室里的人花了全部时间付钱给人，叫他们去销毁粮食。”莫里斯被激怒了。“这不是真的。”

汉弗莱和我感到惊奇。厚颜无耻的否认？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从他们的嘴里听到这情况的。

“不是真的？”汉弗莱问道。

“不，”莫里斯说。“他不是隔壁办公室里。甚至也不在同一层楼上。”“大臣可以举出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荒谬的举动的类似例子，多至几百个，”汉弗莱毫不宽容地继续说下去。

“几百个，”我表示同意，同时想再举一个。

“莫里斯，问题的要害是，大臣正在开始考虑内阁某一阁员应当着手把这些事告诉英国人民。”

莫里斯现在可发火了。他大声说：“可是，这样做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意大利人也不会低头哈腰到这样的地步。”

我看出我的机会来了，去要对手的命。“意大利人可没有被要求把萨拉米香肠重新定名为‘乳

化高脂下脚管子’。”

事情都摊在桌面上了。莫里斯会不会接在我们后面干下去？对，他用双手抓住了棘手问题，迎难而上[43]。（这里哈克使用混杂隐喻，使我们能特别看透在我们一位伟大国家领袖的脑子里的思维连贯性的素质——编者。）

莫里斯谨慎地问：“你们有什么提议？毕竟我们都答应谋求融洽的。我们不能称它为香肠。你们建议叫它什么？”

我一点也没有什么想法。如果你不能叫它香肠，那么你叫它什么呢？整个的问题是我们应当能够叫它香肠。但是我早应当想到——汉弗莱却已想在前头了。

“政治涉及对事物的表达和描述。难道我们不能叫它英国香肠？”他咕哝说。

好主意！莫里斯曾经在几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语言中试用过：法语、意大利语、德语。那些大陆人，过度地卖弄名词！“嗯，对，我认为我们可以向专门委员会建议采用这个名词。”

当然，他可以建议。这是他无可拒绝的提请。

我们结束了会谈，大家都激动地一致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完全和万分令人满意的机构。我

甚至在莫里斯的两颊上都吻了一下。

他走了以后，我沉思好久。汉弗莱和伯纳德建议我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让所有的欧洲通讯记者都参加，告诉他们我已经解决了欧洲香肠问题。

可是我还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是新闻。对报界来说，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为什么我要给他们提供一项“非新闻”呢？已经解决的欧洲香肠问题不会把一个人抛到党的领袖的位置上去的——公众甚至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因此他们没有理由要关心我是否解决了呢？不，我已决定明天我要告诉他们关于一个灾难性的消息。他们会喜欢的。然后过几天，我再告诉他们一个喜气洋洋的胜利消息，那时我就成为一个英雄了。

1月10日

今天我举行了欧洲通讯记者的不供发表、无所归属的新闻发布会。

院外活动制度确实非常有价值。那些雇佣文人渴望拿到新闻，可是非常懒惰，愿意接受别人提供的任何信息。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同布鲁塞尔之间发生了一个重大问题。既然过不了几天说什么他们也会听到这件事的，我现在不妨对他们坦率一些，告诉他们这整个令人难堪的新闻。他们

贪婪地全部接受！

我说布鲁塞尔打算应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规定来使英国香肠成为不合法的食物。”

伯纳德显得十分担忧，急忙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我，提醒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计划并不是使英国香肠成为不合法的食物而仅仅是阻止我们称它为香肠。

我果断地把他的纸条揉成一团。伯纳德就是不懂政治。（虽然他的确懂得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区别——编者。）

我说现在在会上可以提问题。第一个问题提出的一点是与我所谈到的一样。“不合法，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把我的回答加了一个形容词。“实际上不合法，”我答道。“猪肉香肠必须含有75%的瘦猪肉，牛肉香肠也是一样。”[\[44\]](#) 《太阳报》的记者问牛肉香肠是否也须含有75%的瘦猪肉。这是典型的院外活动通讯记者。如果在一个智力测验中，他是唯一的参加者，那他将排在第三名。

我解释说，如果坚持香肠必须含有75%的瘦肉，那么这些香肠将被列入高档精品食物一类。这对一般工资收入者意味着什么太清楚不过了。

其中有一个记者问什么时候公布。我告诉他

下个月。我接着巧妙地补充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时候要否认。事实上，他们大概会对英国报界说，他们只是在讨论改变香肠的名字罢了。

最后，有一个记者问我政府打算怎么办。我显出绝望、可怜和不知所措的样子并且对他说我不知道；还说那是一个大问题，我不愿意佯称我们有答案在手。

随后我把他们送走，送到等候室去，新闻处会硬给他们灌酒的。他们走了之后，伯纳德紧逼着我。“大臣，您明白吗？报界会发表一些不是事实的消息的。”

“是吗？”我对他微笑一下。“多可怕啊！”

1月12日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关于香肠被宣布为不合法的消息在过去两天里都登载在头版上，而且占了一整版。它已经激起了一个大的政治风潮。所有的评论者和专家、权威都在不断地说，政府和党没有了领袖，香肠可以成为香蕉皮。

人人都在说继承问题不明确。杰弗里在整个礼拜里天天被人称为“非官方代言人，”而且摘引他的话，也被称为“消息灵通人士”、“党的看法”、“接近领袖人士”以及“发展着的舆论主流”。报上消息中整篇都是以他说的作为依据，说什么

党越来越感到麻烦，由于事实是两位竞选领袖职位的明显的候选人代表党的极左派。

我自己也在透露一点点东西，结果给埃里克和邓肯造成越来越高涨的压力，要他们退出以便有利于选一个调和折中的候选人。不幸的是，我与之谈过话的那些院外活动通讯记者没有意识到把我的名字提出来作为上述的调和折中人物，而是愚蠢地加上了他们自己的评论，结果竞争者中至今没有一个人抓住和理会公众的想象。令人吃惊的是，你还必须把一切的一切向记者说得清清楚楚才好！他们这些人不仅不会作出极简单的结论，而且甚至不会正确地引用我的话，实际上我说的是“温和”，不是“调和折中”！我已经计划好明天晚上叫大批报界人士出动来听我的选区演说。英国广播公司和独立电视新闻社都要去。伯纳德问我为什么它们对政府的火警和安全政策发生那么大的兴趣。

我没有回答。但是我肯定，如果我同时也讲些其他问题，他是不会惊奇的。

（哈克的重大演说确实吸引了整个报界、广播界和电视界，它们派许多人去参加。“接近大臣的人士”暗示哈克将作重要政策演说；对新闻界人士来说，很明显这意味着他要发动竞选领袖职位的运动。这主要取决于那天晚上他的演说的

效果如何。结果完全像哈克所希望和所计划的一样，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日记里的凯旋口吻上看出——编者。）

1月13日

我有一个感觉，今天晚上我要确定党的领袖地位；如果确定了，我进入十号便是时间问题。今天是星期五，十三日；十三是我的吉祥之数。（但是也许不是联合王国的——编者。）

在我演说过程中，几次爆发掌声，有几次长达半分钟；后我在欢呼声中和起立鼓掌声中就坐。演说的末一部分真正激动了他们。我认为我的前途也许可以当上一个主要鼓动家。

（这演说原来的打字稿已经失落，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全部发表。可是，我们可以复印其后一节文字记录——采自英国广播公司九点钟新闻记录。听众的反应也加上了——编者。）

THE ATTACHED TRANSCRIPT WAS TYPED FROM A RECORDING, AND NOT
 COPIED FROM AN ORIGINAL SCRIPT. BECAUSE OF THE RISK OF
 MISHEARING THE BBC CANNOT VOUCH FOR ITS COMPLETE ACCURACY.

"NINE O'CLOCK NEWS" "MIDNIGHT"

FRIDAY, JANUARY 13th

ACTUALITY:

MR DE HAAN, JAMES DOUGLAS (P): I'm a good European.
 I believe in Europe. I believe in the European ideal.
 Never again shall we repeat the blunders of two World Wars.
 Europe is here to sta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bow the knee
 to every directive from every bureaucratic Donquixote in
 Brussels. We are a sovereign nation still and proud of it.
 (APPLAUSE)

We have made enough concessions to th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agriculture. And when I say Committee, I use
 the word advisedly. We have pulled the wine lake, we
 have pulled the butter mountain, we have watched our
 French 'friends' beating up British lorry drivers carrying
 good British lamb to the French public.

We have bowed and scraped, doffed our caps, tapped our
 foreheads and kissed the other cheek. But I say enough is
 enough. (PROLONGED APPLAUSE)

英国广播公司

所附的文字记录根据录音打字而成，不是摘自原稿。由于存在着误听的危险，英国广播公司不能保证它完全正确无误。

“九点钟新闻”“新闻夜”

播送：1月13日

录音报道：

詹姆斯·哈克议员阁下：我是一个好的欧洲人。我相信欧洲。我相信欧洲

的理想！我们将永远不重现两次世界大战的流血。欧洲一直要保持下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屈膝于在布鲁塞尔的每一个官僚主义的波拿巴[45]的每一项指示。我们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为之自豪。（鼓掌）

我们对欧洲的农业政委[46]已经作出了足够的让步。而且我说政委，是经过周密考虑而使用这个词的。我们已经吞下酒湖，我们已经吞下黄油山，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法国“朋友们”痛打把英国的好羔羊运送给法国公众的英国卡车司机。

我们已经作躬打揖，脱下披肩致敬，拉下额发和凑上另一面颊去挨打，甘受侮辱。但是我说，要适可而止。欧洲人走得太远了。他们现在在威胁英国香肠。他们要使它标准化——他们的意思是要强迫英国人民吃意大利蒜味香肠和德国式小香肠以及其他蒜味油腻的食品而这些食品同英国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说得好，说得好”，“完全正确”，“对啦”，“让他们听听，吉姆”。）

你们要把意大利蒜味香肠连同鸡蛋

和熏咸肉一起当早餐吗？我可不会。而且我也不要！（满堂掌声）

他们已经把咱们的品脱改成公升，把咱们的码改成米。咱们放弃了六便士和三便士硬币以及两先令和两先令六便士的硬币。但是他们不能，也不让他们毁灭英国香肠！（掌声和欢呼声。）只要我在这里，决不行。（剧烈掌声）

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说：“我在这里站定。我只能这样做。”（哈克就坐。突然一大群人站起来表示赞赏和感激。）

（第二天，哈克接见著名电视采访员卢多维克·肯尼迪。我们有幸获得英国广播公司的全部录音文字记录，现复印如下——编者。）

THE ATTACHED TRANSCRIPT WAS TYPED FROM A RECORDING AND NOW
COPIED FROM AN INTERVIEW SCRIPT. BECAUSE OF THE RISK OF
MISHEARING THE BBC CANNOT VOUCH FOR ITS COMPLETE ACCURACY.

TRANSMISSION: JANUARY 14th

ACTUALITY:

KENNEDY: Your speech was strong stuff, Mr Thatcher.

HACKER: Well, it's something I feel very strongly
about. In fact, I sometimes wonder whether you media people
really appreciate how strongly the rest of us feel about our
country and our way of life. We love it and we're proud of it.

KENNEDY: Do you're at odds with Government policy
over the EEC?

HACKER: I'm very happy with Government policy,
Sir Edmund. Every. In Kennedy. It has never been Government
policy to abolish the British seepage. Seaports are not just
good to eat, you know. They're full of top-quality nourishment.

KENNEDY: Russia has denied ever wanting to
abolish the British seepage.

HACKER: Well, they would, wouldn't they? They
know what they're up against. They know the strength of British
public opinion.

KENNEDY: Besides, your speech certainly got a
lot of coverage and a lot of praise. Was there any significance
in its timing?

- 2 -

英国广播公司

所附的文字记录根据录音打字而成，不是摘自原稿。由于存在着误听的危险，英国广播公司不能保证它完全正确无误。

播送：1月14日

录音报道：

肯尼迪：您的演说很强烈，哈克先生。

哈克：唔，那是我深有所感的東西。事实上我怀疑你们新闻媒介人士是

否真正体会我们大家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强烈感情。我们爱它，我们为之感到自豪。

肯尼迪：所以您同政府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不一致？

哈克：我对政府的政策感到满意，卢多维克爵士。喔，对不起，肯尼迪先生。政府的政策从来没有想废除英国香肠。你知道，香肠并不仅仅是好吃。它们富于第一流的营养。

肯尼迪：布鲁塞尔已经否认曾经有过什么废除英国香肠的想法。

哈克：好吧，他们会有，不是吗？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麼。他们知道英国公众舆论的力量。

肯尼迪：大臣，您的演说当然是出色的报道并且得到很大的赞赏。在时间的安排方面，有没有什么用意？

哈克：你是什么意思？

肯尼迪：由于你们的党正在寻找一位新的领袖。毕竟您的名字已经有几个人提出过。

哈克：实际上，有很多很多人。但是不。绝对没有联系。我在那方面没有雄心壮志。

肯尼迪：您的意思是，您不愿让您的名字再进一步有所作为？

哈克：嗯，卢多……我一直在想要做的只是为祖国服务。我从未谋求官职。不过我想假若我同事们对我劝说，认为能作出好服务之处无过于唐宁街十号，那么，我也许会勉强地不得不接受这个责任，不管我自己的个人愿望是什么了。

肯尼迪：那么，如果您不参加竞选，您会投谁的票呢？

哈克：这个，当然时间还太早，没法说。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是消除分歧的时候，是强调相同之处而不是着重不同之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对手身上看到好的东西，不是盯着看他们的缺点。你要知道，卢多，人人都有好的一面——

肯尼迪——除了法国人以外。

哈克：除了法……不，即使法国人也是如此。

1月18日

近这三天里，我一直焦虑得很，什么都干不了；甚至连作些笔记为写日记之用对我也过于紧张。不过今天我成功了！我达到了！我进入了！

我干好了！我得到了！我胜利了！我将以愉快的心情叙述竞选领袖运动的后几件事情。

今天委员会举行年会——说的是党的领袖职位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埃里克和邓肯在我的成功的演说之后退出了，出乎意料地把我推向竞赛的前线。当然，他们不再相互投对方的票，现在两人都答应全力支持我。出于我抓住了他们两人的小辫子，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虽然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非常惊奇！

所以今天的唯一问题是议会党打算不打算提出另外一个候选人来与我对垒。如果是，我们必须举行一次选举。

今天早上我拜访了埃里克和邓肯去验证一下他们是否支持我。他们两人都有些暧昧，不太肯定。仍有可能他们退出后去支持另外一个什么人。如果是这样，我大概会在选举中获胜，不过焦虑的痛苦要再延长两三个星期——谁知道在那段时期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说在政治活动里，一个星期算是长的话，那么三个星期简直是永恒。

于是我去汉弗莱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在那里等消息，一直等到吃完午饭。难道电话永不再打来了？在他的桌上有两架电话。我问他，他们会打哪一架。

“这一架，大概是，”他回答道。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说“或者是那一架。两架都可能，说真的。”

我仍然不明白。连这一点信息都不让我知道。我对汉弗莱说我要坐下放松放松。我刚坐下，他的内部电话响了，我直跳起来。伯纳德来了。

“大臣，”他恭敬地对我说，“王宫打来过电话。”

“王宫？”

“他们在联系所有可能入选的候选人，看看他们是否有空在五点钟吻女王的手[\[47\]](#)。这当然只不过是的一致无异议的推荐的情况下才举行的。”我对伯纳德说，我想我也许可以腾出时间来出席的。

我们坐下再等。随后我提出一个天真率直和慷慨大方的建议（我现在认为我已经有些后悔），我请伯纳德在十号当我的首席私人秘书，如果我当上首相的话。

他的答复仍然是典型的含糊其词：“啊，大臣。天哪！”但是他微微一笑，脸上一片红晕。

我很高兴，就转向汉弗莱。他脸上马上显出冷漠的神态。我问他这样妥不妥。

“首相的话就是法律，”他冷冷地答道。

也许他是对的。我再一想，我是太匆忙了。我实在还未肯定伯纳德能否胜任，他太天真幼稚了。不过我敢肯定他总会设法对付过去的，而且他非常忠诚，从来没有搞阴谋算计我。（哈克称伯纳德为天真幼稚，在这个场合下，说明他非常缺乏对伯纳德的真正忠诚的意识，那是（虽然平分秋色）既忠于他的政治主子哈克，又忠于他的文官部门的主子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编者。）

我认为我可以比伯纳德干得好，（哈克是对的——编者。）但是，现在我已经这样做了。

在这时刻，伯纳德眼眶湿润，充满感激之情。电话响了，我抓起话筒。没人说话。汉弗莱冷冰冰地拿起另一架电话的话筒。“嗯？”他说。“是……是……是，他在这里……我告诉他。”

他挂了电话。我对着他看。我说不出话。但是我满脸上只是一个问号：是我吗？我没有人反对？我终于爬到那个油滑的柱杆顶上了？

“是——首相，”汉弗莱说。我幻想他好像怀着新的敬意在看着我。

未递给政府官员，供回家后做准备工作之用。

[2]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内阁秘书。

[3]由财政部常任秘书和文官部门主管等人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应当作出这种推荐。实际上，首相很可能接受阿诺德爵士的推荐书，特别是如果阿诺德爵士保证他的同事们都予以赞同的话。

[4]就是说阿诺德爵士可以挑选的职位——编者。

[5]就是让他可以悄悄地离开——编者。

[6]换言之，会被人完全理解的——编者。

[7]就是说正确地联系上下文来看——编者。

[8]分南北两部，南为现在的津巴布韦，北为现在的赞比亚——译者注。

[9]那时确实是制裁——编者。

[10]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原属阿根廷，1833年被英国占领——译者注。

[11]Pass on在英语中是“逝世”的婉词，也有“向前移动、继续前进”之意。此处听者以为说的是“逝世”，因此为之一怔而打断了说者的话——译者注。

[12]英语中所用的词是do for（为……干事）——译者注。

[13]英语中所用的词是do to（对待，对付……）二者相差一个介词，含意不同，听到这话的人对之的理解也不同。——译者注。

[14]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编者。

[15]同编者的谈话。

[16]英语中serve一词意指“服务”；在serve（to help）中它意指“起（帮助）作用”，所以哈克在改正时很容易，只要在serve后面加to help，把serve him改成serve to help就可以了。——译者注。

[17]即伦敦警察厅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18]他应说康斯泰伯尔(Constable，警察)，但说成辛斯泰伯尔(Cinstable)——译者注。

[19]他应说克里斯默思(Christmas，圣诞)，但说成克罗斯默斯(Chrostmas)——译者注。

[20]英语中表示“酩酊大醉”的一种极通常的习语（as drunk as a lord）。其中“王公”一词已失去其原来的意思。此处是俏皮话，指的是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他们还会让他东山再起的。——译者注。

[21]与编者的谈话。

[22]邮票背后有胶水，用舌舔湿便可贴上信

封。——译者注。

[23]英语中knock（击）somebody down（倒）with a feather（羽毛）是一个习语，指一下子使人目瞪口呆、大吃一惊之意，“击倒”之意已经失去，此处故意把它提出来作比喻之用——译者注。

[24]类似的谣言在哈罗德·威尔逊先生出人意外辞职的时候在怀特霍尔流传。

[25]汉弗莱大量使用反语修辞法，即使在他私人笔记中也是如此——编者。

[26]同盟者就是指在找一个第三者、更合适的候选人去当首相方面有所帮助的人——编者。

[27]这两件事是文官部门无论如何一定要避免的——编者。

[28]被操纵的人——编者。

[29]条顿族是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日耳曼人尤指德国人——译者注。

[30]英语中常说“从什么地方来”（where..... from）来表示“是什么地方的人”或出生地，原籍等等。那位官员按字面来理解，故产生下面的误会。——译者注。

[31]英语中常说“你是什么人”（what are

you) 表示“你是干什么工作的”职位或职业等等。那位官员因此也同样按字面来理解而产生了误会——译者注。

[32]德国人发音不准，把in the west（在西部）说成in the vest（在背心里），因此使听者莫名其妙，须加以思索才能理解——译者注。

[33]哈克的诙谐之处在于英语中“黄油”是butter，“好一些”是better，二词发音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元音。——译者注。

[34]高卢是西欧一个古国，“高卢（人）的”也可指“法国（人）的”——译者注。

[35]即憎恶外国人——译者注。

[36]英语中也有像汉语中的“好好先生”的说法，此处不妨套用成“扫兴先生”——译者注。

[37]詹姆斯·哈克——编者。

[38]在宣布辞职后，首相出国，表面上去友好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实际上，他是在安排有收入的巡回讲座和一些有利可图的咨询工作。

[39]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比特岛——译者注。

[40]上文的安全局原文为MI5，原来是陆军情报局5处，现为（Secaraty Service 英国安全局）

的代称，而汉弗莱认为该称它为 DI5（国防情报局5处的缩写）——译者注。

[41]此处引用《圣经》上关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那句话。——译者注。

[42]哈克的女儿。

[43]这两句原文都用的是英语中的习语：pick up the Ball and run with it及grasp the nettle with hands，所以接下来的“编者注”里提到哈克使用混杂隐喻——译者注。

[44]英语中，and beef sausages too这个词句意思指“牛肉香肠，也须含有75%的瘦牛肉”，但于是省略句，也可被理会为“须含有75%的瘦猪肉”，如果咬文嚼字的话。这里说明新闻记者的无聊，因为他没有什么可问的。——译者注。

[45]拿破仑一家的姓，此处指像拿破仑这样的为官者——译者注。

[46]哈克用的是Commissar一词，此词指政治委员，也指前苏联的人民委员或部长；他原本可以用Commissioner一词，指专员或委员，此处他是故意使用“政委”来表示他对共同体专员们的态度。

[47]新任命首相向君主宣誓正式表示效忠的礼节。

2. 伟大的计划

1月23日

近几天是非常兴奋的日子。我去了王宫，吻了女王的手，第二天早上我迁入十号。我从以前几任首相的备忘录里读到职员在前厅和导向宏伟的中央楼梯的长廊里列队向走进来的首相鼓掌。我奇怪为什么没有向我鼓掌。（这个荣誉传统上是给予一个刚在普选中获得胜利的首相的——编者。）我希望这不是不吉祥的兆头。

迁入需要一天或两天。首相住在“工作室上面”的套房里，整个建筑非常混乱。从外面来看，它像普通规模的乔治王朝时期的排屋中的一栋房子——但是里面却很大，像一座豪华住宅，一座微型王宫。

这是因为实际是两栋房子。不是并排的两栋（财政大臣住在十一号），而是两栋几乎是背对背的房子，由走廊、楼梯井和院子连接起来。每栋房子有五层或六层，在后面的那所房子里有一些雅致的大贵宾室，为接待我属下的国民之用。（哈克显然患着夸大幻想症，把自己与君主混淆起来——编者。）

整个十号的走道的主要问题在于几乎无法知

道你在哪一层，只要你一上楼的话；原因是它是两栋不同的房子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又下沉，地面向后倾斜。

但是我在迁入时所体验的迷惑不能与我今天的心绪相比——今天是我就职的第五天，在被带领到国防部下面的绝密工作室时所感到的迷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你所看到的正如你所预计的：五大洲的地图、坐在图像显示终端的姑娘、在桌旁办公的官员等等。陆军参谋长带我各处参观，他是将军，名叫杰弗里·霍华德爵士，活泼敏捷，身材高大，浅棕色的头发，浓厚的眉毛，有着一个清脆威严的嗓门。汉弗莱和伯纳德像往常一样，四处溜溜。

我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关于热线的。将军看起来有些惊愕。

“哪一条？”

“通俄国的。”

“啊！那是在唐宁街，”将军告诉我说。我扫了伯纳德一眼。为什么没有让我看？他脸上显出惊奇的神气——也许也没有给他看。

我继续说：“这样，如果有紧急状况，我可以直接接通苏联总统？”

“理论上说，是，”霍华德将军谨慎地回答。

“这意思是说不可以？”

“嗯，我们对新闻记者就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我们确实有一次接通了克里姆林宫，但是只是接上了总机接线员，”

“接线员不能替你接通？”

“我们无法了解实情，她听起来不会讲多少英语。”

“隔多少日子测试一次？”

将军茫然不知。显然，他从未想到有测试这么回事。

“他们尽力减少测试，”汉弗莱平和地插言道。“太多测试容易在那一头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凡涉及核武器时，避免恐慌是一件好事，您以为如何？”我当然也这样认为。

将军陪我走到一架电传机前。

“瞧这个——”他有意图地说道，“就是它了！”[\[1\]](#)

“是它？”我问道。

“是，”他说。

“好，”我欢欣鼓舞地回答。接着我就体会到

再说下去，我就更要摸不着头脑，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了。“哦……这是**什么**，正确地说？”

我随便问问，带着一种神气，希望它能够让人看来我是有知识的。

“这是触发器，首相，”汉弗莱喃喃说。

我突然感到心里一惊。“触发器？”

“是。核触发器……按钮。”

“这个？”我不能相信。我目不转睛地瞧着那架看上去单纯无害的电传机。

“间接的，不错是间接的。”将军看出我的担心。“这完全是电传中继线，直通在诺思伍德的英国海军舰艇。瞧，你只要发一个密码信号，然后诺思伍德的电传操作员发出一个证实认可的信号。”

“要知道，这样他就知道是你那里发来的，”汉弗莱爵士轻声地说。

“这个指示一经证实认可，目标指示一经确定，诺思伍德将向我们一艘北极星潜艇发布命令，实际是由他们按钮。”将军对这一切解说很满意。

看来一切都这样简单和预先安排好的。我发命令，他们执行。

我觉得一下子口干舌燥，但是我还要多知道一些情况。

“他们会干……就像所说的去干？”

“就是这样。”将军显然感到自豪。

“只要我一说干？”

“只要您一说干。”

“但会不会有谁……与我争论？”

霍华德将军为之一惊。“当然不会。在服役的军官服从命令，大臣，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接受这话。“但是假设我喝醉了呢？”我问，开个玩笑。汉弗莱相当严肃和过于严肃地回答：“整个来说，如果您不喝醉，那就比较安全些。”

“不错，不过……认真地说，如果我神经失常，那会发生什么呢？”我问道。

“我想内阁也许会看出的。”汉弗莱爵士试图让人听起来得到安慰。

我没有得到安慰。我认为一个人不能倚靠内阁能否注意到这样一类的事。首先，他们中间一半人，如果不说完全神经失常的话，也不全然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头脑清醒。

我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假定我下了按钮的命令，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呢？”

“那没有问题，”将军格格地一笑并说道：“永远没有谁会知道，不是吗？”其他的人都加以欣赏地格格地笑起来。

我也想格格地笑，不过不知为何我就是笑不出来。我代之以发问：我们实际上有多少炸弹？

“四艘北极星潜艇，”将军说。“每艘有十六枚导弹。每颗导弹有三个弹头。”

我的心算从来是不好的，这不是我的长处，我也不喜欢掏出我们的袖珍计算器。伯纳德看出我的难处，他开腔了：“一百九十二枚实际的炸弹，首相。”显然，大家事前已经把数目告诉他了。

一百九十二枚实际炸弹！这不宜于多去想它！汉弗莱又渲染了威力，指出每一枚至少五倍于广岛炸弹的威力。

他们都等着我说话。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被新职责所包含的恐怖和极端愚蠢大大地压倒了。

将军怀着同情和理解看着我。他说：“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不算很多。”那一点也不是我在想的！我尖锐地对他说，一百九十二枚炸弹在我看来是很多的。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同一千两百枚苏联导弹瞄准英国相比，不算多；他们储备着，等候刹那间的报复。”一千二百？我觉得我

应该坚定沉着。我评论说：“哟，英国过去总是向困难作斗争的，是不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不列颠战争……”

即使在我说这些话时，我也体会在极大困难面前勇敢地战斗这个概念，与在核战争的情况下是完全不相干的。

但是霍华德将军看出这是一个推荐三叉戟飞机的机会。他指出一旦它交付使用，我们就有强大得多的火力供我们支配。所以我们会有厉害的威慑力量。

“同时，”我说，“感谢上帝我们拥有常规部队。”他们都略带一些怀疑的神情看着我。

“首相，”将军生硬地说，“我们的常规部队至多只能顶住俄国人七十二小时。”

“至多？”

“至多。”

将军行了个立正礼，他穿的是便服，显得非常古怪。事实上，我想的是离题了；我在想：在我周围的所有这些人无疑都是军人，即使他们都没有穿军服。除非你愿意把宽松的蓝色细条衣服也称为军服，那他们当然是军人了。

我迫使自己去考虑我刚上任就听到的这样一条信息的可怕含义。“这样说来，万一俄国进

攻，我必须立刻作出决定，是不是？”霍华德将军摇摇头微笑说，“不，首相。您大概有十二小时的时间。”

十二小时？这就是我所说的立刻。我问他我们是否应当想些什么办法。将军果断地表示同意。他认为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但是他苦涩地告诉我，军方三十年来一直听到政治家们说，这个国家花不起钱，设法加强常规部队来担任这项任务。站在我肩旁的汉弗莱爵士点头称是。

“常规部队的费用非常之大，首相，”他解释道。“按一下电钮要便宜得多。”

1月24日

昨晚我睡不着。国防部之行深深地使我惴惴不安。我无法把那些数字从脑海里抹掉。我的思想集中的能力本是相当出色的，（我们相信哈克在这里不是说反话——编者。）可是今天我发觉很难把思想集中在我的工作上。

“七十二小时，”我发觉自己在同伯纳德会晤时禁不住喃喃自语。

“呃，首相？”他在设法把我拉回到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上来：同新西兰高级专员会见花七十二个小时，是否太大方了一些？”我揣度他是在故作诙谐。他可以看出我是在想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的部队只能顶住俄国人进攻的时间长短问题。我问他我们能否劝说美国人去加强他们的常规部队。

伯纳德认为这并不真正对事情有什么帮助。“显然，美国驻在德国的军队吸毒很深，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上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演习时，美国部队散开去树林里同女兵共进野餐。”

我问他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军队的情况如何，他说他们在周日还是可以的。我让他说清楚些。

“荷兰、丹麦和比利时军队在周末都回家去了。”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反常的事。我以我惯常的无情逻辑顺着他所说的情况得出结论：“这样，如果俄国人将进行侵犯的话，总的看来，我们倒宁可他们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发动进攻。”他点点头。

（事实上，即使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这几天内进行侵犯，也无助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营房远远在前线阵地的后面，侵略者无论如何将抢先到达那些阵地——编者。）

“这个情况是否有许许多多人知道？”我迷惘地问道。

他看出我在想的是俄国人。他解释说，如果他知道此事，俄国人肯定也知道。“克里姆林宫通常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卫信息还没有走漏到十号来之前，已经知道了。”

我加以总结说：“所以一切都要回到三叉戟上来了。”

“到了时候，”他表示同意。

“到了时候，”我进入沉思，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到了时候。

“如果发生作用的话，”伯纳德添上一句。

“如果发生作用的话？”他是什么意思？

他漫不经心地随口对我说：“首相，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新武器运到时，弹头配不上火箭的两端。北极星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您知道这一类的事。都载在档案里。”他草草翻阅着一个档案。“线路毛病，集成电路失灵，地面控制发射机的频率与导弹上的接收器的频率不同。”他带着抱歉的心情抬头向我看着。“好多年来，我们没有运送北极星的手段。巡航导弹大概也是这样。三叉戟可能也如此。”

我对他说，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把制造商告到法庭上去。伯纳德伤心地摇摇头，他说明要我们去冒引起公众注意和涉及名

声的险，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他说得对。安全部使这类事成为不可能。而且制造商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问他能否换掉和另找制造商。

“啊，我们是换过。”他吸了一口气说，“一直在换。但是麻烦的是所有制造商也知道。所以为什么那个鱼雷曾经落在桑威奇高尔夫球场上。”

我以为我听错了。鱼雷落在桑威奇高尔夫球场上？为什么我们在报上没有见到这条新闻？

伯纳德完全知道这件事。“那时被掩盖住了。俱乐部的会员第二天早上在平坦球道上只发现一个新的土墩罢了。”

我不知道我更加关心的是那次掩盖，还是鱼雷发生功能故障。我问伯纳德为什么甚至我们的鱼雷都不发生作用。他安慰我。显然，只有那些新的鱼雷失灵，其他的都发生很好的作用——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中设计的那些鱼雷。

可是它们都是四十年前造的。我想知道为什么它们比我们近生产的武器会发生更好的作用呢？答案是太明显的了，我自己应该想到和作出解答的：老的鱼雷曾经经过许多测试。我们现在花不起钱去对现代的武器适当地进行测试——部

分原因是由于太花钱，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如果发生一次核战争，它不会太久，来不及对武器进行测试已经结束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揭露会出现，既然我有权知道我们所有的军事秘密。我认为我好能了解它们。我问伯纳德：“关于联合王国的防御方面，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首相，我不知道您所不知道的是些什么。”

我不认为他的表现侮慢无礼，因为他接下去给了我一些有益的劝告。如果我要听听另外一种看法，我可以同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谈谈。很明显，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国防部的看法相当地不同。

我对伯纳德说马上去请他来。伯纳德迟疑了。我劝告说：“酒喝得慢一些也许更好。好不要让内阁办公室知道。汉弗莱相当心烦——他并不认为首席科学顾问是同我们一起的。”

我在《名人录》里查阅了那位首席科学顾问——艾萨克·罗森布拉姆教授，在阿纳姆获优异服务勋章。汉弗莱怎么可以不信任一个曾经在阿纳姆为我们作战和国王陛下为了他的勇敢而授以勋章的人呢？

“我怕这不能弥补他说话时带奥地利口音的缺点，”伯纳德评论说。“而且他没有去过牛津或剑桥。他甚至也未去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认为这又是伯纳德所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1月25日

今晚我请艾萨克·罗森布拉姆教授到我的套房里来喝酒。我的脑子有些眩晕。在政界里，会见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且同他交谈是不常有的事情。我过去当过工艺专科学校的教员，可是在学术生涯里也没有很多机会与人进行智慧的谈话。（看来哈克认为在工艺专科学校任教也是学术生涯的一部分——编者。）当然，在这两界里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是政治家从来不敢承认这一点，而学术界至少喜爱闲聊。

罗森布拉姆教授是一位个子小而结实的老人。年龄约七十五岁，清瘦，眼睛雪亮，头脑极其敏锐。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上辅导课的大学生。可是我肯定能从他那里学到一两点东西，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谈论对我的政府和我的国家的前途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将发生一些变动。（哈克在口授这一段日记时非常兴奋，以致他完全忘记有文官部这一回事——编者。）

今晚他顺道来访，进入十号时汉弗莱早已回家了。[\[2\]](#)我已向安全人员关照过让他由后门进

入，因为在前门总是有报界人员在注视着。

他第一句话便问我是否相信有核威慑这回事。

“是，”我说。

“为什么？”他问道。

我不十分知道该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人人都相信核威慑。

我请他把问题再说一遍。

“为什么？”他又问道。

“因为……它发生威慑作用，”我软弱无力地回答道。

“威慑谁？”

我从未遇见过一个说话这样简短的人。你在政界里永远找不到这种人，在学术界里也找不到。但是我不能摸透他究竟要说什么。

“请原谅，”我请他重复一遍。

“威慑谁？”他再问我一次。他看得出我不理解。他把问题再说得清楚一些，“它威慑谁？”

在我看来，这似乎很明显。“俄国人。不能让他们进攻我们。”

“为什么？”他又来了，使用那个恼人的小小

的词。老说**为什么**。为了拖延时间，我说“请原谅”，请他再重复一次。

“为什么？”

为什么威慑力量能威慑俄国人，不让他们进攻我们——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他问的是这个问题。我坚定地回答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会按钮。”

“您会吗？”他听来有些惊奇。

“哎……”我犹豫了一下。“我会不会？”

“唔……您**会**吗？”

“作为后一招，我会。肯定会。”我又想了一下说，“至少我**认为**我肯定会。”

他继续无情地问下去。我不得不谨慎地想一想。（哈克在这方面是生疏了——编者。）

“那么后一招是什么呢？”

“如果俄国人侵犯西欧。”这一点至少看来也是很明显的。

罗森布拉姆教授微微一笑：“可是您只有十二个小时来作出决定。所以后一招也是首先的反应，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我所说的**就是**这个？看来疯了。

那位首席科学顾问以挑剔的眼光盯着我

看。“好吧，您不用担忧。俄国人为什么要试图吞并整个欧洲？他们甚至连阿富汗都控制不了。”他一边说一边摇头。“不，如果他们要干什么，那将是萨拉米香肠战术[3]”。（萨拉米香肠战术是通常对“一片一片吃掉”策略的称呼，就是对西方不进行全面入侵而是一次吞并一小块。开始几个步骤往往不是吞并土地而是轻微地违反条约的一些举动、封锁道路等等——编者。）

罗森布拉姆站起身来。他兴奋地在我的起居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拿着一杯桔子汁，阐述各种各样的防卫方案。首先，他假设在西柏林发生暴乱，建筑物处在火海之中，东德消防队越过边境来救火。他突然停止踱步，瞪眼看着我，并问我这样的情况下我会不会按钮。

很显然，答复是不。罗森布拉姆点点头。他看来表示同意。然后他问我如果东德**警察**与消防队一起进来，我会不会按钮。我又摇摇头。我怎么会可以由于这样一个小小的领土侵犯行动而发动一次核战争呢？

罗森布拉姆又踱起步来。在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假定东德人派遣了**部队**，随后再增加部队——他们说不过是为了控制暴乱。接着俄国部队来替代东德部队。您会按钮吗？”

俄国部队在西柏林替代东德部队？我会不会

发动一次核战争？我看不出我怎么会这样做。我又摇摇头。

那位首席科学顾问又微微一笑，并高兴地提出下一“片”是俄国部队拒不撤走的策略。部队被“邀请”留下来支援民政管理。接着，民政管理署也许下令封锁道路和滕珀尔霍夫机场。于是西柏林被切断。（西柏林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块小岛，在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内六十英里处。在这一点上，“民主的”意指“共产党的”——编者。）他问道，**现在**我会不会按钮呢？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我需要时间来加以考虑。

“您只有十二个小时！”他厉声说。

我感到非常惶恐。然后我提醒自己和提醒他，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虚构；说完了我感到宽松了一些。

他耸耸肩：“现在您是首相。也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马上要来一个电话。”

电话真的响了！我心底里发慌，紧张之极。伯纳德赶紧从我的书房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拿起电话。“喂，是。”他转身对我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首相。”

恶梦要实现了？接着伯纳德说下去，“问您是否愿意在四月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年会上

发表演说？”

我过去想过我是愿意去讲的——但是在这时候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肯定。我不能作答。“是”伯纳德向话筒中说了一声后把电话挂了。

罗森布拉姆教授转身向我。他又开始说话了：“行，现在讲设想二。俄国军队的策略‘出于偶然’，使士兵故意越过西德边界……这是不是你所说的最后一招呢？”

“不，”我回答。看来还不是。

“好吧，”他很兴奋地继续说下去。“设想三。假设俄国人已经入侵和占领了西德、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再假设他们的坦克和部队已经到达英吉利海峡。再假设他们已布置就绪，准备入侵，这是不是最后一招？”

我设置障碍，说：“不。”

“为什么不？”他问。“为什么不？”

我脑子昏沉。我想从这一切中悟出道理来。“因为，”我支支吾吾地说，“因为……我们只能为了自卫而打仗。用自杀的办法，我们又怎能自卫呢？”

“那么，什么才是最后一招呢？那位瘦小年老的教授微微一笑。他耸耸肩，坐下，往后靠在炉火旁边的塞得厚厚的印花布面沙发里。“皮卡迪

利？[4]沃特福德峡谷维修加油站？革新俱乐部？”

我凝视着他，想把我的思想整理一下。“如果你这么说，”我对他说，“那么，核威慑就没有意义了。你是不是在说这个？”

罗森布拉姆教授摇摇头。“不——我不是在说这个。如果俄国人或美国人手里有炸弹，那么对方一定也有。我们倒不如保存北极星，万一用得着。”

我还没有懂得他确切地在建议什么。

他为我把问题说清楚了。“撤销三叉戟的订购。把您省下来的一百五十亿英镑花在常规部队上。因为您不会真的按钮，不会吧！”

“也许我会，”我审慎地说道，“如果我没有别的选择的话。”他叹了一口气。“但是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情况。他们决不会使您陷入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境地。他们将坚持他们的萨拉米香肠战术的，记住！”

“那么，”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如果我们把一百五十亿英镑从三叉戟上转移出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把它花在什么地方——坦克？”

“不。我们把它花在ET上。”他究竟在指什么？外星人？[5]

他看出我在想些什么，微笑了一下。“ET代表‘应急工艺技术’。机敏的导弹，目标的发现，红外辐射。ET需要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队来加以操作。”

这么一说，我得到了启发！我忽然看出该做些什么。所有情况都清楚了。非常简单，使人难以置信，可是**完全可行**。第一，我们撤销三叉戟。我们也不购置巡航导弹。随后我们采用征兵制，这为我们提供一支庞大常规军队而不仅解决了我们的防御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我们的失业问题！我非常兴奋地说明了我的想法，可是伯纳德提出了可以担忧的一点：“首相，征兵难道不是一项大胆的政策？”

伯纳德非常错误。征兵在充分就业时期里当然是一项大胆的政策——可是现在会使年轻人有事可干。

实际上，还有其他明确的好处。征来的年轻人可以学行业和技术。他们甚至可以读书识字——军队从来不让一个文盲退伍的，士兵退伍前必须识字。事实上，我们可以让年轻人受到全面教育，来补足他们的综合教育。

我们将这个举动称为国民服役，正如他们过去实行过的那样——提醒每个年青人将去全国为社会和国家服务。

那是一项伟大的政策，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新政。我要把它称为伟大的计划，哈克的伟大计划。我已经作了笔记，准备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概述这整个主意：“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岛国历史上，不时有大任降在一个人身上，他要带领他的人民走出幽谷而进入阳光普照的辽阔高地和太平盛世。”我奇怪为什么直到今晚才想起这一切呢？

（大概有一个理由：哈克和罗森布拉姆教授才刚刚见面吧——编者。）

1月26日

在这里，事情真的必须有所改变，而我便是要看到这些改变得以产生的那个人物。（上任后仅仅一个星期，哈克看来已经脱离了现实——编者。）

整个早上非常忙碌。忙于参加内阁委员会会议和委任我这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一些次要大臣。接着我上楼去我的套房吃午餐。

可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进去时，安妮正在穿雨衣，而且她情绪不太好。我仅以微微感到意外的口吻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她提醒我要去志愿服务委员会而且已经晚了一些。我不管那是什么组织。

我问她有没有可能搞些炒鸡蛋或什么别的东西果腹。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她对我说冰箱里有鸡蛋。

我不能相信她要我自己做午饭。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大男子主义者或这样一类的人，而我是首相，我有许许多多其他事情要干。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实在没有权利去内阁食堂[6]同我所属的唐宁街的文职公务员一起进餐。

我懂得她的中心意思。我们二人确实同意过，如果我当上首相并迁入十号，她仍可干她自己的工作。反正她曾经强烈反对迁到这里，现在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她表现这样的态度：在这里，没有很多清静的自由。我们刚在讨论鸡蛋问题和我对自己扮演哈伯德大妈[7]的角色感到相当不高兴的时候，有人在敲门，一个年青的女通信员带着外交部绿箱闯了进来。

“外交部电报，首相，”她解释道。

安妮感到极端厌恶。她抱怨说：“懂我的意思了吗？不管怎样，住在金鱼缸[8]里是够糟糕的了。我必须搬出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每当我要出去买一些香烟，在大厅里我不得不走过十来个新闻记者、一队电视片摄制人员、一连串通讯员和管家以及警察的面前，随后在街的尽头走过五十个张嘴凝视着的旅游者。什么地方都没有清静的

自由！”

我指出有一扇后门可走。她认为走哪一扇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套房是有绝对或者近乎绝对清静的自由之处。好吧，无论如何，总有一些清静的自由。

“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出她的中心意思。“总统在今天早上两点从白宫打电话给你，你还睡着，这又怎么说呢？”

我相当愚蠢地回答，在华盛顿只是晚上九点，这一辩解我知道从她观点来看无补于事。我正打算说明那是一个重要电话，讨论我行将去访问华盛顿的事，又有人在敲门，冲进两条嗅探犬，伸着舌头，背后跟着两个操纵的警察。显然，发生了炸弹恐怖，他们必须进行搜索。

安妮对我看看并问道：“这是清静的自由吗？”

在我看来，她并不十分有理。可以肯定她宁愿接受安全检查而不愿被炸死。我对她说如果她要清静的自由，她尽可以去花园散步。那里我从未看见有什么人。

“我试过，”她带着反抗的情绪回答道。“大概有六十个人从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和内阁办公

室的窗户里盯着我看，活像我在监狱院子里做操，囚犯和狱卒在观赏。再想想，我们实际上住这屋子还须付房租。他们应该付给我们钱。”

我必须承认我同她一样对付房租有怨言。我早应想到——我**确实**认为——出于为国家服务而作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他们应当免费供给我们住处。（许多非政治家并不单单按“很大的个人牺牲”来看待获得国内大政治权力和重要职务任命权的。还有其他许多人可能在奇怪为什么哈克会这样想象的：他在获取了权力之后，应当有权住房而免付房租！——编者。）

犬和管犬的人走了。我对安妮说：“喂，这里实在是一个相当美好的住处，至少是安静。”这是多么糊涂的一句话——我话音未落，就在窗外，那该死的铜管乐队开始吹奏《皇家骑兵卫队列队行进曲》。

她对我咆哮说：“从今天早晨七点钟起就这么着。”不错，但是这是皇家骑兵卫队在列队行进呀，他们是皇家骑兵卫队么——他们总得在什么地方作操练的演习。当然我还算幸运，因为每天早上七点钟以前我反正已经起床了。

我试图使她平静下来。“要讲道理，安妮。公职的生涯免不了要求一些牺牲。”她扣上雨衣。“好，我牺牲睡眠。你牺牲午餐。”她说罢就

走了。

我追着问她：“**你**午饭吃的是什么？”我向楼梯下面大声叫喊。

“半条约克郡巧克力。”

我怒火中烧，回到套房里去找剩下的半条。连这个我都找不到。在冰箱里确实有几个鸡蛋，可是我就是不能面对下厨房这件事，我接受不了。于是我闷闷不乐地绕着楼梯往下去，漫步走进书房。我饿着肚子站在窗前观看军乐队来回行进。我在私人专用办公室里留了一张条，这样伯纳德吃完午饭回来，见了条子就会立刻赶来看我的。

四十五分钟以后，他冲进来了，吃得饱饱的，高兴得很。我转身问他午餐吃得好吗？

他有些惊奇。“是，很好。”

“你在哪儿吃的？”

“内阁食堂。”

“三道菜？”

“对。”

“喝酒了？”

“一杯红葡萄酒，不错。”他歇了一下，在猜想我是什么意思。

“嗯……大臣，如果您有兴趣听的话，我喝了咖喱肉汤，接下来是小牛肉排加炒土豆泥，还有……”

“我没有兴趣听，伯纳德，”我厉声说。“你要不要知道我午饭吃的是什么呢？”

他感觉到我心烦意乱，但是仍然不懂为什么。“嗯……您想告诉我吗？”他问道。

我不乐意地微笑了一下。“是，”我厉声回答。“什么都没有吃！”

“您在节食吗，首相？”

我简单地说明我并不是在节食。我表示我万分惊奇，我方才才知道十号有供应饮食的设施——伯纳德和所有私人秘书以及整个内阁办公室、新闻处的人员，还有花园室[9]的姑娘们、通信员……都可以去享用，就是我不能。可是该死的，却让我住在这里！

伯纳德问我哈克夫人能不能为我做饭。我提醒他，她有自己的工作要干。接着他提出他可以替我找一个厨子。这看来是一个好主意——再仔细一考虑，我得自己付钱雇用。据伯纳德说，一个专职厨子大约每年得付八千到一万英镑。我可花不起这笔钱。为了他自己脱身不再干系，他建议我可以去向内阁秘书提出——显然他不愿卷入

这样的一种讨论，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权力来改变制度。

可是当时我非常恼火。一想到这个，我现在还火着哩。当时我转身向着窗户，暗暗发怒。

伯纳德清清嗓子：“我料想内阁秘书反正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到来。所以让我们处理一些国家事务？”

“去你的，国家事务，”我答道。“我要一个厨师。”

伯纳德答应这件事会办到的，并且招呼十号的新闻官马尔科姆·沃伦进屋。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直率的约克郡人，一个专业的公务员，对现实世界各种事务如何处理的意思很强。他是我的前任委任的，不过把他留下来是为了他能紧紧有力地控制院外活动的通信记者和整个怀特霍尔街的公共关系机器。

我请他说得简短些，由于我要随时去会晤内阁秘书。

“遵命，首相。两件事。第一而且是重要的，我们应当讨论您作为首相后的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的问题。”

这是多么重要的大题目，所以我请他延迟一两天再讨论，这样我们可以有时间去深入研究一

下。

另外一件他要讨论的事是我去正式访问华盛顿的问题。当然，这比起第一次电视演讲就不那么重要了。

他想提出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大量的报界人士都要跟我们一起去看华盛顿。我认为这是好事。马尔科姆却担心费用问题。可是我对他解释这次访问是极端重要的活动。我将站在白宫的草坪上，同美国总统并肩站着。将奏起两国的国歌。两位世界领袖要一起照相。总统将向全世界谈到我们两国之间的愉快关系、我们的团结和决心。他大概会说一两句关于我本人的勇气、智慧和政治家的才能等方面的话。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他这样说了，将全面报道到我们英国。这种宣传对英国是至关重要的。（哈克的意思是，对他是至关重要的——编者。）对我们的威信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威信——编者。）对我们世界上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编者。）

马尔科姆立刻表示同意，特别当我对他说明：作为政策来讲，我的意图是，关于国家的各方面的成功，对报界不应保密。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对政府的各项成就，绝对坦率。我要求对政府的每一个胜利抱大胆的诚实态度。

他懂得我的意图。他吹毛求疵地提出了一点：由于我就职只有七天，还没有那么多的胜利可言。完全正确。但是会有的。

我还向他提供了一篇新闻稿的一个好素材：我告诉他今天我不得不自己做午饭吃。我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看来还没有人对他说。于是我向他全部托出——楼上套房没有配上厨师或管家，安妮有她自己的工作要干，我们花不起钱雇用人员以及看来好像我得自己洗盆碟和洗袜子，如此等等。

他在理解别人意思方面有些迟钝。他看不出其中可以产生一个好的新闻报道。我说明道，他可以按照这条思路来写报道，即“吉姆·哈克没有被难住——他能同情普通老百姓的难处”，诸如此类的新闻稿。

马尔科姆说他要再想一想。“我们不愿意您被人看来似乎太普通一些，首相，即使您是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指这个方式听起来有问题？我并不认为如此，因为他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这种宣传可以产生相反的效果。您记得吉米·卡特受到一只兔子的袭击那回事吗？”

我隐约记得。他看来有些像一个傻子。还有他那张在户外慢跑的照片，看起来他快要完全倒

下来的样子。他大概认为给他照一张他在锻炼中的照片是一个好主意——可是选民们看了这张照片之后认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因此失去了好多人的支持。马尔科姆要谨慎从事也许是对的。

马尔科姆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也许比较好的做法是，把您的形象一点点树立起来，进行一些宣传——登载几张您在洗衣服，身上弄湿了之类的照片。”

我叫他退下并且告诉他我要想一想，同时伯纳德把汉弗莱带进屋里。

“好，”他起劲地说。

“我当上首相有一个星期了，”我说。

“您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首相，我敢说。”

我很高兴。能得到同事的称赞总是好的，特别是像汉弗莱那样顽强的同事给予的称赞。我对他说我不是在沽名钓誉。但是事情一直进行得很好，而且我很高兴他看到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立刻发现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错误，而且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我随口议论说，得以给我们的一位老盟友以报答是一桩愉快的事。“罗恩·琼斯对他得到贵族称号高兴吗？”我问。

“啊，是，”伯纳德说。“他说他的会员们会很

高兴的。”我不能想象伯纳德说的是什么。“会员们？”

“联合会会员们。全国联合会……”

我豁然开朗，知道出了什么错。我大发雷霆。“不是他！”我大声叫喊。“我指的是我们的后座议员。我要给这个罗恩·琼斯

贵族的头衔，不是那个罗恩·琼史。”

“哎哟，”伯纳德说。我认为他的反应相当地别扭。

我们都坐下来互相盯着看。现在是无可挽回的了。伯纳德试图尽量善以处之。“首相，我猜想他是非常高兴的，这也许对您是一个安慰。”

我敢说他是既高兴，又吃惊！我问汉弗莱对于“这个”罗恩·琼斯的贵族称号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也给他一个？汉弗莱认为不可。“恕我直言，首相，我们不能推出两个罗恩·琼斯去上议院——这样做了，就像廉价出售的一批杂货。”

但是我已经答应给他某种荣誉的。我们都抓抓头皮。然后汉弗莱有了一个主意。由于罗恩对电视很有兴趣，而且不是泛泛的兴趣而已，加上他还有一架电视机，我们可以委任他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主管。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一些重要的事务。我向汉弗莱说明我们楼上套房需要一个厨师兼管家。

他建议我可以登广告聘请。他不懂我的中心意思。我说明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派遣的厨师兼管家。

正如我同伯纳德谈话以后所估计的，汉弗莱对我们并不完全有帮助。他说要获得一个政府派遣的厨师兼管家会是一件难事，由于十号是一个私人住宅，但它正巧是在一幢政府的建筑里。

我指出我正巧住在里面。于是——令人惊奇，令人感到意外！——我正巧吃在里面。“要一个人替我做饭不是不合乎情理的吧。”

“不是不。但是不可能，”汉弗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荒谬的事。汉弗莱要我接受这一点：我有权力把世界炸掉，但是无权要求炒鸡蛋。（哈克有权要求炒鸡蛋一点不在争执之中——编者。）

我再略为进一步地探究这个荒谬的说法，想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我问道，“假设我邀请德国大使来共进午餐，那怎么办呢？”

“那没有问题，”汉弗莱考虑了一下。“正式约会，按政府招待礼节，令人高兴的是，将会有五

道菜，三瓶红酒和白兰地。没有问题。”

显然，汉弗莱所说的是，德国大使的午餐是政府的事，而我的午餐便不是。而且不仅是德国大使的午餐，当然——**任何一位**大使的午餐都是如此。

于是，我就当场叫伯纳德拿出日记本来。然后我命令他为我安排星期一与德国大使共进午餐，星期二法国大使，星期三美国大使。接着不要忘记英联邦，在星期四我要同新西兰高级专员共进午餐。“伯纳德，在联合国里有多少国家？”他当然知道答案。“一百五十八个。”

“好，”我面露喜色地对汉弗莱说，“这就够我安排约六个月的午餐了。然后再轮流安排下去。”

伯纳德急忙翻日记本。“首相，您没有时间每天同大使们进午午餐。有时候，您还有其他官方的午餐要出席。”

“好消息，”我答道。“这样更好。我们就可以利用大使们来填空档。”

汉弗莱流露出担忧的神情，他说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也许对这件事有看法。（这无疑是会有的。据说总是有这样一种说法：首相同一位大使共进一次午餐会破坏两年耐心的外交努力。外交

部不太可能对这类的午餐作出赞同的反应——编者。)

我不那么在乎外交部说些什么。“没有人为我和我的家属提供饮食，这是十分荒谬的。”

汉弗莱不懂为什么。他不会懂得，是不是？他也是在内阁食堂吃午饭的。“首相，二百五十年来，事情就一直是这样安排的。”

“这是后一条明确结论了吗？”我问道。

“两个半世纪以来就是这样。”

伯纳德——感激他的好心——以他通常的学究式困惑人的方式插嘴说：“嗯……尽管我很尊敬你，汉弗莱爵士，恕我直言，”他无礼地开口了，“那不可能是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后一条结论性的理由，因为半个世纪以前它只是两个世纪以来的结论性的理由；一个世纪以前只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结论性的理由；一个半……。”汉弗莱恶意地凝视着他，他就停住嘴了。但是伯纳德的逻辑总是既无可挑剔，又不相干地离题离谱。

我赶紧插入来转移汉弗莱的注意力并把他的怒气从我的忠诚的私人秘书身上引开去。“汉弗莱，我没有被说服。我要一个厨师而且我要你办到他的工资有人负责。”

汉弗莱的面容很冷淡。他转身对我说：“那

么，让我这么说吧，由报界宣告您当上了首相后的第一个行动是把您自己的年俸实际上增加八千至一万英镑，您以为如何？”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永远没有人会知道。

汉弗莱猜出了我在想什么。“嘿，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其他选择。首相的薪俸和费用必须公布。”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不提到它呢？”我怀着希望问道。“公开的政府么，首相，信息自由么。我们总是应当自由地和坦率地告诉报界任何他们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容易发觉的事实。”我简直不能相信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不得不把它搁置一下。汉弗莱的立场是，自从十号于二百五十年以前第一次被用作首相的官邸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根据文官部门的推理，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汉弗莱改变了话题。“首相，您说过您一直在思考。”

“对，汉弗莱，”我回答道。“我们两人都承认自从我当上首相以来，事情进行得很好。因此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怎样保证这种顺利的进行能继续下去？’”

汉弗莱怀着希望凝视着我。“您有没有考虑过……巧妙地不进行积极活动这一着？”

荒谬。但是我对他还是耐心的。“不，汉弗莱，一个首相应当坚定。”

“那当然！”他同意说。“可是**坚定**地巧妙地来一个不活跃不积极，怎么样？”

我不能容忍自己当老好人——毕竟我现在是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不，”我微笑地回答，“我要**坚定**。”

“好，”汉弗莱说。

“而且要有决断。”我继续说。

“完全对，”汉弗莱爵士表示同意。

“而且要富于想象力，”我带着挑衅的心情说。

“富于想象力这一点我不敢苟同。”我敢**肯定**他没有想象力！

“首要的一点，我必须实施领导权，”我以这句话作为结束。

“领导权。”他以极端赞同的口吻说。“领导权，首要的一点。”

“由于我是首相，我有权力这样做，是不是？”

“当然，首相，您是首相么，您领导我们走向哪儿，我们一定顺从地跟着您走。”

于是我告诉他我的新政策。我的伟大的计划。我已经决定撤销三叉戟，花一百五十亿英镑来建立常规部队和ET[\[10\]](#)，实行征兵制，从而一揽子解决我们的国防问题、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教育问题和失业问题。”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看了伯纳德一眼，他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他的老上司。

我等汉弗莱的答复。但没有答复。无论如何，开始时没有反应。他看来完全不知所措了。我给他几刹那时间重新振作起来，然后由于我等得不耐烦了，叫他说话，有所表示。

“我……呃……这个主意哪儿蹦出来的？”这不是一个捧场的问题。但是我提醒他我不是一直在思考吗？

“您不能这么干！”他不顾一切地说。

起先我以为他在对我说：我不会思考，或者不准这样思考。但是他接下去说我所建议的完全是革命的，一桩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争辩就认真起来了。他的意思是我不能实行我的政策。哼，在我看来，这话他没有资格说。

他显然认为他有。“首相，您不能把这个国

土的整个防卫来一个重新组织，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更动！”

我的答复很简单：“我是首相。”况且他曾说过他会跟着我走。他也会赞成我应当有决断。他也会赞成我应当实施领导权。那么，他还在抱怨什么呢？（推测起来，汉弗莱爵士要哈克有决断，条件是只要哈克对他所赞成的事表示决断罢了——编者。）“此外，”我补充说我有这个权。”

他一点也不喜欢这句话。“对——但是仅仅是在法律和宪法、行政先例的约束、预算可能性以及内阁政府范围之内。您的内阁同事呢？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没有对他们提过。但是我知道他们会喜欢的。凡是能减少失业的想法他们会喜欢的。他们中间有一半人甚至会欢迎根据那些理由而实行的通货膨胀。而且我知道内阁会非常高兴，把撤销三叉戟多余下来的一百五十亿英镑移作其他公共开支之用。不管怎样，我是首相，他们怎么想有什么关系呢？

“内阁是我委任的，”我简单地说。

汉弗莱冷冷地微笑了一下。“我肯定您不想使他们失望的吧。”十分离奇可笑，正和他过去一直对我如此傲慢一样，我没有笑。我没有再说些什么，我就是等着他屈从。遗憾的是，他也不

再说些什么。

“汉弗莱，你成哑巴了。”

“您告诉我不少想法，使我只能闭口不言了。”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我们应该保留三叉戟？”

他只能以一个方式来作答。“这不是由我来说的，首相。”太对了。他只是一个文官。

“好，”我豁达大度地表示赞成。“那么我们算是一致了。”汉弗莱不肯放过。“但是既然您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得意。“那么讲下去。”

“是，”他阴冷地说。“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保留它。”

我对他说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意义。汉弗莱在摸索我的逻辑推理，他问我是否要购买巡航导弹，如果不保留三叉戟的话。

我对他说我的意图是，联合王国不应当再购买核武器。

他脸色变白。“但是首相——您不是一个私下的单方面裁军主义者，是不是？”我解释道，我不是这一类的人，我们还有北极星，而且我没有摒弃它的意图。

他放松了一些。至少（在他看来）我不是一个安全方面的冒险者，只是一个蠢人。他试图告诉我，北极星不够好，是草率构成的老装备，而三叉戟是第一流的——速度较快，能多装弹头，能自动地对准目标。按汉弗莱的说法，三叉戟几乎不可能被截击，而俄国人也许有一天很容易地发出一种多层弹道导弹防卫设备来截击北极星。

“哪一天？”我问。

“按战略需要，现在来说，哪一天都可能。”

我老远就可以认出这是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以哈克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哈先本人是以含糊其词作答的能手——编者。）我问他，精确地说，哪一年也许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2020年。”我微微一笑。他急忙补上一句，“可是这比您能想到的还早。”

“你不是在说这种导弹防卫设备可以截击所有192枚北极星导弹吧？”

“不是**全部**，不。但是实际上是所有的——百分之九十七。”

我拿出我的袖珍计算器，迅速做了几个加法。我抬头望着他。

“这样还有五枚北极星炸弹可以射入防御体。”

汉弗莱得意起来。“精确地说——仅仅是五枚。”

“够了，”我温和地提醒他，“足以抹掉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明斯克。”

“对，”他嗤笑道，“不过一共就是这一些。”

我不能肯定对他的话理解是否正确无误。“我认为这足以使俄国人停下来想一想。”

汉弗莱对三叉戟所抱的热烈劲儿是漫无止境的。“但是，首相，您难道不明白吗？——有了三叉戟我们能够抹掉整个东欧！”我不要抹掉整个东欧。我对他说我不要。他点点头，很不耐烦。他知道这一点。他认为我不懂他的中心意思。“那就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威慑物，首相。”

“但威慑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我对他说，“我大概不会使用”

“他们不知道您大概不会使用，”他争辩说。

“他们大概知道，”我说。

他不得不同意我的说法。“是，他们大概知道您不会。但是他们不可能肯定地知道。”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不过他们毋须肯定地知道。我说：

“他们大概肯定地知道我大概不会使用的。”

“是，”他表示同意，“可是即使他们大概肯定地知道您大概不会使用，他们并不肯定地知道：尽管您大概不会，不过没有可能性说您会肯定地使用。”

伯纳德在写谈话记录。幸亏他使用速写法，所以他在傍晚公务完毕时得以为我把这次谈话重新组织一下，见诸于文字。

但是汉弗莱能看出他的威慑论没有什么进展。因此他又试图劝我保留三叉戟，这一次他是恭维我和利用我的虚荣心的办法。我不能想象为什么他总是认为那个东西能产生效果！

“注意，首相，一切的一切压缩到一个简单的问题！您是首相，是大不列颠的首相。难道您不认为英国应当持有好的东西？”

“当然。”

“那很好。”他把我的答复看作是一个加以盛赞的暗示。“如果您走进核导弹陈列室，您会购置三叉戟——太可爱了，太精致了，太美观了，它简直完全是第一流的，而英国应当持有好的东西。在核导弹的世界里，好的东西是萨维尔·罗氏服装、罗尔斯·罗伊斯滨海路式汽车、1945年拉斐德庄园的葡萄酒[\[11\]](#)。是哈罗德公司能卖给您的佳核导弹！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不过，”我平静地回答道，“它要我们花一百五十亿英镑，而我们又不需要它。”

汉弗莱悲伤地摇着头。在他看来，我完全不懂他的中心意思。“对哈罗德公司陈列和出售的任何东西您都可这样说。”他蛮有理由地回答。

1月30日

今天我在十号举行一个招待会。六点半到八点。这是自从我当了首相以来的第一次社交集会，虽然客人中有许多是从上届政府留用的人员。由于我们都是同一党的成员，这没有多大关系。

在经历了长长的厌倦的一天之后，我对集会无所期待。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确实有出乎意料的事出现了。客人中有霍华德将军，大概一个星期以前，他曾经带我参观了国防部。我拉住他谈话。我告诉他我想从他那里探听他关于某一件事的看法，并且说他会喜欢这件事的。

“先说坏的事情吧，首相，”他生硬地说。

于是我谈了。我说这件事即使无疑对三军是一个严重打击，非常不受人欢迎，但是我还是想撤销三叉戟。

他咕哝了些什么，我只能听出一半。“噯，

等一下，”我说，“不要太快加以责备；争论是没有用处的。我……”我停止不说。我突然体会到我所听到一半的那句话的意思。我怕我是在幻想，因此我问，“你刚才在说什么？”

“好主意。”他总是话很简洁而且讲到点子上。我不能肯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你赞成？赞成撤销三叉戟？”

“当然。”

刚刚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所有关于国防的先入之见第二次被颠倒过来了。

我站在那里，凝视着这位有浅棕色头发、浓眉大眼、身高六呎四吋、有威胁力的巨人。“为什么你表示赞成？”

“我们不需要它，”他简短地回答。“那完全是浪费钱。完全没有必要。”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国内高级的陆军军官同意我的看法，说三叉戟完全是浪费钱。我对他说我希望保留北极星，保留美国基地和加强我们的常规部队。

“您是对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驯服的怪僻的人。“国防部所有的参谋人员都同意吗？”

他摇摇头不，海军想保留它，它是由他们的潜艇发射的。如果撤销三叉戟，他们就没有什么作用可起了。”

“所以他们会拒绝？”

“是，但是海军什么事情都加以拒绝。他们拒绝护航，几乎使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呢？”我问。

“噢，”他不屑一答地说，“您可以问问他们。如果您有兴趣知道车间机修工的意见，也可问他们。不过我怕他们还是要三叉戟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能从空中发射的那种形式的导弹，像从外星发来的一类的导弹。”

这一切突然使我明白过来。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历来认为三军对事情总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霍华德将军根据他自己的看法继续说明英国皇家空军的心态。“他们要的是能够由一架飞机来载负的炸弹，您明白吗？他们真正有兴趣的只是飞来飞去把东西扔在人们头上。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善于此术；他们甚至不能接近斯坦利港的跑道。他们甚至可能找不到莫斯科。即使他们找到了，也可能打不中。”

问题清楚了。如果只有陆军赞成我的政策，

那我怎样使它在国防部通过呢？我把这个问题向将军提出，他却有一个现成的解决办法。“国防参谋长的职位不久就要空缺。按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该轮到海军来担任了。不过那是由您来决定的。如果您委任一位陆军军人……”

他微妙地故意不把话说完。我已经明白他是那位资格老的军人。所以如果我委任他，国防参谋长就站在我一边。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够了；也不知道海军将作出什么反应，如果我忽视了

他们的人选。不过这在适当的时候，显然是我必须加以考虑的事。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那天晚上在唐宁街十号的招待会上同霍华德将军说了几句话。他们的谈话，不像使霍华德将军同首相的谈话那样，显然改变了事态的进程。汉弗莱关于这个谈话的回忆在他的私人文件中可以找到——编者。）

那位将军在同首相作了简短的谈话后，看来异常轻松，这一点我一直在观察。后来在适当的时间，我同他谈了话；他说他很高兴能遇上一位有一些头脑的首相。

我问他哪一个国家有幸获得这样一个领袖。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哈克，我

猜想哈克尚未充分地让他露头角。

我当然是正确的。首相已经同霍华德将军提过撤销三叉戟之事，但是**没有**提到重新采用征兵制的事。当我提到所有有关细节时，那位将军大吃一惊，正如我知道他会这样惊恐的那样。哈克要征兵，因为它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因此可以赢得选票。陆军不要征兵，而且从来没有要过。他们对持有一支精锐的、专业的军队感到十分自豪。军队很强硬、训练有素，可能是世界上好的军队。参谋长不要经过征兵而招来的乌合之众——窝囊废、嬉皮士、吸毒者和废物——五十万流氓无法发落，没有事可干，只有在奥尔德肖特削土豆皮。将军们都怕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军队转变为一支普通的军队。

（像打赢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支军队——编者。）

他们还担心那新通过的同等机会的立法。在美国，众所周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司令员都不知道派遣给他们的士兵是男还是女。直到这些士兵来了以后才知道，有时候即使已经到达还不清楚。

鉴于可能要进行征兵，霍华德将军认为，尽管三叉戟有许多毛病，还是保留它们为好。他敦促我想出某种办法来“阻止”首相，不要让他实行这个不幸的政策。

我解释道，不幸得很，无法“阻止”首相们。但是可以让他们放慢步子。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停了下来——在几个月之后，大多数新上任的首相们都多多少少逐渐停止进行了。

我的主张是去同美国大使悄悄地谈一谈。霍华德将军表示赞成。

1月31日

今天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先行来到。

早上，同汉弗莱、伯纳德和马尔科姆一起开会，我们审议了我访美之行的后筹备工作。马尔科姆去落实如何使英国广播公司和独立电视新闻社在白宫草坪上获得好的位置，以便他们能拍取我和总统的雙人特写近镜头。

我也对他说，要保证在白宫里面同样获得照相的好机会。我和总统两人一起合影。

我给了他我已经想好的所有应当成为照相场

合的主意，列成一张单子，包括第二天会谈的开始、总统对我说再见，充满希望地用他的左手抓住我的臂肘——他同西德总理也这样表示过，看来非常友好亲密的样子。

我要他同我们的大使馆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但是马尔科姆认为事情可能有困难。我必须说一句：我真不知道我们要所有这些大使馆干什么用。每当我们需要办什么对英国（即对哈克——编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他们总是制造麻烦。

这并不是由于我关心政治上的利益或想赢得选票，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私利，而是为了英国的好处，好让世界上其他的人把英国目为美国的一个平等伙伴。一切就是为了这一点。

汉弗莱不愿意再进一步讨论宣传方面的事。我不懂为什么。相反，他却给我看了内阁的议事日程。

你用不着成为波洛[\[12\]](#)才能看出这议事日程已经篡改过了。上面没有列入关于撤销三叉戟的讨论一项，这是明显的证明。我问汉弗莱为什么没有这一项——毕竟，他作为内阁秘书，草拟议事日程是他的职务。

“我们确实想讨论三叉戟问题，首相，可我认为把它再拖延一些时候也许更明智些。先彻底

深入一下，作出更细致的观察，思考思考牵涉到的问题，提出一些文件，举行部门之间的讨论，订出应付不测和意外事件的计划等等。我们讨论的是关于保卫王国的大问题。”

我不能相信他仍然以为这些老办法可以愚弄我。我当即责问他，他申明他是无辜的。“不，首相，说实在我没错，可是内阁必须要看事实。”

我苦笑地说：“这是一个新鲜主张。”

他并不觉得好笑。“首相，重要的决策需要时间。”

我立刻看出他在玩什么把戏：拖延战术。书本上讲这是古老的诡计。事情搁置越久，越难以开始。

谈到这里时来了那个坏消息。那真是一个炸弹。很显然，汉弗莱已经从美国大使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非正式地——说美国人将非常不高兴，如果我们取消三叉戟的购买，除非我们另外订购他们一种核导弹。

起先，我是不服的。毕竟我还得想到什么对英国更有利。但是看来他们自称他们之所以不安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我们这个伙伴并且不愿单独背起核负担。这一点是完全合

乎情理的，可是由于我们仍然持有北极星，他们又不愿意这样做。所以第二个理由才是真正的理由：实际上是小事一桩——在交易上要损失几亿美元和在美国宇航工业里要增加几万名失业者。

问题是，我对美国反对我的伟大的计划怎么办？我能干什么？如果有什么可干的话。我对汉弗莱说我并不打算改变我的政策。美国人还须学习如何承认和忍受它。

“按您的愿望行事，首相，”他说，“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您关于三叉戟的建议保守秘密，不公布，直到您访美以后，也许可以免去一些窘困。”

我尖锐地回答我不同意。“如果不得不进行一些强硬的对话，我倒不如在我与美国总统会见时干脆把它抬出来。”

他遗憾地摇摇头：“啊，那好，问题就在这里。您要知道，您同他开会的议事日程必须事先经双方同意。您不能老远地去那里就是为了闲聊。”

“为什么不？”

“哦……您也许想不出谈些什么。而且如果您的关于三叉戟的建议事先向美国人提出，据我所懂得的来说，访问的计划将稍有更动。”

“计划怎么更动？”

“总统不会同您见面。副总统会接待您。”

我极度惊愕。副总统？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他不是认真地说这些话的。但是他是认真的！

太荒谬了。太荒唐可笑了。完全是侮辱。即使是博茨瓦纳，总统也会见的。（因为博茨瓦纳没有刚才取消三叉戟的定单——编者。）汉弗莱试图尽他的可能把话说得好听一些，温和一些。“我肯定他们会处理得很得体的，首相。如总统会患一种‘外交’手段的牙痛，像赫鲁晓夫一样。或者他们会解释总统患了卡他[13]，或者大拇指挫伤或什么啦。可能已经睡熟了什么的。”

汉弗莱知道，我也知道访美之行的整个中心意思是获得公共关系方面的价值，让人看到同总统会见。我问他我们有什么选择可言，他向我劝告说，实际上我一点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我要总统来接待，我不得不把三叉戟问题在议事日程上抹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有朝一日我必须向美国提出。不是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较妥呢？可是，这事必须这样处理，也必须这样处理了，无可奈何。

剩下来的问题是我究竟该不该在内阁提出三叉戟的事。汉弗莱劝我把它搁置起来，待回来以后再说，以防万一这样的讨论透露给美国大使。他可能是正确的。显然，有人已经把这个题目透露给他了。我奇怪那是谁呢？

“无论如何，汉弗莱，”我可悲地说道，“一个新上任的首相必须显示他已经到任了，显示在十号有一个新的头脑和一只坚强有力的手。我一定要成为显要闻名于世。”

接着汉弗莱透露了一个好消息。看来我已经有所成就，是我的前任中间谁都没有做到的一件事。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厨师从内阁办公室的食堂那里调任到我的套房来替我们做饭，如果需要的话。当然，周末和法定假日除外。

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在历史书上将占有一席之地。我认为这就表明我已经开始走上我决定要继续走下去的那条路。我是负责人，文官部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十号里有一只新的头脑和坚强有力的手。

我对汉弗莱说，至于三叉戟问题，我不打算改变我的政策，而且我也不打算改变我的主张。在适当的时期，我将失掉它。（推想哈克的意思是，他将失掉三叉戟，不是他的头脑——编者。）但是与此同时，我看不出把三叉戟的讨论

推迟到等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有什么妨害。我当场就告诉汉弗莱我的坚定决心，把三叉戟从明天的议事日程中删去。

他顺从地接受这个决定。“是，首相。”他恭敬地回答道。

[1]将军说的 Now this is it! 意思是“瞧这个东西多棒，就数它了！”是一句常用口语，但按字面来理解等于“这个就是它了”。哈克就是这样理解的，以为“它”就是指上面所说的“热线”，所以接下来他问“是它？”

[2]下午六时回家。

[3]也称“渐进战术”；萨拉米香肠即意大利蒜味香肠——译者注。

[4]伦敦一地区，以其时髦的商店、俱乐部、旅馆和住宅著称——译者注。

[5]英语中“外星人”是由和extra和terrestrials二词构成，二者第一个字母分别为E和T，与“应急工艺技术”（emergent technology）一样，也是E和T两个字母的缩略——译者注。

[6]附属于内阁办公室。

[7]童谣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8]习语，指无法躲人耳目的地方或大庭广

众、众目睽睽之处——译者注。

[9]这名词专指十号的登记处和打字组的非常高级的女士：她们在通向花园的一间地下室里工作。

[10]ET在此表示应急工艺技术。

[11]这些都是佳产品之意，例如“罗尔斯·罗伊斯”（Rolls Royce）一词还成为“佳”的形容词，Rolls Royce Piano 是指佳钢琴——译者注。

[12]女作家阿茄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主人公比利时大侦探。

[13]喉鼻部黏膜炎。

3. 大臣级的广播

2月6日

今天的事我记不得多少。昨晚我从美国归来，整个晚上睡得相当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来到书房。可是我用不着匆匆忙忙。我要同汉弗莱谈一件事，可是他今天似乎没有来，到处都没看见他。伯纳德告诉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日志上也没有记什么约会。于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读报纸，看看它们关于我们访美之行说些什么。我们还祝贺我们自己访美成功。真的，就是这些。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1]：

首相对他访美归来的回忆，我敢说由于时差综合症而稍微有些模糊。他太疲乏了。

他从他的套房里出来蹒跚地下楼走入他的书房，脸色十分苍白，除去一双眼睛发红以外。他自称没患时差综合症，虽然他有些担忧他一点也记不得在白宫时总统对他说的话。实际上，这不是由于时差——总统实在没有说多少话。可能这是因为总统也非常疲倦。

哈克频频打呵欠，派人把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请来。爵士没有去华盛顿，所以精神非常饱满和头脑敏捷。哈克深知他自己很疲乏，表示忧虑说，政治家们[2]现在花了许多时间乘喷气式飞机周游世界，去参加些能够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谈判，而又“精疲力尽”——这是哈克用来描写的词。

汉弗莱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这类谈判几乎总是事先由像他那样的卑微的仆人去完成的理由。这种谈判差不多不留在“精疲力尽”的人的手里去进行的。

幸运得很，汉弗莱爵士的议论没有引起首相的注意；他在说此话时，首相正轻轻地点着头，放过去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首相的回忆有误，以为那天汉弗莱爵士不在场。

我们试图唤醒首相。过了一会儿，我们成功了。他睁开眼睛，坐起身来，有些惊讶，他说，“啊，汉弗莱，早上好！”

遗憾的是，哈克回忆不起来，他曾经派人去把汉弗莱请来，他也记不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没有告诉我以前哈克已经睡着

了。所以汉弗莱爵士离开了我们。当他这样离开时，首相又点点头，放他过去了，我就让首相安静地打盹了。

那天下午相当晚的时候，他匆匆地走到私人专用办公室找我，并叫我同他一起检查大量积压的工作，因为他设想——错误地设想——在他不在国内时一定已经堆积了不少。

我不得不向他说明没有积压，并且说明——同公众所认为的正相反——既然他现在是首相和自己不再负责一个部门了，他要去做的工作要少得多。

人们从报上读到的关于首相必须辛苦地工作的每一个报道并不是事实，而是神话，一般都是新闻处制造出来的。我把首相实在必须干的工作列了一张表，

1. 主持内阁会议——每星期两个半小时
2. 主持二至三个内阁委员会会议——每星期四个小时
3. 在下议院回答质问——每星期半个小时
4. 女王接见——至多一个小时
(如果她一个小时内不感到厌烦的话)

加起来每星期一共八个小时。此外，首相必须阅读所有的摘要、会议记录、呈递的材料、外交部的电报如此等等。私人专用办公室安排首相从一处赶到另一处，同人们握手。但是事实上，虽然人们要求首相去做的事很多，他应该做的事情以及他能够做的事情也有许多，可是他必须做的事情却很少。毕竟首相是老板。

（事实上，八十年代中叶美国总统所采用的不干实际工作的制度倒有许多可以辩解之处。这可以给总统以时间去思考，如果他觉得可以思考的话；如果不行，他可以去睡觉——编者。）

由于没有积压的工作，首相要看看他的剪报。

他对马尔科姆·沃伦（十号的新闻发布官）送给他的报告很高兴。显然，我们不在国内时，首相接连三个晚上都出现在所有电视新闻报道的屏幕上。《全景》报上登有特写。在全围性报纸上载有1269栏英寸^[3]和31张照片。还有16份无线电广播报道。

我问首相他是否认为华盛顿之行是成功的。他不理解我的问题——在他看来，按定义来说是成功的，因为取得了

这么多的宣传。

（那天晚些时候，伯纳德·伍利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后者的办公室里开会。汉弗莱爵士在他自己的日记里把那一次会议详细地记录下来——编者。）

伯纳德·伍利送给我一份关于首相华盛顿之行的报告并证实首相没有向总统提到他的新的国防政策。这是一件值得宽慰的事。

然而，我们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我们”一词，我的意思指内阁办公室、财政部、国防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大小各部门的所有人员。首相还在想着撤销三叉戟、巡航导弹的订购，继续制造北极星和重新实行征兵制来构成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队。伯纳德·伍利作为首席私人秘书这个非常正当的角色，为首相的主张进行辩护。他的论点是，为了省钱、减少失业和使我们的国防可信可靠，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目的。我替他的忠诚之心打一个A+的分数，但替他的常识打一个十分制的0分。

他似乎认为我们的国防政策的目的在于防卫英国。很清楚，在现代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的国防政

策的唯一目的在于使人们**相信**英国是有保障的，是得到防卫的。

一些威慑理论的拥护者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假设我们的国防政策旨在使俄国人相信我国是有保障的，是得到防卫的。这是荒谬的。我们的政策之所以存在是要使**英国人**相信英国是有保障的，是得到防卫的——俄国人却知道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的国防政策旨在给所有的淳朴无知的英国公民——那些在住房、公共汽车、酒店、工厂和内阁会议室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在努力使他们感到安全。

伯纳德·伍利和首相正在寻求一个更好的方法，这无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不过“更好的办法”这九个字包含着变动的意思，往往是一种危险的概念。

目前我们有一根魔杖，那叫做三叉戟。对于它谁都一无所知，只知道要花一百五十亿英镑，这一点说明它一定是了不起的，神秘的。我们只要开一张支票，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放心了。但是如果政府人士开始谈论它，那么后他们会开始对它加以**思考**。接着他们体会到

其中有问题，思路上有毛病。结果是全国都焦虑起来。

伯纳德·伍利在我给他们解释以后，对这些危险认识得很清楚。可是他提出首相即将发表电视广播演说的问题。他担心首相也许会利用它来宣布他的新政策——在内阁加以讨论以及向下议院立告以后马上要进行广播。他也许会谋求利用一次在电视上的露面来开展全国性的大辩论。这就会成为一个很坏的先例——在政府私下有所决定以前，不应当开展全国性辩论。

伯纳德·伍利认为首相实际上已经有所决定。如果是这样，他必须打消它。我指示伯纳德马上负责办到这件事。

伯纳德·伍利不能说定他可以做到，并且出于忠诚，他指出首相总是首相，为此他持有某些权利和权力。

首相的权利是清楚的和大量的。他有私人汽车和司机，在伦敦有一所漂亮的住房，在乡间有别墅，有说不尽的公开露面获得宣扬的机会，还有终身养老金可以享受。我问伯纳德首相还有什么要求。

“我想他要治理英国，”他答道。

这个企图必须终止！他没有资格。
(阿普尔比文件 WB/CAA/400)

2月7日

今天我觉得有劲得多，也是从我回来以后第一次见到汉弗莱，见面时非常愉快。

但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同马尔科姆举行一次扩大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自从我当上了首相以来的第一次电视广播。会议上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疑问和问题，这是我以前仅仅作为一名内阁成员时从未面临过的场面。

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广播讲话应该是采访形式还是向电视摄像机说话。我起先不懂得二者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只说是。可是他说明二者只能取其一，要么这个，要么那个。

我首先建议采访形式，因为我认为这也许不是那么艰苦的工作。可是马尔科姆马上问我喜欢谁来采访。看来人选是在罗宾·戴、布赖恩·沃尔登、特里·沃根和吉米·杨之间挑一个（都是些著名的传播媒介人物，这是指哈克第一次任首相的时期；现在——唉——这些人都会被遗忘了——编者。）

“这要看情况，首相，要看您希望作为一个思想家出现在屏幕上呢？还是作为一个权力人

物、人民的朋友或就是一个好人呢？”

“说实在，都要。”我说，但是他误会了这句话，因此说不可能他们同时都来采访您。我没有指**他们这些人**都来。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以具有他们所有那些提出的素质的形象而出现在屏幕上。既然我具有这一切素质，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马尔科姆有见识地摇摇头。“形象是跟着采访人选而创造出来的，什么人选，什么形象。您希望重点放在何处？”我建议我主要要以一个思想家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这句话明显地指布赖恩·沃尔登将是与我进行谈话的对象。但是马尔科姆说有一些与布赖恩·沃尔登关连的问题，“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不要忘记，他本人是一位国会议员。”

“这不是更有利吗？”我奇怪地问道。

“不。因为如果您不回答问题，他就再问您。如果您第二次又不答，他第三次再问您。然后，如果您三次不答，他将告诉观众您没有作答而您有过三个机会。”

再思考一下，看来沃尔登也许不一定是佳人选。我认为如果我的形象更多地像一个权力人物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也许好一些。

显然，这意味着我必须以罗宾·戴为谈话对象。但是马尔科姆说我必须支配他才能应付过去。支配戴这个人看来是很难办到的事。不过很明显，马尔科姆认为如果不支配他，他也许看起来比您更像一位首相，您还不如他哩。

伯纳德·伍利觉得罗宾·戴比较容易掌握一些，因为他获得了爵士身份。尽管如此，我认为不要冒什么险更好一些。我问如果我作出抉择当一个好人，怎么样？”

“那就是说要沃根啰，”马尔科姆回答道。“不过这个人，您必须同他斗嘴。”我想不出马尔科姆是什么意思：“斗嘴？”

伯纳德答道：“您必须机智。”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我一直是十分机智的。但是马尔科姆和伯纳德却愁容满面，非常悲观。我摸不透为什么如此，直等到伯纳德突然开口说好吧……麻烦之处是他喜欢说侮辱性的幽默话。”

“他会侮辱首相吗？”我不能相信这一点。

“他谁都会侮辱，只要他觉得有这个意向。”我有了一个主意。“也许他会喜欢得到一个爵士品位。”

伯纳德对这个主意不太赞成。“称他为特伦

斯·沃根爵士？我难以作如此想，首相。”

我不得不同意那也许太过头了一些，虽然一个二等高级英帝国勋爵士也就可以了，并且有可能保证他不会进行侮辱。

伯纳德仍不为这个主意所动。“喔……他是爱尔兰人。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真正懂得什么是荣誉。还有，我不能肯定一个二等高级英帝国勋爵士能在爱尔兰吃得开，特别是在他出生的泥炭沼的国度里。”

在我看来，伯纳德有一点道理。因此，现在只留下一个选择了，我必须以人民的朋友的姿态出现，同吉米·杨共唱一台戏了。

“他这个人也有些问题，”马尔科姆评议说。“倒不是说您会被硬塞进这个节目中去的，他一会儿播送听众的电话请求，一会儿交通消息，一会儿菜篮子，把您推来搡去。”

伯纳德同意这个说法。“他这人非常友好亲密，可是一切看来有些无足轻重，一个无能耐的人。还有，他只是搞无线电广播的。”（伯纳德没有说明在无线电台广播这样一件正经事怎么会显得无所渭或无足轻重——编者。）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放弃了搞采访的整个主张。在我看来，让我对摄像机演讲要强得多

——在那时候将由我来掌握一切，而不是那些竞选失败的议员和自负的节目广播员。

马尔科姆建议搞一个党政客[4]。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主意。一提起党政客，立刻意味着厌烦。我的全部主张应当是，一位首相向他的人民讲话。

伯纳德插话道，“如果您这么做，那将是大臣级的广播，反对党的领袖就要求答复的权利。”

从表面上看，这是荒谬的。我说我不给要求答复的权利。答复什么呢？我是首相，我要向我的国家的人民说话。

伯纳德坚称，按宪法来说，我们确需给予要求答复的权利。我问他他站在哪一边。

他现在表现得非常谨慎小心和一本正经。“首相，我不过是想在前头罢了。您如果是反对党的领袖，您也会要求答复的权利。”我没有成为反对党领袖的意图，至少在可以看得见的可是遥远的将来我不会有这个意图。但是我能看出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于是我对伯纳德说，我还是对摄像机演讲，像一个党政客一样。

“不过您不是说他们这些人令人厌恶吗？”他

说。

我对他也开始厌倦起来了。“我没有说过**我**令人厌恶，我说过了没有？”静默。“**你**认为我会令人厌恶吗？”他未作答。我想我是不会的！我不会发表一篇令人厌恶的演讲或广播演说的，那是非常不可能的，这一点他太清楚不过了！”

马尔科姆问我曾经对摄像机发表过大量的演说没有。由于我没有，他提出安排一次排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接着他提出后一个问题：“广播的内容是什么？”

一下子我摸不透他的意思。显然，广播内容将是关于我这个人的。我对他解释了这一点，他也完全懂得。可是，他还要进一步弄清楚一个细节：我究竟打算说些什么。

我看不出这有多大关系，然而他要知道我会提到哪些政策。我解释道，是一些通常的：共同前进、更好的明天、束紧裤带、齐心协力、医治创伤，这一类话。

他对此感到高兴，但是他敦促我应考虑我**具体地**会说些什么。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会具体地谈谈束紧裤带，医治我们社会里的具体创伤。

可是马尔科姆对我施加压力，要我考虑说些**新的**东西。我从未这样想过。然后，突然地我体

会到这一次我有机会了：我将谈谈我的伟大的计划。我对马尔科姆说，到时候我会给他一份演讲词原文。同时，他为这次广播将去找一个合适的监制人和安排一次排练。一切看来大有可为。

2月8日

今天同汉弗莱的见面非常紧张。他向我提出请求，要我今天什么时候有空尽早同他谈谈。

我在书房一坐定就派人去请他。他马上就来到。他一定早在楼下等我了。

“啊，汉弗莱我说。“已经到啦？”

“是。我料想您要讨论一次电视露面。”

这就是他要与我谈的事，我感到惊奇。“那不是非常紧迫的事，是吗？”我问。

“完全不，”他表示同意。“一点也不重要。”

我并不太高兴，汉弗莱竟把我的第一次电视广播说成一点也不重要。他一定从我的脸上看到什么表情，因此他急忙补充说，是非常重要的事，但不是令人发愁的事，也不是一个危机。

很清楚，他不担心广播本身而是担心我的伟大的计划。他不要我在广播中提到它。

我对他说，我建议要做的事就是这一件，我问他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首相。”“那个政策？”我问。我很自得。

“不，不，在电视上将它宣布出来——这是突如其来的、没有成熟的、岌岌可危的。”[5]

无疑他具有押头韵的天才，当他受到压力时，他便使用此法。我继续玩我的小游戏来逗他：“如此说来……你确实赞成那个政策？”

他入了圈套。他不能说他不赞成那个政策，又不赞成电视宣告。赞成不赞成政策不是文官的事。他迟疑了。我等他说下去。但是他当然不至于好久找不到词。“我……呃……我认为那个政策是……呃……有兴趣的……有想象力的……有刺激性的。一个有刺激性的方式。有**极丰富**的新鲜感，以新头脑来处理老问题，向旧的思想提出挑战，对过去三十年里政府的想法的整个基础提出质问。”

他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我行将推翻过去三十年来的政府的一切想法，那我一定是智力迟钝的白痴。

于是我给他机会表示他的意见。“你并不赞成那个政策？”像通常一样，他不那么坦率。“那不是真的，首相。别的没什么，就是会有不少牵连，反响，回声，撞击的作用。我们需要时间来精选和认真思考证据，审查各种选择，检验论

点，回顾复查，研究，咨询。”

这样很有益处，我以前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帮助。我对汉弗莱说他应当不顾一切地干这一切任务，同时，我会在广播中宣布那个政策。

“不！”他叫喊起来。“您不能。时间未到。”

“为什么？”我要知道原因。他还提不出一个理由。

“好吧……我们必须告诉美国人。”

现在我可火了。突然我感到受够了，够了。就在上个星期，在我未去美国之前，他还曾劝告我**不要**告诉美国人。因此我在美国时就没有这样做。我把这一点摆在他面前。

“啊……”他小心地答道，“是，但是那是您出访以前的事。那时刻去对他们说，便是选了错误的时刻。”

“那么我回来以后呢？”我用浓厚的嘲讽口气问他，“那是去告诉他们的正确的时刻了吧？”

他表示反抗。“对。但是他们将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那就需要许多个月的时间去做耐心的外交工作。敏感的问题需要明智的处置。”

我肯定地认为现在该是提醒汉弗莱的时刻了——究竟谁是头儿。“汉弗莱，关于英国政府的

事，谁说了算数？英国的内阁，还是美国总统？”

他往后一靠，双腿交叉，对这事考虑了一下。“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问题，首相。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你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唔，”他回答道。“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持异端者。我认为是英国内阁。可是我明白我是少数派。”

我对汉弗莱说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他，从今以后他是在多数派之列。

他感到惊奇。“但是您同总统结交得很好么。”他说得对，我确实与他交往得很好。事实上，当我们开始谈话时，我把我的讲话摘要读给他听，他把他的念给我听，然后我们决定如果我们交换摘要，由各人自己阅读，这样进展会快得多。因此我们把时间几乎都花在抨击法国人上。够厉害的。

但是现在蜜月已过。我明确地对汉弗莱说从今以后英国的管理将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不是美国人的利益。

汉弗莱不愿接受这一点。“首相，您敢肯定您能作出那个改变而不用问美国人是否赞同

吗？”

我置他的抗议于不顾。我对他说我们要开始以我的伟大的计划来维护我们的独立。

“好，好，”他说。他非常不高兴。“太好了——但是……还不到时候！为了内阁的合法的宪法方面的权益，我有责任要大声疾呼。

我是他们的秘书，内阁秘书。”

好一个荒谬的决策！“你用不着这么干，”我向他指出。“是我委任他们。他们是我的政府。”

“怀着敬意，首相，他们是女王陛下的政府。”嗨，他在鸡毛蒜皮上做文章了。

“怀着一切应有的敬意，汉弗莱，”我说，使他牢牢地记住他的地位。“我将正式向海外政策和防卫委员会[\[6\]](#)提出那个政策，随后向内阁提出。我已经私下探听过他们大部分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它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有重大贡献的，为此它是十分受人欢迎的。（即可以赢得选票——编者。）

“怀着**深厚**的敬意，首相，”他不再故意谨慎婉转地说话了，“这不光是内阁的事务。您知道这必须先向下议院宣布。您现在仍然是一个下议院的人。”

我不用被人提醒这一点。“怀着**深厚**的敬

意，汉弗莱，”我恶意地回答道，“我将在晚间广播中宣布我的伟大的计划。当天下午我将告诉下议院。”

“怀着最最深厚的敬意[7]，首相……”

我不能忍受这种傲慢无礼。“你也许会后悔不该这样说话。”我出其不意地突然向他明说了。

2月10日

今天我们作了一次排练，演习一下我在电视屏幕上的露面。这一天非常艰苦而且有些难堪和窘困。

我开始坐下来，前面是一张桌子。我对摄像机说话。我的演讲稿放入了电子提词机这一类的玩意儿里。

开头并不太好。开始讲话了，是通常的无聊开场白。“所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继续入不敷出了。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并不亏欠我们什么，而一定要关心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准备作出牺牲。”如此等等。一句一句都是陈词滥调。

我问是谁起草这些废话的，伯纳德在所有人面前对我说是我自己。起先我不能相信，可是后来发现是一篇相当陈旧的演词，发表这篇演讲时

我还很缺少经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解释道，这不完全是无聊话（实际上我想是无聊话），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我正式广播的文稿来排练。

伯纳德看来有些勉强，因为那不过是一份草稿。我看不也这有什么关系，既然我们只是在操练罢了。伯纳德说那份稿子非常机密，由于里面提到我的伟大的计划，撤销三叉戟的订购、重新实行征兵制等等，我还是看不出此刻这样会有什么問題——房间里没有其他人。

于是我坚持要他们把正式演讲稿放入电子提词机。我不懂为什么伯纳德如今这样的完全不得力。

马尔科姆已经找到一位监制人，他过去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监制人，名叫杰弗里·埃塞克斯，要他在电视广播技术方面作为我的顾问。我一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家伙。身材修长，头发微显灰白，戴着眼镜显得不凡——十分有经验，举止文雅机智，戴着蝶形领结。当他们在电子提词机换文稿时，我问他我干得怎么样。他非常能鼓励人，他说我干得很好。

不过他提出很有趣的一点，实际上是以后许多点子中的一点。

他问我是不是要戴眼镜。我问他有什么意见。

“那就在于您自己，”他谨慎小心地答道。“戴了眼镜您看起来有权威性和引人注目。不戴的话，看起来真诚和坦率。您要哪一种形象？”

有许多无法估计的问题我必须作出决定，这是其中的第一个，我过去不知道这一类事有什么关系。我对杰弗里说，说实在的，我要看起来有权威性而且又显得真诚。

“说真的，二者只能居其一。”他说。

“假设……”我想了一下，“假设我这样来搞，在我讲话的时候，一回儿戴上一回儿摘下，你看如何？”

“这在人们看来是犹豫不决。”

那么，我当然不愿意看起来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那将是对真相的嘲弄。我在仔细思考利弊，不能作出决定。

“那么戴单片眼镜好不好？”伯纳德建议道。我想这又是他的一个玩笑，老一套的玩笑。

我把眼镜问题暂时搁下，留待录音的时候再作决定。

电子提词机弄妥了，新的文稿进去了，于是

我开始讲话了。杰弗里、伯纳德和菲奥纳——一位娇媚的女化妆师——都围绕着一位监听员，站着仔细地注视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显微镜底下的一个标本。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受到人们如此细微的观察。

演讲开始，我对演讲词感到满意。“三叉戟这个项目太花钱。撤消它之后，我们就可抽出几十亿英镑作为经费，对国内许多问题实行有想象力的和根本的解决措施。”

杰弗里打断了我的话。他对我说很好，不过他显然脑子里有什么问题存在着。伯纳德也试图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叫他等一下。

杰弗里说我前俯得太多，这样会使我看起来好像在推销保险，想力劝顾客签名似的。

我试试各式各样的坐姿、前俯和投目的姿势。我可以看出杰弗里对任何一个姿势都没有完全同意。伯纳德和马尔科姆都已走开，去屋子的另一角落，回来时给我带来一份略有不同的演讲稿：“我们当然要对政府开支的整个领域广泛审核其一系列的选择项目。”

“伯纳德，”我大声说，有些激怒。“这并不说明什么。”

“谢谢，首相。”

他没有抓住我的要点。我解释道，“完全没有起什么冲击作用”

“您太夸奖了，”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谦虚地回答。

“不，伯纳德”——**我不喜欢这样说法！**

他吃了一惊，再看了一下文稿，想想如何能加强其冲击力。“说需要**迫切**地审核，好不好？”

我怒气冲冲地对着他。他有些紧张但他坚持他自己的立场。

“首相，我确实认为文稿应该降低一些调子。”

我转向马尔科姆，要知道他的想法和指导。他建议这样写：“三叉戟项目对你们的纳税单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百五十亿英镑是很大一笔钱，我们将非常谨慎地看待这个项目来看看它是否值得花这么多的费用。”

这显然多少冲淡了文稿的内容，但是我接受了妥协。我问杰弗里提出具体数字行不行，他是否同意。

“行。”他对数字非常有兴趣。“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没有谁听进去，而那些听进去的人又不相信。可是它可以使人们认为您手头掌握不少事实。不要忘记，人们并不知道您是看着电子提词

机念这个文稿的。”

好点子。除此之外，他唯一的批评是我念得稍微慢了一些。确是如此——但是我之所以念慢些是因为电子提词机这玩意儿走动得慢。可是我用不着担心，他解释道，它会紧跟您的速度——您快了或慢了，它就会跟着您快一些或慢一些。

我试了一下。我说：“三——叉——戟——这——个——项——目——是——一——”然后我突然加快速度，“个——沉——重——的——负——担——就——你——们——的——纳——税——单——来——说。一百五十——亿——英——镑——是……很……大……一……笔……钱……我……们……”（我又减慢速度，非常之慢。）成功了！非常自在，可是要使其自然十分困难，要使其听起来是在讲而不是念也十分困难。可是，我认为我相当快地掌握了它。

杰弗里在那一段话里又找出了一个细节。“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不要说**你们**的税单。说“你们”使人听起来就好像是指人民。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说话——他们与我们。”

又一个好点子。我应当说**我们的**税单。我也纳税么！

伯纳德仍在担心这一部份的演讲词太直接。我看不出这又有什么问题，直到伯纳德提醒我这个国家的许多人的就业有赖于三叉戟时我才懂得

他的意思。他觉得在没有进行一些商议之前，我们不该完全把它讲清楚。

我想了一下，觉得他也许是对的。马尔科姆提出了另一个说法供我选择：“国防开支是这个政府将加以严密审查的领域之一，目的是看看我们能以较低的代价来完成同样水平的国防。”

这个措词在我看来是可以的。但是杰弗里说它太长，应分两句来说。“我们发觉如果任何一句句子占两行以上的地位，等到说完时，大多数人已经忘记它是怎样开始的。包括演讲者本人在内。”

于是我们把它分成了两句。

杰弗里还是对我坐的姿势和位置不放心。明显得很，我还没有调整自己到他觉得满意的地步。他告诉我又开始前俯了。

说真的，我无法控制自己。“我就采取这样的姿势，”我向他解释道，“当我想显出诚恳的样子。”

“问题是，”他答道，“这样会使您看起来像一个希望看起来诚恳的人。如果您往后靠，您看起来很舒展和很能自制。”

我马上往后仰。“不要太往后，”杰弗里说，“否则看起来好像您吃了液体午餐。”[\[8\]](#)

我们当然不要到这样地步！我立刻坐得挺直，心里怀疑如果不让我前俯的话，怎样可以显出我的诚恳呢？

杰弗里有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将文稿中您想听起来诚恳的几处下面划底线。当您念到这些地方时，您要皱眉，并且说得更慢一些。”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可是接着他开始给我上表演课。他说我的脸有些呆板！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接受这一点。

他解释道，在正常说话时，人们转动脑袋挥舞眉毛、抖动两颊的肌肉等等。用了电子提词机，它显然把我变成一个木讷呆板的人。

于是我再试试。我作出眉飞色舞的样子，这样的努力却引起在房间那一头的技术员（他们躲在那里注视我）的暗笑。杰弗里对我说这一次我做得过火了一些。

伯纳德仍在担心演讲词中那一段很重要的话，它仍然是“国防开支是这个政府将加以严密审查的领域之一。”他仍然觉得这样说有太明显的危险。“如果您具体地说哪几项国防措施要削减开支，这将在不少地方引起很大的焦虑，如德文波特、朴次茅斯、罗赛斯、奥尔特肖特和布里斯托尔。

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指的是所有这些城市边缘选区的居民。我告诉他把调子放低一些。于是我们同时对演讲词另外搞了一段。

新的一段是这样说的：“你们将听到从反对党那里来的许多胡说八道的话。他们说我们浪费了钱。他们说我们把自己出卖给美国。我说，瞧瞧他们执政时所造成时一团糟的局面，瞧瞧他们对经济造成的损害。”

这一次倒是杰弗里反对这段演讲词的内容。“首相，恕我建议不要攻击反对党。”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失望的反响。毕竟这些都是党喜欢谈的老一套。

但是杰弗里的态度有很大意义。他的论点是：党无论如何将投我的票，那是没有问题的。攻击反对党只能使一批无党派投票人看到我是一个怒气冲冲和搞分裂的人物。

如果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杰弗里还劝告我听到人们对我的指控时决不要再提到这些指控，否则将为这些批评言词作更大的宣传。他还认为如果我不按照预先的安排而攻击反对党的话，人们会觉得我认为反对党有力量而在发愁。

这样，我就想不出关于反对党我可以说些什

么话呢？他的回答很简单。“对他们只字不提。您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使人们听来很热情很友好。当然，要有威严，可是也要充满深情。一国之父么！试试看降低您嗓音的高度。”我发觉要使说话的声音低沉非常困难。我的声音将听起来是假的，完全假的，像保罗·罗伯逊[\[9\]](#)的风格。有人对我说，如果我要真正掌握得正确的话，必须向皇家莎士比亚剧团[\[10\]](#)里的某人学习声学课。

不管怎样，我尽量用低沉的声音开始念下面一段：“他们降低我们的黄金储备，破坏我们的出口贸易，他们缔结卑鄙和无耻的种种协议……”我体会到这种非常之好的贬低他人的广告言词也必须抛弃。多么遗憾！

可是杰弗里在同马尔科姆商量之后，悄悄地塞入一段谈到我和未来的比较乐观和积极的话：“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要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英国。一个能够在各国伙伴关系中昂首自豪的英国。”

我认为这些话相当好。我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搞到的。原来他们采自上一届反对党领袖的话。我们得变换一些措词。

杰弗里要回到关于我的外貌这个题目上来。我作好接受更多的关于我个人的批评的准备，但

是他首先讨论我的服装问题。

“您将穿什么衣服？”

“你有什么建议？”

“一套深色服装，可以显出传统价值。”我说我就穿一套深色衣服。

“另一方面，一套浅色衣服看起来讲究实际。”

又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要看起来传统气派呢还是讲究实际？我又想两者都要。“我能不能穿一件浅色一些的上装，配上一件深色一些背心？”

“不，首相，这样会显得好像您在识别力方面有问题。当然，您可以试穿一套花呢服装，这会使人想到英国的乡下。还有环境、生态保护等等。”

这听起来也很好么。可是杰弗里还有其他一些选择可以提供。

“一件粗花呢茄克也很好——看起来不拘礼节和平易近人。”我向杰弗里声明我就是这一切的化身，这些素质我都有。

他非常好。他对我说我不用马上作出决定，他给我一张单子，上面罗列了许多指示，供我有

空时思考思考。“如果您称得上是这一切的化身，那么您应当着重于那称不上的地方，或者有可能人们认为您称不上的地方。所以，如果您要作很多变动的話，您就需要看起来能使人感到可靠和放心以及有传统气派。所以您应当穿一套深色服装，身后背景要庄重，犹如栎木护墙板和皮面书籍。但是如果您不打算搞什么新东西的话，您需要穿一套浅色的现代服装，身后背景要现代化高技术化，加上抽象派的绘画。”

菲奥纳拉扯杰弗里到旁边去有几句话要说，是关于我的化装问题。我对这一切的思绪很复杂。我必须说，有人围绕着我忙乱，而我呢，受到他们过度的关怀和照料——这是很美好的事，但是我可以听到他们之间整个的低声谈话，这些话我认为原本是不想让我听到的。

“杰弗里，对于灰发你满意吗？要不要让我们把它染黑？”

“不，那很好么。”

“那么发型呢？开始从前额脱落了。”

“什么脱落了？”我故意说，表示我没有完全听清他们的话。

杰弗里转身说，“高前额。”

“很好，”菲奥纳说。

下一项也使我同样程度地不太愉快，但是杰弗里曾经告诫过我，每当他担任这个工作时，他必须对我绝对地坦率和诚实，否则他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他和菲奥纳对我盯着看了一阵子，随后凝视一下监控器上的我，接着再看看我本人。“唔，菲奥纳……你能否在眼睛上花些功夫？叫它们不要那么紧靠在一起？”

“没问题。”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也看不出。“要不要减轻眼睛下面的肿囊和把苍白的面颊着上一些颜色？”他点点头。“问题大的是鼻子。”我插嘴说：“鼻子？”

杰弗里叫我放心，我的鼻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光线照明问题。显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大阴影。

这一切我受够了。我对他们说还是继续演习吧。可是杰弗里问菲奥纳她是否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一方面安慰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越佳，我赢得下一届大选的机会越大。当然，他这么说是正确的。

“当然，还有牙齿问题，”菲奥纳转身向我说：“首相，请您微笑一下。”

我微微一笑。他们都阴郁地盯着我看。接着杰弗里叹了一口气。他说：“好嘞”，声调十分沮丧。他信步走到我的桌子前面。“首相，来一些

牙科手术，您觉得怎么样？”我听了感到十分不快。

但是杰弗里相当地坚持，他说，“只是略微校正一下牙齿。人们确实在这些鸡毛蒜皮问题上找岔。校正起了奇妙作用，哈罗德！威尔逊就是一例。瞧！”菲奥纳给我两张威尔逊的照片，一张是未校正之前的，一张是校正之后的。我答应下星期去与牙医约定。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我坐着往后靠，不过仰得不太多。我以低沉的嗓音说话，稍稍动动脸颊和眉毛，念稿时的速度时快时慢，我念道：“我们当然要对政府开支的整个领域广泛审核其一系列的选择项目……”一边念一边体会到这就是原来开始时所说的话，一字不差！

我感到恼怒了。我对伯纳德说我们似乎在兜圈子。

“首相，”他说，“我确实认为这是合适，合乎要求的……”

“无意义的，”我突然插入地说道。

他说请允许他表示异议。“不完全是毫无意义，首相。而且更含糊，不表态。”

我开始觉得绝望，永远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我问杰弗里他对这份材料有何意见。

他当然不肯发表意见。我不责怪他。这不是他的问题。“全凭您自己作主，首相，”他说；他坚决地让我来作出反应。“我只能说，如果这是您想说的话，我建议您穿上一套现代服装，身后背景是高技术化和高能黄色墙纸，加上抽象派的绘画。用诸如此类的一切的一切来掩盖实际演讲词中没有什么新东西的情况。”我对他说我也许要重新用我原来的演讲词。

“那么”，杰弗里有礼貌和体贴地说，“就穿深色服装，身后背景是栎木护墙板，求其庄重。”

伯纳德对我建议也许要重新采用原来的文本这一点感到异常的苦恼。“首相，我诚恳热切地请您重新加以考虑。”

我确认说明我的立场的时刻到了。我对他说，也对他们大家说，由于这是我作为首相后的第一次广播演讲，非要涉及重要题目不可。我不能上电视台胡扯一通。我的演讲必须具有冲击力和引起反响。

伯纳德说他全心全意地同意这一点（附带地说一下，他实际上并不同意），但是他建议我能否就争论较少的题目发表演讲。我解释道，按定义来说，争论较少的题目的冲击和影响比有争论的题目来得差。“肯定地说，有些争论较少的题目不是也有冲击力和影响吗？”

“例如什么？”我以很大的兴趣等候他列举。

“唔……乱扔弃物！”他果真在严肃地说话吗？“向乱扔杂物的人们来一个尖锐的打击。或者强调安全驾驶。或者节约能源。有许多题目可谈。”

我说我有一个建议。我对他说，“留些精力吧！”

杰弗里提出后一件事务：开始曲。显然是老一套的规定：巴赫意味着新思想新信念，斯特拉文斯基意味着没有变动。

我向杰弗里建议，如果我们插播英国作曲家的音乐，也许合适些。它可以反映我的形象。他看来似乎喜欢这个主意。“也许埃尔加？”

“对，”我说，“可是不要奏《希望和荣耀之邦》。”

“那么《神秘的变奏曲》，怎么样？”伯纳德说。我对他看了一眼，叫他闭口。

（三天之后，伯纳德·伍利写了一个条子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谈到哈克的电视演说内容问题。幸运的是按照《三十年规则》，在开放的文件中找到这一条子。我们把原件复制如下——编者。）



10 DOWNING STREET

From the Principal Private Secretary

February 13

Dear Humphrey,

I'm afraid the TV appearance looks unpromising. The Prime Minister has ordered a dark suit and oak-paneelling. This means that he is planning to say something new and radical on the air, hence the need for a traditional, reassuring image. I know that this will cause you some concern, but he is very keen on it.

Yours ever,
B.W.

唐宁街10号

发自主席私人秘书

2月13日

亲爱的汉弗莱：

我感到遗憾，电视屏幕上露面一举看来不妙。

首相已定制一套深色的服装和栎木护墙板。这意味着他打算在广播中讲一些新的、激烈的东西，因此需要有一个传统的、惯例的、叫人放心的形象。我知道这将使你产生一些担心，但是他十

分热衷于他的做法。

你的永远的
伯纳德·伍利

(伯纳德第二天收到对此条的复信——编者。)



伦敦 SW1A2AS

怀特霍尔街70号

发自内阁秘书和内政部文官部主任

2月14日

亲爱的朋友：

首相的意图是要在电视屏幕上讨论他所称的伟大的计划，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担心的事。

他对此十分热衷这个事实既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因为首相们对它们热衷。内维尔·张伯伦对和平也是十分热衷的。

这恰好正是我们曾经希望你能加以避免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了呢？

你的永远的
汉弗莱·阿普尔比

（伯纳德·伍利立刻送去一个简单的便条作为答复——编者。）



10 DOWNING STREET

Home Office and Foreign Office

February 14

Dear Humphrey,

Th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thinks that his Grand Design is a vote-winner.

The party has had an opinion poll. It seems that the voters are in favour of bringing back National Service.

Yours ever,
B. W.

唐宁街10号

发自首席私人秘书

2月14日

亲爱的汉弗莱：

能给的解释是，首相认为他的伟大的计划会赢得选票。

党已经举行了民意调查。看来投选票的人赞成恢复兵役。

你的永远的，
伯纳德·伍利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11\]](#)：

不错，我记得这些便条的交换。

汉弗莱·阿普尔比一点也不高兴我没有做到——尽管我尽了大的努力——使哈克的演讲词降低调子。

他要求我顺便去内阁办公室讨论这个局面。他感兴趣的是党的民意调查，我已经看出这个调查是改变首相的思想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再举行一次民意调查，其结果要能显出投票选举者是**反对**恢复兵役的。

我在那时期有些天真幼稚。我不懂选民可以同时赞成而又反对一件事。亲爱的汉弗莱告诉我怎么做法。

诀窍是，向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去接近他的是一个讨人喜欢和有吸引力的女士，手里拿着一个写字夹板。很自然，这个普通老百姓要给人一个好印象，不愿使自己干蠢事。因此，市场调查者就会问他旨在引出一贯式答复的问题。

汉弗莱在我身上作示范。“伍利先生，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你担心吗？”

“是，”我说。

“你是否认为在我们的综合学校里缺乏纪律和严格训练？”

“是。”

“你认为年青人欢迎在他们生活中搞一些组织和领导工作？”

“是。”

“对他们提出挑战性的要求，他们会有反响吗？”

“会。”

“也许你赞成重新恢复兵役？”

“是。”

嗯，我自然而然地说“是”。一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看来缺乏一贯性，几乎不太可能回答其他的话。那么，所产生的事实是，民意调查光发表后的一个问题及其答复。

当然，有声誉的民意调查者不会这么干。但是他们这种人并不太多。汉弗莱建议我们委托别人举行一次新的调查，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国防部。我们就这样干了。他当时当场泡制了一连串问题：

“伍利先生，你是不是担心爆发战争？”

“是，”我说，十分真诚。

“你对军备的增长很不高兴吧？”

“是。”

“你认为发给青年人枪枝并教他们如何杀人，有危险吗？”

“是。”

“你认为违反人们的意志，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是错误的吗？”

“是。”

“你会反对恢复兵役吗？”

我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答“是”。

汉弗莱成功了，他高兴得很。“你瞧，伯纳德，”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完美的不偏不倚的样板。”

汉弗莱确实具有一个十分富于想象力的头脑。同他在一起密切地工作是一种愉快。

他还有其他建议。首相将于三至四星期之后广播。内阁秘书敦促我去告诉哈克，他应在十一天内广播。

我认为首相可能会拒绝。太急了一些。汉弗莱早看到这一点。他建议我去告诉哈克说，我刚从联合广播委员会听到反对党要在十八天之内推出一个党政活动者；还有首相有资格和权利作大臣级广播，如果他不广播，那么首相级

的第一次政治广播将由反对党来做。

我不知道汉弗莱讲的否是真实。我对此提出质询。他微笑地说：“会真实的，如果你在明天早上以前不把消息告诉他的话。”

把哈克的广播提前的原因是要在谋略上打败他，搞智胜，使他不能利用广播来宣布他的新政策。理由是在接下来的十一天之内他只能在日程上挤进一次海外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一次会议是不足以向他的内阁共事者说清楚这样一个根本和激烈的方位转变的。

他的共事者在那时候大多赞成这个政策。但是只是个人的意见。只是在政治上。不是**正式**的！

作为负责的各部门大臣，他们的正式反响必须取决于他们所收到的意见和劝告。

（怀特霍尔的会议按惯例每次都有会议记录。部门里的会议也无例外。每一件事都得有记录在案，作为已经作出了什么决议和如何付诸实施的记录。很大一部份人都一致同意这对政府的连续性是很必要的。然而有一种会议却从来没有记录在案，这就是常任秘书们的每周例会——会议每星期三（内阁集会前一天）在内阁秘书的办

公室举行。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保持接触”的会议，没有议事日程。

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汉弗莱爵士对有些会议的确作了私人记录，为了他自己的用处。他一生中对这些纪录防范得极严密。阿普尔比夫人非常好，她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记录，其中包括二月十五日星期三早上的一次常任秘书们的会议记录——编者。）

今天早上议论纷纷，非常有利。到会者有迪克、诺曼、贾尔斯和戴维。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理查德（迪克）·沃顿爵士；国防部常任秘书诺曼·科毕特爵士；教育和科学部常任秘书贾尔斯·布雷瑟顿爵士；就业部常任秘书戴维·史密斯爵士——编者。）

我们讨论了首相的所谓伟大的计划。我们开始时一致认为摒弃三叉戟和巡航导弹、通过征兵来增设常规部队的主意是一项新奇的和有想象力的建议。

（从这两个形容词来看，可以体会到出席那次会议的文官们对哈克的政策怀着多么深的蔑视和敌意——编者。）

我们一致认为，作为忠诚的常任秘书，我们有责任在我们权力的范围内尽

量协助政策的执行。

然而，我们怀疑我们的政治主子也许没有细细考虑一切可以涉及到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加以详细讨论，为了明天内阁委员会开会，议员们提到这个问题时向他们作基本情况介绍。

迪克说，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观点来看，有问题。美国人简直不能忍受。这并不是说英国政策由美国人来决定——但愿不要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确实知道把所有新的动议同华盛顿讲清楚是明智的。上一次，我们没有做到，结果是不幸的[\[12\]](#)。

我提醒迪克，关于苏伊士事件，首相也许有些模糊，所以这个论点他可能并不介意。同时他也不希望被人看来好像向美国人磕头。

迪克又提出一点：撤销三叉戟这个项目发生在他刚当上首相不久，也许会被看作软弱，姑息俄国人，缺乏勇气和决心。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应构成外交部观点的基础。首相钦佩勇气，不过站在可保安全的距离以外。我问迪克他是否在陈述外交事务大臣的看法。迪克相信到了明天，这会成为他的看法的。

诺曼特别担心这项新政策，因为它对国防部和他的影响密切。国防大臣在那时刻相当困惑——他的具体的特有问题是，海军、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意见总是不一致的。当然，底子里他们是和谐的，但是他们没有谁可以作为他们发泄好战的本性的对象，除非是互相发泄。不过有一点使三军团结一致，即他们对征兵制都坚决反对；无可调和。他们对本国的年青人没有意见，可是他们确实不希望他们原来的熟练的职业精英队伍由于吸收了乌合之众而被削弱。英国军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士兵的优秀领袖。说真的，确实几乎没有多少士兵可以供他们领导——这也许是他们领导得那么好的原因。

我向诺曼指出首相也许不致把三军头头的反对意见作为终立论。

诺曼认为立论应当保持简单：三叉戟是好的，英国必须拥有好的。这是一个能够很好吸引国防大匠的立论。他这人本身非常简单。他是能够接受和支持的。我们一致认为诺曼要给他辅导。

讨论随即转向教育和科学部。贾尔斯觉得从教育观点来看，征兵制可以引

起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培养与社会结合和有创造意识的儿童方面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功，他们在艺术和自我表现的技艺方面受到了充分的训练。教育和科学部在这方面有可以为之自豪的成绩而且做了第一流的工作。然而贾尔斯觉得征兵制会不可避免地宣传说，有许多中学毕业生实际上不会读、不会写或不会做加法。所以全国教师联合会将强烈反对采用征兵制。

进一步说，还存在着一个偶然性的小小风险，即三军也许为了征兵，要接收大多数的进修学院并利用它们作教学之用。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不必要的干扰将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把它们的功能完全扭曲了。

我担忧的是，由于征兵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问题，要贾尔斯的国务大臣去卷入全国教师联合会的否决举动，那是很难的。相反，贾尔斯认为全国教师联合会也许会否决他的国务大臣，使他的任期无法继续下去。

我问贾尔斯他向他的政治主子将提出些什么劝告。贾尔斯说，尽管征兵制并不是教育和科学部所称的教育，如从

实际传授给人们一些东西这一点来看，它还会运行得很好的。所以反对它也很困难。并不是我们中间有任何人要反对它。

诺曼不知道是否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缺乏足够长的时间加以仔细思考的问题。匆促从事会带来灾难。

我提出罗森布拉姆教授[\[13\]](#)的学历也许有问题，其证件有可疑之处，他是哈克主张的提出者。

贾尔斯高兴地表示同意。他觉得可以争辩说，罗森布拉姆的数字已经经过非常严格的细察或者说他也许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有疑问的。他认为这会是他的大臣的见解，如果大臣一旦听到了这些事实的话。说真的，贾尔斯回忆说，是有一篇文章将发表，批评罗森布拉姆教授的思想的整个基础。明天早上就会出来。

（在文官部门里，这种技巧——好像在足球游戏中一样——称为“踢人而不踢球”——编者。）

凑巧这篇文章将由[\[14\]](#)一位未被考虑提升为首席科学顾问的教授所撰写。这位教授并非出于妒忌——他就是觉得

罗森布拉姆所起的影响也许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我们一致认为，为了避免使他伤心起见，也许好不让罗森布拉姆亲自看到这篇文章。应当由贾尔斯呈递给国务大臣，作为个人的意见。

（如果你踢人而不踢球，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个人知道你是这样干的——编者。）

我们后对就业方面是否受到牵连的影响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这个方案的重要部分，即兵役制也许把年青人包括进来为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

戴维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但是与工会关系上要产生严重的问题。一旦你开始向非工会会员提供工作机会，你就处在一个十分打滑的斜坡上。你一旦让几个小孩去修缮老人的房子，你就会看到原来应是他们的工作的一些人大吵大闹——泥瓦工、粉刷工、油漆工、管子工、电工和木工。

我们都一致认为，社区服务工作可以对社区产生很大的损害。然而，有可能首相会争辩说，如果小孩们靠做工谋生而且老人们对工作满意，那么不是很好吗？这个论点当然过于简化，可是首

相对过于简化决不会太担心。

戴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他认为就业大臣也许会争辩说，失业的青年人现在都不合适、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训练。他们成为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威胁！征兵制后将意味着把一大群强健的和受过杀人训练的年青人放到大街上去。

我们一致同意这是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态度，我们还鼓励戴维去保证他的国务大臣在明天之前采纳这个主张。

我们在作总结时，大家都同意我们试图反对首相的政策，这一举动没有问题，这个政策在我们看来是新奇的和有想象力的。我们只不过反对贸然和仓促从事罢了。

（阿普尔比文件 PA/I2I/LAX）

2月16日

今天下午内阁委员会开会，我的共事者以我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对我的伟大的计划作出反响。

那是议事日程上的后一项。我对他们说，我意图在星期五我的电视广播中宣布我的伟大的计划，而且——如果委员会同意的话——我将于星期四早上向全体内阁成员提出并在当天下午通知

下议院。

提出后，静默了一阵子。我以为这是表示普遍同意。于是我打算进入第二项议程，那时邓肯[15]开口了。

“首相，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他开始说。

“好，”我说。

“唯一的问题是……在您就职后不久就撤销三叉戟这个项目，似乎太早了。在苏联人看来，这是软弱。”

汉弗莱惹人注意地嘟哝了一下，同时点头沉思。他把目光转向我并带着询问的表情。

我有些愕然。上次我同邓肯谈到它时，他完全赞成。“我以为你赞成这个主意的。它肯定会使我们通过可靠的常规部队来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邓肯点点头，但是他不同意。“不错……不过这个做法可以被别人看作^是缺乏勇气。也许还带着绥靖的味道。”

我对邓肯说，我会把他的看法记录下来，即使他是少数，只有一个人。

我开口说话太早了一些，休[16]尖声地说话

了。

“噯，说实在的，首相，虽然我也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事实是三叉戟属于第一流，英国应当拥有第一流的东西。”

我大吃一惊。“但是，休，”我说，“我以为你是要去除三叉戟的。你说过那是毫无意义的浪费钱。”

休看来有些不安。“嗯，是，我确实说过这话，但是现在我不能肯定。我一直在重读有关文件和资料。我认为其中还另有道理。”我冷冷地把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下。“嗯……我不过是反对过早地宣布罢了，没有别的。”

“我也反对过早地宣布，首相。”现在帕特里克[17]同邓肯和休两人站在一条线上了。我说不出话来。于是我只能问他为什么。

“因为这整个计划是根据罗森布拉姆教授的数字而来的。我得到的信息是，他在学术上是值得怀疑的。我刚收到一篇充实有力的文章，严厉地批评他的论证的整个根据。”

“但是，帕特里克，”我说，带着越来越焦虑的情绪，“你曾同意征兵制将解决整个青年人就业的问题，并且为我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国防部队。”

汤姆[18]出来代替帕特里克回答。“是，可是自从上一次谈话以来我想起，征兵制虽然也能创建一支身体健康、有纪律和有组织的青年军队，可是他们在两年后从军队中退伍时，他们又失业了而且已经受过如何杀人的训练。”

我以不信任的目光盯了他一眼。“我反对过早宣布。我认为需要时间更充分地加以考虑。”

这整个谈话使我困惑不解。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他们都同意这项政策是一个真正赢得选票的政策。对于我的第二步，我必须慎重地考虑一下。

汉弗莱说，他要把委员会的会议列入记录，不把门关死，以便再予考虑。他大大地帮了我一个忙。

2月20日

今天我收到从国防部的休那里送来的备忘录。他们已经作了民意调查，并说公众中百分之七十三是反对征兵制的。

这真是大大地令我迷惑不解。党在民意调查时说百分之六十四是赞成的！接着送来了会议记录。

（汉弗莱爵士的会议记录经过沧桑还是保存下来，披露如下——编者。）

项目七——伟大的计划

很清楚，内阁委员会同意新政策在原则上，是非常好的政策。但是有鉴于正在表达出来的不少怀疑，决定记录如下[\[19\]](#)：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委员会深思熟虑的意见是，尽管他们认为在原则上这样建议受到了广泛的赞许，可是认为有几项原则在原则上属于基本的，有几种考虑意见是如此复杂和在实践上各个方面是平衡的，以致在原则上有人提出合情合理和谨慎的做法应该是，把这个建议付诸更详细的考虑，不仅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而且在有关部门之间进行，其目的在于准备和提出一个更透彻和范围更扩大的建议、把重点放在不太有争执的成份上面、考虑新的建议与现存的原则之间需有必要的连续性，然后提交议院考虑和公众讨论，其时间应在某个合适的场合以及发表意见的气候被认为更加适宜于考虑这项建议所提出的和旨在征求赞同的主要论点的方法和原则的时机。

我把此文读了好几遍。我认为它无非是表明

委员会不要我在星期五的电视广播上提到伟大的计划。

我不打算放弃我的政策。但是我需要负责进行一场战斗，这一点我是看到的。

与此同时，我已指示伯纳德说，在电视上露面时，我好还是穿一套淡色的服装，配以高技术化的家具、高能的黄色墙纸作背景，还有抽象派的绘画——以及斯特拉文斯基的曲子。

[1]同编者的谈话。

[2]英语中用了statesman这一词，指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善于治国的人，有褒义；另有一词politician，也可指政治家、政治专家，政治学家，甚至政客，有贬义。真正的政客因此喜欢称自己为政治家——译者注。

[3]栏英寸指报纸上横占一栏，竖占一英寸的篇幅。

[4]英语中除politician一词也可作为“政客”讲（如带贬意的话），但另有political一词〔古〕专指“政客”，此处用的正是political，现代用法中，此词指“从事政治的人”，贬义则是“吃政治饭的人”——译者注。

[5]这三个词都以P打头：precipitate、

premature、preilous，故而下面哈克说汉弗莱善用押头韵法——译者注。

[6]属于内阁的一个委员会。

[7]英语中说话时用 with respect（怀着敬意）实际上意指“以慎重的态度”，甚至等于说“恕我直言”（规劝时用）。此处哈克和汉弗莱故意在“敬意”前的形容词上你来我去地对仗说明双方越来越紧张，不满加深，因此按字面翻译可以更好加以体会——译者注。

[8]指以酒为主的午餐——译者注。

[9]保罗·罗伯逊（1898—1976），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和演员，以扮演莎剧中的奥赛罗和演唱的歌曲《老人河》而闻名——译者注。

[10]享有盛名的剧团，主要是他们精于措词用语以及发音法的训练。

[11]同编者的谈话。

[12]指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

[13]在第二章中已提到此人。

[14]汉弗莱在这里出了一个差错。他应当说已经写成——编者。

[15]外交大臣。

[16]国防大臣。

[17]教育大臣。

[18]就业大臣。

[19]从这里开始，直至终了，只有一句，长长的一句，都是咬文嚼字的官样文章。作者在此寓有极大的讽刺意味——译者注。

4. 钥匙

2月27日

我的首席政治顾问多萝西·温赖特今天早上到内阁专用室来看我。她年约四十，非常妩媚，金发，修长，有能力，十分顽强。

我说的是我的首席政治顾问，实际上不那么确切。我的前任即前首相时期她已经在职位上，当时把她保留下来看来是一个好主意。

汉弗莱·阿普尔比曾向我暗示她并不是那么非常有用——所以，把她保留下来看来是更加好的主意！毕竟我确实需要一些不受汉弗莱严密控制的人手。可是自从我第一天到这里以来（那一天我请她留下），我难得见到她。所以当她有目的地信步进入内阁专用室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那时正在伏案工作，而且还有一个意外，她的第一句话很爽快。

“喂，吉姆，要是你不要我当政治顾问，我倒很喜欢你就直说。”我吃了一惊。为什么她认为是我请她留下的呢？她是唯一不让我的前任失去与实际世界一切联系的人。但是看来她得到的印象是，我已经安排好，要把她踢出办公室和放逐到仆役宿舍去！

“我过去的办公地点就在这屋子的隔壁，不是吗？”这是一个修辞性的疑问和反诘，还是要求我回答的问题？为了妥当起见，“是，”我说。“是你让我搬到前楼去，要上三楼，沿着走廊，再下跨两步，转个弯，然后到右边的有四扇门的办公室，与摄影复印室为邻的。”这对我来说是新闻，从未听说过。我不知道她曾在那里办公。我解释道，“我以为你在休假或者什么的。”事实上，我的工作使我非常之忙，所以说实在，我不怎么注意她是否不常露面或十分引人注目。（这不是巧合——编者。）

“那我倒不如休假的好，”她尖刻地回答。“在你上任后第一个周末之后我回到这里，却发现我的办公室已经变成内阁大臣们、官员们的等候室了。所有我的东西都搬到楼上阁楼里。汉弗莱说，这是根据你的指示。是不是？”

我试着回想一下。我曾经下过这个指示吗？不，我没有。可是……我下过！“事情是这样的，汉弗莱来见我，送给我一份合理化精简计划，充分利用空间。”

她摇摇头，静默不语，有些惊讶。“难道你不知道三年来文官部门一直在试图把我从办公室中赶出去？”我怎么会知道呢？“为什么？”我问。

“因为按地理位置来讲，它是处在关键性的

战略地位。它是这幢房子中位置好的办公室。”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区别，”我说。“你还是在十号么。”

“这倒是，”她说，然后紧闭双唇。

“你收到所有的文件吗？”

“有一些，”她承认。

“我们可以通电话，”我提醒她。

“这要看他们是否给我接通了，”她尖刻地说，有些苦涩。

我认为她有些多疑，并且对她这样说了。接着她就开始谈到阿尔巴尼亚和古巴。她说阿尔巴尼亚对美国的政策起不了什么影响而古巴却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阿尔巴尼亚遥远而古巴很近。她争辩说，在十号正如在外面世界一样，影响与距离有关，越遥远影响越小。“而我现在是遥远的了，”她伤感地把话说完。

“你不是在阿尔巴尼亚，”我说。

“不，我是在该死的阁楼上。”她厉声说。“瞧！”她开始把我桌上的东西搬来搬去。“这张桌子代表十号的平面图。这个档案是内阁专用室，现在我们就在此地。穿过这里的那些门（她把一本书放在档案的一端）是你的私人专用办公

室。这把尺代表从前门进来的走廊——这里。这个走廊”（她抓起一把裁纸，把它放在档案和那本书旁边）“它从内阁专用室那边通过来而与那扇锁着的和蒙着绿呢的门连接在一起，门的一旁是内阁办公室——用这记事本来代表它——，汉弗莱就在那里面工作。这个咖啡杯代表通向你的书房的楼梯。这个茶托代表男厕所——这里，这就是——过去是——我的办公室。”她把一只烟灰缸放在代表内阁专用室的档案旁边。“瞧，我的办公桌面对大厅，我总是让我的门打开着。我能看到什么呢？”

我瞪着眼睛看着这一切。我慢慢地说：“你可以看见每一个从前门或者从内阁办公室进来的人，或者进出内阁专用室、私人专用办公室的人，或者上下楼梯的人。”

她保持沉默，我在沉思。她要我深深体会到她的有利地位，就举起那个茶托，然后把它放下。“我曾对着男厕所。我不得不处在男厕所的对面。”

我问她有没有为了这一点而去看过医生，但是显然我说的不是在点子上。她提醒我：“是男厕所。内阁里的人几乎都是男的。我可以听到他们私下谈话的每一件事，当他们都是突然从内阁会议室走出来去小便的时候。我因此能够使前首

相听到这些人所有的小缺点和癖好。”

“有涉及首相管的事吗？”我问。“当他们在暗中谋算他时，那当然啰！”

她很聪明！怪不得汉弗莱把她的办公室改成等候室并把她放逐到阁楼上去了。

我揷铃叫伯纳德进来。他立刻从私人专用办公室的白色宽大的双开门里露面了。

“啊，伯纳德，”我说，“我要你把多萝西搬回到她的办公室去。”

“您的意思，带她到上面去？”他指在阁楼的方向。

“不，”我说。“我的意思是，带她到等候室去，就在这房间的外面。”

伯纳德被搞糊涂了。“您的意思是在她回到她的办公室去以前？”

我很耐心地说：“不，伯纳德。我的意思是以前是她的办公室而现在等候室，等候室将恢复为她的办公室。”

“可是，等候室怎么办呢？”他问。

我叫他思想集中、仔细听并注意我的嘴唇的动作。我说得很慢很清楚，“那——等——候——室——将——成——为——多——萝——西

——的——办——公——室。”

他看来是慌了，可是还在争论。“是，首相，但是有人要在那里等候怎么办呢？”

我发脾气了，并大声对他叫嚷：“**不，伯纳德，马上去办！**”

他**还是**不清楚。他拼命固执己见。“是，首相，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马上，不用等待，可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等候室供等候之用，人们将在什么地方等候呢？”

我听出他的意思。那不过是纯粹的误解罢了。可是他的问题仍然是相当愚蠢的。我指出道，“整个建筑里到处都可以设等候室。所有楼上的政府公寓里的房间都难得用上。还有大厅哩，瞧瞧这个，”我用手指表示我桌上摆着的东西。

伯纳德感到茫然。“什么地方？”

“这儿，”我说，“瞧，在烟灰缸、杯子和茶托之间。”

他对桌子看了一下，又看看我，眼睛睁得大大的，迷惑不解。“在咖啡杯和茶托之间？”

他有时候竟这样地无知！“茶托代表男厕所，伯纳德，”我告诉他，“清醒清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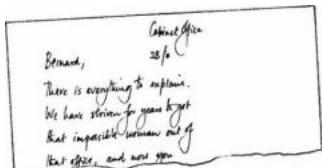
有时我怀疑伯纳德的脑子是否灵敏和能否担任他的工作。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1]：

自然，我立刻按首相的指示办理。我没有自私企图，正是汉弗莱爵士，他坚持温赖特夫人必须搬走，离开她能眺望内阁专用室外面的大厅这个战略性位置。

第二天汉弗莱打电话给我并指示我须作自我解释，或者收回首相指示。我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看来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

一个小时之后，他送来一张便条，是他亲笔写的。



Cabinet Office
28/6
Bernard,
There is everything to explain.
We have striven for years to get
that impossible woman out of
that office, and now you

伯纳德：

要解释的事很多。我们努力了好几年想把那个非常讨厌的女人赶出那个办公室，而现在却在胜利的当口走向失败。

虽然这是首相的要求，但这一个事实无关紧要。你不必答应首相那里来的每一项小小的请求。你必须向他解释：有一些请求并不对他自己的利益有好处。事实上，大多数是如此。

我们的职责是保证首相不迷惑。政治家们是朴素的人。他们喜欢简单的选择以及清楚的引导。他们不喜欢怀疑和冲突。而那个女人使他怀疑我们告诉他的每一件事情。

汉弗莱·阿普尔比
又及！此信阅后请立即销毁。

（对历史学家来说，幸运的是，伯纳德爵士没有听从汉弗莱爵士的指示而把信毁掉。他也没有立刻收回更动温赖特夫人的办公室的指示——编者。）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2\]](#)：

不，真的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的责任是为首相辩解。所以汉弗莱突然到私人专用办公室来作进一步的讨论。他对我采取独立见解感到不高兴。

我十分简单地告诉他，哈克先生喜欢温赖特夫人。我这个论点没有打动他，“参孙喜欢迪莱拉[\[3\]](#)，”他评论说。幸亏这私人专用办公室内没有别人。汉

弗莱很机灵地选了这个时间——一天的结束时——来与我谈话，这时候所有其他人都已回家。

我对他采取强硬路线。我对他说，在我看来，她并不危险。开始时她不太知道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我们也总是小心地把大多数重要文件保存好，不让她看。

这个解释不能使汉弗莱满意。他提醒我——十分正式地——我们在文官部门供职的人有责任保证英国的政府健全。而温赖特夫人的唯一责任是保证哈克先生重新当选。

我倒觉得，如果哈克把英国治理好了，他会重新当选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争执的要害。阿普尔比一直到终还是坚称：正确的决定和人民的决定不仅不一定要一致，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一致过。他认为如果哈克采取了“正确”或必要的决定，他将一败涂地。所以，每当我们推动哈克走向一个“正确”的决定时，她必然会作出反响，她会告诫他有失去可能获得选票的危险，使我们的职责无法完成。

简单地说，于是阿普尔比的论点

是，有必要不让政治进入政府；引伸出来的意思是把多萝西·温赖特放在阁楼里。

当他在解释他后一点时，他背后那扇双开门打开了，多萝西从内阁专用室里走了出来。汉弗莱爵士以他一贯的沉着镇定的态度对付了这个局面。

“啊，晚上好，亲爱的女士，”他一边转身，一边说，“真是很高兴。”

她不为所动：“喂，汉弗莱。等着见首相吗？”

“的确是，亲爱的女士。”

“那么你为什么不等在等候室里？”

他没有作答。我认为这个遭遇非常有趣，但是我必须一如既往，不能流露出笑意。

汉弗莱冲着我，一心要以别的什么方式来实施他的权威。他告诉我前天有一个“外圈人”被允许进入十号。这个“外圈人”竟是首相的选举代理人，没有一张安全出入证就让他进来了。

他简直是心胸狭窄，很猥琐。门外的警察都知道此人。没有风险。然而汉弗莱提醒我——以稍微受屈辱的姿态——这是我的责任，要保证每一个到前

门来的人必须出示十号出入证或者预先约定，才可放行。

温赖特夫人在听这些代话，这丝毫没有使她改变对汉弗莱的看法。她说：“原谅我闯了进来，伯纳德，但是首相叫我同你一起作出必要的安排，把我的办公室迁回到原来的屋子。”

我感到窘迫。汉弗莱锐利地瞪了我一眼，等我开口拒绝她。我看不出我怎样能拒绝她，如果是首相下了这个请求的话。

我试图搪塞一下，对她说我正忙着处理汉弗莱爵士所要求的关于安全出入证的事。她说汉弗莱的要求可以等一下。他说不能等。她说可以等！

汉弗莱转过身来背着她，然后走进内阁专用室去见首相。

我必须说，自从我进入白厅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未见到这样短兵相接的粗野的场面，如汉弗莱同温赖特夫人对垒那样。我不知道是否由于她是非常直率的缘故——我敢肯定她是毫不留情的，正如哈克的日记所显示的那样。汉弗莱显然非常讨厌她，这是真的——即使他没有一开始就讨厌她的原因，他无疑有

终讨厌她的原因。

2月28日

今天我同多萝西会见后，在内阁专用室口授我要发出的信件。她有一些心烦，因为她的办公室还没有搬回到楼下来，但是我对她说没问题，毕竟是昨天才作出的决定。她却很肯定地认为，文官部门有人反对，而我觉得她的多疑症又发作了。

她刚离开我就隐约地听到在私人专用办公室里有人在大声说话。随后汉弗莱出现了。他说：据我所知，您对于我们办公室的重新安排另有一种想法。”

“不，”我答道。“我不过决定让多萝西重新回到她原来的办公室去。”

“那，唉，不可能。”

“胡说，”我反驳说，并且开动我的口授机，准备写信。

但是他没有放弃。“不，首相，这整个重组取决于她的迁出。”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对他说，那不过是等候室的问题。

“**不仅仅**是等候室，”他坚决地不同意，走向我这边来。“是棋盘上重要的一着。”

“人们可以在大厅里等候么，”我说，没有意识到我的口授机在记录我们的谈话。“或者在政府公寓里的房间。”

“有些人也许可以，”汉弗莱答道。“但是有些人必须等在一个地方，那里其他人都看不见正在等候的那些人。还有比其他人来得早的人必须等在一个地方，那里他们看不到那些比他们来得晚却先他们而入的人。还有，从外面进来的人必须安置在一个地方，那里他们看不到从里面出来的人——里面出来的人是来告诉您从外面来的人为了什么事来拜访您的。还有，当您在接见人的时候而这些人本不应该知道您已经接见了什么人，有人来到了，这些人必须安置在某个地方，一直等到那些本不应该被接见的人已经看到了您之后为止。”[4]

我不可能把这些都记住。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我想分辨这一切，可是困难很大。不过其含意是清楚的：“你的意思是，当我在这里安静地不停地工作的时候，整个这出怀特霍尔滑稽戏就在我这扇门外面演出？”[5]

“首相，十号是一个铁路枢纽站。没有它的车棚、岔线和时刻表这些恰当的部件，它就无法运转。温赖特夫人的办公室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车棚。”

我指责他，“你要把她挪走，好不碍事。”

“天啊，不是，首相！”

“你认为她是一个讨你厌的人。说实话。”

“不，不。温赖特夫人是一位好极了的女士，正直，直率，明确。”[6]有时候，汉弗莱具有某种天然的诗意。“可是是一个讨厌的人？”我追问道。

“哎，”他谨慎小心地承认了，“曾有好几次她发表对这部门的批评意见，说得——呃——很坦率，令人耳目一新。她同报界的谈话也一直……惊人地真诚和充实。有时候她请求得到信息和帮助的格调原可以不那么刺耳和死硬。但是我的工作人员中大多数神经失常者在过去三年里说什么也得忍着。”

“不过我发觉她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我提醒他。

“当然，首相。”汉弗莱的语调现在充满了理解。“您可以取得书面意见。”

“这样你们都可以看到？”我向他挑战。

我立刻体会到我在鲁莽从事了。他问：“为什么不可？对我都保守秘密？”

当然我无言可答。于是我重新提出这个争论

的要点。“她需要呆在事情发生之处。”

“想一想，首相。这对她是公平的吗？”

我想不出他的意思何在。他继续说：“我们在十号这一部分工作的其余人员都是职业文职人员。忠诚，可靠，真实，我们多少年来经证明是谨慎从事的。如果只有一个从外面来的暂时性公务员，那么任何时候发生安全方面的故障，她就会成为怀疑的对象，千人所指。对一位女士来说，那是太重的一个负担。不管予以多少同情。”他这个论点是否有真实性在内？听起来似是而非，貌似有理。有一点肯定是确实的了——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他们定要除掉她！但是我向汉弗莱说明她是有价值的，因为她可以在政治方面提供意见。

“首相，”他答道，“您有整个内阁可以在政治方面提供意见么。”

“他们只劝告我为他们各自的大臣提供更多的钱。我需要一个

站在我一边的人，汉弗莱！”

汉弗莱这时突然地变得和蔼可亲友善起来。“但是我是站在您一边的。整个文官部门是在您那一边的。我们六十八万人。无疑这是足够跟您一起继续前进的了，不是吗？”

他看来在争论中要赢了。我无论如何决不应该卷入这场争论。我应当坚持我的决定。不过现在太晚了一些。我已经被卷进一场我永远不能胜利的争论中去了。“可是你们都给我同一的劝告，一样的意见，”我绝望地说。

“这证明，”汉弗莱以凯旋的口气回答道，“那一定是正确的！所以现在请问我们可以不可以回到原来的重组计划上来？”我知道我已被打败。我点点头。

汉弗莱试图以一句赞美话来讨好我，犹似把苦药包上糖衣，

“同一位有自己明确的想法和决断的首相在一起，是多么高兴啊！”我叫伯纳德去请多萝西来。使我惊奇的是，她在隔壁我的私人专用办公室里等候着。所以她马上就进来了。我等汉弗莱离开屋子。他不离开。于是我说明我要同多萝西单独谈话。

他还是不走。“您可以在我面前自由谈话么，”他微笑说。

多萝西能看出风势。她厉声说：“首相也许可以这样做。我不能。”

“我肯定你能，”汉弗莱显出优越感地答道。

这局面很糟，完全令人难堪，真正是我的

错，没有恰当地抵抗汉弗莱。多萝西转身就走并说：“伯纳德，也许你会告诉我首相什么时候有空。”

我叫她不要走，要她马上回来，还请汉弗莱离开。

他不让步。“首相，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的话。但是据我所知，您不过要说短短几句话罢了，而我们还有其他紧急事务要讨论哩。”我不知道怎么办。很明显，汉弗莱决心要做到不让多萝西占内阁专用室外面的那间办公室。当我为了犹豫不决而忍受折磨时，多萝西冲着汉弗莱。

“很遗憾，汉弗莱，”她说，声音很坚定，“我想我已经听到**首相**请你离开。”

我保持静默。汉弗莱体会到他没有别的选择了，转身走出屋子。我暗示伯纳德跟他出去。

门关了。多萝西坐在我对面。整个情况她知道得很清楚。她开门见山地说话了。

“您知道，他没有权利作出这样的举止。”我想挽回一些面子，故而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解释道，她的意思是指擅自闯进闯出，甚至不打招呼，她对我说我不可能花太长的时间同她谈话。

“他是内阁秘书，”我提醒她。

“正是这样。他是一位大臣。”

现在我觉得我必须挽回汉弗莱的面子。“他是年头久的老公务员。”

她嘲讽地微微一笑。“如果您的举止行动像一个骄横的主人而人们却仍旧称您为一个公务员，那真是了不起呵。”

现在我必须再度保全我的面子。“在这里我是主人，”我以非常一本正经的声音说道。

“那就对了！”她着重地说。

我得了她的鼓励就对她说我是首相，我会坚定和有决断的。

我对她说我要同她谈谈她的办公室的问题，我已改变了主意。

她没有礼貌地问我这一回是否非常坚定和有决断。

这句话使我十分生气。我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令我失望的是，她回答道：“是您自己改变主意的，还是别人代你改变主意的？”

我对她说我们需要那间等候室。她问作啥用？

“好吧，”我开始解释，但我知道无法把汉弗莱那一套辩词重新再说一遍。我生怕我的解释词

说出来与他的相当不同。“因为，如果有人来此求见某人，这人不知道有人来……就是说，如果人们见到过他们要见的人而是在其他人看到接见他们的人之前……以及其他人看到人们……唉，甭说了，全都乱套了。”[\[7\]](#)

我刹车了，很窘迫。她凝视着我，她的冷淡的蓝眼睛在估量我。

“这番话是您自己编出来的吗？”她问道。

“注意，你说话要有分寸，要公平！”我竭力为自己辩护。“我不可能事事操心。我必须依靠我手下的官员给我出主意，提意见。”她承认此话有理。但是她的看法是，我不光需要依靠我的官员来提供劝告。她认为汉弗莱正在试图把所有我的信息和劝告的来源，除了文官部门以外，统统切断。而且进一步，她坚称他希望能使自己成为文官部门意见和劝告的唯一渠道。

这番话在我听起来似乎有些属于空想。但是她毕竟在十号有过经历，她的经历比我多，而且我确实知道她是站在我一边的——或者至少她不站在汉弗莱一边，这也许不是一码事。

但是，汉弗莱怎样能使他自己成为意见和劝告的唯一渠道呢？我自己不是每星期四都举行内阁会议以及还有许多委员会的会议吗？

这个问题我自己能回答。我的内阁中大多数人只讨论文官部门的简报。我发觉我总是这样做的。可是汉弗莱总是在内阁会议前一天非正式地同常任秘书们会晤——可以推断他们对简报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就说明为什么我的伟大的计划正碰上这样的麻烦——文官部门在反对它。

然而，还存在着一个智囊团[8]。我提醒多萝西说，他们也送报告给我。

她表示怀疑。“如果汉弗莱向您建议要他们向他自己送报告而不是向您，我不会感到意外。接着他就要在十号内多占一些地盘。”

“为什么？”我问。“智囊团按理应该设在内阁办公室之内。”（内阁办公室是在另一建筑里，与唐宁街十号连接，从怀特霍尔街出入——编者。）

“他会说，”多萝西预测道，“他们需要更多的地盘。他将逐渐地侵入您这里的领土。为什么？因为这将使他有权利把十号作为他自己的地盘来对待，同时又是内阁办公室的地盘。您知道随后他会干些什么吗？他将开始把您除掉。”

我开始认为多萝西有些发疯。我问你是不是暗示他要当首相？”

“不，不，”她不耐烦地说。“他不是要这个头

衔或这个职责。他只要权力，所以，在使他自己成为所有信息和意见劝告的中心以后，他要鼓动您去作一些远程的海外旅行。接着他必须乘您不在的时候，作出一些决定——对不起，我说的是向内阁建议这些决定——而您如果不在内阁会议上，您得听从他的意见和劝告。而内阁将听从他的建议，因为他们从常任秘书们那里也将收到同样的建议。”

这番话看来像一个可怕的设计方案。我实在不能相信。可是，我认为对汉弗莱必须加以一些抑制；思考一下后，我想明天我要把她的办公室还给她。

3月1日

今天我真正坚定和有决断了。多么痛快的感觉呀！我已经建立了权威，好好地、真正地树立起来了。

第一件事，我把多萝西召来。我坚定地、有决断地对她说我又改变了主意！她将回到她的原来的办公室去。

接着我征求多萝西关于对汉弗莱的看法和意见。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采取它！而是要知道她是不是建议我把他开除。

她退缩，不敢回答这一个问题。但是她不肯

定我也许要限制他的权力还是不要。她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他既是内阁秘书，又是内政部文官部门的联合头头。他负责人事——委任之类事务。薪俸和配给是在弗兰克·戈登爵士手里，他是财政部常任秘书。所以，文官部门的头头一职实际上由汉弗莱爵士和弗兰克爵士分担。

多萝西的建议既英明又简单，就是从汉弗莱那里挖出一半工作然后全部交给弗兰克爵士！

当然，这一着棋子的危险在于也许会使弗兰克爵士成为同汉弗莱爵士一样的有权力。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很难说。我对弗兰克不那么了解，印象不那么深。但是我还没有必要作出什么许愿。今天我要作的就是在汉弗莱身上吓唬他一下！这一点我今天肯定已经做到了！

我派人把他找来。他进来时多萝西还在。我开始告诉他我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她原来的办公室还给她。

他马上抗议，但是我不让他说话。他要求单独同我谈谈。多萝西不愉快地微微一笑并说他可以在她面前自由讲话么。

他似乎有些犹豫。我问他是否就要反对我的决定。

“**一**经决定，就不了，不，”他谨慎地回答道。

“好，”我说，将此事告一结束。“现在我另有一件重要事情同你讨论一下。”我向多萝西表示她现在应当离开。她甜甜地向我微笑了一下，以胜利的心情离开了。

我还没有向汉弗莱提到我对他的威胁要把他的职责分一些给弗兰克爵士，他却先开口了。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

他开始说：“我认为我们应当想想关于智囊团的问题。”我的上帝啊！是不是多萝西早已**知道**要来这一下子吗？或者是她根据她对此人的了解而有灵感地猜测的呢？不论如何，当时我就理会到我不能斥她的恐惧心理为多疑症了，不然我有被除掉的危险。

“智囊团不能想想自己吗，”我漫不经心地问。

“我担心的是他们交流的路线不明确，”他说。

我显出惊奇的样子。“怎么会呢？他们向我报告。”“运行上，是。但是行政上，向我报告。”

汉弗莱自称这是一个严重的反常情况。所以我假装我误解他的意思，我说，“嗯，因此你要

他们在行政上也向我的办公室报告？”他没预料到我对此有这样的解释。“不，不！”他急忙回答。“把行政工作加在您的办公室头上将是十分错误的。不。我建议在运行上也向我报告。”

我假装愿意考虑这个新计划。内心里我极度恼怒。“这样，他们应当把报告送给你？”

汉弗莱显然感觉到他已赢了。“是，唔，就是为了核对，如此等等罢了，”他答道，把身子往后靠在椅子上，稍稍放松一下自己。“还有保证您收到的报告是满意的。”

“汉弗莱，”我说，微微一笑，这一笑是我一生中虚伪的一次，

“你太大方了。这会不会形成大量的额外工作？”

他呈现出勇敢的、英国人的面对《无情的海》的神气。“一个人必须尽他自己的责任，”他咕哝一声。

我决定对多萝西的理论考验一下。“但是……天哪……你怎样解决房间问题呢？”我天真无知地问。

“我正要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将无法在内阁办公室里容纳额外的工作人员。但是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里十号找到几间屋子。”

她又说对了，该死的！

“这里？”我问。

“嗯，这里有一些余地，”他解释道。

“如果是这样，”我问，“我们为什么必须挪动多萝西的办公室呢？”

他只不过张惶失措了一刹那，马上说：“唷……如果她将呆在这里，那么我们叫两三个人员搬到她的新办公室去。不，她的老办公室。不，她的老的新办公室。”

“说下去，”我说，在同他闹着玩。

“您同意了？”他问道。

“不，不同意，”我好声好气地回答，“但是这种事很有趣。你还有什么其他提议呢？”

“就是一些海外访问，”他说，一边拿出几页纸。我惊奇得几乎要从椅子上掉出来。“您应当予以考虑。”

我把他递给我的单子看了一下，其中包括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联合国大会、欧洲经济共同体议会会议、关于香港这块殖民地前途的谈判、在渥太华举行的英联邦会议、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的高级会议，我对多萝西关于这个体系及其操作运行者的情况知道得这么多，感到惊

讶。

但是对汉弗莱我却说：“如果我一直不在国内，这不变成给你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了吗？”

“首相，我认为您出去在世界舞台占一个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我同意，”我热烈地回答。“但是这对你的要求太多了。真的我一定要试试减轻你的负担。”

他以十分猜疑的目光瞟了我一眼。“呀，不，没有必要。”

我对他显出鳄鱼眼泪般的同情。“啊，有必要，汉弗莱，有必要！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你是文官部门的头头，不是吗？”

他采取回避的手法。“噯，财政部掌管薪俸和配给事务。”

“但你是负责提升、委任等等事务。难道这对你不是有些过多了吗？”

他以一笑置之。“不，不，一点也不。一点也不费时间。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感到这样摆弄他很好玩。“提升和委任六十八万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喂，我的意思是，那全是委托别人去作的，”他谨慎地解释道。

我高兴地笑起来。“啊，那好，”我说，“反正是委托别人去作的，所以把工作移交给财政部就更没有问题了。”

这时他开始惊惶失措了。他坚定地说：“完全不可能。财政部已经握有太多的权力呢，工作。”

我就不留情面。我说，“你要知道，由于你负责提升而他们负责发薪和配给，管辖权的路线就不清楚。实际上一切都不令人满意。一种严重的反常情况。”

汉弗莱看到一个有利机会。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好吧，既然如此，我也可把发薪和配给的事务拿过来么。”

我想汉弗莱抱着希望，在再作一次有益的努力。可是我愁苦地摇摇头。“在你所有其他负担之上？再加上你计划要干的工作？不，汉弗莱，我不能允许你作出这种牺牲。”他开始感到绝望了。“那不是牺牲。一点也不麻烦！”

也许在他一生中这一次是在说真话了。“汉弗莱，你太伟大了，”我说。“但是我能识破你的论点。”

他像一只受惊的雪貂看着我。“你能？”

“你在想牺牲你自己，”我温和地说为了使我不必担忧，是不是？”

他感到狼狈。他不能捉摸出一个稳妥的回答，这个回答会使他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他说啊。”他接着说呃……是。嗯，不。”后他说真的这真**不算**是牺牲。”

我对我这个游戏感到不耐烦了。因此我给他一个后的答复——不。

但是汉弗莱需要知道对他的其他一些提议的答复，主要是关于智囊团的一些问题。我说：“我越想到这一点，我越觉得你盘子里已经堆得太多，工作太忙。事实上，我不愿再把你留在这儿了，你一定在**你的**办公室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

他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他已经被免职了？我决定澄清他的地位。“你现在可以走了。如果十号再需要你，会派人去召你来的。”

他站起来，接着停一停，纠正我：“你的意思是‘**当……时**’。”[\[9\]](#)我抱歉地微笑了一下。“我意思是‘**当……时**’，”我同意。他转身向着门。“或‘如果’，”我恶作剧地补上这两个词[\[10\]](#)。

他发呆了一下，接着走向房门。当他出门离

开时，我故意要他听见我在拿起内部通话机，要求伯纳德尽快请弗兰克爵士前来看我。

3月2日

弗兰克爵士昨天有事缠身，不能前来，所以我就在电话上同他说话。

“弗兰克，”我说，“我不过要探听你关于一件事的看法。是关于汉弗莱的。我不知道他手头的工作是否太多了一些。”

正如我所期望的，弗兰克向我肯定地说，汉弗莱可以很好地应付，他非常能干，没有过分负担和紧张，每件事都管理和控制得很好，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我指出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无非汉弗莱是文官部门的头头，他起的是这个作用。我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分担汉弗莱的一些工作。

对任何一个读者来说，弗兰克尽管说汉弗莱有极大能耐，但在听了我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只字，这并不是令人十分感到意外的事。相反地他说，这一个提议可以说是十分合乎情理的。

我请他明天过来会晤，同时请他把他的确切想法写成书面材料，我指的是关于汉弗莱是否负担和紧张过度的问题，然后把它送给我。

一个小时以后，他的“想法”来到了，很尽职尽责。其想法如下：



女王陛下财政部

常任秘书

3月2日

亲爱的首相，

当我谈到汉弗莱·阿普尔比没有过分负担和紧张时，我当然是按这样一种意义来说的，即按综合整体的累积总负担而言，而不是就某些个别的和实质上反常的责任方面来说的，这类责任，按逻

辑来讲，并不与一系列广泛的互相吻合、不可分隔的职责显得协调或融洽的，而且说实在，它们可以对公务部门加上过量的和额外的负担，如果从它们带来的比较微小的好z处这个总的考虑来加以看待的话。

你的永远的
弗兰克

我把它读了好几遍[11]。我得出的结论是，他能够担当汉弗莱的部分工作。

3月3日

弗兰克今天来见我。但是我们的会晤自始至终没法进行。

他来到后，我指示伯纳德要保证汉弗莱不来干扰我们的会晤。我要求的是完全保密。

伯纳德说：“我当尽力而为。”

“你的‘尽力’也许不够好，”我对他说。啊，我这个人的心灵确有预见的功能！

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同多萝西会面。她提醒我，按严格规定来说，汉弗莱爵士应当在通过蒙上绿色平呢的门进入十号之前，先从内阁办公室用电话通知。

我同伯纳德核对一下是否如此。他犹豫地说：“在理论上，这可能是对的，首相，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形式。”

“好，”我说。“汉弗莱喜欢形式。”

伯纳德表示同意，可是带些勉强。“是，首相，不过正如人们所说的……它是这样一种习俗，在有人违反时比有人遵守时更得到尊重。”

我对伯纳德、汉弗莱和弗兰克这一帮人都感到厌烦。为什么他们都在表达自己思想时必须使用这种浮华词藻和迂回说法呢？关于习俗在有人违反时更受尊重这一套陈词滥调，嘿！……为什么他们要歪曲和破坏这世界上美的语言，莎士比亚的语言呢？（哈克显然没有意识到伯纳德的话出自莎士比亚：《汉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12\]](#)：

那一天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从未理会到我作为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的新职位能给我机会显示出我的力量和对我的老上司的独立性。这个理会的来到犹似一个突然的启示，令人眩目地闪烁着，是通往大马士革的路！[\[13\]](#)

我刚把弗兰克·戈登爵士引进内阁专用室，就回到私人专用办公室。我拨了汉弗莱的电话号码。我听到了汉弗莱的声音，既响亮又清楚。“喂？”

“啊，汉弗莱爵士，”我说。

“是我，”他又说。我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声音如此响亮清楚的原因了，原来他就在我后面。他已经进入了房间。

“我是伯纳德，”我傻乎乎地说。我慌张起来。

“我知道，”他答道。我放下电话。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我说，还是很担心他太靠近哈克正在进行的秘密会晤。

“好吧，我现在人在这儿了，不是更好吗？”他说。

“也是也不是，”我说。我在打颤，说得不知所云，我说我想同他说一句话，所以我在打电话给他，还会有别的原因吗？后我终于说出来——首相吩咐我提醒他：万一他突然到这里来看我们，如果事前在内阁办公室打个电话通知一声的话，那也许对我们更方便一些。

汉弗莱向我肯定说这没有什么不方

便吧。

“是，是不方便，”我说。

“不，不是，”他说。

“是，**是**不方便，”我说，非常坚定。

他怒目而视。随后突然冷却下来，他问首相是否在忙着。

我不得不说他是忙着。汉弗莱要知道忙于什么。我试图含糊过去，咕哝说他正在忙他的文书工作。你要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汉弗莱真的确使我害怕。

汉弗莱说如果他只不过在伏案工作，我可以闯进去同首相说句话。我那时被迫、不得不承认首相正在**同**另外一个人**一起**搞文书工作。

汉弗莱爵士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他明白了，我对他很不坦白，也许甚至完全在撒谎捏造。“你的意思是说，他在开会？”我点点头。“**跟谁在一起？伯纳德？**”他厉声说，声音刺耳。

我想他一定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已流传两天了。我刚承认首相正在同财政部常任秘书会晤，汉弗莱爵士就穿过房门一溜烟地进入内阁专用室。我无法阻止他——我的本能反应不够快。

可是，我刚开始同弗兰克·戈登爵士谈正经事，汉弗莱闯了进来。我问他要什么。我并不欢迎他。他说他正在察看一下是否有什么可以用得着他的地方。我问他伯纳德有没有告诉他我正在开会。在门开着的门道里，伯纳德在拼命点头。汉弗莱承认伯纳德说过。

“那么你要什么呢？”我不耐烦地问道。

显然，他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正在察看我。“噯，”他说，

“既然是同我的一个职业上的同事会晤，我认为——**哈罗**，弗兰克

——我也许可以出一份力。”

他热情洋溢地向弗兰克微笑着，我注意到弗兰克简直没有报之以微笑。

“明白了，”我说。“不，谢谢你。”我等他离去。他站着不动。

“谢谢你，”我说，十分明确。

“谢谢**您**，首相，”他回答，可是仍然一动不动。他就是站在门口，等着，聆听着，倒要看看我们敢于剥夺他什么职责。

“汉弗莱，”我说，“这是一个单独的会晤，”我肚子里的火正在冒出来。

“啊，”他说。“要不要我把门关上？”

“好，关吧，”我说。当他转身把门推上，自己留在门这一边时，

我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了。我说，“不，汉弗莱，请去门的**那一边**。”他生气了，不服气。“可以问为什么吗？”与此同时，弗兰克显然逐渐紧张起来。他站了起来，请求离去。

我对他说坐下，对汉弗莱说离开。

汉弗莱看来准备好假装他是乡下傻子，就是不离开。“您说‘离开’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好像这是一个有头脑的问题。

我大声叫嚷，叫他出去。我同时也对弗兰克说他可以走了——那时候我太心烦意乱和气极了，无法再同他继续一个理智的谈话。

伯纳德则想偷偷地溜走，我也对他大声喊叫，要他回来。只剩下我们两人在一起。

我问他：“我曾明确地告诉你不要让汉弗莱进来，为什么你又让他进来了呢？”

“我无法挡住他，”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回答道。

“为什么没法子？”

“他职位比我高。”

“那么，”我严酷地下了决心说，“必须把他限制在内阁办公室里。”

“怎样做法？”他问。

很明显，我说：“把接连起来的那道门锁上。”

“可是他有钥匙，”他哭诉地说。

“那么把他的钥匙拿走，”我说。

伯纳德不能相信他的耳朵。“把他的钥匙拿走？”他表示怀疑地问。

“把他的钥匙拿走，”我重复一遍。

“你去把他的钥匙拿走！”伯纳德说。

我从来没有听到这样无礼和公开的挑战性的言词。“**什么？**”我喊道。

伯纳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住不说话，然后又试着说：“很抱歉，首相，可是我认为这不是在我的权力之内的事。”

伯纳德是有学术修养的，受过很好的教育，就是秉性十分抑制和受约束；办事方面他受过高度训练，事情原来是怎样办的，他就怎样办，因此有时候他见树不见林。

“我给你权力，”我解释道，“我授权给你。”

他看来处在完全垮掉的边缘。“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意思是……唷，他会完全发疯的。”

我对伯纳德微微一笑。他也回我一个微笑。接着他的微笑消失了，紧张地舔舔嘴唇。他还是很有勇气，我看得出来。我温和地说：“你自己看吧，伯纳德。”

“是，但是……”

“自由，伯纳德，”我轻轻地说。

“是，但是……”

“我给你权力，伯纳德，”我温和地提醒他。

“是，但是……”

“只有你单独可以来见首相么，”我诡诈地鼓励他。

可是即使这样，还没有十分说服他。

“但是……但是……”他不能构成他要表示反对的言词。他的整个世界都翻了个筋斗，颠倒了。

“别老对我说‘但是，但是’了，伯纳德。莎士比亚。”我认为是时候了，让我显示我的一点学问。

但是，点滴学问却是危险的。伯纳德立刻在

无用的、无意义的迂腐学问里寻求庇护。“不，首相，‘别老对我说但是，但是’是一条引语，是十九世纪的，大约在1820年。我相信，森蒂利弗夫人在1708年使用过这词句，但是司各脱在《古董商》里使用过它，从此把它推广开去。”我谢谢伯纳德，并问他我们是否可以对核心问题坚定不移。他误解我了——我认为是故意的——，再次试图逃避那个汉弗莱出入的问题。

“是——核心问题，首相，是，我认为您把森蒂利弗夫人同《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中的老凯普莱特混淆起来了。在那一场戏里他我说的是，‘不要老感谢我，不要老为我骄傲’。”我再次谢谢伯纳德，并告诉他可以向汉弗莱爵士说这句话么。

他茫然。“说什么？”

“不要老为我骄傲，汉弗莱爵士。”

“是，首相。”他看来一点也不高兴。“嗯……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夺去他的钥匙，我能提出什么理由呢？”

我发脾气了。他生来是一个公务员，公务员只能看到问题。可是，他不懂随着每一个问题的出现，也必然带来一个解决的机会。

“看在上帝的份上，伯纳德，”我厉声说，“找

一个理由么！”他退却了。“是，首相。谢谢您，首相。”

我从我眼镜框上面看着他并对他微笑。我说“不要老感谢我。”

（多萝西·温赖特的回忆录《首相的耳朵》在这件事发生两三年以后，成为一本畅销书。在下面的摘录中我们看到（从她的现点来看）那一天晚些时候所发生的事，就是伯纳德·伍利行使了哈克刚赋予他的权力——编者。）

我正在思忖关于我所希望的搬回从前的办公室去这一回事，我忽然听见从大厅那一头的私人专用办公室传出伯纳德的大声说话：“我说‘不’，汉弗莱爵士，”这是他的嗓音。接着他又说了一遍“不’，汉弗莱爵士。”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闯进那个办公室。伯纳德在打电话。他脸色绯红，看来非常激动。“我确实说‘不’，”他在说。“首相正忙着。”

电话那一头说话的是汉弗莱爵士，听来他一定提出要来看伯纳德，因为伯纳德接下来说：“我也正忙着。”

似乎有一阵子在电话线上发生了一点点急促而又低声的辱骂。接着伯纳德

突然站直，挺了挺他的足足五英尺十英寸半的身子，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汉弗莱爵士，你不可以穿过来，你没有得到允许。”

汉弗莱大叫起来：“说什么我也得来”——这句话在整个房间里都可以听到——并且把电话听筒砰的一声扔下。伯纳德也搁下了电话，身子啪哒一声跌落在坐椅里，一半高兴，一半惊恐。他以惶恐的眼光和微笑看着我。他高兴地说：“他简直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

“他怎么说？”

“说什么他也得来。”

“你觉得你能顶得住吗？”我同情地问。

伯纳德往后一靠，松了一下劲。“没有问题，他来不了。我已通知保安处从他的办公室里拿走了钥匙。”

正在这时候，门突然大开，汉弗莱爵士大踏步地走了进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的怒气直冲。不加夸张地说，简直是他的耳朵也在冒气。

（只能按字面的意思来说，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编者。）

伯纳德跳起身来。“我的上帝！”

“不，不是上帝，伯纳德，”汉弗莱咆哮着，“不过是你的上司。”

（按严格规定来说，这段描述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内政部文官部门的头头。可是，伯纳德自从搬到十号以来，不再向汉弗莱爵士报告。作为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他现在实际上同内阁秘书具有一样多的权力和影响——因此发生了这场吵嚷——编者。）

“你怎样穿过那扇结实的门的？”伯纳德问道。“我的钥匙到哪儿去了？”汉弗莱问道。

“你一定有一把备用的！”伯纳德推断说。

“我的钥匙在哪儿？”汉弗莱爵士咆哮着。

伯纳德鼓起勇气。“我遵照首相的指示把它取走了。”

我认为我应该援救伯纳德。我添上一句：“这是非常正确的。”

汉弗莱凶恶地转过身来。他叫喊说：“**亲爱的女士**，请注意。这与你无关。”他又转身向伯纳德说：“首相并没有权我的钥匙。”

“这是他的房子，”伯纳德大胆地

说。

“这是政府的建筑，”汉弗莱说。

伯纳德没有惊慌，也不胆怯。“我认为谁进入这屋子是由首相决定的。总而言之，我毕竟不会把我家的钥匙给我的丈母娘的。”

我差不多要笑出声来。这个比喻顿使汉弗莱看来怒火冲天，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似的。

“我不是首相的丈母娘，伯纳德。”

伯纳德不作答。他没有必要作答。他就沉默地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汉弗莱走向窗户，慢慢地静静地作些深呼吸运动，使自己安静下来。随后他回转身来对伯纳德来了一个假慈悲的微笑。

“注意，伯纳德，我不愿意我们为了这点点事吵架。首相气量也太小了。你和我两人还得有好多年在一起工作。首相有来有去——而你的事业的前景，从长远观点来看，全仗那些有权力提升和任命的人。”

“让我们盯着中心问题来谈吧，”我以生硬的声音说话了，汉弗莱马上向我这边投来凶狠的一眼。看来要杀人似的！

伯纳德值得大大赞扬。他**确实**盯在中心问题上。他说：“我必须坚持要你说明你是怎样进来的。”

汉弗莱爵士立刻噘起嘴唇，这是他惯常使用的“无可奉告”的表情。

“你一定个人有一把钥匙，”伯纳德说。汉弗莱仍然沉默不语。“你是不是在说你没有钥匙？”伯纳德问道。

汉弗莱半笑半不笑。“我不是在告诉你我没有。我就是不告诉你我有。”

伯纳德伸出手去。“交出来！”

汉弗莱瞪着眼看了一回伯纳德，然后转过身来走出屋子。伯纳德突然坐下，使劲地呼吸，透了一口气。我对他说，他干得很好。

他点点头。接着他伸手拿起一只电话机，打给保安处，告诉他们把连接内阁办公室与十号的那扇门上的锁换掉，并且把所有的钥匙交给他。

（同一天早些时候——3月3日——在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办公室内举行常任秘书会议。近在弗兰克·戈登爵士的私人日记里找到一段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记载，是关于会后非正式举行的一次简单谈话——编者。）

离开会场时，汉弗莱问起我关于我

同首相的会晤那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汉弗莱不受欢迎地闯入以后，会晤突然停止。相反，我却告诉他会晤非常成功。

他问我有没有提到任何具体题目。我问他，他是否对任何具体题目都感到特别有兴趣。他问我首相有否提出文职委任问题，或者首相预示有否把职责重新分配一说。既然没有讨论到什么问题，我只暗示若干题目也许已经提到了，而且我们举行了一个涉及广泛的讨论。

有趣的是，他问我有否趋向于作出什么结论。看样子他是非常担心和忧虑的。我说双方都有些争论和论点，也许不是略微倾向于这一边，便是那一边，不过肯定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担心之处。

3月6日

我的计划完全成功。汉弗莱终于认识了他自己的地位。正如一两天以前我向多萝西暗示过的，限制汉弗莱的权力该是时候了。（机敏的读者也许会回忆在这日记中以前提到过哈克承认限制阿普尔比的权力是多萝西·温赖特提出来的——编者。）

显然，伯纳德把十号同内阁办公室之间的门上的锁换掉以后，汉弗莱不得不先来获得应许，当汉弗莱打电话要求获得应允在今天早上来十号时，伯纳德拒绝了。不久以后，他和多萝西听到门的那边有打雷一样的捶门撞门声，夹着压抑着的狂怒的叫门声：“开门！开门！”

汉弗莱接着从内阁办公室的前门跑出去，冲进怀特霍尔街，拐个弯，直上唐宁街十号。两名警察不让他进去，因为他没有约会卡，也没有保安处出入证——只是一张内阁办公室的安全通行证。

伯纳德上星期订立新的安全规则——表面上是由汉弗莱自己指示的——现在没有谁可以进入十号，除非持有十号出入证或者在那份每日约会单上有他的名字。

警察当然十分熟悉汉弗莱，他们显然打电话到私人专用办公室问是否可以允许他进来——不过那个时候，伯纳德和多萝西已经来到内阁专用室同我一起晤面了。

汉弗莱一定跑回了他的办公室，跳窗进入十号的花园，穿过草坪和花坛，以飞贼的姿势爬上墙，进入内阁专用室外面的阳台。

当然我知道有这一切行动，因为我首先看到沾上了泥和衣衫凌乱的汉弗莱在落地窗外面站立

不稳，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对他微笑着，还招招手。他抓住窗上的把手试图打开——立刻电铃声、警报器声大作，震耳欲聋。过了一会儿穿制服的警察、警犬和便衣侦探冲进内阁办公室。

我们在喧闹声中叫嚷我们都安全，没有问题，我们不需要保护，内阁秘书碰不了我们，不管他多么发怒或者多么委屈。

警报器关上了。

汉弗莱爵士走向前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他亲笔写的。

“汉弗莱，”我说，“这是什么？”

他闭口无言，他在狂怒，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试图保持他的尊严。他说不出话来——只用手指着那张信笺。我读了信。



Cabinet Office

Dear Prime Minister,

I must express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my profound opposition to the newly instituted practice which imposes severe and intolerable restrictions on the ingress and egress of senior members of the hierarchy and will, in all probability, ensure the current deplorable innovation be perpetuated, precipitate a progressive contraction of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culminating in a condition of organisational atrophy and administrative paralysis which will render effectively impossible the coherent and co-ordinated discharge of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within Her Majesty's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Your obedient and humble servant,
Junglaury Appleby

内阁办公室

亲爱的首相：

我务须以可能强硬的词语来表示对新近制订的规定的强烈的反对。这个规定对本统治集团高级成员的进出施加严厉和不能容忍的限制，并且十分可能将要——如果这项现行的该受谴责的发明长存下去的话——促进对联系的渠道采取逐步升级的限制，终形成组织萎缩和行政瘫痪的状态，从而使得在女王陛下的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的连

惯性和协调一致的政府功能成为不可能。

你的顺从的和卑微的仆人
汉弗莱·阿普尔比

我仔细读了这封信。然后我抬头看看汉弗莱。

“你的意思是你丢了你的钥匙？”我问。

“首相，”他不顾一切地说，“我一定要坚持拿到一把新的。”我惭愧地说我是在摆弄他。我说：“到了一定的时候，汉弗莱，”我答道。“在适当的时刻。到注定的时刻。现在目前，我们还要作出另外一个决定。一个更加迫切的决定。关于多萝西的办公室问题。”

“确实迫切！”多萝西咄咄逼人地插入。

汉弗莱还试图置之不理，和他过去一贯的态度一样。但是我不让他这样干。“不，汉弗莱，”我以极大的耐心解释道，“现在必须解决。不是这样，便是那样，无论如何要解决，真的，像钥匙的问题一样。”

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后终于明白了。当他还在内心作挣扎时，我试试看给他一个保全而子的机会。“我在奇怪你的见解究竟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看法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钥

匙。

你以为如何？”他对我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希望这个意见在人们看来是经过思考的而且是一个尊严的妥协。“我认为——在思考之后——温赖特夫人的确有必要同这个房间靠近一些。”他说。

我们大家都感到缓解了。“这样，我们就让她搬回去，是不是？”他点点头。“马上立刻？”他又点点头。

我告诉伯纳德给他一把新钥匙。我感谢他的协助和合作，并请大家都离去。

今天晚一些时候，伯纳德告诉我汉弗莱爵士打电话来问，他是否可以单独与我见面。我说：“当然可以！”伯纳德宽宏大量地请他过来。汉弗莱毕恭毕敬地进入我的书房，并问起另外一件事是否解决了。

另外一件事？我想不出他指的是什么。

他清清嗓子说：“我可以……呃……不可以问问谁将是内政部文官部门的头头？”

“你——也许是，”我说。他微笑一下。“或者，可能，弗兰克爵士，”我加上一句。他的微笑消失了。“或者也许……像现在那样分担一下。我还未决定。但是无论如何，总是我的决

定，是不是，汉弗莱？”

“是，首相，”他回答道，他显得比以前悲哀些，可是更聪明些。

[1]与编者的谈话。

[2]与编者的谈话。

[3]参孙（或译桑松）系古犹太人的一位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迪莱拉是参孙的非利士情妇，后将参孙出卖给非利士人——译者注。

[4]汉弗莱使用的语言是要把哈克搞糊涂，不知所从，因此把它全部按字面译出，不嫌噜苏——译者注。

[5]“怀特霍尔滑稽戏”是一个词，专门用来描绘怀特霍尔剧院里二十年以来在演出的一系列舞台剧。“怀特霍尔”当然也指把唐宁街十号与议会广场接连起来的那条街，沿着这一条街可以看到若干主要的政府部门。

[6]汉弗莱的词藻，他常用谐音等文字游戏作为手段。此处又是三个谐音词：upright, downright, forthright——在英语中意思相仿：公正，正直，直率，而且同温赖特（wainright）也是谐音的——因此哈克说他有天然的诗意——译者注。

[7] 哈克要学汉弗莱的一套学不像，于是显出语无伦次，句不成句，原文就是这样没有语法，乱七八糟，只能按字面照译——译者注。

[8] 这是口头语，指中央政策研究团，简称 CPRS (Centrel Policy Review Staff)；另有一个口头语是“思想库”(ThinkBank)。

[9] 英语的词是when——“当十号再需要的时候”一语与“如果十号再需要你”相比，后者可能含有“免职”之意，前者只是“将来的时间”问题——译者注。

[10] 指when and if，后两词是加上去的，英语的正式文件中常有此用法，而不仅仅用when——译者注。

[11] 此信也是咬文嚼字的——从头至尾在英语中只是一个长长的句子，只能按字面一一翻译来显出它的本色——译者注。

[12] 与编者的谈话。

[13] 基督教《圣经》中载原来迫害基督徒的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忽被强光照射，复活后的耶稣向他显现，在光中向他说话，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自此他转而信奉耶稣基督！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译者注。

5. 真正的伙伴关系

3月9日

今天我蹒跚地走上楼梯，回到我自己的套房去吃午餐。幸运的是，安妮在家。她对我望了一眼，问我内阁会议是否开得很糟。

“有没有什么办法擦去地毯上的血迹？”我哼了一声，一边把身子倒在我的印花布面的安乐椅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1\]](#)。（我们推测这不是安乐椅在深深地叹气——编者。）

“谁的血迹？”安妮一边问道，一边拿起饮料瓶。

“所有人的，”我苦恼地回答道。

她问我要不要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或是要一个双份。我决定来一个三份的。

我所以抑郁，主要原因在于刚刚递呈给内阁的财政报告。财政危机比我们中间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坏。没有人——尤其是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来临——除了一个人之外，即我的前任。怪不得他出人意料地辞职了！

安妮一点没感到惊奇。她沉思了一下，“我总觉得十分奇怪，他为什么要辞职而让位给一个

年纪比他大的人。”

我感到困惑。我说，“我并不比他大。”

“啊。”她以同情的眼光凝视着我。“也许你看起来比他大。”我一想，现在我看起来确实如此！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内阁的支付计划不得不进行这么多的削减。他们那些人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们都有雄心勃勃的发展的想法，因为我要求他们这样。

我们听到重重的脚步声。伯纳德在起居室门口出现了。安妮递给他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请给三份，”他严峻地说道。

安妮点点头，同情地但是聪明地没有说话。

“伯纳德”，我说，“汉弗莱早应该向我提出警告这情况将要来临么。”

他坐在沙发上，抿着酒。“我认为汉弗莱爵士并不懂得经济，首相——你要知道，他的确读过经典著作。”

“噢，弗兰克爵士怎么样？他是财政部的头头。”

伯纳德摇摇头：“首相，我敢说他理解经济方面更为不利。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安妮拿着一杯毕雷矿泉水[\[2\]](#)加入了我们的谈

话。“吉姆，如果发生了经济危机，难道内阁看不出必须要有所削减吗？”

“他们能看到别的部门必须进行削减开支，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部门。”

“那是相当自私的，”她评论说。安妮看来仍然认为内阁是充满着集体精神的。并非如此，他们都经常在互相竞争，讨人喜欢，要得人心。而求得人心的迅速的方式是花钱。花公家的钱。这使得他们受到本部门的人们的喜欢，还有党、议院和报界的喜欢。削减开支使得他们人人都不讨人喜欢，不得人心。安妮看不出其中原因。伯纳德试图加以解释，但是他长年来一直以完全不能使人理解的方式闲扯关于帽子或职务的问题[3]，使人对于什么事都莫名其妙，无法懂得。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4]：

我的解释实际上是一清二楚的。哈克夫人——据我所记得的——似乎觉得如果削减开支，公众会**高兴**的，因为公众是纳税人。我解释道，那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帽子或职务的问题。投选票的人，戴了他的帽子，即担任投选票的职务，总是极端高兴的，如果政府拿出钱来支付某项设施的费用他的话，因为他认为这设施是免费的！他并不体会到戴

了纳税人的帽子，即作为纳税人，他却是在为了他作为投选票人，即戴了投选票人的帽子，所得到的东西而付钱的。而内阁大臣们，戴了他们部长头衔的帽子，即当了部门头头的职务，却在互相竞争，因为戴了政府成员的帽子，即当了政府成员的职务，他们必须从这顶帽子里，即职务里，汲取出经济成就而同时又须让纳税人——他们戴了投选票人的帽子——认为政府是在花费别人的钱，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花的是**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必须努力把这件事放在他们的帽子下面。

安妮问我：“可以推测是你鼓励所有那些项目的开支计划，因为你要得人心，是吗？”

也是也不是，这是唯一可能的答复。当然我要讨人喜欢，赢得人心——这没有错，这也是你如何当选的实在情况。得人心，受人们欢迎就是民主的全部内容。但是我也认为这样做，我们花得起钱。我并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谁告诉过我，由于通货膨胀而出现的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英镑危机以及生产率低落等等。

安妮问我对此我在采取什么措施。“今天上午，你有没有下令严格限制？”

“我不能对任何事情发什么命令，安妮。”我痛苦地解释道。

她不能理解。伯纳德说：“他只是首相，哈克夫人。他手下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是属于他的，无法加以严格限制。”

安妮认为——据我的了解，她现在仍然认为首相是负全责的。这是一个谬见。一个领导只能通过一致协议来领导。

“那么，如果你不是，又是谁负责呢？”安妮问，相当困惑。

我被她的问题搞得茫然了。看来不存在一个答案。我想了一下。我终说道，“说实在的，没有人负责。”

“这样好吗？”她被搞得更糊涂了。

“必须这样才是，”我无可奈何地答道。“这就是民主的全部含义。”

“这使英国成为今天的英国，”伯纳德真诚地加上一句。

安妮思考了一下她刚才所听到的话。“所以，你的内阁在控制一切，不是你。”

她完全误解了！“不！”我说，“安妮，回想一下！当我是大臣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控制，是不

是？”

“不，”她说，“不过我认为那只是你这不在控制。”

像报界和传播媒介一样，安妮也一直盯着“控制”一词唠叨得没个完。至于政府，要点是没有谁在控制。很多人有权力制止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可是几乎没有谁有权力使得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我们的政府制度好得很，具有一架草坪割草机的引擎和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的刹车。

当然，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谈起过。选民们会把这一点解释为失败主义。可是它不是。它是真理！我将斗争[5]。（我们并不认为哈克要他的读者相信他意在“与真理斗争”——编者。）我们开始谈到眼下这个混乱的财政的进一步的含义和影响。明天我得会见一个后座议员代表团，他们要见我，是关于我曾经答应过他们的提高报酬的事。自然，我必须告诉他们现在不能增加了。他们会大光其火的。他们会说：

（1）我不能食言。

（2）他们的报酬低得不像话。

（3）对我来说，一切都称心如意，因为我每年的薪俸是五万英镑。

(4) 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事情的原则。

(5) 事情不是为了他们个人。

(6) 我在向议会民主的基础本身进行打击。我怎么会知道他们会说所有这些话的呢？因为这些是我当后座议员时曾经说过的话。

作答的唯一方法是说谎。我将说：

(1) 我对他们深表同情——实际我并不同情！

(2) 他们应该得到这笔钱——实际这一点并不真实！

(3) 待危机过去后，我要优先办的是这件事——实际我不会这样做！

(4) 如果议员们表决通过为他们自己大大地提高酬劳而同时又告诉所有别人说提高薪金没有钱的话，那么对议会的尊严产生不了奇妙的作用——实际上肯定产生不了！

如果有人说，“不是钱而是原则问题”，我忍不住要加一句话：他们**意思**是钱，为了钱！

我把这一切向安妮进行解释。使我惊奇的是，她同情这些人。

“事实上，议员们的酬劳难道不是太低了吗？”

我自己感到吃惊。酬劳太低？后座议员？我对安妮解释道，作为一个议员干的是一桩有津贴的大范围的追名逐利的自私行为。它是一种并不需要资格的职务，没有强迫规定的工作时间，没有履行职务的标准要求，可是能获得一间舒适温暖的房间、一架电话。这一伙夸夸其谈、空话连篇的妄自尊大者和爱管闲事、搬弄是非的无事忙还可以得到三餐补贴的费用，他们这帮人突然发现人们真把他们当回事而认真地相信他们，由于他们的姓名后面加上了两个字母M和P[6]。他们怎么会报酬太低呢？要知道每一个议员空缺约有两百人要申请争取到手。如果他们必须拿出钱来，就是说付了钱才能当上这个职务，那么每一个席位你可以二十几次地随便去填补。

“但是仅仅五年前你也是一个后座议员呀！”安妮说。

“我是例外，”我说明道。“我是精英。所以我上升到顶峰。”安妮想知道我是否认为我的这些答复能封住那一些人的嘴。我认为不能。他们也决不会让我闭嘴。“但是，”我耸耸肩对她说：“没有办法，没有其他选择。当我们在削减护士和教师的数目时，国家决不会接受为议员增加报酬这一举的。”

“护士和教师？”安妮脸上表示担忧。“这太严

重了，是不是？”有时候，我认为安妮始终对于政治一点也不懂，没有学到一点点政治。“不，安妮，”我厌烦地说。“远远不算严重。护士和教师在下一次大选前不可能投票反对我——而后座议员在今天晚上十点钟就能够投我的反对票。”

3月10日

正如我所预见到的，我同后座议员的会见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他们全说了我曾经说过他们会说的那些话，我也全说了我曾经说过我会说的那些话！他们还说，我必须记住：如果我失去我自己的后座议员的支持，我以后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任何话了，没有人听了。

我后来把汉弗莱请来。我对他说如果事前我得到一些消息，我也许早已预先把他们缓和下来。他承认没有预告是一件憾事。

这意味着他还懂得我的要点。“汉弗莱，这是你的事，”我着重地说。“你是内阁秘书。你必须坚持做到文件要早一些传递。”汉弗莱垂下头来。“唉！文件没有写好前，关于传递一事就有严重问题。”

这么说，那些具体文件没有写，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没有写？我沉下脸来对汉弗莱厉声说：“财政部肯定早已看到事情就要发生的。”

“首相，”汉弗莱耸耸肩回答道，“我不是财政部常任秘书。你还得问弗兰克爵士。”

“他会说什么？”我问。

汉弗莱又耸耸肩。“像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凡人是猜度不出大伟人的复杂和崇高的思考内容的。但是总的说来，我认为弗兰克爵士相信：如果财政部知道必须做什么，内阁不应当有过多时间去思考它。”

我发怒了。“但是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见解。”

“是，”他微笑地说道，“这就是所谓财政部的政策。”

“假设内阁有问题要提出呢？”我问道。

“我认为弗兰克爵士的见解是，”汉弗莱谨慎地说道，“在极少情况下，财政部理解内阁提出的问题，而内阁并不理解财政部作出的答案。”

我的怒火越烧越旺。“你支持这个看法吗？”我率直地问他。

汉弗莱看来真的大吃了一惊了。“我？首相。我唯首相和内阁的愿望是从，努力去执行罢了。”

我指示汉弗莱说，我的愿望是今后所有文件至少在内阁会议前四十八小时先行传递。我告诉他去对弗兰克爵士说明这一点。

汉弗莱说他很高兴去告诉弗兰克爵士，并说马上要求他接见他。说罢他就离去。

他的浮华措辞没有逃过我的注意。他清楚地认为弗兰克越来越摆架子和自以为是。除非……他仍然在担心上星期我对他发出的威胁，要委任弗兰克爵士为内政部文官部门的头头那件事。当然啰！这就是为什么他目前对弗兰克如此不忠诚的缘故。

我不知道我应当不应当解除他的苦恼。我把他们两人都悬在空中，不作决定，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对，我可以得到一个热切和合作的内阁秘书。

（那天晚些时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会见了弗兰克·戈登这位财政部的常任秘书，地点是在蓓尔美尔街[7]的改革俱乐部。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关于这次会晤记了一笔——编者。）

弗兰克和我谈论了这个星期财政部给内阁的文件晚到的事，以及关于经济危机的信息通知太仓促的事。

弗兰克表示说，希望我已经说明，仓促通知是由于美国对利率突然改变政

策所造成的。我请弗兰克放心，我已经勇敢地为他辩护过，使得首相对这次仓促的真正原因完全没有怀疑而确信了。

弗兰克对我的回答很高兴。他比我想象的要好，并不那么难于捉摸。

他关心的是，我们在这时候不能失去议员的友善关系。财政危机来了，我们显然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薪俸限制。不幸议员们被告知不能获得他们一直在盼望的薪俸的提升，而且正是在弗兰克即将提出文官部门加薪的建议那个当口。

这事情确实是难堪的。显然，一个人对加薪如此感兴趣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常务次官们不在乎的就是钱。如果我们去办实业，我们都已经发财了。金钱就是金钱，服务就是服务。

然而，弗兰克和我两人都完全同意我们应该为晚一辈的同事办我们尽量可以做得到的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努力帮助他们将涉及我们自己的薪金的提升——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点不在乎——接着我们就被批评说是营私自肥。

可是，这不过是我们不得不背上的

另一个十字架。

（汉弗莱爵士的日记中的这一段话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他是不是真正能够说服自己认为，在大规模地推动文官部门普遍加薪上（他和弗兰克在其中将获得大的一笔现金数目），他的行动是完全无私的？或者他是不是非常谨慎，所以他写下的每一件事（即使是为了私人日记之用）都能经得起仔细的审查，万一日记被偷走或曝光的话？——编者。）

我敦促弗兰克迅速提出我们有关薪俸的提议，在任何薪俸限制开始实行之前。也很显然，它必须在下星期四内阁会议之前那个晚上送进去——如果大臣们有两天的时间去花在同后座议员和政治顾问们的谈话上，他们将遇到各种各样的反对。

弗兰克担心这就要促使内阁活动连续突击两个星期。我要他确信眼下没有其他选择。

弗兰克于是建议，好这个提议由我们两个人发动。我能看出他要这样做的原因——人数多来得妥当。可是他提出的理由是，我们两人实际上是文官部门的联合头头。

不用说，这不是我所接受的见解。

内阁秘书是这部门的合法头头。弗兰克宁愿认为，由于他管财政这一方面而我管体制一方面，我们两人事实上都是这部门的头头。

他看来热切于继续谈论下去，好像为了证明一个要点。我只是一个劲儿要避免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根据我的看法，我必须在文官部门的薪俸事务上保持冷漠和公正，我对他说，如果我失去首相的信任，对这部门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毁灭，（对汉弗莱爵士本人也是灾难性的毁灭，这一点他是十分懂得的——编者。）

我鼓励弗兰克发动，等到时机成熟，我会出来站在他那一边的。

弗兰克还有一个顾虑，这一次的顾虑是合乎常规的。非常正确，他不愿内阁对这个作出裁定。

我们明确地认为，应该按惯例把它提到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那里去。问题是：谁来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一致认为阿诺德应当在委员会里，可是看来不太可能要内阁批准一个以前的文官来担任一个决定文官部门的薪俸问题的委员会的不偏不倚的主席。

我建议一个人选：韦尔什教授。弗兰克听说过他是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老家伙。尽管如此，韦尔什曾经要求我把他提名为大学公费补助委员会的主席一职。所以他理解对他的要求。

弗兰克同意韦尔什教授是一个佳人选。

（阿普尔比文件BA/281/282）

3月15日

自从我指示汉弗莱去保证不再有什么文件仓促送给内阁以来，仅仅过去了五天。就在那一天，我们决定议员们不能加薪以及财政部将削减一半计划开支。

但是我今天在桌上却发现了一件什么东西呢？文官部门的加薪计划？！

汉弗莱竟这样冒失地提出说，因为削减开支为文官部门增加许多额外工作，他们为了应付这些工作应当加薪。

荒谬！即使这是合理的话，他竟敢试图让内阁在明天的会议上通过，况且我已经告诉过他要保证递给内阁的文件必须在开会前四十八小时送到！

汉弗莱坚称这不是他的过失。“首相，轮不

着我替弗兰克爵士辩护。”

“替你自己辩护，”我反驳说。“你是内阁秘书。你也是文官部门的头头。”

“我是吗？”汉弗莱微笑道。“多么使我快慰呀！”

“只是眼下这一刹那，”我有含意地说道，我在后悔刚才说漏了嘴。

“作为内阁秘书，”汉弗莱说，“我是热切于削减公共开支，但是作为文官部门的头头，我对行政上即将出现的十分实际的问题负责，如果加薪问题不很快解决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以处理的事务，因为我担任两个职务。”[\[8\]](#)

“难道那是相当难对付的问题？”我问道。

“如果一个人不三心两意的话，”他安详地回答。

“或者有两张脸的话，”伯纳德插入说；我可以看出他立刻有些后悔。

“也许我应当解除你其中之一，”我建议说。

汉弗莱惊恐起来。“啊，不，不，我对这两个都十分满意。”

“两张脸？”我好玩地问。

“职务，”[\[9\]](#)他厉声说。

“但是，”我提醒他，“你说你有十分实际的问题。”

“问题是士气低落，这免不了会导致罢工的危险。试想一下，如果管理社会服务项目计算机的人都罢工，其影响如何？进一步说，我们已经在招聘方面体会到不少困难。”

他的话对我来说是新闻。“我以为对每一个职位，你手中都有约十个应征者么。”

“对，”他勉强承认，“但是我们得到的应征者的质量很低，没有几个具有第一流的学位。他们中间大多数只有第二流的低级学位。”

荒谬的知识学问上的自命不凡的态度！“我得了一个第三流的么，”我说。

汉弗莱犹豫起来，意识到他很不够策略。伯纳德试图为他掩盖。第三流的对一个首相来说是可以的，可是汉弗莱在讲的是关于文官的问题。”

汉弗莱坚持他自己的立场。“文职人员工会的不合作会使政府搁浅和停顿起来。”（我想他是在假设政府以前是在运行的）第一部门联盟[10]现在会员的人数很多。

“包话你在内？”我问道。

汉弗莱向我保证，即使他是该工会会员，他

将一如既往地同我合作。

这一点大致上就是我现在感到不满意而抱怨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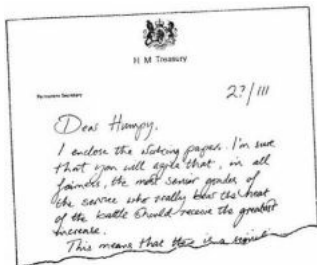
我向他重申我不可能使这个计划通过，**即使我愿意这样做**。后座议员们在削减问题上要造反的阴影在笼罩着，议员们决不会通过文官部门的加薪。而且内阁也必然会拒绝的。

汉弗莱很快看到了这一点。他建议我们只不过请求内阁，在原则上，同意察看这个申请书。随后这件要求可以提交给一个独立的评审小组去详细考虑。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妥协。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就是汉弗莱建议由韦尔什教授当主席。我听说过他是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老家伙！

（第二天，内阁确实在原则上同意察看这一要求，但是未承担其他任何义务。这个要求被搁置起来，等待它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这个计划订立得非常匆忙，仅仅在十一天以后就由弗兰克·戈登爵士送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准备将计划写成书面文字这一点上，弗兰克爵士的谨慎小心略差于汉弗莱爵士。我们在内阁办公室内发现了这封由弗兰克手写的条子。推测起来，它由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万一将来在同弗兰克爵士进行控制文官部门的斗争中可能

派用处。在这件事进展过程中，此信从未给哈克看过，不过它显露了在二十世纪后期文官部门加薪的要求是如何筹划的大致情况。整个信件复印如下——编者。）



女王陛下财政部

3月27日

亲爱的汉弗莱：

我在信内附上工作底稿。我肯定你会同意：求其绝对公平，那些其正承受斗争重担的本部门高级的文职人员应当增加得多。

这意味着副秘书长、秘书、常任秘书及那两个挑起大负担的职位[11]，其增加的百分比相当大。大约可以到百分之四十三，唉！

所附文件不是预备提呈的。应提呈的不久即将给你送去，内容包括附录从A到Q，所以内阁不可能有时间和机会去阅读其全部。交给内阁的一页摘要[\[12\]](#)大体上与上一次的一样，标题是“工业中类似的职务”，现在也附上。

你会看出薪俸数目的比较是以英国石油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董事的薪俸作为依据的。我认为这没有遭到责难的危险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习俗和惯例，我们没有提到这些公司的名字；只称为“典型的实业公司”。

接着我们提到我们自己的加薪新例子，从逐级递增的尺度的低额开始，例如：

通信员每周加三点五镑

登记处职员每周加四点二镑

科学方面的官员每周加八点二镑

对本部门高级别的官员[\[13\]](#)来说，则是年俸增加二万六千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必要在常规的一页总结中提到这一点，首先因为如果内阁成员愿意干的话，可以由他们自己来进行计算！第二，因为这仅仅应用在上述的两个高职位方面。如果遭到批评，正如我们说过

的，那仅仅是我们必须担起的另一个十字架。

诚挚的，
弗兰克·戈登

（汉弗莱爵士后来发了一封复信，措辞非常谨慎——编者。）

怀特霍尔街70号，伦敦
SW1A2AS

发自内阁秘书和内政部文官部门主
任
3月27日

亲爱的弗兰克：

看到你关于文官部门要求加薪的提议的内容，很高兴。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信息。

也感谢你没有给我看全部细节。如果我完全知悉，那会非常不合适的，既然薪俸一事是在你的权限之内。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自愿提出放弃我们自己所加的薪俸的一部分？还有你未曾提到养老金这个问题。

你是否十分肯定内阁不会研究审查这个提议，比那页撮要远为细致地研究审查呢？

你的永远的，
汉弗莱·阿普尔比



（弗兰克爵士回信给汉弗莱爵士——编者。）

3月27日

亲爱的汉弗莱：

如果我们自己的加薪被提出讨论，我们可以自愿提出推迟增加。等纷争平息后再补发。

我未提养老金。我觉得好还是不提（自从我们经过周折完成通货膨胀指数

以后），它将产生敌对情绪，把事情搞混，而且规定养老金的真正价值是非常困难的。

我看不出内阁大臣们有什么可能更深入地研究调查这件事。大臣都是由他们自己手下的官员他们简介基本情况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忠诚之心何在。

弗兰克

（接着汉弗莱爵士回信给弗兰克爵士——编者。）

3月28日

亲爱的弗兰克：

我将把这件事放在议事日程的末了，在午餐以前。日程这么多，所以在小心掌握之下，只剩五分钟可以进行讨论。

因此，一切都应该很顺利，除去韦尔什教授的严格审核之外！

你的永远的，
汉弗莱·阿普尔比

3月29日

今天早上我接到多萝西·温赖特那里来的电话，非常有意义。我曾经吩咐她对文官部门加薪

要求作一研究，写成报告。她要马上给我一个反响。

我问她她的答案是什么。

“我还没有答案，有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她告诉我：“这些问题不是向您提的，而是向汉弗莱提的。这个要求是谋私利的和不适当的，并且对它没有答案的一些问题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不过请把我的问题以绝密来对待之，否则你将永远捉不住汉弗莱。”我把那张问题单子锁在书桌里并且把钥匙拿在手里。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很幸运，这个电话给伯纳德·伍利听到了。他不是偷听。所有首相打出的或打给首相的电话，首席私人秘书有责任要聆听，以便纪录所说的是什么话并以资作证，也为了替首相书写备忘录，以及保护首相，不使他以后被人歪曲。在这件具体事情上，多萝西·温赖特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她没有使用哈克的私人电话线。或者更好一些，她应当亲自去看他，当面谈话。

当然，实际上也该说伯纳德·伍利有责任对这个电话严守秘密。也许可以辩解说，他死盯住规则的字面意义——但是从汉弗莱爵士的有关日记中可以看出伯纳德·伍利并没有坚持保密的精神实质。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如所有私人秘书一样，

他的确有困难保持双重的忠诚——编者。)

我在通过私人秘书办公室走向内阁专用室的途中，急切的伯纳德·伍利挡住了我。

他告诉我已经发现了动向。具体地说，是在文官部门不希望有任何动向的事务方面发现了动向。

我没有指出文官部门一般来说不希望任何事务出现什么动向。

伯纳德·伍利看来甚至不能够或不愿意以他通常的清晰的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告诉我情况有发展，那是关于一件正常地、完全地和专一地处于文官部门控制之下的事务。我对他说他在讲谜语，搞不懂在说什么。他向我道谢，

对我来说这次却非常罕见地领会得很慢。我体会到他的嘴唇被封住了，以及他一定在机密地指一些记录，一定是他有责任记录下来的首相与他某一个可以信任的顾问机密谈话之类的东西。

我问他是不是这样的东西。他点头承认。

我问他与首相谈话的那么可信任的顾问叫什么名字。他对我说他不可随意地泄漏她的姓名。这一点非常有利。

我仔细追问他，想发觉他的机密告诫是不是涉及财政危机或者首相的愚蠢的核战略。伯纳德·伍利暗示说，那件事务比刚才所说的那两件甚至还来得重要。

我马上理会到他一定在指文官部门的加薪要求。我问他是不是，他却拒绝明说，既不认可也不否认。做得十分正确。

（也许可以争辩说，这种拒不认可又拒不否认并不那么正确，因为伯纳德·伍利对汉弗莱爵士所提的其他一切问题都已经给了明确的反面答复，唯独对这一个没有。所以言下之意推断起来是很清楚的，不会错误的——编者。）

我问伯纳德·伍利该怎么办？他劝告我应该非常小心地考虑考虑我的地位，也许可以暂时采取中间道路的姿态，同时注意人们想的和说的，这样可以敏锐一些，以便掩护撤退和注视后方背部。我觉得他说得虽有损于尊严，但还是重视他的警告。

我感谢他的帮助，他答道，他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东西。我同意他的说法，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会是非常不合适的。

3月30日

今天我起得很早。起身之后我非常详细地研究了文官部门的加薪要求；有了多萝西的极妙的问题单的配备，我打算同汉弗莱大闹一场。我很高兴她把她的评语完全机密地告诉了我，因为今天我才明白过来——关于汉弗莱这个人的很重要的一点，即他并不是总是站在文官部门一边的。如果事前不知道我提出的若干别扭的问题，那他表现得还通情达理和有所帮助，使我对他印象很深。

他进来以后，我递给他那厚厚的加薪要求的卷宗。它简直是惊人地冗长和噜苏——我记得光附录就编到Q。感谢上帝，多萝西是多么有耐心的读者！而且读得也很快！

我问汉弗莱对此有何看法。他说太多了，一下子不能加以判断。我对他说，读一读前面的那精彩的一页撮要。

他读了。接着他抬头看着我说，我把他推到一个十分困难的地位。

我对他严肃起来。“注意，汉弗莱，”我提醒他说，“我欣赏你对你的同事们很忠诚，但是你对内阁及其政策也应忠诚，更加广义地表示忠

诚。

“我同意，”他说。

我感到迷惑不解：“你同意？”

“是。”他说。

我要把他这句话搞个明白。“你的意思是同意我的说法？”我问道。

“是，我同意，”他重复了一遍。

我还是不能肯定他并不是在玩文字或语言游戏。我要十分肯定他对我抱什么态度。“确切地说，你同意谁？”

“同意您，”他答道。

我要绝对地肯定。“不同意弗兰克？”

“不同意。”他说。

我归纳一下。“这样……那你与我一点也没有与我争辩？”

“没有，”他答道。“也许我没有说清楚。首相——我同意您。”好吧，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完全大吃一惊。

于是我问他对这个谋私利的加薪要求有什么看法。

“它本身并没有过度，”他答道，“但是在国家

拮据紧张的时候提出，那是既不明智又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我不愿批评我的同事们，但依我之见，弗兰克爵士，尽管无疑出于全然良好的动机，应当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文职人员较狭窄的部分利益之上。这项要求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他竟使用这个词语，多么有意思啊！我对他说我也写下了一些问题。我把多萝西的问题单子递给他。

他瞪眼看着这单子。“问题提得好，”他轻声地说。“这些问题哪儿来的？”

我不肯定我对他这个问题的含意有否兴趣。我说：“是我……想到的。”他又瞥了这张单子一眼。“是。噯，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以及多萝西——所认为的。于是我问汉弗莱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他说我们应该发问。我以为我**是在**发问，谁知他的意见是，我应当向弗兰克爵士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您应当把他请来讨论它们。他可能有了答案。说实在，他应当有答案。毕竟这是他的工作。”

我觉得他是很对的。我吩咐他去告诉伯纳德安排这个会晤。我还对汉弗莱说，我真的欣赏他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偏不倚。毕竟，如果这加薪要求通过的话，无疑汉弗莱本人从中会得到不少好

处。

汉弗莱谢谢我，并说明他已经看到他本身工作的报酬就是：意识到他的服务对国家一直是有益处的。我肯定他说的是事实。当然，我对我自己的报酬也正是这样的看法。可是，一个人看到应该表扬的就必须予以表扬——汉弗莱今天表现得非常公正。

他走了以后，我问伯纳德“第一部门联盟”是如何工作的。如果他们都加入工会，他们又怎样能就他们自己的薪俸问题同他们本身讨价还价呢？

我应当预计到他会怎样回答的——伯纳德说，如果他们干脆担任两个职务，那就不那么困难了。

“这一切都很好，”我说，“可是发生了劳工行动，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词语一定在这个唯一的场合被文官部门加以使用的，尤其是把使他们降低身份的industrial这个词应用到这个部门本身上面来，而通常往往是用industrious[\[14\]](#)这个词来描绘他们自己的——编者。）

“这种情况可以是很尴尬的，”伯纳德说。“我们工会的书记是文职人员工会的理事，这个工会

曾经策划上一场的分裂——同时他作为斯旺西[15]的第三把手，他的责任是为了挫败这一次的分​​裂作出应急计划。”我问结果如何。伯纳德说他干得非常成功。

我不懂怎么会的。我说：“他一定已经知道另一方的计划。”

“哪一个另一方？”伯纳德问。

“有两个另一方，”我符合逻辑地回答。“任何一个时刻他只要不在这一方，就必在另一方。”

这个说法对伯纳德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同意道：“对，可是他从不泄漏另一方的计划。”

“向谁泄漏？”我有些迷惑不解了。

“向他自己那一方。”

“哪一个自己那一方？”我问。

“就是任何一个时刻只要他不在那个另一方，就必然会在这一方。”伯纳德耐心地解释道。

现在我倒是在逻辑的迷雾中瞎摸了。“对，但是即使他从未把另一方的计划泄漏给他自己那一方，可是他知道另一方的计划，因为他也在另一方那边！”

伯纳德对这个问题略加思索。他回答

道：“所以我料想他从未向自己泄漏他已知道的事情。”

我问伯纳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对伯纳德来说这实在非常简单。他说：“他在谨慎方面堪称典范。”

对我来说，斯旺西第三把手听起来像是该收容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格分裂的典范。不过还剩下一个十分重要的未解答的问题，“当真正的利益冲突发生时，伯纳德，文官部门将实际上站在哪一方呢？”

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赢方，首相。”同时他动人地向我微笑了一下。

（被事态的发展所迫，汉弗莱不得不站在反对弗兰克爵士所提出的文官部门加薪要求的那一边，他处在似乎进退两难之中。以比弗兰克爵士更为忠诚的姿态出现对他是有利的：无论如何，既然首相已经觉察到一些关键性问题，这项要求无可避免地要完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聪明的人都会避而远之。然而现在，他不得不找出一个方法来使文官部门的加薪要求被目为是可以接受的要求——部分地由于那将巩固他在首相和部门中所有同事前的地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是要钱的。

为此，他求教于他的杰出的前任阿诺德·鲁宾

逊。阿诺德退休后接受的许多职务之一是：就争取信息自由运动的主席。可是，奇怪的是，阿诺德爵士没有把这一章里所叙述的一些事件向报界，也没有向该运动作出报告。他关于这方面的私人笔记，实际上，只是相对而言是在近期才发现的，那时候（根据他的遗嘱）他的私人文件才从他在沃金地方的银行保险箱里取出来，那是在他逝世后三十年的日子——编者。）

我们在雅典娜神殿俱乐部共进午餐。汉弗莱感到不安的是，他未能支持弗兰克的那件事。他无疑深感苦恼，但是一个人是不可能去支持明明要受到拒绝的提议的。

那个温赖特雌货向哈克提供了一连串的问题，再加上一个提示，由那些政治家们来阻止我们处理我们自己的加薪要求，并让一个精选的议会的委员会来加以决定。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念头！我们将碰到第二件事，即政治家们以不称职为理由来去掉一些文职人员，这将成为可能引起大变动的小事。

无疑，事实是有些文职人员确实不称职，但是当然不是差到那样的地步而足以引起政治家的注意。一个比较对头的想法也许是：文职人员可以拿不称职

为理由而去掉政治家，虽然这是很遗憾地不太可能的念头，因为这实际上将撤空下议院、去掉全部内阁人员，终止民主制度和开始责任政府制。

看来弗兰克使用了标准比较方案——以工业中的类似职位为参照系数。他们要求提薪百分之四十三。我提出了下列建议：

（1）既然实际上所有有关职员都在伦敦工作，就应当大幅度提高伦敦津贴。津贴等同费用。由于它不算作提薪，在百分比计算中就不在其列。

（2）推行一项特殊毕业生津贴，对象是一级学位和二级“上”学位的持有者（牛津不授二级“上”学位，所以把牛津的二级算作二级“上”学位）。

（3）倍增优异功绩奖，这项奖金人人可得。因它等同额外奖金并且像津贴一样，不算作提薪。

（4）上述一至三项，对一些高级薪俸来说，比原先的加薪要求降低了约百分之十八。因此应从1973年算起，那是百分比[\[16\]](#)增加值的高峰。而且要计算到从现在起——也就是这次加薪要求阶段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的两年之后

开始计算。

这四项措施把百分比增加数降到约百分之六。不过这**仍然**意味着文官部门的薪俸总额显得太高。唯一的选择是削减文官部门的编制。这样，对个人来讲，提薪相当宽裕而同时对总额来讲增加又较少。

当然，文官部门的**确实**削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将是文明的终止。所以，解决的答案远不会令人担忧，那就是对有些官员，不再称他们为文官就可以了。

例如，把所有博物馆都转变为独立的信托机构。随后全部职员不再称为文官。他们仍然是干同样的工作的同样这些人，仍然从政府补助金中付给他们薪俸。所谓补助金，正如津贴和额外奖金一样，并不计算在薪俸统计数字内。这样看来像是一次削减，一次极可观的削减，除非有谁要求对它进行十分细密的调查[\[17\]](#)。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设立足够数目的信托机构。但是也许没有必要一定要设立。只须在以后的两年中花一段时间去**筹划**即可，为了在统计数字中得以反

映出来。如果随后没有产生，这也不是谁的过错。

阿普尔比大大地感谢我。我表示我总是很高兴帮忙的。

（我们猜度尤其是在他的生日将临，女王将授与他荣誉称号的时候，更是如此。阿诺德爵士确实在六月被授与第二级爵士巴思勋位。——编者。）

我提出同弗兰克·戈登在财政部也讨论一下这件事。汉弗莱坚持我不应这么做。显然，弗兰克·戈登目前正面临着许多问题。他没有向我提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弗兰克爵士还不知道哩——编者。）后我向阿普尔比建议来一个重大改革。

议员们关于文官部门的薪俸的事可以气量很小和固执己见，要下议院通过一项增薪方案常常需要斗争。但是如果把议员们的薪俸与文官部门的某一级别挂上钩，那么每次他们对文官部门加薪要求进行投票表决时，他们附带地也得到提薪。我们也可以使议员们的养老金与指数也挂上钩去，这就可以免去各方面的不愉快[\[18\]](#)。

这一点在我任职时没有在内阁办公

室实行，因为哈克的前任，作为首相，认为那也许会推动议会经常在政府支出方面搞通货膨胀的恶习。我希望议员们不要如此地谋私利，可是政治家们是贪财的一伙，而我们在文官部门中供职的人务必不能以我们自己的高标准来判断每一个人。

4月3日

今天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会。出席的有汉弗莱爵士、伯纳德、弗兰克爵士和多萝西·温赖特。啊，当然还有我。我听说汉弗莱是一个忠诚和不自私的仆人。对弗兰克我不敢肯定。

弗兰克在会上第一个说话，坚称文官部门的薪俸明显地落后于工业中类似职位的薪俸。当我问他哪几种类似职位时，他避免给我一个具体的回答，而说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程式，但是多年来一直是普遍承认的。

我拿出一些事实来与他对质。我告诉他说：“根据我掌握的数字，一位常务次官每年已经得到四万五千镑以上的收入。内阁秘书和财政部的常任秘书则超过五万一千镑。”

弗兰克在回避，他带着淡淡的微笑说：“也许您是对的。”

荒唐可笑！他连自己拿多少都不知道？还是有可能暂时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

我转向在内阁会议桌上坐于我右边的汉弗莱，问他有什么看法。

他是很谨慎的人。一点没错。他说：“真的，这事不由我来分说，首相。我享有既得利益而且弗兰克爵士又是负责文官部门的，是不是，弗兰克？”

汉弗莱至少还懂得情理承认他有既得利益。坐在我左边的多萝西接下来发言。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我点点头。她死命瞪眼看着桌子对面的弗兰克。“弗兰克爵士，在工作保障方面的得益，你作了多少扣除？”

他吓了一跳。显然，这是一个以前从未有人问过他的问题，也是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多萝西进一步解释道：“工业中的高级人员可以被解雇，有这个危险。他们在企业合并或被人接管时有被开除的可能，企业也可能破产。可是你们的工作有保障。”

他又在回避了：“唔，有得有失么。”

“什么失？”多萝西尖锐地问道。

弗兰克解释说，高级文官也许职位有保证，

但是他们工作压力大、时间长。

“难道工业里的那些人不也是一样吗？”多萝西要他回答。接着看看我并加上一句：“不管怎样，工业中的领导人物必须作出决定并忠于决策。”这句话触怒了弗兰克。他脸上泛起了绯红的小疹。他反驳道：“文官也一样。”

多萝西厉害地向他进攻：“有这事？我一直以为大臣们是作出决定的！”

“并承担责任的，”我插话道。“就是这样定的，是不是？”

弗兰克的确不知道要不要答复这一切反诘式的问句。“是……唔……当然是大臣们作出决定的，”他承认说，“可是文官必须决定如何执行。”

多萝西来了一个杀手锏。“正如一个秘书要打一封信时决定怎样设计布局那样？”

“是，”弗兰克说。“不，”他又说，立刻改变了主意。接着他求救于汉弗莱，“我想汉弗莱爵士懂得我的意思。”

汉弗莱把眼睛牢牢地盯着摆在桌上他面前的那张白纸。“嗯，弗兰克，全在于你，你是负责文官部门的薪俸事务的。”

多萝西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的是，**提一提“公职的效劳成分”**如何？

我冷冷地凝视着弗兰克。我问：“谈谈‘公职的效劳成份’，怎么样？”

“‘公职的效劳成份’？”他问。“您指的是什么？”

我自己也不太肯定我意思是指什么或者说多萝西指的是什么。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报告上没有提到。我漫不经心地转向多萝西，表示她可以代替我说明。

“关于职位，其中有一个公职服务的效劳功绩的浓厚成份，”她爽快地开始解释。“这个业绩的酬报就是受勋——三级巴斯勋爵士、二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士以及爵士品位。

“在一定程度上，”弗兰克谨慎地承认。

多萝西又转向我说：“你知道，首相，我不知道我们应当不应当把文官与慈善机构的主管人员比较，而不是与工业中的主管人员比较。”她边说边在她自己的文筐里急忙寻找。“我想他们只能得到一万七千镑左右。”我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议。”的确是。

弗兰克惊慌失措。汉弗莱看来也一点不高兴。

“我不认为.....这样，我们永远招聘不了新工作人员，”弗兰克说，声音显然高了半个八

度。“士气会直线低落……我敢肯定汉弗莱爵士会同意的。”汉弗莱依然保持沉默。

我朝他看了一眼。“汉弗莱，你呢？”我问。

“好吧，首相，我的意见是……。”他抬头看看弗兰克，目光中明显地露出不支持的神气，他说：“弗兰克是负责文官部门薪俸事务的。可是，弗兰克，我的确认为首相有权要求回答。”

弗兰克明显地被这个回答吓了一跳。他又勉强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桌子旁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微笑的。

那个与指数挂钩的养老金问题也在多萝西列出的单子上，我下一个就提出这个问题。弗兰克斥之为完全不相干的问题。“很早以前已经同意过的。”

“可是具有相当大的价值，”我坚持说。

他在滑过去。“价值，对。但是并不过分。”

我在多萝西为这个会议准备好的极好的摘要里拿起一页。我说：“这里有一份估计说，买回一份常务次官的养老金要花六十五万镑。”

弗兰克又微笑道：“荒谬！”

“那么，你怎样估值呢？”多萝西问道。

弗兰克太愚蠢了，他竟提出了一个数

字。“约十万镑。”我猛一下抓住这一点。“这样吧，弗兰克，我就向你提出一笔交易。政府将买回你的养老金——以及任何别的愿意出售者的养老金——按照你刚才的估值。我们将给你十万镑，现款，来交换你享受养老金的权利。交易就这样定了？”

弗兰克现在给人的印象是所熟知的文官形象——一只没有头脑的鸡。“噯，我的意思是，不，我是不假思索地随便谈谈的，那可能是这个价，我自己也没有计算过。”

多萝西又射出一枪直中鹄的。“六十五万镑的数字来自保险和养老金精算师协会。”

“不错，但是商定的时候，我肯定完全不是如此，”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嘀咕说。

多萝西不留情面。她另有注意。“养老金与指数挂钩作为勋章的替代，一个抉择，那又是怎么回事！每一个文官都可以选择他的报酬的形式，他要勋章呢，还是现款？”

“但是这是荒谬无稽之事！”弗兰克尖叫起来。

“为什么？”多萝西问道。

我也要听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在我右边的汉

弗莱看来咬紧嘴唇不说话，他的沉默使他非常突出。甚至伯纳德脸色也苍白起来。我在十足地欣赏这幕戏。

现在留给弗兰克一个机会来为无法辩护的事进行辩护。“这样的选择会……它会……它……呃……它会把我们……呃……把**他们**推到一个难以处置的地位。我的意思是，那些已经获得荣誉勋章的人怎么办呢？”

多萝西当然对这一问题是有答案的。显然，她事前已经估计到每一个牵连到的方面。“那很简单。他们也可以选择，放弃荣誉勋章还是放弃他们与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她俯身向前并越过我高兴地向汉弗莱微笑道，“你以为如何？汉弗莱爵士，——或者成为阿普尔比**先生**？”[\[19\]](#)

汉弗莱并不觉得有趣。他期望弗兰克能对付得比目前这个样子好一点——现在他自己的加薪和荣誉勋章都受到攻击了。“我肯定弗兰克爵士对这一点已经彻底地研究过了，”他说。

“不够彻底，”我说。“弗兰克，从这个加薪要求中，你个人会得到好多钱，是不是？”

弗兰克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说：“首相，这不是一种报酬。”他这么说，按推测，大概意思是指“**是的**”。

多萝西当即赏给弗兰克一个讽刺的微笑，“你意思是指你个人很高兴把自己排除在这次加薪之外？”

弗兰克不言不语。她转向汉弗莱。“我肯定内阁秘书会这样做的，会不会，汉弗莱？”

我对汉弗莱觉得过意不去，但是他是处在一个相当难堪的地位。

他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谈了一些前例，考虑到总的这个部门以及以长期观点来加以思考，如此等等。接着他突然发现了一条出色的脱身之路。他说得很突然和十分坚决：“是，我同意把我自己排除在加薪之外，如果（而且除非如此，否则决不如此）政府确实认为高级人员的薪俸应当少于他们的下属，如果政府把这个原则引伸到内阁大臣和他们的年资较浅和晚一辈的大臣之间来加以应用的话。”

自然我是没有这种意图的。而且不管怎样，我的目的不在于逼得汉弗莱走投无路，使他陷入困境，他在这件事上站在我一边。

于是我谢谢各位并请他们回去。

我把汉弗莱留下，向他单独说一句简短的话。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们对弗兰克太严厉了一些。他说：“相反，问题提得非常合适和尖

锐，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即使我本人并不愿意对同事不忠诚。”

很明显，他从来没有当过内阁大臣一职。

4月5日

汉弗莱今天确实安然度过了。他在努力制订一个文官部门新的加薪要求，比以前那一个低得多。他想向我解释一下。

他对我说：“遗憾的是，我一直认为在紧张和不足的时候，财政部的要求是过份了，不是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的。当然，对文官们来说是件好事，但不是应对上面忠诚的内阁秘书所能推荐的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财政部常任秘书担任文官部门头头的原因。”我懂得他的中心思想。

他接着向我提呈一个更为温和适中的要求，在两年中仅增加百分之十一，高级人员仅仅约按一般的数目来加薪。文官部门总的薪俸额，在一个时期里，按照汉弗莱的方案，每年只增加百分之六左右。

这显然是大为合理的，我也完全愿意批准这个方案。他甚至也没有要求立刻实行。他说，明显得很，低级人员的加薪还必须经过正常的程序，但是他建议第一部门[\[20\]](#)的要求应当以极端

保密和迅速的步骤完成手续。

其理由是，他生怕他的方案可能发生逆火，如果广泛地加以讨论，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第一部门联盟[21]的许多成员也许会提出更高要求——如果省掉弗兰克那一头也行的话，我肯定地觉得他是对的。所以汉弗莱现在不愿让谁看到它，即使是顾问，也不让他们看到。

这一方案我没有话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他能够使他的同事们接受这一个微小的增加，仅仅是百分之六的话。他说他能左右局面，如果我保证予以支持和在保密方面予以合作。我保证。我在这方面真正做成了一笔交易！

但是还有一个未决的问题：议会。后座议员总是讨厌文官部门的加薪的。汉弗莱有一个解决办法——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办法涉及一个将要受到普遍欢迎的重大改革。（所谓普遍欢迎，哈克指的是议会和文官部门，不是英国的公众。对他来说，普遍只包括威斯敏斯特和怀特霍尔街——编者。）

“首相，如果议员的薪俸同文官部门的一个级别挂钩的话，那么他们毋须不断投他们自己加薪的票了。每一次文官部门获得加薪，他们也会获得加薪。自动地。如果他们的养老金也与指数挂钩的话，那就更好了。”

“那当然啰，”我同意。“好极了，谢谢你。”汉弗莱真正是可靠的人，是支柱、是骨干，而且彻底自我牺牲。“你认为一个后座议员应该属什么级别？”我问他。

“我认为，大概可能是一个高级校长的级别吧。”我感到惊奇。“那是不是相当地低了？”

“后座议员是相当低的，”他说，眼睛调皮地闪烁了一下。

“那么内阁大臣应该与哪一级挂钩呢？”我问道。

“次官，是不是？”汉弗莱建议说。

“那么首相呢？”

“唷，首相，”汉弗莱说，“眼下你的收入甚至比我还少，可是我认为您的级别应当等同于一个常任秘书。还有，您像我一样可以享受与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可以按您的担任首相的年数计算，不过计算时，好像您曾终生担任这个职位一样，而且那也将是您的退休薪俸。”[\[22\]](#)

一个非常公平的待遇。我谢谢他。他耸耸肩，满不在乎我的感谢。“毕竟，首相，这是一个伙伴关系。”

“说真的，”我同意。“那是一个真正的伙伴关系。”

“是，首相汉弗莱说。从这一切情况来看，从骨子里看，他还是一个多么好心人啊！”

[1]英语中表达“人倒在椅子上深深地叹一口气”这句话的后半部可以用介词词组加名词with a deep sign,（不像汉语中把“叹气”作为动词），来表示一个动作，因此这个介词词组，由于紧跟在椅子后面，在英语结构中也可作为修饰椅子用。为此，编者借这一点加注表示对首相的嘲讽——译者注。

[2]法国南部产的一种冒泡的矿泉水，也是商标名——译者注。

[3]英语中的 hat 一词，作帽子讲，也作区别职务的帽子，也就等于职务或职位——译者注。

[4]与编者的谈话。

[5]编者在此处加注，因为哈克只说fight it; it这个代词可指上句的“真理”，也可指整个这种情况，而且既可理解为“与……斗争”，也可理解为“为……斗争”，因此含义不清，加注是为了调侃——译者注。

[6]即“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

[7]英国伦敦以俱乐部多著称的那条街——译者注。

[8]这两处哈克都用的是“帽子”（Hats，等于“职务”见170页的脚注），作者在此地，为了玩文字游戏，故意用“帽子”，因下面说话中又提到“脸”或“脸皮”（faces），这二者都是实义词而转作比喻之用——译者注。

[9]同1

[10]First Division Association（FDA），代表白厅内高级文职人员的工会。

[11]这两个职位就是内阁秘书和财政部的常任秘书；这两个职位凑巧是由这封信的发信者和收信者担任的。

[12]在文官部门里称为“珍妮特和约翰常规”，意即老一套，典型的行事方式或标准做法。

[13]仅指弗兰克爵士和汉弗莱爵士二人。

[14]industrial此词一般作“工业的”讲，但也作“劳工”讲，如industrial relations则作“劳资关系”讲，上述“劳工行动”（怠工、罢工）也称industrial action。又industrious一词指“勤劳”，与industrial词出同源。编者加此注是调侃文职人员自以为高尚，不把自己列入劳工之类，但又要加入工会来争取劳工的权利。——译者注。

[15]英国威尔士南部港市——译者注。

[16]不是收入——编者。

[17]这个程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使用过，导致英国的公众相信文官部门的职员仅为六十八万人，是许多年来最小的数目。

[18]这个条例在1983年执行，没有通过任何立法而且极少宣传；在七月后期才予公布，这是因为少数几个能够看透其意义的新闻记者外出度暑假去了。

[19]Sir一词用于有爵士称号者的名字或姓名之前，但不用于姓氏之前。因此汉弗莱·阿普尔比，可以说Sir Humphrey（汉弗莱爵士）但不可说Sir Appleby（阿普尔比爵士）；当然也可以连名带姓说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如称先生，则须称阿普尔比先生。但一般不称汉弗莱先生；连名带姓称汉弗莱·阿普尔比先生是可以的。——译者注。

[20]高级文职人员——译者注。

[21]是高级文职人员的工会组织——译者注。

[22]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已经成为惯例。

6. 民主的胜利

4月10日

今晚我们在十号举行了一个酒会。许多宾客中有美国大使。他在有黄色立柱的那间屋子里拦住了我并慢慢地把我挤到一根柱子那里去。

我愉快地问他：“白宫情况如何？”

他是一个十分高大结实、和蔼可亲的家伙。很难相信他说的话会等同于威胁。然而……他说：“白宫的人听到一些关于撤销三叉戟的打算，除去这一切以外还有关于粮食战争等的流言蜚语——呃，就是说那个来自我们欧洲朋友们的友好竞争[\[1\]](#)，这个竞争差不多可以炸毁这整个北大西洋联盟。”

说话时，在场的许多可爱的、有风度的中年女士中有一位手里端着一只小银盘，上面放着各种酒和饮料，在我们面前走过。我快慰地挑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美国大使挥手示意请她到别处去。

“当然，那仅仅是谣言，”他继续说道。“我个人不能相信英国政府会试图撤销三叉戟。但是我体会到有压力加在您身上。”

事实上，所有的要撤销三叉戟的压力都发自

我自己。不过我勇敢地回答——实际我是在说谎——“对，噯，受压力是我的职务的一部分，是不是？”

“不过白宫吩咐我向您转达——当然，非正式地，不以我作为大使的官方身份——这也许会造成麻烦和产生麻烦。你知道，国防工业包括一些大的单独的对党的经费作了捐助的人呀。”

这是汉弗莱早已预料到的，美国会有这种反应。那不是什么新闻。“真的吗？”我说，好像这是新闻似的。

美国大使进一步靠近我。我肯定他无非是要表现他有机密，可是我感到那是威胁。“白宫会大做文章极力制止撤销的。大做文章！”

在这一时刻，我又取得机会思考一下，这次是政府礼宾司的一位女士端了一盘供费前开胃的薄土司，走上前来。我拿了一些黑面包，里面卷的是麻哈鱼和芦笋。我吃了一口，说声“味道好极了，”并用手指点点，意思是大使该欣赏我们的盛意款待。他放弃了，没吃。

“你可以告诉白宫——非正式地——，”我无畏地表白说，“你已经表明了你的看法。”

“非正式地？”他同意就这样编造一下。“好。但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还有其他忧虑。”

“关于什么事？”我想不起还有其他什么事做得不对冒犯了美国人。

大使抿了一口他手里的毕雷矿泉水。“好吧，您是不是意识到那个东也门的问题？”

我从未听说过。我说完全意识到，‘大问题’。”

大使听到我的反响似乎感到惊奇。“唷，‘大问题’！肯定不是眼下这一时刻？”

“当然，不是眼下这一时刻，”我急忙表示同意。“但是有潜在的可能性。”

“对！”他对他这个题目开始兴奋起来。“您知道关于圣乔治岛的事？”

又是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地方。“圣乔治岛？”我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好像我故意秘而不宣。

大使没有被蒙住。“你们英联邦的一部分么，”他说明道。

“啊，那个圣乔治岛，”好像人人都知道有两个圣乔治岛似的。

“嗯……”大使脸色有些阴沉。“看来共产党也许要试图霸占它。”

这可听起来有些严重了。“真的吗？”我

说，“我去告诉外交大臣。”

大使看来有一些疑惑不决。“您以为这样有效吗？”

我不知道，是不知道吗？一开始我不知道需要什么计谋才能有效。而且同邓肯说说反正很难得到什么结果。于是我支吾搪塞起来。“嗯，说说本身也许不会有效——但是……”

“白宫，”大使打断了我的话，插话说，“担心的是你们的外交部也许对这事不够强硬。他们也许就袖手旁观。白宫认为你们的外交部都是些同情共产党人的家伙和卖国贼。”

我大笑起来。“他们读了太多报纸……我的意思是，侦探小说。”这是下意识的失言。

“我对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大使叹口气地表示同意。“但是五角大楼说他们从俄国档案里读了太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密。首相，如果赤色分子占了像圣乔治岛那样的战略基地，白宫将非常不安。”啊，原来它是一个战略基地！“传说对英国汽车出口到美国要交关税。不再让豹牌汽车销往美国。”他是在威胁我！

我试图解释一下，但是他正讲得起劲。他说：“当然我会提出反对的。可是我算老几？白宫也许对美国在英国的投资要课税。这会造成对

英镑的严重的挤兑。他们会降低GCHQ的地位[2]而提高在西班牙的监听和情报通讯站的地位。他们也许甚至从总统访欧计划中取消英国之行。

这一切都是令人屈辱的威胁，而后一点是灾难性的。（这是因为它将使吉姆·哈克自身受到屈辱——编者。）对这样的袭击我实际上一时讲不出话来。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大使继续说道，“我当然不会建议向我们的朋友和老盟友进行那样的报复。”同时我在想，但愿他会把我的沉默误解为一个反威胁。（哈克总是像一个一厢情愿的人——编者。）

我想不出他在谈哪一个人。“谁？”我问道。

“您，”他说。

我正要挤身出去找其他二百位客人中无论哪一位交谈，大使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呀，顺便说一下，我认为你们驻联合国的那一位不至于去支持阿拉伯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吧？那会真正使白宫爆裂一根血管的啊！自由和民主必须保卫。”

显然，我当然同意自由和民主必须保卫。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同意。一项联合国的决议究竟对自由和民主的前途能起什么作用，是大家

都拿不准的事。今天晚上的整个谈话可说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明天我得去见见邓肯。

4月11日

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太好。美国大使确实使我担忧。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经过全部告诉伯纳德。

我问伯纳德，我们在东也门究竟有什么大问题？“嗯，”他说道。他说他会努力去了解的。我对他说，美国为圣乔治岛担忧，美国认为我们的外交部干不了什么事，因为它里面的人全是同情共产党和卖国贼的。

“不是，”伯纳德愤怒地说。“噯，不全是。”

伯纳德说他会同外交大臣安排今天下午开个会。“您可以吩咐他把事情解决好，”他以安慰的口吻对我说。“毕竟他们站在咱们一边。”

“谁站在咱们一边？”我问。

“美国人，”伯纳德说。

“哟。他们是站在咱们一边，是，”我说。“我想了一下，以为你指的是我们外交部。”

（看来外交大臣邓肯·肖特那天未能去见首相。会晤安排于第二天上午在唐宁街十号举行。然而就在外交部从伯纳德·伍利那里接到与首相会

晤的紧急通知后不久，同一天下午另又安排了另一个会议——那是新任外交部常任秘书理查德·沃顿爵士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会晤。汉弗莱爵士在他私人日记里记录了这次会晤——编者。）

外交部的迪克[3]·沃顿来到我的办公室作短暂的交谈。他在担心。我想不出为什么。据我的了解，他已经做到外交大臣完全受他的支配。

迪克证实外交大臣完全受过管教，有礼貌，能顺从。显然，问题是首相开始对邓肯向他提的外交部意见或劝告不太信任。看来首相甚至在怀疑外交部的政策。

迪克开始看到内阁奉行它自己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危险。国家不可以有两个外交政策！

固然，首相是严重地处在白宫的影响之下，只有临到处理三叉戟问题时他才一反既往，成为例外，这是他应该坚持的唯一的一次。

迪克告诉我有两件事已露端倪，关于这两件事首相也许需要一点点正确方向的引导。

（1）**圣乔治岛**。迪克还须提醒我该岛究在何处。在独立后仍旧留在英联

邦内的少许几个印度洋海岛中的一个。它是民主的，举行自由选举，但是在山里存在着一组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据报道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政变。

这一类事情当然是会发生的。但是根据迪克的说法，游击队将受到东也门——或者应说其全名东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援助。像其他所有人民民主共和国一样，它是一个共产党的独裁国家。

从东也门来的这些游击队有苏联和利比亚的支持。外交部正在计划，使英国避开这个局面，因为：

（甲）如果我们卷入，我们只会使许多非洲的前线国家不安！

（乙）我们不愿在目前与苏联对抗！与它结怨！

（丙）我们刚落实一份大工程的合同，建设圣乔治的新机场以及港口装备！

（丁）我们不在乎究竟是民主主义者胜利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胜利。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可能与首相之间发生的问题：首相也许会陷人邱吉尔式的极端爱国情绪或

精神状态。他也许要发动某种亲英的“保卫民主”的冒失行动。

外交部的解决办法：首相必须懂得，你一旦开始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争吵，你就仿佛站在一个非常滑溜的山坡上。这一点甚至外交大臣也能领会！

(2) **上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这是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特拉维夫扔的炸弹的一个报复行动。阿拉伯人已经把一個谴责以色列的动议列入联合国的议事日程。我们自然将投票站在阿拉伯一边。但是显然首相已经表示他要我们弃权。他的理由，正如已经由外交大臣解说过的那样，并不清楚明确。可是，大致上可列为：

(甲) 这次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的；

(乙) 双方都有错误！

(丙) 对于美国人的顾虑！

(丁) 对于圣地[4]的担心。

外交部的见解是：（甲）和（乙）是感情用事的无价值的废话。至于

（丙），首相实际上是讨好美国人，会引起危险的。至于（丁），首相应多多担心产油的地方，胜于那些圣地。

可能与首相之间发生的问题：

像所有唐宁街十号的人一样，他要
在世界舞台上占有地位。但是在舞台上
的人被称为演员。要求他们做到的只是
貌似真实、保持清醒和按正确次序念好
台词而已。那些想自己编台词者一般来
说，不会长久。

外交部的解决办法：首相必须理
会，就外交事务而言，他的职务是把自己
限制在友好款待和执行礼节礼仪的范
围之内，起这样的作用。

（阿普尔比文件 FO/RW/JHO）

4月12日

昨天同邓肯的会晤神秘地推迟了。今天早上
他来到十号。

我告诉他前天晚上，美国大使曾同我“非正
式”谈过话。

“关于什么事？”他紧张地问道。

我靠在椅背上仔细地注视着他。“关于圣乔
治岛，你知道些什么情况？”

邓肯的眼睛躲躲闪闪地来回移动。他
问：“您知道了些什么情况呢？”我不知道他是否
知道什么情况，或者像我那样该死，如果他表现

得一无所知的话。

“你是外交大臣，不是我。”我有意让他听起来我有点恼怒之意。“你认为有什么共产党去占领的危险？”

他仍然看来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他说过有这样的危险吗？”我告诉他“他暗示过”，然后等候邓肯的答复。

邓肯决心采取一条坚定和断然的路线。“不，一点也没有什么危险。”

“肯定如此？”

我等候他的明确保证。我得到了，可是我还觉得不非常可靠，

“当然。如果有的话，外交部早会告诉我的。”

我问：“你能肯定他们总是会把每一件事向你汇报的？”

“每一件事，如果他们认为是我应当知道的，”他带着自信的微笑说。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一件事，”我反驳说。“可是显然白宫却为它担心。我们目前务须不要使他们感到不安。”

“我敢肯定我们已经完全把它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邓肯以平静的自信口吻回答道。

“张伯伦也曾肯定他已经控制了希特勒，”我提醒他说。“还有艾登也曾肯定他已经控制了纳赛尔。”

邓肯好斗地马上为外交部辩护。“您是否暗示外交部不知道它自己在干什么呢？”

“不，”我谨慎地答道，“我在提示外交部，它不让我们知道它在干些什么。”

邓肯说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关于我提出的任何问题，我总是得到全面充分的答复的。”

“那么，关于你没有提出的问题呢？”我予以反击地说。

“例如？”

“例如关于圣乔治岛！”

他耸耸肩。“啊——这个，我不问那类问题。”

“好吧，那么就问问他们，”我要求他，“为了我的缘故，问问他们。行吗？”

好像他会为我做**任何**什么事情那样。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们。（为了我当上首相一事——编者注。）

邓肯似乎有些勉强，不太愿意去问外交部关于圣乔治岛的事，尽管他答应去问。但是他告诫我：“不要忘记，您如果一旦开始干预别的国家的内部争吵，您就仿佛站在一个非常滑溜的山坡上。”我把题目转向美国大使曾经提出的另外一件事务。我问他是不是今天晚上我们真的要在联合国提议投票反对以色列？

“当然，”他说，他的口吻表示有些惊奇：我竟然能问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

“他们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投炸弹，”他说。

“可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向以色列投炸弹。”我说。

“可是以色列人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投的炸弹更多，”他说。

“可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先开始，”我说。

他想再一次反驳，但是我的手势叫他不要再说。我对此感到

厌倦。我说：“不管怎样，在我看来，双方都一样有错，都该受责备。”

“按我的意见，不是这样，”邓肯坚决地说。

“两个都一样，”我说，对正反两方面的争论

感到厌烦，真希望能处理一些已经确知的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我是处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对待这个问题的。我要求今天晚上我们弃权。”

邓肯露出十足的焦虑心情。还显出躲躲闪闪。“唷，我认为我们不能这样做。外交部不会接受的。”

我发脾气了。“在这儿他们是服从我的指示，还是要别人接受他们的指示？”

“别傻了！”邓肯答道。

很显然，这是又一个他没有提出的问题。

4月14日

两天过去了。我从邓肯那里得不到答复。这使我很烦躁。我在午餐后召汉弗莱来讨论一下外交事务——这是过去我们从未谈到过的题目。

我们坐在书房里，在炉火旁边，一边一个；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说话。我们没有议事日程——我无非是真想聊聊罢了。可是，结果这个下午无疑有些收获，我从中学到了一两点。

“外交事务非常复杂，是不是？”我开了个头。

“确实如此，首相。”他拿起了一块容易消化的巧克力饼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些事交

给了外交部的原因。”我立刻起疑，感到有可疑之处！

“噢……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我漫不经心地问道。

他自信地微笑了一下，并说：“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又有谁会知道呢？”

这很难说是对我问题的回答。我告诉汉弗莱我是在担心美国人。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使他感到烦恼。“是，好吧，我们大家都担心美国人，”他说道，精神不振地微笑了一下。

在伦敦的舆论制造圈子内，现在滋长着一种普遍的反美情绪——具体地是在怀特霍尔内。这使我有些担忧。但是汉弗莱就不能很轻易地解除我的顾虑；他知道如果我要撤销一项巨大的国防用的三叉戟定单的话，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不得罪他们那些人士。

当然！我知道他会建议什么！不要撤销三叉戟！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完全明确地道出他的见解，我也在怀疑他是不是在竭尽全力阻止我在这个领域里要干的事。事实上，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明显地不愿意在这个新产生的美国问题上予以帮助。

然而我是坚决地要撤销三叉戟的，因此我必

须肯定在任何其他方面我们不要去使美国人心烦意乱。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点子上。我说：“美国大使提到了关于圣乔治岛的什么事。”

他看来有些吃惊。“真的吗？”

“汉弗莱……你知道不知道那一部分世界在发生什么情况？”

“那是哪一部分的世界？”他问道，他一双傲慢的蓝眼睛一直在凝视着我。该死的，他理会到我并不正确地知道那个岛在哪儿！好吧，我**还是**不想承认这一点。“哪个部分！”我顽强地不改口。“圣乔治岛所在的那个部分。”

“那是什么部分？”

我虚张声势地愚弄他到底。“如果你不知道，汉弗莱，我劝你去看看地图。”

“我确实知道，首相。”

“好。那么说，我们两人都知道，”我说。我不太肯定他是否信服。但是我向他说明美国人深怕圣乔治岛将被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占领。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我怀疑他是否早已知道。

“他们认为我们应当对付这件事，”我继续说下去。

汉弗莱格格地笑起来，愁苦地摇摇头。

我轻轻地责骂他。“这并不是好玩的事，汉弗莱。”

“的确不是，首相。说实在的，令人同情。”汉弗莱有时候表示得非常高傲，我恨不得扭断他的脖子。

“不是好玩的！”我急躁地说。

他的脸上立刻失去了笑容。他着重地附和我说：“当然不是。”

“那是英联邦中的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首相，可是您一旦开始干预别的国家的内部争吵，您就仿佛站在一个非常滑溜的山坡上。”

现在我有证明了，证明这个谈话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意外。他所说的完全是外交大臣已经对我说过的话，一字不错！我把话题转向关于以色列的事务。我指出双方都有过错，中东的局势是历史产生的悲剧，以及按道义来说，我们不应当只谴责其中一方而不谴责双方，

汉弗莱不同意我的意见，这对我并不意外。他争辩说：“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我们同阿拉伯人保持关系的问题。伊斯兰的力量。

石油供应。”

我试图让他理解。“汉弗莱，我是在讲是和非的问题！”

他大吃一惊。“噢，不要让外交部听见您的话，”他以突然间强烈的语气劝告我说。

我觉得我不得不给他上一堂基本历史课。我提醒他我们英国人是扛民主旗帜的人。我们使自由的火炬永久不灭。我们的伟大责任，而且我们的命运是抵抗侵略者和压迫者以维持法律的统治和正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是文明的受托人。（据推测，这大概就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所惧怕的邱吉尔式的情绪爆发——编者。）

汉弗莱表示同意。噢，他必须同意。接着他提议来一个妥协：如果我坚持进行不偏不倚处理方式，外交部也许会在以色列问题上投弃权票，只要我们批准由我们的人在联合国发表强有力的演说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就行了。

我也不能肯定这样一个出色的主意。“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辩论的机会来缔造和平、和谐和友善。”

“那样将是非常少有和独特的，”汉弗莱答道，一边竖起眉毛表示怀疑。“联合国是公认的表露国际仇恨的讲坛。”

他似乎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好的。据推测，其理由大概是，如果我们不在有控制的环境里表达仇恨的话，我们大家终可能还是要以战争来结束的。但是既然在世界各地目前正在进行六十或者七十场战争——指联合国的会员国之间——我宁可这样想：少表露一些仇恨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应当受到鼓励。汉弗莱在他的保卫民主或圣乔治岛的方式方面不肯让步。他一再嘲讽地谈论他所谓“挥动旗帜”和“高举火把”等口号，言词尖刻。他极力争辩说：保卫民主不是“先考虑”重点，如果民主使那些我们希望成为朋友的人烦恼不安而损害了英国的利益的话。

我为之惊骇不已。这是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那些人的声音。事实上，同是一个外交部，现在我想起来了。

但是使我完全吃惊而且目瞪口呆的是，汉弗莱竟为绥靖者辩护。“他们十分正确。打了六年的仗而我们所得到的成就仅仅是把东欧从法西斯独裁统治改为共产党独裁统治。可是所付的代价是几百万的生命和国家的没落。这就是不听外交部之言的结果。”我认为这是汉弗莱对我所说的话中使人吃惊的言词。我的意思是，他也许是对的，不过他打击的是我认为宝贵的每一件事物。

我向他提出质疑：“汉弗莱，你是不是在说

英国不应当站在法律和正义那一边呢？”

“不，不，我们**当然**应该，”他着重地回答道。“但是我们不应当让它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完全不分是非，不讲道德范畴。

“我们应当扶弱抗强。”

“啊，是吗？”他在使用他奸诈的语调。“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派兵去阿富汗，同俄国人打仗呢？”

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批评。我不屑作答。俄国人显然**太**强大——依我之见，这并不影响我的论点的正确性，我也这样对他说了。后我指示他把我们的保证传递给圣乔治岛的经选举产生的首相，说英国将支持他。

汉弗莱站起身来说：“大概您想同外交大臣讨论这件事的吧。”“我会告诉他的，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我冷冷地回答并向他表示他可以走了。在这件事上他对我没有很大帮助。我叫人请伯纳德来。我不得不问他一个十分难为情的问題：“究竟圣乔治岛在哪里？”

使我大为宽慰和更加大为高兴的是，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唔……要不要让我们看看地球仪？”他说。“您的私人专用办公室里有一个。”

我们急忙走下挂着前任首相像片的宏伟的圆形楼梯，走过哒哒作响的自动收报机，进入私人专用办公室。屋内有几个文书。除了卢克以外，其他私人秘书都不在。卢克是外交事务私人秘书。他是我所见到的人中富于雅利安人[5]容貌特征的家伙——高大、修长、白肤金发和碧眼——实在很有魅力，如果他不带上那种傲慢的神气十足的态度的话。换一句话说，他实在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他只是还不到四十的人。

我们一进去他就站起来，他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双排纽灰色法兰绒服装，非常洁净整齐。我对他说了一声“下午好，”他回敬了一声“下午好”。

伯纳德和我直接走向那个地球仪。伯纳德指着阿拉伯海中间的一个点——阿拉伯海是靠近波斯湾的那一部分印度洋。



“波斯湾是西方的生命线，”伯纳德说。“现在，瞧，”他继续往下说，手指着阿拉伯海以北的一块土地，“这是阿富汗，现在处于苏联控制之下。如果苏联人万一占领巴基斯坦的话……”

“这一件事他们不会干，”卢克很安详地插话说。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同我们在一起看地球仪而且就站在我们后面。

“但是，万一他们干了，”伯纳德坚持说，手指着在海岸线上的巴基斯坦——在阿富汗以南和阿拉伯海以北——“苏联人接着就会控制波斯湾、阿拉伯海以及印度洋。而且苏联总是想要一个他们所谓的温水港口。”

卢克带着优越感微笑道：“没有这个危险。他们不会侵犯巴勒斯坦，而且无论如何美国说什

么也在这里驻扎了永久性的舰队。”他说话时指着印度洋。

我转身向着卢克，请他告诉我，根据他的外交事务专门知识来看，为什么美国人那样担心圣乔治岛。是不是由于利比亚和苏联支持的游击队发出了威胁的缘故？

卢克说我们必须记住非洲的前线国家——一边指着也邻接印度洋的东非海岸——会剧烈地争吵起来，如果我们进行干预的话。

“它们喜欢共产党游击队吗？”我问道。

“它们对游击队并不介意，”卢克告诉我。“它们的政府中大多数人开始时也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可以这样争辩说，游击队得到圣乔治岛人民的支持。”

“是谁提出争辩的？”我问道，

“游击队，”伯纳德冷冰冰地说。

卢克强调说，由于我们同非洲前线国家有大量的贸易往来，我们不愿扰乱它们，使它们不安。接着我提出我们应当为圣乔治岛上的自由和民主斗争，他窃笑起来，高傲自大地对我说，一切事情都比我们所谈的要复杂得多，外交部的见解是我们应当啥事不干。

但是我认为外交部一贯地总是采取我们应无

所作为的主张。

接着他竟鲁莽地给我上和平共处的一课。他说美国人说定会非常积极冒进的——噫，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他引用了常务次官的见解说，和平共处的反面是好战的不让存在。这又是过去外交部的绥靖那一套。出乎我意料的是，伯纳德突然说，他迫切地要同我谈谈国内事务。我对他说等一下，可是他以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开始不断点头和眨眼。开始时我以为他犯了神经质的颤动，后来理会到他背着卢克并且在表示他要单独与我说句话。

我们走进隔壁的内阁专用室，伯纳德小心地关上门。

“我不愿做什么不忠诚的事，”他实际上在轻声地说，犹如耳语，“但是我真正感觉到在卢克面前继续谈下去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卢克？为什么不好？”

“安全问题，”伯纳德轻声说。

我感到愕然。“他是你的同事。是我的许多私人秘书中的一个。英国安全局怎么会允许有这种事情？”

伯纳德急忙纠正我。“不，首相，他不是那种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他又是一个为外交

部工作的人。”

这对我倒是一件新鲜事！我一贯认为卢克是为我工作的。但是结果搞出了他不仅是放在外交部工作的我的人，而且也是外交部放在十号的他们的人。换一句话说，他是一个安插进来的人！我懂得这一点。可是其涉及的影响却相当大。还有，令人担忧得很。这明确地证实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怀着的猜疑。

“伯纳德，”我说，踮起脚悄悄地离开那扇门，深怕卢克听到所说的话，“你的意思是，外交部有什么事瞒着我？”

“是，”他毫不犹豫地答道。

“什么事？”我问。

“我不知道，”他无奈地说。他们也在瞒着我。

“那么，你又怎么知道的呢？”伯纳德迷惑起来。“我不知道。”我开始有些恼怒了。“你刚才还说你是知道的。”“不，我只是说我不知道。”

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呀！此刻我大为沮丧而火冒三丈起来。你说他们有事瞒着我——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那你怎么又知道的呢？？”

伯纳德开始露出走投无路的样子。“首相，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是我的确知道外交部总

是事事瞒，人人瞒。这是他们的正常惯例。”

“那么，谁即北欧日耳曼人——译者注。会知道呢？”我问道。

伯纳德思索了一会。然后他以他受教育和训练之所得让我充分理解。“可以不可以让我澄清这个问题？您在问谁会知道，我不知道，您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外交部知道他们自己知道而在向您隐瞒以便您不知道，但是他们确实知道，咱们所知道的只是，有什么事咱们不知道而咱们想知道，可是咱们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咱们并不知道。”[6]我只能凝视着他，默不作声。“问题不就是这样吗？”他问道。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事情就是这样，不然的话，两手抓住他的上装翻领，拼命把他摇晃得不省人事？我问道：“我可以澄清这个问题吗？除了外交部以外，谁知道外交部的秘密？”

“啊，这容易回答，”伯纳德说。“只有克里姆林宫。”

（伯纳德·伍利写了条子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理查德·沃顿爵士，要求举行一个讨论圣乔治岛这个题目的会议。沃顿的复信由伯纳德·伍利爵士保存在他的私人文件夹里，他为了出版哈克的日记而向我们提供了这封信——编者。）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London SW1A 2AH

18 April

Dear Bernard

I shall be happy to attend your meeting tomorrow. This bit of bother on St. George's is getting to be a bit of a bore.

For your own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 believe that we made the real mistake twenty years ago when we gave them their independence.

Of course, with the wind of change and all that, independence was inevitable. But we should have partitioned the island as we did in India and Cyprus and Palestine and Ireland. This was our inevitable practice when we gave independence to the colonies, and I can't think why we varied it. It always worked.

It has been argued by some people that the policy of partition always led to Civil War. It certainly did in India and Cyprus and Palestine and Ireland. This was no bad thing for Britain. It kept them busy and instead of fighting us they fought each other. This meant that it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have a policy about them.

However,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 The damage is done now.

See you at 3pm tomorrow.

Dick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伦敦 SW1A2AH

4月18日

亲爱的伯纳德：

我很高兴明天去参加你的会议。圣乔治岛的点滴纷扰正在变成有些厌烦了。

为了使你了解背景知识，我认为我们在二十年以前就真正地犯了错误，就是那时候我们让他们独立。

当然，由于变迁的潮流以及诸如此

类的动向，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把该岛分割，正如我们在印度、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以及爱尔兰做过的那样。这是我们始终如一的做法，当我们让殖民地独立的时候。我不能想象为什么我们要变动它，既然它是一贯地行之有效的。

有些人提出论点说分割政策总是导致内战。当然在印度、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和爱尔兰，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对英国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这样的做法可以使它们够忙的，不会来向我们战斗而是互相战斗。这意味着不再有必要订一个关于它们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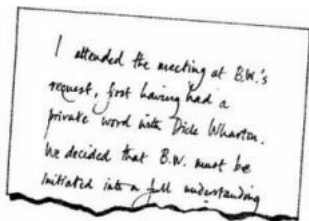
然而，后悔是无补于事的。现在已经造成了损伤。

明天下午三点钟再见。

迪克

（第二天，午餐以后，伯纳德·伍利在怀特霍尔同这两个诡计多端的官僚会晤。他们的谈话很直率，从谈话中伍利第一次知道外交部是怎样运行的真实情况。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关于这次会晤作了细心的记录，该记录保存在他的私人文件里。因此，一般的读者破天荒地可以从中理解外交部对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世界事务是如何处理应付的——编者。)



I attended the meeting at B.W.'s request, first having had a private word with Dick Wharton. He decided that B.W. must be initiated into a full understanding

为了答应伯纳德·伍利的请求，我出席了这次会晤。我先同迪克·沃顿单独谈了话。我们认为必须让伯纳德·伍利充分理解外交部的工作方法。

伯纳德·伍利开了个头，按规定是专谈圣乔治岛，他首先谈到他所看到的问题，就是，首相毫无所知。迪克说这是好事，我们就开始鼓励伯纳德·伍利不要把这一点作为一个问题来看而是作为一个机会。

这个概念并不很容易地被伯纳德·伍利所了解。他问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是首相不知道的——这是一个真正荒谬的问题。我有时候真搞不懂伯纳德这个人。接着他问是否有什么关于圣乔治岛的重要事情是首相不知道的。对此迪克

正确地说明，首相的正当程序应该叫外交大臣向他报告有什么他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外交部必须要做到的，只是保证外交大臣对整个情况也不知道这一点。

我们越谈越接近伯纳德·伍利的问题的根源了。他有一个印象是，首相应当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外交事务的可靠处理的基本规则是，不让政治家们卷入外交，如果让他们卷入，那简直就太危险了。外交是关于继续生存到下一个世纪的问题——政治是关于生存到下一个星期五下午的问题。

世界上有一百五十七个独立国家。外交部多少年来已经同它们打过交道。差不多没有一个议员知道关于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的任何情况。把一张世界地图给议员们看一看，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要找一找怀特岛[7]在哪里，是有困难的。

伯纳德打算争辩说，议员们不至于这样无知吧。于是迪克给他来了一个小小的测验：

1. 上沃尔特[8]在哪里？

2. 乍得的首都[9]叫什么？
3. 马里人说的这是什么语言？
4. 秘鲁的总统是谁？
5. 喀麦隆的国教是什么教？

伯纳德得了个零分。迪克表示他可以代表议院。

伯纳德·伍利的问题是，他念了太多关于宪法历史的书——或者至少过于认真。他在争辩，我可以说他讲得并不那么清楚。他说：“如果获得了民主，人们是不是有什么事该讨论讨论的？”

我们一致认为同首相充份讨论是必要的。于是伯纳德就力争说，首相应当掌握事实真相。谬论又来了！

伯纳德·伍利需要明确地懂得下面的立论：

- (1) 事实使事物复杂起来。
- (2) 人民不要它们。
- (3) 报界、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所要知道的只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 (4) 不幸，英国的利益通常涉及同公众认为坏人的人们做交易。
- (5) 有时候，英国的利益意味着我们不能帮助好人。

(6) 于是，讨论必须限制在外交部内部。接着外交部就为外交大臣制订一项政策，它代表外交部深思熟虑的见解，外交大臣就可以按照它来执行。证讫。

伯纳德担心的是，外交部只产生一个经过考虑的见解，没有选择余地，没有取舍替代。

在实践中，这并不呈现出什么问题。如果受到压力，外交部再研究这件事务，得出的结论是同一的见解。如果外交大臣要求有选择余地，外交部责成他提出三个抉择的可能性，其中两个

（经过严密审查）将完全是一致的。当然，第三个将完全不能接受，例如轰炸华沙或侵入法国。

另有一个选择偶然用得上，那就是鼓励外交大臣去制订他自己的政策。外交部随后向他指出它将必然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在 48 小时内就要发生。

伯纳德懂得了这个意思，但是他要——由于他目前是一个私人秘书，这样要求是十分正当的——从政治家的观点继续讨论下去。他评议说，大臣们主要关心的是政策对国内政治舆论的影响。

事实上，这是他们的所长。而外交部的制度是并不真正允许这样做的。

他十分正确。外交部确实采取一个全球观点。它要问的是，对世界来说，什么是好的事。另一方面，大多数大臣却宁可要它提出这样的问题，《每日邮讯》的社论将说些什么？要外交部，考虑这个是十分不合适的！外交政策是不能由像舰队街编辑那样的乡巴佬、后座议员和内阁大臣来制订的。外交部的职责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让其他人后来去理清政治。

伯纳德也关心，如果外交大臣仍然不理睬外交部的意见，尽管所有供选择的可能都已经提出，那会发生什么？我向他解释道，这是一个自由国家，外交大臣总是可以提出辞呈的。

于是我们谈话的整个基础来了一个意外的转向。一封急电送来了。迪克念了一下，告诉我们东也门正在准备侵犯圣乔治岛来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

伯纳德·伍利认为这是一个坏消息。当然是，对圣乔治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坏消息——但是对游击队来说，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消息。

伯纳德尤其要知道（其他一切暂且不论）这对岛民来说，是否是一个好消息。我认为他当私人秘书的时间太长了——他开始像一个政治家那样作出反应了。

迪克建议，我也同意，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干，不去帮助岛民。如果他们向我们呼吁，我们将给他们一切支持，就是不予帮助。如果首相坚持要我们予以帮助，那么我们执行传统的四阶段战略，这是外交部对任何一个危机所作的标准反响：

阶段一

我们说不会发生什么事。

阶段二

我们说也许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应当什么都不干。

阶段三

我们说也许我们应当干些什么了，但是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阶段四

我们说也许有什么事我们早已可以干的，但是现在太晚了。

4月19日

今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我认为我已经获

得了重大胜利。

一切都在今天下午达到了严重关头——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年轻人卢克带着内藏外交部电报的绿色旧箱进入内阁专用室。

伯纳德由于某种原因不在那里。他曾留了一个条子，说他在同汉弗莱爵士会晤。

我拿起第一份电报：上面说在东也门有部队在调动。我看了看卢克。他说这并不重要。

“可是，”我对卢克说，“美国大使上周已经提到过东也门有些情况。”

“真的吗？”卢克带着傲慢的微笑说，“他已经听到，使我感到惊讶。”

我问卢克为什么在东也门有部队调动。他说他的推测是，他们只是在准备对西也门的一次经常性的袭击。

“有什么事可以使我们担忧的吗？”

“一点也没有。”他深信不疑地对我说。

我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开始思索。然后我对卢克说：“美国大使也谈到过圣乔治岛。”

“真的吗？”卢克又这么说。“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受过教育的人。”

“那边有问题吗？”我问道。

“不，首相，只有一般的当地人之间的争吵。”

卢克在隐瞒什么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当然，窍门是不去寻求正确的回答而是寻求正确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应当提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将使卢克不得不告诉我外交部在隐瞒的是什么。

“美国大使看来担心的是共产党进行占领，”我后说出这句话来了。

“美国人总是这样，”他微笑道。

看来这件事就是这样了。于是我拿起下一个电报——我可不喜歡我所读到的内容！显然，我们昨天晚上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以色列。我把电报递给卢克看。他镇静自若。

“卢克，”我说，“我给过明确指示，我们要弃权。”

“我想您没有吧，首相，”他照旧微笑道。他竟敢如此！

“我确实指示过，”我坚定地重申一下。“我对外交大臣说过，我强烈地认为我们不应当支持一方，予以袒护。”

“那是非常对的，”卢克表示同意。“外交大臣注意到了您的强烈情绪。”

此刻我站了起来，说真的，非常气愤。“那好吧，为什么他置之不理？”我大声叫嚷起来。

“允我直言，首相，”卢克说，明显地并不怀着什么敬意，“他确实做了一些事。他问拉我们的驻联合国大使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考虑弃权。”

“那么那位大使干了些什么？”我问道。

“他说不，”卢克答道。

我大吃一惊。看来外交部认为它简直可以蔑视首相的意愿。

卢克否认这就是所发生时情况。他说外交部在作出决定前曾经全面充分地考虑过我的意愿。但是事态发展得很快。“昨天晚上，在我们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当您在采取您的见解时您还不知道。及时告诉您又不可能。”非常荒谬！“你知道，我有电话，”我说。

“因为并不认为太重要，不用在早上三点时把您吵醒。”

“非常重要，”我对这个目空一切、自命不凡的家伙大吼一声。

“白宫要大发雷霆的！”

卢克看来好像不那么在乎。“好吧，我想我可以作出安排，由他们在联合国每次投票表决前都通过电话告诉您。但是举行投票时，一个晚上需要投票表决的事有两三次。”他是在故意避开要害。关于联合国有许多次投票表决这一点，我不表示我个人的意见，这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一旦有所表示，我希望得以奉行。

同他辩论这次的错误是毫无用处的。我在考虑以后怎么办。我问他要扭转这种情况，我能做些什么呢？”

“无事可做，首相，”他干脆地答道。“那将会使人难堪的。政府的政策一经声明，不能收回。”

也许他是对的。那么一项未经首相批准的政策更有理由不作声明了！

接着我有了一个主意——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这一个主意，我现在相信，将改变历史。但在当时我没有理会到它将导向何处。我说：“卢克，我想同以色列大使谈谈。”他摇摇头：“我认为不要谈，首相。”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卢克，他是什么人？自以为了不起！我重复了一下：我要同以色列大使谈谈。卢克坚持他自己的立场，也重新说一遍：在他看来，那是相当地不明智的。

我用食指指着我的嘴。“卢克，”我说，“你听见了没有我在说的是什麼？注意我嘴唇的运动。我——要——同——他——谈——谈……”

他抓住了点子。他终于懂得，我说话是算数的。谁在传播说所有外交部的这号人都是聪明人？花了好多钱去受教育——没错，是花了钱的！

卢克说，如果这是我的意愿，那么当然可以！他的话使我觉得好像他在宠一个小孩子似的。“我去同外交大臣和理查德爵士联系，然后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

“我不要那两位，”我说，看着这个傲慢的年轻人的样子，心中大大地喜乐他一番。“我只要大使。”他开始有些生气。“首相，我必须劝告您，见大使而没有外交大臣在场是非常不合适的。”

“为什么？”我问。“你认为我要同以色列大使谈些什么呢？”他歇了一下，发觉这里有圈套。“嗯，大概谈谈联合国的投票表决吧。”

“是这样吗，卢克？”我轻声地斥责他，表面上很严厉，不过完全是一个花招，“那将是非常不适当的。”他感到窘困，有气无力地说一声：“唷。”

现在轮着我给他上礼貌礼仪课了。我也向他显出傲慢的样子微笑了一下。这是很有趣的逗乐。“不，卢克。事情不过是露西想去一个基布兹[\[10\]](#)度假，她大学就快放假了。啊，或者也许我该说再去另一个基布兹，因为她现在在埃塞克斯大学念书。”

“我明白了，”卢克阴沉地说。

我接着说明，以色列大使和我一起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过书，而我又认为安妮和我该请他来我这里套房来谈谈，以便对去基布兹提些意见。”

“啊，”卢克又说了一声。

我扳着脸，一本正经地对他微笑。说实在，只是露露牙齿作出笑容罢了。“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吧！”“唔——不，”他又来了一个“不”。

我就在他创口上抹盐，一干到底。“你想想，我们是否需要外交大臣或理查德爵士前来帮助对如何为露西选择度假的去处出主意呢？”

“唔，——不，”他重复一遍“不”字，完全被打败了。

我吩咐他将见面安排在今晚六点钟，随即威严地挥挥手，叫他退下。

至少我赢了第一回合。我希望我的以色列朋

友戴维·比卢能够帮我想一个方法来改变外交部关于以色列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和行为。

我在这一点上没有成功。但是我确实发觉了另外一件具有更大更重要意义的事。

六点钟，戴维来到了，我们坐在顶楼的起居室里。他以平和的态度接受了我对于在联合国表决一事的歉意，他说以色列人对这种事已经习惯，因为它经常在发生。

我向他保证我事前已经通知我的人投弃权票。他相信我的话。他点点头，他的棕色大眼睛露出忧愁和充满着无可奈何的神情。他轻声温和地解释道，“大家都很清楚在英国外交部里，首相发出的一个指示成为外交大臣提由的一个请求，然后成为国务大臣提出的一项推荐，后仅仅成为对大使的一个建议，如果它能达到这一层的话。”

他讲的英语非常道地，我为之吃惊不已。接着我想起了他原是英国人，后来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前不久移居到巴勒斯坦。

感谢我的道歉已经表达过了而且被他那么欣然地接受了，于是我站起身来又替他倒了一杯威士忌。我刚要提出如何处理他方才如此正确地概括过的情况这个题目，他却先扔下他的第一颗炸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好吧，吉姆，关于圣乔治岛您打算怎么办？”我把脸转向他。“你知道些什么情况？”他耸耸肩。“很明显么。”

我带着酒回到矮茶几前，在沙发上坐下。“那不是个严重问题，是不是？”

他吃了一惊。他的眉毛自动地竖立起来，差不多要碰上他花白的头发了，“难道不是？您的信息一定比我的灵通。”“怎么会呢？”我问道。“我的信息来自外交部。”

他抿了一口威士忌。“以色列情报局说东也门将在几天内侵入圣乔治岛。”

喔，原来有这样的联系！却没有人事前告诉过我！

戴维·比卢解释道，外交部已经与东也门达成协议：英国人将提出强烈抗议但不采取任何行动。作为交换，也门人在占领以后将让英国人继续执行在那里建筑新机场的合同。

但是，这仅仅是开始。显然，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已经告诉戴维，美国人计划支持圣乔治岛现在的政府。在战斗中！在岛上，他们意图派遣一个由第七舰队作后盾的空运师。

美国人为了保障自由和民主而侵犯一个英联邦的国家，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白宫会暴跳如雷的！

“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告诉我？”我问戴维。我认为他不会知道。

可是他是知道的。

“他们不信任您，”他同情地答道。

我感到难以为情，很窘。“为什么不？”

“因为您信任外交部。”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中心意思。我实在不能责怪他们。接着戴维向我提供一些极好的意见。

“吉姆，你们在德国有一个空运营在待命，目前不需要留在那里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演习之用。”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他看来很自信。“如果你们把它派遣到圣乔治岛去可以把东也门吓跑。他们决不会侵犯。但是当然不能让以色列大使来向英国首相提出这样的劝告。”

他幽默地眯眯眼睛。我咧嘴以微笑作答。“说什么他也不会采取你的意见的，”我说，却一边赶紧走过去打电话表示采取他的意见。

我告诉总机先接通外交大臣，然后接国防大臣。当我在等候他们在找这两个人时，我在

猜想为什么外交部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报道。他们通常是报道的。今天晚上我翻了所有的文件匣，只有一只匣子没有翻。于是我在那只匣子里翻找，快找到底部时发现一个厚厚的档案，上面标出“北印度洋：情况报告”。我理会到大概是它。我数了一下，共一百二十八页。我**知道**就是这个！但是今晚我必须细细地缜密地研究一下。

邓肯打来电话。我对他说我要求圣乔治岛的总统请求英国派遣一个空运营去那里进行友好访问，作为友好的姿态。

他看不出有反对之处。当然不会——他也并不十分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他只提出意见说，八百个全副武装的伞兵进行友好访问过于隆重了。我对他说就是要表示隆重的友善之意！

接着保罗[\[11\]](#)来电话。多么惊人啊！我们的系统和制度能够很迅速地跟踪找到我们所有人。我受到鼓舞。我对他说，由于我们在德国驻有一个空运营待命，我要派遣它去圣乔治岛。他有点尴尬。他要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们有一个营在待命。没有礼貌之至！我告诉他我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他要知道圣乔治岛在哪儿。极端的无知！我对他说大概在非洲和印度之间并且叫他去看看地图。究竟在什么地方对他来说并不在乎。

他也表示怀疑是否纯粹是显示军事力量性质的友好访问。我叫他放心，我们是接到邀请的，并吩咐他下达在六小时内起程的命令。我说明那是一次短暂的友好访问。

后，我对他说，要他去告诉报界那是一次惯常的访问。他补充纠正说，应该说成惯常的意外访问；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他问怎样作全面的解释，我建议他可以说我们是早已收到邀请的，不过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搞军事演习，我们那时候无法接受邀请

——现在这个营不需要呆在德国，因此出发去圣乔治岛。

他还在支吾，这一次他的理由是荒唐可笑的——他说这故事不真实。我指出没有谁会知道它不真实，而且提供给报界的声明，说什么都不是经过宣誓而发表的。我告诉他好午夜前后空运出发；说完之后我就把电话挂上。

现在是午夜一时，我还在口授这些笔记。部队确实在午夜前出发的——这一点我查对过。我觉得全身精力充沛，一点也不疲倦，精神饱满，非常兴奋——事实上，活像拿破仑一世的感觉，我感谢戴维·比卢的帮助。他很感动。“您不但吓唬也门人，而且也使外交部害怕，”他说罢就通过边门轻轻地小心地消失在黑夜之中。

4月20日

今天，我可以说“大获全胜”了。我昨晚没有睡好，我太兴奋了。所以当汉弗莱前来时，我已经在内阁专用室里我的老位置上忙着工作了。

外交部一定很快就告诉汉弗莱正在发生的事，因为他是直接来找我的。

“我猜想，”他说话的声音充满了恶意，“现在一个空运正在天空中飞行。”

“听来这是它好的去处，”我咧嘴地笑道，

他冷冷地盯着我看并说：“我猜想它是在去圣乔治岛的途中。”

“对，实际上在一两个小时内它就要在那里着陆了，”我加以证实。他并没有由于我直率得可爱的态度而平静下来。他厉害地说：

“确实如此。这一切是不是相当突然呢？”

我愉快地点点头。“对，我突然有一个想表示友好的冲动，汉弗莱，”我说。“我要传送一些友好的善意。”

“今天早上在外交部可没有很多友好的善意，”他咆哮起来。

“是吗？”我说，假装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这个举动可以被解释为挑衅性的——把一个全副武装的空运营派到像这样一个有纠纷的地点去。造成爆炸性的局面。”

我马上抓住他所用的“爆炸性”一词。“但是，汉弗莱，你对我说过那边没有问题么。”

他试图摆脱他自己陷入的这个困境。“是。不。那边没有。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是易于爆炸的……有潜在的可能。来回调动部队！”

“得啦，得啦，汉弗莱。”我现在毫不掩饰自己被逗乐了。“我们一贯在索尔兹伯里平原来回调动部队的。这是不是也有潜在爆炸的可能？”

伯纳德插嘴了，想挽回汉弗莱的面子。这是我的猜度。他说：

“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有许多未爆炸的炮弹。”

我谢谢伯纳德提供情况，并有礼貌地请汉弗莱正确地说明外交部担心的是什么。我兴趣很大，非常想看看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如何争辩。

“那里是世界上十分敏感的一部分，”他开始说道。

“但是外交部这些人一直在告诉我那边是多么稳定。”

他仍固执己见。“啊，那是的。是，是，那是的。”他眯起眼睛，只留一条缝。“但是那是一种不稳定的稳定。”

卢克这时刻来到了，手里拿着外交部装电报的匣子。他嘴唇紧闭，紧得实际上看不见嘴唇了。他以冰冷的礼貌态度，把匣子安放在我面前。我打开匣子。“喏，可不少呀，”我假装惊奇地说道。

我对卢克看看，想听他的评论。

“是，那——呃——有些非正统的对圣乔治岛的访问看来挑起麻烦，”他说，声音微弱。（“有些非正统”一词是外交部对“不负责任和十分愚蠢”的代号——编者。）

第一份电报包含了好的消息：东也门正在把军队调回基地。

“终他们决定不再侵犯西也门了？”我对卢克说。卢克阴沉地点点头。我知道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我是知道的，即知道“他知道我是知道的。”

第二份电报是白宫打来的，对我们的友好访问一举表示高兴。

我把电报给汉弗莱看。

“注意，”我指着有关的一段说，“他们说如果

我们要增援，他们有一整个空运师已作好准备。”

“增援什么？”他向我责诘。

我巍然不动。“增援友好，加强友好，汉弗莱，”我有风度地答道。

汉弗莱再也忍不住了。“首相，我可以问问究竟这次越规行动的念头或驱使来自何方吗？”

“当然可以，汉弗莱，”我答道。“来自卢克。”

汉弗莱吃不准要否相信这一点。他信疑参半，故而转向卢克，那时卢克已经脸色发白。

“来自我？”卢克喘着气说，惊恐万状。

我拿出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那份档案——北印度洋：形势报告——向他挥舞着。“是你组合这份高超的报告的，是不是？”卢克开始惊慌失措。他倒抽一口冷气，忍气吞声。“是的，但是它的立论是我们毋须采取任何行动。”我对他心照不宣地微笑了一下，并且对他说他不能蒙我，我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实在的意思。我还对他说，在第107页上有一小段（这一段我知道他放进去时是为了掩盖自己，虽然他的方式是尽可能地显得一点也不加强于人）说得十分明确：圣乔治岛迫切需要支持。我说，“我采纳了这个暗

示，谢谢你。我并且十分称赞你，还对外交大臣说，请他告诉理查德·沃顿爵士说，是你的及时警告引起了这整个军事演习。”这一点至少是真实的——我已经吩咐外交大臣宣扬这是卢克的主意。

卢克觉得走投无路，非常急切地要为自己辩护，以致他不太可能想到责怪那明显地透露消息的人——以色列大使。他只是大声喊叫：“不，不，不是我。”“我没有！”

“我不认为当我说你应得到奖赏时，我是在透露什么秘密，”我以慈祥的语气说道。“你已受到派遣去一个十分重要的使馆当大使。马上去！”

“哪一个大使馆？”卢克轻声地说，深怕发生坏坏的事情。

“特拉维夫，”我愉悦地说。

“上帝啊，”他叫起来，声音沙哑，陷于绝望。“不！请不要这样！您不能把我派到以色列去。我的一生事业怎么办？”

“胡闹，”我轻快地答道，心里非常明白他这个人完蛋了。“那是荣誉。提升。”

卢克千方百计要挽救自己。“以色列人那方面呢？您会使他们烦恼不安的。他们不会要我

的，他们知道我是站在阿拉伯人一边的！”

我没吭声。我让静默本身来说话。通过他自己嘴巴来服罪。我们都凝视着卢克，我听到钟在滴答摆动。“我的意思并不是……”他微弱地说道，但立即停止不说了。

伯纳德和汉弗莱把眼睛转向别处。他们不愿意在场看到一个同事的一生事业的结束。我回答他道，“我认为你原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轻轻地说。

卢克沉默不语。

“不管怎样，”我轻快地微笑道，“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特拉维夫，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联合国是一贯投票反对他们的原因。汉弗莱，我们不是需要吗？”

汉弗莱抬头看看我。他知道这一局他又输了。“是，首相。”他谦卑地说道。

[\[1\]](#)见第一章。

[\[2\]](#)设在切尔滕纳姆（英格兰西南部城市）的高级安全的雷达谍报中心。

[\[3\]](#)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译者注。

[\[4\]](#)指一些宗教徒朝圣的地方。

[5]即北欧日耳曼人——译者注。

[6]此处又是作者在调侃伯纳德等人的文字游戏，故只能按字面全部译出以达原意——译者注。

[7]在英格兰南部——译者注。

[8]即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旧称——译者注

[9]即拉密堡（Fort Lamy）；它的新称是恩贾梅纳（N'djamena）——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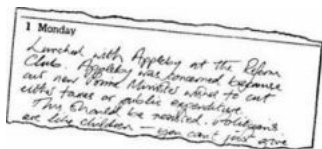
[10]以色列的合作农场——译者注。

[11]保罗·西奇威克，国防大臣。

7. 烟幕

（哈克成为首相约三个半月之后，他不得不面临他们第一个内阁危机；他克服这个危机的方式是对他的越来越精明的政治手腕的赞扬。危机同时包括许多问题——为了拯救他自己创制的伟大的计划而进行的斗争、向泄漏的威胁作斗争、对付至少是一位，也可能是两位年龄较轻和年资较浅的大臣要辞职的威胁的斗争，以及他使用强有力的烟草院外活动进行的斗争以资智胜财政部和实行减税使他获得一些短期的大选优势。

危机的来源可以从五月早期举行的一次会晤记录中看到，那次会晤的是两个人——内阁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财政部常任秘书弗兰克·戈登爵士。汉弗莱爵士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这次会晤，可是弗兰克爵士的笔记近却在文官部门的沃尔瑟姆斯托档案库中找到了——编者。）



在改革俱乐部与阿普尔比共进午餐。阿普尔比表示担忧，因为我们的新

任首相想减税或降低公开开支。

这一点必须加以拒绝。政治家们像孩子一样——你不能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只能鼓励他们这样做。

然而，阿普尔比甚至不应当允许这一点逐步形成一项“正式提议”。不应当让它通过“非正式讨论”。

（弗兰克爵士用不着严重地担忧。在非正式讨论和形成正式提议之后还须经过九个初步阶段。全部十一个阶段罗列如下：

- （1）非正式讨论
- （2）正式提议
- （3）初步研究
- （4）讨论文件
- （5）深入研究
- （6）提议修正
- （7）政策
- （8）战略
- （9）执行计划传阅
- （10）执行计划修正
- （11）内阁批准授权

任何一个称职的文官应能保证：如果一项政策不受欢迎，它不会到达第十一阶段，直到下一届大选前的竞选时期——编者。）

汉弗莱，我个人的愚见，对于这件事放松得不恰当。那项可能实行的减税依哈克的幻想而定，他的幻想是撤销三叉戟的订购和转入征兵制以便成立大规模的常规部队。三军决不会接受的，因为尽管它们很不喜欢三叉戟，但是它们厌恶征兵制。

但是我的手下人员感到恐怖。财政部整个都掀起惊慌的活动。放弃十五亿英镑的税款是不可想象的。

（哈克争辩说，这笔钱是纳税人的钱，以及——万一实行减税——财政部只不过是从来不是从纳税人手里拿走罢了。这个见解从来不是财政部的见解——编者。）

我向汉弗莱·阿普尔比表示道，阿诺德^[1]决不会让这样一个意念形成一项提议的。阿普尔比说（有些道理），阿诺德当时没有同现在的十号居住人^[2]在一起。

由于汉弗莱对现在的职务相对来说是一个新手，我就向他说明下列各点：

(1) 这个整个系统有赖于这样的设想——他能控制首相，而我能控制财政大臣。

(2) 要做到能维持这种控制，在他们之间必须产生愉快的不信任。

(3) 更可取的是他们之间存在对抗。

(4) 减税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政治家们由于他们而赢得选票。

(5) 甚至所**建议**的减税会把他们连结在一起，因为他们发出行将赢得选票的许诺。

阿普尔比有了信心，也许几乎可以说是沾沾自喜。他相信首相和财政大臣没有我们的帮助也会了结他们之间的对抗。他认为埃里克[3]决不会宽恕吉姆的，因为吉姆成功地进入十号，而吉姆也决不能再信任埃里克——毕竟，一个人决不会信任他已经欺骗过的任何人。

可是，我已经**保证**埃里克会反对任何减税的措施的。我使用了通常用的诱饵——告诉他我们需要钱花在医院、学校和老年人身上。

（这个论点在财政部里称为“人工肾策略”。这一着几乎从未失败过。紧接着下面就示意说，

在职者将在历史上被称为“关心的财政大臣”。这一着也从未失效过——编者。)

阿普尔比仍旧认为我过于挂虑仅仅是十五亿英镑的减税。固然，这一数目本身并不太大，但是我指出我们年资级别高的同事中有些人担心他（阿普尔比）不是处在控制地位。这次减税提得太快了。阿普尔比能否遵守阿诺德的传统——铁手套里铁拳头？毕竟，如果政治家们开始治理国家，那一天对英国来说，将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日子。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看来并未由于弗兰克爵士的暗示、焦虑和掩盖着的威胁而过份地担忧。他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冷冷乏味的评语——编者。)

弗兰克担心哈克的减税提议。减税是认真的，这我知道，但是如果我在他的地位，关于经济状况和低下的生产率我怕我会担忧得更厉害。当然，弗兰克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无能为力。英国的工人基本上是懒惰的，他们要不劳而获。不再有谁愿意老老实实地干一天工作。

今天下午我去洛兹板球场。我到那

里时，英格兰是四七十对。英格兰又一次垮了。英镑的状况和击球的状况怎么啦？人们有时候怀疑英格兰是否还有什么前途。

不过，那天下午还是一个可爱的下午。暖和的阳光、冰凉的香槟酒以及球上带有典型的柳叶味儿——不过是偶然的。

我去那里当然是为了政府公事，作为英国烟草集团公司主席杰拉尔德·巴伦的客人。该公司在我看来是国家的施主。我乘此机会请求杰拉尔德给予加登[4]以更多的赞助。杰拉尔德对这个主意是比较开明的，虽然他提到体育大臣也许今天下午也要顺便光临洛兹板球场，替温布尔登、布兰兹——哈奇锦标赛或者某个彩色台球锦标赛向他施加压力。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集团公司的支持我们会怎么样。

然而我确实看到卫生大臣彼得·索恩爵士又不在场，这是惹人注目的事。显然，他被搞反对吸烟的院外活动的人拖住了。杰拉尔德问我，索恩博士在白厅里是否有门路、有很大影响。我在这方面可以向他再次保证——索恩博士仅仅

是一个大臣而已，没有一点势力。

（阿普尔比文件 WHS/41/DE）

5月3日

汉弗莱和我会晤，讨论他已经送给我的关于撤销三叉戟和重新采用征兵制这个题目的一份研究报告。它很长，十分详细、充分和全然不可卒读。

我给他看了，他很高兴，对它表示满意。他沾沾自喜地说：“啊，这个，我们总嫌文件资料不足。我们需要投入许多信息。我们不愿在审查每一种牵涉到的影响及衍生的后果结束之前，先有所公告。”这是大家熟知的拖延策略。

“这~~是~~会发生的，汉弗莱，”我以坚定的口吻对他说。

“啊，是，首相。”所谓~~是~~，他意思是指~~不~~。“确实是，毫无疑问，在适当的时刻，到一定的时候，在成熟的时候。”

“不，汉弗莱，”我尖锐地答道。“在这个世纪。实际上，在这届议会上。”

他愁苦地摇摇头。“这届议会？我不能肯定它会有什么成效。时间也许没有成熟。结果可以成为一只香蕉，外熟内生。”

他的怀疑也许反映了我在同埃里克遭遇时所

碰到的古怪的顽固症。文件说明如果我的计划得以实行，我们就有十五亿英镑的税可以减得。这一着有人要反对，尤其是财政大臣，他特别反对。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去赢得选民的人心，他怎么能反对呢？唯一的可能性——根据汉弗莱的看法——是埃里克听了财政部的意见，这个意见明显地表示不主张把钱还回去。

这一主张对一个“非财政部的人”总是难以理解的。我解释道，钱不是财政部的，而是纳税人的。

“这是一种看法，”汉弗莱承认。“但是这不是财政部所主张的看法。他们不止一次地把钱弄到手。”

“但是，如果他们不需要钱呢……”我开始反问。

他打断了我，感到迷惑不解。“对不起没听清楚，”他说。

“如果他们不需要钱呢……”我重复讲了一遍，可是没有讲完又给打断了。

“课税，”他高傲地说，“并不是讲您所需要的是什。财政部并不先制订出它所需要的是什，然后再想怎样去弄钱。财政部设法弄钱，只要能拿走，尽可能越多越好；然后再考虑怎样花

这些钱。如果政府开始把钱还回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需要，那么我们会破坏几百年来老传统。举例来说，英国海军会成什么样子？”

我看不出他的话同在讨论中的问题有什么关连。“海军仍然会存在。我们仍然需要海军。”

汉弗莱解释道，由于我们只有四艘主力舰，我们仅仅需要四位海军上将以及一位海军元帅。而我们现在一共六十位海军上将。尽管去掉他们中的五十六位是一件很容易想到和做到的事，但其实际结果将是从上到下地砍掉正在服役的军官，直到海军几乎留不下多少人为止。

我认为他的话是在转移注意力。我同汉弗莱的谈话完全是在兜圈子。总括起来：财政部是政府中权力大的部门，因为它掌握所有的钱财。每次你要拿走它的一些钱，那就等于拿走它的一些权力。所以它总是抵拒。要使财政部同意减税，唯一的办法是要使得财政大臣同意。但是财政大臣是不会同意的，除非财政部能同意。所以你可以怎样克服阻力使得财政部同意呢？只有克服阻力使得财政大臣同意。那么怎样克服阻力使得财政大臣同意呢？只有克服阻力使得财政部同意！

汉弗莱建议我说服财政大臣来支持我。他是我的内阁同事。简言之，这是障碍所在和不利之

处。我需要一个人，他是站在**我一边**的人。我们谈话没有结果。我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好好地思考一下。

6月10日

今天我看到了使我的减税提议得以通过的途径。将给我的帮助的人竟是卫生部的国务大臣，说起来实在不太可能。不仅他是一个不太可能给予帮助的力量，而且他甚至不知道他要帮什么忙。

当然我是不打算让他知道的！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索恩博士来看我。他曾经送给我一篇表面上关于吸烟的文章，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份关于这个国家里烟草院外活动集团的权势和影响的文件。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去读这个文件。他问我对这个文件有什么反应。于是我请他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一下文件的内容。

“写的都是我自己的话，”他说，有点迷惑不解。

伯纳德德前来解围，手法非常巧妙。“首相常常觉得口头的概括性简报可以明确着重点和集中在明显突出的要点上。”

“明显突出的要点，”我附和道，为了鼓励索恩博士说话。

于是他告诉我他所想的事情。我吃了一惊。他的主张是要政府采取行动禁绝吸烟。他有一个五点计划：

(1) 完全禁止所有对香烟的赞助

(2) 完全禁止所有香烟广告，甚至出售

(3) 拨五千万英镑去花在反对吸烟的宣传方面

(4) 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

(5) 五年内抽能起遏止作用的和累进的高税额，直到一包20支的香烟等于一瓶威士忌的价格。

这是一个过激的方案。他自称这个办法应当可以把吸烟率至少减低百分之八十。也许甚至可以百分之九十。他预计这将使各个烟草公司关门大吉，没有买卖可做。对这种激进提议，我不能马上答复。当然，如果我在没有会见之前先读过他的文章，那是会有帮助的。可是，人总不能抽出时间去对付每一件事情！不过他是十分认真严肃的，我必须使他高兴。于是我对他说，显然我是同意他的想法的，即基本上应当禁止吸烟。这没有疑问。我还对他说，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明确地禁烟的，在适当的时刻，在成熟的时候。我看出伯纳德在背后点头称是。我越来越善于使用

文官部门的拖延技巧了。

索恩博士可是能看出我的作为。“您的意思是，不必在意，别提它了？”

我向他肯定，这不是我的意思。真的**不是**！
暖，不完全是！但是

我们确实必须面对现实。我说，“毕竟，我们不是昨天才生下来的。

“不。”他双唇紧闭，非常坚决。“我们也不是昨天死的。”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昨天确实有三百人死去，死得太早了，就是由于抽烟。一年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吸烟。”

我试图让彼得明白，他真是多么不现实呀！如果我把这个提议带到内阁去，财政部和财政大臣肯定会说，吸烟给国家岁入每年带来四十亿英镑；没有这个数目，我们国家不太可能对付过去。

彼得坚持说，他并不是不现实。“我知道您不可能在财务论点上批驳财政部。不过这是一个道义论点的问题。”

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极好**的主意！一条打败财政部的办法——利用彼得·索恩博士的帮助，不

过不一定要他的知识；**不是**解决吸烟问题，而是把吸烟问题作为我要实行减税的途径。

我非常小心谨慎。我并不**全然**告诉索恩说我支持他，而是对他说他已经证明他有理由这样做，我们可以让他的计划试一试。我对他说我甚至已经拜读过他的文章。我说漏了嘴，马上及时地补上一个词“再一次”。他试图确定我对他这个问题是否真实地予以支持，他强使我表态。我说明我不能给他以**公开**的支持——还未到时候。“如果我在这个阶段出来支持一方，那将削弱我的地位。我在人们的心目中必须是不偏不倚的审判官，是信服有根据的理由来说话的。”他说他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他这人多少是易于受骗上当的人。不过我必须记往，也可以产生危险。细想起来，也可以有用处。

“但是我说的话不作记录，”我后说。“我愿意看到这件事得到十分有力的推动。说真的，强烈的催迫。我还希望看到你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

伯纳德的脸上表示吃惊，可是索恩博士的脸上却喜气洋洋。他高兴得脸上泛红，多多地感谢我的帮助。我谢谢他的关于香烟的文章。（推测起来，索恩博士懂得哈克在意指他写的关于吸烟的文章[5]——编者。）

彼得·索恩走了以后，伯纳德问我我说的话是否认真，我是否严肃。他说明在过去，习惯的作法是劝大臣们不作反对吸烟的演说的；如果已经发表，也不鼓励印刷或分发他们的演讲词。我问伯纳德是否有过关于这一点的书面指示。他说那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关于这件事只有一个君子协定。

我指示伯纳德去查对彼得·索恩的一些反对吸烟的演讲是否印刷出来和分发出去，并且吩咐他保证人人都知道这些演讲。特别重要的是要赶快让财政部听到这件事。

伯纳德当然不知道我的计划，他问我是否认为我有可能打赢这一仗。

我愉快地微微一笑。“伯纳德，有输有赢么。这一仗我一定要输。”

这样他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了。“那么，为什么……？”

我要他省些唾沫，所以接下去说因为如果~~我~~输了，他们就必须给我些什么东西作为回报。假使你是财政部，你宁愿放弃哪一个——十五亿英镑的所得税收入呢，还是四十亿英镑的烟草税收入。”他微笑道：“我宁愿减所得税。”

我点点头。“正如你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一

直在要求得到的东西。”

他的脸上表示十分赞赏和敬佩之意。“所以您是在利用纸烟设置一种烟幕？”

“正是如此。”我说。

5月11日

今天上午汉弗莱前来看我。他十分紧张——明显得很，伯纳德干得非常之好，保证人人都知道索恩博士的新政策这回事。

“首相，”他开口了。“我就是不知道……您是否同索恩博士有过一次有意思的谈话？”

“是。他提议禁绝吸烟。”

汉弗莱嘲弄地大笑起来。“现在请问，他企图如何做到这一点？大概是搞一个大规模催眠运动吧？”

我保持镇静。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并向他充满信心地微笑了一下。“不。是使烟草税飞涨，同时禁止一切香烟广告，包括销售这一点在内。”

汉弗莱自信地格格笑了起来，但是没有说话。

“难道你不认为，”我问道“他是站在道义的而且是令人敬仰的立场上吗？”他尽其所能地表现得那么高超优越，他说：“也许是道义的，可是

极端愚蠢。没有一个神志正常的人能够认真思忖这样一个提议。”

“我倒在思忖它，”我说。

“是，当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他的高傲的微笑立刻在他脸上消失。“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然对所有来自您的政府的提议进行思忖是对的，可是没有一个清醒的、心智健全的人会支持这个提议。”

“我支持它，”我说。

“那也十分对，首相，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的手腕如此敏捷，以致不能责怪人们看不出他每说一句话都是完全在颠倒来和颠倒去他刚才表达的意见。

我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转到我这边来。我问道：“那么你会支持它？”

“支持它？”他着重地说。“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它！一个出色

的、新奇的、浪漫的、善意的、富于想象的、空想改良社会的概念。”正如我想的那样，他是完全反对的！

“唯一的问题是，”他继续说道，“现下存在着强有力的论据来反对这一政策。”

“也存在着强有力的论据来赞成它，”我答道。

“啊，**一点不错**！”他坚称！“但是**反对**它的这些人会指出烟草税是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呀！”

“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会指出烟草是若干导致死亡的致命疾病的主要原因**[6]**。”

汉弗莱认真地频频点头。“是，实在如此。非常惊人。如果这些是真的话。但是，当然，还没有**确实**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是？”

“统计数字是无可争辩的，”我说。

他看来像是被逗乐的样子。“统计数字？用统计数字，什么事您都可以证明。”

“即使是真理，”我加上一句。

“是……是，”他有点勉强地承认道。“但是每年四十亿的岁入是很大的一笔钱。**他们**会说，”他急忙补充说，深怕被我认为在这次争议中他在袒护一方。**他们**明显地指财政部。

我说一年不必要地死去十万人——低限度——是一种可怕的流行病。他同意那是恐怖的。于是我就施出杀手锏——“为了处理这些牺牲者，国家卫生局要花很大一笔钱。所以如果我阻止吸烟，财政部将大为高兴。”

这是一个策略错误。汉弗莱爵士自信地转向进攻。“这样，我认为您是错了，首相。”

我看不出我怎么会错的。“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我说，指的是放在我面前的索恩博士的文章，“一年要花国家卫生局一亿六千五百万英镑。”

但是汉弗莱爵士早已由财政部和他们在烟草院外活动的朋友们向他很好地提供了一些情况。他答道：“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情况。已经证明：如果每年那些额外的十万人活到高龄的话，他们要我们在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方面付出更多的钱，甚至比付他们的医疗费用还要多。所以按财政来讲，他们继续以差不多像现在那样的比率死去，无疑更好一些。”

我大为吃惊。我参与政治已有很长时期，不再有很多的事使我吃惊了。不过他的无情悲观实在是令人惊骇不止。（有意思的是，汉弗莱的鼓励吸烟的无情嘲讽的愿望使哈克吃惊，但是哈克并没有被他自己宣告的利用吸烟问题仅仅作为迫使财政部同意削减所得税的计划所吓坏。他同汉弗莱一样都没有意图听从索恩博士的意见。但是他能暂时性地使自己相信他比起内阁秘书来并不像他一样那么假冒伪善。伟大的政治领袖们就是由这种自我欺骗造成的。无怪哈克能够同汉弗莱

爵士在道义这个名词上进行争辩——编者。）

“汉弗莱，”我说，“1833年霍乱杀死三万人，那时我们就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1952年，工业废气烟雾杀死了两千五百人，那时我们就通过了洁净空气法案。当一种商业性的药物杀死五十或六十人时，我们就不让它再出售，即使它给许多病人带来不少好处。但是香烟一年杀死十万人，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一年四十亿英镑，”他利索地答道。“加上在烟草工业里有两万五千人就业以及有助于贸易平衡的繁荣的卷烟输出。还有二十五万人在与烟草间接有关的行业里就业——报刊经销业、打包业、运输业……”

我打断他的话，我说“这些数字都只不过是猜测。”

“不，”他说，“这些数字出自政府的统计。”他看见我在微笑就急忙继续说下去：“那就是说，都是事实。”

我不能抵挡这一下子。“你的意思是，你的统计数字是事实而我的事实不过是统计数字？”

汉弗莱爵士认为到了这个时候该说一个小谎和违心的话。“请注意，首相，我是站在您那一边的。我只不过是在向您提供您会遭遇到的争辩

时用的论据罢了。”

我说声谢谢并对他说我很高兴，我应当听到像他这样的支持，我希望他那一句话就可以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束——但是，不！他决心要向我提供**所有**的论据来应付行将遭遇到的争辩。“也须指出烟草工业是体育运动的有力赞助者。他们使千百万人们获得天真无邪的乐趣，而您要把这种乐趣全部抓走。说到头，如果卷烟公司不能做广告：英国广播公司的体育节目怎么办呢？（这句话阿普尔比说漏了嘴。八十年代后期以前，英国广播公司一直在虚构一个形象说广告不上荧屏。当然，他想要问的实际上一定是：如果卷烟公司不可以“赞助”体育比赛的电视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的体育节目怎么办呢？——编者注。）

我重申我们在讨论的是每年有十万多人死亡的问题。汉弗莱立刻表示同意。

“是，首相……不过发生在一个人口过密的岛上。而且无论如何，没有足够的职位叫人人都有工作。吸烟的好处大大地超过它的坏作用：纸烟提供国家卫生局整个开支的三分之一。由于有那些自愿为朋友牺牲自己生命的吸烟者，我们才能拯救多得多的生命，否则我们无法办到。吸烟者对国家来说是施主，是恩人。”

“只要他们活着就行，”我冷嘲地提醒他。

“对只要他们活着就行，”他点头称是。“当他们死了，他们给我们还活着的人省下了许多钱。可是，说什么也总是有更多的人来代替他们这些吸烟者。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这并不是已经证明其中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

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种胡说开始使我冒火。我提醒汉弗莱，美国卫生局局长说过“吸纸烟在我们社会里是可以避免的死亡原因中主要的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重要的公共卫生方面重要的问题。”

汉弗莱以一个高傲的微笑来表示他不接受美国卫生局局长的看法。“在他的社会里，也许是。但是首相，请您记住：美国人确实喜欢事事夸大，愿上帝赐福于他们的慈悲的赤子之心吧。”他请求我不要干冒冒失失的事，一定要有非常可靠的根据，而且在作出任何举动前要十分谨慎小心。当然，实际上他对每一件事都是这么说的。

伯纳德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内阁委员会要开会了，接下来将去议院进午餐，体育部部长在那里等我，有迫切的事要谈。

消息无疑传得真快。我以指责的眼光盯着汉弗莱，假装生气。

“谁把消息捅给他的？”我问。

汉弗莱和伯纳德彼此看了看，然后看着我；两人都没吭声。

“他属于烟草院外活动集团的，”我对汉弗莱说。

汉弗莱假装不知道。“您的政府的一个成员？”他问道，带着微微一怔的表情。

这个手段，就汉弗莱来说，是蹩脚的。太显然了，体育大臣在烟草方面享有既得利益——所有对体育的赞助费。不仅如此，这位具体的体育大臣（莱斯利·蒺藜，议员——编者。）是诺丁汉一个选区的议员，而诺丁汉有几千烟草工人。

我吩咐伯纳德去告诉那位大臣，两点半我可以同他说十分钟的话。

“很高兴去告诉他，首相。”

“不要说很高兴，伯纳德，”我说，“就告诉他，说什么我要见他。”

两点半，我们会晤了。莱斯利·蒺藜是我从前任手里接过来的。他实在是一个极其乏味和非常不吸引人的人物。身材矮小，十分瘦削，眼睛凸出，既爆突又鼓囊，决非造物者的原意，原因是经过一英寸厚的镜片的放大更显得膨胀。他既在咳嗽，又在呼哧呼哧地喘气。他的手指给尼古丁熏得黄黄地怕永远也除不掉了。他一根接着一根

地抽烟，把烟灰乱弹在地上，活像一座古老的火山。他邋里邋遢，牙齿发黄，身上一股烟味正如在火车二等吸烟车厢内所能闻到的那样。我只能猜想我的前任委任他当体育大臣时，他的幽默感原来并不多，在那时刻一定难得出门远足去了吧。

“我抽烟您不见怪吗？”菠茨说，声音粗哑。

我摇摇头，于是从他的半捏紧的手掌里立刻出现了一支点燃着的纸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稍微咳了一下，提到那个谣言，说我意图对烟草工业亲自出击。

我给他一个真实的但是不在点子上的回答。我说：“我没有听到那个谣言。”

“真的吗？”莱斯利问道，他没有受骗。

“卫生大臣正在考虑此事。还没有作出决定。”

“无风不起浪，”莱斯利说。他应当知道！

“他自然会向你咨询的，”我以富于商量口吻的声音说道。

“我理会你作为体育大臣对此事是感兴趣的。”

“体育，我一点也不在乎！要知道在我的选

区内有四千烟草工人。我的seat，怎么样？”[7]

“你的肺部怎么样呢？”我说。

“我的肺很好，”他吼叫起来。

“喔，他呼吸不通过臀部，”伯纳德说。他这句话于事无补，倒起了反作用。

菠茨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哧说：“你说什么？”

“啊”，伯纳德答道。“你的seat，你的议员席位。我明白了。对不起。”

我极力控制自己忍着不笑，并挥挥手叫伯纳德不要再说下去。

我转向莱斯利。

“当然我意识到你的选区里有一家卷烟工厂。但是有时候一个人必须把眼光放宽阔些。”

“甚至比你的臀部还要宽阔，”伯纳德恶作剧地说。我的目光不敢与他的目光交接——要不然我也许会忍不住大笑起来。

议员莱斯利·菠茨没有被逗乐。他厉声说：“这不单单是我们议员席位问题。在布里斯托尔、诺丁汉、格拉斯哥、巴西尔顿和北爱尔兰还有边缘席位[8]，那里都有烟草工厂。而且还有那些啤酒厂林立的城镇，它们都属于烟草制造商所有。”

“我能看出是有一个问题，”我承认说。“但是一件对国家有利的话，难道你不赞成政府不管怎样应当干下去吗？”

对莱斯利·蒺茨来说，没有可争辩的余地。“当然，政府必须做它认为是正确的事——但是如果影响边缘选区的话，那就必不可做！很显然，总有一个限度。”

我重新向他保证至今还未作出决定。当然，他所惧怕的决定永远不会产生——我在追求另一种结果。不过他不肯就此罢休。

他对我说，为了党的好处，我不可干预吸烟这个有争执的问题。

我不喜欢由别人来告诉我什么事我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尤其是由我的政府的低级成员来告诉我！“对我恫吓咆哮是没有用的，莱斯利。”我抗议说。

“对不起，”他说，用手挥去第二手[9]蓝色烟雾。

我继续说道，“难道你不是英国烟草集团公司出钱雇佣的顾问？”

他摆出威严的架子站起来，挺一挺身子——充其量不过五呎二吋半，并以非常自以为是的语调答道：“英国烟草集团公司付给我一笔小数目

的聘金，这个事实完全与这件事不相干的。”我竭力克制自己，不动声色。“他们是一家非常慷慨的公司，对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瞧他们花在体育上那么多钱。而您现在试图不让他们赞助体育！”

这一切废话，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听够了。我坚定地说：“莱斯利，他们只是为了推销更多的香烟而拿出钱来搞赞助的。”

“不，”他顽固地坚称，“他们这么干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真诚愿望。”

“那好，”我答道。“既然如此，如果他们乐意的话，他们可继续用无名氏捐款么。”

“啊，”他说道，但又迟疑了一下。“噯……当然，他们会很高兴这样做的，如果他能公开宣传他们是在以无名氏捐款的话。”他对此没有什么问题。“告诉我，吉姆，彼得·索恩也在试图改变政府对健康问题提出的警告，这是真的吗？”

我不愿意予以答复，所以我对伯纳德看看，要他帮忙。但是伯纳德至今还没有对这次谈话予以绝对地严肃认真的看待。他毫无表情地答道：“我相信索恩博士在发出像这样一种警告：‘癌症会严重地损害你的健康’。”

莱斯利·波茨被激怒了。“那完全不是这么一

回事，”他叫嚷着。我怀疑他自己是否相信。谈话进行到这个时候，我真正逐渐认为关于这个吸烟与健康问题，必须实际做些事——不过我想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听着，莱斯利，”我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无所作为的话，在未来十年中，我们国家里将有一百万人过早死亡——低限度。”我在道出这个统计数字时，我自己也确实吓了一跳。

“我同意，”他无可奈何地答道。“一百万人死亡。可怕。但是死亡者将**均衡地分散**，不单单在边缘选区内。听我说，吉姆，还没得出结论性的后证明说确实存在什么因果关系，在吸烟和.....”我不懂他的那句话的意思，因为其余几个词又被一阵子咳嗽和喉咙呛气所淹没了。但是我想我已经抓住了要点。

（与此同时，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财政部常任秘书弗兰克·戈登爵士之间急切地进行信札来往。信札的复印件已经在内阁办公室和财政部档案中找到，我们现在都是根据《三十年规则》而看到的。由于他们之间的讨论都是书面的，两位先生都十分谨慎小心地对政府政策表示热诚。他们的真实感觉必须从字里行间去细细品味——编者。）

怀特霍尔街70号，伦敦，

发自内阁秘书和内政部文官部主任
5月15日

亲爱的弗兰克：

我们两人当然一致认为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吸烟是不予鼓励的。显然我们也同意，帮助首相达到他的目的是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也许必须帮助他懂得：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理想世界里以及他也许是明智的，如果他能进行重新评估，不是去评估他的目的而是评估他须优先考虑的重点。

他不幸受到愚蠢的压力集团和狂热者的影响，例如皇家内科医师学会。这些狂热者要求政府制订关于吸烟的政策。

我遗憾地说，这是痴心妄想。这不是世界运行的实情。在政府之外的每个人都要求政府有政策。但是我们在政府里的人却没有一个有此要求，包括（我冒昧提出）首相在内，如果他充分地了解涉及的风险和衰落的趋势。

如果你订立一项政策，有人就能要求你恪守它。虽然那些反对吸烟的院外活动者对这整个事情按照非黑即白的思

想方法以及仅仅是为了防止死亡如此等等来看待的，可是我们知道这整个问题比他们现在所知的这一点远为复杂。

正如政府的所有管理一样，我敢肯定你会同意必须要有一个端平问题。例如，卫生大臣也许反对吸烟，可是体育大臣需要烟草公司。

如果政府是一个班组，那事情就容易些。但是，事实上由于它是冲突的伙团的松散的联合，就要由我们来找共同的根据。

请加评论，
汉弗莱·阿普尔比



70 WHITEHALL, LONDON SW1A 2AS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and Head of the Home Civil Service

May 15th

Dear Frank,

We are, of course, agreed that in an ideal world cigarette smoking would be discouraged. And we agree, obviously, that it is our duty to help the Prime Minister achieve his objectives. Nevertheless, we may have to help him understand that we are not in an ideal world and that he might be wise to re-examine not his objectives but his priorities.

He is unfortunately subject to silly pressure groups and fanatics such as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These fanatics want the Government to have a policy about smoking.

This is wishful thinking, I regret to say. It is not how the world works. Everyone outside government wants government guidance. But none of us in government wants them interfering. I venture to suggest, the Prime Minister when he fully understands the risks and the downside.

If you have a policy someone can hold you to it. And although the anti-smoking lobby see the whole matter in terms of black and white, merely preventing death and so forth, we know that the whole issue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is.

As in all government, I'm sure that you agree that there has to be a balance. For instance the Minister of Health may be anti-smoking, but the Minister for Sport needs the tobacco companies.

It would be easier if the government were a team. But no. In fact, it is a loose confederation of warring tribes, it is up to us to find the common ground.

Comments, please.

W

（第二天，汉弗莱收到回信——编者。）



H M Treasury

Permanent Secretary

May 16

Dear Humphrey,

The Minister for Health wishes the smoking problem dealt with by high taxation. The Chancellor, however, will not let me raise taxes too high - he is concerned about his own popularity with the electorate.

I must agree with him, for other reasons. The inflationary effect of such a high rise in cigarette taxes would be considerable.

Nonetheless,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re is a moral principle involved. And we at the Treasury fully understand and applaud the HM's concern. We earnestly believe in the moral principle.

But when four billion pounds of revenue is at stake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consider very seriously how far we are entitled to indulge ourselves in the rather selfish luxury of pursuing moral principles.

As you recall, I have been worried about a suggested income tax cut of one and a half billion, and that was in a proposal that may not now happen. A cut of four billion would be a catastrophe!

I suggest we get Noel's opinion and advice. I have copied these letters to him.

Frank

女王陛下财政部

常任秘书

5月16日

亲爱的汉弗莱：

卫生大臣希望用高额征税来对待吸烟问题。然而财政大臣不让我把税提得太高——他担心他自己在选民中不得人心。

我为了其他一些理由必须同意他的意见。卷烟税这样大幅度的提高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影响是很大的。

可是，必须承认这里涉及一个道德原则。而我们在财政部里的人都充分理解和赞许首相的关心，我们热切地相信这项道德原则。

但是这使四十亿英镑的岁入成为问题，我们不得不十分严肃地考虑：我们有权利一味地满足相当自私的对道德原则的追求，但应该到什么程度为止。

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一直在担忧有人提出削减所得税十五亿英镑的建议，不过那是列入一项现在也许不会产生的提议之中的。可是，削减四十亿英镑，那将是灾难性的！

我建议我们去取得诺埃尔的意见和劝告。我已经把这些信的复印件送给他了。

弗兰克

（信札的复印件送到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征求诺埃尔·惠廷顿爵士——常任秘书——的意见。两天之后，此信送给弗兰克爵士，复印件送给汉弗莱爵士——编者。）



May 1989

Dear Frank,

There are several worrying implications raised by this potential cigarette tax increase:

1. It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revenue loss. There is also the question of scrutiny. If we 'suck out' the tobacco companies they would put a host of people on to documenting everything we do. They would point out, publicly, any errors of fact, inaccuracies of argument, inaccurate or misleading published figures, and so forth. Of course, it is good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stand up to scrutiny. Quite right too! Parliamentary scrutiny and press scrutiny are to be applauded. But not professional scrutiny, which could take up far too much government time. It is therefore no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proceed to it.
2. The tobacco companies might attempt to embarrass us by threatening to drop up all the times we have accepted invitations to lunches and free tickets at Wimbledon, Gloucestergate, etc.
3. Where would the arts be without tobacco sponsorship? They would be at the mercy of the Arts Council!
4. Worst of all, and here I speak for the NHS specifically, we must remind the PM that there is a moral issue here: Governments must be impartial. It is not proper for us to take sides as between health and cigarett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NHS, which is the Department

Govt.

卫生和社会保险部

5月18日

亲爱的弗兰克：

这个有可能实行的卷烟税增税事引起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牵连：

(1) 这不仅仅是减少岁入的事。还有细察的问题。如果我们与烟草公司“较量”的话，它们会把一大批人处于严密审查之下，察看他们的每一件所做过的事。它们会公开地指出我们提出的事实有什么错误，立论的矛盾不一致

处，公布的数字不正确和令人误解的地方，如此等等。当然，据说我们的工作应当经得起审察。而且也十分正确！议会的细察和报界的细察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专业性的细察可不是这样，这项审察可以花掉政府太多时间。因此，挑起这事对公众利益并无好处。

（2）烟草公司也许企图为难我们，它们用的手段是：每当我们接受邀请共进午餐和送上温布尔登和格林德布恩比赛等等的免费入场券时，总是要不愉快地提起这件事，一次一次地被抖出来，使我们受不了。

（3）没有烟草商的赞助，艺术会在哪里呢？艺术将受艺术委员会的支配！

（4）尤其是，我在这里具体地代表卫生和社会保险部说话，我们必须提醒首相这里存在着一个道义问题：政府必须不偏不倚。由我们在健康和卷烟之间选择站在哪一边是不合适的。这对卫生和社会保险部来说，特别如此，因为它是卫生和社会保险部门。我们负有双重责任——如果我们失去烟草税收，那么对每年额外的十万人（他们将活下去

和领取养老金)来说,怎么办呢?

很清楚,我们必须(过去一贯如此)维持一个平衡,要端平。我们要一个健康的国家,可是我们也需要一个健全的烟草工业。

我们有责任不偏不倚:烟草业赞助费也许鼓励人们去抽烟,但是获得赞助的体育又鼓励他们去作运动锻炼。

在我看来,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在反吸烟这件事上也许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已经把一位助理次官的三分之一的的时间以及一位主管的二分之一的时间投入到减少吸烟的工作。肯定地,在一个自由国家里,这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总结一下,我提出两条建议:

(1) 由汉弗莱·阿普尔比作出安排,使首相接见烟草界一些人。这样他会看到他们都是那样的大好人,有趣的家伙,以及他们如何真诚地关心健康上的风险。依我之见,英国烟草集团公司不可能有什么严重的错误,例如,他们的董事会里有一个前常任秘书。而且有人建议,他们好在一定的时候还需要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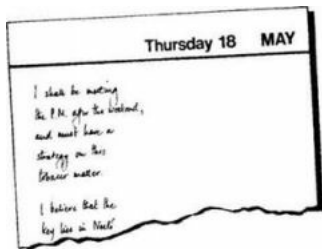
(2) 我认为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关

于我们的低级大臣索恩博士的问题。他是非常聪明和十分有想象力的大臣。但是他没有经验，而且一些做法也不公平。遗憾的是，他担任这个职位时，带来了严重的偏见，他是一个医生；由于他是个医生，他不能有比较开阔的见解。他的**唯一要点**是要使人活着。看到病人死亡，遗憾得很，一定使他的判断见解受到歪曲。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的反响对冷静地作出决定的举动是一个障碍。

我期待着听到你的结论。我认为由汉弗莱爵士立刻采取一些行动是十分重要的[\[10\]](#)。

诺埃尔

（汉弗莱爵士仔细考虑了这封信，并在他的私人日记中作了下列的记载——编者。）



我在周末过了以后即将与首相会晤，我必须对烟草事件采用战略手段。

我认为关键在于诺埃尔那一句话，即我们是一个自由社会。所以人们应当有自由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政府不当成为一个保姆。我们不要保姆政权。

这个见解的唯一弱点是，它也是一个论点，可以用来使出售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砒霜和硝酸爆胶成为合法化。

因此我的战略是这样的：当哈克是行政事务部大臣时，他陪我去不少地方，不仅作为英国烟草集团公司的客人去了格林德布恩，而且也去看过温布尔登网球赛、洛兹板球赛、歌剧和芭蕾。

在观看《睡美人》时，人们以为他也许是在旁听。他对艺术没有一点点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利用赞助来从艺术委员会手掌中把艺术拯救出来这一点，不可能成为一条有效的争辩路线的因。在观看芭蕾时，除了打鼾以外，他一直不声不响。瓦格纳的歌剧的第四幕在科文特加登剧院开始上演时，他问为什么他们拉得这么长。提到第五幕时，他认

为是“受伤延长比赛时。”[\[11\]](#)他完全是一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但是我离题了。看来他牵连在从英国烟草集团公司收受价值几百（要是不是几千的话）英镑的馈赠一案中。如果这件事拽漏出去——也许会令人吃惊，也许不会——对他来说至少可以使他大大地难堪和窘迫。

（汉弗莱把他这个威胁估计得太高了。四天之后在会晤中，哈克对这件事应付得非常从容，出乎内阁秘书的意外——编者。）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道[\[12\]](#)：

5月22日早晨首相非常乐观。他告诉我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还说他使得财政部走投无路。财政大臣也是一样。

我问他这一切是否完全有好处。毕竟财政大臣是首相的政府中的一员么。

这使我细细品味起汉普蒂·邓普蒂的话[\[13\]](#)。

“财政大臣一度想当首相，你记得吗？他是竞争中领先者。我以智胜之。”这事我记得多么清楚啊！首相在他的书房窗户前，欣喜地手舞足蹈。“现在我又智胜他。他知道如果他损失了四十亿英镑的烟草税收，要么他

不得不加征为数四十亿英镑的别的税饷上——这一做法将使他大大地失去国内的民心——或者不得不削减四十亿英镑的政府开支——这一做法将使得他在内阁里更不得人心。他们都被彼得·索恩的政策吓坏了，他们将失去吸烟者的选票、损失烟草税、失去工作——那简直太好了！所以我将支持彼得·索恩，直至财政部不再阻碍我要的十五亿英镑的所得税削减为止。

5月22日

同汉弗莱的会晤很好。他开始时先给我一张纸，是一个写好的费解的东西——我现在理会到这种东西总是标志着一个好兆头。他现在不再能够用这个办法来唬弄我了。那只能说明他自己的不稳定。（这标志着哈克越来越警觉，行政手腕越来越高明——编者。）

（这张纸上写的是汉弗莱爵士对索恩博士所递呈的计划的评论。计划是卫生和社会保险部提的。整个递呈的文件仍在。汉弗莱爵士的评论复制一页如下——编者。）



(1)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proposal could conceivably encompass certain concomitant benefits of a marginal and peripheral relevance, there is a consideration of infinitely superior magnitude involving your personal complicity and corroborative malfeasance,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the talent and stigma of your former associations and diversions could irredeemably and irretrievably invalidate your position and culminate in public revelations and recriminations of a profoundly embarrassing and ultimately indefensible character.

尽管事实是该提议可以令人理解地包含着某些边缘和外国方面的伴随利益，但现有一个无限高度重要性的引人瞩目的问题；它涉及已经确证的您个人串通共谋的渎职行为，其后果是，您以前的交往和消遣所带来的瑕疵和污点将无法补救和无法挽回地取消和废弃您的地位并终形成公布于众和受到反责的下场，其性质将是非常难堪和后无从辩护的。[\[14\]](#)

我要求汉弗莱把它概括一下，成为一个简短句。

他想了一下。他说，“您的手上染有尼古丁。”

我想不透他是什么意思。我不抽烟。接着我体会到他并不是按字面来达意而是用的修辞手段。“您受到的所有的款待都是由英国烟草集团公司开支的，”他以悲痛的口吻来责备我。“香槟酒会，冷餐会、体育比赛和文化演出场合的佳的座位等等。”

他看来在想，如果我立个法对它们不利的话，烟草公司也许会将这种令人难堪的信息透露给报界。

但是我看不出这种事有什么可难堪的地方。我在苏联大使馆喝过酒——这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间谍。如果这是汉弗莱能以此来阻挡我的佳主张，我也许不得不后使索恩博士的提议得到通过！我认为汉弗莱也许在松劲，在失控——他这个威胁是我听到过的软弱无力的恫吓。

汉弗莱自己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沉默不语了。“还有别的吗？”我问，希望他能表演得好一些。

“是，首相。”他在继续斗争，但是看起来并无信心。“有人向

我提出，既然吸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

不应当站在某一边。”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不偏不倚？”

“完全正确，”他以感激的心情答道。

“你的意思是，”我装蒜地问，“一边失火，另一边消防车要救火，在两者之间也要不偏不倚吗？”

他知道自己下的赌注要输了，于是急忙直截了当地说：“还有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一大批人——赫赫有名的人，有影响权势的人——已经提出索恩博士提议的立法对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个打击。”

我问为什么。他拉拉扯扯地谈到实行惩罚性的课税和禁止对一种本身完全合法的产品做广告是对自由的严重进攻，如何如何等等。我对他说这完全是十足的废话，胡说八道！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禁止吸烟本身的问题。我问他是不是每一项增税都是对自由的打击呢？他回避我的问题，只是说：“要看增税数目有多大。”

一个真有趣的问题。我再问：“那么，增加二十便士算不算打击自由？”他开始抗议了：“首相……”

我置之不理。“二十便士是不是？三十便士呢？三十一便士呢？[\[15\]](#)是不是凡是能严重损害

你的财富的事都算作对自由的打击呢？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个缘故呢？”

我心想这一反驳驳得相当好。可是他并没有笑。他只是阴沉地说，那是十分离奇可笑的。

这样我就在关于自由选择的争论中一直牵着他的鼻子走。我们一致认为广告是必要的，如果有自由选择的话，因为自由选择有赖于有充分的信息。所以正反两方面都应当做广告。好吧，既然烟草公司在广告和推销方面至少要花一亿英镑，那么难道他们不应该花同样数目的钱来做广告反对吸烟了吗？我提醒汉弗莱，这会成为一种观点，那些赞成自由选择的所有著名和有影响的人都会欢迎的观点。

“首相，”他咬咬牙说，“我确实要劝告您，索恩这个提议将造成严重的困难。我预见到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预见不到的问题。”

“例如？”我问道。

汉弗莱有些恼怒了。“如果我能预见这些问题，那么它们就不会是预见不到的了！”他厉声说。

“但是你刚才说你能预见的，”我开心地提醒他。

他陷入了困境。现在他到了使出后的招数的

时刻了。“哎，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怎么样？……进行一次会议调查……成立一个皇家专门委员会？”

我提出一个好几天来我早已要提出的问题。“汉弗莱，为什么你对烟草工业如此热爱？”他回避我这个问题。当然，我知道他会回避的。“首相，首先在财政部搞一个委员会，您看如何？”

这是我的机会了。“不要同我谈财政部，”我忧愁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在阻挡我的计划，包括在我的新国防战略方面实行十五亿英镑的减税在内。”我说罢又大大地叹气——演戏似地——一边心里在嘀咕我是否有些做过了头，接着我就继续表露：“当然，要是财政部能表示一些灵活性，那就好啦……”

汉弗莱马上看出点子，甚至可以说是顿时立刻。“啊，”他说，大大地开颜和活跃起来。“呃……首相，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对那件事完全确定。”

“真的吗？”我假装感到意外。

“绝对没有。喔，没有。灵活，可变通。我肯定他们能找出一个办法。”

“他们能吗？”我睁大了眼睛，惊奇地问道。

对这个做作，我应得到奥斯卡奖。

“唯一的绊脚石是，”汉弗莱说，迅速地把自已调整到新的谈判地位上来，“如果反吸烟的提议得以通过，财政部将忙得不可开交，无法动员那些人去找到有助于削减项目其他的办法了。”

我们两人现在都以我们双方都理解的代码在说话了。“唔，”我说，“反吸烟的提议不会具有同国防几乎一样程度的重点优先性质。”

汉弗莱现在懂得什么样的交易我才能接受。交换条件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只是同财政部讲清楚就行了。

5月23日

今天发生了一个轻度的复杂情况。

彼得·索恩到下议院我的房间来见我。他开始就讲：“我刚听到一些令人兴奋的新消息，首相，我们已经得到英国医学协会、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以及其他八个第一流的科学和医学学院的全力支持。”我的心直往下沉，非常紧张。我没有期望他会作出这样巨大这样迅速的进展。我对他说这是极好的消息，但他提议的立法不可能马上实现。

“不，”他说，“但是它们的支持只要求在三个月里宣布那个建议为政府的政策以及在一年里成

为白皮书就行了，所以有很多时间。”他的热诚令人感动。我真诚地觉得抱歉，因为我行将抛弃他的方案，特别是由于我同汉弗莱对它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争辩，以致现在我自己也开始相信这个方案了。

我告诉他我已经遭遇到来自财政部方面的困难问题。他立刻看出我们的谈话在转向了。

他眯起眼睛说：“不可能是您以前所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吧。”

“彼得，事情并不像你所想的那样简单。”我知道我这句话听起来难以置信。

彼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发出一个威胁，这是一个真正**实在**的威胁。“注意，吉姆，我对这件事确实是认真的。这是一件真正重要和值得做的事，我指的是我认为在政治方面我所能做的一件事。如果您把它拖延下去，我不得不辞职。并且要说明为什么要辞职。”

我叫他冷静下来，可是他说他已经非常平静了。“吉姆，医学界的团体甚至比我认真和明确。也许我根本不应该告诉他们您是支持的，不过他们说他们将宣布您屈服于烟草公司。”

他的战略是经过计划的。很明显，他对我在这件事上改变了立场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事实

上，他一定已经料到了一半。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或做什么。可是铃响拯救了我。正确地说，是电话铃声。

伯纳德拿起电话。“请原谅，首相。汉弗莱问能否马上见到您，就那么一会儿，是紧要事。”

我叫索恩在屋外等候。汉弗莱直闯进来告诉我好消息：他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财政部谈话，出人意外！出人意外！他们可以促成我的所得税削减的举动。这是基于一种理解，即对于那项反吸烟的提议一事不再需要理会。

我简单地向汉弗莱提供了关于新产生的复杂情况——索恩博士发出威胁要辞职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英国医学机构对我的公开谴责。

汉弗莱感到担忧——不过只是一会儿功夫。接着他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这类主意对我来说，会引起一切（喔，近乎一切！）麻烦，可是还是很值得的。

“首相，你不是还在财政部里留下一个政府人员的一个缺额吗？”

这真是天才的主意，纯粹是天才。它意味着进行破格跳级提升，一个非常迅速的提升——对彼得·索恩来说。但是为什么不能提升呢？对这样

一个能干的大臣来说，为什么不呢？我们把他请回办公室。

“彼得，”我说，“我刚想起一件事，在财政部里我们还有一个缺额。我想不出如何把它补上——但是你这个对于提议所做的工作，我必须告诉你，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在猜疑。唷，难道有谁不能去补缺？“你不是想把我开除吧？”

“绝对不是。完全相反。”

他受到了诱惑。“好吧……那是连升三级的大飞跃啊！”

“然而这是应得的，受之无愧的，”我以热诚的长者的口吻说道。“**完全**应得。”

索恩十分苦恼地说：“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那项反吸烟的提案，那我真不知我能不能接受。”

“彼得，让我对你完全说实话吧。提案的通过原会……将会……（我认为我设法做到了改正自己的话，而没有让他觉察出来）十分困难的。财政部是关键所在和实在的绊脚石——不是卫生部。也许要多花一些时间，但是如果你在财政部工作，如果你因此而懂行，通过一项真正不会误用和完美无缺的法案的机会可以大大增加，后载入法令全书。相信我。”这个立论听起来非常令

人信服，以致我自己也相信会有这么回事。

幸运得很，他接受了。“这样，我的抗议并未放弃，是吗？”他问道，**要求**得到“不”这个答复。

“绝对不会放弃，”我说。我并不完全在说谎——也许我会回到这提议上来的，在适当的时候，在一定的時候，在时间成熟的时刻。

他只迟疑了一刹那。“OK，”他答道。“我就担任财政部的那一职位。多谢。”

我们握握手，他就走了，洋洋得意地走了。当首相的妙处在于你能给予人们那么大量的快乐以及那么强烈的成就感。

5月24日

彼得·索恩提升到财政部去给我在卫生部留下了另一个空缺。很明显，我们现在要避免起用一个将对抗烟草院外活动集团的大臣。所以一个显然的候选人的名字跃入我的脑海里。

我今天早派人去请莱斯利·波茨。不用多久他从马香街[\[16\]](#)开车来到。他一面气喘吁吁一面走进我的书房，他满身照旧裹在污染的烟雾里，在他的又短又粗的熏得黄黄的指尖间夹着一支点燃着的纸烟。

我热烈地欢迎他。“我的亲爱的老家伙，请

进来。由你来当卫生大臣，你乐意吗？”他大大地吃了一惊。“我？”

我点头称是。

他咳了一会儿，肺部有痰，讨厌的粗哑的声音连续了好一阵子。咳嗽过去之后，连我也感到好受些。

“这是大大的提升”，他后说话了，他以谨慎的目光看着我并且在怀疑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应得的，受之无愧的，”我热诚地说。

他想了一会儿，可是他看不出设有圈套的迹象。说实在的，是没有。“好吧，当然我不能拒绝。谢谢您，首相。”

我派人去请汉弗莱。他来了以后，我把他介绍给我们的新任卫生大臣。汉弗莱假装有一些吃惊，虽然这是汉弗莱自己的主意。

与此同时，莱斯利认为他已发觉了其中有鬼。“且慢”，他突然沙哑地叫起来。“如果这意味着对烟草工业的打击，我不要这个职位。”

我完全向他保证，叫他安心。“不，莱斯利，我们在政府里的人必须是现实主义者。我要你到烟草工业去工作；他们那些人都是可爱的家伙，关心人的人，出色的雇主，而且他们真诚地

愿意相助——我要你去同他们一起工作，不是去反对他们。行不行？”

莱斯利·波茨面呈喜色，可是当他想回答我的话时，无可控制的一阵咳嗽把他的声音淹没了。他脸色发紫，还在挣扎着要说些什么话——我简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我转身对着汉弗莱问道：“他说些什么？”

“我想，”汉弗莱高兴地说，“他说‘是，首相’。”

[1]前任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

[2]指哈克。

[3]财政大臣埃里克·杰弗里斯。

[4]即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该剧院多多少少在若干程度上是由内阁办公室主办的。

[5]这个“编者注”读来好像是多余的废话。实际上，出于英语中词语构成的简化法和一词多义的问题。英语中把“香烟”或“卷烟”（cigarette）与“纸”（paper）连起来构成一个词语，意思是“关于香烟的文章”，但也可从字面上理解为“香烟纸”或“卷烟纸”，而且paper一词的意义是“纸”，但也可指“文章”、“文件”、“论文”、“报告”等书面的东西，这种文字游戏，在汉语中无

法表达，只能直译加注——译者注。

[6]指肺癌、咽喉癌、口腔癌、食道癌、胰腺癌、膀胱癌和肾脏癌；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中风；围产期死亡；怀孕期吸烟导致较高的死胎率。在八十年代，每年约有一万次火警归因于吸烟并造成一年有250人死亡。

[7]此处的seat一词无法翻译，莱斯利意思是他的职位、席位、位置、地位往哪里搁呢？但seat在英语中也是一个婉词，作臀部、屁股讲。哈克为了调侃他，故意曲解，问他肺部怎么样？——译者注。

[8]指仅以微弱多数取胜因而不稳固的议员席位——译者注。

[9]第二手吸入之烟指被动吸入之烟，即非吸烟者因置身吸烟者近旁而无意间吸入之烟——译者注。

[10]这一句话意味着已经向诺埃尔爵士本人作了暗示。

[11]足球比赛中用来补偿因球员受伤事故而耽搁掉的时间——译者注。

[12]与编者的谈话。

[13]汉普蒂·邓普蒂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说：“当我使用一个词时，它的意思就是我用它

来表达的意思——不多也不少。”艾丽丝说：“问题是你*能否*使一个词同时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物，”汉普蒂·邓普蒂说：“问题是哪一个是主人——就是这么一回事。”——摘自刘易斯·卡罗尔普《镜中世界》第5章——编著。〔卡罗尔是《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这个著名童话的作者，这个童话与《镜中世界》一样流传很广——译者注。〕

[14]这是汉弗莱的老把戏，咬文嚼字，和使用晦涩的词句，只能按字面照译来看出他的用心——译者注。

[15]哈克的意思是，什么叫做数目大？二十不是，三十不是，难道再加一便士就是了吗？——译者注。

[16]环境部总部的所在地。

8. 选主教这一着

6月5日

今晚六时工作结束，只剩我的红匣子里的文件未阅。于是伯纳德和我同看六点钟的电视新闻。没有什么新鲜事。不过传媒在一个年轻的英国护士身上大做文章。她名叫菲奥纳·麦格雷戈，现在被拘留在海湾国家库姆兰，据称她持有一瓶威士忌酒。

在那里，她被判十年牢狱和四十鞭子，不过显然还未执刑，要等到“证实”之后再作道理，“证实”一词的意思不明。

新闻广播中露面的是她的母亲和她的议员（我们的后座议员之一——斯图尔特·戈登），两人正在向库姆兰大使馆呼吁。大使馆官员拒不接受请愿书。

新闻广播的末尾是外交部对此事件的官方反响，报道说外交大臣称之为“一件‘遗憾’的事，但是没有计划要采取什么行动。

新闻广播接下去告诉我们今天又是英镑的一个倒霉日。我关掉电视，派人去请汉弗莱。他来了以后，我对他说，这位护士的处境使人们很担忧。公众对她表示大量的同情。

他称是。

“什么是好的办法，该怎样干？”我问道。

“我敢肯定外交大臣会给您出主意的，”他说。

“他给我出的主意是什么都不要干，”我说。“我肯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劝告，”汉弗莱说。

这又是来自外交部的通常手法，阻止，而且长时期以来一直是这样。我说明道：“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那我们看来是没有心肝的人。而且也被人目为软弱。被人们看作既无情又虚弱对政府没有什么好处。”我转身向伯纳德说：“伯纳德，你认为如何？”

伯纳德活跃起来了。“也许您可以设法做到这一回看来冷酷无情，下一回看来软弱无能地交替着。”

我不理睬他的话，我就是一味向汉弗莱表明我必须干些**什么**。我的希望是，由于不久以前才呵斥和打败了汉弗莱和他在外交部的伙伴迪克·沃顿，这次他们在我没有施加多少压力的情况下也许会屈服认输。

然而，暂时在这一时刻看来还不太有希望。汉弗莱有礼貌地告诉我，外交大臣并不认为我们

必须干一些什么。嗯，**显然**是不干什么——他该怎样认为都是由外交部教给他的，而且外交部的官员并不知道；也不在乎选民要求的是什么。

汉弗莱告诉我官方的见解：“库姆兰人是英国的好朋友。他们刚同我们签订一张数目很大的合同，是关于国防需要的。他们告诉我们苏联在伊拉克打算干什么。他们甚至替我们破坏欧佩克[\[1\]](#)协定。我们不值得使他们苦恼不安。”

“这一切我**知道**，汉弗莱，”我不耐烦地说。有时候他对我说话，好像把我完全当作一个白痴来看待。“但是要点是，有一个英国公民在某个国家为了一个小小的过失而要面临着一种野蛮的惩罚。而外交部又在那里干什么——他们应该保护英国国民。”

他摇摇头并且悲苦地微微一笑。“他们是在那里保卫英国利益的。”

“让她受鞭挞肯定不是保卫她的利益，”我说。

“阻止鞭挞也不是保卫我们的利益，”他突然以坚定的口吻答道。

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接受这个见解。好几天来我一直拒不接受，现在我仍然拒不接受。（哈克继续不断地拒不接受他们的见解，外交部对此

却一直非常满足，因为他的拒绝看来是在情绪上给自己以满足，只要这不会造成他强迫外交部接受政策上的变动就可以了——编者。）汉弗莱争辩说，所发生的那件事就像一次小小的林区火灾，一下子燃烧起来，几天之后又灭了一样。我们可能犯的唯一错误是火上加油。声明呀，行动呀，后通牒呀，制裁呀——这一切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外交部要我向后靠着坐和无所作为。

他声称外交部是在干些什么。明天，表面上，我们将把一份措词严厉的抗议书送给库姆兰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就送交？”我问道。

“因为我们还未得到他们的同意，”他解释道。“我们正在同大使谈话。他们对措词表示赞同以后，我们即将送给他们。那时候，”他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到的一切。”

看来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抗议方式。那纯粹是一种外交式的抗议，只为了让公众了解就是了。一点也没有威力。而汉弗莱认为，为了那个可怜的姑娘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已经足够了。“我猜想外交部一定认为彼拉多[\[2\]](#)也竭尽了他的全力，做了他可能做到的事。”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汉弗莱热烈地表示同意。“对，说实在的，彼拉多巡抚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出色优秀的外交大臣。你不能仅仅出于要求正义的愚蠢的感情用事而让国家的利益受到风险。如果我们为了个人受到不公正和残暴的对待而采取道义的立场的话，我们决不可能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人，或者在津巴布韦让穆加贝掌权。外交部计划把福克兰群岛平静地移交给阿根廷，这个计划之所以搞糟就是出于道德观——他们现在已有很长时间不愿意采取任何道德立场了。”

我叹了口气。看来他是对的，如按纯粹的实际作用来说。看来我们不能做任何什么事了。我忧郁地说：“那是十分冷酷无情的。”

汉弗莱得到鼓励地把身子向前一探。“没有心肝比没有头脑来得稳妥一些。世界历史是无心肝者制胜无头脑者的历史。”

他已经获胜了，而且他知道他胜利了。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汉弗莱站起来并问他是否可以离去因为他有一个晚餐的约会。当他走向房门时，我在他背后喊着说，外交部决不可能使内阁同意他们这种政策的。

他在门口转过身来说：“外交部从来不期望内阁同意他们的任何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充分对政策进行解释的缘故。

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内阁在决定作出之后予以默许即可。”

汉弗莱说罢就走了。

我阴郁地凝视着伯纳德。“伯纳德，在公职生活中，有没有任何其他人像外交部官员那样没有骨气的？”

伯纳德觉得诧异。“他们不是没有骨气，首相。做到无所作为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问：“是吗？”

“是，首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您看作一位强有力的领袖的缘故。”这是赞词还是侮辱？看来伯纳德自己也无法肯定是哪一个，因为他急忙接下去说：“我的意思是：因为您能抵抗压力。”接着他提醒我应当准备准备去出席今晚的招待会。

我要求他就重要的宾客名单给我介绍一个梗概。今天晚上重要的客人是几个英国国教会[\[3\]](#)宗教会议的代表。在伯里圣埃德蒙兹教区有一个缺额，我必须在他们将向我递呈的两个人选中挑选一个补缺。

但是，按传统，虽然他们必须提呈两个名字，他们焦虑的是，怕我挑错了一个。我问伯纳德我怎能知道应该挑哪一个。

“好比，任何一次文官部门的选才一样，首相。这将是玩一项魔术。你知道玩魔术的人会对

你说‘随便抽一张牌’——实际上，结果你总是抽了他迫使你抽的那一张。”

伯纳德能这样承认，那是很大胆的。于是我问他：“如果我不抽它，那又怎么样？”

他自信地微笑说：“你会抽的。”

我自忖：好吧，让我们等着瞧。“伯纳德，他们要向我提供的这些‘教士’牌是谁呢？”

他咧了一下嘴笑道：“至于教会么，通常叫你挑选的是一张J或者一张Q。”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那天晚宴约会的地点是在他母校牛津的贝利学院，他坐在贵宾桌边[4]。在那里，出于偶然，汉弗莱爵士退休这个话题出乎意料地影响了首相即将选择一位主教的决定。在贵宾桌上的谈话汉弗莱爵士记录在他私人日记里，首相当然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编者。）

我们上的是通常的、充足的饭菜。一般来说，干红葡萄酒[5]总是比供应的菜可口，波尔图葡萄酒[6]比红酒好喝，谈话比波尔图葡萄酒更好。

像通常一样，严肃的谈话总是在饭后喝波尔图葡萄酒和吃甜食时开始的。在惯例的礼貌客套（学院院长谢谢我来

同他们一起进餐，我回答说我一直很高兴能同老朋友一起吃饭）之后，院长谈到正题上来了。他对我说他将在四年或五年内退休，差不多与我从文官部门退休的时间一样。

二者相提并论不太可能出于偶然的巧合。所以我很警惕他接下去要说什么。他说：“司库[7]和我认为你正是继承我的院长职位的家伙。”甜言蜜语。听起来像音乐。

然而，不一会儿事情就清楚了：存在着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据人所知就是教务长[8]。院长有些勉强地但是不再谨慎和婉转地透露说，教务长不喜欢我。

这使我感到惊奇。为什么他不喜欢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他应当感谢的事？

可是，看来这是事实。司库的看法是，教务长认为我太聪明了。人们总以为在牛津，被人称为聪明也许多少是一句赞语。

显然，教务长还认为我自鸣得意。我也是从司库那里知道这一点的。司库看来喜爱和欣赏这次谈话，不过太过头了一些，不合我意。

司库也许已经理会到我不欣赏他的坦率，因为他对我说，在他看来，他并不在乎。我认为他是在说教务长怎么想他并不在乎——可见，不，他是在说我自鸣得意他并不在乎！

随后他唠唠叨叨地讲下去。他对我说那是明摆的事，而且我有许多地方是可以自鸣得意的。如果他有七万五千英镑年俸、爵士品位、与指数挂钩的养老金以及一群政治家为他犯下的所有错误承担责任、（他告诉我说）他也会非常自鸣得意的。

这句话十分有启示：教务长不喜欢我的根源在于妒忌以及司库也认为我是自鸣得意的。再没有其他解释了。这又是一个我须背上的十字架。但是我将竭尽全力，欣然地去背这个十字架。

院长又补充说，教务长厌恶阴谋和不喜欢政治家。有那么一会儿我十分不快，我一直在想院长是在暗示我是一个政治家吧！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花了够多的时间来讨论他们对我的品质的歪曲的看法！我说我想知道关于教务长的更多情况。

司库说明教务长是多疑者，他怀疑

院长和司库背着他对这件事在搞什么阴谋诡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乘他外出时同我一起加以讨论。他们把两件事说得很清楚：第一，他们并不主张搞阴谋；第二，如果他们能够除掉教务长，这是我能当上贝利学院院长的唯一办法。

这可以成为一个问题。教务长是一个懒惰的家伙。他只须一周工作四天，讲一次课和担任一两次辅导课——可是他是终身教职。他们说只有两种兴趣：板球和蒸汽机。他从不需要阅读一本新书或者想出一个新思想，所以当个牛津学院的教师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不过的职位。那么，他怎么会有调动的想法呢？

院长和司库已得出结论，只有一个管辖教区的主教职位会使他离开贝利，故而他们才想到伯里圣埃德蒙兹教区，这是有人要争取的去处。

那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教区，是老教区中的一个，在上议院有一个席位。这一点（我知道）能大大地吸引教务长。按我对他的观察，他的主要癖好是被吸收进入贵族阶层。

遗憾的是，我不能肯定我能否干什么事为教务长获得伯里圣埃德蒙兹一职。因为为时已晚；再者，我解释道，教会在寻找一位候选人，此人要能够在信上帝者和不信上帝者之间保持平衡。

对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使他们吃惊，包括院长和司库在内，当他们听到教会内有许多人不信上帝，其中包括大多数的主教这个事实的时候。

伯里圣埃德蒙兹一职已经解决了。教会已经安排大教堂教士迈克·斯坦福获得此职。在理论上，哈克必须推荐委任人选。但是教会习惯上提出他们所要的候选人，再加上一个不能接受的第二候选人，这样来保证首相无法进行真正的选择。

再者，教务长的公职服务年份不足，甚至没有资格进入伯里圣埃德蒙兹。

但是，这对我自己的前程来说，是一件严重的事，特别由于在近的将来，没有其他教区还会有空缺。主教们常常不按规定，他们不肯退休。年纪较大的被委任者不一定要在六十岁退休，而主教们往往寿命较长——显然，天上的主

并不是那么渴望，要他们去与它同在。“神所喜爱的人去世得早”[\[9\]](#)——这句话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主教们都活到高龄的原因。

我们的谈话集中在唯一有希望的进攻路线上，给教务长更多的公益服务工作。他是伊斯兰研究的专家，他喜欢阿拉伯人——这是他的仅有的几个优点之一。我突然念头一闪，得到启发：我建议院长说服他的主教把他派往库姆兰，代表那位护士说情。他们听了这个主意都很高兴。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错过的职务。如果他没有成功，那么至少他已经去尝试过。如果他成功了，那么他将成为一名英雄。如果他回不来，没有人会想念他。

可是我却不愿意去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可怕的国家。他们惩罚窃贼是斩去他的双手！妇女通奸则用石头砸死（get stoned）不像英国，在这里妇女喝醉了（get stoned）则去通奸[\[10\]](#)。

甚至于他回来时，也许身体上缺了什么似的。

瞧！手都没有了！

6月6日

与负责任命的秘书彼得·哈丁会晤。他年约六十，是不声不响地十足自信一类的家伙。显然，非常健全可靠。

我略显踌躇，因为我以前从未委任过一位主教。（应说向国君推荐任命人选——编者。）

现下有两位候选人。第一位，大教堂教士迈克（Mike）·斯坦福。我料想应该称呼迈克尔（Michael），尽管看来人们都叫他迈克。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人们从来不对主教直呼“迈克”的！无论如何，在公共场合决不会这样称呼的。也许因为他经常在电台广播，人们就叫他迈克了。

彼得告诉我，迈克是一个现代主义教徒。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术语。“首相，是神学上的一个新名词。看来他接受这样一个说法：《圣经》中叙述的有些事件并不像字面上所记载的那样真实——他把它们看作比喻、传说或神话。他对故事叙述背后的心灵和哲学方面的真理感兴趣。”

对此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看法，为了肯定地让人理解。“你的意思是，他不相信神（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了世界，或者不相信夏娃

产自亚当的肋骨，这一类的事？”

彼得高兴起来。看来完全是这一类的事，听起来是十分合乎情理的。彼得说关于迈克·斯坦福，我需要知道的其他事情只有一点，即他在牛津的温切斯特和新学院念过书，名列第一。彼得还补充说，“而且他有一位出众的合适的妻子。”

“你意思说，她是虔诚的和做了很多好事的人？”我问道。

他感到意外。“不，我意思是说，她是多尔切斯特伯爵的女儿。”现在该轮到我来惊奇了。那又怎么样呢？我在奇怪。我问他名单上第二位是谁。

“嗯……第二位是保罗·哈佛博士。”

我等他说下去。但是彼得看来不太愿意往下说。

“还有？”我催促他。

“好吧，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彼得说。这是表示赞许而其实旨在贬低的话，我一听就听得出来。彼得把眼睛盯着自己的鞋，不敢抬头。

“可是？”我要求他解释一下。

彼得叹了一口气，然后直对着我看。“当然，这该由您来挑选，首相。不过有一个怀疑，

他倾向于非国教主义。”[11]

“啊，”我似有见识地说道，可是使我难为情的是，我体会到我并没有**绝对**肯定他是什么意思。我请他讲详细些。

“那是一种见解，就是说英国国教不应当是国家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应当分离，像循道宗[12]或天主教一样。他们认为，普通百姓都把国教目为统治阶级的俱乐部而不是一种信仰。”

我听起来他倒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家伙，而且我也说了。不过彼得还是痛苦地保持静默。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好吧，当然，完全由您决定，首相。不过我猜想女王陛下也许会感到一些意外，如果您请她委任一个人而这个人却认为应当使女王取消加冕时所宣称的保卫教会的誓言。”

有道理。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把他列入名单呢？彼得支吾搪塞起来。他解释道，哈维**还未完全**成为一个**正式**的非国教主义者。只不过他的思想方式有所趋向。不过，讨论的结果，他的名字出现了。还有他的健康也值得怀疑。加上他开始吸一点点毒。

有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有人在说他坏话，恶意攻击！不然的话，一开始他就决不会成

为一个合适的候选人而被提名。无论如何，这不是我所说的一个选择问题。我对彼得说：“你是在说我可以在大教堂教士斯坦福或大教堂教士斯坦福之间挑选，倒来倒去还是一个。”

“不，”他满不在乎地答道。“这完全由您来决定。不过在这件事情上（请允许我这样说），决定还是十分容易作出的。”他就是不肯承认。他的脸上毫无表情。“首相，专门委员会向您提供了所出现的两个名字。”

“有没有开放性随意选举？”我问道。

他不耐烦地啧啧说，“不可能有。主教被认为属于使徒统绪。”[\[13\]](#)

我不是一个信教者，所以要求解释。

“那是上帝的旨意。加略人犹大[\[14\]](#)玷污自己的名声后，他不得不由别人来代替。使徒们由圣灵来决定。”

我大惑不解。“怎样显出是圣灵的见解呢？”

“抽签，”彼得说。

“那么这次能不能也让圣灵来决定呢？”我问，心想找一条出路来解脱这个尴尬的决定。

彼得和伯纳德面面相觑。很清楚，我的建议不行。伯纳德试图解释。他说：“没有谁确信圣

灵会理解一个英国国教的好主教应当是什么样的人。”

我问这次“选择”是怎样产生的。彼得神秘莫测地告诉我曾进行过不动声色的调查试探。

“彼得，”我微笑道。“我在学生时代常常玩扑克。我一看见一副叠起来的纸牌就能认得出来。”

伯纳德站起来，并提醒我到时间了，该会晤汉弗莱爵士了。他建议彼得和我明天再继续讨论。彼得面露谢意地走了。

汉弗莱进来和我在倒一天工作结束后一杯酒时，伯纳德去取关于迈克·斯坦福一生事业的详细材料，临走时他轻声地对我说，委任迈克·斯坦福也许有点想达到个人自己的目的。

汉弗莱和我举杯互祝健康后坐在舒适的书桌前的扶手椅上，很惬意。我问他现代主义者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误会了，问我是不是在指肖斯塔科维奇[\[15\]](#)或马赛尔·杜尚[\[16\]](#)。

我告诉他我指的是迈克·斯坦福。

正如我所期望的，他完全知道。“在英国国教里，此词是不信教者的代号。”

“一个无神论者？”我惊奇地问。

“啊，不，首相，”他顽皮地答道。“一个无神论牧师不能继续不断地领薪俸。所以他们不再信神时就称自己是现代主义者。”

我大吃一惊。“英国国教怎么能推荐一个无神论者当伯里圣埃德蒙兹主教呢？”

汉弗莱交叉着双腿，抿着酒。他微笑道：“很容易么。英国国教首要地是一个社会组织，不是一个宗教组织。”

这对我来说倒是一条新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自己并不来自一个富于“社会”性的家庭背景。

“啊，对了，它是这个国家的悠久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汉弗莱蛮有知识地继续说下去。“主教们需要那一类的家伙，谈吐文雅说话合乎体统，并懂得席间举止，该用什么样的和什么样的叉。他们必须是受人尊敬的人。”

我才理会到，这就是彼得所说的斯坦福有一位出众的合适的妻子的意思。

我问汉弗莱是不是还有其他合适的候选人。他说眼下没有。显然，近来有一两个更好的职位空着。我想不出除了当一个骗子以外，还有什么比当一个主教更好的事！不过显然，温莎教长是

一个更好的职位。威斯敏斯特教长也是如此。汉弗莱说明这种美差能使一个人同王室成员的关系密切起来。

一切对我来说慢慢地都清楚了。我总结一下：“所以当主教完全是一个地位身份问题——能穿上长袍和戴上鞋罩。”

汉弗莱点点头。“是，首相。尽管鞋罩现在只有在重要的宗教活动时才穿戴，像王室的露天花园招待会那样。”我奇怪为什么长袍和鞋罩现在不时兴了呢？

“教会试图更加适时，”汉弗莱说。

“从同上帝的关系来说？”我问道。

“**当然**不是，首相。我的意思是从社会学方面来说。”

他所说的话实际上是，从教会观点来看，理想的候选人是上流社会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的混合物。

伯纳德回来了，带来关于迈克·斯坦福的详细履历。他是对的。材料非常有启发性。他在离开神学院以后成为设菲尔德主教的助理牧师。他升迁为“非基督徒和异教徒社区事务和社会责任”的教区的顾问。他组织关于各种信仰之间的连络交接、基督徒和马列主义者之间的连络交接、基督

徒和格林汉康芒妇女营之间的连络交接。（格林汉康芒妇女营是一个反对核武器者—和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妇女的半女权主义者半女性同性恋者的营地，非法地驻扎在纽伯里（巡洋导弹储存地）附近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外面。只有妇女和儿童才允许参加这个抗议运动——运动是反对核武器、美国和男子（可能次序颠倒了，应是男子、美国和核武器）的。核导弹被目为一种象征阴茎的形式。该营地的妇女据弗洛伊德学说信奉者看来，是严重地患着阴茎羡慕症。对格林汉康芒妇女营表示支持——即使是有限的支持——被目为一种“进步姿态”——编者。）随后，斯坦福在埃塞克斯大学任大学牧师和一所神学院的副院长，现在他是英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裁军委员会干事。

在他的履历中有一个明显的缺漏。我问，“他有否当过牧区的普通教区牧师？”

伯纳德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不，首相。要当主教的教牧人员总是试图回避牧区工作的。”

“他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汉弗莱神秘地说道。

“伊卡罗斯[\[17\]](#)也是如此，”伯纳德神秘地答道。

“不管怎样，如果他是一个政治上惹是生非者，说什么我也不要他，”我作了决定。

伯纳德明智地点点头。“那希腊人是多么刚愎自用的傻瓜，他竟授给他的儿子以飞禽的功能。”我叫伯纳德不要对我摘引希腊[18]词句。（哈克错了。伯纳德·伍利是在摘引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一剧的第三部分——编者。）

汉弗莱对我的决定的反响是谨慎地表示同意。他说斯坦福还会以一位主教和上议院议员的权威来说话的，那将多么讨厌无聊。

“他正完全是我所不愿意要的那种人，”我加以说明道。“所有这些主教们规劝我多花些钱搞福利，这多么不好。你不能老是靠扔钱给他们来解决向题。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更伟大的精神——负责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汉弗莱对我微笑一下。“当今政治家们讲道德而主教们讲政治，多有意思，是不是？”

他是对的。伯纳德从斯坦福的生涯中举了一个例子给我们听：

“他在南伦敦设计一座新教堂。平面图上划出好几处地方供配制和分发橙汁以及计划生育、组织示威行动等等之用——但是没有地方举行圣餐。”他以公正的语气补充说，有一所两用的大

厅，里面可举行礼拜。

我问我的两位官员，教会是否批准这个设计。

“啊，是，”汉弗莱说。“您知道，教会是由神学家经营管理的。”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噯，”他微笑道，“神学是一种手段，有助于把不可知论者留在教会内。”

“也许我是幼稚天真了。”我说，“但是……”“不要这样想，首相，”汉弗莱打断了我的话。

愚蠢的奉承！他能不能承认这是虚伪的谦恭？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幼稚天真的。我挥手叫他闭嘴；我继续说：“我认为教会应该由相信上帝的纯朴的人来管理主持，不是那些追求肥缺的世俗政治家。”

“您可以提出争辩，”汉弗莱和蔼地说，“那些追求肥缺的人却认为把他们放在更加重要的职位上，他们对社区能作更多更好的服务，”

“那是伪善的胡说八道，”我说。

他耸耸肩。“正如您本人只想在十号这个地方为祖国效劳一样。”

突然间，我懂得他的意思。他说得对。但是我仍然不愿意要斯坦福。

汉弗莱听我解释说，我可以对两个候选人都加以拒绝，虽然这个做法将是一个例外而且是不足取的。

“即使一个候选人想把上帝从英国国教中搬出去，另一个想把王后搬出去，我也能这样做？”

汉弗莱说，“王后与英国国教是不可分离的。”

“是吗？”我问道。“那么上帝怎么办？”

“我想上帝是所谓一个可加以选择的**额外**成份，”我的常务次官答道并把酒一口抿干。

6月9日

今晚在库姆兰的那个护士的事件有了有趣的发展。外交部几天来没有什么动静。这实在并不是一个意外——外交部的人不是在那边做事的，他们是在那边解释为什么有些事情他们不能办的缘故的。

我想在吃晚饭时向安妮解释这一点。她感到困难，抓不住这个概念。她不断提出不相干的问题，如“他们难道不关心？”

“不，”我说。要她懂得这个回答有困难。

“难道这不是相当糟糕吗？”她问道。

显然，这是糟糕的，对政府造成了许多损害。然而外交部所做的只不过是耸耸肩膀和说我们决不能使库姆兰人不安。“外交部简直看不到它的狭隘利益之外的东西，”我说。

“对她来说，这一定是糟透了，”安妮说。

“谁？”我问道。接着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指那个护士。“对，”我表示同意。

安妮冷冷地凝视着我。“你不见得比外交部对她更关心，你们都是一样的。”我不认为那是完全公平的。（也许该说，不完全公平——编者。）安妮似乎认为我在不断担忧我在选民中失去人心，正如外交部在担忧在阿拉伯人中失去人心。这不完全真实——但是只要是真实的，有什么错误可言呢？我是一个被选上的代表——难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我应当关心得到选民的喜悦这一点，不是正确和正当的吗？

伯纳德来到我的套房。我有些恼怒。看来不再有不受干扰而让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安静地喝杯酒的可能了。他穿着大衣，显然是在回家途中。

他对他的打扰说了声抱歉，但是说有要事。“外交部刚才打电话来说，班伯里的主教和

基督教会传道会已经公布我们将派遣贝利学院教务长去库姆兰执行为那个护士申辩的仁慈使命！

这是好消息。但是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派遣一位牛津的大学教师。伯纳德解释道，该人对阿拉伯人怀有信心。

“很高兴听到英国国教的年资高的教友对一些事物怀有信心，”我说。“不过这是一次没有什么希望的远行，是不是？”

伯纳德认为不是这样。“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对伊斯兰教是一个专家。这是一次信仰对信仰的会面。”

我微笑了一下，吩咐伯纳德去告诉外交部，我很高兴支持这次旅程。伯纳德拼命摇头。“不，不，”他说，“实际上外交部要您制止它。他们非常愤怒。他们说那是一个白费劲徒劳无功的姿态，而且只会损伤我们同一个友好国家的关系。”

这真正太过份了，太不像话了。我没有意思去制止。那是一个极好的主意。至少，少到极点，人们会把它目为我们是在为她作出一些行动，而且这行动也许能救她。我叫伯纳德回家，走前他提醒我，兰贝斯宫[\[19\]](#)在催迫我对伯里圣埃德蒙兹一事作出决定。

安妮觉得好奇。她问他是什么意思。

“我必须对谁应当被委任为主教一事作出决定。”

“这不是给海军大臣的职位吗？”

“不，安妮，”我耐心地解释道，“我是在选一位主教。”

她哄然大笑起来。“你？”她甚至喘着气说。“那很荒唐可笑。”她擦擦眼睛，笑得劲都没有了。

我不能完全看出这有什么荒唐可笑的地方。我知道我不是信宗教的，但是宗教明显地与此无关。我是首相。安妮看不出为什么宗教与主教们无关的缘故，所以我向她说明他们基本上是穿上化装服的经理。

我从我的红匣子里拿出文件给她看。英国国教教会拥有十七万两千英亩土地和数以千计的佃户和各项租赁权，财产和投资的价值为十六亿英镑，包括工业，商业和住宅房地产，还有农田和林区。所以说实在的，理想的主教是一个公司集团的主管——一种商业银行家、人事经理和房地产经纪人。

安妮没有被激动。她说：“作为一个教徒，我要说我宁愿你挑选一个相信和属于上帝的人”

“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我说明道。“但是他要把英国国教转变为一个宗教运动。”

“唔，我明白了。”

“另外还有一个，他们试图把这个人强加于我，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由于安妮是一个教徒，她知道这个代号。“你意思是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无神论者？”

“两者都是，”我揭示了实情。“显然，没有谁介意无神论这一套。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对我造成许多麻烦，如果他在上议院开始作演讲的话。”

“难道你不能摒弃他？”安妮问道。

“我想这样做。但是这将被目为搞政治。”安妮迷惑了。“不过你刚才不是在说明教会是政治性的吗？”我保持着耐心。“是，安妮，可是必须不让别人看出。”

她把这事考虑了一下。“那么为什么你以宗教为理由拒绝他呢？”

我不能完全领会她的意思。她解释道，“他相信天堂和地狱吗？”

“当然不信，”我说。

“耶稣由童贞女所生？”

“不。”

“耶稣复活？”安妮问道。

“不。”我开始领会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主意。

“这些难道还不够拿来作为理由吗？”她问道。她真聪明。简单的常识。我突然明白了，我可以按汉弗莱所建议的，要求提出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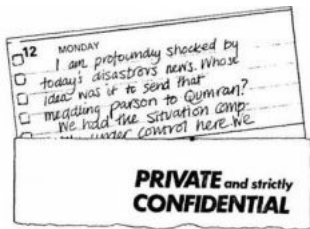
多候选人而**不显出是在搞政治歧视**。太妙了！

我对安妮说：“我所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同每一个人相处和交往的候选人。”

“你的意思是，他必须对任何事情并不强烈坚持自己的见解？”安妮这样说有些冷嘲热讽和挖苦，但是基本上是对的。不过有一个附带条件。以我之见，假如他**倾向于**基督教，那也会于事有所补益，也不可能造成真正的损害。所以我实际所需要的是一种尚空谈的基督徒。

（几天之后，贝利的教务长——克里斯托弗·斯迈思牧师大人——在大肆宣传声中出发去库姆兰执行仁慈的使命。他到了那里以后，三天不见人面。突然又在大肆宣传和炫耀的情况下重新出现并宣布他已经成功地得到允准，菲奥纳·麦格雷戈那个关在监牢里的英国护士可以释放。他和护

士第二天即能回到英国。在英国，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特别有鉴于英镑在那天又碰上一个糟糕的日子。外交部常任秘书理查德·沃顿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记下了这一笔！该日记本上面标出“私人和绝密”字样。该日记近在卡尔顿花园的地下室里被发现——编者。）



6月12日

今天的糟糕透顶的消息深深地震动了。这是谁出的馊主意把那个多管闲事的教士派到库姆兰去的？

在这里，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形势。我们已经提出了抗议，那个护士会静悄悄地吃鞭子并被塞到库姆兰的某一个监狱里去，在一两个星期以后报界会把这事抛到九霄云外去的。

现在的结局是对外交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们差不多已经获得了在库姆

兰设立一个信号收听站的协议。我们已经对他们说过，如果他们签署协议。我们不会再对护士一案大吵大闹的。现在我们失去了我们佳的讨价还价的柜台。

在这整个愚蠢的搭救举动中唯一的好事是把那个护士的糟透的母亲这个包裹给我卸掉了。她一直在打电话、写信和告诉报界说，我们做得很不够。令人不能置信地，报界站在她一边。他们一直在唠叨外交部应该如何表现得更爱国一些。这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工作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人们对外交部已经啧有烦言，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但是从来没有谁有过一次指控我们不爱国的。

很难相信报纸这样糟糕地对外交现实如此无知。

现在我预见将同首相发生问题，因为我们曾劝告他不要让那个教牧人员到那里去。他将说我们错了，不应该告诉内阁说使那个护士获释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还是对的——如果他们把这件事交给外交部去办，是会办不成的，不可能的。

（第二天理查德爵士从汉弗莱·阿普尔比那里

收到一封信——编者。)



怀特霍尔街70号，伦敦
SW1A2AS

发自内阁秘书和内政部文官部主任
6月13日

亲爱的迪克：

我认为外交部行将遭到新闻记者报道问题。

报界将说，外交部做不到的事，教会做成了。他们也许会挖掘所有有关的剪报，如关于大使们乘坐罗尔斯—罗伊斯汽车、花五百万英镑建立大使馆、用

纳税人的钱作为去伊顿公学就读的学费，以及英国在这件事上到底得到了什么等等？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汉弗莱·阿普尔比

伯纳德·伍利回忆道[\[20\]](#)：

我被召去同汉弗莱会晤，会晤是迫切的，单独进行的。这是在那个护士从库姆兰搭救出来以后不久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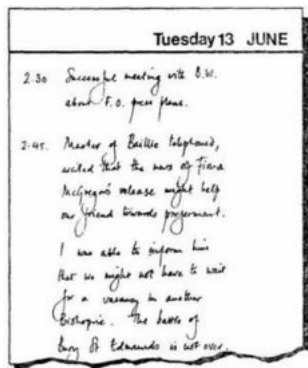
汉弗莱知道外交部曾经反对贝利的教务长进行的仁慈使命一事，而且他也知道我是知道的。

但是为了阻止报界针对外交部在进程中的被动作用作出不利的报道起见，理查德·沃顿爵士已经提议外交部去向报界说明派遣教务长出于哈克的主动。首相会欣赏这份功劳。（顺便提一下，将不存在什么危险——哈克是不会仅仅为了不真实而否认那个对他有利的报道的。）

至于对星期日报纸，外交部会向他们透露这个说法，就是说他们曾经向首相建议过这个做法和行动方针，因为他们发现外交途径已经堵死。因此，谁也不能受到责怪，人人都将分享这份功劳。

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计划。由于我作为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我的合作是需要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合作。

（在同伯纳德·伍利会晤之后，汉弗莱爵士接到贝利学院院长打来的电话。同伍利的会晤一事在日记里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不过关于这个电话以及随后同专管任命的大臣彼得·哈丁的会晤，存有简短的记录——编者。）



两点半——同伯纳德·伍利就外交部对付报界的计划一事的会晤很成功。

两点四十五分——贝利的院长来电话，说很兴奋，菲奥纳·麦格雷戈获释的消息也许有利于我们的朋友获得肥缺和

晋升。

我乘这个机会告诉他，我们不要等候在另一个主教管辖区有什么职位空缺。伯里圣埃德蒙兹之争还没有结束。我的意图是，使教务长作为一个后到的竞赛者得以站在起跑门前就是了。

三点——彼得·哈丁前来讨论伯里圣埃德蒙兹的事。王室任命专门委员会明天上午要举行会议。

他不太高兴，听说必须向首相再提供一个候选人，因为首相觉得打破传统是正确的举动，他坚持一位主教必须相信耶稣复活才算得上是主教。

彼得答应我有一个人可能当得上候选人——斯蒂芬·索姆斯。但他抱歉的是，索姆斯被保留着，准备派他去特鲁罗。

（特鲁罗非常遥远偏僻。该地对教会来说，等于文官部门心目中的斯旺西的机动车执照署——编者。）

索姆斯多少年来一直在等候获得一个主教职位。可以说long time, no see[21]了。此人相当讨厌，可称讨厌鬼。他一直在干什么“服侍上帝”的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教会真想把他搬

掉。但是，如果首相要一个笃信宗教的主教的话，周围恐怕差不多只有他这个人可以找出来当候选人。

我对彼得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困难。首相要求向他再提出**两个**名字。实际上，首相还未知道他有这个要求，不过一旦向他提出这个主意，他立刻会领会这是个好主意。应当让首相感觉到他是在作出抉择，是有选可择，这样做毕竟是对的。

于是彼得不得不提供一个第二候选人。我鼓励他去找某一个貌似可能的但实际不可能的候选人。彼得有些担忧。他必须在明天早上以前想好另一个候选人。

我建议贝利学院的教务长。彼得觉得他太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理由是他自视过高，可以说无出其右，而且极其无能，丝毫不能胜任。

我向彼得说明首相并不认为委任自负和不能胜任的人是愚蠢的。瞧瞧内阁。此外，由于教务长近获得一些好名声，得到了宣扬，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貌似可能的第二候选人。

这使得彼得更加担忧。这一次他所担心的是，教务长也许因此而**获得**这个职位，确实有这个危险。

我告诉他首相已经阐明他的见解说，应当委任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通过这个方法我得以缓和彼得的烦恼。由于教务长，据人们所知，只相信伊斯兰教、MCC[22]和蒸汽机，彼得对于把他的名字列在名单上的第二位这一点感到放心了。

当哈克推荐教务长担任主教职位时，又有烦恼需要我去进行缓和，不过那是另一天的事，明天的事。

6月14日

早报的报道是一首凯歌。

«Ангел милосердия был
напослан ПМ»

«Посланец премьер-
министра освобождает
британскую медсестру»

«По просьбе нашего Дэй-
на декан спасает Фиюну
от порки»



标题有（《每日邮报》首相派遣仁慈天使；首相使者使护士获释；吉姆派去教务长使菲奥纳免受鞭挞。

标题还有（《每日电讯》的社论）：富于想象力的外交——首相不受正统外交枷锁的束缚，大受赞扬。

昨天晚上的新闻报道中也把全部功绩归于我。我也不十分肯定是什么原因。我料想**一定**全是由于我的作为，是真的吗？毕竟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我的确制止过外交部，叫他们不要制止教务长——这等于是一码事。

然而还是很奇怪。通常一个人在其公职生活中是有这样一种斗争要作的，就是要求对他已经成就的任何好事予以适当的表扬，把功劳归于他。可是，这一次荣誉却是轻而易举地投给我的，而我本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低限度来说，是表面的。

无论如何，新闻报道已经发表彻底的对我有利的消息，如果要求更正是没有什么用的，也没有什么意思。我想我应该把它算作天赐我的恩惠。

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开后一次会，来讨论主教职位的空缺问题。显然，兰贝斯宫现在在等

我们的决定。可是汉弗莱和伯纳德进来后，我首先问他们，在他们看来为什么外交部新闻处把这一项拯救归功于我。

汉弗莱采取的看法是由于他们曾经提过抗议，他们不能把任何功劳归于他们自己。但是，如果归功于我，事情就看来出于政府的成就，而不是教會的成就。



我料想情况一定是这样！《每日电讯》的社论也强调了这个看法。

我们接着进入伯里圣埃德蒙兹的新主教问题。一开始我说我赞成斯蒂芬·索姆斯。彼得也喜欢他。尽管贝利学院的教务长在库姆兰干了一件很出色的工作，但据说他这个人相当古怪。事实上，据说他疯狂得够呛。但是当我征求汉弗莱的意见时，他的回答真使我吓了一跳。“我肯定索姆斯正是王室任命专门委员会所希望您作出的人选，首相。”

这是一个不祥的警告预兆。彼得一直对我不坦率直说。我问汉弗莱，索姆斯有什么问题。

“我听说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

我不知道**极端主义者**是什么词的代号。“你的意思是他相信上帝？”我在胡乱摸索。

伯纳德试图解释。“他是**非常**虔诚笃信的，首相。”

我仍在摸索。“那对一位主教来说是不错的，是不是？”

“噯……又是又不是，”汉弗莱谨慎地说。“他倾向于提出政府往往希望不要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是一个锋利的批评者，批评堕胎、十六岁以下避孕、性教育、色情作品、星期日做买卖、轻易离婚以及电视中的脏话。”

名目还不少哩！这是严重的。我不要叽哩呱啦喋喋不休的人、自以为是的牧师，在这一切问题上责难政府。

如果他们对这些情况中任何一个订有政策的话，事情就不会这样地糟。不过它们全是政府想避免制订政策的一些事。我们的政策是不制订政策。

我同汉弗莱讨论了这一点。他答道：“确实如此。他这人就是反对您的‘没有政策’的政策。”

伯纳德尖声地讲话了，我推测他是为了求得明晰的缘故。

“他会要求您禁止堕胎、星期日做买卖、十六岁以下避孕、性教育……”

“谢谢你，伯纳德，我已领会要点，”我说。

汉弗莱说他还有关于索姆斯更多的坏信息。“他也反对在非洲的压迫和迫害。”对这一点，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的么。”“对，”他表示同意。“但是反对是为了黑人政府和白人政府都这样做。”

所以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在逻辑上，这样一个古怪的跳跃，如何解释？原来当哈克是反对党时，他曾经是《卫报》的一个读者——编者。）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汉弗莱同情地轻声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依旧可以选择索姆斯。显然，我~~不~~想选他——可是我怎样来拒绝已经提出的~~另外~~两个名字呢？

于是我们又研究一下贝利学院的教务长。我列举反对他的几个论点。“他实在不称职。据说他这个人懒惰、自负和对基督教毫无兴趣。”

“对，”汉弗莱说，“不过他~~没有~~反对它！我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彻底适宜的英国主教——板球、

蒸汽机以及对神学一窍不通。神学可以严重地毁坏你的信仰的。”

我的问题是，我认为他基本上不合格。提呈上来的资料说他从未真正做过教会工作。他整个一生花在牛津。另一方面，他在库姆兰干得非常之好，因此委任他当主教也许是投票选民所十分欢迎的选择。

接着汉弗莱出人意料地扔下一个炸弹。他突然说：“有一个问题！我推断他正在想对报界说明库姆兰之行不是您出的主意。

我猜想他在您卷入此案之前早已收到班伯里的主席的一封信。”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那将造成一个无可置信的困境。事情将看来似乎是我在试图把我没有做过的什么事归功于自己！我就是不能想象报上会出现怎么样的标题？！

教务长仁慈使命首相居功

或者

吉姆没有安排使命

于是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制止教务长不让他作出令人难堪的揭露？根据汉弗莱所得到的信息，看来教务长是恼怒了，因为对他在库姆兰所起的作用未曾予以足够的表彰和报偿。或者说，教会没有这样做。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缘故？

在表面上看，答案是容易的。我告诉伯纳德去邀请教务长今晚来此喝酒。这将对报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拍照机会。

然而汉弗莱说这样做不合适：当我正在考虑两个候选人中谁去补伯里圣埃德蒙兹的缺的过程中，在他看来，我几乎不可能只邀请其中一人来此喝酒。

我懂得他的要点。但是我必须做一件**什么事**来制止他向报界揭露。

接着，感谢上帝，汉弗莱突然想到一个妙计。“如果您已经**授于**他这个职位，那么事情就会完全合乎体统了。”

这样一来，我对此事越加思考，越开始觉得教务长也许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教，一个**很好**的选择。毕竟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家伙。而且，当我对伯纳德解释时，古怪可以成为长处——你就把它说成是个人主义就是了。

伯纳德满心和完全地同意我的说法。“这是那些不规则动词**[23]**中的一个，是不是？所谓‘我有一个独立的头脑，你是怪僻的，他在左右一切’，不是吗？”

我们进一步讨论下去，一致同意在上议院里我们需要了解阿拉伯世界的人。还懂得板球。还

懂得蒸汽机。所以在成熟的考虑后，我决定选择克里斯托弗·斯迈思牧师大人——牛津贝利学院的教务长。我吩咐伯纳德把我的推荐通知兰贝斯宫，快！我要求在午餐时候宣布这项任命，并立刻通知教务长，还要他今晚六点来此喝酒，带上一个摄影师。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危机避免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伯里圣埃德蒙兹主教，那个护士从库姆兰释放出来，我得到全面的赞扬。

汉弗莱也很高兴。他对我说任命教务长是一个明智的行动。事实上，他是那样高兴，以致我开始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突然记起来，贝利是汉弗莱的母校。也许这是为什么他对教务长那么熟悉和那么高兴的缘故。于是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男孩们将有职业了罢。

他生气地加以否认。“相反，首相。我不太认识他。事实上，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今儿晚上您可以问他，如果您不信的话。我也并不很喜欢他。”

“这样，从这项任命事务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怎么能得到什么呢？”他问道。

我也看不出他能得到什么。但是一切看来似乎有些巧合。所以当我们一起在白色起居室的壁炉前让报界照相时，我问教务长他是不是喜欢汉弗莱·阿普尔比。“我受不了，十分坦白地说，”教务长轻声地对我说。“我认为他这人总是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这样看来，汉弗莱说的是真话。我真正很感激他，他按照文官部门的优秀的传统给了我有益和公正的劝告。

[1]“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缩略称呼——译者注。

[2]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他担任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据《新约全书》的记载，他优柔寡断，屈服于压力而宣判耶稣死刑。“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27章24节）。他表示已经尽他所能而无可奈何——译者注。

[3]亦称英国圣公会——译者注。

[4]英国大学宴会时的较其他餐桌为高的桌子，故英语中称为high（高）table（桌），也指大学饭厅中院长与导师的餐桌，通常供应美酒佳肴——译者注。

[5]亦称红酒，无甜味的和暗红色的酒——译者注。

[6]原产葡萄牙的一种高酒精度葡萄酒，常为深红色——译者注。

[7]高等学院的财务主管——译者注。

[8]原稿用的是dean一词，dean一词可指教务长，也可指训导主任、事务主任，甚至学院的院长或系主任；在牛津、剑桥大学也可指学监——译者注。

[9]雅典剧作家米南德（公元前342—292）的话，原文是希腊文。

[10]此处作者又是在搞文字游戏。英语中stone（石头）作为动词用，get stoned意为“遭人用石头砸死”；但作为形容词和主语补足语用时，get stoned意为“喝到醉醺醺的地步”。因此无法保持原文句子形式上的巧妙来翻译，试看原文的两句，表面上只是两个子句次序的颠倒：Women get stoned when they commit adultery.和Women commit adultery when they get stoned.但它们的含意大不相同。——译者注。

[11]不支持国教（尤其是英国国教）的主义——译者注。

[12]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别称，英文名称

为Methodist，信徒自称“循规蹈矩者”故名——译者注。

[13]指自基督的使徒（使徒即门徒，共十二人）以来经由历代主教的神权递传——译者注。

[14]《圣经》中的出卖耶稣的叛徒——译者注。

[15]1906—1975，俄国作曲家——译者注。

[16]1887—1968，法国画家——译者注。

[17]代达罗斯之子，他飞得太近太阳，他的双翼融化了。因此他由于雄心太大而没有胜利的希望，正如大学教堂牧师斯坦福一样。

[18]英语中Greek一词指希腊人或希腊语，但也指难以理解的东西。此处哈克听了伯纳德提到伊卡罗斯，以为他在摘引希腊神话中的词句或他不理解的什么东西，所以他用了Greek一词。因此直译来体现作者妙语双关。“编者注”则是进一步嘲讽哈克的无知——译者注。

[19]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官邸——译者注。

[20]与编者的谈话。

[21]英语在某种程度上已在口语中采用这个所谓“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long（长）

time（时间）no（不）see（见），即“好久不见了”。但英语中的see如果S大写，在另一语域中作为名词用时具有“主教的职位、权威、管辖权和主教教区”之意，因其词源来自拉丁文的sit（坐）和seat（座位、住所）。此处作者又在玩文字游戏，借同音异义词来嘲讽，直译应为“长年未得主教职位”。——译者注。

[\[22\]](#)Marlebone Cricket Club（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的缩略语——译者注。

[\[23\]](#)英语中规则动词意指其“不定式”尾上加ed构成“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一律如此；不规则动词的三个形式的变化可以各不相同——译者注。

9. 咱们的人

6月20日

今天下午在下议院我举行了一次完全轰动一时的“首相质询时间”活动。下议员们从各个方面攻击我对国防开支的控制，但是我真的把他们大家驳得体无完肤。

所以工作完毕以后我急忙回楼上的套房里去观看电视新闻。安妮正在看电视，新闻已经开始了。我问她那是不是头条新闻，可是他们未曾提到这一点。

“典型的BBC[1]的作法，”我说。

“那不是BBC。”

“那么是典型的ITV，”[2]我说。

“那是四频道，”她说。

“噢，”我说，“你希望看到什么？”

我把新闻的后半部分看完了，全是讲贝琪的命运，它是一条老英国牧羊狗[3]不知怎么及时赶上并进入了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国防部炮兵靶场。

根据四频道新闻的报道，贝琪属于一个名叫琳达·弗莱彻的八岁的孤儿所有。琳达去年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双亲，只有她和贝琪幸存。

贝琪迷路进入的靶场，满地是未经爆炸的炮弹，非常危险，只有一条规定的路贯穿着靶场。贝琪离开那条路很远。新闻报道放映了“危险”字样的路牌的镜头，以及那条狗到处乱跑和坐下的远镜头，还有一个泪痕满面的小姑娘的镜头，她在铁丝网藩篱外面观望着，她的亲戚在安慰她。

报道结束时，陆军对此表示遗憾，但是说他们没有办法，除非那条狗自动地走到铁丝网这边来，看来不可避免的是，贝琪要么饿死，要么被炸死。

新闻到此结束。我不能相信——竟然一点也没有关于我的报道！我问安妮是否她把它错过了。

“我从头至尾都看了，”她一边说，一边走向厨房去装盘端上晚餐，“但是你知道一个人看电视时会怎样表现的——碰上乏味无聊的片段时，不进脑子，等于把电视关掉。”

“谢谢，”我说，给我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她立刻感到抱歉。“不，不是指你，亲爱的。对我来说，你不乏味无聊，即使对全国其他人来说你是那样令人厌烦的话。”她这话当然并不是指我**个人**，她意思是有些人对政治家们感到

厌烦。

我可是有些不满。他们不给电视观众看到我在下议院中的一次重要胜利，而要他们看关于一个孩子和一条狗的哀怜的故事。

（虽然哈克认为在下议院的那场辩论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很可能四频道新闻节目认为那次辩论的内容仅仅是一些幼稚的喧闹者在互相争吵而已——编者。）

“我认为那个关于狗的故事是有趣的，”安妮说，手里在切番茄片，打算做色拉。“但是那完全不重要，”我说明我的看法，一边在费劲地拨弄那盘冰块。

“为什么关于议院质询的那个报道更为重要呢？”她想知道。

“十分简单，”我说，竭力表示谦虚，“因为那是关于我的事。我毕竟是首相么，难道这对传播媒介的任何人部不产生印象吗？”

“你给我们所有的人的印象看来是很深、够深的了，”安妮说。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她采取这种态度。

“安妮，”我向她抗议说，“英国国防的未来正在全国论坛上研讨，可是向电视观众提供的是什么呢？小姑娘回家吧！”

“可是全国论坛上作出了什么决定呢？”

安妮有时候会问愚蠢的问题。明显得很，什么都没有决定。你不能把决定交给议员们去作。她就是这样愚蠢。辩论的真正重要性是，**我赢了这场辩论**！我认为传媒应该让人们知道。（显然哈克进入十号执政五个月以来在发展一种摩西情结[4]——编者。）我对她说，传媒界人士并不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我还说我不愿再谈这个问题了。

可是安妮拉住不放。“我认为一个孩子丢了一只狗比一群长得过于高大的男生互相辱骂要现实得多。我认为陆军应当拯救那只狗。”

该死的傻念头！把成千成千的英镑花在搭救一条狗的举动上？而你尽可以去巴特西蓄犬所不花钱再要一条么！孩子丢狗天天有。难道军队都要开展搭救活动去把它们找回来吗？那不过是一只叫人伤心啜泣的故事罢了。

安妮说我不理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感觉的。

“我自己凑巧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高傲地答道。

“肯定不是！”

我试图向她解释我是负责管理公家钱财的。“我可不能为了轻易购买一点点人心而去花

纳税人的钱。”

“如果人心是那么轻易取得的话，”安妮说的话径直给了我一个不公正的批评，“那么你在民意测验中怎么会获得那么低的位置呢？”她争辩说，搭救一只狗所费的钱，每个纳税人只要付一个便士的几分之几，可是他们都希望能把它救出来；还有有时候你必须做些经济上不合算和破费事，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文明仁爱的社会里的话。

我对她说，她对此事可以写一篇文章，递呈给财政部。在内阁经济委员会里我们没有很多可供消遣的事。

6月23日

在我从事政治期间我曾经有过一些吃惊和意外的事，可是今天我认为是我生平中吃惊的一次。

英国安全局局长来看我。他的名字叫杰弗里·黑斯廷斯。身材高大属于圣伯纳德狗[\[5\]](#)那种类型笨拙的人，其棕色的眼睛带着忧伤、疲乏的神情，他的萎垂的双下巴在颤动。

伯纳德领他到我的书房去。我请他们两人坐下。黑斯廷斯尖锐地望着伯纳德。我对他说，我有会晤时总是要他在场的。

“这一次不行，首相。”他温和可是坚定地说道。

我想了一下，想起实际上我会晤时也不总是要伯纳德在场的，于是我让伯纳德出去。他走了以后，我才体会到我还没有收到关于这次会晤的任何文件。但是黑斯廷斯表示这是他关照过的。显然，这个会晤太严重了，因此不能见诸于文件。换句话说，关于它不应当有任何记录。这在怀特霍尔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在怀特霍尔里事事都是记载在案的。

我觉得好奇，而我好奇的渴望不久获得了报偿。

“我们刚刚收到一些信息，”黑斯廷斯低声地说道。

我有些迷惑不解。“还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吗？”

他点点头。“您知道约翰·霍尔斯特德爵士吗？”我点点头。我同他**从未有过**个人交情，但大家都知道霍尔斯特德是六十年代英国安全局的头头。上一个月他故世了。“他留给我们一整批他的个人文件。我们已经开始在阅读审查。很清楚，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好多年把政治秘密提供给莫斯科。”

我觉得很难相信他正在告诉我的事。安全局的头头是一个俄国特务？不可信！

杰弗里·黑斯廷斯似乎有些窘迫地竟然告诉我这一切。我并不感到意外。我问他霍尔斯特德为什么要把文件留给安全局呢？

“他的遗嘱里说是他出于良心的后一个举动。但是我想他就是想在死后出一些风头，表示他扬扬得意和幸灾乐祸。他给我们看看他终于未被发觉或受罚而得逞了。不过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杰弗里无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眼袋下的肿囊，几乎垂及面颊。

“他泄露给俄国人多少情报？”我问道。

“这倒没有多大关系，”杰弗里说。“我的意思是，由于想到那么多人这样做过，如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布莱克、富克斯和克罗格一家人，再加上一个实在没有多大的区别。”

“那么要点是什么呢？”如果对泄密的事都不在乎，我就看不出有**任何**应当在乎的理由了。可是我错到多大程度呀！杰弗里·黑斯廷斯忧郁地凝视着我，他的黑白混合的髭鬚在呼吸中拍动。我从未见过这样哀伤的人物。“要点是，”杰弗里以深深的沮丧的嗓音说道：“他是咱们的人。”

“咱们的人？”

他看出我自己没有十分抓住这一点的全部意义。“他从牛津出来后直接参加安全局。他的一生一直呆在文官部门。如果这件事传出去的话，我们中间所有受他招募聘用的人将永远成为嫌疑犯了。”

我突然明白其中的全部严重性。“我明白了，”我说着并带着疑问猜测的眼光看了他一下。“而你自己不是一个俄国特务，对不对？”杰弗里冷冷地瞪了我一下，我于是急忙使他放心，我说：“只是开个玩笑，但是你不是。是这样吗？”他仍然不吭声。我明白过来了：即使我从他嘴里得到一个答复，说什么我也不会知道是真是假的。“不，你当然不是，”我说，接着我对他说，不管窘迫不窘迫，以我看来，我应当把这个信息公布一下。

他恳求我不要这样做。他说其中有很多很重的关于保安方面的牵连。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如果信息本身并不重要的话。不过黑斯廷斯说，不让我们的敌人知道我们不能保守秘密，这是绝对重要的事。

“我真不应该认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我说。我说话的逻辑是无可驳复的，毕竟，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布莱克和克罗格一家人一定已经泄漏过秘密。但是事情却不是

这样——俄国人不是他脑子里的敌人。他在谈到的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报界。

“在七十年代，我们曾经搞了内部保安调查，调查的对象是约翰·霍尔斯特德。传媒界掀起了大量的猜测。您记得吗？”

“约摸记得，”我对他说。“那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和不正确的报告，”杰弗里痛苦地提醒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问道，“报界暗示霍尔斯特德是一个间谍？”

“是。”

“但是他是一个间谍。”

杰弗里不耐烦地吸了口气。“是，不过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典型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他们只是碰巧，偶然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不管怎样，调查把他澄清了。完全查明了。证明他清清白白。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些相当明显的问题和检查。所以显然那，哎……人们感到怀疑。”

他说的这句话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他真可以说是在往外舀呀舀。我奇怪人们怀疑的是什么？我猜不出，于是我不得不问他。

“人们怀疑那些把他搞清楚的家伙，他们究竟是否……您知道……”

“愚蠢，你意思说？”我说，接着我突然理会到他要说的是什么。我的上帝……你意思说，**他们可能也是间谍**？”他点点头，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谁主持那次调查的？”我问道。

“老麦克尔弗勋爵。不过他大部分时间在生病。”

“生病？”我要求澄清。

“嗯……嘎—嘎，真的。所以实际上是那位秘书在处理。”

“那位秘书是谁？”我问道。

杰弗里·黑斯廷斯愁眉苦脸地注视着我，然后向四周看人，以抱歉的口吻咕哝说：“很遗憾，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听错了。“汉弗莱？”

“是，首相。”

“你认为他可能也一直在充当俄国人的间谍？”

“那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可以说不大可能。毕竟他是咱们的人。”

“约翰·霍尔斯特德也是，”我向他指出这一点。

他不能加以否认。“嗯……是，不过一点也

没有其他证据，对汉弗莱不利的证据。”

我试图集中思想，镇定一下。“也许他为了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而在掩盖……”我马上纠正自己。“**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呃，**你们**中间的一个人？”

杰弗里认为这可能性非常微乎其微。他实际上认为汉弗莱是完全忠诚的，以及汉弗莱的错误仅仅错在极其不称职。

可是，这也够呛、够坏事的了。毕竟这涉及国家安全的高利益。我问黑斯廷斯他有什么建议，我对汉弗莱该怎么办。

“那全在于您了，首相。我们还没有把所有文件审查完毕。您可以设立一个调查汉弗莱爵士的专案。”

我该说，这是一桩相当有乐趣的察看举动，但是我对杰弗里仔细发问之后，发现他并不真正要作出这样的建议。“在这个阶段不要搞。事情也许会泄漏出去。我们不能再看到报界掀起不负责任的、报道很差的乱推测。”

“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搞，”我评论道。

“**特别**是正确的话，”杰弗里表示同意。“天下事没有比**正确的**可是不负责的、报道很差的报界乱推测更糟的了。不过您可以给汉弗莱以园艺假

把他调走，同时我们可以审查霍尔斯特德其余的文件。”

这也是一个可取的想法，但是汉弗莱这人相当有用处，尽管他有许多缺点。而且他是内阁秘书。我觉得我应当把他留下，除非他的忠诚与否确实成了问题。

杰弗里·黑斯廷斯对这一点觉得没有问题。他递上一件档案材料，上面标着“绝密：只供首相过目”，并且对我说我可以就其中包含的所有实质性的证据同汉弗莱对质。

但是我实在并不愿意盘问汉弗莱。“如果你没有严重地怀疑他是一个嫌疑犯，我们是否应当不予注意、不放在心上？”我问道。

他看来对这一点实在非常犹豫不决。“显然，由您来决定，”他以低沉阴郁的语调说道。“另一方面，如果您无所作为而后来出现汉弗莱爵士……他是……**他们**的人……，**他们**，也许事情看起来就不太妙了。更不用提出这样一个事实：他作为内阁秘书是在协调我们所有的保安服务的。一切都瞒不过他。”

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杰弗里站起身来，整整他的宽松下垂的细条子服装。他后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很难相信我们中间的一人是他们中间的一人。但是如果我们中间的**两人**是他们中

间的一人……”他理会到这在逻辑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并且想纠正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两人**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是……可以是……”

他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们所有的人？”我向他提出，帮他说全，我边说边陪他走向房门，“谢谢你，杰弗里。我听到的情况很充分。”

6月26日

我无法在星期五同汉弗莱谈约翰·霍尔斯特德爵士的事。整个一天我都有约会，汉弗莱也一样。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会议。

那是关于我一直在盼望的讨论国防开支削减的会议。我决定先把会议照原计划开完，随后同汉弗莱单独谈话。

我一直在极力试图找许多可以在国防预算中省钱的地方，哪怕数目是微小的。这个国家的国防开支完全无法控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将只能买得起半艘护航舰。我推测这对我们的海防来说，是很不充足的。国防大臣无路可走，所以我决定自己来审视一下。

例如，出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来省下三百万英镑，可是三军的头头都说不能干。当然，汉弗莱是支持他们的，他的论点是**任何**国防开支的节

省都可能是危险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军头头所作出的建议是，关闭沿一百英里海岸的雷达站。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故意建议这一项具体的节约，因为那样干**是**危险的，因此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我正在**建议他们可以开始吃四十三年来的草莓酱存货，不再去买新的。

汉弗莱看不出——或者不愿看到——这又如何济事。“据我所知，首相，陆军没有一点草莓酱的供应。是海军，他们有。”

他是对的。但是陆军有七十一年来的罐头肉存货。而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草莓酱，也没有堆积如山的罐头肉，但是有五十六年的烘豆[\[6\]](#)。所以我试图让汉弗莱和国防部理解和接受我的主意：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应吃海军的草莓酱；海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应吃陆军的罐头肉；陆军和海军应吃英国皇家空军的烘豆。而且其他所有的供应也按照这个办法来干的话，我们在今后的四年内，每年可省三百万英镑。我并不认为士兵吃水手的果酱会危及这个国家的防卫！伯纳德提出反对。“英国皇家空军的烘豆在东英吉利，陆军的鲱头肉在奥尔德肖特，海军的果酱在罗赛斯。所以这意味着把烘豆运……”

我叫他不要再说下去。“伯纳德，”我问，“如

果我们的武装部队无法把几罐烘豆在英国国内搬运的话，那么他们怎能截击巡航导弹呢？”

伯纳德似乎被这个问题弄糊涂了。“但是你不会用烘豆去截击导弹的，你手里有长长的尖头的东西，它们……”我吩咐他闭嘴。在这一点上，汉弗莱勉强地同意那是可以办到的，不过他又补充说，那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行政开支将超过节省下来的数目。”不过甚至没有人计算过行政开支。那又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需要——他们知道他们能够使行政开支超过节省下来的数目，如果他们花些脑筋的话。

当会议因无重大事件而正将结束时，一个通信员送来一份近的民意测验报告，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我的百分点又降了三个点。不是政府的得分——而是我自己的得分。

我奇怪我干了什么错事。汉弗莱认为这反证明我是做对了事——在他看来，政治方面的得人心的行动通常在行政方面是大失败。

我不懂是否起因于我没有使国防开支削减一事得到通过。也许是。但是我可以完全诚实地说，我不能肯定国防开支的削减是英国超级市场上的主要的话题，不，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是关于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走失的那条该死的狗。也许暂时我应该忘掉我的国防政策而应当想出一个关

于失落的狗的政策。

不管怎样，会是开完了。没有什么结果。我可不能再拖延了：我必须同汉弗莱单独谈一谈。我告诉伯纳德我必须同汉弗莱讨论一个绝密的保安事务，并向着房门点头示意。“你不介意吧，伯纳德。”

他向门走去，突然猛一下地把门拉开！接着他上下打量楼梯过道，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我体会到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于是我说明我希望他让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

他似有些泄气。我能看出为什么。两天之内有两次会晤我都请他离开。但是杰弗里的一次没有选择余地，我也没有——我几乎不可能让伯纳德知道，在**所有**人中汉弗莱在目前竟然是在保安方面的一个危险人物。

伯纳德离开我们以后（他也许在怀疑**他**自己突然被人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只剩下汉弗莱和我两人了。我不太知道怎样开始谈，所以在一两分钟以后我才说话。汉弗莱耐心地等着。

“汉弗莱，”终我开始说话了，“有一件事我要同你谈谈。一件十分保密的事。”

我说不下去了。汉弗莱俯身向前，希望对我有所帮助。“也许我不在这儿，事情会容易办一

些？”他问道。

“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我回答道。

他装出一种相应的严肃表情。“十分严重，十分保密？”

我点点头。“汉弗莱，约翰·霍尔斯特德爵士这个名字引起你的记忆吗？”

“当然，首相。三个星期以前他才去世。十年以前他是一次保安调查的对象。实际上我不得不亲自主持。老麦克尔弗在呢——呢。”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我问汉弗莱他是否发现有牵连的证据。

当然没有。”他自信地微笑道。

“好吧，首先约翰·霍尔斯特德是咱们的人。我们已经交了好多年的朋友。第二，这整个故事是报界安排的。第三，内部保安调查的整个目的是不要找出证据。

“即使这个国度的安全遭到危险？”

他大笑起来。“首相，如果您的确相信这个国度的安全会遭到危险的话，您可把政治保安处[7]召来。政府的安全调查只是被用来宣布报界的报道是不正确的，消除它的影响。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使首相能在下议院里站起来并宣告：“我

们已经作了一个充分的调查。对这些指控我找不到实在的证据。”

“但是假定你发现了某某可疑之处呢？”

“首相，实际上在政府内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可以怀疑的。您刚才吩咐伯纳德离去和让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进行秘密谈话，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解释和推断为可疑的。”

这使我感到惊异。但是不应当这样——显然他是对的。无论如何，汉弗莱继续说下去，整个故事是胡说八道，是典型的舰队街追求轰动效应的报道。

他十分自信，所以如果我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事情时，他一定会感觉到不知所措。我到此刻开始从中感到很大的乐趣。

我谨慎地问道：“约翰·霍尔斯特德~~没有~~可能把什么信息送往莫斯科吗？”

“不可能，”他断定说。“不成问题。”

“你敢以你的声誉打赌？”

“毫不犹豫。”

我打击要害了，我说：“好吧，汉弗莱，我遗憾地不得不对你说，他在他的一生事业中，相当多的时间在为俄国当间谍。”

汉弗莱闷声不响了。不过一回儿他又挑战地说起话来了：“我不信。谁说的？”

我遗憾地微笑道：“他自己说的。他把他所有的文件留给政府，还有一份详细的自白书。MI5说那绝对是真实的，从头至尾都证实了。”

汉弗莱无话可说了。这个景象以前我是从未见过的，我必须说我彻底欣赏这个洋相。他有些气急败坏，语无伦次了，他勉强地

在拼凑成句。后他说：“但是，我的天，我意思，嗯，他是……”

“咱们的人？”我帮助他说出来。

“嗯……对。”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噯，这样是有许多疑问可以提出的了。”

“对，”我表示同意，“让我先问你第一个。为什么你那时没有向他提出许多问题呢？”汉弗莱没有看出我的用意所在。“汉弗莱，为什么你的调查如此迅速地宣布他无罪呢？”

他突然体会到我的问题触动了**他**。“您的意思不是指……肯定没有人在向您提示……”他脸色转为非常苍白。

于是我向汉弗莱指出一切都值得怀疑。我问他为什么他没有搞一次彻底的调查。根据绝密档案来看，汉弗莱毕竟有证据说明霍尔斯特德曾出

乎意外地长期地呆在南斯拉夫。霍尔斯特德离开那里之后不久，我们驻在铁幕背后的几个安全局特工人员被围捕，从未再露面，影踪全无。

还有霍尔斯特德同一个特定的译员老在一起。我问汉弗莱对这个译员调查了没有，查出了什么没有。

“结果发现她是一个俄国特务。我们知道大多数南斯拉夫译员是俄国特务。就是说，那些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但是你从未追查她。”

“我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干，我的时间有限，”他为自己辩护。

我以指控的神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三个月以后，她迁移到英格兰来，定居在牛津，离开约翰·霍尔斯特德爵士的住宅仅一百五十码。他们在以后的十一年里一直是邻居。”

汉弗莱完全泄气了。他试图为自己辩护。“一个人不可能查对每一件事。你不知道你可能发现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具有那种善于怀疑的头脑，你应当……”

“主持保安调查，”我替他把那句话说完。

汉弗莱的辩护，简括地说，是说霍尔斯特德向他保证过，许下了诺言，君子绅士的谎言。你

对君子绅士的谎言一般不去查对，特别你们两人曾经一起在牛津上过学。我问他有否查对过安东尼·布伦特。汉弗莱说那完全是两码事。布伦特那时在剑桥。

我耐心地听他说话。接着我不得不对他说我对他产生一个问题。

他感到恐惧。“可是您不认为……您不能认为……我的意思，我说的是，我一点也不会说俄语。”

我说：“但是你必须承认事情看来一定是二者居其一，或者是不称职。或者是勾结串通。不论是哪一个……”

我没有把话说完。暗示是够清楚的了。汉弗莱极其不安。“勾结串通？首相，我向您保证其中没有共谋。”

“这是一个绅士的诺言吗？”我嘲讽地问道。

“是。一个牛津的绅士，”他马上补充道。

我对此并不真正满意。“花园怎么样了？”我问道。

他放松了一下，开始讲讲他的那些玫瑰花，然后他领会到我

这个问题的全部含意。“不，不，我恳求

您，首相，不要给我园艺假！”

“为什么不？”

“我还必须考虑考虑我的声誉。”

“我认为你已经把赌注下在约翰·霍尔斯特德的无罪上了。”我告诉汉弗莱我还须花许多时间好好地思考一下该怎么办。我表示我要去同阿诺德·鲁宾逊爵士谈谈，他是前任内阁秘书。

我还警告他不要在我同阿诺德谈话以前告诉他。

他向我保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去说的。

（是什么事支配着哈克事前警告汉弗莱爵士说，他要去同阿诺德爵士谈谈这件事的？为什么他相信汉弗莱爵士的保证说他自己不会去同阿诺德爵士谈话？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要永远加以思考的。只要提到汉弗莱爵士当天晚上就同阿诺德爵士在雅典娜俱乐部碰头喝杯酒就够了。阿诺德爵士的私人日记详细叙述了经过——编者。）

在俱乐部遇见了一个慌张焦虑的阿普尔比。喝了一杯白兰地以后，他透露了他惊慌的原因。显然，首相和安全局的杰弗莱·黑斯廷斯都认为他可能是一个间谍，因为他宣告霍尔斯特德是无辜的，而现在霍尔斯特德自己却承认了。

汉弗莱问我他该怎么办。我对他说，这全看他究竟是不是间谍而定。他似乎大为震惊——我竟然也抱这种怀疑，但是我解释说，一个人必须没有先入之见。

汉弗莱提出了几个对他自己有利的能令人信服的论点：

(1) 他不在剑桥上学。

(2) 他是结了婚的人。

(3) 他是咱们人中的一个。

(4) 他一生在文官部门工作。

(5) 不像约翰·霍尔斯特德，他从未相信事业[8]这一类的东西。汉弗莱正确地争辩说：他一生从未信仰过什么东西。

(6) 不像霍尔斯特德，他从来没有过什么观念——特别是独创性观念。

这些立论都有说服力——但不是结论性的。

然而，在我看来，在短时期内，汉弗莱·阿普尔比究竟是不是一个间谍，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同意他的意见，不管他是或不是，我们必须做到不让这件事透露出去。

当然，我既然是争取信息自由运动

的主席，我处于一个很好的地位来阻止敏感性的信息不让它到达报界的手里。为莫斯科提供信息是严重的——可是向任何人提供信息都是严重的。事实上，向内阁提供信息可能比向莫斯科提供信息还要严重。

关键性的一点是，这种性质的丑闻可以严重地削弱文官部门的权威。这可以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把政治家们引进来——如在美国，他们也许可以决定使他们党的政治仆从成为常任秘书和秘书，甚至副秘书。文官部门的高职位会由那种人来担任，就是政治家们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唯命是从地去做的那些人员。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英国按照内阁所要求的方式去治理，任何能向莫斯科提供的秘密中没有一个会对英国造成十分之一的损害。所以汉弗莱毋须承认，即使他是有罪的。我把这个意思对他说了。

他重申他没有什么可以招认的，尽管如此，还存在其他一个可能性。然而我吩咐他为了争辩起见，要假定自己是无辜的。

他多多地感谢我。我重复一遍，我

只是为了争辩的缘故而作出这个假定的，丝毫没有先入之见。可是遗憾的是，即使他在间谍行为方面是无辜的，他明显地错在无能和不称职。

他否认自己无能和不胜任。他提醒我，是我委任他当霍尔斯特德调查的秘书的。而且他还提出是我暗示他说，人们并不期望他找出不利于霍尔斯特德的证据的。

我自然加以否认。他没有书面证据——我确证当时没有见诸于书面的不利于我的东西。当然我曾送给他那份备忘录（备忘录经常总是送的）；里面指示他要千方百计地去干，不管是谁地一视同仁和寻求真相，不管事实是多么难堪。

事实上，我把那份备忘录的复印件留在内阁办公室的档案里，这样汉弗莱审称我如何如何，就没有可靠的凭证。

可是我还是要他向我保证，关于据说我也有串通之嫌这一点我们谁也不要再提了。他向我作了保证，随后我们回到他的不称职、不胜任和无能的问题上来。我对他说，虽然我们两人也许都知道他干的工作都是别人要求他干的，不

过对这一点很难向政治家们解释。

他问我政治家们是否必须知道这一点。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有可能，应当避免。不过主要的危险在于首相这个人：他也许会到处去告诉人的。

显然，汉弗莱一定不让这种事发生。一定要加以制止。首相也许会告诉内阁。他们也许决定让汉弗莱停职。他们也许把他调走去当现役军人墓葬委员会的主席！

汉弗莱未曾考虑到这些不祥的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他应当加以考虑。坦率地说，我并不在乎汉弗莱要碰上什么事。他是可以被牺牲的，而且我也这样对他说过。在情感上，他接受不了，他要否认这一点，不过事实上是如此。

但是即使按个人来说，汉弗莱是可以被牺牲的，我们还是不敢让政治家们开个先例树立起这样一个原则，即高级公务人员如果无能、不称职、不胜任的话，也是可以去掉掉的。那将是以小见大的开端，使小事引发起大的变动。我们可能因此而失去几十个我们的伙伴。也许几百个家伙。甚至几千个！

因此我劝告汉弗莱应当设法在这几

天内使他在首相面前显得那么重要，有用、和宝贵，因此他不能让你走。我们讨论了目前首相坚定不移地追求的是什么：当然是人心——赢得人心是所有政治家们一直始终不渝地所追求的。

当前大的新闻是关于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失落的一条狗的报道，我劝他在这件事上找一个有利机会施展一下手段。

（汉弗莱的日记关于同阿诺德爵士谈话一事只简单地提了一下。也许他不愿有任何记录在案，说明阿诺德爵士认为他是可以去掉的和牺牲的。这一点对他的伤害和刺痛甚至比说他可能是间谍还要厉害。不过汉弗莱爵士记下了第二天他同诺曼·布洛克[9]的会语；在那次会晤中他提出一个建议，那是明显地根据阿诺德·鲁滨逊爵士的劝告而构成的——编者。）

昨天在俱乐部同阿诺德见面。他作出了一两个有价值的建议，主要的意思是由我去想什么办法在周末以前帮助首相提高他在民意测验中所能得到的分数。

唯一的办法看来是让哈克对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失落的那条狗作出帮助。阿诺德似乎在建议找应当使首相爬遍整个

索兹尔伯里平原，一手拿上探雷器，另一手拿着一包怀南洛特牌狗食，这样做也许至少对英国来说，少受些损害，比他可能去做的别的什么事都要好一些。

今天，诺曼顺便来看我。他好奇想知道，他部里的国务大臣在内阁会议上作出什么样的表现。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作为内阁秘书，出席所有的内阁会议。其他常任秘书一般不出席，除非特别受到邀请，这是难得出现的情况——编者。）

我告诉诺曼，即使内阁表示愤慨，他部里的国务大臣拒不同意削减国防开支。诺曼听了，得到很大的鼓舞。

我对他说我需要他在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帮一个忙。他推想我将提到巡航导弹或化学战争的问题。当我透露我是在担心索尔兹伯里平原上那条失落的狗时，他感到很意外。

诺曼对这件事自信没有问题，每一方面都在控制之下。他预测那条狗到周末时就会饿死。随后军队将取回尸体，为它举行一个感人的小小葬礼，并就在铁门外面把它埋好。他已经计划好照相，让卫兵稍息，枪口朝下[\[10\]](#)，还打

算把照片集中起来表现司令官慰问啼哭的孤女的情况。他说电视台和观众会喜欢这一些。还有所有的星期日报纸都将登载照片。

我听得 very 仔细，然后建议我们去搭救那条狗。

诺曼像爆炸一样跳了起来。他的反应是，那太危险了。这样做需要：

（甲）一个中队的皇家工兵部队，配备探雷器，

（乙）一个分遣队的兽医部队，配备眩晕枪，

（丙）一架直升飞机（可能要两架），配备绞车装置，

（丁）一纸几十万英镑的账单。

这一切都是为了了一条狗！而这条狗去当地玩赏动物铺里花上一张五英镑钞票就可以买到的！

这一切我都知道，但不管怎样，我坚持要去搭救。我问诺曼狗能不能救出来，从技术上讲。诺曼想都不想，迳直回答道，从技术上讲，任何事都能办到，只要你有钱。但是他争辩说，那是疯狂的行动。首相对他在施加压力，要他削减开支。究竟为什么他该浪费几十

万英镑而全世界报界全都看得清楚仅仅是为了搭救一条狗？！

诺曼所看到的是这个问题本身。我把它扔在一边并向他点明这是个机会：如果首相批准了这次搭救，如果是出于哈克的创议，那就会使他大为困难地坚持随之而来要削减的国防开支了。

诺曼默然不语。接着他天使般地微微一笑，乐极的一笑。在我看来，明显得很，我已经恢复了我的机敏和才能。我向诺曼提出了下列条件：

(1) 搭救费用的真正数目，在搭救成功以前一定不能让哈克知道。

(2) 搭救行动应当随对准备着，立刻待命而且绝对保密。

(3) 功劳必须归于首相——这是十号的一项工作。他马上同意。

(阿普尔比文件28/13/GFBH)

6月27日

阿诺德·鲁宾逊爵士自从退休以来今天第一次回到十号来，为了同我秘密会晤，谈论汉弗莱事。MIS已经向他简要介绍了情况。他认为那是一件坏事，一件不幸的事。我进一步说，是一件非常糟糕的灾难性事件。阿诺德似乎觉得我太夸大了。

“不是灾难性的，肯定不是，首相。决不会透露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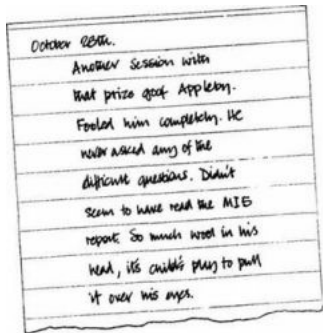
“你的意思是，”我问道，“事情只有在人们发觉以后才是灾难性的吗？”

“当然。”

也许他是对的。如果没有谁发觉，我料想那只是一件难堪的事而不是一场灾难。（如果内阁秘书是一个间谍，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难堪政治困境——编者。）

但是很幸运，结果不是灾难，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阿诺德爵士带来一个证据，说明汉弗莱爵士不是一个间谍。

“安全局刚刚在霍尔斯特德的文件里偶然发现了这个文件。从他的日记里发现的。”



他把它递给了我，我带着很难以形容的复杂情绪阅读了它——是宽慰、是喜悦，也许是欢乐。我一生曾经阅读过的材料中没有一件给我这么大的快乐，实属空前！

阿诺德假设我的高兴是由于汉弗莱现在证明是无罪的缘故。他要把霍尔斯特德的日记拿回去，可是我坚持要保留下来。

阿诺德于是建议，这件算是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再调查的了。不过我指出无能和不胜任的问题还存在着。

“咱们大家都犯错误，”阿诺德微弱无力地说道。

“在这样的等级规模上，情况就不一样。”我

严厉地回答。“你认为我该不该把他开除？”

阿诺德看来并不认为这个建议甚至不值得讨论。他拒绝考虑地回答道：“我很不以为然。”

“为什么不？”我问道，“你认为公务人员永远不应该被开除吗？”阿诺德谨慎地答道，“如果他们罪有应得，当然应该。在原则上是这样。不过在实践中并非如此。”

起先我表示怀疑，可是他加以解释道，在做到开除汉弗莱之前，必须要进行一个调查。所有关于公务人员不称职的调查，不知怎么的看来总是回溯到部长们的身上，是他们的错误。不过他倒自愿提出由他来主持一个不偏不倚的调查。

我须进一步考虑。既然好几年来，我一直是汉弗莱的大臣，我决定不作无谓的冒险[\[11\]](#)。我谢谢阿诺德的好意见，让他走了，随后我派人请汉弗莱来。

我等他一到，马上解除汉弗莱的痛苦。我告诉他已经查明，他不是间谍。自然他感到万分的宽慰，并且问是怎样查明的。

“从约翰，霍尔斯特德爵士所写的东西上查明的，”我告诉他说。

“那太令人满足了，”他说。

我从他这个情景中得到了乐趣。我说：“是

吗？”我还加上一句，“我早知道你会高兴的。”

“有关的人可以看看那个文件吗？”他问道。

“有关的人当然可以，汉弗莱。可是，让另外一个人念给有关的人听，那更好。”我就高声念起来，让他听着。

“10月28日。同第一流的傻瓜阿普尔比再谈一次话。把他完全蒙住了。”

汉弗莱脸色绯红。“我明白了。谢谢您，首相。”他伸手想拿那个日记本。

“不，汉弗莱，还有呢，”我说。“下面的话进一步为你洗清了。‘他从不问到任何棘手疑难的问题。看来他没有看过MIS的报告。他的头脑里有那么多的糊涂东西，蒙骗他是极容易的事，略施小计即可。’”我抬头看看汉弗莱，对他满脸堆笑。“这不是太好了吗？你一定十分高兴。”

他撅起了嘴。太显然了，看得出他内心极度恼怒，真可以说怒火中烧。“我一贯地说过约翰·霍尔斯特德对人是一个糟透的评判者，”他咆哮起来。

我假装为这一点担心，就说：“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日记？他在说谎？”

汉弗莱这一下走投无路了。他体会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承认是事实。他极其勉强地同

意霍尔斯特德的叙述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坚称霍尔斯特德不够聪明，不理解他的微妙隐晦的质问技巧——采取非当面对质式的迂回方法。

我表示理解地点点头。“你在诱骗他产生一种真实的安全感，”我补充一句说。

“是，”汉弗莱说。“不，”汉弗莱又说，因为他体会出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管怎样，”他加上一句，“我认为现在这一切好在都过去了。”

“勾结串通的罪名？当然咯，”我说，汉弗莱听了感到宽慰。

“但是我们还留有那无能、不称职、不胜任的问题。”他紧张地舔舔嘴唇。“首相，我恳切地求您……”

“汉弗莱，”我说：“有人为你工作而显出这一类的无能，你会容忍宽恕他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申辩说。“在一个极度紧张的时期。那时我有许多其他繁重的职务要做。”

“现在你也有许多其他繁重的职务要做么，”我带些威胁地说。

但是他下一着挽回了自己的命运。处于绝境作困兽斗的汉弗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他开始是这样说的：“首相，我一直在花些时

间思考您怎样可以提高您在民意测验中的评分，使你更得人心。”自然而然，我立刻对此感到兴趣。我等他继续说下去。

“一个坚强的政府需要一个受人欢迎的首相。”说得多么真实呀！我等着他再说些什么。

“我认为您应该做一件真正得人心的事。”

我等得不耐烦起来。“当然，我应该做，”我说。“但是做什么呢？”

他的建议不是我所期望的。“我想提议您应当亲自拯救那条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可怜的小狗。”起先，我以为他不是认真地作此提议。“那肯定会受人欢迎的，但是也肯定要花相当多的钱，是不是？”

“肯定不？”汉弗莱答道。

（文官部门的观察家会注意到这个巧妙的回答——它不是一句谎言，但也不显露什么真相——编者。）

他告诉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个决定必须马上作出，今天上午，乘可怜的小贝琪没有饿死以前。”我犹豫不定。接着汉弗莱诉诸我的情感作用。“有时候，一个人必须从内心出发采取行动。即使作为首相，也是如此。”

他是对的！我为他开了绿灯。他马上打电话

给诺曼爵士。他告诉我他已经使军队下了三小时待命的命令，并且说他现在只是等候我的后许可。

我很高兴。我只有一个顾虑。“汉弗莱，这是一个廉价购买人心的问题，是不是？”

“决不是，首相，”他着重地回答，然后打通国防部诺曼爵士的电话，说一声“诺曼？Walkies。”

显然，这是开始“姑娘回家行动”的代号。

6月28日

今天他们把贝琪搭救出来了。因而我期望明天我将**非常**受欢迎。

我在六点钟新闻节目中从头至尾地看个仔细。相当兴奋和激动，觉得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的高司令官。我觉得像在福克兰群岛一役中的撒切尔夫人，有过之无不及——几乎真正像邱吉尔式的人物。国家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物。国家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物。国家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物。行动今天一早在B 靶场开始。皇家工兵部队的四个分遣队，配备了探雷器，从各方面出发包围和逐步逼近贝琪后一次被人看见所在的那一区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贝琪找到。接着皇家兽医部队发射眩晕枪，一枪就打中了，我们看到狗倒下了，暂时失去知觉。

部队如不引爆炮弹无法进入该地区，而引爆也许要伤害那条狗。于是一架皇家空军的直升飞机飞入该地区上空，由一个空中营救小组放下一员捡起贝琪，没有必要让士兵穿越危险地面。贝琪由飞机平安送到他的小主人——孤儿小琳达——那里去团聚。琳达见到小狗雀跃起来。我想她一定已经放弃重新见到贝琪的希望。想到我自己的智慧和仁慈之心，我深深地激动了，禁不住稍稍哭了一下。我承认我是哭了，但并不害臊。

安妮也很高兴。我没有告诉她是我安排他们搭救那条狗的。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搭救时，我曾对她说那将是浪费钱财。

安妮的娇小脸庞由于替那个女孩子高兴和欣喜而容光焕发。我对她说，我曾经重新考虑过。“对你说的话我想过。我认为

‘政府是在关心’。”

“关心选票？”她问道。

我感到不高兴。“这样说很苛刻，安妮。我想到那个小姑娘和她一定多么疼爱那条狗。人——个别的人——多么有价值，即使在这样一个专讲预算呀、决算表呀的世界里。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这样地使用军队，可是我不在乎。有时候，作一件正确的事意味着有不得人心、失去民心的危险。”

我高兴听到这种声调。我将在明天下议院的质询时间里加以使用——它必然会出现的。

安妮完全喜爱[12]这件事。（很可能哈克说的是被这件事“欺骗”了[13]，但是他在录音时灌入盒式磁带的话语很不清楚，由于说话人听起来处于强烈感情和兴奋的状态之中——编者。）

她吻了我一下，并且对我说她**肯定**不会为此而批评我的。“自从我们迁入十号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能看出担任首相的妙处。”她真是不可思议。

6月29日

今天早上，报纸上的报道太妙了。甚至比我希望的还要好。



《太阳报》标题：首相愈合一颗破碎的心——贝琪得救

其他报上的标题：首相的仁慈使团——一条狗命——被吉姆搭救了。

我把它给汉弗莱看。他也很高兴。社论甚至也表示赞扬。

“今天英国发现在唐宁街十号内有一颗人的心脏在跳动。”我把这篇文章给伯纳德看。他的反响是他的一个典型的含糊其词的妙语。

“实际上，七十四颗人的心脏在十号内跳动。”但是他也在微笑。

我在汉弗莱身上犯了一个轻微的战术错误。我对他说我一直是正确的，我对人民所想要的具有本能的直觉。这话当然是完全真实的——可是在这一件事上，实际上是汉弗莱建议要去搭救的，而且当他提醒我做这件事时，我大方地全部归功于他，充分赞扬了他。事实上，虽然他大多数场合下出的是一些糟糕的主意，功劳**实在**还在于我能够一眼看出，但是话又说回来，他的这个主意还是好的。我仍然让他感觉到他是出主意的人，这样总是对鼓励士气有好处。

由于他在这件事上对我有那么大的帮助，我乐意答应他向我提出的请求。他要求霍尔斯特德调查案中所提到的无能、不称职、不胜任的问题不要再提了。我立刻答应。为什么不呢？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么。

接着我们在心满意足地再看了几张报纸的报道后，进入内阁议事日程问题。有几处引语非常之好。琳达说：“**我投哈克先生一票。**”英国广播公司和独立电视公司报道说，收到大量纷至沓来的电话赞成我搭救贝琪的决定。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反对党领袖没有评论。我敢打赌他不会评论的！他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支持我或者赞成让狗饿死！我在这一点上真正难住了他！

当我们后转向议事日程时，汉弗莱建议我们把第三项推迟一下——就是国防开支削减那一项。他要去同内阁的海外政策和国防委员会谈一谈。我看不出这一举有什么意义——我要的是在内阁里作出决定，不要从现在起九个月后才递呈上来的六十页的文件！

但是接下来，出人意料的事使我震动起来。汉弗莱透露搭救贝琪花了三十一万英镑。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这是国防部根据实际成本算出来的数字。

我震动得透不过气来。“汉弗莱，”我吓呆地说，我们必须想个办法！”

“把狗放回去？”伯纳德提出。

总的说来，尽管我大吃一惊，我仍然觉得那决定是对的——也许花了三十一万英镑，但是我赢得了大量的公众支持。（也许哈克应更正确地

说他用了公家的钱购买了大量的公众支持——编者。) 但是接着我突然充分意识到糟糕之处。至少，不完全是突然意识——汉弗莱加以说明。他还说：“您不一定非要推迟讨论国防

开支的削减不可，但是如不推迟就需要作出一个大无畏的决定。”我的心一沉。“大无畏？为什么？”

“如果实行国防开支的削减，搭救那条狗的费用问题必然会泄漏给报界的。”

“肯定不，”我微弱地说，但我心里知道他是

对的。

他摇摇头并微微地苦笑一下。“当然，首相，如果您对国防部职员

的机密可靠和忠诚完全信任的话……”

多么荒谬的想法！我怎么会信任呢？他们像筛网一样泄漏得够多的了。

汉弗莱使我痛上加痛地说：“我现在可以想象我将看到这样的标题：**首相拿英国防空开支搭救一条狗**！那将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哩。”

“一个无聊的滑稽故事，”这时伯纳德插嘴，诙谐地加了一句。

有时候，伯纳德真可恨，我要把他杀了。

我痛苦地对情势思考了一下。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斗争，要作出国防开支的削减。而现在，由于作出了一个一时冲动的好心决定，却受骗了。

“当然，”汉弗莱咕哝道，“事情只有在那样情况下泄露出去，如果……”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我突然怀疑这不是一个阴谋，是不是汉弗莱故意劝我去搭救那条狗以便取得推迟削减国防开支的决定？

但是我很快地体会到这是十足的多疑症。汉弗莱还不够聪明能这么干，他也不会对我这样干的。

他完全是在告诉我，国防部内有人不可避免地会把事情透露出去，除非我不再提削减国防开支一案。他是对的。有人肯定会找机会来敲诈我。

“我决不让人来敲诈我，”我坚定地对汉弗莱说。

“我希望没有这类事，”他说。说了以后又等着我说。

由于我从头至尾想了一下，我理会到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我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另一方面，”我谨慎小心地又开始讲话

了，“你不能把国防开支削减得太多。保卫国度是政府的首要责任。而且总是会发生不能预期的紧急情况：朝鲜、福克兰群岛、贝琪。”

“贝琪！”伯纳德和汉弗莱随声附和，表示赞成。

“对，”我下结论说，“大概我搞得太急了一些。”于是我对汉弗莱说，经过考虑后我的意见是第三项——国防开支削减问题——可能需要再加一些思考。我指示汉弗莱把这事提到委员会去。

我可以从汉弗莱的显出尊重的表情上看出，在他看来我是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还告诉他们没有必要特别地匆忙从事，好吗？”

“是，首相。”

[1]英国广播公司的缩略词——译者注。

[2]（英国）独立电视（公司）Indepedment Television的缩略语——译者注。

[3]18世纪初在英国培养的一种使役狗——译者注。

[4]摩西是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曾制定“十诫”，《圣经》首五

卷传说为他所制律法；此词也指“摩西式人物、神圣的领袖或制定法制、法典的伟人”。此处指哈克自以为是这种人物而且在心理上形成心理学上所说的“情结”，即“情意综”或“夸大的情绪反应”——译者注。

[5]指瑞士救护犬，一种大型红棕毛或白毛的狗——初为阿尔卑斯山圣伯纳德济贫院训养以救护雪地遇难的旅客——译者注。

[6]豆加咸肉、糖浆、番茄酱制成的食品——译者注。

[7]属于英国警察部门——译者注。

[8]英语中的cause在此处指“事业”，汉弗莱指的是由于某种信仰而作为奋斗目标的事业，如社会主义事业、世界和平事业；如说 the miners' cause，那就是为矿工利益而奋斗的事业，汉弗莱的意思他不是搞这一类豪迈事业的人——译者注。

[9]国防部常务次官。

[10]军队中下致哀口令时士兵所做的动作——译者注。

[11]此处哈克想到的是一句英国谚语“谨慎即大勇”（Discretion is the better part of valour）——译者注。

[12] 哈克的原话是was taken by it, 按字面的意思是“喜爱这件事”。

[13] “编者按”的意思是, 可能哈克说的是was taken in by it, 少了一个词in, 而taken in 这个词组意思却是“被欺骗”, 这也是一种讥讽——译者注。

编者的话

出版吉姆·哈克的回忆录在编辑工作上真可谓是困难重重。虽然我们因有幸能编辑整理他那兼收并蓄的录音资料而深感荣幸，但是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有时候粉饰和调整了一些往事。尽管现代读者对此会感到很吃惊，但他似乎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个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

我们相信任何政治家都不会以重新编排以往的事件来歪曲历史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作如此的设想：哈克在思维方面有个奇怪的毛病，致使他从来不问“我做了什么？”却只问“对我的所做所为，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才能令人信服，才能不被已经公开过的事实所否定？”

政治回忆录的读者们知道，大多数政治家的回忆录是公正和精确的范本，他们总是充满宽宏豁达的精神，也从不文过饰非。政治家们写到他们的同事的时候，总是热情洋溢，流露出一片崇敬之情，而涉及到他们自己对政府的贡献时，却总是谦虚地缄口不语。他们不大会故意暗示说，他们所建议采取的措施结果都很成功，他们也不大会声称，凡是他们反对过的决定后都导致灾难。政治家们都血统高贵。正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奉献才使不列颠成为今日之英国。

事实上，大多数政治回忆录的编者面临的难题是：不管这些政治家们是多么不愿意，也得强迫他们在书中包含有充分的争议，适度的被歪曲和遭受的恶意，这样，出版商才会有可能让《周日时报》连篇累牍地连载。

可是哈克为什么不一样？像样的解释莫过于，一旦身处高位，他对语言的表达就有不同于常人的看法。政治家们是直截了当的。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但是正像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所说的，由于哈克长期在内政部供职，他不再把语言看作是通向心灵的窗户，而是把它当作遮住心灵的幕帘。

哈克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对他的盒式录音机谈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对它是情有独钟的。归根结底，在这世界上也唯有它能不加褒贬地听他讲述一切，它还不光是听——它还愿向他一丝不差地复述他自己的念头和思想。这种品德是能使首相们放心的了。

如果没有人慷慨地让我们取得别的文件的话，哈克对他在唐宁街十号任职期间的回忆文字就会是很不完整的了。我们还大量地引用了阿普尔比文件，这包括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信件和备忘录。我们还得感谢他的遗孀，他的受托人，他的遗嘱执行人以及档案局。在《三十年规

则》的允许下，档案局慷慨地公布了所有可以公布的文件。我们也特别感激伯纳德·伍利爵士——他起先是哈克在唐宁街十号的私人秘书，后成为内政部的首脑——他也为我们写下了他的回忆文字，并为本书的历史事件的精确性作了校对，这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管是因遗漏还是失职，我们仍对所有的错误负全部的责任。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哈克学院，牛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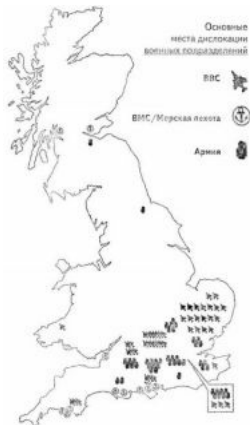
五月，2024AD

1. 落水之人

7月2日

在温布尔登[\[1\]](#)的时候，就业部大臣显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从中心球场径直向我走来，并对我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建议。

简单地说，他的计划就是要把我们的许多部队调往英格兰的北部。他已经意识到，虽然我们的现役人员有四十二万之众，但驻扎在北部的却只有两万。几乎人人都挤在南部。海军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皇家空军就在贝德福德和东英吉利亚，都在伦敦北面。陆军就在爱尔德肖特。在华什以北，英国实际上就没有军队了。还有——毛病还出在——实际上失业的问题也全出在北部。



达德莱[2]倒并不担心军队里的人。他们中不少人本就来自北方。不，他看到的前景是：如果我们把二三十万现役军人从南方调到北方，我们将创造出许多人的就业机会：职员，物资供应人员，建筑工人，汽车维修员……等等。机会简直是多得无穷无尽。也会有三十万份额外工资花在那儿的多种店铺里。

实在也没有任何像样的理由可以反对这个建议，我激将似地请内政部提提反对意见。（好一个鲁莽的激将——编者。）他们再也不敢低估我了。对他们的那些花招，我变得越来越有办法

了。

（在唐宁街就职八个月以后，哈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任何地位的改变，内政部可能会作出的反应。即使如此，他在这一件事上似乎有点过份自信了，这才使允许反对这计划的大门洞开。陌生的读者可能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合理的，温和的，也是适应性较强的。但那些熟悉哈克以往经历的学生会明白，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编织出很有力的反对理由。不管哈克自信得多么不可动摇，认为自己对汉弗莱的花样是了如指掌的，他显然忘记了他自己面对的是一位魔术大师。

就业部大臣的调防计划刚被传阅，国防部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记录说是全部同意这计划，只是有一个注解，在有关这计划的实施中某些细节的可行性方面，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保留意见。在近《三十年规则》允许下公布的汉弗莱爵士的私人笔记却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编者。）

今天在国防部和爱伦[3]及杰弗里[4]面晤。

杰弗里迟到了。我想，这可不太军事化，但是爱伦解释说，就业部大臣的这项建议使整个国防部陷入一片混乱。

新上任的爱伦确实把这看得十分严重。我设法给他解释：从首相的观点来看，这计划合理得无懈可击。爱伦拒绝以首相的观点来看这计划，他语带怨恨地说，这份倒霉的建议是就业部泡制出来的，干吗要把我们国防部扯进去。我纠正他说，这计划是就业部大臣泡制出来的——就业部本身也与此无关。

更何況，既然我已看到两个部门之间的内战已渐成气候，我表明制订这份计划的一切工作全是就业部大臣的政治顾问一手包揽的。

（谨慎小心的汉弗莱爵士可能并没有说这份计划是出自大臣的政治顾问之手，他只是“表明”这一点。即使他不说出真话，他也很不愿意说谎。他的杰出的前任阿诺尔德·罗宾逊把这过程描述为：“精简了事实”，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引用了艾德蒙德·伯克的话——编者。）

我向爱伦指出，我们应该保持冷静，这不只是一份调防建议吗，又不是俄国进犯了。爱伦说：“俄国进犯我倒不这么担忧了——国防部对此是有准备的。”

我们对此都很感吃惊。他就进一步说明道，他的意思是国防部明白对击退

俄国的进犯该做些什么。我倒是更吃惊了，我问他难道我们真能击退俄国？他说不，当然不，但至少，国防部不必费神去作什么思考。

既然首相已公开表示支持，我责无旁贷地应该维护就业部大臣的这份建议。所以我重申：虽然部队里有许多人来自北方，**他们**可并不是现在失业的人。而就业部大臣的计划是旨在帮助现在失业的人。

爱伦认为我们已经做得够好的了。我们部队中许多来自北方的人本来就是失业的，他们正是为此而参军的。这种说法是不会被首相接受的，他关心的是北部的就业问题，而在北方参军的人现在却在他们所在的南方花钱。

爱伦说这在逻辑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北方没有什么地方可让人花钱。

陆军上将杰弗里·荷华德爵士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他奋起进攻，干脆通知我，必须阻止这计划的实施。他告诉我，不能把几十万的部队这样在国内调来调去。

我想调动军队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理由听上去不堪一击。但是再仔细一

分析，他所反对的是这一调动的永久性。这倒也合情合理。

他退一步说：有一些现役军人是可以长期驻在英格兰北部的；另外一些阶层的人也可以，比如说低级军官。但是他清楚地表明，讲得也很得体，我们总不能让高级军官长期驻在北方。

我请他列举些理由。他欣然从命。

1. 他们的夫人忍受不了。
2. 那儿没有学校。

（这时候，英格兰北部有学校，但是杰弗里爵士可能是指合适的私立学校很难找——编者。）

3. 美仑美奂的海洛兹百货商店又不在北方。
4. 温布尔登也不在北方。
5. 迪托·爱斯考特地方的赛马在北方也看不到了。
6. 也没有了在汉利·瑞盖塔的赛艇盛会。
7. 更不用说陆军和海军俱乐部了。

简言之，他是怕文明将会变成遥远的东西了。这样的牺牲在战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这样的调防，士气无疑会一落千丈的。

我已没有耐心来听这样的理由了。今天下午，内阁会议将讨论这件事。总要拿得出比高级军官不愿远离俱乐部更像样一些的理由来，尽管这理由是多么叫人不安也不管这理由是多么的千真万确！

杰弗里是想不出比这更像样一些的理由来了。他愤愤不平地说，怎么能叫像他和我这样的人调防到那儿去呢！

我硬要他拿出反对这计划的客观些的理由。他坚持说这些理由**本就是**客观的。我好不容易控制自己不去拿一本词典叫他翻翻词意，我只是问他，是否在**战略上**有反对这计划的一些理由。

他说有，有九个。我停下笔来等他说。我请他列举一下。他却说不出来。他说他还没时间去考虑过。但是，要反对一件事，在战略上总找得到理由的。他在这一点上倒是对极了。

所以当爱伦和杰弗里找时间来考虑战略上的理由时，我们必须做到，万一这些理由经不起外界一驳的话，我们得为这些理由保密。在国防问题上，一向是照此办事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始终可以对国防工作作出高度的评价。我

们把这些战略上的理由只提供给首相过目，这当然意味着，这些理由并不受专家们的评说。

然而，一些战略上的理由并不一定能使首相不支持就业部大臣的计划。所以我建议，为了保险起见，在这场球赛中，我们该对付人，而不是球。这常常是个很好的战术，这件事中的人——当得起这一角色的人是——就业部大臣，这计划就是出自他的可怕的主意。我们计划去迎合首相的妄想。所有的首相都是妄想狂，我们的这一位比谁都更甚。向首相暗示就业部大臣在阴谋反对他，那真是易如反掌。

杰弗里问这是真的吗？军人真是头脑简单。问题又不在于有没有阴谋（就我所知，并没有什么阴谋），而在于是否能使首相相信有阴谋。

杰弗里问有没有可能把他彻底摆脱掉。起先我以为他是指首相，我指出，我们培养他花了那么大力气，这样就摆脱他岂不太可惜了。

但是我后来明白杰弗里指的是摆脱就业部大臣。此人太危险。如果他从就业部出来，他会去工业部——那样的

话，他会把空军给卖了，把陆军转为私有。或者把海军给淹了。

因为有一两个国防部的低级官员参加了会议，这就有“旁廷”[\[5\]](#)的危险，我得体的表达了对陆军上将荷华德看法的不安。他竟认为谦卑的内政部的公仆可以设法把女皇陛下政府中的人员从内阁中赶出来。我解释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首相能罢免大臣。

但是，任何首相只要怀疑他的内阁成员对他不忠，他都会采取这样一个可怕的行动的。既然只有患有深度妄想狂的人才会怀疑就业部大臣有阴谋，那我们倒是有机会的。

在会议结束前，我们做到使会议的详细记录反映出我们对就业部大臣全面地大规模地把部队调往英格兰和苏格兰北部的建议的热情。

（阿普尔比文件36/17/QQX）

（汉弗莱爵士对低级官员所持的谨慎态度反映了当时关于信息自由的日益增长的忧虑。一位叫旁廷的助理秘书就是把信息泄漏给国会成员和其他没有资格和不适合知道内情的人，他还声称这本是公众关注的事。“旁廷”就成了动词的分词形式，而动词“旁特”就是指以这种形式泄漏机

密。许多低级官员都很担心这种泄密问题，他们在供职期间不得不忠诚和谨慎，否则就得辞职、不过“旁廷”显然是很有诱惑力的，尽管随之而来的是身陷囹圄，名誉扫地，和在《卫报》上长期连载其回忆录。

国防部开会后的一天，就业部大臣的建议就在内阁委员会里进行了讨论。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7月4日

我们今天在内阁委员会里讨论了达德莱的建议。正像我预料的那样，我遇到了反对意见。汉弗莱在场。迈克斯^[6]和达德莱和其他的一些人也在场。伯纳德当然也在场。

在我的提议下，达德莱问大家对他的文件有什么反应，

迈克斯先说了。他是肯定会反对的。“好吧，首相，我知道，表面上看起来，这计划似乎有利于不景气地区的就业问题的解决！但是，我认为，这问题的解决是靠重新布置我们的国防布局。我恐怕这样做对国防部的影响至少和对就业部的影响一样大。我得花时间作可行性研究。”

我环顾会议桌一圈。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还有人有意见吗？”我问。“快一点。”布赖

恩[7]，文立克[8]和耐尔[9]都显得满腹狐疑。

布赖恩说：“呃，我对此知之不多，但是好像有点乱。”这两点他都说对了，艾立克喃喃地说：“得花很多的钱。”耐尔小心翼翼地评论说，这是一次很大的调防。

我已欣赏够了这一切，我就发表自己的观点了。“我完全赞成这个建议，”我说。

“我也赞成，”杰弗里[10]毫不犹豫地附和说。

“绝对是第一流的，”艾立克说，耐尔评论说这是很明智的计划。有时候，被一群应声虫包围是一件叫人很恼火的事，虽说当然也会有有利的一面。归根结底，既然在政府事务中，我总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立刻附和倒也省了我不少时间。

我向我的同事们微微一笑：“我想国防大臣是少数派了吧！”迈克斯为他自己辩解了。他是下定了决心的。即使他赢不了，我也得钦佩他的决心。“但是，首相，”他说，“我是负责任的大臣，在我作出可行性研究之前，还不能作出决定。此事有关国家的防卫。我们必须为此再进一步开会讨论，要定出充分讨论的时间。”这要求很合理。我同意两周后在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上再作充分的讨论。这以后，我们可递交全体内阁会

议讨论通过。

其他的委员会成员又一次表示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他们吵吵嚷嚷地叫道。

达德莱补充说：“我是否能请求，首相，在会议记录上写明内阁委员会赞成我的计划，只有一位例外？”

我对汉弗莱和作记录的伯纳德点头示意。但是迈克斯不作评论地拒绝接受达德莱的要求。“一位成员，”他固执地说，“正是要被调动的国防部的成员。这很有问题。”

我开始对迈克斯失去耐心了。“我能否请国防大臣记住：每一个问题也同样可以是机会？”

汉弗莱打断说：“我想，首相，国防大臣是怕这一计划会造成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都笑起来了。“很有趣，汉弗莱，可是够了。”我解散了他们，他们就顺从地挨个走了出去，我留下来再读一下达德莱建议中的细节。在开会前，我还没来得及细读。

“呃……首相。”我抬头一看。令我吃惊的是，汉弗莱爵士也留了下来。我意识到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伯纳德·伍利回忆说[\[11\]](#)：

我记得不是这样的。这场谈话我记

得很清楚，因为一连几个月，我在外不吃飯时都提起这场谈话。谈话是这样的，汉弗莱确实说：“呃……首相。”到此为止，哈克的叙述还是很精确的，后面就不对头了。

“喔，你还在这儿，汉弗莱？”哈克说，一面还在看这份计划。

“是的，”汉弗莱说。“关于就业部大臣的计划，我想跟您谈一谈。”哈克这会儿正全神贯注地在读这份计划。“真是份绝妙的计划，是不是？”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汉弗莱可并不作如是想。“是呵……可我想军官们并不太喜欢这个计划。”

“好啊，”哈克兴致勃勃地说，然后抬起头来。“什么？”他刚才根本什么也没听见。

汉弗莱感到生气了。他可不喜欢别人把谈话精简到这程度，当然，他

自己精简谈话那又另当别论了。“首相，”他试探性地说，“您在听着吗？”

“当然，汉弗莱。我刚才是在读这些注解。”

“首相，在海叟米尔这地方发生了一场地震，”汉弗莱试着说出这么一句来。

“好啊，好啊，”哈克咕哝着说。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刺了他一下，尽管是慢慢地，他还是z抬起头来了。汉弗莱爵士很清楚地意识到首相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长不了，他就把要说的话简单明了地重复一下，军官可并不喜欢这计划。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汉弗莱反复说军官们并不喜欢这计划。他们当然不喜欢！谁会希望他们赞成把他们的家眷从海洛兹和温布尔登调走呢。

汉弗莱爵士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首相，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个人的感情与此无关。他们的反对全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

“喔，是吗？”我在座椅里向后退一靠，显得很慈祥地一笑。他骗不了我。再也不能了。我语带讥讽地说：“战略上的？海军部的兵舰需要深水港，所以显然就只能驻在巴斯——离海三十英里的内陆。海军的任务是保卫挪威，所以我们就得把他们驻扎在普利茅斯。战车的检测是在苏格兰，所以军工部门就只能驻扎在萨利。”

“这些只是些各不相同的例子，”汉弗莱回答得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不错，”我同意地说。”在这文件中，还有七百多个这样互不相关的例子。”我把这篇报告向他挥了挥。他面无表情地扭头凝视着我，冷冷地，却丝毫不为所动。当他的蓝色的锐利目光从他带贵族气的鼻子上面投向我的时候，两眼直盯着我。我犹豫起来了。（我们都明白，人一犹豫，会发生什么事——编者。）

“你为什么反对呢，汉弗莱？”我觉得我该弄清这一点。

“我，首相？我向您保证，我并不反对。我只是想向您提一些该提的问题，比如说费用问题。”

他完全看不到问题的关键。“但是，妙处就在这里，汉弗莱。这样做可以赚钱！我们把南方那些昂贵的大楼都卖了，搬到北方便宜的大楼里去。在伦敦周围还可以高价出售几十万英亩的土地。”

“您这就认为就业部大臣干得很出色？”

“是啊，他的确不赖。”使我奇怪的是，汉弗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喔，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他聪明极了。他很出色，是个难得的人才。

脚踏实地，又有铁腕，无疑是个干大事的人。”

我倒并不认为他有这么好。事实上，我奇怪的是汉弗莱竟会对他如此推崇备至。我就这么说了。

“可他是好样的，”汉弗莱坚持说。“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是这么看的，”我说。我不是早就说了吗？

“的确是，”汉弗莱倒乐了。“他也很得人心。”这一点我倒闻所未闻。“是吗？”

“喔，是的，”汉弗莱告诉我说。

我想再了解一些。“不见得那么得人心吧，是吗？”

汉弗莱点头不语，眉毛微微一扬。他似乎对达德莱如此得人心也略感惊讶。“喔，他很得人心。我觉得在怀特霍尔街，在议会党里，他都左右逢源。”

我想了一想。只怕他是对的。达德莱在议会党内**的确**很得人心。

“据说普通议员也和他相处不错，”汉弗莱补充说。

“是吗？”

他点点头，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

“似乎在内阁，他也很有一批追随者。”

在内阁有追随者？这怎么可能？在内阁不是只有我才拥有追随者吗？“说下去。”我感到很好奇。“请坐。”

汉弗莱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但是似乎并不愿再往下说。“实在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人们开始在谈论他当下一任首相的事了。”我吃惊得跳了起来。“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汉弗莱小心翼翼地说，“当然，那是在您决定隐退的时候。”

“但是我并没有计划要隐退啊！我还刚开始干呢！”“对极了，”他故弄玄虚地回答说。

我踌躇了片刻。“可为什么，”我终于问道，“人们会谈到下一任的首相？”

“我肯定这只是一般的猜测，”他漫不经心地排解道。

汉弗莱这么说说当然容易，可叫我怎么能肯定呢。“你觉得他想当首相吗？”

突然，汉弗莱似乎变得警觉起来。“即使他想当，您当然也不会怀疑他的忠诚吧？他总不至于有意在培植一批他个人的追随者吧？”

“他不至于吗？”

“他至于这么做吗？”

我苦苦地想了一会儿。“他倒是花了不少时间周游全国，到处发表演说。”

“那也只是作为一位忠于职守的大臣去游说的。”汉弗莱干吗那么热衷于为他辩护？“我肯定在他所有的演说中，他都表达了对您个人的敬意。”

我们四眼相对，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是这样吗？”我问道。我从来也没去检查一下。我要伯纳德把达德莱近的六次发言稿给我找来。要马上！

我们静静地等着。我既然已从这方面来考虑，脑中倒出现了一个念头：达德莱在下议院的茶室里花相当多的时间去和后座议员们闲聊。

我向汉弗莱提到这一点。他设法想叫我放心。那是您自己要内阁成员们去和下议院的人们不厌其烦地多作交流的呀。”这倒是真的。“可他还和他们共赴晚宴。”

“喔，”汉弗莱显得阴沉起来。“是吗？”

“是的，他就是这样做的，”我斩钉截铁地说。“这就叫人不放心了。”

好像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伯纳德回来了，他说就业部打了回电来，说在今天晚些时候或明天以前，我们拿不到达德莱的发言稿了。一到手我就要看。同时，我也不去为此担心。幸亏我又不是妄想狂。我有汉弗莱这样的人做我的内阁秘书真是件幸事，他在让我知道事实真相方面从不退缩，即使事情本身很令人沮丧，他也从无顾忌。

7月5日

我睡不着了。达德莱的这件事确实令人担忧。我对安妮[\[12\]](#)说了这事。她却自以为是地说她肯定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知道什么？

今天，第一件事，我就翻阅了达德莱近六次的发言稿。正像我怀疑和害怕的，里面竟找不到他个人对我表示敬意的话。真的，一个字都没有。

我请汉弗莱来作密谈。他跟我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达德莱竟会连一句对我表示敬意的得体的话也不说。

“当然，”汉弗莱问道，显然他也感到迷惑不解当然他总会谈到新的首相给英国带来新的希望吧？《新时期的黎明》，您知道，就是那份您让党部向议员们和各选区散发的小册子？”我摇摇头。“只字未提？”

“这倒怪了。”

“不仅是怪，”我说。“这很可疑，非常可疑。”“即使如此，首相，他总不会在故意阴谋反对您吧？”

我不敢肯定，“他不会吗？”

“他会吗？”

他思虑万千地摸着下巴。“您总能弄清楚的。”

“我能吗？”

“秘书长总该知道的。”

当然，汉弗莱是对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要伯纳德立刻去找秘书长来。运气不错。秘书长正在十二号[13]里。我们叫他把手上的事放下，马上就过来。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说[14]：

我的责任是去迎接秘书长并把他带进内阁屋内。所以当汉弗莱爵士离开首相的时候，我赶上了他。这时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咀嚼他的猎物——当然，这只是比喻的说法。我急于想知道这场明目张胆的阴谋的细节。

我在内阁屋外的大厅里叫住了汉弗莱。在那儿我还可以一面看住十号的前

门！

“汉弗莱爵士，”我说，“我对听到的这一切深感不安。”

他倒是洒脱而兴趣盎然地看着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解释说，我觉得我一直是闭着眼睛在走路。我从没意识到竟有一场反对首相的内阁阴谋。

他把双眉一扬。“有阴谋？”他问道。“这多有趣儿。”

“您不是说有阴谋吗？”我说。

他说，“我什么也没说，伯纳德，什么也没说。”

很快，我的脑子进行了回忆搜索。我意识到他倒的确什么也没说。那么……他说了什么呢？当然，他总说了什么的，即使是没什么的什么。可总不会真的什么也没说，或者是，他为什么什么也没说？

我为哈克也得刨根问底，我决定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归根结底，不管是多么的难得，汉弗莱有时也会直截了当地回答的。“那么……您是否说……您知道有一场阴谋？”

“不。”

这好像是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可是

不，我得弄弄清楚，

“不，没有阴谋，还是不，您不知道有阴谋？”

“的，”汉弗莱有问必答地说。

我决定另辟蹊径。“汉弗莱爵士，”我谨慎地说，“就业大臣究竟干了些什么？”

“至今，还没什么，伯纳德。我们必须这么说。”

我看出来他是在指这份计划，而不是指阴谋，或是阴谋之外的东西。但是，突然，我想到了。我一直没弄懂为什么汉弗莱爵士那么急于说就

业大臣深得人心。现在我明白了；在这场球赛中他踢的是人，而不是球。

那么我偏来踢球。“就业大臣的计划不是很好吗？”

“对谁好？”

“对国家好啊！”

“可能是的。这又不是关键。”

“为什么不是？”

汉弗莱很生气地看着我。“伯纳德，你从这儿出去以后，想上哪儿？”我认为这是他的威胁。我吞吞吐吐地说我还不大清楚。

“做个负责国防贷款的国务大臣，你看怎么样？”

这建议叫我大吃一惊。国务大臣可算是位高爵显。再也不必愁没有骑士风度了。国务大臣是高等阶层的人，他们的名字是印在名人录里的。一般来说，如果汉弗莱想威胁我，他会提出让我去战后丧事料理办公室或是去斯旺西的汽车执照颁发中心。那么，如果他不是在威胁的话，他又是想干吗呢？我等他说下去。

“你可去森德兰德做这项工作。或是去贝瑞克。或是给你洛赛茅斯。”

他是在威胁我。我立刻就看出就业大臣计划的缺点了。我当然不愿意离开伦敦去森德兰德或是贝瑞克。这些地方都在北部！

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提到洛赛茅斯。“这是个地方吗？”我问汉弗莱。

“你想这会是什么？”

“是狗食。”

汉弗莱威胁性地一笑。“如果就业大臣得逞的话，你就要吃三年的狗食了。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这计划对国家也不可能有利。对内政部不利的计划不可能对国家有利——这本身就矛盾了。但是我仍不明白，既然这一阴谋并不存在，汉弗莱为什么还要派人去请秘书长来证实。

我们还站在十号的大厅里，这地方来往的人很多。汉弗莱小心地环顾一下四周，以防我们的谈话被人偷听。然后，他向我解释了一些我以前从不理解的事。

“伯纳德，秘书长肯定会为自己设防的。他不敢明白地说没有反对首相的阴谋，以防万一是红阴谋的。即使秘书长什么也没听说过，他也一定会说 he 也有怀疑，这才能保护他自己。他还会说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会答应去作紧急调查。”

就在这时，秘书长，杰弗里·皮阿森从正门像张开帆的船，在宽宽的过廊里向我们驶来。我用眼色向汉弗莱暗示他的到来，他转过身去向他热情地招呼。“啊，早上好，秘书长。”

“早上好，内阁秘书。早上好，伯纳德。”

我请皮阿森等在私人秘书办公室

里。我想确证一下我和汉弗莱爵士观点都已一致了。

汉弗莱指示我去见杰弗里——这事我总会去做的——并要我把一切都向汉弗莱爵士汇报——这事我原来倒并不会做的。

“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做。谈话可能是机密的。”

汉弗莱不同意。“现在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防卫和政府的稳定。”

“但是您只需知道‘需要知道’的事。”

汉弗莱不耐烦了。“伯纳德，我需要什么知道一切。否则我怎么知道什么需要知道，什么不需要知道呢？”

我倒从没想到这点。至今为止，我还一直以为内阁秘书需要知道什么是由别人来决定的。我决定就这么说出来。

“那就是说，您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也照样需要知道。您需要知道这些事并不是因为您需要知道，而是因为您需要知道您是否需要知道。即使您不需要知道，您还是需要知道，这样您才知道您并不需要知道。”

“是的，”汉弗莱说。总算有了直截

了当的回答。他感激我帮他把问题解释清楚了。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秘书长杰弗里·皮阿森十分钟以后就来到了内阁屋。他有点闪烁其词，但在谈话中，他很清楚地表明某种形式的领导权之争的确是有的，要么就是由达德莱为首的，要么就是利用达德莱出头的。

他的问题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他不敢提议把此事披露出来。

我是宽大为怀的。不管怎么说，内阁里总得有胸怀抱负的人，这是需要的。只要他们别太野心勃勃就行了。

我很感激汉弗莱让我注意到这一点。他真是个好人，是个忠心的仆人。

（杰弗里·皮阿森的叙述与此不同。我们从他的风格独特的回忆录《浅尝即知》中摘录下来印在下面——编者。）

十号给我打来了紧急电话。哈克要马上见我。他的私人秘书伯纳德·伍利不肯告诉我原因。

我自然以为我做了什么使他不快的事。所以我是步步为营地走入内阁屋

的，边上还有伍利。早晨的阳光从窗外直照进来，阴影和光斑构成了图案。

哈克先生坐在背阴处。“情况怎么样，秘书长？”

我当然得小心，虽说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告诉他情况都很好，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问！

“你是说，你没注意到什么？”

那么，我是该注意到什么的啰。什么呢？我不明白，我没注意到什么。什么特别的事也想不起来，虽说在那些不安份的后座议员之中有过一些小麻烦。但是在那些不太安份的后座议员中小麻烦是从来不断的。除非是，后座议员很不安份地造成了大麻烦。

（“在不太安份的后座议员之中有过一些小麻烦”被算命的称作为引子：这些话总是错不了，说说无妨。算命人的引子可以是：“你在十三岁的时候有个小小的难关。”大夫们的引子在他无法诊断时就会是：“我看你好是把烟戒掉，再稍微减减肥”——编者。）

“有没有什么事你不曾告诉我的？”首相问。

我急速地绞尽脑汁。他提示起我来了：“一场阴谋？一场领导权之争？”

我可什么也没听说过。可是我不能这么说，因为哈克显然已有怀疑。甚至可能他已有证据了。我还是安全一点，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你有怀疑？”

我不能说我没有……我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怀疑的。“怀疑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我谨慎地说。

“那么，事情是怎样的呢？”

这一招真厉害。“吉姆，”我以坦诚的方式回答说，“把我的怀疑都向您直言是不对的。除非确实有事已具端倪了。”

“可是你总知道我在说谁吧？”

我一无所知。“我想我可以猜一猜，”我说。

哈克还在背阴处。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他叹了一口气。“这事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他终问道。

我还在苦思冥想此人该是谁。我有一点可以肯定——情况尚不严重，否则我当然也早知道了。至少，我认为我当然会知道。

他在等我说出叫他安心的话。我说

了。“只是在初级阶段。就我所知！只是这样。”我依旧非常真诚。

“你是否认为该和他谈一谈呢？”首相这样问我。“告诉他，我都已知道了，我不想在内阁里失去他。我只是要他控制一下。”我不明白在连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和他去谈一谈呢，

“可能您得亲自去和他谈一谈，”我谨慎地回答说。

他摇摇头。“不，现在不行。”我等他往下说。

“还有谁参与了？”

我看到机会来了。“除了……？”

首相发起火来了。“除了达德莱，当然啰。”达德莱！达德莱？难以置信！达德莱！！

“喔，除了达德莱，现在还很难说。总之，首相，还不一定有事呢。”首相站起身来。他从眼镜上面朝我注视着。他看上去很瘦，很累，也很沮丧。这份工作真使他大伤元气，他只干了一年都不到。“杰弗里，我不想冒险，”他静静地说，

我看得出他是认真的。我离开了内

阁屋，我安排所有的秘书都去作调查。这是首要的大事。无论如何，只要确有阴谋，我得知道一切细节。

（杰弗里自然想在阴谋刚冒头时就粉碎它，这才能使他安心。当然，这是说如果确有阴谋的话。如果他做不到，那么趁早改变立场，这倒也能叫他安心。）

（两天以后，阿普尔比的前任，前内阁秘书阿诺德·罗宾逊爵士收到了一封汉弗莱爵士的信。这是在信息自由运动的档案里发现的。何诺尔德爵士是这场运动的首领。自然信是保密的，一直被封存着。但在《三十年规则》的允许下，信息自由运动的档案近向历史学家开放了——编者。）



75 WHITEHALL, LONDON SW1A 2AB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and Head of the Home Civil Service

July 6th

Dear Arnold,

You will have heard in the programme about the Employment
Secretary plan to move many of our armed forces establishments
to the north.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the Plan is in
favour of the plan:

1. It will reduce unemployment.
2. Alternatively, it will look as though he is reducing unemployment.
3. At the very least, it will look as though he is trying to reduce unemploy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he is only trying to look as if he is trying
to reduce unemployment. This is because he is worried that
it does not look as if he is trying to look as if he is
trying to reduce unemployment.

Consequently, the Pla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the plan many



内阁办公室

亲爱的阿诺德：7月6日

你可能也风闻有关就业部大臣把部队调往北方的建议。首相支持这计划有三个原因。

1. 它能降低失业率
2. 也可以让人觉得是他降低了失业率。
3. 至少，人们会觉得他在设法降低失业率。

事实上是：他只是设法显得是在设

法降低失业率。因为他担心看上去不像他在设法显得他是在设法降低失业率。

奇怪的是，首相已开始怀疑这份建议可能是就业部大臣争夺领导权的开始。

当然，这种想法很荒唐。但是，职位越高，政治狂想症的级别也越高。然而，无疑这是出于国家利益。这份计划还未付诸实施。如果报界透露出消息，暗示就业部大臣的这份出台的建议受挫于首相的话，首相的狂想无疑会加剧。

我们必须虔诚地希望，不今有这样的消息透露出来。您对此有何高见？

您忠实的
汉弗莱

（几天以后，阿诺德·罗宾逊就写了回信。我们在信息运动司令部里找到了信的副本，但是我们有幸在阿普尔比文件中找到了原件——编者。）

**The Campaign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1 Eastleigh Street, London WC2E 8NH
Telephone 01-275 0885



July 07

Dear Humphre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A leak of the sort
you sugges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result in some awkward

I cannot see, however, how such a leak can occur.
You as Cabinet Secretary cannot be party to a leak.
And although, as President of the Campaign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 have an undoubted duty to make certain
facts available, I do not see in all conscience how I,
as a former cabinet secretary, can giv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o the press.

Yours ever,

Arnold.

亲爱的汉弗莱：7月9日

谢谢您的来信。您所提及的那种消息的透露几乎肯定会使人翻船落水的。

然而，我不明白这种透露消息的事是怎么才会发生的。作为内阁秘书，您是不能参与其中的。虽然，作为信息自由运动的主席，我无疑有责任提供某些事实依据，但是，作为前任内阁秘书，如果把保密的信息提供给报界，我在良心上何以自安。

您忠实的
阿诺德

（一封由信使递送的回信显然是给阿诺德·罗宾逊爵士的——编者。）



亲爱的阿诺德：7月10日

我做梦也不会想让您给报界提供保密的信息。我指的是保密的假消息。

您忠实的
汉弗莱

（阿诺德爵士立即回了一封简短的信——编者。）



亲爱的汉弗莱： 7月10日
我欣然从命。

您忠实的
阿诺德

7月11日

我现在完全相信一个肮脏的阴谋在我的背后
已酝酿成熟了。

好一个反叛的、忘恩负义的、阴险的阴谋
啊！我决不能容忍。

我跟秘书长说了，他说尚无确凿的证据，但

是他怀疑到了。他说他会去调查的！在他拿到真凭实据以前，拒绝对我说出他的看法。我把这看作是同意有这场阴谋的证据。

我今天和汉弗莱讨论了这件事。他对达德莱竟会反对我表示了吃惊。“我总以为您的内阁全都忠贞不渝。”有时候汉弗莱的轻信和天真使我大为惊讶。忠贞不渝？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内阁秘书所说的忠贞不渝意味着什么。这只是表示他对失去职位的害怕远胜于他想对我取而代之的希望。

“这么说，”汉弗莱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您相信就业部大臣的双眼已盯住您首相的座位了？”

“是的。”我坐回到椅子上。“但是，看看我从这座位上得到了什么？”

汉弗莱并没领会我的戏言，他只是评论说忠诚是集体负责制根本的要求。

他难道没注意到集体负责制早就过时了吗？集体负责制就意味着，当我们做成了什么深得人心的事的时候，他们都透露出去说，这是他们的主意；而当我们做了不得人心的事的时候，他们就透露出去说他们本来就反对此事。这个国家是被集体不负责任的原则统治着。

“您曾是内阁大臣。”汉弗莱似乎在悄悄地提

醒我。

“那可大不一样，”我提醒他说。“我是忠诚的。”

“您是说，您更害怕失去您的职位……”

“不，汉弗莱，”我打断他说。“我是真正的忠诚。”

汉弗莱问我为什么我的同事们那么想得到我的职位。解释是很简单的：我是政府里唯一不会在明天被派往北爱尔兰的人。

“即使如此，”他说，“我还是很难相信就业部大臣会故意阴谋反对您。”

我对他说这是很明显的。我问他还需要什么证明。他想了一会儿。

“喏……”他开始说，“这份把部队调往北方的建议一定会向报界透露的，您说呢？”

“一定会的，”我也同意。“可是很奇怪，现在并没有透露出去啊！”

“那么，如果有消息透露说这份建议是就业部大臣提出的，我就认为这证实了您的怀疑。但是我肯定，消息只会说这是政府的计划。”

他说得对。这是好的试金石。我将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

7月12日

汉弗莱对达德莱的忠诚真是坚信不疑。《标准报》今天刊载了我们等待的消息。这是这个不忠的臭猪对我磨霍霍的明证。



伦敦晚报

标准报

星期四，7月12日

哈克打击无业的人们 彼得·科斯顿
报道

怀特霍尔的报告透露：就业部大臣
达德莱·贝林提议的一份降低萧条地区失
业率的大胆的计划被首相阻止了。

他怎么敢这样？他怎么敢？？

是汉弗莱给我看的报纸。我真是怒不可遏。我对汉弗莱说，我一直是多么地支持达德莱，我告诉他，我为了他的这份倒霉计划左右出击。我告诉他，我是怎么把这内阁的职务给他的，我是把他当儿子一样地信任他。我说，而这就是他对我表示的感谢。我无话可说，彻底地无话可说了。

汉弗莱愁云满面地点点头。“与忘恩负义的内阁成员共事比被毒蛇咬一口更致人于死地。”

你还能说什么呢？无话可说。“这是妒嫉，”我说。“达德莱被妒嫉之火烧毁了。”

“这是达德莱的七罪之一，”伯纳德说，他是想缓和一下气氛的。我瞪了他一眼。

汉弗莱总好像是智慧之源泉，他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措施：我们起草一封接受他辞职的信。

可是这个主意也有几点不利的因素。达德莱会否认是他透露的消息，那样的话，我让他辞职就师出无名了。如果我不管青红皂白地仍把他辞了，后果会怎样呢？他在内阁的后座就会对我更为危险——解雇的大臣连装作忠诚都不必要了。

“那么，”汉弗莱问，“您就准备对他的计划听之任之？”现在这计划我也无法接受了。一旦报界说是我阻止这份计划的，我当然不可能再让它

出笼——否则不成了他打败我了吗？很遗憾，我必须放弃这计划，即使这计划再好也不行。至少，我认为我必须这么做。

我对汉弗莱说了我的难处。

“首相，您不会优柔寡断吧？”

“不，”我说。他看看我。他知道我没说实话。“是的，”我承认了。然后，我又想：我如果优柔寡断的话就完了。“不，”我咆哮起来。接着，我意识到我把问题说得太清楚了。“我不知道，”我虚弱地说，把头埋在两只手中间。我沮丧极了，浑身乏力。我的精力都在对付阴谋和反叛中消耗尽了。

他提供了帮助。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帮助。但是他从搁在腿上的

档案中抽出几份文件来。“从技术上来讲，我不该让您看到这个。”

“为什么不该，我是首相，不是吗？”

“是的，”他解释说。“所以我本不该让您看这个，这是国防部的内部文件。绝密的。国防大臣还没看过呢！”他把文件放在桌上。“但是您看，这文件对就业部大臣的计划深感怀疑。”

我对读这份文件很感兴趣。妙极了。第一部份指出：达德莱所说的许多“价格昂贵的”部队大

厦根本不能卖。有一些是上了国家规定的名单的拍[15]。另一些是受严格的计划控制的。还有一些不符合消防设施和安全规则的条文。这一切都说明，这份调防计划的开支已经来源枯竭了。

第二部分说明这项计划将在伦敦附近和东安吉利亚造成严重的失业。在北方能造成的就业机会还抵不上在南方造成的失业。

在第三部分，这是我今晚在床上看的，连篇累牍的都是战略上反对这计划的理由。

明天我将进一步盘问汉弗莱。

7月13日

今天一早见到汉弗莱，我就仔细盘问了汉弗莱有关国防部的文件的内容。“文件所讲的是真实、精确的吗？”

汉弗莱显得闪烁其词。他说问题在于怎么来解释。如果我们看看这报告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在就业部大臣泡制这份计划前，他就知道这些反对意见了。汉弗莱还补充了一点很说明问题，整个计划可能跟达德莱代表的新堡市选区不无关系。

这原也没逃过我的眼睛。（这样的话，哈克从没提起过这事倒有点怪了——编者。）

“公众，”我说，“有权知道这一点。”

汉弗莱摇摇头。“这是绝密的文件。”我只是注视着他，等他说下去。“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继续说，“军官们在不慎泄密方面倒名声不佳。”

“名声的确不佳，”我同意他的说法。

“很可以使这一点捅到某个不负责的记者那里。”

“这行吗？”我满怀希望地问。“或是几个不负责任的记者？”汉弗莱觉得这样的结局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然而，我明确表示，即使这样做至少能让公众明白真相，我在这种事情上是不能参与的。汉弗莱完全同意，我不能插手这种透露消息的事。

我们同意把对这份计划的讨论时间不定期地向后推。（那就是推翻了这份建议——编者。）同时，汉弗莱爵士着手透露消息一事。

他走了以后，伯纳德转身向我走来，他有时候会很迟钝。“他什么时候把消息透露出去？”他问。

我大吃一惊。“我要人去透露了吗？”

“您并没有……”他支支吾吾地说。“没有，首相，您没有。”

“我确实没有，伯纳德，”我强硬地说。“我从

不透露消息。我只是偶尔把保密的简报给报界看。就这些。”

伯纳德笑了。“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动作，不是吗？我提供保密的简报，你去透露，根据官方秘密法案第二款 a，他已被起诉了。”

7月18日

直到今天为止，一切进行得像上了发条。两天前，几份报纸刊载了一条消息，虽然来源皆不明，但却有效地击溃了达德莱的计划。

所有的要点都提到了——国防部在伦敦地区的那些价格昂贵的大楼上得不到好处！害怕在北方没有产生多少就业机会，在南方倒造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还有就是军事上战略上的反对这份计划的理由。至少其中有两条消息提醒读者，达德莱自己就代表东北部的选民区。

电视新闻把这些全播出了。（八十年代的电视新闻几乎从没有自己采编的消息——编者。）

但是今天一切都反了个个儿。我惊恐不已地看到《卫报》第一版上的漫画。



卫报

星期三 7月18日

曼彻斯特

达德莱·贝林声称有人陷害他
就业部大臣否认透露过消息。

戴维德·透报道

达德莱·贝林，就业部大臣，昨天否认上星期曾向外界透露过他的计划的细节，而那透露的消息说政府正考虑把我们的一些军事基地调往失业率很高的中心。

达德莱先生还声称内阁支持他的计划，也包括首相吉姆·哈克。但是这消息的透露又引起一系列消息的透露，这对

他的可信度和他的政策大有损害。昨晚他生气地对记者讲了话，并要求作出调查。

一早就开了内阁委员会。汉弗莱和伯纳德在内阁屋等我。他们向我道了早安。我对他们说这个早上并不好。他们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他们也读了报了。

“达德莱对报界谈了关于新近的透露消息的事，”我说。

“真叫人吃惊，”汉弗莱爵士说。

“他说他什么也没透露过，有人想陷害他。”

“真叫人吃惊。”

“他要求作出调查！”

“真叫人吃惊！！”他又喃喃地说，这一次有点真情。伯纳德却叫人奇怪地缄口不语。

“你可以认为他会明智起来的，”我继续说。“不管怎样，泄密调查从来查不出究竟是谁泄的密。”

“但是我们知道是谁泄的密，首相，”伯纳德插嘴说。“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是您要我去……”我瞪了他一眼。“伯纳德，我希望，你总不是想说，是我授权给人去泄密的吧？”

伯纳德犹豫起来了。“不，我……那是……是的，但是……我是说，我现在记起来了。对不起。”

我必须弄明白。“你记起什么了，伯纳德？”

“嗯——您想要的事，首相。”

“我想要的是让公众看到在内阁里是不分派别的。”

“可是明明是有派别的，”伯纳德说。“我不想再成倍地分派，”我解释说。

“首相，如果您成倍地分派，结果就都成不了派。”我看不出他想要说什么。毫不耽搁地，他继续解释起来：“你不断成倍地分派，终都成了单个，那还有什么派呢？当然，除非，你再把单个……”

“谢谢你，伯纳德，”我坚决地说。他这样咬文嚼字可怎么来干这份工作呢？委员会的人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考虑好各个策略。

我解释了我的计划。

“汉弗莱，我还想把就业部大臣留在内阁。还有国防部大臣迈克斯，但是我不能让这场争吵再继续下去了。我不允许让人觉得我是被就业部

大臣击败的——我不能冒此大险。因此，我们必须让这份计划流产。”

汉弗莱看着自己的鞋尖在动脑筋，然后提出了一个三要点计划。

“我建议您让委员会同意这三点：首先，他们同意接受内阁的集体决定。第二，要有一个不作进一步讨论的冷处理阶段。第三，以后的发言和报刊消息都要经过内阁办公室检查。”

好啊，我看这个计划很好。我立即就明白了。但是会议一开始，达德莱就对议事日程提出异议。

“对不起，首相……在次序上讲，我看到我那调防计划不在议事日程上。”

我告诉他这是对的。他问为什么。我解释说因为现在有一系列的泄密行为，这后果十分严重，政府让人觉得是四分五裂的。

“是四分五裂的，”达德莱说。

他有时很固执。“所以才不能让人感到是这样，”我解释说。我补充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暂时想推迟对此事的讨论。达德莱很感不解：“我不能理解。上次您还是赞成我的计划的！”我不能允许达德莱或其他人作此断言，即使事实是这样也不行。“不，我没有，”我说。

也许，我倒是应该承认我曾赞成过，尽管现在我是反对的。但是简单地作个否认要方便得多。

达德莱瞪眼看着我，好像我在说谎似的。
(哈克就是在说谎——编者。)

“您曾赞成过，”他重复说。“人人都赞成，只有国防部大臣例外。”

“不，他们没有，”我说，现在很坚决了。

“是的，他们赞成的！”达德莱可不放我过门。“您还答应进一步讨论的。”

这完全是事实。我正不知说什么是好的时候，汉弗莱插了进来。我记不起他说什么了，但是他拐弯抹角的对前次会议细节的解释省了我一天的事。

接着我们继续讨论汉弗莱的三要点计划，但不知怎么搞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竟让达德莱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原来只是想订一份妥协性的计划，可现在不知怎么竟成了后通牒。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竟对达德莱说了，他必须考虑自己的地位。(这就是说，要就是合作，要就是辞职——编者。)

我恐怕我们得失去他了。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汉弗莱和我一样困惑。

伯纳德·伍利爵士的回忆[\[16\]](#)：

那次会议是汉弗莱爵士策略的全面胜利。他一直以来就想把就业部大臣从内阁赶出去，因为他把这看作是能免除成千上万的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员充军到伯明翰以北地区的唯一良策。

汉弗莱对此结果毫不感到困惑，因为这原就是计划好的。我并没有在他的预谋中插手，但是我对这件事中精密的计划和果断的行动大为赞赏。

在开会前，他提出了三要点计划作为一种妥协，而其实他很清楚，这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哈克声称他立刻就理解了这计划，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如果他真懂这计划的话，他就能看得出它的全部含义，他就会立即加以拒绝。其次，他头脑中乱成一团，根本就记不住计划的内容。当委员们进来的时候，哈克正在没法回忆。

“你的三要点计划，汉弗莱，提醒提醒我。”

“您请他们，首相，赞成三个要点。第一，他们同意接受内阁的集体决定。第二，要有一个不作进一步讨论的自然冷处理过程。第三，所有进一步的

发言和报界的消息都要经内阁办公室审查。”

“妙极了，”哈克说。“就该是这样。第一点，他们得冷却……呃，不，不作毫无决定的进一步讨论，或是不讨论而作决定，第二点是什么？集体的报界声明……对不起，汉弗莱，看来我还不清楚。”

他的情况真是糟透了。他什么都记不住。他就像是一只可怜巴巴地在拍打着翅膀的没头鸡。汉弗莱愿意为他写下这三要点计划，哈克很高兴。

可是，达德莱·贝林马上就对议事日程提出异议，这一点上，哈克没有说错。达德莱提醒首相，他上次曾是支持这建议的，哈克也曾接受达德莱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再来讨论这事。

哈克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汉弗莱来救驾了。“并无此诺言，”汉弗莱爵士说，又一次精简了事实。“首相也没有支持这建议。如果他支持的话，会议记录上是会有这一笔的。可是现在没有啊！”

达德莱被击败了。“没有吗？”他把会议记录急速地翻了一遍，这会议记录

是当时大家都点头同意的——为了精确起见都还签了名的。他当时没仔细读一遍真可谓是大大的失策。

他抬起头来，心中更感愤慨。“汉弗莱爵士，为什么我要求进一步讨论和首相的回答都没在记录里记下？”

汉弗莱心中早有对策。他的回答倒不啻是给人上了一堂客观教育的课。我至今记忆犹新。“虽说会议记录确实是委员会讨论的权威性的记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把每一个发言、建议和插话都无所不包地记录下来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文件显得过份详尽，并变得令人生厌地见长不堪。”

哈克注视着他。全体委员注视着他。外交大臣后来对我说，他当时真希望是在联合国里，因为那里他可有同声翻译来帮忙了。其实他说的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可是政治家们都是头脑简单的。

后哈克满怀希望地说：“你是不是说，你记不起有这场讨论了。”汉弗莱爵士的回答真叫人折服。“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的特点就是：每一个成员都能记得清楚，但是各人的记忆偏又大相径

庭。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传统的做法，正式的决定就只是那些由官员正式记录下来的会议记录，也就是说，任何正式作出的决定都在会议记录里正式记下来，而在会议记录里没有的决定就不是正式通过的，即使是有几位成员相信他们记得是有此决定的也没有用。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如果这决定确是正式通过了的，官员会把这在记录里正式记上的，否则的话，”他大获全胜后来个急速收场，“没记录就是没有通过。”又一次停顿。达德莱气得冒烟了。“这是作弊，”他咆哮起来。

哈克坚决地插话了说：“该停止了！”

“是该停止了！”达德莱厉声说，我心里明白他们说的是两回事。

哈克主动进攻：“我起草了三要点计划，我们必须通过一下。第一点……呃，你是怎么说的，我是说这第一点我是怎么说的，汉弗莱？”汉弗莱默不作声地把放在椅子之间的地上的薄薄的文件包的拉链拉开，抽出他手写的三要点计划，把它放在内阁会议桌上离首相几寸的地方。

“谢谢你，”哈克说，“第一点，每个人都得接受集体的决定，达德莱。”“我很愿意，”达德莱小心翼翼地说。“但集体决定的定义怎么下？”他真行。他知道什么是该弄清楚的。

“由我来下！”首相生硬地说。“第二点，有关调防问题，该有一个自然冷处理的过程。第三点……”

他犹豫起来了，我们都在期待着等他说下去。而他却探身向汉弗莱爵士，轻轻地说他不大能读出第三点。“清查什么？”

“检查所有的发言……”内阁秘书在他耳边说。

“啊，是了，”首相大声地说。“所有的发言和报上的消息今后都要经内阁办公室检查。”

表面上看起来，第三点好像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它能防止内阁成员们发表令人发窘的互相矛盾的言论。但是它还有一个优点——它使汉弗莱爵士负责和报界联系。

达德莱一眼就看穿了。“我不能接受第二点，由于官员们拒不记录，或是疏忽了而没有记录我对进一步讨论的要

求，问题至今尚未讨论，连今天的议事日程上也没有，我们怎么能让它就此冷却了呢——即使是您首相同意的也不行。至于您的第三点，在原则上我不能同意，我所说的一切话都要经过他的检查。”他指了指汉弗莱，显然是不愿提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我不相信，”达德莱总结性地说，“他有什么能力检查我要说的话。”

哈克参加了进来。“可是，这是我的决定，我必须请你接受。”

“我不接受。”达德莱拒绝和解。

“喔，”吉姆说。他偷看了汉弗莱一眼请求指示。汉弗莱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吉姆愁容满面地点点头，转身对着他的就业部大臣。

“那么，达德莱，”他神情肃穆地宣布：“我必须请你考虑你的地位。”在场的人都明白达德莱的事业到此为止了。

7月19日

今天早上我正坐在我的书房里，心里抱着最美的希望准备迎接坏的结局。伯纳德敲门进来了。

“我给您带来了消息，首相。”我朝他看了

看。但是从他脸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等他
说。

“您先要听坏消息吗？”他问。

我竖起了耳朵。“你是说既有坏消息又有好消息？”

“不，首相——有坏消息和更坏的消息。”

这原是很容易预料的。达德莱辞职了，他递上的常规式的信，比通常的这类信更简单。伯纳德给我起草了一封信让我签名。汉弗莱和新闻发布办公室正在为我起草一份声明。

我想和汉弗莱谈一谈。我要伯纳德去请他来。但是伯纳德却先告诉了我更坏的消息：显然达德莱是在就业部门前作了辞职报告，指责我独断专行，在政府内实行总统式的统治。

开始我认为伯纳德有理由郁郁寡欢。但是实际上情况并不那么糟：我想达德莱对我的指责利大于弊。人们喜欢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我向伯纳德解释了。

他马上就明白了。“喔，确实是的。何况，强有力的领导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乐趣。”

“不，那倒不是，”我很快地回答。

“对，那倒不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这时汉弗莱来了。我和他不必咬文嚼字。我提醒他，我一直想避免发生他辞职的事，我现在意识到——太晚了——是他的三要点计划促成了他的辞职。

汉弗莱还有别的惊人的消息。他也认为他的三要点计划是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可是，”他补充说，“我认为，无论如何，就业部大臣在一两个月内总是要辞职的。”

“是吗？”我大感惊奇。“为什么？什么时候？”

“在秋季预算公布的那一天，”汉弗莱披露说。“因为预算中的给他的钱不足以应付解决失业问题。”

我被震’惊了。因为秋季预算而辞职才**真**是一场灾难。这会使得达德莱大得人心。实际上我越想越觉得我一切都处理得很好，简直很出色。我现在是迫使达德莱按我的意志为了行政上的问题而辞职，不是按他的意志为了重要的政策问题而辞职。不管是在选民中或是在后座议员中，没有人会支持他，因为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辞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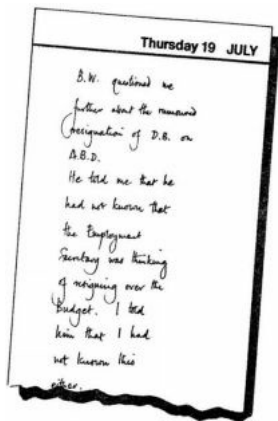
我把这向汉弗莱解释了，他立刻就同意说，我把整个事情处理得很有大将风度。

（奇怪的是，吉姆·哈克从不怀疑汉弗莱·阿

普尔比爵士披露几周后就就业部大臣要辞职的说法。可能因为这使他可以把失败看作是胜利。

伯纳德倒是注意到这消息来得好容易，他不明白这消息从哪儿来的。

那天晚些时候，他和汉弗莱爵士私下谈到了这件事。谈话的主要的内容记在阿普尔比的私人日记里——编者。）



7月19日 星期四

伯纳德·伍利进一步问起有关达德莱·贝林将在预算公布那天辞职的传言。

他告诉我说，他并不知道就业部大臣要为预算的事而辞职的一说。

我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有此一说。他似乎很奇怪，问我这是不是真的。

我想对他把这事澄清一下。我解释说，我并没说这是真的。我只是说我**认为**这是真的。我误解的可能总归还是存在的。

伯纳德·伍利对我刨根问底：“那么说，您不知道这是真的？”我解释说，同样，我也不知道这不是真的。这可能是真的。

伯纳德说什么事都可能是真的。我为他终于抓住要领而向他道贺。但是我说得太早了。伯纳德仍旧不明白为什么我告诉首相说达德莱总是要辞职的。我觉得这答案不是太明显了吗？为了使首相觉得好过些。

（还有，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里本该加上一笔，因为首相将不再因他想要留住的大臣辞职而批评他了——编者。）

伯纳德评论说，很遗憾，达德莱·贝林不得不走了。千真万确！但是，舍此还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那可恶的计划

呢？

7月20日

今天我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我坐在书房里看我的安抚性的新闻发布稿。这份稿子旨在针对达德莱的怒气不息的辞职报告，使我显得坚强有力，体恤下情，足智多谋，并有政治家风度。

我修改了新闻发布大臣马尔科姆的措词，现在的文字是：“他的计划正在被研究，但是，花费可能比估计的要大得多，而解决就业问题的目的**不一定**能达到。所以，我很感困惑，也很难过，他竟突然辞职了。”

汉弗莱和我在一起享用早上的咖啡，还有几块助消化的巧克力。放眼看出去，外面是骑兵仪仗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十号里，充满着温馨、安全和舒适的感觉。我为失去一位人才仍感不安，更何况一份绝妙的计划也就此流产，这计划原是可以切切实实地解决失业问题的。突然，我有了灵感！

“汉弗莱，”我轻轻地说，“即使就业部大臣已经走了，我们可以重新制订他的计划。”

起先他似乎不明白这其中的妙处。伯纳德也不知其中奥妙。他们几乎都感到惊恐不已，虽说

他们显然是应该高兴才是的——我想他们是因为我比他们头脑机敏而感到受了伤害。

“你们不明白吗？”我解释说。“我现在可以着手搞了。这计划再不存在什么弱点了，它很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是……”汉弗莱开始说了，接着他又停下来了，他被搞糊涂了，可怜的人。

“是什么？”我问。“我们又不真想丢掉调防计划，是不是？”

“不！不，当然不，我们是，呃，是……要建立你的权威。”

“对极了！”我说。

他终于弄明白了。有时候他是有点迟钝的，但是他总还是弄得明白的。

这样，一切都圆满结束了。重新制订计划可以使我**证明**我并没反对它。这也可向世界表明达德莱的辞职完全是莫名其妙的。解决了这个阴谋反对我的坏蛋，我等于是向其他人发出警告：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排除异己。“下一次内阁会议的议事日程上要讨论调防的问题，”我不露声色却很有信心地对汉弗莱说。

“是，首相，”他回答道。他思绪万千地注视着我。

[1]位于伦敦附近，是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地——译者注。

[2]达德莱·贝林，就业部大臣。

[3]爱伦·古斯瑞爵士，国防部任秘书。

[4]陆军上将杰弗里·荷华德爵士，国防部人事主任。

[5]见后面编者的注解——译者注。

[6]迈克斯威尔·霍普金斯爵士，国防部大臣。

[7]布赖恩·斯密森，环境部大臣。

[8]艾立克·杰弗里斯，财政部大臣。

[9]耐尔·希区柯克，运输部大臣。

[10]杰弗里·皮克尔，工贸部大臣。

[11]和编者的谈话。

[12]哈克夫人，首相的妻子。

[13]唐宁街十二号，离首相官邸两个门面，半分钟的路程。

[14]和编者的谈话。

[15]1971年城镇计划法案54（9）段被1977年城镇计划规则（名单上规定的建筑和保留地区的建筑）所代替，1986年法案对此作了进一步修

改，1987年城镇计划（上国家规定名单的建筑和保留地区的建筑）法规（S/1987，No.349）又作了必要的改动。根据这法规，上国家规定名单的建筑里指自1943年7月1日（1947年城镇计划法案实施）以来，建筑上有特色或是有历史性的建筑物，和那些由内阁大臣根据国家的标准，以其重要性，纳入三大等级的建筑！也就是说：等级Ⅰ，等级Ⅱ和等级Ⅲ。根据1971年法案的107段，任何改变、扩建和拆毁上国家规定名单的建筑都是违法的行为，除非符合56段和54（9）段（见73自然段）或是56（1）（a）段和（b）段，这不包括教会的建筑（见103—105自然段）。

[\[16\]](#)和编者的谈话。

2. 官方秘密

7月27日

离辞退达德莱只过了一个星期。我辞去达德莱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一直是把他当作我的老朋友和可信赖的盟友的呀！设想一下，当汉弗莱向我披露他一直在阴谋反对我时，我的怨恨和痛苦该有多深啊！

现在，只过了一个星期，我又面面临着—场对我权威的挑战——这一次却来自更叫人想不到的源头。我的前任，前任首相，交上了他回忆录的新的一章谈安全检查——必须停止出版。

今天一早，在内阁委员会上，副检察长[\[1\]](#)和他那部门的一两位低级官员也出席了。还有汉弗莱和伯纳德。

（副检察长是政府内两位高级法务官中的一位。另一位就是检察总长。罗宾爵士很出名，有些人会说他很有些臭名，因为他对他政治上的同事采用一种假装在法律上比人家清正的态度。这样，他就有了个绰号**好人伊文思**——编者。）

今天早上罗宾更是虔诚无比。“你们知道，我们已经讨论通过了第一到第七章，我看没有理由不通过第八章。”

“等一等，”我急忙说。“这一章似乎有一些很值得商榷的内容。”

罗宾显得很吃惊：“请举个例子。”

我花了半夜来考虑这事。我手头就标明有哪一页有问题的几个例子。“先说二百十一页。”

我把有问题的这页纸递给坐在桌子另一头的罗宾。他从他那半月形的金边眼镜里看我标上记号的部分，然后冷冷地从眼镜上面看着我。“这只是说行政事务大臣在内阁支持扩大赛拉菲尔德核燃料工厂的建议，可在公众场合又发言反对。”

我真奇怪他怎么会看不出问题来。“但是那是我！我就是那个大臣。”

“问题是，首相，这又不算是泄密。”

“问题是，”我愤愤不平地回敬他，“这不是真的！”

“这文章写得相当感人，”他不动声色地说。

（“相当感人”在怀特霍尔里就是指“不可辩驳”——编者。）

他的冷冷的蓝眼睛似乎因感到有趣而闪闪发光。我可看不出有什么有趣的地方。“请相信我对您的敬意，首相，”他继续傲气凌人地说，“如

果他诽谤了您，那是在出版以后上法庭的事，而不是在出版前安全检查的问题。”

我直接表示反对。“不光是有二百十一页上的问题。二百二十四页上，他用污言秽语指责我毫无理由地害怕报刊评论，而去阻止那份建立化工厂的计划。接着，在二百三十一页上还有一段跟我有关系的文字根本站不住脚。”

汉弗莱抓住机会把这段念了出来——毋庸赘言，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哈克对选票比对原则更感兴趣。他遇到不得人心的事就逃之夭夭。他提高了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却降低了他们的平均智商。””

“谢谢你，汉弗莱，我们都已读了，”我刻薄地说。我不由得感到在这张桌子的四周，人们对我的遭遇大有幸灾乐祸的味道。

罗宾踌躇了一下，接着又开了腔。他步步小心地为自己解释，

“可是，我说，首相，我一点儿也不想支持他或为他辩护，但是这实在不是一件泄密的案例。再说，第五章倒是先向报界泄漏了，而我们什么行动也没采取。”

他没弄清关键所在。“第五章对我取得库兰姆合同着实美言了一通，”我解释说。“还提到我

的电脑安全索引。”

“但是，”罗宾坚持说，“这里面很有些需保密的材料，可是您连泄密调查也没有做。”

他们都对我看，他们知道真相了吗？“谁都可能把这一章向报界透露的，”我说，尽量装成一副无辜的样子。

“谁都可能！”汉弗莱强调地说。

第五章怎么能和这事相提并论。我又回到手稿的开始部分。

“请看看这一章的标题吧，”我痛苦地叫起来。

汉弗莱又把它念了出来。“吉姆·哈克的两副面孔？”

“那总不是秘密吧？”伯纳德想让我好过些——我这么想！他看到我的眼神，立刻就沉默了。

我又发起进攻。“对不起，我看这里面就有安全方面的含义。赛拉菲尔德就和核有关。”

副检察长摇摇头。“但是能源部大臣是负责赛拉菲尔德的，他看过了这一章，他说没有问题。”

当然，他是没有问题。这一章把他描述为内

阁中有能耐的大臣。这本身对我也是一大攻击。我向罗宾指出了这点，他从法律上引经据典地回答说，他觉得对此不能采取行动。我对这种样式的阻力感到烦透了。“让我们先弄清楚这点。我们有权拒绝出版，是吗？”

罗宾点点头。“我们有这个权。可是如果他们不予理睬，仍给出版，在法律上，我的意见是，我们想通过法庭来阻止出版是无望的。”

这是一大打击。我建议，那样的话，我们就对出版商施加压力。副检察长要知道用什么理由。我告诉他是国家利益。

他又一次不顺从我！“但是我已说了，没有理由……”

我打断了他。“听着，”我尖刻地说。“这是很下流、很肮脏的丑事。不可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出版了它，而结果却损害了这个国家的领导的威信。这一章一定不能发表。对吗？”

他们都在冷冷地看着我。会议不欢而散。他们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但是他们知道该怎么去做。

（事情发展得很快。一周以后，伦敦有影响的早报《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哈克想要阻止发表他前任的回忆录中的一章。这条消息擅

自一字不漏地发表了这一章的一部分，这部分正是哈克感恼火的。）

每日邮报

星期五 8月3日

哈克企图阻止发表回忆录 却被副检察长击败

由政治组撰稿

吉姆·哈克首相在上星期唐宁街十号里一次秘密会议上，想要阻止前任首相荷伯特·爱特威尔的未题名的回忆录中第八章的发表。像通常那样，稿子曾送到内阁办公室作安全检查。

（消息在大街上传遍的那个早上九时，在伯纳德·伍利的办公室里，人们忧心忡忡地开了个会。在场的有伯纳德·伍利，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唐宁街十号新闻发布官马尔科姆·华伦。在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日记里有会议的记录——编者。）

B.W., A.W. and I argued about the story in the Daily Post. We knew that even if the P.M. had not yet read his daily press digest, he would have heard it quoted on the Today show, to which he always listens while he has his breakfast.

A.W. remarked that he had listened too.

伯纳德·伍利，马尔科姆·华伦和我谈到了《每日邮报》的那条消息。我们知道即使首相还没有读过今天的报纸摘要，在今天的《每日新闻》电视节目中他也会得知这消息了。他每天进早餐时总是要欣赏这一节目的。伯纳德·伍利说他也听到了。节目主持人已经把哈克当作一份早餐了。

我们都把这看作是很有趣的事，虽说有些令人发窘可也不致造成什么后果。除了使首相不快之外（这也不算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是，透露的消息不光是引自第八章，而且还披露了哈克想压制它发表的企图。

这就是说消息是从参加会议的人中透露出去的。

马尔科姆马上就有了问题：英国有一半的报界人士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等着看哈克的反应，另外一半人正在打电话打听消息。外国的报纸也已经采用了这条新闻。《世界报》，《华盛顿邮报》和《妇女服饰报》都已经要求进行采访了——马尔科姆跟我说后面这份报纸是海峡对面的重要刊物。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生活在母系社会里。

（阿普尔比文件1540/BA/90077）

8月3日

汉弗莱、伯纳德和马尔科姆鱼贯而入，好像是在参加一个葬礼。个个都满脸肃穆，双眼下垂。我生气地瞪眼看着他们。

“怎么了？”我问。还是没有人作声。

“怎么了？”我又问。

他们死死地盯住他们的鞋子看。“说些什么啊！”我咆哮起来。

又一个停顿。伯纳德终于开口了：“早上好，首相，”他含糊不清地说。

“早上好，”其他人就像应声虫一样，显然他们都感激伯纳德终于想到了一句说说无妨的话来了。

我把《每日邮报》狠狠地一摔。“你们读过了吗？”他们都从腋下或背后拿出了这报纸。

“你们意识到这是什么吗？”我问。我指着那条消息。

“这是《每日邮报》伯纳德多余地说。

“这是灾难！这才是这条消息的实质！”汉弗莱清了清嗓子：“请相信我对您的敬意，首相……”

我没让他说下去。“无敬意可言，汉弗莱。”我说得言简意赅。

“既不尊重人的隐私，又不尊重保密的原则，又不尊重国家利益，又不尊重国家选出来的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谁透露出去的？”又是一片沉默。我在等着回答。“谁能说呢？”汉弗莱终于作了这么个虚弱不堪的回答。

“你能说，”我说。“你好说一说——否则就麻烦了！我要把这件事调查个水落石出。立刻。总归是参加会议的人说出去的——我要知道是谁。”

汉弗莱点点头。“我将马上组织一个调查团。”

我发起火来。“我可不要什么调查！”我吼叫起来了。“你听见我说了吗？我要知道是谁干

的？”

（哈克对汉弗莱所提的建议大为光火是因为他知道对泄密的调查只是些表面文章，什么行动也不会采取的。泄密调查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不到证据。如果你真要找到泄密的原因，那你得召集一个特工组。那些调查泄密事件的人很少碰面，他们只是汇报一下，说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编者。）

“首相，”汉弗莱温和地说，显然他是想让我平静下来，“发生泄密的事件时，一般来说，人们并不真想知道是谁该负责，以免结果表明泄密的人正是您内阁中的一位成员。”

我对此倒并不担心。副检察长和我是当时在场的仅有的两位大臣。他当然不是，他也得不到好处，司法官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泄密的。我也知道此人不会是我。因此，**一定**是官员中的哪一个。我马上就对汉弗莱说，我们马上就向法院起诉。

马尔科姆插话了对不起，首相，我必须让报界发条消息了。他们都在等着呢。有四个电视采访和十一个电台采访的请求。”

“真是妙极了！”我感到苦不堪言了。“上星期我想在电台里谈谈我怎么成功地缓和了和苏联的紧张关系，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现在出了这事，他们倒像一伙逐臭的苍蝇一样都冲过来了。”

“不是一伙，首相，”伯纳德令人不解地说。

我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伙的。可我马上就意识到我误解了。“一伙，”他说，“不是一伙。我是说，苍蝇不是一伙一伙的，他们是一群一群的。他们不是冲来的，他们是……”

“是吗？他们怎么样？”我转向他，我是怒不可遏了。我在等他说。还是一片沉寂。“说呀，他们怎么样，伯纳德？”

他明白自己在自找没趣，“他们……”他停住了。他双臂拍打了一下。“没什么，”他说，又开始盯着他的鞋子看了。我再也容忍不了伯纳德的咬文嚼字了！

我转向摩根，“报界对英国还有信任感吗？”我字斟句酌地说。

“他们为什么总喜欢找麻烦和揭丑呢？他们为什么就不写写我们的成就呢？”马尔科姆咬了咬他的下嘴唇。“比如说……？”

我想了一想。“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我缓和了和苏联的紧张关系，”我舒了一口气，总算很快就能想出了这个。

马尔科姆对此想了一下。“可是，克里姆林

宫里的口气虽然友好了些，至今还不见任何具体的行动，是吗？”

“会有的，”我解释说。人们真是死脑筋！

马尔科姆看了看他的表。“对不起，首相，我得跟他们谈谈这件事了。”

他没错。我们得说些什么了。我要他和他们谈话时不用任何资料，只是用我说过的话，一定要保证让他们找不到任何依据。

他停下来，举笔不写。

我开始说：“就说他说到关于我的事全是谎言。”

伯纳德忧心忡忡地插话说：“嗯，您是说，嗯，首相，喏，有关您躲避责任的一些事？”他的脸红起来了。

“是的，”我说。他的问题在哪儿呢？

“嗯……”伯纳德坚持说唯一的问题是，那是作者的看法。我们总不能因为他表达了他的看法而叫他骗子。”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但是我还是宽厚地把对马尔科姆的指示说得缓和一些。“就说：关于我在内阁支持赛拉菲尔德却在公众场合反对它的话是谎言。”

“嗯……”伯纳德好像又有了问题。我把双眼眯起来看他。“可是，唯一的问题是，这是真事，是不是？”

“住嘴，伯纳德！”我解释说。

他不住嘴。“那我们怎么能说这是谎言呢？”他坚决地问。马尔科姆比较懂事。他已经在用得体的语言把这写下来了。

“首相对往事的回忆和他的前任大相径庭。”

伯纳德松了口气。“喔，我明白了他说，一面交叉着双腿，靠向他的扶手座椅里去。

“再说，”我对马尔科姆说，“内阁会议的记录完全证实了我的话，但是因为有《三十年规则》的条文规定，这些记录在二十八年之内尚不能公布。这样，他的书就显得既不公正又不精确了。”马尔科姆全都记下来了。他的速记没话可说。让当过记者的人来当新闻发布大臣总是个好主意——用做贼的来捉贼。

“怎么来对付他对您的人身攻击？”他想弄明白。

“攻击他，”我马上就回答。“就说这个老混蛋想用重写历史的办法来使他的首相生涯不至于显得太糟糕。暗示他已经是老糊涂了。”

马尔科姆咬了咬他的笔。“时间的流逝和不

在其位可能使他的记忆蒙上了一层迷雾？”

“很好，看来不错。有关老糊涂的说法怎么写？”

马尔科姆微微一笑：“人们对像他这样高龄的人还能期待什么呢！”他建议这样写。

我觉得这很可以了。“这样行吗？”我问他们大家。

马尔科姆似乎觉得可以了。“再驳一下这一章里的话是足够了。但是关于您阻止发表的说法又该怎么对待呢？”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也说这全是谎言。”

马尔科姆也很满意。“这是对会议内容的歪曲。从没有人要阻止发表。”

我环顾了一下会议四周。汉弗莱和伯纳德没提反对意见。我对马尔科姆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接受采访，我让他原文记下我的话：“一件无关大局的细小之事，全属新闻媒介把政治问题庸俗化的典型事例。”

“我能说这是您的原话吗，首相？”

“当然不能！”有时我真怀疑马尔科姆是不是还是他自己。“就说是出自一位亲密的内阁同事之口。”

马尔科姆走了以后，我们讨论了这场危机，我觉得他们把这看得太轻了。我觉得这是一场灾难，可汉弗莱觉得没那么严重。

“不严重？”我真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对英国人民说他们自己首相的话一句也别信，还不严重？”

汉弗莱既平静又自信，“他们不会相信这件事的。”他坚定地说道。我正想使自己相信他的时候，伯纳德尖声尖气地开了腔。

“要知道他们会相信的。”他总是如此的使人心灰意冷。“而且，从逻辑上说，这将意味着他们根本不相信前任首相的话。”

汉弗莱向伯纳德表示感谢。（换句话说，汉弗莱爵士暗示伯纳德，他的话已经够多了——编者。）

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我和我的前任的言词中作出选择，英国公众将会相信我。他们永远不会信任他，这是毫无疑问的。谢天谢地我已经做到给英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些诚实。（像许多政客那样，哈克自欺欺人的才能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除非有人只从字面上来理解“一点点诚实”这个说法——编者。）

我们对于《每日邮报》中这条消息的反驳已

经讨论得够多的了。“现在，”我就直接往下说，“现在就来补补漏洞吧。”（我们尽可能地保留了哈克的含混不清的隐喻，因为这有助于了解这位不平凡的政治领袖的内心世界。然而，伯纳德却不能不管它——编者。）

“对不起，我又得咬文嚼字了，首相，但是，如果您说补漏洞的话，您先得承认有个漏洞。”

我怒视着他。他又闭嘴了。“我要找出那个肇事者。”我不饶不让他说。

“是，首相，”汉弗莱毫无保留地回答说。

“我要判他罪。”

汉弗莱好像感到迷惑了。“首相，我们能设法找出肇事者。我们能提出起诉。但是在我们的现行制度下，这会有问题的，我肯定您一定明白，要政府直接给人判罪是不行的。”我当然明白。但是，事实上还不是不断地在这样做吗？天晓得！我建议和法官作一次私下谈话。

“这很难想象！”汉弗莱爵士完全是在假正经。他扮演这种角色是不称职的了，“首相，对英国法官施加压力是不可能的事。”他以为他在戏弄谁？“那么，如果一定要给人判罪，你是怎么干的呢？”我问道。

“很简单，”汉弗莱爵士很快地回答。“您就找一个不需要任何压力就会照办的法官。”

我倒没有想到这点。做个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

“和大法官悄悄地谈一谈，”汉弗莱继续说。“找一位站在政府这一面的法官。”

“哪一位是不喜欢《每日邮报》的？”我问。

“他们都不喜欢《每日邮报》。我们得找一位想当上诉法院常任高级法官的法官。然后，公正就会自行不偏不倚地走完它的康庄大道。”

我问这样做是不是定能奏效。汉弗莱解释说有时也会骗不了人。“有时候，他们太急于完事儿了，陪审团竟会心不在焉地宣告此人无罪的。”

“那么，”我考虑缜密地总结说，“这位法官还必须有些常识。”他点点头。我看得出，事情并不像他讲的那么简单。

8月8日

今天和德瑞克·勃汉共进午餐，他是《每日邮报》的主编。和这样一位人物进餐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可他是第四等级[2]的代表人物。对付这种人，我得步步为营。

我们是在十号的小餐厅里用的餐。餐厅四周有护壁板，它是豪华型大餐厅的前厅，和有黄色柱子的房间相连。这地方很有气派，地方很小，正适合进行亲切的用饭时的谈话。有时候，如果安妮不在家的话，而我又不想上楼去自己做饭，我就和伯纳德和其他官员上这儿来进餐。

勃汉叫人很难形容，他是有一头枯发的苏格兰人，年届中年却说不出具体年龄。双肩和腿上都洒满头屑。

“您要我对我的读者说些什么？”他喝着番茄汤问我。

“我并不要你对你的读者说什么，”我谨慎地答道，在使用策略上不敢掉以轻心。“我只想让你听听我这方面的话。”

德瑞克装作迷惑不解的样子。“可是这并不重要，是吗？”他总不想在报上发表造他谣言的消息吧！（哈克忘记了，在报上发表的关于他的消息是真实的。或者他并没真的忘记，因为读到真实的消息比读到谣言甚至更为痛苦——编者。）

“那又何必大惊小怪？”他坚持这么说。

“因为，”我感到愤愤不平了，“我并没有两副面孔，我也没有阻止发表那一章。”

“我能直接引用您的原话去发表吗？”他恶作剧似地问道。

我精心考虑了我的回答。我告诉他说，他不能直接引用我否认有两副面孔的原话。

他露齿一笑。“这倒值得一试。”他啜了口汤。“但是，吉姆，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沮丧。我承认这一章没对您说好话，但是这在一个人的艰难卓绝的政治生涯中是正常的。”

我对他说，我认为一份有责任性的报纸是不会刊载这种诽谤性的文章的。他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我就问他，那么他为什么刊载它呢。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多销了几十方份。”

“可是你难道不明白这些指责是多么的有害吗？”

我为自己设了个陷阱。“这正是我的观点，”他微微一笑。“这些指责确实有害，您就得向公众澄清事实。您不是要我相信，您并没要阻止发表吗？”

“我当然没有。”

“为什么不阻止呢？”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德瑞克，”我堂堂皇皇地说。“只要我在十号任职，言论自由是受到

保护的。”

他可不放我过门。“但是如果这对您有损害的话……”

“还不至于有害到这种地步，”我怒气冲冲地回答。

他往后一靠，又笑了。“好啊，”他说，“那还要大惊小怪干吗呢？”

我看得出来，再要自圆其说是很困难了。我又用了一条新的策略。我解释说，对我个人的损害，我毫不在意，我担忧的是对英国的损害。

起先，他不明白英国怎么会受到损害。我向他耐心地解释了，损害领袖就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在外国人眼中的威信。英镑也会贬值，类似的事情都会发生。

他可不买这个账。当我接着请他把我阻止发表那本倒霉的书的第八章的消息修改一下时，他说他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说不愿意，我能理解，可是为什么你不能？”我向他挑战似地说。“你不是主编吗？”

他拿起了一个面包卷，伯纳德马上把白脱递给他。“首相，主编和军队里的司令可不一样。他只是个马戏团的领班。我只能决定演出节目，但不能规定演员往哪儿跳。我也不能阻止演员从

马背上掉下来。”好言相劝显然是无效了。是施加压力的时候了。“德瑞克，”我为他斟满爱洛克斯——考顿酒的时候（马尔科姆说，这是他心爱之物），小心翼翼地说，“我觉得，如果你硬要我们得出一个不能信任你的结论，这就很不好。显然我们是很想和报界合作的，但是你使我们觉得很为难。”

德瑞克倒是块硬材料铸成的。他闻了一下桌上的花儿，把杯中之物摇晃了一下，让里面的气泡冒上来，然后，直直地盯着我看。

“我觉得，如果您使我们感到您对我们报纸抱有敌意，这也很不好。显然，我们是愿意和十号合作的。但是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

我不让他说下去了。我向他保证我们是不愿意有磨擦了，这对我们双方都不利。“我只是，只是想……可以作些专门的采访，并刊载些照片……”

“您是说如果我修改消息的话？”他尖刻地问道。

“我是说如果你刊载真实的消息的话，”我纠正了他的说法。

他叹了口气。“吉姆，在我拿到确凿的证据

说明那条消息是假的以前，我将维护我发的消息。”

我想不出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消息不实。
(可能因为这消息原本就是真实的——编者。)

“比如说什么样的证据？”我问。

“会议记录。”

“我的人格受到威胁，我觉得没什么是不行的。”我转向伯纳德说伯纳德，会议记录可证实我的话，是吗？”

伯纳德语无伦次地口吃起来。我们三个人的眼睛——德瑞克，马尔科姆和我——全盯着他看。他说了些好像是“好，我，呃，嗯，但是，好，呢，是，但是……”这样的话。

“好吧，”我说。“德瑞克，他会给你看的。”伯纳德看上去像中了风。我想他是要脑溢血了。“但是，首相……”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竭力让他宽心。“是啊，是啊，一般来说，这是保密的，但是这情况是特殊的。”德瑞克可不满足于看看会议记录。“我能发表吗？”

我对他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现在我自己都还没看到呢。

我要伯纳德当天下午拿给我看。

（伯纳德的不安原因有二。人人都明白哪一种忧虑更使他痛苦。第一，按违反官方秘密法，把内阁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捅给报界的主意全然是史无前例的。即使首相的指示能使违反官方秘密法的做法变为合法（还完全不能肯定是否能使之合法），还有一个问题是，哈克发誓要对把讨论有关惹事的第八章的情况透露出去的官员起诉——而这事比起会议记录的保密度来无疑要小得多。

但是伯纳德·伍利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一离开首相和德瑞克·勃汉的餐桌，就马上向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透露了这个问题。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文件里就有这次叫伯纳德安心的谈话的详细报道。这也证明了他对政治回忆录和政府秘密的与众不同的、很有价值的现点——编者。）

伯纳德·伍利带着出事前的慌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担心的是，首相竟对报界说，内阁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能证实他并没有想阻止发表那本书的第八章。

但是，伯纳德对我说，会议记录都还没写呢。我觉得事情倒简单了——他就只要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伯纳德觉得这不是个办法。他担心，据他记得，首相是想阻止发表这本书的。当我对他的记忆表示惊讶时，他

表示了惊讶。

所以我向他解释说，我记得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会议记录没有说他想阻止的话，那么，他就是没有阻止。

伯纳德·伍利更为慌张起来，他说他不明白他怎么能在会议记录上做假。他说，他要一颗清白的良心。我真不明白，他既有这么高雅的情操，又是怎么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

政治家们才有良心。我们是谦卑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责任只是执行由我们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们的命令。如果执行的是代表人民的人们的命令，我们又怎么会错呢？

伯纳德·伍利可不接受这个观点。“人不是孤立的，”他说。我也完全同意。“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正为你而鸣，伯纳德。”

惊恐之余，他问我有什么建议，以及建议的依据。我让他考虑一下这些要点：

1. 会议记录并不记录会上所说的每一句话。
2. 会议上，人们经常在改变主

意。

3. 由于记录时的自然选择过程，会议记录不可能是真实和完整的记录。

4. 所以，会上所说的只不过是烧成会议记录这碟菜的配料而已。

5. 秘书的任务就是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主意中选择出能代表首相意见的观点，这样的意见也一定是他愿意让人看到的。

当天的晚些时候，伯纳德回到我的办公室来，仍是一脸的迷惘。他考虑了我所说的话，也接受我的烧菜配料之说。这种类比很危险。在说到书和会议记录的时候，好不用“烧”这个动词。

又一次提出了真实性的问题（不管该称作什么问题吧），伯纳德错误地相信：会议记录总归该是真实的记录。

我耐心地从另一方面来解释这问题。我尽可能清楚地解释了下面几点：

1. 会议记录的目的不是要记下事件。

2. 目的是保护一些人。

3. 如果首相说了言不由衷的话，你就不需要记下来，特别是当这些和他在公众场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的有出入的

时候。

4. 简言之，会议记录是有**建设性**。它是用来**完善**人们说过的话的，使之变得更有策略，更有条理。

5. 谈不上什么道德问题。秘书是首相的仆人。

简单地说，会议记录只是供正式记录的一些笔记和同意采取的措施（如果有措施的话）的书面文字。

所以，我们又转而谈到有关的那次会议。会上发生些什么了？副检察长忠告说，法律上没有理由阻止发表第八章。首相同意说，在法律上是没有理由阻止发表的。只要记下这些就行了。

这不是谎话。这样的会议记录又不会使人良心上过不去。伯纳德·伍利离开的时候，良心上好过些了。

这两次和伯纳德关于这小小的风波的谈话使我想起这些基本观点的来源：

这次麻烦的真正起因无疑是发表大臣和首相的回忆录这件事。

当我在五十年代进入内政部工作的时候，一个聪明而有才能的人还可能维护这样的理论：搞政治是一种诚实和荣耀的工作。大臣们从不泄漏内阁会议的

过程。向报界透露消息被看作是令人失去信任感的行为，这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所为。一个部门失职了，这位部门的大臣就得辞职。

同样，内政部的成员默默无闻地工作，保持着沉默谨慎的传统，从不让国内的其他人知道是他们在管理着这国家。

所以，我相信，首相的回忆录和日记是该深受谴责的。没有教养的人会乐此不疲，他们相信，读读轻率地揭示政治家们是怎么作出决定的（更为经常的是，怎么作不出决定的），他们就等于是被赐予了洞察事物的特权。大多数政治家们的文风往往比较随意，没有欣赏水平和没有交流思想能力的人往往有这样的文风。这种品质和文风使他们的文章不太有可读性，可是倒叫人很可信。

先不去说大多数大臣的回忆录在文风上是多么要不得，更重要的警言是！像这样泄漏天机的东西万万发表不得。

在这种书里，一般的传统是：身负要职的大臣和他的顺从的仆人总是被歪曲成由心怀叵测的官员们在暗中操纵着的无辜的政治家。虽然在政府心脏里工

作的人很清楚这是无稽之谈，但头脑简单的普通人还是有被骗去相信这里面总有些真话的危险。

发表日记是会产生连锁反应的。一旦有一位大臣揭露了内阁的秘密，另一位马上就会要“改正过去的记录”，当然，那就意味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形象。

读了一连串同一时期在同一政府里工作的对立的两位大臣的描述以后，你觉得他们在自己的描述中都是行事那么光明磊落，判断那么英明无误，叫你很难说这几十年来史无前例的、源源不断的政治丑闻，该怪罪于谁。

因此唯一可找到的替罪羊自然就是些文官了。舆论终就令人沮丧和遗憾地转了向。文官不可避免地得扮演这种角色：提醒人谨慎行事，试探性地暗中调查，征求同事们的意见，查查有否先例，准备些意见，提醒大臣们，让他们明白制订的法令全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种作用却被人们看作是内部官僚主义造成的阻力，而不是把狭隘的政治利益转化为全民利益的努力。

当然，有一种说法是：保守秘密使

我们只是维护了文官部门的狭隘利益，不如增加政府的透明度那么有利。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至今未被证实是否正确。

在六十年代我刚刚以私人秘书的身份跻身内阁的时候，内阁大臣们对令人窒息的会议进程很感愤怒，他们会用揭示各种真相来造成针锋相对的激烈场面。二十年后，我以内阁秘书的身份回到内阁，所有的成员们都在平静地记他们的笔记，以便将来可以作为回忆录发表，他们也说一些希望别人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记下的话。

这对文官部门倒是极为有利，理由很有趣，事实是，增加政府“透明度”的运动一旦成功，总是增加了保密度。一旦会议——议会、地方议会、内阁会议——向大众公开，它就会被那些把这当作宣传讲台的人利用，而不能成为真正的不同政见的争辩场所。真正的讨论就会在非正式的小圈子里私下进行。

在政府里，这些小圈子里常有一两位高级官员。这样，在一些建议出笼以前，就可以征集到一些信息和可行性意见。以后，他们在为这些建议作答辩

时，振振有词的辩词就体现了他们战胜了芸芸众生的自豪。所以，在公众事务上增加透明度的运动已大大增加了保密度，也使政府中作决定的人的层次越来越高。

现在，这情况又因哈克的非同一般的、愚蠢的，绝无先例的决定而变得更为危险了。他竟要把内阁委员会的记录去给报纸编辑看，这很可能——不，是一定——会被发表的。

因为伯纳德和我都参加了会议，损害才能被控制。也因为这原因，伯纳德必须按照我的指示来写会议记录。

（阿普尔比文件 PU/12/3/86/NCH）

（伯纳德·伍利对他写的会议记录会被史无前例地发表出来的担心很快就成了事实。会议记录真的在《每日邮报》发表出来了——编者。）



每日邮报

星期一 8月13日

独家发表内阁会议的会议记录
简要的参考材料证实了哈克的说法

由政治组成员报道

在首相的首肯下，第一次由《每日邮报》发表了秘密内阁会议的会议记录摘要。记录中说，副检察长忠告说在法律上没理由阻止发表第八章。首相同意说，在法律上是没有理由的。

伯纳德·伍利回忆说[3]：

我没能守口如瓶。在一生中，我第一次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以我看来，对文官部门的人来讲，这是大的厄

运。当然，略胜于被遣送回家搞搞园艺。

这就是说，我自己得回答报界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是不能随便作答的，也是回答不了的——这些问题需要作一定程度的推诿和对事实的精简，而我并非政治家，自然无此顾左右而言他的才能。

《每日邮报》刊登这些会议记录的那天早上，在我去唐宁街上班的路上，有人迎上来和我说话。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我回答得不大好。你无疑可在档案馆里查到这些资料。



时报

No62, 839 星期二 8月14日

伍利说首相凌驾于法律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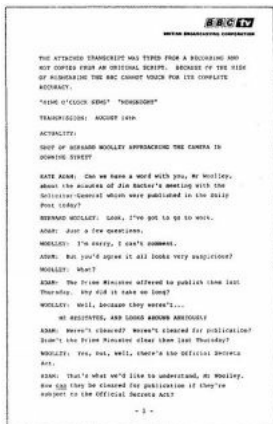
官方秘密法对哈克不适用

由主任政治记者报道

伯纳德·伍利，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今天承认官方秘密法对首相不适用。

他的回答对未完成的英国宪法作了有趣的解释。

（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同一条消息。全部对话在英国广播公司九点钟的新闻报道中播出。我们在此登出文字材料——编者。）



WOOLLEY: Well, the Prime Minister can clear anything.
BARR: Do you not saying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not
subject to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WOOLLEY: No, no.
ADAM: No so it is not he isn't?
WOOLLEY: Yes.
ADAM: So when it comes to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the
Prime Minister is above the law?
WOOLLEY: Not in theory.
ADAM: But in practice?
WOOLLEY: No comment.
OUT TWO

FADE ADAM TALKING TO CAMERA

ADAM: What Bernard Woolley seems to be saying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makes the rules. We could not be
drawn further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minutes, though
he denied the rumor that the minutes took four days to
appear because Mr. Butler can only type with two fingers.

- 2 -

英国广播公司

下面的文字是从录音中打字记录下来的，而不是原版文字的副本。由于有听错的可能，英国广播公司不能保证其精确无误。

“九时新闻”“晚间新闻”

播放时间：8月14日

现场：

伯纳德·伍利在唐宁街走近镜头的特写。

凯特·爱登：我们能跟您谈谈，伍利先生，关于吉姆·哈克和副检察长的会议记

录在今天《每日邮报》上发表的事吗？

伯纳德·伍利：您看，我得去上班呢！

爱登：没几个问题。

伍利：对不起，无可奉告。

爱登：可您也认为这显得很可疑吧？

伍利：什么？

爱登：首相让这些材料在星期四发表出来。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伍利：那是，因为还没有……

他犹豫起来，担心地看看四周。

爱登：没有检查好？为了发表要先作检查？上星期四首相亲自检查的吗？

伍利：是的，但是，你看，有官方秘密法的。

爱登：我正想弄懂这事，伍利先生。既然有官方秘密法，那么这些材料怎么能经检查而出版呢？

伍利：可是，首相是什么都能检查的。

爱登：那么您是说首相是不受官方秘密法约束的？

伍利：嗯，不。

爱登：不，他是受约束的，还是不，他不受约束的？

伍利：是的。

爱登：那么，关于官方秘密法，首相是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伍利：在理论上并非如此。

爱登：在实践上呢？

伍利：无可奉告。

镜头转入：

凯特面对镜头说话：

爱登：伯纳德·伍利似乎在说首相是订法的人。有人说哈克只能用两个指头打字，所以会议记录过了四天才发表。虽然他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没法再让他进一步谈谈会议记录的内容了。

（凯特·爱登的后评语引起了唐宁街十号向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的投诉。英国广播公司急切地否认这评语反映了任何对政府抱有偏见的迹象。）

8月14日

今天早上伯纳德对我说报界采访了他。我大为不快。接受采访又不是他的事。

他解释说他并没想这么做，但却误入了被撬开口的陷阱。

我问他说了些什么。

“嗯……也没有什么。”这个回答一点也不对头。如果他没有说什么，他根本不会来供认。他

的双眼游移不定。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我问。

“喏……”他犹豫地说，“他们向我问起您。”这并不奇怪。“问我什么？”

“问起您和官方秘密法，首相。”（当哈克把这记在日记里的时候，他还没看过电视新闻或读过早报。这场和伯纳德·伍利的谈话就发生在他跟报界的谈话之后——编者。）“他们问我，您是否受法律约束。”

“当然受约束，”我证实说。

“是的，您当然是的他同意说。

我等着。没话了。他很不快地盯着墙壁看。“怎么办呢？”我催他说。

“喏，这，呃，结果都是那样。”

“你是什么意思？”我声音中充满着威胁的语气问。

“喏，嗯，回忆一下我所说的，您所说的，我说您所说的，或者是他们会说我说您所说的，或者是他们会以为我以为您以为，或者是他们会说我说我以为您说我以为……”他精疲力尽了。我严厉地叫他说下去。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我说了您觉得

您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我被吓呆了！“你说了**这话**？？”

“不是故意的。但是似乎结果却这么说了。我真是太抱歉了。但是他们都在问这些问题。”

我真不敢相信。“伯纳德，”我确实十分好奇地问，“你怎么会觉得你一定得回答他们呢？只是因为有人问了你问题？”他说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很难叫人相信。他从来不因为我问他而回答**我的**问题。我光火极了。“一生在文官部门供职，整个的事业就让你避免回答问题，**今天**你突然决定回答问题了？

回答**报界**的问题？？你一定**头脑发胀**了，伯纳德！”

他请我不要对他吼叫。他快要哭出来了。他向我保证再也不回答任何问题，决不，决不了！

我平静了下来。我要他马上去叫汉弗莱来。我们在等汉弗莱到来的时候，我教了伯纳德八条对付难题的办法：

1. **攻击问题**。“这问题很蠢，你怎么来解释你的措词凌驾于法律之上？”

2. **攻击提问题的人**。“你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几年？”

3. **恭维问题**。“这问题问得好。我很感谢你问这个问题。请让我以问你一个问题来作回答。”

4. **拜托问题**。许多问题是有哄骗性的。这些问题全是些假设，比如说“好多人说你认为你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可以有两种问答这个带哄骗性问题的答案。

a) “举出十个人名来。”

b) “在一个有五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里，你当然找到一些什么话都可能说的人，不管这些话是多么的不着边际，多么令人误解，或是显得多么的孤陋寡闻。

5. **使一切看上去像场戏**。这只运用于现场电视采访，“你知道，我已得出一个结论，我不同意在节目开始前你在楼下问我问题时，你认为我该回答的话。**真正的**回答是……”

6. **利用时间因素**。许多采访的时间都很短，特别是现场“实况”采访。回答可以是：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回答时我想提九点。”采访记者会说可能你只要简单地说上两点就好了。”你说：“不，这问题很重要，不能作些表面的回答，如果不能回答得恰如其份的话，我宁可不草草作答。”

7. **推说要保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这有关一些保密的事。我肯定你总不愿意让我来泄密吧！所以，恐怕在一两周内我是不能回答的。

8. 在一篇冗长而无意义的叙述中避开难题。如果你真能很长时间地嚼舌，谁也记不得原来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回答过这问题。

伯纳德全神贯注地聆听了对付新闻媒介中的好事者的办法一课。汉弗莱到来的时候，我为他总结了一下：“如果你没什么可说，就什么也别说。但是好还是：有一些可说的，把它说出来，**不管人家问的是**什么。不要去管问题是什么，只管说你自己要说的话。如果他们又问你同一个问题，你只要说：‘这不成问题’或者‘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然后你再把你要说的话再说一遍。很容易。”当汉弗莱进来时，我问他关于泄密调查的事。他有点闪烁其词。

“啊，是的，”他说轮子就要转动起来了。”

“一周前我就布置了，”我说。我重申我希望办事的人着力去办。而且要快。

汉弗莱显得迷惘了。“着力去办？”

“而且要快。”

他还是一脸迷惘。“要快。”

“要快，”我重复说。

他听懂了。“喔，您是说……您真的要办。”

我要他看着我的嘴唇。“我-要-你-现-在-就-去-办！”

汉弗莱还是显得迷惘，但是他没有说反对的话。“如果您是认真的话，我就安排一次真正的近在咫尺的调查——我是说如果您真的想办的话。我会从特工部把卜劳德检察官调来。”

（汉弗莱爵士说调卜劳德[\[4\]](#)检察官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编者。）

问题解决了，我指出，现在我们得改善一下和报界的关系了。

“今天我可敬的私人秘书对他们说，在官方秘密问题上我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使我们的关系恶化了。”

汉弗莱瞪眼看着伯纳德，大为震惊。伯纳德垂下了头。

“是啊，你是该感到羞愧，伯纳德。”我不愿把他轻轻放过。我请汉弗莱告诉我这件事在法律上的影响。他答应让我在今天晚些时候看到文字材料。

（汉弗莱爵士遵守他的诺言。当天晚些时候一份备忘录送到了哈克的书房里。我们从内阁办公室的档案里找到了它的副本——编者。）



70 WHITEHALL, LONDON SW1A 2AS

Memorandum

To: The Prime Minister August 10th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In one sense, Bernard was quite correct. The question you posed, in a nutshell, i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reach of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n attributable off-the-record briefing by a senior official?

The former - the breach - is a criminal offence. The latter - the briefing - is essential to keep the wheels turning.

Is there a real objective difference? Or is it merely a matter of conven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nd is it a breach of the Act if there is an unofficial non-attributable off-the-record briefing by an official who is unofficially authoris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You could argue that this is not a breach, if it has been authoriz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which is Bernard Weather's position.

You, Prime Minister, will inevitably argue that it is up to you to decide whether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something to be revealed or not. This would be your justification for claiming that the leak from your meeting with the Solicitor-General, which may have come from an official, is a breach of the Act.

However, this raises some interesting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1. What if the official was officially authorized?
2. What if he was unofficially authorized?
3. What if you, Prime Minister, officially disapprove of a breach of the Act but unofficially approve? This would make the breach unofficially official but officially unofficial.

I hope this is of help to you.



70怀特霍尔，伦敦SW1A ZAS

备忘录

致首相 8月14日

寄自内阁秘书

从一个意义上讲，伯纳德是对的。您提出的问题，简括地说，不就是：违反官方秘密法和一位高级官员私下介绍了一些不见出处的消息之间的区别吗？

前者——违法——是犯罪行为。后者——介绍情况——对使轮子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有没有真正客观的区别呢？还是只不过纯属随心所欲的解释？如果一位官员未受首相的正式授命而非正式地私下介绍了一些不见出处的情况，这算不算违法呢？

您可以说，如果是授命于首相的，那是不违法的。伯纳德的处境就是如此。

您，首相，不可避免地会说，该由您来决定：哪些事揭示出来会对公众有利。这样，您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说，一位肯定是参加会议的官员披露了您和副检察长在会上说的话，这种做法就是违法的。

然而，这又引起了有趣的法律上的难题。

1. 如果这官员是被正式授命的又怎样呢？
2. 如果他是被非正式授命的又怎样呢？
3. 如果您，首相，正式地反对违法，可又非正式主张违法，又该如何呢？这会使违法变得非官方的官方，但又官方的非官方。

我希望这对您有用。

8月15日

我们又一次重新开会了。（叠床架屋是哈克个人文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尽可能地保留它——编者。）昨晚我们都看了对伯纳德的新闻和电视采访。伯纳德成了新的热点人物。他今天早上来办公室的时候戴着墨镜和大帽，这是一种避免被人认出来的无效的典型办法。

奇怪的是，报界的人立即又来打听，为什么在一年中热的日子里，这个奇怪的人会戴着墨镜，还顶着一顶海狸皮帽子。

我谢谢汉弗莱送来了他那有用的备忘录——我感到，这是一篇无伤大雅的谎话——我们还讨论了怎么来把这一周的损失减少到小的程度。我提议再和那位主编共进一次晚餐——这次得友好些。

马尔科姆·华伦也来开会了。他的评语是：现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友好的。

“在新年授衔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给他们中的一位授以爵位吗？”我问道。

他对此终有没有用很有怀疑。“授给他们爵位是给他们一把两面锋利的剑。它可以为你斗，也可以对你斗。问题是：你给他们授爵位以后，

还有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我总觉得，”我说，“任何编辑都会感恩戴德的。”

马尔科姆摇摇头。“您知道，有了爵位，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再也不怕失去什么了。”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事后你是得不到什么感激的。在政治上，感激只是用来期待恩惠的诱人钓饵。

马尔科姆认为，与其去讨好新闻界，倒不如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送他们一条消息。”

“比如说什么消息？”我问。

“爆发战争，”他神气活现地说，“或是这一类的消息。”

“爆发战争？”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

“我只是举个可以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例子。”

“一场小规模战争就行了，”伯纳德补充说。

他们在开玩笑。一定是在开玩笑。汉弗莱也参加了讨论。“如果我能插一句的话，我得说即使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也会伤害无辜。但是，说真的，你们为什么不驱逐七十六个苏联外交官

呢？过去

也曾有过先例，那时我们正想让新闻界对一件别的事降低兴趣。”我感到大为震惊。我立刻就拒绝了这建议。

马尔科姆坚持说：“那时，首相，你就会有——一条新闻标题是：‘政府粉碎了红色间谍的阴谋’。很有爱国热忱。紧接着对大选也极为有利。”

汉弗莱点点头。“是的，您看，该用一条没有人能证明其不确切的消息……”

“还要能被人相信，”马尔科姆下结论说，“即使有人否认也没用。”

“‘苏联大使的汽车司机是克格勃的主要负责人’”汉弗莱想象力丰富地宣布说。他完全是沉浸在想象之中了。

我对他说，这种荒唐的念头是根本行不通的。几个月来我好不容易缓和了紧张局势。这也是现在对我唯一有利的形势。

他们都好像有些失望。我转向我的私人秘书。“你是怎么看的，伯纳德？”我语含讥讽地问。“你对把消息捅给新闻界很有些专长。”

他脸红了。“我看，是不是可以是皇家轶事？”他这么提出来。说。

我想不出他是指什么。“请举个例子。”

“那么，订婚……怀孕……离婚？”

“你能作出安排？”我问他说。

他倒没有想到还有这个麻烦。“喔，可是，不，我……”

汉弗莱听不下去了。“我看，”他说，“就写‘首相的私人秘书在排队领救济金’，怎么样？”

（五天过去了，泄密调查的报告总算来了。肇事者被点了名，此人是能源部的新闻发布官，那天和副检察长会谈时他也在场。调查组在发现他是泄密者上倒并不困难，因为（a）有嫌疑的人本就不多，（b）他很快就供认不讳。伯纳德·伍利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同一天收到了泄密调查报告的副本。伯纳德一定给汉弗莱爵士打了电话请求指示，因为这封汉弗莱爵士写的信和报告都标的是同一天——编者。）



70 WHITEHALL, LONDON SW1A 2AS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and Head of the Home Civil Service

August 24th

Dear Bernard,

Yes, I have read it. This is a potentially
difficult situation, as there is no precedent for
handing a book causing that activity into the
secret.

Although the writer is a man poor given he
was undoubtedly be listed as Senior Civil Servant
by the press, simply because he works in
Whitehall.

I think we can trust him, however.

Yrs.

亲爱的伯纳德：8月24日

是的，我读过了。这可能会是很麻烦的情况，因为以前还没有泄密调查居然查出肇事者的先例。

虽然这牺牲品不过是位新闻发布官，可是他无疑会被贴上文官部门高级官员的标签的，这仅仅是因为他在怀特霍尔工作。

然而我想我们救得了他。

汉弗莱·阿普尔比

伯纳德·伍利写了回信：



10 DOWNING STREET

From the Principal Private Secretary

August 20th

Dear Humphrey,

How can we save him? There's
no doubt he did it.

Bernard

亲爱的汉弗莱： 8月20日

我们能救得了他吗？无疑事情是他干的。

伯纳德

汉弗莱写了回信：



亲爱的伯纳德： 8月21日
会有疑问的！

汉弗莱·阿普尔比

8月21日

今天早上的会开得很艰难——但是在我的能干和忠诚的伙伴的帮助下，我竟成功地转败为胜了。

昨天泄密调查的报告送来了。昨晚我读了。是能源部的新闻发布官捅出去的。证据确凿。也没有人否认。

所以在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要求立即让他辞职，并且根据官方秘密法的第二部分对他起诉。

汉弗莱很谨慎。“我看不这样为好，首相。”

我嘲笑了他——结果是我做了傻事。“你认为不这样做为好？因为他是文官部门的人，是吗？”

他没有觉得有什么可乐的。“当然不是，首相。因为出于对您的利益的考虑。”

“难道因损坏了整个的政府的利益而对他进行惩罚就不是出于对我的利益的考虑吗？”我冷冷地问他。

伯纳德说：“唔，利益是不能损坏的，首相，因为利益是……”我瞪了他一眼，他就突然刹了车。

汉弗莱对我是能洞察一切的，他已经请教过大法官了。“大法官的忠告是：起诉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这里面没有泄密的成份。”我说我不在乎有没有结果。“至少可以杀鸡儆猴，”我补充说。

好像我什么也没说似的，汉弗莱只顾往下讲。“他还忠告说：如果要起诉的话，我们得先请特工部来对以前第五章的泄密作一个同样的调

查。”

我压根儿听都不想听。而且，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第五章的泄露根本是另一码事！这是绝对无害的。

汉弗莱的看法却不同。“大法官说要就是两次秘密都无害，要就是都有害。”他两眼圆睁地望着我，一副坦诚的样子。“那么，我是否得请特工部来调查第五章的泄密事件呢？”

他很清楚，只有一个读过第五章的人会在泄密中得益——我总不想让自己根据第二部分的条文被起诉。

“转念一想，汉弗莱，”我对他说，“我看大法官说得也对。别提起诉讼的事了。把与此有关的人解雇算了。”

汉弗莱无奈地摇摇头。“那也很困难。有证据说这位新闻发布官并不是出于本意。”

我倒没注意到这一点。“什么意思？”

“他是执行他的大臣的意图。”

我惊恐地请他说说清楚。据汉弗莱说，这位新闻发布官并不是因为对我有敌意才泄密的。事实是：能源部的大臣很高兴看到前任首相把他描写成内阁里能干的人。他对他的新闻发布官说，非但不能阻止发表这一章，他倒很愿意看到这一

章马上见报。否则，公众就永远也不会有机会读到它了，因为十号里的人企图把它删去了。

我问汉弗莱他能肯定吗。

他点点头。“我肯定，如果在工业法庭上[5]，这位新闻发布官受了被解雇的委屈时，他一定会作此解释的。他会争辩说，他是照含蓄的指示去办的，是他的大臣要他去这么办的。”

我真是大失所望。结果竟是我既不能对他起诉，又不能把他解雇！

汉弗莱责无旁贷地提出了另一个办法。但也不大行得通。“我怕，首相，如果您必须解雇什么人的话，唯一可考虑的是能源部大臣。他该对他的部门负责。”

“但是，这不行，”我伤心地说。“上个月我已失去了一位内阁大臣。我不能在这个月再解雇一位。”

“就是啊！”汉弗莱完全同意我的话。“失去一位大臣可能会被人看作是一场灾难。失去两位看上去就是有人太不把这当回事了。何况，能源部大臣又没有透露什么，他会否认他要人去这么干的。

他也可能因为错误地把他解雇而起诉的！”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新闻界鼓噪着

要看调查的结果呢！汉弗莱递上了一份马尔科姆起草的新闻发布稿。但是这份稿子毫无用处。通篇皆是废话：“交流对话已经中断……误会时时产生……信心十足地去办……此事将作内部处理。”

“这是美化，”我不满地说。“而且是无效的美化。”

“还不如说是丑化呢，真的，”伯纳德同意地说。

汉弗莱的看法不同。“这不是美化。这是让大家担责任。”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结果。我倒宁可让人觉得我的确想阻止发表第八章！（这本是真的——编者。）

汉弗莱略微想了一想。“可能……”他小心翼翼地提议说，“可能我们该把这消息捅出去——但是又马上盖住。”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了。

“你是说……？”我问。

他点点头。

内阁屋内一片寂静。我们都明白再也没别的选择了。不多时，汉弗莱就付诸行动了。

“我一直想告诉您，首相——在外交办公室

的档案中有一些很令人担心的情况。有关苏联大使馆和代表团的间谍活动。”

“不！”我惊恐万状地说。

“只怕这是事实了。有证据指控许多外交官。”

“多少？”我问。

“七十六人。”他回答。

我并不感吃惊。“你知道，汉弗莱，我看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到了。归根结底，国家的安全是受到威胁了。”

“完全正确。”

就这么办了。“把他们驱逐出境，”我命令说。“我们并不想保密。今天就告诉新闻界，同时告诉他们泄密调查的结果。”

“是，首相，”汉弗莱爵士说。“好主意，”他毕恭毕敬地补充说。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1] 罗宾·伊文斯爵士。

[2] 指新闻界——译者注。

[3] 和编者的谈话。

[4]英语卜劳德plod就是行动缓慢的意思——译者注。

[5]解决劳资纠纷的法庭——译者注。

3. 外交事件

9月3日

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纪念日，是有一两件很适时的事情取得进展的一天，是充满令人且惊又喜的事件的一天，可又是

将来会被看作是光辉灿烂的一天，是揭开英国崭新的一页的一天。

（哈克偶尔兴之所至，会大作起词藻华丽的散文来。一般来说，全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话。多也不过是些无关轻重的话。但是这倒显示了他的丘吉尔式的想在历史书上占一席之地的渴望。遗憾的是后代已把他遗忘了——编者。）

我度过了短短的夏日假期后，今天一早与汉弗莱、伯纳德开会讨论了我们遇到的关于海峡隧道工程[\[1\]](#)大大脱期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开工典礼的盛况。（这是自然的——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外交部又把这事给拖延了。

汉弗莱觉得不必着急。伯纳德也这么想。“他们说政府首脑们还没签字呢！”

典型的外文部的拖沓作风。“他们也该签字了，”我不满地说。盛典一定很感人——大门新落成，詹姆斯·哈克首相阁下奠的基石。我将为这

一历史性的连接作报告，两个神圣的国家从此相通。我会把什么都谈到的。外交部和法国还没有取得一致，看起来，这也不能构成拖延的理由，特别是当我的大选民意测验的票数已有些下降的时候。

我就告诉汉弗莱我的决定：和法国总统开个高级会议，我自己出面解决。

汉弗莱大为吃惊：“我没想到您会要采取这样激进的行动，”他说，用的是他语库中为强烈的词汇。

“是啊，我是想这么做。”

他紧接着又想摧毁我的自信心。“首相，您是否真的相信您能亲自解决和法国的协商问题？”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难的。“是的，我相信。这问题有什么棘手的地方？”他答道：“主要是一些主权问题。您认为边界该在哪儿呢？”边界？我想都没想过。可能，他指的是英国和法国的边界。

（这篇日记向我们大家揭示了哈克的思维过程。还是记住这句格言吧：如果上帝真想让政治家们思考问题的话，他早就给他们脑子了——编者。）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边界在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您是说，”汉弗莱问道，“有三英里的界线？可是谁拥有隧道的中部呢？”

我是想说三英里界线可作边界。我从没想到过隧道。

（这是无疑的。哈克只考虑到从开工大典中争得一些人心——编者。）

“您看，”汉弗莱解释说，“英国的立场是英法应该各占一半。但是，当然，我们可以接受你的主意，那样的话，隧道的大部分就成了国际地带，可能得由联合国来管理？或是欧共体？”

我感到外交部第一次办对了一件事——把隧道一分为二为公平。

但汉弗莱解释说法国并不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们要把英法边界设在朵佛。荒唐之极！“可能，”汉弗莱微笑着猜测说，“可能您会考虑对法国的建议作百分之五十的让步吧？”

为了公正起见，我对汉弗莱说，我总会考虑作百分之五十的让步的。

“喔，天哪！”汉弗莱显然是很得意地回答说，“既然法国一开始就提百分之一百的要求，结果他们就能得到百分之七十五。”这是个花

招。它给汉弗莱的一笑作了注解。他现在是得意洋洋的，这傻瓜，因为他使我中计了。谁都会玩这花招。（无意中透露出一点诚实——编者。）

“显然，”我告诉他，一面强压住怒火，“我们得在隧道中部划分，那样的话，我们就拥有一半隧道的主权，法国也一样。”

“那么谁对火车拥有主权呢？”

我没有想到这事。汉弗莱是事先有准备的，他现在向我问上一连串的令人恼火的、琐碎烦人的和花样百出的问题。

“如果在英国的地段里，法国的火车上发生了一起罪案，由谁来负责审判呢？英国还是法国？”

“英国。”我回答说。他睁大双眼看着我，嘴上露出一丝令人恼火的假笑。“不，是法国，”我说：“不，英国。”他不理我，只是继续问下去：“如果在法国的地段内，一具尸体从英国的火车上被推下去，谁来处理呢？”

“法国？”我试着回答。他没有反应。“不，是英国，”我说，“不，唔……”

“如果，”汉弗莱咄咄逼人地说，“如果英国的卡车装在法国的火车上，又在英国的地段里，由谁来审理呢？”

我现在是完全被搞糊涂了。（其实，起先就糊涂了——编者。）

伯纳德也糊涂了。“能不能把司法权分成两部分？”他问道。

“对内和对外的？”

汉弗莱没去理会伯纳德。“我们该不该在隧道的中间竖一块边界牌呢？就在中部这个地方。”

“是的，”我说。他盯着我看，我又失去了自信。“不，”我补充说。

“或者说我们该在某一边设立一个海关和移民检查点？”

我开始看到整个问题有多复杂了。“不，”我开始决定这么说。

“是的，”考虑一会后，我又下了这个结论。

“还是两边都设？”看来，各种可能性竟是无限的多。

“是的，”我表示同意。

汉弗莱暗示说我的态度还不够坚决。真是对极了。但是，正如我指出的，归根到底，这些都是谈判时该由律师们解决的问题。

“对极了，首相。但是我以为您是要亲自去

解决这问题的。”我越来越恼火了。“我并不想解决国际法中深奥难懂的问题，汉弗莱，我要解决的是有关问题中基本的政治观点。”

“那么，”汉弗莱说，讽刺的语气中带有夸张了的惊奇，“主权就不是政治吗？多有趣。”他有用不尽的这种廉价的饶舌法。他明知道我在说什么。

（哈克有些过份乐观了。汉弗莱爵士不可能知道哈克的意思。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这些文稿后，我们仍不明白他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哈克是否明白他自己的意思——编者。）

“我认为，”汉弗莱继续他那相当无礼的盘问，“您会同意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建造隧道吧？”

“当然。”

“那么，”汉弗莱回答说，“您刚才说将同法国公司签订百分之九十的合同。您签的合同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吗？”

“不！”我坚决地说。

“可法国人想这样。”

“我们不同意。”

“那在我们同意之前，就举行不了开工典礼

了。”

我说可以作些让步。“我们可以在英国这份合同上先用英语，在法国的那份合同上先用法语。”

“火车呢？”我很恼火。“看在上帝的份上，汉弗莱，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很平静。“对法国有关系，”他解释说。“菜谱呢？用法语运是用英语？”

我想找个折衷的办法。“他们就不能一半用法语，一半用英语了吗？”

他遗憾地摇摇头。“法国人会很坚决的。所以，英国和法国的协和式飞机Concorde都用法语的拼写法——后有个E。当然，如果您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作出让步，我们马上就可以和法国订合同了。或者是——”他后拿出杀手锏：“——您可以让外交部去尽力办。”

让他们去尽力办？看来他也不敢期望外交部能干出什么好事。他证实了这正是他的想法。“我怕他们也办不好。但还是比您自己去办要好，首相。”

我恐怕他是说对了。但是，这也不像话。“汉弗莱，”我问他，

“和法国打交道时，难道我们从来不能得手

吗？”

“有时候能，”他说。

“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难道真会是这样？我在考虑这问题的时候，搜索遍了我记忆的百科全书和历史知识。这时，汉弗莱提出了个恼人的绑架问题。

“如果恐怖分子劫持火车怎么办？他们如果威胁说要炸毁火车和隧道怎么办？”

这想法多么恐怖！“上帝，”我叫道。“还是让法国来主管全部隧道吧！那么，他们就得来处理这种事了。”

汉弗莱心满意足地笑了。“您看呢，首相？”他现在是在指导我。“如果您来参加协商的话，您就得在**一切问题**上向法国妥协。实际上，我相信法国会用一些很不光彩的手段来获利。而您无疑都是会料到的，首相。”

他明显是在挖苦我，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可能处理好协商这件事，跟有些国家还可以。跟法国，永远不行。而且，我看到置身于事外的另一大好处：“如果达成令人屈辱的协议，我就可以叫外交大组负起责任。”

“很明智，首相。”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我

们继续讨论另一件一直叫我愤怒不已的事。“我们现在能不能讨论一下令人同样生气的问题——您前任的回忆录？”

好像嫌我们在第八章上遇到的麻烦还不够多，现在他似乎在写他的后一章了。这一章涉及他的辞职和我继任首相一事。为此，他想翻阅一些政府文件。

我问，在这本回忆录毁了我的前程之前，有没有**任何**办法不让他再写下去。我那时不知道，竟真会有天赐良机。

汉弗莱愁苦地摇摇头。“回忆录，老天啊，是一种职业性的灾难。”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叹气。我是被刺伤的人。使我沮丧的倒不是他写的内容——而是他的背叛！在读他这本书的前八章以前，我还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呢！

比方说，在今天早上我看到的稿子中，他把我称作两面派。我把这给伯纳德看。

“太不对了”就是伯纳德想叫我满意的评语。

我对这份信任票表示了感谢。

“不可原谅的鲁莽，”伯纳德继续说。

“鲁莽？”我吃惊地看着他。

“而且是错误的！”伯纳德加强语气补充说。

“他怎么能造我这样的谣？”我很注意修辞地问道。

“什么谣言？”伯纳德问。“喔，我明白了，”他说。

说真的，伯纳德有时候在理解上真是迟钝得可以。他怎么会想到我改变话题的呢？但是他确实是这么想了。

前任首相干吗要写这种垃圾文章？只是为了增加销路才造这些谣？我想不会吧。有些人造谣倒不是想得到好处，而只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质。“他是恶毒的、阴险的、卑鄙的流氓，”我对伯纳德说，“如果他想再获得荣誉，或是官方资助，或是争取机会去作皇家调查的话，那他得仔细考虑考虑。只要我在这儿，他就别想再得到一点官方的重视。”

我真后悔这么发作一通，因为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伯纳德接了电话。

“怎么？……有这么重要？因为……喔！……啊！……喔！一到就死了？……我明白了。”

他严肃地放回电话听筒。

“是坏消息，伯纳德？”我问。

“是，也不是，”他小心地回答。“你的前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前任首相刚死于心脏病。”

“真令人悲痛，”我马上说。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该说什么话。

“真令人悲痛，”伯纳德和汉弗莱像回声似地答道。

“一位伟大的人物，”我说，希望有人好记录下来。

“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们同声重复说。

“大家都会痛苦地想念他，”我说。归根结底，**总有人**会想念他的。

“会痛苦地想念他，”在内阁会议桌另一边的双簧又像回声似地说。

“还会痛苦地想念他的回忆录，”我补充说。

“这就再也完不成了，”伯纳德说。

“天哪！”汉弗莱叹道。

“天哪！”我说。

“显然，首相，”伯纳德说，“他表示了一个遗愿，希望能有国葬，就在.....临终前说的。但是您既然不准备再给他任何荣耀了.....”

伯纳德是大错特错了。葬礼是我想给他的荣耀。我对伯纳德说他完全误解我了。“我肯定，伯纳德，有许多人想来参加他的葬礼。”

“您的意思晃，向他致敬？”

“当然，”我说。这当然是一个原因。确证一下他真的死了是另一个原因。

（工作葬礼是首脑会晤的好的形式。表面上举行葬礼是为了悼念死者。实际上，政治家和外交家就可以在招待会上、在教堂、在墓地非正式地接触，得到的收获比在十个正式的“首脑会议”上得到的还要多。对这种正式会议，人们的期待总是过高。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哈克会立刻同意给这位已故的、无人哀悼的前任以国葬的原因吧——编者。）

9月4日

邀请出席葬礼的名单已经拟就。也已发出请柬等待回复。现在已请了七位英联邦的首相和总理，美国的副总统，苏联的外交部长，六位欧洲的总理——好极了。由我作东！我将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周旋于所有这些政治家之间。我将以尊严和坚毅来强压我的悲痛。选民们喜欢的就是以尊严的外表来掩盖悲痛的人了，特别是当他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的时候。真是天大的好事，他死了，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但是，名单上还有个有趣的问题：法国总理能来吗？当我们谈到葬礼安排的趣事时，我向汉弗莱和伯纳德问起此事。

“我猜想，明天法国大使来看您就是想讨论这件事，”汉弗莱说。

我马上想到的倒是摄像机将放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地方能放？”我要一个很肯定的回答。要放在十号外面，一路都安置好，在威斯明斯特教堂外面，教堂里面。再放一架摄像机正对着我坐的靠背长椅。

汉弗莱看上去觉得不太行。“那样的话，摄像机就得放在布道坛上了。”

“这难道不行吗？”我问。

“那么主教站的地方就太挤了，”汉弗莱说。

我能理解这是个问题。“那么他站在哪儿布道呢？”我问。“我想他总是该站在布道坛上的。”问题比我想的要严重得多。“那我的摄像机又放在哪儿呢？”汉弗莱想了一会儿，“噢，总还有个主祭台吧。但主教也要用上它的。”

那你就别用它了。（显然，主教有个错误的印象，他把葬礼看作是一个宗教仪式。也没人告诉他这是一次政党的政治宣传——编者。）

9月5日

今天我见到大使了。事情比我想的要糟得多。

当然，我先见了伯纳德。“法国大使就要到了，但是我知道他带来的消息会是：法国总理不来了，来的是总统。”

“总统？”我太高兴了。“那是太妙了。”

“不，不，首相。这很糟！”汉弗莱也听到消息了，他慌慌张张地来加入我们的谈话。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开始的时候。和法国人打交道我还没有经验。伯纳德却是极为老道。

“三年前女王访问法国的时候，首相，她送给总统一只拉布拉多小狗。总统现在也给女王带来一条小狗作为回敬。”

汉弗莱惊恐万状地跌坐在椅子上。“不！”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也是这么听说的！那么说这是真的了？”

“只怕是的，汉弗莱爵士。”伯纳德用他在丧礼上用的嗓音说。

“我早知道了，”汉弗莱像病入膏肓似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会这么做的。”

我还是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

这似乎是友好的表示。”

“这是一种表示。”汉弗莱苦笑着说。“但不能算是友好的。”“为什么不是？”

“因为女王陛下是会拒绝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反响的！”看起来，问题是出在检疫方面！狗是不能进口的。在希思罗机场检疫站，这条小狗得呆上六个月。

这对我似乎还不能构成大灾难。“法国人总能理解的，是吗？”

“当然，他们是会理解的。作为个人，他们能理解。所以他们才这么干。但是作为官方，他们就拒绝表示理解。”

我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法国正在制造事端，以便在海峡隧道的主权问题上得遂其愿。我向汉弗莱和伯纳德解释了这一点，他们对我的洞察力很钦佩。接着，我坚决地派人去找来彼得·盖斯康因，外交部的私人秘书。“我们怎么办？”我问。

“我不知道。”他已经知道这消息，显然已在为令人沮丧的后果而垂头丧气。他看上去像是一个绝望的人。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毫无希望的回答。文职人员一般总是有一些办法的。“但你是外交部

的私人秘书，”我对他说。“我需要有有益的建议。”

“对不起，首相，但是负责检疫的是内务部。”

我看他是在踢皮球。或者说是在踢开这条狗。我派人去叫葛雷汉·法兰启，内政部的私人秘书。我们在等他的时候，我和彼得商量了让法国人收回这份礼物的可能性。

“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彼得绝望地对我说。“我们建议他们送一幅小狗的肖像画，一座铜雕，或是瓷像。但是都没有用。”

“你不能叫人把狗做成标本吗？”我问。

汉弗莱插进来说我们怎么能……喔，您是说把狗剥制成标本？不行。”

葛雷汉匆匆地走了进来。“葛雷汉，”我说，“对你的内政部的人说，要他们想想办法绕开这些检疫法的条文。”他硬梆梆地回答：“恐怕那是不可能的，首相。”我可不想让人反对我的意见。我请他作出解释。

“首先，我们已经，”他不安地对我眨巴着眼睛说，“让英国人民和所有外国人毫无例外地都严格地遵守这些条文了。其次，检疫法是女王陛下亲自签署的。她总不能是唯一违反她自己订的法律的人吧！这在道义上和在为健康着想上都说

不过去，而且也不可能这么办。”

正在这时，内线电话铃响了。法国大使到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但是，葬礼只剩下三天了，不能再耽搁了。

所以，当这位大使在内阁接旁边的小候见室等候的时候，我对我的伙计们说，**得**想个法子。我叫彼得马上回外交部，叫他们去同内政部的人谈一谈。而葛雷汉在内政部做同样的事。两方都与伯纳德联系，伯纳德再向宫中汇报。汉弗莱去和法务官员谈谈，看看有什么法律方面的漏洞可钻（他们对此建议都坚决地摇头），我还让汉弗莱负责统筹处理这件事。

“这件什么事？”他似乎感到困惑。

“不管什么我们能想得出来的可以对付法国佬的办法，”我解释说。

“喔，这件事。”有时汉弗莱真有点迟钝。“当然，首相。我将在内阁办公室内设立一个行动办公室。”

我似乎是唯一能动动脑子的人了。我问汉弗莱**他**是否有些建议。他建议说我不再让法国大使久等了。我就派人去请他。我让汉弗莱留下来给我打气。

“我要准备些文件吗？”汉弗莱问，他一想到

迫切的对峙局面就略感不安了。

“只要一块海绵，一条毛巾，”我对他严厉地说。

法国大使脚步轻健地走进房间，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首相，您真客气能接见我。”他又矮又瘦，但非常动人，我对他说这是我的荣幸。

“我想您是急于想后签订海峡隧道的协议吧？”

“是的，我是非常……”我开始说。但是我从眼角看到汉弗莱在慢慢地摇头，这动作很难被察觉，这是一个不会被人误解的叫我谨慎行事的信号。我立即缩了回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那么急，”我说。我肯定这位大使什么也没察觉。

实际上，他似乎是急于来圆场了。“但是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的话，这难道不好吗？”

“好？”我朝汉弗莱扫了一眼。他耸耸肩。“好，”我同意地说。

“当然好。”

“而且，”这位大使继续说，“我的政府觉得，如果我们能利用这葬礼——顺便说一下，我很难过，真令人痛心——”

“令人痛心，令人痛心！”我痛苦地应声说。

“.....利用这葬礼让您和我们的总统谈上一谈.....”

“当然，当然，”我打断他说。“唯一的问题是，我将接待许多尊贵的客人，我不知道.....”

大使阁下感到不快了。“您就不想和我们的总统谈谈吗？”

“我当然想。”我令他宽慰地一笑。“当然，毫无疑问。”自从两天前和汉弗莱那场谈话之后，我充分意识到直接参与和法国人谈判的危险。所以我想解释说，我宁可只是和他**谈谈**，而不要协商。我想向他暗示，具体参加协商的事本该是我的下属的事。

他能理解这种矜持的态度。但是他不愿就此罢休。“您是否觉得，朋友之间的小小不和好是由相互谈谈、面对面地谈来解决？”

“朋友之间是该这样，是的，”我回答说。汉弗莱的脸都发白了。

但是大使却不动摇。“我看，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的总统会感到很不快的。个人倒没什么，但是，这是对法国的不**惊**。”我**想**，他是说**不敬**听上去很像是“不**惊**”，可是不明白什么叫不**惊**。

但是，我还是让大使阁下放心，我们一点也不想对法国表示不敬，我把法国看作是**挚友**。

他很高兴。我希望他好走了，可他不走。他很有自己的章法。

我们又进入第二项议题。

他声言在总统访问期间他很担心大使馆的安全。这倒令人很吃惊。我朝汉弗莱看了看。有理由担心吗？但是，不，从汉弗莱的表情来看，我明白这又是一个法国式的花招。我们俩都保证警察厅长完全能控制局面。

大使并不就此满意。“我国政府要求让法国警察来保卫我们的大使馆。”

汉弗莱给我传来了明确无误的警告信号。他的表情是在说：“无论如何也不行。”所以我对法国大使说这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他装作愤慨不已。“这肯定不是**不可能**的。”

我决定发起进攻。“您不会是说您不信任英国警察吧？”

“我国政府对英国警察不作评论。”他小心谨慎地回道。“但是，如果法国警察出马，总统会更放心些。”

我看出来汉弗莱急于想击败他。所以我就让

他出场，我自己则靠到我的转椅里。

“问题是，阁下，”汉弗莱说得有条不紊，把阁下两字说得听上去像是带有一丝讥讽，“在伦敦有七十三个大使馆。无疑地，大家都想用自己的警察。只要有可能，大多数使馆还想配备机关枪。女王陛下的政府很难相信，这会使伦敦变得更完全。”

这些讽刺的话直冲着他说。但是，他似乎用一种外交上的优雅风度来接受了我们的拒绝。“我国政府感到很失望。可现在，我想接下去谈一谈轻松一点的问题，我们的总统将为女王陛下带来一份小小的礼物。”

我强作笑容。“真是礼仪周到。”

“一条小狗，”他解释说，其实这已没有必要了。他还要费这麻烦干吗呢？他一定知道我们已知道内情了。“这条小狗和女王陛下访问法国时送给总统先生的那条是同一条拉布拉道狗所生。”

我等着，不表示高兴，也不表示感谢。所以他就一直把话说完了。“也许，您能让我们知道献礼仪式是怎么样的？”

我叹了口气。“大使阁下，”我耐着性子说。“你们真是客气，想得真周到。但是，您明

白，在六个月内，这礼物是送不成的。我们有检疫法。”

他自然是表示拒绝理解。他说这是荒唐的。他提醒我说，女王在她访法时就送过狗。

我解释说，我很高兴他的总统也这么做，但是法律总归是法律。

“我想，”大使问道，这时他的态度显然变得很冷淡，“你们的法律只是不让受感染的动物进入国内吧？”我表示同意。

“但是您总不会暗示说，法国总统会把有病的狗送给英国女王吧？”

“不，当然不。”

“那么就没问题了。”

“不，有问题的。”我很坚决。“我必须请您向您的总统建议另换一件礼物。”

大使阁下对我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这只是总统个人的事，也许……”他耸耸肩。“但是总统的夫人，我们的第一夫人，已经决定了，她决定这么做。”

又进逼了一步。现在看来，如果我不行，我就是侮辱了一位夫人，还是第一夫人。我对他说我们将竭尽全力。但是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外交词令中，这是坚决的形式了——编者。）

大使站起身来。“首相，我想我不一定要告诉您，如果女王拒绝总统送她一份回礼的话，我国政府会把这看成是一次多么严重的冒犯。恐怕这会被看作既是对国家的也是对个人的一种侮辱。对总统和他的夫人都是侮辱。”

我再也不要听这种胡言乱语了。我也站起身来，“阁下，请总统别把这条母狗带来。”

汉弗莱吓得透不过气来。大使只有瞠目结舌的份了。我马上意识到我的话有两种意思。

“小狗，”我急忙说，“我是说小狗。”

今晚，在办公室楼上的公寓里，我和安妮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唐宁街十号的顶楼——编者。）我们得把她对葬礼所作的安排再检查一遍。她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给那些夫人们安排那么多的参观活动。我解释说这是外交部的主意——这样可以使她们不碍手碍脚。她们不能和丈夫在一起，她们的丈夫正忙着呢。

“可这只是葬礼啊！”安妮说。

我解释说，她没有看到葬礼的实质：那些人是为政治目的而来的。这是一个工作葬礼。实际上，几个月前我们在挪威参加一个葬礼时。法

国、德国和我就在旅馆里一直讨论欧共体农场配额问题，结果我们都忘了去教堂。

安妮觉得有趣极了。“他们发现了吗？”

“葬礼结束前，我们赶到了。我们责怪了保安人员。现在，任何事情都可以怪保安机构。”

事实上，这次葬礼真是个天赐良机，千真万确！比首脑会议强多了，因为人们不会在事先有什么期待。公众不会期待他们的领袖参加葬礼回来时，已达成了禁止检测和减少农场配额的协议。所以，我们倒反而可以进行真正严肃的协商，而“首脑会议”只是一场展示公共关系的马戏表演。在那种场合，新闻界从来不给政治家一个真正的机会来进行协商。新闻界的人只想找出问题，外交家们只想解决问题。

安妮想知道是否真有人参加这次葬礼是为了对朋友表示哀悼。我笑了起来。如果只是他的朋友来参加的话，连祈祷室都坐不满，更不用说教堂了。不，我的杰出的前任这一死，无疑是比他一生中所做的任何事对世界的贡献都更大。

她问仪式安排妥贴了没有，我的有趣的老安妮。她是虔诚的，还记挂着这件事。我对她说会有音乐的，我也只知道这点。

“那就好。”她说。

“是啊！”我说。那样的话，当风琴演奏时，我们就可以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了。不幸的是，在布道和祷告时，我们不得不停止讨论了。

安妮微笑起来。她弄明白了。“布道时你们怎么办呢？”

“那是我们的客人调节乘飞机造成的时差上的不适的良机。”我解释说。

这次葬礼来得真是太是时候了。且不说那本倒霉的回忆录在国内已经寿终正寝，我会让选民们看到我置身于世界各国的领袖中间，这将有利于我在大选中的处境，而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中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何况，这也是在第三世界中交更多的朋友的大好时机。

“吉姆，”安妮问，“我有一件事一直不明白。如果说我们是第一世界，贫穷国家是第三世界，那么谁是第二世界呢？”

“问得好，”我说。“我倒从没听到有人承认自己是第二世界。我们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集团，也许他们认为是我们——可是因为没有人提过这问题，这也就不是问题了。这就是外交，安妮！”首要的是，中东正有不祥之兆发生。我相信，只要有时间，我会把作战的双方拉在一起和平共处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三天之内还不能解决某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得希望还有什么要人在三

个月内死去。

9月6日

今天从外交部和内政部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对付小狗难题的建议，一份比一份蠢。

（第一份是欧尼斯特·罗启爵士的，他是内政部的常任秘书，他的信复印于下——编者。）



[内政部]

安妮女王门
伦敦 SW1H9AT

备忘录

寄自常任秘书 9月6日

致：伯纳德·伍利

亲爱的伯纳德：

我们有两个办法来解决正在讨论的问题：

1. 我们可以通过一项国会的权力授予法，使这条狗能留在英国。权力授予法什么都能做到。

2.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白金汉宫变成一个狗的检疫区，虽说这不符合法律精神，倒也不违反法律条文。请让我知道首相的反应。

欧尼斯特·罗启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内政部的前面两条建议完全是满纸荒唐言。一条权力授予法什么都**能**做到——这样的话，也能做到叫我在下次大选中落选。

建立狗的检疫站的想法不能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女王其它的狗又怎么办呢？

外交部比内政部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让葛雷汉碰了一鼻子灰走后，查尔斯王子街[2]送来了备忘录。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伦敦SW1 A2AH

备忘录

寄自常驻秘书 9月6日

致：彼得——盖斯康因

亲爱的彼得：

我们想到一个绕过这个问题的办法！把白金汉宫从观念上变为法国大使馆的延伸。那样的话，这狗就能仍在外国的领土上了。

请作出反应。

迪克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就让他们看看我的反应。我告诉他们，一旦真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们总是显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和愚不可及。我提醒他们说，我近正在为隧道的主权而斗争。他们认为我对王宫主权的丧失会作何感想呢？

文职部门的人总是精明得可怕，还总是好为人师——**特别是**外交部的人。有先例可循，生活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他们这些人就像电脑一样：叫他们面对**新的**难题，他们的程序还没有编入，那么，他们的脑子就要短路了。

（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在被人说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和愚不可及时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更使他们痛苦的是，说他们的正是自己就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和愚不可及的哈克。使他们痛苦的是，哈克没说错——编者。）

同时，十号里的人整天都像发了疯。所有私人办公室的电话**整天**都在响着。

伯纳德干得很出色。他没忘了给王宫打了一个电话，弄清楚至今还没人正式告诉女王陛下有人建议送这么一份礼——这样的话，她也不会有要拒绝的意思。

但是连伯纳德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这条狗，他所能提出的就是让我们在巴黎的大使对它“下手”……暗中放点毒药，向保加利亚人借项

伞尖。（请参考1978年乔吉·马可夫的谋杀案，这是位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外服务部工作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加利亚人，他在伦敦汽车站被人用带毒的伞尖刺死——编者。）

这种偷偷摸摸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后果会令人难堪之至。英国的选民能容忍日益增长的失业率，通货膨胀和赋税，以及英镑和证券的贬值——可是当他们一旦认为我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去把这条拉布拉道狗送上西天，他们是绝不会再选我的。英国人知道他们该把什么看得更重！

在无法解决对付法国人的问题的同时，今天的其它事情倒是进展顺利。我们为许多会议都安排了翻译。甚至在名单上还有为我和美国副总统谈话时的口译人员，我想这大概是在打字时错打上的。（几乎一定是这样的。归根结底，如果宽大为怀的话，说英语的国家总能包括美国的。事实上，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可能就纯粹是因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都不能说别种语言——编者。）

明天各国的首相都会驾临本国了。伯纳德对我说皇家海军乐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得学会奏各国国歌。当我们知道阿根廷不来的时候，我们真是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倒不是因为我们让

他们在福克兰群岛吃了败仗，而是因为阿根廷国歌有三大段，要演奏六分钟[3]。

教堂里的座位成了今天的大问题。这得由我来审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是以字母顺序来安排的，结果，伊朗就坐在伊拉克边上，以色列和约旦则坐在一条长椅上。我们不是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伯纳德给教堂通了电话。他们对他说这些人是坐在了一起，因为教堂中的人认为，他们来自世界的同一部分，他们在一起会感到自在些。伯纳德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说，相近并不等于相亲。

还有人指出，爱尔兰也坐在同一条长椅上，这会使情况缓和些。我指出爱尔兰一点儿也不会使情况缓和。对我们来说，不会的。决不会的！

彼得，我的私人秘书，到我的书房里来让我看了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的概要。当然，伯纳德也在场。

“西班牙大使说他的外交大臣想讨论一下各国联合起来的事。

而意大利想讨论一下欧洲的事务。”这些显然都是暗示些什么的密码。我问他们是什么意思。

彼得把这些话解释了一下。“西班牙想要回

直布罗陀。而意大利却要扩大欧共体的酒池。”

（当欧共体的外交大臣开完高级会议回家的时候，如果他们说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促进欧共体的事务时，他们政府都会吃惊的。欧共体只是一个海关联合体——政治家只靠维护他们国家的利益来讨好他们的上司——编者。）

“新西兰，”彼得继续说，“想在英联邦的领袖中开一个随意的会议来讨论英国在南非支持种族主义的做法。”

我问他们干吗又旧事重提。他对我解释说，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欧共体的白脱配额把新西兰的奶制品排斥在外，这使他们极为恼火——或是说明他们对自己在核政策上的向后转可能感到内疚。

彼得建议对新西兰作皇家访问。这主意妙，虽说这有点远水救不了近火，无助于解脱目前的窘境，除非提出对他们进行皇家访问时作为交换让他们免开尊口。彼得提醒我说，我们在南非问题上注定要遇到大麻烦的。

“是人权问题？”我问。

“不，他们想多出口些柚子。”

我还学了一些正确的称呼。对塞浦路斯主教的正确称呼显然不是主教大人，而是法座大人。

如果教皇特使说“我们想洗洗手，”他的意思是手头拮据。

正在这时，伯纳德接到了宫中打来的电话。我们都屏息凝气地在听。她听到小狗的事了吗？如果听到了，她的意见怎么样？但是她没听到！宫中得知希思罗的红地毯出了问题。（是有问题，但解决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女王陛下担心象牙海岸的总统会——显然他是会的——送给她一头象。

我脑子都要炸裂了。“伯纳德，彼得，看在上帝的份上吧！”我吼叫起来。“不能再来一头动物了。特别是大象！整个的怀特霍尔，外交部，内政部，内阁办公室和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在近一周内全为一条小狗伤透了脑筋。政府都已瘫痪了。不要再来一头大象了！！”

但是我弄错了。象牙海岸要送的分明不是一头真的大象——只是大象纪念章。问题在于，送礼时会附送一个湿漉漉的吻。

我让外交部的人去对付这事。

9月7日

明天是我那可怜的前任的葬礼了。今天我们打败了法国佬。

我说不出这两件事中哪一件更叫我心满意

足。

可是事情一开始并不那么顺利。

今天一早伯纳德带着两份档案进入内阁区。一份有一吋厚，另一份有六吋。

“那究竟是什么，伯纳德？”我问。

他指了指薄的一份。“海峡隧道的档案，首相。”

“不，”我说。“我指厚的那份。”

“喔。”他看上去很无奈，“那份是小狗的档案。”

“怎么说？”

“今天早上称了一下，有三镑半重。”

“是小狗？”

“是档案，”他认认真真地回答。

我们已对法国说了，很遗憾，机场保安部得把小狗关在希思罗机场的检疫站里。法国方面至今未作答复，但是，为了听上去好一些，外交部已让法国方面明白，因为希思罗机场是在白金汉宫和温德城堡之间，所以女王会在她的路上去看一看它的。

我很感奇怪。“可以去看一条在作检疫测试

的狗吗！”伯纳德也不明白。“如果她不能去看的话，”他回答说，这时他已对整个事情觉得烦透了，“她也能在M4公路上驾车路过时，向狗挥挥手。”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场所谓人为的冷遇之后，法国方面会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可能的是：如果我们在海峡隧道问题上再不让步的话，他们会大张旗鼓地发布这消息。

我们对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自然是全天准备的。汉弗莱爵士顾不得礼仪地冲进房来。

“首相！”他气都喘不过来了。“我有一条紧急消息。”

“好消息？”人总是抱希望的。

“是的……不。”他很谨慎。“在法国大使馆的底楼，警察发现了一枚炸弹。”

我惊恐不已，“谁放在那儿的？”

“我们还不知道。许多人会有动机的。”

“举个例子说，我们就有这动机。”伯纳德说。

“不管怎么说，”我说，尽量往好处想，“我们发现了，我看，这总是好事。”这一定是汉弗莱的消息中好的部分。

汉弗莱还有话要说。“另一条消息更糟。法国总统不乘飞机来参加葬礼。”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对我来说倒像是条好消息。当汉弗莱说总统来的，只是坐汽车来——秘密地，我**还是**觉得这像是好消息（不那么好，但也差不多可算是好的了）。不乘飞机只是一个圈套，一种障眼法。

“这倒像是个好主意，”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

“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汉弗莱气得牙关咬紧了说。“他可以把倒霉的小狗放在车里偷带进来了！”

汉弗莱说得对。我们难道就无计可施了？“首相，您难道想下命令拦住法国总统的汽车，并对您邀请来参加葬礼的客人进行搜查？”我完全是中计了。“您难道想违反外交豁免权来搜查外交行李包吗？”

我被弄得晕头转向，“总不能把狗放在行李包里吧！”

“行李包就会是一只放狗的包，”伯纳德说。

“要是我们真的搜查，并找到小狗呢？”我在考虑我的办法。“那会像是湿手沾上了面粉，事情就麻烦了。”

“那就再洗洗手吧，”伯纳德说。

“但是.....更糟的是.....万一我们错了呢？”汉弗莱解释说，

“万一里面没有狗呢？”

他说得对。我可不能冒这个险。无端地去违反他们的外交豁免权？这会引来一场灾难的。

“但是，”汉弗莱说，他故意唱起反调来，“如果狗是在车里的话，他们就可以带着狗一路驾车进入法国大使馆了，那时，狗就在法国的领土上了。就在我们伦敦的中心了。”

“搅得我们心神不宁，”我情绪灰暗地看到这一前景。

“让我们祈祷吧，但愿这是条训练有素的狗。”伯纳德说。

伯纳德·伍利的回忆[4]：

那晚在十号里我们开了个外交招待会。会上充满着幽默的谈话，大多数是无意识的。

当然，我扮演的角色是使首相的客人感到随意。特别是法国客人，我记得还把哈克先生介绍给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贝伦吉先生。他谈兴正浓，

他还对我们俩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葬礼。上次他参加了安德罗波夫[5]的葬礼，那次葬礼一点都没有生气。

我有幸把他介绍给警察厅长。我解释说，贝伦吉先生是作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外交代表来到伦敦的。“啊，是啊，”这位警察厅长说，一面还像无所不知似地用手拉拉他那牙刷般的白胡子，“这小国家很美丽。”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十号里正在开着群星璀璨的招待会——我却在那儿大战法国人。虽然，我得老老实实在地承认，法国方面的目的过于离谱，这才使我大获全胜。

人人都很高兴。没有人在为明天的葬礼而难过。美国副总统带来了葛罗米柯[6]讲给他听的一个新的波兰笑话。“你们听说过一个新的波兰笑话吗？有关雅鲁泽尔斯基的！[7]他很长时间地大笑起来。

副总统急于想讨论一下在德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问题。这在招待会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在教堂里再谈。

接着他消失在人群中了，他想去找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人谈谈。

（不结盟国家的定义是，不和美国结盟——编者。）

俄国人表现得不错。在客厅里，苏联大使坐在汉弗莱爵士旁边谢拉登式的沙发上，正在和我们一起缅怀我们前任首相的往事。

“你们知道，前任首相的故世真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

“令人非常难过；很难过，”汉弗莱尽职似地喃喃说，一面啜了一口白葡萄酒。

“但是对英国来说，这也不是一个损失，”这位俄国佬继续说。

“你们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问题压倒一切。我想得出不少答案，可我还是想听苏联方面的观点。“他这儿很行……”这位大使指指他的头“……这儿很行……”他指指他的心。“可这儿不行！”他吼叫起来，一把去抓住汉弗莱的私处。

汉弗莱尖叫起来，一下跳起来，把盛满梅肯村酒的杯子掉在地上，而俄国大使却放声大笑起来。我笑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离开这房间。顺便说一句，这位俄国大使说得很对。

有一段时间，我看不到汉弗莱的人影儿。他不在场很让人感觉得出来。我想他或是在重整尊

严，或是在擦去他裤子上的酒渍。我一直在找他，因为在和法国总统谈话的时候，我需要有他的知识和忠告给我带来的安全感。这场谈话不管我多么不喜欢，却是再也不能往下拖的了。

接着，伯纳德和警察厅长这一对放在一起不大相称的伙伴把我从宴会厅中一路通畅地领了出来，穿过有护板壁的大厅，来到我的书房进行一次私下的谈话。汉弗莱等在那儿。

“要我来干吗？”我问。

“法国大使馆花圈里的炸弹是法国警察放的。”警察厅长说。开始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这不是玩笑。

“他们是想看看我们能不能发现。想证明我们的保安措施不力。”

几个月来这是我听到的好的消息了。他们给我看了证明材料。在旅馆里找到了和炸弹配套的雷管。他们招供了。

我是欣喜过望了。法国警察把炸弹偷运进英国的事正给了我求之不得的机会。我叫汉弗莱安排我和总统谈几分钟，并在谈话中当我按一下有目的地装在书桌里的秘密电铃时候，他就进来打断我们。（显然是为了制造碰巧来打断的假象而装的电铃——编者。）

好了，他们把总统先生引进了我的书房。我向他抱歉，让他不得不离开宴会厅几分钟。我表示想和他谈谈隧道的事。可他却还不想讨论隧道的事。“首先，我们能不能先澄清一下愚蠢的误会？关于明天我想作为回礼送给女王陛下那条小狗的事？”

那么，他们**确实**把它偷带进来了！“总统先生，”我说，态度十分坚决，“我非常抱歉，但是这里没有什么误会。我不能让女王违反法律。”

他微笑了。“我并不想让女王陛下违反法律，我只是请首相变通一下。”

我再一次道了歉，非常正式地道了歉，然后说不行。他很傲慢，一付不可侵犯的样子，还表示出受到了很大的冒犯。他评论说，如果法国人民得知这次的“回绝”，他们会把这看作是对法国打了一记耳光。这听起来好像对他们是否会得知这消息还有疑问似的。我私下里相信，法国人（不像英国人）比他们的领袖要富有常识，他们决不会那样想的。

所以我们又回过来谈到隧道的事。现在总统就随心所欲地利用起他认为已经造就的有利形势来了。“至于隧道，您使我对这件事很感棘手。法国人民不能接受这第二记耳光。您拒绝接受我们关于法国主权延伸到朵佛，但不包括朵佛的合

理建议。但是把这先

搁在一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 *Langue de préférence*？”[8]

我走到我书桌旁，装腔作势地拿起一张纸和一支笔来。我把左手悄悄地放在书桌面下，按了一下铃。他没有注意。“当然，”我合情合理地说，“如果一半的签字合同先用法文，一半先用英文，那就公平了。”

“公平，是的，可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什么要紧？”我问。

“法律又有什么要紧？”他回答说。

“当然要紧，”我说。“英国是唯一没有狂犬病的欧洲国家。”

汉弗莱连门也不敲就直冲进来。他带着材料来了。“总统先生，请原谅，首相，我想你们该先看看这份紧急的材料。”

我坐在我的桌边，把材料打开。我读了。“不！”我喘着粗气，目光炯炯地盯着总统先生看。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继续读下去，让他去保持悬念。然后，我站起身来进行谴责。

“总统先生，恐怕我得请您作出解释了。”我把证明法国方面安置炸弹的材料递给他。他读

了。他依旧不动声色。

“我希望我不必再解释这事有多么严重了，”我说，心里倒希望我**确需**解释一下。

我并无此好运。他的眼光从材料上抬了起来。“首相，很抱歉。

我必须请您相信，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可能是不知道。但是我不能轻放过他。他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轻放过我的。“这是一个客入企图欺骗女王政府的阴谋。而且还有非法把炸弹运进英国时大罪一桩。”

“您得知道，”他合情合理地回答说，“法国政府从来不知道法国保安部在做些什么？”

“您是说，对他们的行为您不负责任？”

这不是他的意思。他推卸不了责任。“不，但是……如果这报告是真的话，我得请求您接受我深切的遗憾之情。”

事件的真实性很容易就被证实了。接着，汉弗莱露出了这一杀手锏。“您看，这使首相在海峡隧道问题上很难处理了。”

我表示同意，“炸弹事件一公布，英国人民是不大肯让步的。”“他们会觉得过隧道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汉弗莱咕哝着说。

“隧道里会放满法国官方安置的炸弹，”我补充说。

总统先生和我四目相对。他依然默不作声。得由我们发球了。

“当然，”我提议说，“为了英法两国的友谊，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你们保安人员所犯的罪。”

他提出作一半让步。名副其实的一半。“我建议……我们可以同意把主权只延伸到隧道的一半处。”

汉弗莱写了下来，很夸张地动着笔。

我说：“我们想有一半的文件先用英文。还有，重要的是，在两个月之内，开工典礼就得召开。先在朵佛，再到加来。”

“我看这主意很好，”他笑着说。“这也是我们两国之间友情和信任的表示。”

我们握手言欢。

“明天让我们在葬礼上看到公报的草稿，行吗，汉弗莱？一定不能让新闻界知道炸弹的事。或是拉布拉道小狗的事。归根结底，我说，双眼直视着总统，“两条消息中任何一条透露出去，另一条也一定会透露出去的，不是吗？”

“是，首相，”他说，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份公报会使本就异常欢愉的场合成为一次全面胜利和乐事逢春的庆典！

[1]1980年英吉利海峡的地下工程，连接朵佛和加来两座城市。

[2]1980年英吉利海峡的地下工程，连接朵佛和加来两座城市。

[3]实际上，长的一种演奏法大约是四分钟（看演奏的速度而定），缩短的一种是一分钟四十八秒，哈克的这条信息是外交部中反阿根廷的那部分人提供的。

[4]和编者的谈话。

[5]前克格勃头目，后来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病死。

[6]苏联前任外交部长，当时是苏联国家元首。

[7]波兰的傀儡总理。

[8]第一语言。

6. 蛛网缠结

（就在哈克、多萝西和汉弗莱达成协议，让民主推迟到二十二世纪再实行的第二天，哈克在下议院回答问题。首相每周有两次在议会回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能提出来问首相，他不必去注意问题本身。说得精确点，议员的第一个问题很可能是：“首相能列举他今天官方活动的安排吗？”补充提出的问题就完全是什么都可能的了。比如说：“首相有时间来考虑上涨的利率吗？”或者是“首相有时间来考虑有关阿格尼丝·穆尔豪斯，要建立亨兹华斯伦敦地区的警察不能涉足的禁区的丑闻吗？”或者是“首相有时间来考虑有关百分之五十的荣誉头衔授给了只占不足人口百分之一的，几乎都在政府部门里的人的丑闻吗？”

首相可以用下面几种方式作出回答：诚实地，不诚实地，或举出一大堆数字。他可以作出反击，也可以恭维提问的人，或者开个玩笑。后者是危险的，也是不便作出的反应。

像所有的首相一样，哈克会审慎地为提问时间作些准备。伯纳德·伍利和议会提问秘书——私人秘书办公室主任——会在首相的屋子里，从两点三十分到三点三十分，来讨论该说的话。他们

会带上三整卷书，里面列举了以前每一位议员曾在议事日程表上提的问题，说明了议员的特殊兴趣是什么——重要的是——以前所作的回答是什么。首相有责任回答有关政策的问题。然而，如果问题只需一个纯粹列举事实的回答，首相可能就给一个书面答复。

事先安排好一些问题可使他负担减轻不少。这种问题可能来自下议院相互对立的双方，政府中渴望晋升的后座议员也很可能说——“我一直很想提供服务，首相。”——甚至提出：“您想要我问些什么，首相？”

更何況，首相的议会和私人秘书的工作就是“套住”议员：“首相想让您问这个问题。”然后，首相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问题是有敌对情绪的。叫人难堪的问题经常是来自政府一方的——来自那些失望的、失势的、酸溜溜的后座议员们，他们要就是被人忽视了，要就是被人辞退了。

因此，首相回答提问的结果往往是，在万里无云的晴天突然刮起一阵狂风——编者。)

伯纳德·伍利回忆说^[1]：

当有人问吉姆·哈克他是否一直在接线窃听议员们的电话时，他的回答倒可谓妙语惊人：“虽然我既尊敬又高度

评价在这个下议院里的所有成员，但我得承认，我对这些可敬的议员说的话，除非是绝对必要的，连多听一个字都无此愿望。”这一说引起了哄堂大笑。

（大笑的议员大多数来自他自己的党内，那些渴望荣升的和那些害怕被辞退的。这些人组成全部大笑的人群——编者。）

但是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我们回到十号时，汉弗莱爵士在通向内阁办公室的狭窄过道的拐弯处截住了我。他问我那天下午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怎么样了。

“很快活。”我回答，“他在今天下午的答问时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

“是吗？谁的看法？”

“他的。”我说。实际上，我在开玩笑。人人对他回答窃听议员电话的问题都很感兴趣。

只有汉弗莱神经过敏。真的，他似乎是那么担心，我开始害怕，不敢正眼看他。他责备我事先没提醒他——作为内阁秘书，汉弗莱料理着政府保安方面的工作。我解释说这是预料不到的意外问题，但是他不同意，他说这是一个可预料的预料不到的意外问题。

从汉弗莱爵士的行为和不安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虽然首相否认了他派人去窃听过议员的电话，但这个回答不符合事实。

英国首相竟会对下议院撒谎，这真使我大为震惊。这叫人难以相信。但是汉弗莱腋下夹着一份档案，他告诉我这档案里有着证据——包括手抄本。

汉弗莱要求立即见哈克。因为首相正沉浸在他的成功之中，他并不常有这种真正欢乐的时候，我怀疑我们是否好稍等一下。但是汉弗莱的看法是，哈克不该这么快活。他坚决要马上见他。

11月15日

今天我在答问时间里回答得精彩极了。我的情绪是绝对的好。所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汉弗莱出人意外地出现在内阁会议室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吃惊。

“首相，我想跟您谈谈有关今天下午首相在答问时间的事。”

“谢谢。”我说。我的态度谦虚得恰到好处，“我接受你的祝贺，是不是更精彩，伯纳德？”

伯纳德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相信，首相。

您今天下午的回答叫人很难忘怀。”

汉弗莱想要说话，但我没让他说。从他的态度上，我该看得出天际出现了暴风雨前的乌云，但我没看出来。我傻乎乎地还想复述一下我的胜利。“我来告诉你事情是怎么样的，汉弗莱。”我急急地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内政部把监狱缺少官员的事搞得一团糟。我很有气度地回答说，‘我请这位可敬的议员去查一下 4月26日我在下议院作的发言。’”

“他记得您说的话吗？”汉弗莱问。

“他当然记不得。我也记不得。但是这是回避问题的好办法，因为他对我说的话像我一样忘得精光，我们就直接转入下一个关于失业率和就业部有否捏造数字的问题。”

伯纳德纠正了我：“您的意思是‘周期性地调整产生数据的基础，以便不让公众注意到事实’？”

“正是这样。”我重复说，“控制数据。”

汉弗莱不顾原来他自己要说的话，现在对此很感兴趣了。“当然，他们是这么干了。”他说。

“我是知道的。”我说，“但我回答得很了不起。我说我没有发现什么证据。”

伯纳德说：“那是因为您没去调查。”

“还因为我们没给您看。”汉弗莱补充说。

“我知道，汉弗莱。谢谢你。做得好。所以接着我们又谈到了能源部正在酝酿的清除核废物的计划。提这问题的人是想逼我承认内阁是分派的。”

“是分派的！”汉弗莱评论说。

“我知道是分派的。”我说，“所以我说，‘我的内阁作出了一致的决定。’”

汉弗莱笑了：“那是因为您威胁要开除不同意的人。”

当然，他说得对。但是这自然就使他们一致同意了。不管怎么说，这时候，我的后座议员们都为我的每一句话鼓掌。“接着就有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尽管我们在反导弹上花了那么多的钱，可是，自从第一枚导弹从生产线上产生以来，它就一直被废弃在那儿。”

汉弗莱很好奇地想知道我又是怎样绕开这个问题的。

“我的这一手才是真绝。我没有绕开它。我的回答真聪明。我就说‘我们的政策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么有效，虽然此事我们办得不妥。’”

汉弗莱的嘴张得大大的。他大为震惊，我居然能这样承认。但是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回答。

这就叫避开锋芒。一个完全诚实的回答总是使你在下议院得到一个使大家吃一惊的效果。

伯纳德在回忆中仍感到津津有味。“还有一个问题确实是意外的，汉弗莱爵士。他们问首相什么时候辞退对此负有责任的大臣。”那不是太容易回答了吗。来一个未着地的直线投球。我直接将球投到边界线得分[2]。“在他被发现是犯错误的当时，而不是事后，要他辞职”支持我的议员们站起来为我鼓掌，蹬脚，挥舞他们的议事日程单。这一天叫人难忘！

但是，不幸的是，这一天也因为别的原因叫人难忘。当然，从汉弗莱潜身进入内阁的样子中，我早该看出事情不妙了。我错误地把他对迫在眉睫的灾祸表示出来的哀伤，看作是因为没有他的帮助我也能巧妙地对付下议院的局面而产生的嫉妒。但是事情还远不止这样严重。

“我认为。”他漫不经心地说，“在窃听议员的电话上有一个问题吧？”

“愚蠢的问题！”我说，“我们干吗要窃听休·海利法克斯的电话呢？他是我的议会私人秘书，我自己行政办公室的一员。我想不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事后，我意识到这回答可能听起来很蠢，但是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事实。汉弗莱想打断我，但是我不愿听。说到底，我怎么会知

道我当时不知道的事呢？

“你能想象吗？”我说，把汉弗莱完全搁置一边，这只是比喻的说法。“我们干吗去偷听一个议员的电话？乏味，无聊，全是一些成见。我尽力不去听这些话还恐不及呢。休只是一个议会私人秘书，我是说，在弄清国防部里发生的事情上已经够我麻烦的了，他会知道些什么？这对我来讲无异于入地狱。如果我生活上犯了罪，上帝才会用这办法来惩罚我——他会要我坐下来听议员们的讲话录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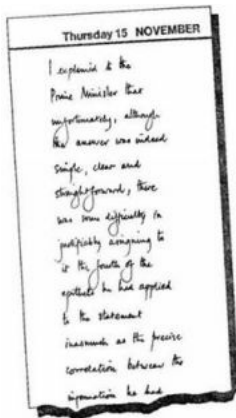
我得承认我很为自己高兴了一阵。汉弗莱却一点也乐不起来。

“那么我认为您否认海利法克斯被人窃听了？”

“是啊。”我说，“这是今天我能简单，清楚，直截了当，诚实地回答的问题。”

这时，汉弗莱怒气冲冲地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

（幸亏，汉弗莱爵士在当天就把他的评论在私人日记中记了下来——编者。）



我向首相解释说，虽然这回答很清楚，简单和直截了当，不幸的是，很难用上他对自己的话用的第四个形容词[3]，因为他所提供的信息与事实之间的距离想要用英国的语言来承担填空的任务，那将会使它不胜重负的。（阿普尔比文件 TK/3787/SW）

11月15日

口头回答
教育和科学大臣有关教学大纲的本质。

首相 活动

问题1. 泰勒克先生问首相是否能列举他在11月15日星期四的官方活动。

首相（詹姆斯·哈克先生）：今天早上我将和内阁成员和其他人会面。除了在下议院的任务外，今天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会议。

泰勒先生：首相是否知道因内政部办事不力，出现监狱官员严重不足的不光彩局面？

首相：我请这位尊敬的先生去看一下4月26日我在下议院的发言。

问题2. 弗莱德·布劳德赫斯特爵士问首相是否能列举一下11月15日星期四的官方活动。

首相：我请这位尊敬的先生看一下几分钟前我的回答。

弗莱德·布劳德赫斯特：首相能否向我保证，就业部并没有周期性地调整产生失业率统计数字的基础，以便不让公众注意到事实？

首相：我很高兴向尊敬的先生保证我至今还没有这方面有力的证据。

问题3. 赫克斯利夫人问首相是否

能列举一下11月15日星期四的官方活动。

首相：我请尊敬的夫人去看一下我几分钟前的回答。

赫克斯利夫人：首相是否能证实内阁没有同意能源部有关清除核废物的计划？

首相：不是这样的。我的内阁已一致同意。（尊敬的议员们叫：“听啊，听啊。”）

问题4. 爱尔格罗夫先生问首相是否能列举一下11月15日星期四的官方活动。

首相：我请这位尊敬的先生去看一下我几分钟前的发言。

爱尔格罗夫先生：今天首相是否有时间来考虑，为什么尽管在新的{反导弹}上花了那么多的钱，但自从第一枚导弹从生产线上产生以来就一直被废弃呢？

首相：我们的政策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有效——（稍停）——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有效，显然我们办得并不妥。（大笑声。）

在野派的领袖（乔治·海德力先

生)：那么，什么时候首相会请求辞退对此负有责任的大臣的职务呢？

首相：这位尊敬的先生很清楚我会在这位尊敬的朋友被发觉犯错误的当时辞退他，而不是事后。

许多尊敬的议员站立鼓掌。

主持人先生：安静。

查普曼先生：让程序符合规定，主持人先生。

主持人先生：我会使程序符合规定的。

问题5. 吉尔先生问首相是否能列举一下他在11月15日星期四的官方活动。

首相：我请我的尊敬的朋友去看一下几分钟前我的发言。

吉尔先生：我尊敬的首相能否向下议院保证政府没有，也从不偷听尊敬的议员的电话？

首相：虽然我尊敬和高度评价下议院的意见，但我得承认，除非我不得不听，我是连多听一个字也不愿意的。

(大笑。)

在野党领袖：首相真的是说尊敬的议员安屈莱(海利法克斯先生)没有被

——〔停顿〕——没有被窃听……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我意识到他为了希望不致太伤人心，不致太令人难堪，或是为别的原因，他正想掩盖起他原想要说的话。但是我得请他解释。

他抖擞一下精神来作回答。他看了看地板，天花板，又看了看窗

外——后他的眼光和我的眼光相遇了。“您说的是谎话。”他说。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谎话？”

“谎话。”他重复说。

“你是什么意思，谎话？”我简直不懂他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首相。”他支支吾吾地说，好像在寻找一个解释清楚的方式，“……您……说了谎话！”

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又试着说，

“嗯……您没说事实。”我暗中问自己，他会不会是想说我们是偷听了休·海利法克斯的电话？

他点点头。“我们听了。”

“我们听了？”我被吓坏了，“什么时候停止窃听的？”汉弗莱看了看他的手表，“十七分钟前。”

我大大地受到了伤害，也为我的正直的品德受到这样的非难而大为不安。“你不能说这是说谎。”我抱怨说。

“我明白。”汉弗莱把头斜往一边，脸上露出希望地看着我。他看上去像是一条想学本领的长毛牧羊犬。“那么您把讲真话的反面称作什么呢？”

“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去骗他们。我决不会有意地使下议院引出错误的结论。”

（哈克因蒙在鼓里而暴怒的时候，显然忘记了他曾骄傲地承认那天他就有好几次把下议院引向错误的结论。诚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永不会故意地对下议院说谎，那是因为他怕后果严重。实际上，为了历史学家都不清楚的原因，说说似乎是一个下议院不肯原谅的罪愆，虽说它比起我们的政治家们给我们招来的许多大灾难来，真是微乎其微——编者。）

“这没用。”汉弗莱说，“您确实对他们说了假话。”

“但这不是我的错！”他似乎一点都不明

白，“我又不知道他被窃听了。”

伯纳德轻轻咳一声来引起我的注意，“首相。”他心怀同情地解释说，“光说您不知道是不够的。您是应该知道的，终还是得由您来负责。”现在我是大怒了：“那么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伯纳德看着汉弗莱。他们都很窘。“内政大臣”汉弗莱咕哝着说：“可能觉得没有必要让您知道。”

“为什么？”

“也许有人忠告他说您没有必要知道。”这真滑稽。“但是我**确实**需要知道。”我指出。

这时伯纳德只有求救于文官特有的把话讲得叫人听不懂的本事了。他和汉弗莱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他说的话我是一点都听不懂。

伯纳德·伍利回忆说[\[4\]](#)：

我对我说的话记得太清楚了。我简单地解释了，在当时并没有人知道哈克需要知道现在知道当时就该知道这回事，所以那些给内政大臣提出忠告和提供信息的人可能认为，是否要向高权威人士报告这已知的消息还属未知，所以就没有理由向权威报告，因为应该知道的这一需要在当时并不知道。或者并不需要知道。

我想我的解释是清澈如水，但是，主啊，对哈克却不见得。也许他消化不了我说的话是因为他过于沮丧了。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我需要有人解释一下。我转向汉弗莱，我竟会向这个人求援！他提供了解释。

“也许内政大臣也不知道。我们设想，如果您在下议院被问到一个问题，您会支吾其词，或推说不甚了了，或说您会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可能**知道，首相，您居然会采取一个新的方法——切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听懂了他的话。但是我的确回避了，躲开了前面的四个问题。我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了。这个问题似乎是很安全的。

汉弗莱很表同情。“是的，我们不可能知道您会回答。不可能知道在下议院您会切切实实地否认一切窃听行为。”

“如果我不知道这事，而被问到了，我显然会这样回答的。”汉弗莱说：“我们不知道在您不知道的时候会被问到。”

这是白痴的论据。我解释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那么一定会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被问到的。但是他似乎听不懂。有时候老汉弗莱有点反应迟

钝了。好在他又不搞政治。

汉弗莱继续想为他全然无理的做法寻找理由。他用一种我很不喜欢的不耐烦的口气说：“首相，人们认为您好是不知道。海利法克斯先生是您政府机构的一员，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好不要制造不信任。我们只在您应该知道的时候让您知道。”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

“那是……您**现在**应该知道了，因为您刚才否定了这事。”

“如果在我否定以前让我知道就会好些了。”

汉弗莱并不这么来看。“相反，如果在您否定前让您知道，您就不会否定了！”

“但是！”我激动万分地叫道，“我早就该知道！”

“这并不是衡量问题的准绳。”汉弗莱很顽固地坚持认为他是对的，“在您需要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告诉您窃听的事，我们只在您知道您需要知道的时候来告诉您，”

“或者是当您要知道您是否需要知道的时候。”伯纳德说。

“或者是我们知道您需要知道的时候。”汉弗

莱说。

“您看，”伯纳德在推波助澜地说，“有时候，您需要不需要知道。”

“够了！”我叫道。叫我吃惊的是，他们立刻噤若寒蝉了。他们困惑地互视着。“为什么？”我对汉弗莱嚷嚷：“你怎么能断定我不该知道？”

“我没有断定。”他说，口气听上去很有点生气。

我被弄糊涂了。“那么是谁呢？”

“没人。”

我真是急得没办法。“那么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因为没有人决定要告诉您。”汉弗莱说。

“那不是一回事吗？见鬼！”

现在汉弗莱用一种对精神病人说话才用的冰冷的语气说：

“不，首相，不是一回事。决定把一件事对您隐瞒起来对任何一位官员来讲都是一件担当不起的责任，而决定不把一件事向您透露只是一个日常的工作程序问题。”我告诉汉弗莱我要知道一切。

“一切，首相？”

“一切！”

“那好。”他查了一下他的档案，“本周送到内阁办公室的文具

包括四包二号订书机，六百 A4开的打字纸，九十打毡面的……”他怎么这么蠢。“重要的事情！”我咆哮起来。

“那么谁来断定什么是重要的呢？”他装作全然无知的样子问。

“我。”我说，但又马上意识到我又要面对一大串的文具名称了。“不，你。”我说，但又立刻意识到前面就是陷阱。这问题好像根本就没有答案。我怒气冲冲地要他简单地告诉我，他怎么来解释隐瞒这件事的原因。

“正像您在下议院里说的那样。”他回答得很流畅，“显然我们办得不妥。”

模仿是恭维的诚挚的方式，但这种恭维我还是宁可不要。

“我办得不妥”对把首相处于这样的绝境不能算是充分的理由。

“我只是一个谦卑的仆人。”我接触过的谦卑的仆人继续说，“一个地位低下的仆人。这是内政部国务大臣的决定。”

真是这样吗？我早该猜到的。他从来就不喜欢我。“你能不能告诉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要他辞职？”

他谨慎小心地说：“请相信我对您的尊敬，首相，可能您不该要他辞职，除非他犯的错误在当时就被发现，而不是在事后。而且，今天的麻烦是您自己错误地决定否认这件事而引起的。”

我被他厚颜无耻的无礼行为所震惊。“什么？”我说。我是真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们暂不作进一步的评论——编者。）

“您不该否认一件您还没被告知的事。”他自以为是地教训起我来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这是你的错！”我叫道。“你已经承认了把这事瞒过了首相。”

现在轮到他感到愤慨了。“完全不是。首相在事先把他要说的事告诉他的文官才能使这个制度运转自如。但是如果他事先不和他的官员把事情弄弄清楚就莽撞地说出来，那么他就只能怪自己。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您根本什么也不该说。请相信我对您的敬意，首相，您得学会谨慎行事。”

我从没见过这样同义反复的辩论方式。“可

是我**根本**不知道，汉弗莱，这里有什么要谨慎处之的事儿！”

“在政府里，首相，总有一些要谨慎处之的事的。”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先前没想到。

“但是汉弗莱……我们干吗要去窃听休·海利法克斯的电话呢？他跟苏联大使馆通话了吗？”

“不。”汉弗莱说，“和法国大使馆。这就更为严重。”“为什么？”

“俄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伯纳德说。

可法国人是我们的盟友啊！不管我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也不管谁不喜欢他们！

（读者们很可以回忆一下外交部有三个他们喜欢的民族[5]：

a) 阿拉伯

B) 德国

c) 美国

也有三个他们不喜欢的民族：

a) 俄国

b) 以色列

c) 法国

它特别恨的是法国。这就是为什么直接和法国通话在印象上就会被外交部看作是叛国一般——编者。)

“谁授权的？”我问，“哪个官员授与窃听电话的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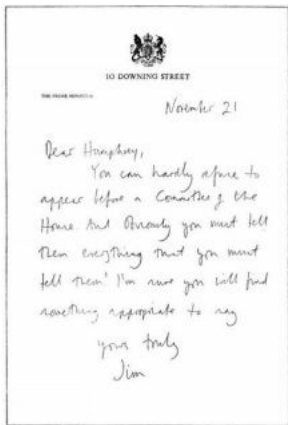
“外交部，我刚才说了！”他刚才没有说过！我也从没意识到他们有权授权去窃听人家的电话。既然他们控制特工活动，我想他们是有权这样做的，但是既然秘密情报局并不以官方设立的形式存在，他们又不能以官方出面来授权作调查。我假设是外交部的得到正式任命的官员们非官方地授权非官方的秘密情报局的官员们去做的。

汉弗莱想结束这场谈话了。“首相，说得越少越好，您同意吗？”我被弄糊涂了。“关于什么？”

“一切。”

（汉弗莱爵士想对休·海利法克斯进行窃听一事不再提一个字，但这愿望没能实现。不久他收到了下议院委员会写的一封信，请他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出席。汉弗莱爵士把信寄给了吉姆·哈

克，内附一张字条，请教哈克如何处置。哈克寄出了下面的一封信。在《三十年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此信得以公布于众——编者。）



唐宁街十号

首相 11月21日

亲爱的汉弗莱：

你不大可能拒绝出席下议院的委员会。显然你还必须告诉他们你必须告诉的事[6]。我肯定你会找到合适的话来说的。

您忠诚的

伯纳德·伍利回忆说[7]:

汉弗莱爵士召我去他的办公室，还给我看了首相的信。当然这封信没提供答案。汉弗莱爵士在担心，如果委员会问他首相是否授权去窃听一个议员的电话，一位忠诚的公仆将作何回答。而这个问题是完全可能被提出来的，

我建议他说这问题不该问他，而该问首相，内政部大臣或是外交部。

“或者英国内线电话服务工程部？”他嘲讽地问。

显然我没给他一个他想听的回答。所以我又建议他作一个他常用的兜圈子的回答：这是一个保安上的问题，所以我无权透露，证实或否认，等等，等等。

汉弗莱叹了口气。“伯纳德，您认为我真不知道有这些回答可供选择吗？”

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他解释说，这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对首相是否授权去窃听电话的事闪烁其词，接下来的问题就一定是：你为什么不像昨天首相在下议院一样地予以否定呢？对这个问

题，就没有一个万无一失的回答了。

我向汉弗莱建议：“您可说首相比您知道得多。”

“那么他们就知道我在说谎。”汉弗莱说。这是无可辩驳的。

我很羞愧地承认，由于我急于想帮助他，我甚至建议汉弗莱干脆也否认这种指控，就像哈克一样。

汉弗莱大为震惊，他有他的荣誉感。“您要我说谎？”

“没有人能证明这是谎话。”我说。

汉弗莱似乎对我十分失望。“那么只要没有人能证明这是假的，什么事都是真的了？您这样说话很像一个政治家，伯纳德。”

他没认错。我还必须告诉你，如果汉弗莱能肯定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话是假的，他也会像政治家一样地说话的，也会否认曾窃听过电话的。

我的建议不行，不是因为它说了假话，而是因为它很危险。

但是，我这位上司给我的指责使我不想再提任何建议了。

就在这使人很不自在的当口，电话铃响了。是英国广播公司打来的。但这

和电话窃听无关。他们要采访老汉弗莱，请他为三号电台的记录片谈谈政府的结构问题。他似乎高兴得叫人好笑。他想接受采访！这次轮到我大为震惊了。一位文官接受采访？他怎么能这样？他还似乎一点都不担忧。

我感到有责任提醒他此事的危险性。“他们会要您说出一些事情来的。”

“在电台里，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滑稽的回避问题的、把水搅混的回答。他明白在电台里讲话是违反文职机构的传统的。开始，只是出现些口误，然后就会漏出一些使人感兴趣的事来，甚至会是一些很有争议的事。

但是时代在改变。文职人员开始走出议事室（该用这个词吗？）。

他声称把记录改正正是他的职责。而我，根本就不知道记录有问题。“这不是为了一个人自身的利益！”他何必这样急于否认呢？我私下想。“我一点也不想成为名人。这种愿望只不过是可怜的虚荣心。但是有人也太抹煞自我了。”

我不明白怎么会抹煞自我。我对他说我理解的文职人员都该是不出头露面

的。

“他们又不能让你在电台上露面。”

我讨厌这种为自己辩解的诡辩术。我很清楚：这个参加三号台讨论节目的提议既危险又诱人，他是肯定会摔跤的。但是我确实感到他该更清楚。“默默无闻地，”我提醒他，“提供服务，万事谨慎。”

他感到很窘。他倒了一杯梯奥皮普酒[8]。“伯纳德，他们说如果我不去，阿诺德[9]答应去。”

“也许那样更好，”我说。汉弗莱的眉毛往上一抬。但是我并不是故意无礼的。只是因为阿诺德爵士已经退休了，所以不能透露出什么事情来，当然更不可能泄露当前的秘密了。何况，他现在正是信息自由运动的主席，忙于让政府增加透明度——但愿增加透明度对国家有利！

汉弗莱对阿诺德一向心怀妒意。他很想抛头露面，但是他是死也不承认这一点的。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无力的托词：“对我自己来说，当然，我宁可不接受这采访。可是我认为一个人的责任感迫使他去阻止把阿诺德树立为文官的

高榜样的企图。”

我向汉弗莱指出他该得到首相的准许。他对此略表关注。但我可以很高兴地补充一句：首相这一边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三号台的节目，好在根本不会有人去听它。

（在英国的这个历史时期，做一位常任秘书一定是件很屈辱人的事。全体常任秘书均是杰出人才，他们组成一个精英班子，身居国内四十二个要职，收入丰厚，声誉显赫，却又很叫人同情——因为根据传统或者从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出发，实际上他们只能使自己默默无闻。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一位常任秘书就是“临时”的反面，充其量不过是位机关的高级助理。这可能就是汉弗莱爵士无法抵抗去电台讲话的诱惑的原因。他的自我感觉无疑地渴望这样的抬举——编者。）

11月26日

今天上午，汉弗莱来看我的时候显得十分紧张和不安。开始我还以为又有什么新的危机来袭击我了，但是我马上记起来这是电台采访他的日子。

我要他别担心，可他却傲慢地否认他在担心。“对付难题我是有些经验的。”

“是啊。”我同意地说，“但是如果你太支吾其

辞或含混作答的

话，他们就会把你的讲话都给删节掉的。你还确实得说些什么。”他显得很迷惘。“说些什么？”他没有听懂。

“说简单而有趣的事。”我解释说。

他似乎开始发抖了。“简单而有趣的。”他重复说，接着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那么……呃，如果您有什么忠告的话……特别是如果问题提得很尖锐的话。”

我解释说对付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像对付一个快速滚来的地滚球——只要它不是绝对精确，你可用它的冲力为你自己得分。“问题越尖锐越好。这使听众站在你一边。”

“但是我得回答问题。”

“为什么？”我问，“你可从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啊。”

“那是不同的，首相。”他回答说，“我可能被问到几个很深刻的问题。”

我对他怒目而视。“汉弗莱，”我反问他，“你为什么接受这次采访？可能是为了要解释文官部门的观点。所以你得像我那样干——带几件想说的去，并且说出来。只要问问你自己想回答哪些问题。”

“回答时无畏而诚实。”伯纳德鼓励地同意我说，他显然把我在几个月前教他的话记住了。

“或者，”我继续说，“如果你想控制一点局面的话，你就说：‘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然后，无畏而诚实地问你自己两个你想回答的问题，并回答上来。”

汉弗莱用手帕擦了擦他湿透的手心。“他们的调查员提出过，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权力集中到我的手上。”

“许多？”我竭力不笑，“大多数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你，汉弗莱。”这个深刻的洞察力看来对他的鼓励作用不太大。

“可能他们是指三号电台的许多听众。”伯纳德想弄清楚。

“这在说法上有了矛盾。”我和蔼地说，“但是如果他们真的问了这个问题，他又该怎么回答呢，伯纳德？”

“请举出六个来，”伯纳德很快地回答。他是个好学生。

“说得对。”我说，“因为这么一来你就难倒他了。他不可能想到两个以上的，懂了吗？”

汉弗莱第一次露出了笑脸。“我懂了，首相。伯纳德，您是怎么知道的？”

伯纳德说：“还记得我在八月里和那些记者们作了那场倒霉的谈话吗？在那次谈话里，我无意中说了，在官方秘密方面，首相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在这以后，首相教了我应付场面的几招。”

“我明白了。”他转向我，“还有别的招数吗，首相？”

我转身向伯纳德。“有的。”他说，“攻击问题中的某一点。您可说，**经常？经常**是什么意思？或者您可攻击采访的人：‘您当然没有读过白皮书。’或者您就反问一个问题：‘这问题问得好。现在请让我问您个问题：您什么时候参观过一个不受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府部门，比如斯望西的汽车执照签发中心？’如果您实在没有办法，您总可以用保安原因作为不予作答的借口。”

“说得好，伯纳德！”我向他祝贺，“你会更有成就的。”但是一些别的事出现在汉弗莱的心头。“这使我想起，首相——恐怕我必须很快就出席委员会来回答被提到的窃听休·海利法克斯的电话的问题。”

我知道了。伯纳德已经告诉我了。“你只得证实我在下议院说的话。”

他装作不懂。“但是那就是说谎了。”我耸了耸肩。“可谁会知道呢？”

“喔，我们编织了一张缠结得多紧蛛网啊！”他嘴唇都发白了！

“别胡扯了，汉弗莱。”我打断了他的话。

他装出一付清纯无邪的样子。“对不起，首相。我不能说谎。”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竟会这样对我。“但是汉弗莱！”我惊恐不已地发觉我竟在求他！“如果你不这样说，**我**就像在说谎了。”他合上嘴，仍作沉默。显然他并不觉得这是他的问题。我发起火来。“汉弗莱！”我暴跳如雷。“你得忠诚！”

“对事实忠诚。”他刻板地说。

我现在已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在内阁会议室里来回踱步。“但是……”我一时找不到话说。“但是……你总不能到那里去使我在报纸上和在野党面前出尽洋相。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你得支持我，你必须支持我！”

他拒不接触我的目光。“您使我非常为难，首相。”这句话是他令人很不满意的全部的回答。

“汉弗莱。”我坚决地说，“我命令你去证实我在下议院说的话。”

他傲慢地冷眼看我：“那好，首相。我就对他们说您命令我证实那种说法。”

这怎么会是我的意思呢！“汉弗莱，我命令你不许说我命令你。”

他不肯让步：“那么我得告诉他们您命令我不许说您命令我。”我对他怒目而视。我已是怒发冲冠了。他却是一副只有他才有的冷静而优越的模样。“对不起，首相。我不能卷入这种不体面的掩盖真相的事件中去。”

好一个阴险、不忠的流氓。

（汉弗莱爵士直接从唐宁街十号驱车去广播电台。在那儿，他第一次接受了采访。只有一份录音副本保留了下来，倒不是在英国广播公司，而是在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自己的私人档案室里。承蒙阿普尔比夫人，他的遗孀的允许，我们得以进入在赫泽尔米尔的米德兰德银行的保险库。我们把录音的内容写成手稿，有关部分刊载在下面——编者。）

汉弗莱爵士：在治理英国方面，有些责任是由双方共同负担的——以立法者为一方，执法者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因缘和结果一样，也如同动源和终局一样。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总是那么复杂，以致终，即使其中的人员并非缺乏责任心，这样的机构也总会办事无力的。

（看来汉弗莱爵士无法使他的回答像哈克忠告他的那样简单而有趣——编者。）

采访者：是的，请允许我要求您回答得确切一些，或者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文官部门对现在的失业率究竟负有多少责任呢？

汉弗莱爵士：那个，当然，失业率是一个名词，大众媒介用它来指实际上要广泛得多的社会经济现象，其在政治上实际含意恰恰是……

采访者（打断他）：但是请您确切地回答，有多少责任？

汉弗莱爵士：等一等。恰恰是从目前每周登记的比例来看，全国的失业率被认为是高于历史上可让人接受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去掉其他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更不要说是想找出该负这个责的人来，也需要细微的分析工作，而想压缩在这样一个很有局限性的而受大众欢迎的电台节目中解决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认为三号电台的谈话节目是受大众欢迎的，这是他向广大的听众套近乎。另外一种解释说，汉弗莱爵士可能用受大众欢迎这个词来暗指这节目的听众是在文官部门

这一上层圈子以外的。有人会问，如果这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节目，那么不受大众欢迎的节目会是怎样的呢——编者。）

（到这时候，采访已结束。人们就可能听到节目制作人厌倦而有礼的声音——编者。）

制作人（对电台的内线电话）：非常感谢，汉弗莱爵士，精彩极了。

（现在谈话在继续。即使在采访结束以后，磁带还在走——编者。）

汉弗莱爵士：刚才那样讲还行吗？

采访者：您就不能再多说一点吗？至少谈谈失业率？

汉弗莱爵士：比方说？采访者：比如，事实啊。

汉弗莱爵士笑起来了。

采访者：您为什么笑？

汉弗莱爵士：我的好伙计，谁也不会说出失业率方面的真情。

采访者：这是为什么？

汉弗莱爵士：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几周内就可把它减半的。

采访者：怎么回事？

汉弗莱爵士：只要剥夺那些拒绝两

次就业机会的人的社会保险金。在北方，失业问题确实严重。而在英格兰南方到处都是游手好闲的人，他们中有很多是大学生，他们就靠救济金和房租补贴来过活，再加上一些他们不告诉任何人就伸手拿来的钱。

采访者：您是指夜盗。

汉弗莱爵士：这种做法，完全是欺骗行为。整日工作的话，他们只要每周挣两百英镑就会日子好过多了。但是，实际上，有成千上万的空缺没人去干，有那么多雇主在抱怨说工作人员奇缺。只要给失业者提供一个扫大街的活儿，那么你就不能骂他们是经济上的“寄生虫”了，他们就已不在失业名单上了。老实说，一个国家准备付出多少社会保险金就会有多少失业的人。政治家们没有一个有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采访者：我但愿您刚才这么说就好了。

汉弗莱爵士：我肯定您会这么想的。

（磁带到此结束。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起磁带以后的事[\[10\]](#)——编者。）

下面一天汉弗莱爵士要我找来一个

盒式录音机，他要听一听英国广播公司给他送来的磁带录音。他很激动，因为他觉得他接受了一次很有挑战性，很有活力，也极为精彩的采访，尽管他仍像平常一样用的是调子很低的语言。

我从“花园房”里的姑娘们[11]那里借了一只收放机来。汉弗莱爵士从没听说过收放机。他问这是不是用在破坏性工业上的。说得对极了——它能破坏听力！

在盒式磁带上附有一张字条。



英国广播公司

电台4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内阁办公室

怀特霍尔街70号

伦敦 SW1 11月27日

亲爱的汉弗莱爵士：

这是一份您在电台采访后的不公开的讲话录音副本。我们觉得这特别有趣。不久我将和您联系。

您的诚挚的

克劳福特·吉姆斯

（谈话节目的节目制作人）

有几个原因使我对这封信产生满腹狐疑。首先，这封信写得不是很直截了当。他说“特别有趣”会是什么意思？第二，我对那些教名和姓名可以颠来倒去放的人会本能地有一种不信任感。但是当我对汉弗莱爵士表示他接受的采访可以说是很有趣时，汉弗莱爵士感到极为不快——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口头上总是说他企图什么也不说的。

我早就怀疑他在电台里怎么能什么也不说。这封信使我很惊奇。但是那时我的惊奇还并不很大。当我们打开录音机时，我听到一个和汉弗莱一模一样的声音在说：“我的好伙计，谁也不会说

出失业率方面的真情。”

“这是为什么？”是接下来的问题。

“因为，”又是汉弗莱的声音，“每个人都知道在几周内就可把它减半的。”

我惊恐万状地看着汉弗莱。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怎么回事？”磁带在依然故我地继续放着。

“剥夺那些拒绝两次就业机会的人的社会保险金。”

汉弗莱扑向录音机。我想他是想把它关了，可是他按错了钮，磁带倒反而走快了。他的声音在快速放音时变得像米老鼠一样。他连忙把手从按钮上抽回——这时我们听到了为要命的话：“政治家们没有一个有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探身向前，自己把录音机关了。我们久久地相对无语。我第一次感到在林荫道[\[12\]](#)那边远远地传来的车马声。

我后还是说话了。我得弄弄明白。“汉弗莱爵士，”我问得很平静那是您吗？”

“是的，伯纳德。

“不是泰克·亚伍德？”[\[13\]](#)

一个淡淡的希望出现在憔悴的脸上。“您认为我能说是他？”

我黯然地摇摇头，“不，他们能证明这是您。”我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他竟说了这些话。我问他还说了些什么。他默默地点点头。

“跟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要命？”

他又点点头。他似乎不能够开口了。但是我耐心地等着。后，他像一个败兵那样用低哑的声音说：“还有更要命的，我想我还提到了‘寄生虫’。”

我真难相信。我问他怎么会这么不谨慎。他可怜巴巴地解释说那时采访已经结束——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他们在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这是不能公开的。”他说。

“可能吧——但是这一切都在磁带上。”我评论道。

突然，汉弗莱猛拍一下他的前额，站起身来痛苦万状地叫道：“我的天！”“喔，我的天，喔，我的天！”他绝望地呜咽着说，“我才意识到，这是讹诈！”他一把抓起这封信，把它塞在我的手中。

我又读了这封不详的信。这显然像

是一场讹诈。我的怀疑看来很有根据。

汉弗莱双目失神地注视着我，他的领带歪向一边，他的头发——通常总是那么纹丝不乱——根根竖立，好像他是在凌晨三点四十一分时被斯坦莱·鲍德温[14]的鬼魂闹醒了。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他呻吟说。

我仔细地思考着这个问题。英国广播公司要把汉弗莱怎么样呢？它会要任何人怎么样呢？这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谜，像我这样一个凡夫俗子想要一蹴而就地解决它是不可能的。

我想从政治上来考虑，这对像我这样一生都在文官部门度过的人来讲是很困难的。可能，我怀疑英国广播公司想提高百分之五十的收听执照的价格？或者也许是，这是谈话节目的制作人进行的个人讹诈，叫你相信制作人至今还没说出去。

汉弗莱在我面前垮下了。这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他跌坐在扶手椅里，探身向前，把头埋在双手之中。“他怎么不知道我是个苦人儿？”他叫道。

我很怀疑。我突然想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可能没读到过这条消息：汉弗莱

爵士住在赫泽尔米尔，过着年收入七万五千英镑的清苦日子。

“我怎么办呢？”汉弗莱爵士一脸晦气。他把两眼睁得大大的，显然是吓坏了。

“以后紧闭双唇。”我忠告他。

“我是指现在！”他打断我说。这会儿，他把两眼瞪着向我了。

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办法，除非是带着希望等待。等着看他们要什么。希望他们还没有把磁带发给全国所有的报纸。我似乎暗中已看到了叫人胆颤心惊的大标题：内阁秘书把失业者称作为寄生虫，或者是：政府无勇气解决问题，汉弗莱爵士说。

我让他也看到我所看到的可能性。他目瞪口呆地坐着，请求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一丝口风。

我非常愿意不在怀特霍尔街传播，哪怕我能够靠它一连几个月到处受邀吃饭。但是汉弗莱说的“任何人”似乎也包括首相，我不得不指出我对他尽职是我的首要任务。

汉弗莱想要重振他的权威。他站起身来，直面着我说：“伯纳德，我在命

令你！”

“很好，汉弗莱爵士。”我回答说，“我将告诉他您命令我不要对他说话。”

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承认失败了。他又坐了下来，向后靠坐着，抬头向上像在问天花板他该怎么办。虽然他好像没在和我说话，我仍向他提了我想出来的建议，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是同情失业者的。归根结底，他很可能去加入他们的行列了。

11月28日

我正坐在内阁会议室里，一个人在思考着，这时，伯纳德进来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问他要什么。

“请允许我打扰您一会儿，首相。但是因为您现在似乎没在干什么，我能否和您谈一谈。”

我瞪了他一眼，以示我并不欢迎这种打扰。“实际上，”我简短地回答，“我正忙着哪。我正在考虑该向内阁怎么交代窃听的事。对他们说我在下议院说的话，还是告诉他们真情？”

伯纳德无丝毫犹豫。“首相，我斗胆向您建

议，您可能得像您期望他们对待您一样地来对待他们？”

“你说得对极了。”我告诉伯纳德说，“我将对他们说我在下议院说的话。”

我转身去看桌上的一堆文件，正要开始读那长达八十页的介绍反导弹导弹的可行性措施，这时，我听见伯纳德一声咳嗽。他还在那儿，显然他想把肚中的话倒出来。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伯纳德？”

“是的，有一个问题，您需要知道。”突然，我警觉起来。“我需要知道？”

接下来他说的话，我就不大听得懂了。为什么伯纳德和汉弗莱在谈到“需要知道”的事情时，两人都这么异乎寻常地不能把话讲清楚？他们似乎惯于用一种似乎他们什么也没说的方式来告诉我这种事情。

伯纳德·伍利回忆说[\[15\]](#)：

我当然不想拐弯抹角地说话，尽管我那时是非常激动。我查了一下我的日记。我说的是：哈克需要知道，特别是因为汉弗莱爵士已特别关照我对这件特别的事件的特别详细的细节要特别谨慎。我提醒哈克，他（哈克）知道汉弗

莱办事特别小心，特别是有关哈克需要知道，和汉弗莱需要知道是否哈克需要知道而他认为他并不知道的事情。那是说，如果哈克需要知道的话。我认为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看起来我的私人秘书在讲关于汉弗莱爵士在电台讲话的事。

“很乏味吗？”

“开始，是的。”伯纳德说，“但是由于他越来越不谨慎，谈话就变得大大地令人兴奋了。”

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汉弗莱？不谨慎？在电台？”

“那是，因为他以为广播已经结束，所以他只是随便聊聊。非正式的。但是磁带还在走。”

我开始感到我胸中有一种下沉的感觉。我的心已经跳到我的喉咙口了。

（如果是这样，哈克的内脏之能动性倒是独一无二的了——编者。）

“他上了他们惯用的伎俩的当？”伯纳德点点头。

“你总是应该把一个话筒看作是有生命的。

他不明白吗？”

伯纳德想为他辩护：“我认为他对在广播里讲话没什么经验，首相。”

“看起来他现在倒很有经验了。”我怨恨地说，“你听了这磁带吗？”

“一份复制的。”

“他说什么了？”

“他说有可能明天就把失业率减少一半，只是政府没有勇气来办。”

我吓得连发火都发不出。我只是坐在那儿发呆。

伯纳德想要解释：“他不知道这些话被录下来了。”

我脑中扫过了一串可怕的情景。如果英国广播公司保存了原带——因为伯纳德似乎认为他们寄给他的只是“复制”的——那就意味着明天所有的报纸都将刊登这一消息了。而伯纳德似乎全不担心。他只是评论说，汉弗莱没对报界说出什么来。他更关心的是讹诈给他的威胁。

讹诈给他的威胁。这对我倒是一条新闻。

“随着磁带来的还有一封信，说寄信人不久会来联系。他们把磁带寄给了汉弗莱——这就是

说他们保存了原带。”

我已经看到了磁带被私下复制的海盗版，明天将散发给所有的电台。“伯纳德！”我很有决断地说，“你得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件事。”

“实际上，首相，我已经做了。”

我并不很惊奇。他能这么镇静，我自然想到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件事了。

“以前在牛津我和节目制作人曾见过面。我打电话给英国广播公司时，他向我提起此事。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但是好像我们有一些两人都认识的朋友，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起我在工会的一次演讲——那天晚上我雄辩有力地演说，表示对现状的支持。显然他是不惹人注意的，专门录制辩论场面的那种角色。不管怎么说，人人都知道他现在丝毫没有把这盘录音公布出来的企图。所以我就让他给我了。”

这时伯纳德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盘磁带。

“这是原带吗？”伯纳德点点头。“没有其他复制品了？”他又点点头。“汉弗莱知道你拿到了吗？”伯纳德摇摇头。我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伯纳德也一样。

“我要告诉他吗？”他天真地问。

“为什么？”我问他。

“我想……”伯纳德小心谨慎地说……他是很想知道的。”

“我肯定他想知道。”我反驳说：“但是他是否需要知道？”

“啊。”伯纳德回答道。他眼中闪出一缕光。他沉思片刻，接着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要他重复这些话——“您的意思是说**总有人**需要知道。但是如果您现在知道了，那么汉弗莱爵士是否就不需要知道了，而您是否需要知道汉弗莱爵士并不知道，并且他是否并不需要知道您知道或您知道他不需要知道？”

我张口结舌看着伯纳德，惊叹逻辑教育竟会如此无用。“我是无法把一句话讲得这样叫人无望听懂的。”我说。

伯纳德问我是否想听听录音。当然我急着想听——但是我有了一个了不起的主意。“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听，你看呢？我想汉弗莱也该听一听。把他请来好吗，伯纳德？”

不需要再催他一次，他就去打电话了。“告诉汉弗莱，首相要见他，马上！”

他挂上了电话。他高高兴兴地急忙走出去拿磁带了。他回来以后，在他把磁带从一头退到另一头的时候，他提醒我说，他对我说的话是私下

的——这没有必要说——我对人家的私下的谈话总是非常尊重的。

现在他已是满脸堆笑了。我想把脸板下来，装得庄重些，并对伯纳德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是，首相。”他说。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有人在敲门。汉弗莱先把头从门外探进来，“是您要见我吗，首相？”

“啊，是的。请进，汉弗莱，请进。电台采访怎么样？”他说起谎来倒很有一手。“很好，很好。”

“好，好。”我和蔼可亲地轻声说，“你还记得说了些什么吗？”汉弗莱爵士似乎已不清楚了。“喔，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慢吞吞地说，“我想我是指出了要在政治家和文职人员之间找出该由谁来负责，是很困难的事。”“可是你说得很谨慎吗？”

他清了清他的嗓子。“您问这干吗？”

“是，还是不是？”略有停顿。“是。”

“是，你说得很谨慎，还是，是，你说得不很谨慎。”

“是。”

“汉弗莱！”

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来向我挑战。“您不是希望我说话谨慎吗？”

“是的，我是希望你能这样。”我说。

“那就是了。”他反驳说，却完全回避了问题。

“我明白了。”我说，“那么，这没错。”我目光炯炯地对他看着。

他在椅子上不安地晃动着身子，一会儿搁起腿，一会儿把腿放下来，然后又清了清嗓子。“您问这干吗，首相？”他的调门听上去比往日高。

“因为英国广播公司刚才给我寄来了一盘磁带。”他往后缩了一下。我请他看一看方桌上的那盘磁带。他进来时没有看到。

他咽了一下口水。“磁带？什么磁带？”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一盘磁带，汉弗莱。关于你的。我想我们一起来听这盘磁带一定有趣。”我一面说一面走向那架录音机。

“不。”他站起身来，“不，不。”

我显出吃惊的样子转过身来。“为什么不？”

“这……这并不很有趣。”

我格格地笑出声来。“汉弗莱，你过于谦虚，过于自甘埋没了。

不很有趣？内阁秘书向全国谈论政府会不很有趣？”他的眼睛游移不定。“可是，并不那么有趣。”

“你是说，”我暗示地说，“你不太谨慎吧？”

他不再说话。他知道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他知道了。伯纳德也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了。（哈克和伯纳德·伍利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编者。）我打开录音机。

我得承认连我也没料到会有这样惊人的评说。汉弗莱爵士会说没人会说出实情。会说失业率在几周内就可减半，还会提到游手好闲，夜盗和寄生虫。

我把录音机关了。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我从没见到过比这位内阁秘书和内政部的领导更忧伤的人了。他注视着我，无法——看上去是这样——甚至是原谅自己。所以我就等着。后他脱口而出：“首相，我太抱歉了。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您知道，那时我们的广播节目已经结束了，而且……”

我做了个手势让他停下来。“汉弗莱！不负责任！还有别的吗？”

“不。”汉弗莱说。

“有的。”伯纳德说。

我说：“我们好听一听。”

“不。”汉弗莱说。

伯纳德又打开了录音机。“老实说，”汉弗莱的快活而自足的声音在说：“一个国家付出多少保险金就会有多少失业的人。政治家们没有一个有勇气来扭转乾坤。”

磁带停了。只剩下一片寂静。我简直不能相信汉弗莱会蠢到这种地步，竟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即使我知道这是不会播放出去的。

“你怎么能说那种话？”我终于问他。

“我……我！那是泰克——亚伍德。”他用一种近似窒息的声音说。

“是吗？”我问。

“不是。”伯纳德说。

我从桌旁走到窗边。十一月下午的天空是灰黑的一片，看来就要下雨。“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我沉思着说，“我得接受些忠告。”

“忠告？”汉弗莱爵士低声说。

“是的。”我说，一面用去剜伤疤。“我想好把

它拿到内阁会议上去放。看看他们的反应。”

他像是马上就要跪下来了。“但是，喔，请别。”这是他唯一能说的话。

“或者拿到枢密院去。”我提议。

“喔，请别。”他恳求说。

“或者去给女王陛下。”我轻轻地说。

“喔，上帝！”他呻吟道，又瘫倒在椅子上了。

我穿过房间，站到他面前。“如果这消息被报纸登出来会怎么样？这对我该会有多大的损害啊？还有对政府？”当然，汉弗莱依然认为这是会被刊登出来的，“我将说我错了。我核查了数据，这情况不确切。”

“但是，这情况很确切。”我嘻嘻一笑。

“但是我可说这情况不确切。没人能证明。也没人想试着证明。”

我装作大受震惊。“你想否认事实？在公众面前？”

“是，首相。为了您！”确实是我！

他还有别的念头。“我们可以在报界解释清楚。”

我指了指磁带盘，“我想你的观点已经很清楚了。”

“首相，在政界，解释并不使事情弄清楚，可是它能使您显得清白。”

“我看即使像你这样聪明绝顶的人这次也无能为力了。”我说，

“但是，你居然愿意为我去说谎，这真使我感动不已——这事我可请你以后兑现。现在我有些事要对你说。”这么一说，我使他可不再受痛苦折磨了。“伯纳德，把磁带给汉弗莱。汉弗莱，这是原带。是母带。”

我给他一两分钟来细细品味一下这消息的含意。“您是说……”

“没有其它复制品了。”我让他放下心来。“这是从英国广播公司追回来的。”

“怎么追得回来的？谁去办的？”

伯纳德双眼欲裂，急忙给我一个“千万记住您的允诺”的眼色。可是他大可不必担心。

“情报局。”我安详地说。

伯纳德明显地舒了一口气。

“那么——您是说没事儿了？”汉弗莱问，心中充满了希望，但是还把它强压着不敢太露出

来。

我不想让他立刻脱钩，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买卖呢。“这得看你怎么解释没事儿了。”我说。

“谁也不会知道？”这就是他的意思。但是在他还在钩尖挣扎时，我想了一下他的问题。

“我想，”我终于说了，“这取决于我是否想告诉他们。我是说我可以就把磁带还给你……或者，当我考虑到安全和纪律的问题时，我可以把这抓住不放。我当然不想卷入一件不体面的隐瞒真相的事件中去。”

他在等着法庭的判决。我这才漫不经心地向他提出一桩交易。

“喔，汉弗莱，有一件事想问你。你什么时候出席委员会的会议？”

“明天，首相。”

“你是否已决定怎么跟他们说了？关于我授权窃听议员电话的事？”

“喔，是的。我已经……呃……”他竭力想从模糊的记忆中找到这个问题的影子，磁带的事把别的事都从他脑中赶出去了。“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得很苦。”

我问他有什么结果。结果不太叫人惊

奇。“我得出一个结论，首相，为了国家安全，唯一体面的做法是证实您在下议院的说法。”我对他作了提示。“你得说，休·海利法克斯的电话从来没人窃听过？”

“我得说我没有证据……”

他说到一半我就打断他。“不，汉弗莱。你得说政府从来没有授权去窃听一个议员的电话。”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得说政府从没有授权去窃听一个议员的电话。”

我这里微笑盈盈。他那里却在轻声说：“如果他们发现了真相该怎么办？”我根本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你只要说没有人告诉过你好了。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同意吗？”

他点点头。我交给他这盘磁带。“那么，这事解决了？”

“是，首相。”他轻声应道，一面用手把磁带紧压在心口。

[1]和编者的谈话。

[2]这两句都是板球术语——译者注。

[3]诚实——编者。

[4]和编者的谈话。

[5]这就解释了在侵略苏伊士运河时，外交部会遇到这样的挫伤：内阁站在法国和以色列一边反对阿拉伯和美国。

[6]汉弗莱爵士会把这理解为所有委员自己在别处也能发现的事。

[7]和编者的谈话。

[8]一定是下午六时以后了——编者。

[9]阿诺德·罗宾逊，汉弗莱爵士的前任，内阁秘书。

[10]和编者的谈话。

[11]十号地下室打字房里的一群上层人物——编者。

[12]“林荫道”原文为The Mall，指英国伦敦圣詹姆斯公园中林荫道——译者注。

[13]八十年代著名的印象派代表。

[14]斯坦莱·鲍德温（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1937年间三次任首相。

[15]和编者的谈话。

4. 利益冲突

10月1日

今天早上的报纸叫人读得非常扫兴。早饭以后我在书房见到伯纳德时，我对他这么说了：“这些报纸都说，我上任以来，一切均无改变。”

“您得感到骄傲才是，”伯纳德说。

我向他解释说，这一句不是恭维话，尽管从文官部门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是句好话。“我读了十份伦敦的早报，”我承认，这已超越我的职责了，“在九份报纸里，对我的好话一句也没有。”

“可第十份要好些？”伯纳德问道，他弄错了我的含意。

“第十份更糟！”我解释说。“它连提都不提我。”（政治家一般都是宁可出臭名也不愿不出名——编者。）

所有的报纸基本上都在说同样的话——说我只是一只大汽球。（一些漫画家也这样描绘——编者。）我给伯纳德看了。他和我感到同样的吃惊。（虽说诚实无疑是一位成功的私人秘书的重要品德，但有时还是谨慎为妙——编者。）

“这真是太奇怪了。报纸说我办的事全在口头上。我说了又说，却一事不干。但是这不符合事实——我不是一直这么说吗，在管道布局上有一次大改革，我答应在方针上有很大的变动，在经济发展上有一些大的计划。政府有一个全新的观念，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机体和地缘政治气候有一场深刻的运动。”

伯纳德深表同情地点点头。他表示完全同意。“那么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他问。

“明摆着的，什么也没有！现在还没有！”我不耐烦了。我完全有理由不耐烦。归根结底，这些事情得花时间。罗马又不是一天建成的。

事实上是，近爆发出的一连串的批评文章都起源于伦敦金融城丑闻的混账传言。

所以当汉弗莱来到我们这儿时，我对他说我决定回答所有这些报纸的批评。“新闻界正需要对金融城丑闻采取行动。他们将看到行动了！”

汉弗莱看来是大感兴趣的。“什么样的行动？”

“我将委任一个人，”我坚决地说。很高兴他倒没有问我是谁，或是去做什么，因为我还没有想好。实际上，我还得请他来帮我出主意呢。

他倒是问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首

相，您在什么时候作出这么重大决定的？”

“今天早上，”我不无自豪地回答。“当我在读报的时候。”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的？”他竟是在礼仪周到地盘问起我来了。

“今天早上，”我说。我突然意识到突然作出的决定使我显得有点蠢。“当我在读报的时候。”

“我是否能问，您对赞成和反对这决定的两派人的反应考虑了有多久？”他有时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无非是竭力想使我觉得决定作得太匆忙了。

“没多久。”现在我是在挑战了。“我决心要态度坚决。”他看得出，虽然我的决定作得匆忙，但是正确的，因为他绝口不谈此事了。（这个绝妙的例子说明，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总有能力来相信他想要相信，他需要相信的东西——编者。）

伯纳德想来安慰我：“首相，我得说，我认为您太为报纸所说的话担心了。”

我向他微微一笑。他知道什么。“伯纳德，”我带着疲倦的笑容说，“只有文职人员才能作出这样的评论。我得担心他们，特别是两院会议即将召开。那些金融城丑闻的传言是不会自行

消失的。”但是汉弗莱却不慌不忙。“在一切还只是传言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担心吧。我能让您看一看内阁的议事日程吧？”

我不感兴趣。“请别，汉弗莱，”我说。“报纸更为重要。”

“请相信我对您的敬意，首相，”汉弗莱被我不愿读他的愚蠢的议事日程而激怒，回答得很傲慢。“这倒不见得。唯一能读懂报纸的办法是要记住：他们总是迁就读者的偏见的。”

汉弗莱根本不懂报纸。他是文官。我是政治家，我对他们很了解。我必须了解。他们可以造就我，也可以毁了我。我很清楚谁读什么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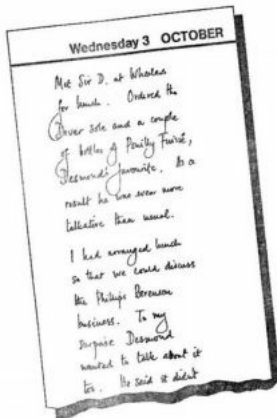
《时报》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读的。《每日镜报》是自认为在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读的。《卫报》是自认为应该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读的。《晨星报》是那些认为这个国家该由别的国家来管理的人读的。《独立报》是那些不知道谁在管理这个国家却坚信他们做得不对的人读的。《每日邮报》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人的夫人们读的。《经济时报》是拥有这个国家的人读的。《每日快报》是那些认为国家该像早先那样来管理的人读的。

《每日电讯报》是那些仍旧认为这**还是**他们的国家的人读的。《太阳报》的读者可不管谁管理这个国家，只要她们的胸部丰满就行。

（这篇对伦敦报纸的评语是在哈克去世后不久，在唐宁街十号发现的。大楼里到处都是这评语的复印件：在内阁屋里，私人办公室里，当然，还有新闻发布办公室里。）

（在上面提到的有关金融城的谈话后不久，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爵士在福斯特巷里的维勒饭店里共进午餐，这家地理位置很好的饭店就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背阴处，以餐桌间距离远而负盛名，大多数餐桌都被用护壁板隔成一个个的小间。所以在这家饭店里，可以作一些很谨慎的谈话，这饭店也成了金融城中众人趋之若鹜的密谈场所。

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爵士是汉弗莱爵士的老朋友了。这时，他仍是巴特利银行——“高街”银行之一——行长。汉弗莱爵士的日记记下了他的菜谱——编者。）



10月3日 星期三

和戴爵士在维勒共进午餐。点了一道朵佛鲷鱼和两瓶普宜飞赛酒。戴斯蒙酷嗜此物。结果，他就比往常更健谈。

我安排这次午餐，目的是想讨论一下菲利浦·贝伦森的事。使我奇怪的是，戴斯蒙也正想谈此事。他说这事看来不妙，这种话就几乎等于是说在金融城的朋友们有诈骗和偷窃行为。

现在新闻界所说的是，这是又一例投资银行滥用投资的行为。但是戴斯蒙

暗示说这就像是处在冰山之顶。他们不光是违反了内部贸易的规则，虽然现在还没有人这么说，但人人都已知道了。他们还违反了金融城的基本准则。

（金融城的基本准则是：如果你没有能力，那你就得诚实，如果你想玩花招，那你就得聪明。理由是，如果你诚实的话，人们就会围在你的身边来帮助你。相反，如果你玩花招的话，只要你大获其利，没有人会来查问你的。金融城里理想的商行是既诚实又聪明，只是这样的好事并不多见——编者。）

我想弄清楚飞利浦·贝伦森是否犯了法。葛莱兹布鲁克却闪烁其词。他说他不想这么说。这使我觉得实际上结论已经下了，

我问他一些特殊的问题：

（1）飞利浦·贝伦森的董事们是否把股份悄悄地转入他们自己的公司去了？

（2）他们在纳税上是否做了手脚？

（3）他们的资金有否转入利启坦斯泰因公司？

（4）有没有贿赂行为？

戴斯蒙的回答更闪烁其词了，但是

隐含的意思却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在回答（1）时，他承认这是发生过的，尽管这些钱原想马上就归还的，然而，归还至今还停留在字面上。

在回答（2）时，他同意说菲利浦·贝伦森对财务条律作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觉得总得有人来作出解释，特别是因为财政部的解释似乎并不很合适。

至于对（3）的回答，资金转移是发生过“一些”的。在（4）方面，他确实知道有过事先秘密地付给外国政府官员回扣的[1]。

这一切叫人该怎么去想？菲利浦·贝伦森要完蛋了。现在是他们违反法律而躲不过去的时候了——既然整个事情很可能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戴斯蒙激动不已地认为，此事必须遮盖起来。这叫我很奇怪，他是一个大的既得利益者。我直到今天才明白一家巨大的高街银行会因一家小投资银行的失败而受影响。但是人们都知道，巴特利银行一直是大力支持菲利浦·贝伦森的。葛莱兹布鲁克披露说，差不多有四千万英镑。

他竭力为此辩解。看起来问题出在

他们手上的那笔利息为11%的阿拉伯钱。如果他们不把钱以14%的利息转借给别人的话，他们就会显得太蠢了。麻烦的是，并不是人人你都能相信会按14%的利息付钱的。

已经把钱以14%的利息借给人家了——结果——人家还不出。巴特利只能不断地把越来越多的钱去借给它的债主使它们能维持下去。可是他们还是翻船了。

为什么巴特利（或者戴斯蒙）看不出这些滑头货呢？为什么他们不去调查一下呢？做个事后诸葛亮，这很容易理解：在金融城，人们就从来不作这样的调查。他们看上去都是体面人，那就得运用体面人规则：体面人从来不去调查体面人的行为是否体面。何况，也没有必要：如果他们是诚实的，那就是浪费时间——如果他们不诚实，在为时已晚之前，你也调查不出。

那么，你倒有两个选择：

（a）要么你失去了钱，只对他们吹吹口哨就完事了，要么，

（b）你闷声不响，成为他们这种罪行中的共谋。

因此——我很明白为什么——戴斯蒙选择了第三种办法：说穿了就是，不去管它，那么巴特利银行董事会看上去就是一群被坏蛋们骗了的老实人。结果，金融城里的人们就不会在意了。他们也不在乎有人是滑头。人们发现了有人知道有人是滑头货，事情反而更糟。

但是问题还是有的：一场错误使巴特利损失了四千万英镑。装聋作哑值得了四千万吗？

葛莱兹布鲁克认为值得。装聋作哑保障了安全——至少有了免受法律之扰的安全。当然，这又不是银行董事们自己的钱。

所以我就再往下谈，谈些琐事，讨论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葛莱兹布鲁克觉得：答案只有一个：英格兰银行必须来拯救飞利浦·贝伦森——悄悄地，一点不作张扬地。那样，我们就在内部解决此事，巴特利银行就要得回自己的钱了。

这个方案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巴特利不是从他的债主那里要回钱，而是从纳税人那里要回钱。然而，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它的可行性全有赖

于新的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这个职位尚空缺。不幸的是，首相很可能委任一个叫亚历克山大·吉姆森的人。

实际上在金融城里人人都反对吉姆森。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为人诚实，显然，这二点本身并没有问题，这并不被看作是致命的缺点。因为聪明人可以既诚实又成功。但是吉姆森多走了一步——他在金融城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过——他要人守道德。

（那就是说，他实际上想阻止别人的不道德行为——编者。）

他大兴调查惩处之风。正像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千真万确地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可行不通。

我们在怀特霍尔里也已受过他的干扰和聆听过他的说教。他就文职部门的浪费和低效率写过一份极为坦诚的报告，还提出了209条确实可行的改革建议。委员会整整花了十八个月的艰苦劳动才把它削减成三条。

戴斯蒙不要吉姆森。我同意。但是这做起来很困难。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任命事实上是财政部推荐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听之任之，因为如果吉姆森一上

任，并开始做起业余舍洛克[2]来，不光是菲利浦·贝伦森会受影响。各种类似的事情都会发生。他会去揭露一宗大的丑闻，接着信任感就会彻底崩溃。货币出现危机，英镑一落千丈。

当然，如果金融城里的所有作弊行为都能得以查清，这对我们大家倒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这只是乐观得天真的想法，我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这只是镜花水月。根本的一条是（我们的美国表亲喜欢这么说）：金融城为这个国家每年挣六万亿英镑。我们总不能仅仅因为一些人对另外一些正好是他们朋友的人做了一些好事没有告诉股东们，而去冒此风险。

可能阻止这类事情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不会是合理的。影响太大了。时间尚未成熟。（阿普尔比文件 RR/2056/LFD）

10月5日

两院议会就要召开了。我和多萝西[3]一直在忙于准备我今天的发言，可是我一点都不满意。

她说这还只是初稿，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稿中没有好消息。我向她指出了这点，她耸

耸肩。“我们想不出任何好消息来说。”

多没用！办法总会有的。如果真是没有好消息的话，你就把坏消息写得像好消息。

比如说，我对她说，你得说一些有关保健设施的话。对老年人、

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等等，等等。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健康的民族。

“花去的钱呢？”多萝西提出来问我。

“我们不能去说这个，”我指出。“人人都知道费用已完全失去控制。”

多萝西提出另一个办法：“我们正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财力来使我们的保健设施成为今日世界之。”妙极了！

我转而谈到国防。我原想在两院议会中谈到削减国防费用，但是我还没能让国防部做出削减计划。多萝西已经有了主意。她在心领神会方面确实是很快的。“政府不想钻在钱眼里用虚伪的节约来使国家的安全处于危险的境地。”（哈克也不会这么做，比如说，把三军的三座音乐学校合并成一座，来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陆军、海军和空军各有一所音乐学院究竟有什么必要，这很叫人怀疑。比如说，皇家海军总不见得有一种特有的巴松管的演奏法吧——编者。）

我们又谈到欧共体。这是个难解的问题。我并不想攻击它，因为我急于签订减少配额的协定。我总不敢使这一大批欧洲国家都来对付我。“全心全意地为我们欧洲的朋友服务”是多萝西的绝妙措词，“但是仍决心要事事警觉，处处着力，使我们英国也能得到公正的待遇。”

她真是不错。最后，我们谈到了经济，这是大的问题。真是一点好消息也没有。一想到在公众面前我只能强装笑脸，我心中一片悲愁。

——多萝西想来安慰我。“总能说出什么的。”

我问她在两院议会里会不会再冒出什么坏消息来。

“别来问我。您是能读财政部的保密文件的人。”“我并不是在想这个，多萝西。”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在考虑菲利浦·贝伦森的事。”

“啊，”她不置可否地说。她看上去依旧是楚楚动人——苗条，金发，碧眼，冷艳——是智慧、美丽和坚定的化身。她总是让我为过去没请个保姆来照看我而感到遗憾。

我向她逼近。（我们想，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编者。）“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我感到满腹狐疑。”

“为什么？”

“因为……”她思索着回答，“因为我注意了证券交易所所长、清算银行协会的主席和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说法。”我感到困惑。“但是他们谁也没说什么。”

她莞尔一笑。“我这才满腹狐疑。如果谣传是捕风捉影的话，他们总会说些什么的。”

很精明。很英明。当然，她是对的——一定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你能再调查一下吗？”

“我去试试，”她答应说。

这事真不公平！对政府来说，金融城的丑闻总是很糟的，可对我来说，却是绝对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在两院议会上这消息一透露，那将对我是一大打击。

多萝西建议说，如果弥补一下可能会有损害，我可以宣布对营私舞弊作大规模的复审。这主意真是不错，但是这听起来还是不够。

接着，我意识到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可以宣布英格兰银行的新行长。“如果我用人得当，我可以让人觉得金融城的丑闻再也不会被容忍了。”多萝西显得有些迷惘：“您说……任命一位真有才干的？”她感到掌握这个概念很困难。

我用力点点头，站起身来，在书房里踱来踱

去，为这个主意而热情沸腾起来。“是的！”我兴奋地说。“任命一位有高度警觉性，并且办事得力的人。”

她感到更加迷惘了。“这跟传统相悖，”她是这么看的，她问我是不是想任命亚历克山大·吉姆森。

她倒不傻。然而，我还没作出后决定。我还不必作决定。我明白，如果我委任吉姆森的话，金融城的人是不高兴的。如果菲利浦·贝伦森根本没事的话，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如果！”多萝西说。

我们继续研究我的发言稿。在我们扯开去以前，讨论了经济问题。我看不出在这个问题上我能说些什么！我是说，如果我从另一党派手中接过了这个烂摊子，我至少在以后的三年中也能把一切都归咎于他们。但是我怎么能对我的党员说，是我那已故的、无人哀悼的前任阁下把我们引入这该死的困境，然后他却撒手西去？

多萝西想显得有气派些。“您可以说：‘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困难时期。’”

我对这样可怜巴巴的建议不屑作答。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又试着说：“所有的工业世界都在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我摇摇头，“美国和日

本不都挺好的吗？”

“那么，”她说，毫无放弃的意思。“就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面临着严峻的局面’行吗？”

这是我们想得到的好说法了。但是还不足以提高我们党人的士气，使他们兴高采烈地离开。

多萝西再需要一些材料。“产量方面怎么样？”

“下跌了！”

“和去年跌得一样？”

“不，”我说。

“那好啊！我们控制了产量下跌的趋势。”好极了。她想了一会儿。“失业率也下降了吗？”

“不多，”我回答说，但是我看得出她又有了说法了。

我看对了。“我将把解决失业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她建议这么说。不坏啊！

“工资呢？”她问。

“提高得不快，”我承认说。

“我们不能拿得比应得的多。世界并不欠我们什么。”

对是对的，可是也不怎么鼓舞人心啊！只不

过是一点吉米·卡特式的说教。没有人愿意听说教，特别不想听政治家的说教。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一部分变成对贪得无厌的工会和没有脊梁骨的经理们的攻击，这样可以把烧我的火引开，扎扎实实地把罪责怪到该怪的人头上去。

多萝西提议用一种更为婉转的方式。“劳资双方必须一同努力为英国而和平协调地工作。”

最后要提到的一条是必要的：利率，现在无疑是太高了。**只要**在两院议会召开前往下跌一些，我就能得救了。但是，我似乎无此好运。我们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想不出在利率上有什么好的、积极的话可以说。

所以我们就考虑如何来结尾了。因为整个境况是一场灾难，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挥舞英国国旗了。所以在发言结束前我将说些英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以及国家的伟大的前程之类等废话。

多萝西要我说，我要“竭尽全力为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至少这部分是诚实的。它说出了需要多长时间。

伯纳德·伍利的回忆[\[4\]](#)：

首相为在两院议会上的发言真作了排练。他现在面临一些问题。如果你要提高忠于你的党人的士气，你总持带给

他们一些好消息。

他让我知道，他计划任命亚历克山大·吉姆森为英格兰银行的行长。我自然就把这向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汇报了。我必须承认我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因为我把这看作是好消息。

汉弗莱爵士立刻让我猛省过来。“这消息很可怕！”他是那样的狂躁不安，他从桌旁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在办公踱里来踱去，偶尔停在防弹窗帘旁边向外凝视着骑兵仪仗队。

起先我不太看得出委任吉姆森的危险性，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汉弗莱爵士要聪明得多，消息灵通得多。所以我问他是否试图改变首相的主意。

他转过身来向我微笑着，然后用他那特有的精确性说起话来：“不，伯纳德，我会改变首相的主意。”

尽管如此，我还禁不住回他一笑。我不明白这目标怎么能达到。就我看来，吉姆森真是个好的人选，而且首相也很看好他——看来这也是他能在布赖克普尔为一大群后座议员带来的唯一有希望的消息。

汉弗莱爵士觉得首相看好吉姆森也

无妨。实际上，他似乎把这看作是有利因素。“这是我的第一手。如果你要说某人可能不是理想的选择，第一步是表示绝对的支持。”

（就是说，贬低他们——编者。）

现在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有说过别人不好的记录。你必须让人觉得你是他们的朋友。就像那天早上汉弗莱爵士令人信服地解释的那样，归根结底，你想从背后对人捅一，那你就得先设法绕到他背后去。

关于对吉姆森表示支持的有趣之处是：这确实是一件该做的事。吉姆森的**确是**好。他又诚实又能干。汉弗莱爵士就准备这么说。所以汉弗莱爵士的伎俩一开始总使我莫测高深。

但是我该耐心一点的。他向我解释了。

“第一步：表示绝对的支持。

第二步：列举他全部的优点，特别是那些不适于这一工作的优点。

第三步：继续大力赞扬这些优点，一直到听上去完全成为缺点为止。

第四步：用为他辩护的口气来提他的缺点。”

那天我明白了，只要把事情简单化，就能容易地做到第三步。你只要给人**贴上标签**。比如说，如果某人很好，你只要叫他“清廉先生”就能把他给毁了。这很怪，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汉弗莱听说吉姆森信教，这一点我可以证实。我补充说，实际上，他曾是一位业余的传教士。

汉弗莱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看到他高兴真是美事一桩。“了不起的消息！我们可以用这来反对他了。”

我请他解释一下。汉弗莱爵士转身向着我，对我像对首相那样说了起来：“多好的一个人啊！在世上他连一个敌人都没有。但是他**真**能对付得了金融城里的这些坏蛋吗？”

真是聪明极了！但是我不能肯定这就能奏效。就像我对汉弗莱爵士说的那样，因为吉姆森实际上是位很强硬的汉子。

汉弗莱仍旧是得意洋洋毫不担心。“那样的话，我们就走第四步，说他**太**强硬了。比如说，‘他无所愿意地唱反调，这可能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人**真的**对他的爱国热忱表示怀疑。’或说‘我

认为上次就他的公司破产一事对他进行的批评不完全是公正的。’或是类似的话。”

我清楚了，汉弗莱是来赞扬吉姆森的，而不是来诋毁他的。我以前没有掌握赞扬也能致人于死地的特性。汉弗莱解释说，有些人在事业上无懈可击，那么就把同样的原则运用于他的个人生活。你只需要暗示一些无法被证据推翻的事。如果真的被推翻了，那你也没说过，你只是暗示过。

好的办法是暗示有未被揭露的丑闻。比如说：

1. 如果还没结婚——同性恋。
2. 如果结过婚——通奸，好是和一位不能加以指责的女子，比如是皇室成员，或是电视新闻的播音员。
3. 如果婚姻美满——清教徒生活或是酗酒。或是有隐藏的精神病史。

可能性竟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把人说成是一个伟大的鼓动家，一个巧舌如簧的煽动分子，一个超级厨师，一个革新的棋手，都能使这个人的事业完蛋。至于把对人的描述简单化的做法，那几个步骤是太容易的了：

1. 利用某人的观点——就说，有人相信教育津贴应该由家长们来汇集，而不是由地方教育局。

2. 把这想法简化到荒唐的地步——“他好一切都能免费。”

3. 承认过去这种想法还有些道理。“可是我们都已意识到，解决问题还能用不那么极端的办法。”

每当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就贴上他的观点的标签。“啊，是的，这位是教育担保人。”

那天我学到好多东西，当我在文职部门高升时，我就能很有效地使用这些办法了。实际上，我还得承认，我后荣升为内务部负责人和我今天早上在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办公室里学到东西不无关联。

10月 8日

多萝西给我拿来了在两院议会上的新发言稿。这篇稿子略微好了一点，但仍是不够鼓舞人心。我还是很为菲利浦·贝伦森的丑闻和由此对我们的影响深深地担忧。

然而，早上在我和汉弗莱（以及伯纳德）见面的时候，我的内阁秘书似乎不同意我的看

法。“肯定没那么严重”是他漫不经心地排斥这意见时说的话。

这对多萝西就像是在斗牛面前晃了一下红斗篷。实际上，她倒是经常这么回答他的。我从来说不准他们永无休止的争论究竟是很有建设性的举动呢，还是该死的胡闹。但是她的意图自然是维护我的立场。“这当然很严重，汉弗莱，”她尖锐地反驳说。

他是一付傲慢的派头。“不，不，亲爱的女士，我看这只不过是银行把钱给大户借过了头，就这样。”

“远不止是这样。菲利浦·贝伦森的一些股东们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往事，你是知道的。”

他冷冷地看着她。“你能证明吗？”

“不，”她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说。“这只是我的感觉。”

汉弗莱爵士咯咯地笑出声来，他转身问我。“我想，首相，我们都受女士们直觉的影响了。”

多萝西气得脸都发白了。她双唇紧闭，站起身来，平整了一下她的黑色的亚麻紧身裙。“我们会弄清楚的，”她厉声说道，径直向门口走去。

“我们的确会弄清楚的，”汉弗莱得意地笑着轻声说。

我不懂他怎么那么自信。他连暗示也不给我。所以我告诉他一条好消息：我想要任命亚历克山大·吉姆森为英格兰银行的新行长。

我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我自然不期待他听到这消息会表示很大的热情。

“喔，那位业余传教士！多好的人啊！”

业余传教士，我想，一定是个绰号。我问他怎么会有这个绰号的，我得承认，我对汉弗莱的回答略感吃惊。“可是，他是的，不是吗？”虽说我对任何狂热的人都有些反感，特别是宗教的，可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即使在这个充满世俗欲念的时代，人们也不大会以此来反对一位坚信上帝的人，尽管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这样的人有些不合情理。“但是，汉弗莱，你觉得他好不好？”

“说他好是再对不过的了，”汉弗莱回答说。“真是一个好人。在怀特菲雪地方当局他干得很出色。”

怀特菲雪地方当局没干出什么业绩来。也许他把时间都花在传道上了。“他在哪儿传道？”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我想，是在教堂里。他是极为虔诚的。绝对的诚实。对谁都坦诚相见。”

显然汉弗莱非常喜欢他。但是.....在他的热情赞扬中有些什么东西使我担心。“对谁都坦诚相见是好事，是吗？”我问。归根结底，我委任一个人是要他去把事情查清楚的。

他的态度很暧昧。“当然是好事。如果他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丑闻，即使是在十号里，他也会逢人便说的。这是无疑的。”

“你是说.....他不太谨慎？”

汉弗莱看上去有点不安了。“喔天哪。”他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这样说就太带贬意了。我宁可说他是诚实得着了魔。”

我担心起来。上帝知道，我是大力主张人该诚实的，但是一切总要讲个地点和时间。我们讲的是政治，处理人的事情，以及类似的问题。“坦率地讲，你是不是认为，他是能把金融城整顿好的合适人选？”

“绝对是，”汉弗莱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您要的是一位圣人的话。当然，有人说他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上。即使是圣经宣讲者也会说他过于禁欲了。”

听起来吉姆森的问题要大于他的价值了。或是快相等了。我向汉弗莱指出我要听到全部的赞成和反对意见。他很为难地继续说：“可是，我必须承认，他是那么诚实，他不会懂得他们的花招。但是金融城里的那些人把他包围起来可能也没有关系。我想石油生产国组织总不至于把他当早饭吃了。”

他一定是汉弗莱的朋友。金融城的那些人把他包围起来当然会有问题的。但是会吗？我觉得很难相信。谁说过石油生产国组织要把他当早饭吃了？

我对汉弗莱说，我坚信他既不那么无用也不那么愚蠢。“我听说他很有智慧也很严厉。”

汉弗莱马上表示同意。实际上，我开始感到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很严厉，首相，的确是。事实上，有点阿亚图拉[5]式的严厉。

唯一的问题是，您是否想冒险让参孙[6]把整座大厦都掀倒？”

我不能否认有此担心。我不作声了。汉弗莱继续热情地赞扬他，直到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自然是对人不大够尊重的，他很具鼓动性和煽动力。唯一的问题是，虽说磕磕碰碰是难免的，但他却以此为嗜好。当然，他就喜欢什么都公开，他对新闻界谈起话来口没遮拦——在这个问题

上，他很不现实。”我问汉弗莱对吉姆森还了解些什么。

“喏，有人怀疑真**有谁会那么**有道德——我听到说……”接着，他犹豫起来。

我全神贯注地期待着。“怎么？”

他的不变的谨慎态度又占了上风。“没什么。不管怎么说，肯定这事不会闹出来的。”

“什么？”我问，急不可待地想知道。

“没什么。”他现在想让我宽心了，但是这完全没有用。“我肯定没什么事，首相。”

我却不能肯定是否还能用这个人了，尽管汉弗莱热情地推荐了他。他是多么地不了解我啊！

（在怀特霍尔街消息不胫而走，一两个小时后，财政部常任秘书，弗兰克·高登爵士听到了传言，说是汉弗莱爵士“诋毁”了亚历克山大·吉姆森。这样一来，内阁秘书和财政部常任秘书的利益有了冲突，目标大相径庭，各有不同的忧虑。

第二天汉弗莱爵士及时收到了弗兰克爵士写来的措词友好的便笺，在《三十年规则》允许下，我们有幸得到了它，并把它复印在此——编者。）

财政部

常任秘书 10月 8日

我亲爱的汉弗莱：

您可能已经听说，财政部极愿让亚历克山大·吉姆森来担任英格兰银行新行长的要职。

我们相信，这家银行是到该有一位以精明强干著称的人来当行长的时候了。虽说这是一种革新的做法，但是这当然是值得一试的。

财政部已经对金融城里这些丑闻容忍得够久了。财政大臣对不得不维护这些无法原谅的人已感到十分厌烦了。财政部也有同感。

何况，我们相信一个诚实的财政部门不能做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金融城是一堆狗屎，我提议现在我们就来把它清除掉。吉姆森是我们的人。

您的
弗兰克



H. M. Treasury

Permanent Secretary

October 8

My Dear Sir,

You may well have heard that the Treasury would like Alexander James to be the new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about time that the Bank had a Governor who is known to be both intelligent and competent. Although an innovation, it should certainly be tried.

The Treasury has endured these long standstill for long enough.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is quite fed up with having to defend the indefensible, and so is the Treasury.

Furthermore, we believe that an honest financial sector cannot damage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City is a doghill and I propose that we clean it up now. James is our man.

Yours ever,

Frank

（汉弗莱爵士没有急于作答。但是几天以后，弗兰克爵士收到了印在下面的一封信——编者。）



70 WHITEHALL, LONDON SW1A 2AS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and Head of the Home Civil Service

12 October

Dear Frank,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letter.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hear from you.

I was most amused by your direct remarks about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Bank of England.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need, from the Chancellor's point of view, for a clean-up in the City. It would indeed be in the Chancellor's own interest.

But I am sure you will agree that we must all ensure that the nation's interest is paramount. And although no honest financial sector cannot damage the nation in the long term, there would be significant short-term problems.

An inquiry into the City would undoubtedly cause a loss of confidence, the pound would plunge, the share index would plunge -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plunge with them.

This would not be in the Chancellor's interest, nor the Prime Minister's. If I might borrow your analogy of the City as a daughter, may I ask what is left when you clean up a daughter? Nothing! Except that the person who cleans it up usually finds themselves covered in dung.

Yours ever,

70怀特霍尔，伦敦 SW1A2AS

寄自内阁秘书和内政部负责人 10月12日
亲爱的弗兰克：

很感谢您的来信。读您的信总是一件快事。

我觉得您关于英格兰银行未来行长的滑稽评论很有趣。从部长的观点出发，我充分考虑了清理金融城的需要。这的确会是符合大臣自己的利益的。

但是我肯定您会同意必须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

来看，一个诚实的财政部门不能损害国家，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短期问题。

对金融城的调查无疑会造成信任感的丧失。英镑会贬值，股票指数要下跌——政府的威望也随之滑坡。

这就不符合财政大臣的利益，也不符合首相的利益。如果我也用您把金融城说成狗屎堆的比喻，我能否请问，把狗屎堆清除了还剩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清除它的人，他还通常是满身狗屎。

您的
汉弗莱

（弗兰克爵士对英格兰银行的敌意体现了财政部的一种传统态度。英格兰银行的官员比文职部门的工作人员收入要高。嫉妒在人际关系中起着作用。进一步说来，银行是个很奢侈的机构，食堂为一大群职员供应上等的饭菜。而财政部的人智高艺精，对银行里工作的人的能力有点不屑一顾。财政部里出类拔萃的人不同于外交部里的高手，他们真是一个精英班子，有看不起智商低下的人的传统。即使是低级官员在政治家面前也会表达他们很合理的不同意见。

弗兰克爵士显然不肯就此罢休。他给汉弗莱爵士的复函已丢失，但是它激起汉弗莱爵士措词

强硬的回信，我们有幸找到了，现复印于下——
编者。)



70怀特霍尔，伦敦 SW1A2AS

寄自内阁秘书和内政部负责人 10月16日
亲爱的弗兰克：

我并不觉得这种情况对我构成任何问题。您知道，菲利浦·贝伦森的百分之七十的大笔贷款都只借给了三位名声欠佳的外国人。英格兰银行有责任指导菲利浦·贝伦森，但是这种指导只是闹剧一场。所以英格兰银行才想遮遮盖盖——

把他们的调查员是一群外行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掩盖起来。

我理解您是想要清查的。但是我请您考虑一下这里面的全部含义。英格兰银行可能是负责指导菲利浦·贝伦森的，但是反过来，财政部是负责指导英格兰银行的。

因此，如果我们清查起来，不可避免地要有一番张扬，那么大臣会终发现他该负有责任。那时，他将得维护真正不可原谅的人了。

为了能度过捅马蜂窝后的难关，大臣需要首相方面的大力支持。但是，奇怪的是，首相却不怎么热心去维护不可原谅的人。

实际上，大臣能说服首相来救他的唯一办法是：使首相相信他（大臣）是被他的高级常任秘书们弄得丢尽面子的。

考虑一下吧，弗兰克。

您的
汉弗莱·阿普尔比

（汉弗莱爵士的致命威胁打胜了这一仗。财政部再也不闹着要清查了。吉姆森当上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可能性也急剧地减少得接近于零了。汉

弗莱爵士第一次干了他自信是为了哈克的大利益的事，他确实做到了让弗兰克爵士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也来反对吉姆森了。

然而，这情况的发展哈克是一无所知的。下面是他的日记——编者。）

10月17日

我和多萝西·温赖特，伯纳德·伍利讨论了我昨天收到的有关菲利普·贝伦森的报告。

多萝西说得完全对。真是叫人震惊。全是犯规和舞弊。我不太清楚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但是菲利普·贝伦森的舞弊情况似乎在商业银行里也是少有的。（“犯规”是指犯了罪而没有人能证明。“舞弊”是指犯了罪并有人能证明——编者。）

似乎我们已有了一份查账员的秘密报告。事实上，这不止是秘密的——没有人见过它。（在怀特霍尔，“秘密”一般是指人人都见过它了——编者。）

我问多萝西是怎么弄来的。

“他们会计科的经理是我的朋友。”

“纯粹出于友谊？”我要把这弄得很清楚。

她嫣然一笑。“显然他很想在新加坡授衔名单

上有他的一份。”这倒也是公平交易。我问她怎样才能做到给他授衔。把他放在哪个部分。

伯纳德很神秘地往前一靠说：“通过威尔士事务部怎么样？就因为他透露了消息有贡献？”他总约束不了自己。

整个事情中真叫我吃惊的是像巴特利这样的高街清算银行竟也会深陷泥潭的。

但是这并不使多萝西吃惊。“只要看看他们的行长——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好了！”

“你是说他也是个滑头？”我很吃惊。

“不，”她解释说。“但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小丑。”当然，她是对的。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7]。

多萝西说：“只要看看他是怎么做行长的。他从来没有自己的主意，他说话慢吞吞的。由于他什么也不懂，他总是同意和他谈话的人的意见。所以，显然人们就认为他很健全。”

她说得太对了。麻烦的是，我受邀去和他商量关于委任英格兰银行新行长的事。倒不是说有必要和谁商量一下——即使他是个业余传教士，我仍旧要委任吉姆森。他是我们需要的能对金融城彻底清查一遍的唯一人选。

“我认为您会发现，”陶乐赛说，“戴斯蒙爵士

要您别委任吉姆森来清查。”

“我难道有别的选择吗？”我反问道，一面用手轻轻拍打着菲利浦·贝伦森的调查报告。“在看到这今以后！”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了，如果消息一公开就没有选择余地了。”

“有些是注定要公开的！”

多萝西可不那么肯定。“如果诉诸法律，那么什么都得公开。但是如果英格兰银行出来调停的话，他们可能会把糟的事情也遮盖起来。比如说贿赂和盗用公款。董事们把保险金在保险生意大亏前投到他们私人的利启坦斯泰因公司里去。”

我起先不太明白她在作何建议。“首相，马上委任吉姆森。然后，如果在他开始着手调查前，您就让人知道他已受委任，**您**就没事儿了。而且在两院议会上，这也是一件值得宣布的好事。”

（有趣的是，这是一种少有的情况，多萝西·温赖特和汉弗莱爵士都在尽可能地保护哈克——而他们建议的事却是完全相反的。为了保护哈克，她要委任吉姆森，而他要尽力避免随着做了同一件事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经济上信任感的丢

失；这同一件事就是清查金融城。另一方面，她相信，你要加强信任感，你先得削弱它。

危机在深化，公众对此却毫不觉察，新闻界怕犯诽谤罪也未加报道。两天以后，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爵士做了十号的不速之客——编者。）

10月19日

我和多萝西又一次讨论了银行行长的烦人问题，这时内线电话铃响了。

我问：“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要我委任谁呢？”

“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爵士，”伯纳德在内线电话机旁说。

“你说得对极了，伯纳德，”多萝西说。

他一脸茫然的表情。“在说什么？”他说。他会被弄糊涂并不奇怪，他只是在通报一下戴斯蒙爵士马上就要到了。但是，我意识到，多萝西并非是在开玩笑——她的意思是说，葛莱兹布鲁克会推荐他自己来承担这份工作。

我问她是不是真的。她点点头。“归根结底，谁想掩盖真相？”说得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叫伯纳德请他进来。伯纳德报告说汉弗莱爵士正和戴斯蒙爵士在一起，他们正向书房走来。

我们在等他们到来的时候，我问多萝西，汉弗莱爵士和戴斯蒙爵士是否知道关于菲利普·贝伦森的调查报告。“是的，”她眼中投来警告的一瞥说。“但是他们不一定知道您知道了。否则的话您得给那位经理授以伯爵的头衔了。”

戴斯蒙一到，我就不难看出什么使他在金融城取得成功——高大，一脸聪明相，满头银丝，一双像海洛德·麦克米伦式的下垂的眼皮，再配上一撮小胡子，优雅的态度中露出几分随意，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让人觉得不务正业，无所事事，不求上进。他让自己无可挑剔的躯体坐进我的印花布套的扶手椅里。他莫名其妙地乐呵呵地看着我。许多人相信，这种乐呵呵的表情是装出来的——我清楚，这种莫名其妙的表情也是装出来的。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开始说。“你知道，我得任命一位英格兰银行的新行长。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戴斯蒙很有信心地说：“我当然认为您得任命一位新行长。银行是需要行长的，您知道。”

汉弗莱不会不觉察到戴斯蒙的信心下错了地方。“我想首相多少已作出了些决定。问题只在于该任命谁。”

“啊，”戴斯蒙明智地说，因为在一片朦胧中

他已看到一丝透过来的微光。“啊，”他又说，在脑中把信息进行编排。“这很微妙，”他继续说。“这是个任命谁的问题，是吗？”他证实着说。“那好，”他下结论说，“需要有个大家信任的人。”

“是的，”我同意说。“我觉得我需要个真正聪明的人。要正直，要有力。”

戴斯蒙显得不安起来。“好好，等一等！”

“你不同意？”我问。

他小心翼翼地衡量了一下这问题。“可是，当然，这是个很有趣的主意，首相。但是我不知道人们会信任那种人吗？”

多萝西插话说：“我想首相担心的是财务上的丑闻。您也担心财务上的丑闻吗，戴斯蒙爵士？”

“是啊，那是当然啰，我们不想有任何这样的丑闻。但是如果您起用人们信任的人，您就能信任他去防止有人卷入任何丑闻中去。”

“你是说他们会让他们不声张？”多萝西总禁不住要提些挑衅性的问题。

戴斯蒙大感震惊：“老天爷，不！只要有一丝怀疑，你就可对事情作全面调查。可以马上叫有关的人员来共进午餐。你可直接问他是不是真

有其事。”

“如果他说没有呢？”我问。

“那么，您就得相信此人的话。这就是金融城的运转规则。”可能这就是不运转的规则。再往下，我问了他关于菲利普·贝伦森的事。“你对此知道些什么？”我问他。“您对此知道些什么？”他步步为营地反问说。

“只知道些从报上读到的事，”我回答说。

“喔，那好。”他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是啊，他们是有了些麻烦，就这些。把钱借给不该借的人。这样的事谁都会有的。”

“没别的了？”

“就我所知，没别的了，”他小心地说。

多萝西对此并不满意。“在这件事上，你总得发表你意见吧！”戴斯蒙踌躇了半天。对他来说，自己的话是至关重要的。金融城里即使像戴斯蒙这样冥顽不化的人也知道他们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非同小可的——他们除此还有别的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去调查一下。”

多萝西真像一条猎犬，一点都不肯放松。“你就连传闻都没听到过吗？”

“当然，传言总归会有的，”他回答说，明显地松懈了一点紧张的感觉。

这一球回得很妙，差一点出界，却还在线内。

“传言，”多萝西重复说，“有关舞弊，行贿，盗用公款，知情人交易。”

戴斯蒙想要降降温。他和蔼地笑了一笑。“行了，别这么说，亲爱的女士，这些话都太激烈了。”

多萝西不吃这一套。“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对事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脸的诚恳显得和问他的问题全然无关。

多萝西很感到好奇。“对舞弊的不同看法是什么？”

“喔，当然，如果有人舞弊了，你就得对此采取措施。”

“跟他谈一谈？”我语含讥讽地问。

戴斯蒙可欣赏不了这讥讽。“完全正确，”他回答说。“但是一般来说，大不了是有人从公司的账目里擅自为自己作了短期贷款。

您知道，马失前蹄。总是常有的事。都是些类似这样的事。”

我看得出别想再有进展了。显然多萝西是对的。葛莱兹布鲁克要我别委任吉姆森。所以我问他究竟想让谁来当行长。

“我说，首相，我说过，这很难说。人们信任的人可不太多。我是说，这事不该由我来说，但是如果一个人被人问到，而正好此人又是被认为是……当然，一个人应该埋头于自己目前的工作，但是如果被人强拉上马的话，我敢说，人总会以大局为重，勇于担当起……”

我突然意识到他想要让人听出什么来，我干脆把这层纸戳破了。“我正在考虑亚历克山大·吉姆森。”

“啊，”他像泄了气的球一样地说。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当行长。我为在别人身上明显看到的无限的自欺能力而大为吃惊。（但是显然，从不在他自己身上看到——编者。）

“你对他的看法如何？”我问。

戴斯蒙用一句无力的赞语来贬低他：“他是位很好的会计。”

“诚实？”

“是的。”

“强干？”

“恐怕是的。”

“那么你会推荐他啰？”

“不。”戴斯蒙含糊不清地说。这不奇怪——任何一个把强干看作是批评的语言的人不大会是站在吉姆森一边的。“金融城这个地方很奇怪，首相。您知道，如果您把豆打翻在地，那您就引出一大堆豆蛀虫。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让猫跑了出来，您怎么能让睡着的狗依然躺着？您拿来了一把新扫把来打扫，如果不小心的话，您会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在溪水中易马而骑，您就会落水无疑。”

“那么，后来怎么样？”我问。

“那么，显然，汽球上了天，结果鸡飞蛋打，实际上是你自找的。”

我听懂了。这是叫我听之任之。来个眼开眼闭。汉弗莱点头以示同意。他坐在近代亚当式座椅里，脸上略显出一丝敬佩的神情。

（现代读者可能会不明白，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已经当上了令人艳羡的巴特利银行的行长，为什么还要当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实际上，虽说行长的收入并不丰厚，但这一职务在金融城里仍被看作是职高位显的，这意味着显赫的地位，巨大的影响，华丽的服饰，甚至还真有点权势。还

有些浪漫和神秘的色彩，其更重要的是，他可知道一些秘密，这就构成了斯瑞德尼德尔街上传统的诱惑力。何况，这一银行行长的职位可被看作是对国家的奉献，而不仅仅是能使自己变得更富一点，这样，自己也就能坚定地置身于伟大的名人名单之中，在后退休的时候，也就能更为荣誉加身，有机会吸收进半官方资助的机构，或身负皇家的使命到阳光明媚的地带去作调查——编者。）

10月24日

今天傍晚，我坐在布莱克普尔冬园的化妆间里。门上有一个旧的粗糙又肮脏的银色星号。我不想当什么明星，连名誉郡长也不想当。我心中充满着绝望。

我在寒风中漫步在海滩上，一大群芒克郡的警察簇拥着我，他们全部出动显然是想让我赞赏他们在保安上的安排。海滩又湿又荒凉。除了几十个摄影师和记者外，我谁也没碰到。这些人都问我在发言中将说些什么。

当然他们并不是真想听什么回答。使我担心的是恐怕他们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因为，就在我出来散步前半小时，我满不是滋味地在梳妆台旁翻阅卷起了边角的手稿，我意识到——好像我并不知道似的——通篇发言没有一点内容。

当然，发言后的反应不会有多大区别。不管怎么样，我得让他们站立鼓掌！三分半钟。那是说如果他们不喜欢我的发言的话。多萝西订下了这个低极限：我那已故的、无人哀悼的前任在去年得到三分钟站立鼓掌，所以无论如何，我还得再加上三十秒。所有的要人今天都配备了秒表。

但是人人都明白站立鼓掌只是摆摆门面的事。在新闻节目中，他们只会播放几秒钟。他们也会播放我的空洞无物的发言，以及零零落落心不在焉的几声鼓掌，然后政治记者就会出来指出我对党和国家都没有带来好消息。

我无望地拿起了笔，又一次凝视着我的稿子。“我得说出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来，”我对多萝西说，这时，电视顾问团里的一位漂亮姑娘在我的眼袋上化着妆。

她翻了一下稿纸。我看得出，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就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来看，这是我们能说的好的话了，”她回答说。“除非您要说情况即将改变？”

“又没有证据，”我不满地说。

“我们不需要证据——这是两院议会，又不是在老贝利[8]，您只要一句判词就行了。”

我心情沉重地想在老贝利我能得到的就是一

句判词。当伯纳德的头探进化妆间房门的时候，我深沉的悲愁一点儿也没被驱散。

“首相……汉弗莱和布兰达高级使节在楼下。您有时间和他们谈话吗？”

我想象不出他们要谈什么，可是我也看不出谈谈有什么坏处。在我们等他们上来的时候，多萝西说失业情况严重，利率太高，投资不足。我们还能怎么办？”

看来是没有办法了。不降低利率，我们就得不到更多的投资。但是怎么能降低利率呢？曾有过降低利率的先例——也有过提高利率的先例。多萝西想为了社会公正而降低利率——但是社会公正只是通货膨胀的代名词而已。

“您是否能对大法官施加压力，让他对财政部施加压力，让财政部对英格兰银行施加压力5再让英格兰银行对高街银行施加压力？”她想知道这一点。

在我发言以前的二十分钟里5要完成这一大堆任务似乎是神话。我的选择是宣布对业余传教士、清廉先生，亚历克山大·吉姆森的任命，希望在报纸的标题上能看到：哈克在金融城的问题上不再空口说白话了。

（哈克企图宣布这样的任命状，尽管他充分

意识到他在这件事上得冒的风险。文官部门的逻辑学家们都把这看作是政治家的推理：

第一步：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事情。

第二步：这就是事情。

第三步：所以我们必须做这件事情。

从逻辑上讲，这跟一个同样有名的推理似出一源，比如说：

第一步：所有的狗都有四条腿。

第二步：我的猫有四条腿。

第三步：所以我的狗就是猫。这条政治家的推理得对二十世纪英国的许多灾祸负责，包括慕尼黑条约和苏伊士行动——编者。）

只有一件事使我大惑不解：汉弗莱在我一提升到十号以后就知道我要作这么一次重要的发言。为什么他选择这个时候把我介绍给布兰达高级使节呢？

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匆匆忙忙地走进化妆间。还没来得及坐停当，汉弗莱就开门见山地说话了。

“高级使节先生听说，”他开始说，“您要任命亚历克山大·吉姆森为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他必然会着手调查菲利浦·贝伦森的问题。他为此深深担

忧。”

我不明白这对布兰达有什么影响，我就这么说了。“菲利浦·贝伦森是个有问题的银行，他们把百分之六十的钱借给了三个名声欠佳的外国人，”我指出。

高级使节开口了：“三个外国人中的两个是布兰达总统和布兰达企业公司的主席。”谢谢你，汉弗莱，你让我这么发窘。“啊，”我若有所悟地说。

高级使节倒说得直截了当：“如果您攻击这些贷款的做法，布兰达总统就不得不把这看成为敌对的和种族主义的行为。”

“种族主义？”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布兰达高级使节回答说。他对此似乎深信不疑。

我想要解释一下。“我……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对您的总统进行人身攻击，我只是想……”

我找不到话来说了。伯纳德提了个建议：“您只是想说他的名声欠佳？”我瞪了他一眼使他安静了。

“我能不能进一步指出，”拒绝和解的布兰达人继续说，“对我们总统发起的种族主义的攻击无疑会促成所有非洲国家的团结和使我们得到其

他非洲国家的支持。”

“那些是英联邦的国家，首相，”汉弗莱提醒我说，这根本没有必要。

“我们会建议把英国从英联邦开除出去。我们的总统会取消女王陛下下个月的访问。布兰达会立即把英国政府带来的股票全都卖了。”

我转身低声对汉弗莱说：“这会造成英镑贬值吗？”

他严肃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对高级使节询问道：“还有什么吗？”

“那还不够吗？”我对汉弗莱厉声说。我指出这场讨论该结束了，因为我马上要上台了。我向高级使节道了谢，我答应对他的话一定慎重考虑。

在那位非洲外交官走了以后，我把汉弗莱留了下来。我气白了脸！“你怎么竟敢把我置于如此难堪的境地？”我吼叫起来。

他固执地强词夺理：“又不是我，首相，是布兰达。还有，英联邦大家庭是不能捅的马蜂窝。”

我火冒三丈。“布兰达总统是个滑头货！他不属于英联邦大家庭，他该被赶出去。”

“他已经被赶出去了，不是吗？”笑容满面的伯纳德说。“对不起，”他立刻补充说，这正赶在我想掐死他之前。

我对汉弗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生气。“汉弗莱，你在玩些什么花招？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坚信我会允许再一次把金融城里的丑闻掩盖起来？你在这件事上也有一手？”

汉弗莱的回答听上去既无奈又诚实。“没有，首相。我向您保证。我并没有什么别有用心个人动机。我只是想救您。我是为了您哪！”

“我们怎么能相信呢？”心怀疑惑的多萝西说。她显然是不相信。

“因为这一次是真的，”汉弗莱发人深省地叫道。我们瞪着眼看他。“我是说，这一次我是特别的为了您。”

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知道我必须在发言中说出一些好事儿来。除了宣布把这个业余传教士任命为行长外，别的我是一点儿也想不出来了。

“说说把利率降低怎么样？”汉弗莱说。

我正要叫他别犯傻了，他脸上的表情使我意识到他确实有一个锦囊妙计。（我们看，这不能说是确实的——编者。）但是我看不出该怎么

办。“吉姆森决不会同意为政治原因而降低利率，”我对汉弗莱说。

“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就会高意，”汉弗莱说，“如果您任命他为英格兰银行的行长的话。今天早上他就把巴特利银行的利率降低了。您在发言稿中可以把这两件事一起提。”

“您怎么知道的？”

“他刚告诉我。他就在这儿。他让您第一个听到这好消息。”我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了。

（哈克对“真的”两字自有他不是字面上的解释——编者。）我对什么是对的已经糊涂了。（相反，哈克明白，任命吉姆森对国家来说是一件正确的事。他可能是指，选择葛莱兹布鲁克对他个人或是他的党，才是一件正确的事。政治家经常为一个错误的观念而困惑：所谓对他个人是正确的事，其定义就是对他的国家是正确的事——编者。）但问题是，戴斯蒙爵士怎么能当这个行长。他是这样的一个蠢货。他满口都是陈词滥调。他一说起废话来就没完没了了。

多萝西反对的矛头直指汉弗莱。“这连孩子也骗不了，”她谴责他说。

他耸耸肩。他否认不了这一点。但是他指出降低利率可以使我的发言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多萝西已经想在前面了。“降低利率不是意味着物

价上涨吗？”当然，她是对的，但是老实说，在这会儿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只要得到巴掌就行。（我们相信，哈克想要说“鼓掌”，但是经过考虑以后，我们还是决定把这误印了出来，因为这很发人深省——编者。）

多萝西似乎是痛苦地醒悟了。“那么您是不想让一个诚实的人来管理金融城了？”

这使我感到很不公正！戴斯蒙，葛莱兹布鲁克并不是真的不诚实。只是他蠢得不大明白什么时候他是诚实的，什么时候他是不诚实的，“事实仍旧在于，”我一面说，一面准备跨步上台了，“没有金融城的支持，政府这一机器就无法运转。不是吗？”

“是，首相，”汉弗莱说。

“毫无必要地使他们不安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吗？”

“是，首相。”

“多萝西，”我说，“在我的发言稿上写上降低利率。汉弗莱，立刻请戴斯蒙上这儿来。”

“是，首相，”他们同声说。两分钟之后，戴斯蒙得到了任命，而我也上了电视。我得到了六分钟的站立鼓掌。这是个很好证明，我作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这是金融城里贿赂的代号——编者。

[2]著名私人侦探——译者注。（就是福尔摩斯——ken777注。）

[3]多萝西·温赖特，哈克的首席政治顾问。

[4]和编者的谈话。

[5]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者注。

[6]以力大著称——译者注。

[7]请参看《是，大臣》第7—13章。

[8]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译者注。

5. 权归人民

10月29日

今天早上我在电视上露了面。我对此向往已久。通常是，有了坏消息，他们就来采访我，这才是他们感兴趣的。今天的议事日程中特别的难题是关于地方政府的长期面临的麻烦，对此我是真的无能为力！

“在白厅和议会里几乎每个人，”我对伯纳德说，“不管他是属于什么党，都一致认为有几个政务委员会被一群聪明得过了头的腐败的白痴在操纵着。”

伯纳德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只是评论说白痴多能做到“不够”聪明。他讨厌对很久以后才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发表看法。但是我要求他说出他的高见来。

“他们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他谨慎地说。

“那得看你怎么给民主下定义了，”我指出。“只占地方选区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而他们却把它看作是威斯敏斯特[\[1\]](#)中产生政治领袖的大选一样。”

“但是，他们仍然是代表啊！”他坚持这一看法，而且越说越不对劲儿。

“但是他们代表谁？”我挑战似地问他，“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委员是谁。委员们也明白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难作交代地花了四年时间去作公开获得资助的私人旅行，把纳税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捐赠给那些为女同性恋者开办的学习班，资助伯罗宠物督视工程来和偷猫行为抗争！他们毁了学校，他们把城市搞得支离破碎，他们使警察道德沦丧，破坏法律和条令，而他们却责怪我们。”

“他们在责怪您，”伯纳德审慎地说。

“就是这样！”我同意说。“怪我！”

“您这么说吗？”

“我已经说了！”我打断他。“见鬼，你不在听吗？”

伯纳德解释说，他想问我是否将在电视上这么说。他在想什么？当然，我不会去这么说的！（有趣的是哈克相信自己不是容不得人的。这么说会使他显得容不得人。一些更有思想的政治家会因为容不得人而感到自豪的。他们会感到这仍可使他们深得人心。哈克就是想要被人喜欢，而他大的问题是这些地方当局使他不得人心——编者）。人们猜想我该负责，因为我是首相。现在亨兹华斯政务委员会的领导，那个该死的叫阿格尼丝·穆尔豪斯的女人威胁着说要从警察局里抽回

资金，并且取缔警察部队。如果她得逞的话，就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把国家拱手交给地方当局来管了。

伯纳德已经查阅过有关章程。“她是做不到的他说。“1964年警察法案的第五章说市政务委员会必须提供充分的、足够的警察力量。”

我读过《卫报》记者近采访穆尔豪斯女士写的报道。我暂时让自己故意唱反调，“她说除非让警察扩大到占人口的一半，否则总有人说警察力量不够充分的。”“她没有办法证明这句话，是吗？”伯纳德问道。

谁知道呢？她现在拥有的那支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力量确实是国内不充分不强大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如果我们把她送上法庭的话，她准会胜诉。

（不幸得很，当天电台对哈克的采访手稿已经失落，我们也因此相信这并不重要。然而，第二天早上，哈克和汉弗莱特别讨论了亨兹华斯的伦敦区的问题——编者。）

10月30日

“汉弗莱，”我开始说，“似乎我们得对这个阿格尼丝·穆尔豪斯采取些措施了。她的区域几乎成了禁区。”

他点点头，显得睿智又贤明。“确实是的，首相。”

“可是，采取……什么措施呢？”我问。

他满怀希望地望着雕花天花板，沉思着抓了一下他的后颈。

“给她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怎么样？”

我看，这建议不怎么样。她会回我们一封措辞更强硬的信。并把复印件发给所有的报纸。

伯纳德不知道他是否能使她注意到法律条文，可是我怕这也无济于事。她就是律师，她的专长就是绕开法律条文。

事实上，汉弗莱和伯纳德都没了辙。他们根本不懂人们并不在依法行事。他们多少有点不理解，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现在他们俩倒很一致了。

汉弗莱在他拍纸簿上心不在焉地乱涂着，静静地思考。后，他提出，“干吗我们不能不去理她呢？”

我瞪着眼看他。“这样做，不是让人说我把控制国家的大权拱手交给一些军事狂人了吗？不，汉弗莱，总得有人跟她谈一谈。向她指出这个问题在国家安全上的含意。”

我等着，但没有效果。“找一位法官去和她谈？”他困惑地问。

“不，”我说。“这不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冲突。这必须是官方的。”我再等了一下，可还是无效。“要一位负有安全方面责任的人，”我暗示说。

总算明白了！“不！不，首相，不！”他竭力反对这么做。我真的不能怪他。“当然这取决于伦敦警方吧？内政部，安全局，特别情报部，大法官，环境部……”

“怀特·菲须港务局？”

“怀特·菲须港务局！”他一本正经地重复说，接着他又意识到我在开玩笑。“关键是，不能是我，这不公平。”

“关键是，汉弗莱，”我解释说，“你是主持保安措施的。”

“是的，但是……”

“或者我们得把这重任另派他人？”我的威胁使人一听就懂。他话说一半就一言不发了。

我深表同情地一笑。“那么，你同意了。悄悄地去同她谈。达成一个君子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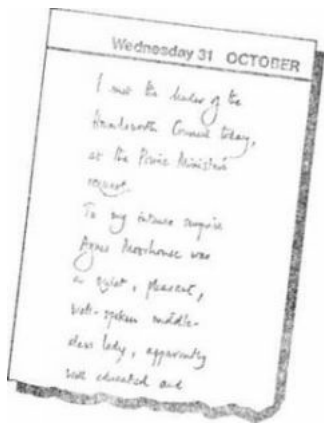
汉弗莱紧绷着脸。“但她又不是君子。她甚

至还算不上是个女士！”

“没关系，”我安慰他，“我要你去左右她。”

他的眉毛竖到了头发根。“左右她？”很明显，他把这看得比死还难过。我不能不对此抱同样的看法。

（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提到了他和阿格尼丝·穆尔豪斯的那场累人的、伤脑筋的谈话——编者。）



10月31日 星期三

在首相的要求下，今天我会见了亨

兹华斯政务委员会的领导。

使我大为吃惊的是，阿格尼丝·穆尔豪斯是位沉静可亲，言辞有修养的中产阶级女士，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良好的环境中长大。这样，她对我们的态度更叫人大惑不解了。

她对我们绝对地抱有敌意，虽然我必须说她仍是礼仪周到的。她一到就接受了给她的一杯茶，但是，当我友好地问她该称她为穆尔豪斯夫人呢还是女士时，她却不屑一顾。在回答的时候，她生气地问我她的婚姻状况是否和我的主题有关。

当然没关系。我对此也一点不感兴趣。同时，她显然不喜欢袋泡茶，而爱喝桔子汁，这说明她受的教育使她对生活中的享乐也不是无动于衷不知高低的。

我审慎地问她是否愿意被称作穆尔豪斯女士（这称呼似乎对她完全合适）。她告诉我可以叫她阿格尼丝。随便说一句，我是不很愿意这么称呼她的。她问我她该怎么称呼我，我表示称汉弗莱爵士就可以了。

然而，我感到处在这种关系中，互

相直呼其名很不恰当，因此不大愿意称她阿格尼丝，而称呼她亲爱的女士，作为谈话的开始。这种称呼方式纯属习惯性的，全无半点讽刺的意味。也不想使自己显得居高临下。可是，这位可爱的阿格尼丝却叫我“不必这样称呼了”，她不要听任何带有“性别歧视的陈年老调。”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现在得到了证实，那就是：这次会见不大可能很融洽了。但是，我意识到如果不越过这个相互称呼的阻碍，事情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所以我很快就转入正题。我说我们必须互相理解，我希望我们双方在根本上还是一致的，尽管她在该如何治理英国方面，毫无疑问有她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双方都同意，社会该有秩序和权威作为基石。

她声言这只说对了一半。

“一半？”我问。

“您同意，而我不。”她说。真滑稽。可谓是很有趣的论点，但很难当作是一个严肃的回答。简单地说，她声称我们现行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实力集团的利益，在滥用权力。她说，这样一

来，无家可归的，无计谋生的，年老体弱的就只有遭罪的份儿了。

她似乎觉得我和普通人一无接触。我猜不出她是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的。我耐着性子向她解释说，我充分地了解我们社会中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们，我说我读过一切出版的报纸，看过全部的统计数字，研究过所有的官方文件。而她却向我发出一连串互不关联的问题：“半磅麦淇淋要多少钱？社会保险办公室几点钟办公？五十便士可使你的煤气取暖器开多久？”等等，等等。

我自然是一点也回答不出，我也看不出这些问题有什么关系。但是她似乎在暗示：只要我能回答这些问题，我对上层权力的态度就会大不一样了。

这念头真是荒谬绝伦。我们都同意，铲除贫穷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我们都同情那些不及我们富有的人们。但是，我们根本没有使每一个人都同享荣华的万全之计。说老实话，这种在经济上“平等”的概念压根儿就是海市蜃楼。总归会有人比别人富有的。

令我吃惊的是，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开始在我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东

瞧西看，好像她是在星期天下午去泡特贝罗路观赏风景似的。她问我这书桌是不是我自己的。还有这幅肖像画，还有这些瓷器，她其实很明白这些全都是政府财产。她估价说我办公室里的一切可值八十个千，我想这是当地人讲八万的一种说法。“是够给二十个单亲家庭过上一年了，”她这么说。

我想“八十个千”是过高估价了。但是，即使她说得对，她在经济上仍是一窍不通。我正要向她解释，剥夺富人的财产在长远的观点上看来并不给穷人增加财富——事实上，正好相反——她倒问起我的工资待遇来了。我拒绝告诉她我的收入，但是她调查过了。现在哪儿还有什么个人的隐私可言？哪儿还谈得上尊重别人？难道就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了吗？

她大胆地建议我把收入降低到每周一英镑，每年把七万五千镑供给穷人。我又一次设法向她解释我的工资只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她却不予理睬。她说如果由她当权的话——上帝饶恕她——她会把这结构简化的。

我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这本是我

的职责。我该忍辱负重。但是，接下来，这个该死的女人实在太过份了！她指出我正从我的国家中牟取私利。

她显然对我作了些调查，当然，只是在我的工资方面。但是，在这次谈话前，我也没闲着。现在，我问了她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她禁止在政务委员会办公室悬挂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月历怎么会有利于穷人。

她的回答倒很给人启迪：性别歧视，她说，是一种“对女人的殖民主义”。其实，把这种月历说成是下流的就更为准确的了——但是现在“下流”这个词被错误地用来描写战争，描写财政上的失误和其它那些可能是错但并不下流的事物了。

显然，阿格尼丝认为殖民主义从其定义上看来就是邪恶的。把它用在带性别歧视色彩的月历上非常恰当，无须作进一步的争辩。那么，我就问她，抵制对女人的殖民主义是不是就成为亨兹华斯地方鼓励和赞同让同性恋的单身工作女子领养孩子的理由。

“是的，”她说。“我反对一切形式的偏见。我觉得孩子们不该在有歧视同性

恋的不合理的偏见中长大。”我注意到，在这儿她回避了一些问题。

接着，我问她在她的地区只允许出售自由牧区生产的鸡蛋是否有利于和歧视同性恋的偏见作斗争，有利于争取女权的斗争，有利于消除贫困的斗争。

她的回答是，“动物也有权利。”我想她是想说，这里有对鸡的殖民主义，但是当我笑出声来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激动。“用电气设备饲养的鸡根本就不该活。您愿不愿意生活在不能呼吸新鲜空气，不能流动，不能伸展四肢，不能思考，而四周是另外只百个没有希望、没有头脑、只会咯咯乱叫、有一身难闻气味的生灵的环境之中？”

我当然不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参加竞选议员的原因。我用来驳斥她的论点是电气化养鸡可生产大量的蛋，这样，蛋就会便宜，这样，在她的地区，穷人就有吃的了，她不是那么地关心他们吗？

她拒绝接受这一观点。“鸡因此而遭罪，它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有趣的是，我有点听懂她的话了。我喜欢买自由牧场的蛋——但是不止是喜欢，我也

买得起。实际上，她对动物世界的关怀促使她要在附近着手一项宠物督视工程，来和偷盗猫的行为作斗争。我指出这笔钱完全可以用在穷人身上——但是，她一定会争辩说这笔钱是用在穷猫身上。

现在我在使阿格尼丝生气了。她问我何以反对我们的哑巴朋友们。我的回答是——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它们，因为在地方当局里我有许多朋友——可是这一点儿也没使她乐起来。

我们争吵了一会儿。后，我们之间没能建立任何关系，也不再互相用大道理来压对方。我们转入下面的程序：她要把资金从警察局抽回来，不提供给政务委员会，把警察局长撤职，建立几个禁区。我语含讥讽地问她是否也痛恨对罪犯的殖民主义，但是我的这一笑话并没激起半点浪花。阿格尼丝相信社会的不公正才造成人们犯罪。然而，这种好心的理论解释不了遗传的因素，以及仍有无数有特权、有财富的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对他们来说是够好的了。

她还认为她的地区里的警察麻木不仁，还带种族偏见。我能肯定他们中许

多人属于前者，一部分人属于后者。但是配备上足够的警备力量，仍是有利于我们大家的，特别是有利于那些住在犯罪率很高的地区的普通人的。

她也不接受这一观点。我这才对她完全失去了同情。她承认她不在乎有的人用粗劣的自制武器干着抢劫、强奸和爆炸的事。

我设法去解释她这样做会推翻我们政府的整个制度，并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她微笑着说：“是您的，不是他们的。”

简言之，她乐于取缔议会、法院和君主——一切！我递给她一包火柴，让她焚毁我的办公室。但她以一笑婉谢了。我问她为什么。

“我也许会需要的。”她说。

11月3日

今晚我坐在楼上公寓里心爱的座椅里，做着填字游戏。我以为我整晚都会一个人度过了。但是安妮很早就从伯明翰[\[2\]](#)回来了。我告诉她，我已让汉弗莱去见一见那位可怕的阿格尼丝·穆尔豪斯。安妮觉得好笑。“听上去像要作一个有趣的社会实验。”

实际上汉弗莱说会见进行得很好，但是我注意到他不想多谈这件事。伯纳德告诉我，在她走后，他在十分钟内喝了四杯威士忌。

安妮说，在我的选区内，她跟地方当局也有过麻烦。“就是那个市政厅。他们硬是取消了老人的圣诞晚会。”我大吃一惊。“为什么？”

“有关新工作人员的超时工作条约。他们说这全是你的错。如果你给他们钱，他们就开这个晚会。”

这正是我要抱怨的！这不公平。英国每一个市政厅的每一件蠢事，每一次失误都被看作是我的错。而实际上我根本控制不了他们。我将请多萝西拟订一份有关地方当局情况的供我思考的文件。明天！

11月6日

今天我和多萝西的谈话很给我启迪。她有许多关于地方当局的事要告诉我——显然，她对这事已考虑了好几个月了，她很清楚我早晚要对付他们的。

“概括地说，”她开始讲了，“有一个君子协定，只要政治家们不说当官的是多么无能，那么当官的就不会说政治家们是多么愚蠢。”

我想，这倒很像在唐宁街十号的情况。我问

多萝西对此我们有何良策。

“您真想知道吗？”

我奇怪她竟会提这个问题。“当然想知道。”

“现在是一个他们对我们的局面。地方当局本应就是我们。”

我被搞糊涂了。我们是指人民呢还是指政府？

“在民主制度里，”多萝西很有理由地指出，“那应该是一回事。”

在理论上是丝毫不错，但是我们都知事情从不如此。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我们是指人民。“地方当局应该为我们办事，他们应该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现在并不是。他们在为他们办事。为他们的方便，为他们的利益。”

这我知道。人人都知道。但是怎么办呢？和他们斗？

“不，”多萝西说，“把他们变为我们。”我被搞糊涂了。我请她举个例子。

“设想一下，如果您想阻止一份重要的政府计划，”她说。“您会怎么办？”

“这很容易，”我说，“参与一下政府部门的讨论。”她笑了。“不，说真的，如果您是一个普通

人呢？”

“我记不起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形了，”我承认了这点。

她请我想象一下我是个普通人。这也不那么容易。

“想象一下您要阻止一份开拓路面的计划。或是在您房屋附近建立机场的计划。您会怎么办？”

我不太想得出有什么办法。“给我的首相写封信？”我充满希望地说，

她不太满意，“这有效吗？”

“当然没有，”我承认。不管怎么样，我是不大会去注意这种事的。“但是普通人一定是那么干的，他们很蠢。”

（当然，哈克从不考虑到这句话暗中的含义：愚蠢的选民和他的当选之间的因果关系——编者。）

多萝西想要说明的是：普通人会做的是，抱成一团来和他们反对的官方计划作斗争。这群人就代表当地人民。在另一方面，地方当局不代表当地人民，而只代表当地的政治党派！

“在当地的人们真地关心起一件事的时候，

他们就会抱成团，”多萝西说。“这使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担起责任来了解一二百户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们上街，站在台阶上，在超级市场里，对人们发表讲话；他们要求人们的支持，筹集款子。现在您看，这些人群和地方上的政务委员会会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是有头脑的体面人。”我说。

“还有呢？”她问。

“他们明白他们代表谁。”我说。

“这就对了，”多萝西说。“所以他们就做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要他们做的事。他们筹款子也不像收税款，因为他们把钱都花在人们要他们花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钱。地方政务委员会乱花钱，因为他们花别人的钱。”

当然，她说得对。举例说吧，我家乡的普通人想为老年人开开圣诞晚会。而市府却宁可把钱花在造一座新的市政厅上面，或是花在去巴哈马的调查旅行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说，“取消政务委员会，把一切都处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哈克完全弄错了。这只能是汉弗莱爵士的解决办法——编者。）

但是多萝西的观点更为激进。“关键是把权

力归于普通人，剥夺市府机器的权力，使地方政府切切实实地负起责任来。”她拿出一份本月的《政治评论》来。里面有一篇马里奥特教授写的文章。

他的计划是：

1. 建立城市村落——约有二百户左右的选民区。

2. 建立村政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二百户选民选举产生。

3. 给每个村政务委员会钱款——一年一千镑，除去税款和地方税金，这些钱只用在他们的小地区上——两条街，一个城市村落。

4. 村政务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区务委员——也就是说全国会有五百到六百个区务委员。像议会一样。

5. 选出一个区务执行委员会——也就是说每个地方当局有一个议会和内阁。

听起来很对我的胃口，虽然，由议会选举产生内阁的主意，不太使我兴奋。这样做会使人们的参与程度推向极端，还会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多萝西坚持说这对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结果就会是每一个区委会挨家挨户地和选

举他们的人接触。”她说得对。真是绝妙的主意。如果他们真遇上阿格尼丝·穆尔豪斯的话，谁会选她呢？（可能有更多的人——编者。）这影响是巨大的！就像是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一样。所有的政务委员会，实际上全都腐败不堪——在地方党派中有六个人在决定着四年中谁进市政厅议事。

一旦成功，我将是伟大的改革者。我现在就看到了这一点。哈克改革法案。在历史书上有我一席之地。我将自己来写这一页。我立即有了如何开展辩论的主意。我这就在多萝西身上试验起来。

“英国之伟力不在办公室和政府机构之中，而在自由男儿的健全的心和坚强的意识之中……”

她打断我说：“女人也有选举权。”

“自由女民……”这听起来不太像话。“自由民众，自由人……”我重新措词。“整个英伦三岛的民族，在宽阔和明智的肩头……”她又打断我。“肩头哪来智慧？”我继续说下去。“在他们宽阔的肩头和聪慧的心上……脑中，命运就在他们坚强的心中和聪明的脑中。我们必须信任他们朴素的智慧。我们必须把权力还给人民。”她鼓掌了。

“多萝西，”我谦虚地说，“我为成为推荐这新制度的人而感到骄傲。我们该怎么称呼它呢？”

“民主，”她说。她的蓝眼睛闪闪发光。

伯纳德爵士回忆说[\[3\]](#)：

一平方英里的怀特霍尔街是当今世界上令人莫测高深的地方。把它比作一个筛子，倒也似非而是。没过多久，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就听说了多萝西·温赖特向首相推荐了马里奥特教授的主意。在那周的一个晚上，他请我在下班后去他办公室喝茶。

我也读过马里奥特教授的文章，但我得承认，由于我比老汉弗莱稚嫩一些，我还不不太领会这理论的深刻含义。所以当他提到这题目时，我说在我看来是到了该改革地方政府的时候了。

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告诉我，我应该更谨慎些。我这才表明我只是想说我并不全盘否定改革地方政策。由于他的表情一成不变，我觉得还是再明智一点为好。我补充说我看得出，在反对改革方面，可能会有许多令人信服的论据，实际上这些论据可能有人会说是结论性的。我很感激他没有要我具体说出这些

论据，因为，说句老实话，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论据。我真傻！

当然，汉弗莱习惯于细致入微地考虑问题，他早已想出了这些论据。他解释说，如果一旦建立起真正民主的地方社团，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它们一旦建立，就会坚持要更多的权，政治家们将会感到害怕。

必然的结果就是建立地区性的政府。

怀特霍尔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是一条坏消息！让我为你举个例子吧：如果，比方说在诺丁汉有一块空白的土地，在使用上有两个对立的方案——建造一座医院或是一个机场，这只是举个例子——我们一贯的做法是组成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各个对此感兴趣的部门一联合起来，这个委员会在几个月内就会做出有成效的工作。这些部门可以是：保健部，教育部，运输部，财务部和环境部等等，等等。我们都得读文件，开会，提建议，讨论，修改，汇报和重订方案。这是正常的事。

为什么？因为这总能使问题成熟，结论可靠。但是如果有了地区性的政府，他们自己就可以决定诺丁汉的一切。可能开上三、四个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业余的。

你会争辩说——就像那天我对汉弗莱争辩的那样——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城市，他们应该有这个权力。但是我错了，所以你也错了，理由如下：

第一：不能相信他们会知道对和错。

第二：这样一来，怀特霍尔的工作量就大大减少，大臣们几乎可以自己办理一切了。所以我们这些文官，也就不大有权了。

第三，文官不大有权倒没什么。说实话，我个人一直是不想有权的[\[4\]](#)。但是文官不大有权的不幸涵义是让不该有权的人有更多的权了。

汉弗莱爵士一向我解释了这一点，我就立即觉得我看问题的方法错了。在他的不该有权的人的名单上，位居榜首的就是政治家们，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级的。

开始，我觉得在他的论据中我找出

了纰漏，既然是平民百姓选出了这些政治家们，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是不该有权的人。在民主制度中，权力不是应当由选民授予的吗？

汉弗莱使我调整了看法。“这是**英国式**的民主。伯纳德，这可不一样。英国式的民主承认，你得有一个制度来保护重要的事，使这些事不落入坏蛋的手中。像艺术，乡村，法律和大学一类的事——所有这些事。

我们就是这个制度。”

当然，他是对的。我们，文官们，在管理着这样一个文明的精英班子，一个运转得很顺利的政府机器。这机器只偶尔受到大选的考验。自从1832年以来，我们渐渐地把选民们排斥在政府以外。现在是我们让他们每四、五年选一次的时候了，这样我也好看看哪些小丑们想要干扰我们的政策。

我也不得不把这件事彻底忘掉。汉弗莱爵士谈话的时候，我窘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羞愧得头也垂下来了。

“你想把**湖区**写变成一个辽阔的活动住房的聚集地吗？”他问我。“你想把皇家歌剧院变成一个赌场，把国家剧院

变成一个地毯拍卖行吗？”

“看上去本来就像拍卖行，”我争辩说。

汉弗莱听了很伤心。“为了不让人说这种怪话，我们还授予那位建筑师一个爵士头衔。”我咬了咬嘴唇。“你是不是想让三号电台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流行音乐？如果他们从电视中抽掉所有的文化节目，你将作何感想？”

我想要为自己辩解。“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看这些节目。”“我也不看，”汉弗莱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们**存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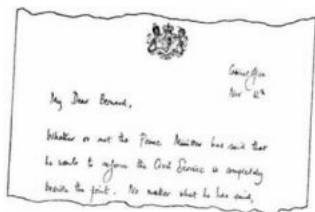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仍旧不懂。据我所知，哈克不管是在他走马上任首相要职以前还是以后，总是说他想改革政府机构的。

既然他已适时当选了，被民主地委任为首相（这取决于民主的不同的定义[5]——编者。）我感到不管改革地方政府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肯定**有责任改革文官部门。如果地方政府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现地区性的政府，以及因此而引起文官部门的改革，可能我们的责任就应该是帮助他们成其好事了。

我因此而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给汉弗莱爵士。后来他告诉我已经把信撕得粉碎。我想他是出于好心才这么做的，我知道如果我的信留在档案里被人看到的话，那么我荣升为常任秘书的美梦也就化为泡影了。为他的宽宏大量和未卜先知，我将永远对他感激不尽。

但是我确实保留了汉弗莱爵士给我的一封手写的回信[6]，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把它复印出来。

（我们自然接受了伯纳德爵士的好意，把这封难得的汉弗莱爵士的私人信件印在下面。——编者。）



我亲爱的伯纳德：

首相是否说过他想改革文官部门完全不是关键。不管他说了什么，这不是他真想要的。

那么，您会问，他真的想要的是什

么呢？更好的英国？是的，更好的天气？也是的。但是，所有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日夜在他们脑中萦绕的，他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赢得人心！人心，名誉，宣传，在电视上露面，在电台里讲话，在报纸上登照片。为什么？不光是因为这使他们心里暖洋洋的。香槟酒也使他们心里暖洋洋的，但是他们不会为香槟酒朝思暮想。

不，答案是，是否深得人心对他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还想当选。从政就意味着荣耀，名声，显赫的地位，宽敞的办公室和私人汽车司机，还会受节目主持人泰莱·华根的采访。相反的结局就是无权无势，默默无闻。在晚会上人们会问你是否认识罗宾·戴爵士[\[7\]](#)。

因此，从政后唯一真正的工作就是做到再一次当选。既然有六万选民的选区对人民来说是太大了，他们无法了解他们的首相，他们就只好根据电视、电台和报纸的宣传来作决定了。接着，在他们的选区内，有几十个人推举的任何白痴都能成为他们选举的候选人。

换句话说，政治家并不真的代表选民。他的任务是在公众场合作表演，树

立起形象和变得出名又得人心。

那么我们得问：政治家们真的想从文官部门中得到什么呢？

1. 宣传。他们要宣传他们做过的一切好事（或者认为他们做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怀特霍尔街有一千多位新闻发布官，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帮助他们写发言稿，写文章，安排刊登照片的机会。

2. 保密。他们要把一切可被用来反对他们的事保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官方保密法案，为什么把所有的文件，从火箭发射到送茶女郎的值勤名单，都分门别类。

3. 措辞。他们要我们使人相信这一永恒的神话，他们是被民主选举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帮他们写各种风格的手稿，例如在议会里的答辩词。我们也为内阁起草文件。这样，首相就可以让他的同事看到他们在报纸上看不到的新消息。

4. 统治。他们需要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是为重要的任务。政治家们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没资历，没经验，对此也没兴趣。

5. 掩人耳目。后，他们需要我们来掩人耳目，让人觉得是他们在作出所有的决定，而我们只是执行命令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我们肩上分挑掉许多重担，比如：

- a) 盛大的庆典宴会；
- B) 开幕式；
- c) 发射仪式；
- d) 正式开张典礼；
- e) 接见外国代表团等等。

他们把这些工作都做了，就让我们随意地去做我们能做得好的事。

所以，政治家们不会真的希望改革文官部门的。在我们的现行制度下，我们正在做着这个制度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做了一切他们需要我們做的事。而且，允许我这么说，还做得很出色。

那么很自然引出的结论就是：如果首相真要改革文官部门的话，他首先就得改革这个政治制度。

但是，这又怎么可能？正是这个制度把他抬到这个位置上来的。过河拆桥总不行。特别是当你还在桥上的时候。

当他在那些年里还是个在野党的人士时，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在野党总想改变把他们排斥在权势之外的那个制度。但是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他们只想保住它。举例说吧，**在位**的人没有一个会要改变我们的选举制度，使之变成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的制度。虽然每一个在野党都保证过要废止官方保密法案，可是没有一个政府这么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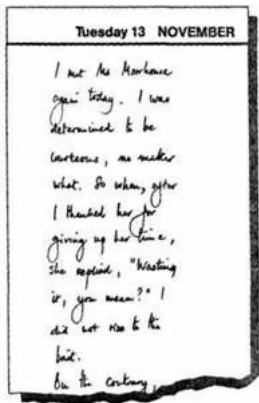
结论就是，伯纳德，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做到让首相也这样来看问题。这不是为了个人。我们并非孤军作战：马里奥特教授本人和阿格尼丝·穆尔豪斯都将加盟我们，你会明白的。

您的
H.A.

（汉弗莱·阿普尔比的缩写——编者）

（伯纳德把这封信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他帮助大臣们和首相们了解自己该扮演的角色时，这封信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

他很长时间为汉弗莱爵士的后一段话大感困惑。马里奥特教授和阿格尼丝·穆尔豪斯——竟会是他们俩——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和他俩结成同盟。就在这时，汉弗莱爵士和穆尔豪斯女士又作了一次面谈。在他的私人日记里有一篇简短的记



11月13日 星期二

今天我又和穆尔豪斯女士会晤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决心以礼相待。所以，在我感谢她抽出宝贵的时间，而她却说，“您是说，来浪费掉这时间”时我并没有反唇相讥。

相反，我告诉她一个简单的事实，首相对她对警察的态度相当关注，他正提出一个对地方政府进行全面改革的方案。具体地说：

- i) 每街都有代表
- ii) 每二百户组成一个选区（平均）
- iii) 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当局的候选人。

我请她读一份写有全部细节的计划文件。当然，她恐慌不已。“这正击中了我们民主社会改革核心，”她告诉我说。

“这么说，您觉得他们不会赞同您的政策的，”我说。

她否认这些。“当然，如果他们能理解改革的全部含义，他们会赞同的。但是普通选民是头脑简单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没有受过分析问题的训练。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他们需要合适的领导来指引他们走合适的路。”

“您认为人民会选出这样的领导吗？”

她看上去很怀疑。“人民有时并不识好坏。”

“我非常同意，”我告诉她说。

她感到奇怪了。我就向她解释说，文官部门总能提供这样一个不算强加于

人的领导。那就是为什么它能在一个世纪里幸存下来的原因。我们使国家成为今日之国家。但是没人会选举我们。

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我们，我和阿格尼丝，都相信，我们明确什么是有利于国家的。首先要做的是由一小群人来负责让选民们确实了解他们所选举的人，仅仅是了解，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和被选的人直接接触谈话的话，他们会接受所有的愚蠢的传统观念。

这时，阿格尼丝女士就有了她认为是她的独特见解，虽然实际上是我竭力引导她这么来看问题的。

“汉弗莱？”

“说吧，阿格尼丝？”现在我们已相当和谐了。

“这对您也会是一场灾难。”

我解释说，我确实意识到社团政务委员会会导致地区性的政府。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想要阻止首相这么做的原因。

她很感吃惊。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我也想阻止首相的计划。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需要她的帮助。

我要求她给我一个书面的保证，不

再和亨兹华斯警察局过不去。她答应写一封信，保证不使警察局承担实施她的民主主张的义务[8]。

我们的会晤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她说我没有参加军事革命真是一大损失。我对她表达了我在这方面的真情实意，认为她不在文官部门工作也是一大损失。在一片尊敬和遗憾声中，我们分了手。

11月14日

今天早上有一场和马里奥特教授的谈话。显然这是汉弗莱安排的。我事先并不知道。

伯纳德作出了解释：“我认为他觉得，首相，如果您采用了他的计划，这有助于和他的谈话。”

多萝西评论说汉弗莱一定有他的个人目的。

“为什么？”我问。

“汉弗莱的所有做法都有个人目的，”她说得很简单。

我看着伯纳德。“是吗？汉弗莱爵士怎么看待这些改革方案呢？”

伯纳德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那个，我想，这是，我肯定，如果，如果，这是，呃，如

果这是您的愿望，那么汉弗莱爵士就会，呃，呃……”

“竟敌对到这种程度？”我问。“把他叫来吧。”

当汉弗莱出现在内阁会议室时，马里奥特教授没有一同来。

“教授呢？”我问。

“他就外面，”汉弗莱马上就回答。“要我现在就让他进来吗？”

“你先说一下，”我命令似地说，“你对改革地方政府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给英国政府带来真正民主的绝妙主意。”

他在搞什么花样？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是说你是赞成的？”

“他可没那么说，”多萝西精确地指出。

他没去理她，这是他的一贯做法。“首相，如果您真想得到一个充分民主的政府，您会得到我坚决的支持。现在您想见马里奥特教授吗？”

马里奥特长得很高，模样很和蔼。他正不安地在摆弄着他的领结，和我见面自然使他有点激动。我们握握手，相互寒暄了几句。后汉弗莱触

及了正题。

“下个月，马里奥特教授将发表他的文章的续篇，比原来的一篇更为激动人心。”

我请教授再作详细说明。

“是啊，”汉弗莱鼓励说，“告诉首相这会给议会带来什么好处。”

教授欣然从命。“是啊，您明白，按照这个计划，每一个区将有自己的五百位街代表。地方上的议员就可以在一个大厅里和他们所有的人谈话了。”

“这样，他们就可以真正地互相了解了，”汉弗莱推波助澜地说。

“正是这样，”教授说，“他们能够对这条街上的人介绍他。这种对议员的介绍完全是真切可信的。”

这话叫我吓了一跳。我扫了多萝西一眼，可是她看上去全然无动于衷。她表示想说几句话。

“那么，把选区党置于何种地位呢？”她口气平稳地问。

马里奥特脸露笑意。“对了，您看，这就是计划的妙处。党组织就完全免去了。议员们将是真正独立的。”我吓得目瞪口呆。

“您看，”马里奥特热情洋溢地继续说，“如果在他们的选区内，人人都认识他们，或者他们的选区代表们都认识他们，那么，议员们是否能再次当选就不再仰仗于他们的政党是否支持他们了。一切就将取决于当地的选民认为议员在任期中是否称职。”

汉弗莱在向我微笑。“那么，如果议员们不依赖政党机器的话，他们就可投自己在该党的反对票，并绕过它去。”他解释说。

“正是这样，”教授说。“因为不再需要‘官方’的候选人，选举就完全取决于每一个议员自己的名声，而不取决于党的领导形象。这就结束了党的历史。结束了有人幕后操纵权力的历史。”

我竟无法理解这种制度怎么能行。“那么……政府又怎么能通过一些不受欢迎的条令呢，既然它已无法强扭人的胳膊来支持它？它怎么能保证赢得一个大多数的赞同呢？”

马里奥特的回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就是关键。它再也不能了！政府再也不能保证一定有大多数人赞同它的主张了！它必须做得值得大多数人赞同。就像在1832年，那时一个议员的选区只有一千二百个选民，只有在大多数的议员真的赞成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一条法令。议员们只有在选民们赞同的情况下才会赞同某一主张。议

会就又会成为真正民主的议会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哪一个正常人会把这样一条危险的建议带给首相呢？只有一些蠢到了家的老学究才会这样做。以我看来，这位好好教授可以从他来的路上回到他的象牙塔里去了——还得马上！

“非常感谢，教授，”我带结论性地说。“真是妙不可言。”我随之站起身来和他握手。

他感到奇怪。汗珠从他向后倾斜的额头上冒了出来。“喔，呃，谢谢您，首相，”他说。他还没来得及起来站稳，伯纳德就把他领出屋子了。

沉重的房门随着轻轻的一声给关上了。汉弗莱向我微笑着。

“这不是很精彩吗，首相？真正的民主！”他把双手合拢，欢快地搓将起来。

我不去理他，却转向多萝西。“他说得对吗？会有这种局面？”

“恐怕会有的。”

我目光呆滞地重复说出这可怕的威胁。“议员们可随心所欲地投票赞成合他们意的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像1982年的改革法案一样，”汉弗莱证实

说。

“但是，”我向汉弗莱解释说，好像他并不知道一样，“整个制度就依赖我们来告诉议员们该投什么票。而这种制度却要他们根据选民们的意志行事。”

“或是凭良心行事，”汉弗莱同意说。

“正是这样！”我说，就像那个该死的教授老爱说的那样。“多萝西，这份计划根本不能实施。”

多萝西问我，在这种情况下，对阿格尼丝和警察局之间的纠葛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一时语塞了。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汉弗莱说他倒有个办法，“我再来跟她谈一次，首相。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为您写了这份备忘录。”他递给我一张纸。

（幸亏这份备忘录就在记下这部分日记的盒式录音带上面找到了，现印在下面——编者。）

70怀特霍尔街70号，伦敦
SW1A 2AS

备忘录 11月14日
致首相
寄自内阁秘书

我们举行了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互相充分地真诚地交换了看法，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经过调查，已经证实，只要我们着手按建议中提出的有效方式去进行研究，在一定的情况下，实际上，会产生出另一种行动的方案。在细节处作某些改动，并非难事，现在重新估价原有的分歧很有必要，这才能使双方有可能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便今后更好地合作。如果将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能更为合适地找到一个在得失方面两方都能接受的设想的话，那么，大家都感到满意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汉弗莱·阿普尔比



70 WHITEHALL, LONDON SW1A 2AS

Memorandum

To: The Prime Minister

11 Novemb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Several informal discussions have taken place, involving a full and frank exchange of views, out of which there arose a series of proposals which on examination proved to indicate certain promising lines of enquiry which when pursued led to the realisation that the alternative courses of action might in fact,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be susceptible of almost total mitigation, in one way or another, leading to a reappraisal of the original areas of difference and pointing the way to encouraging possibilities of significant compromise and cooperation which if bilaterally implemented with co-operation give not only as both sides could if the climate were right have a reasonable possi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of finding, slightly or strongly, to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conclusion.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我瞪眼看着这银纸，简直被弄得昏昏欲睡了。后，我抬头看汉弗莱。“你能不能把这总结一下？”我问。

他竭力思考了一会儿。“我们作成了一笔交易，”他回答。

他和阿格尼丝·穆尔豪斯作成了一笔交易？真精彩！

“你是怎么作成的？”他谦卑地笑了笑。“喔，旧制度有它好的地方，您明白。在它的时代，很

管用。”

我坐回到我的椅子上，放松了一下，不再问他什么。“是啊，是这样，不是吗？”我很高兴地喃喃自语。

“那么——对马里奥特的计划该怎么办？”他问。他完全知道我会说什么。

“我想我们的国民还没准备接受彻底的民主，你说是吗？”他哀愁地摇摇头。“下个世纪行吗？”

“下个世纪您还会是首相，”多萝西打断说。

“那么，再下一个世纪吧，”我说。

“是，首相，”汉弗莱说。他显得心满意足。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心满意足，汉弗莱、多萝西和我。大家终于又成为朋友了。

[1]威斯敏斯特是伦敦的一个贵族居住区，区内有白金汉宫、议会大厦、首相官邸、政府各部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同时，威斯敏斯特又可喻指政府、议院，此处即为此意。——译者注。

[2]哈克的选区

[3]和编者的谈话。

[4]我们提醒读者，当伯纳德爵士退休时，他

已是内政部的主任了——编者。

[5]参见《是，首相》上卷第一章。

[6]手写的，这样，在办公室里就没有复印件——编者。

[7]罗宾·戴爵士（1923—），英国电视记者，新闻业中第一个被封为爵士的人。

[8]老一套——编者。

7. 恩泽艺术

12月3日

“您是否认为，可能……”伯纳德犹豫不决地问，“我是说，那样

是不是更明智一些？……您知道，事后看起来，这是不是错了？”

“是的，伯纳德。”我说。

我们是在讨论英国戏剧奖，这是一种实际上不太重要的，只是为圈内人谋私利的，供他们自我陶醉的聚会。首相的时间是不该浪费在这种事情上的。

但是马尔科姆，我的新闻发布官，伯纳德和我已经花了足足一个小时来讨论如何使我摆脱可怕的困境。

有嘲讽意味的是，我当然不一定要同意出席这次颁奖大会。这是马尔科姆提出的。当然，现在他是否认这一点了。“请相信我对您的尊敬，首相，我实际上并没有提这个建议。我只是说英国戏剧奖颁奖会餐将会被电视台现场直播。将有一千二百万人看到您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辉煌、奢华、情趣盎然的招待会上。您将周旋于给亿万人民带来欢乐的璀璨的明星之间。

“你把这还不称作建议？”我真不可相信，“在民意测验中，你这样的描述，就该得十分。”

马尔科姆忧伤地点点头。但是伯纳德搞不懂了。“和演员们在一起总不大好吧？我是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装扮成他们并不真的是的人物。如果人们看到您和他们在一起，那么，人们可能意识到……”

他戛然而止。**可能意识到**？我注视着他，看他敢不敢往下说。

“说下去，伯纳德。”我威胁似地要他说下去。

他踌躇了一下。“呃，我是说，不是真的意识到……可能是怀疑。可能想您是……我是说。我不是说他们会想您是在**供人消遣**，显然不会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们可能把您也看作是在扮演……”他无望地结束这段话。

这问题对谁都会是很清楚的。只有像伯纳德那种在文官部门的象牙塔里谋职的人才会搞不清楚。马尔科姆向我保证，出席这场合是不会引起争议的。那儿没有别的政界人物。男女演员们对政界人物很友善，因为他们靠互相恭维过活，其中有些人一受到恭维就回敬给别人。

但是谁也没把问题考虑周详。我拍了拍面前的档案，指责地说：“那么这个呢？”我问。

马尔科姆感到窘了。“对不起，首相。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邀请。”

我只能说，他本该知道。他本该去弄清楚。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你明知道有人在批评政府在艺术上总是花钱不够多。”

伯纳德急忙表示同意。“这是艺术记者们讨好演员和导演的标准做法。这是他们写了攻击性的艺术评论文章后和他们重修旧好的办法。”

“但是你是明知道——或是应该知道——情况会是怎么样的。”我坚持这么说。

马尔科姆顽固不化地拒绝承认这一点。“不，首相。我当时并不知道艺术委员会的赞助只提高这么一点点。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是昨天才决定的。”他说得对。这是我的错。虽然我不承认——我坚决不准透露消息。我又是自搬砖头自压脚了。昨天消息传来说对国家剧院的赞助实际上没有增加。再加上可怕的巧合，国家剧院的总导演正是颁奖大会的主席。他在介绍我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讲话中充满恶意和讥讽，把我描绘成一个品德卑微的市侩。这一切都会在一千二百万人民面前现场直播出来。

“我发言时会是什么情景呢？”我绝望地问。听众们会心中充满敌意。连嘘声也会有的。

“嘘声总是会有有的。”马尔科姆说。我被他说的话吓住了。他是认真的吗？“嘘声又不要我们付钱的。”他叫我放心地说。我突然意识到他在说宴会上喝的“须生”酒，而不是“嘘声”。

“嘘声！”为解释清楚，我叫了起来。并把“声”字拖得很长很长。

伯纳德吓了一跳。“演员们会嘘吗？”他问，还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以为是听众才嘘呐。”

“这些听众都是演员。”我提醒他说，“这是一年一度他们能够嘘的机会——这时他们可以对平时嘘过他们的人发泄一通了。”伯纳德提了个建议：您为什么不去找艺术大臣，请求他增加资助费呢？或者，更好一点的话，就让他代你去出席这次颁奖宴会。那样，大家都会去怪他了。这是下一级的大臣当仁不让的义务，是不是？”

表面上看来，这主意不错。但是再一想，我意识到这行不通。

“他就会责怪财政部。”

“您可以和财政部谈一谈啊。”伯纳德继续说。

我一直在和他们谈。问题就出在这里。六周

来，我一直在叫他们减低花费！

“好派艺术大臣去出席。”伯纳德坚持这么说。“是吗？”我不相信，“你就没看到可能出现这样的标题吗？吉姆小鸡不出场。首相从责难声中逃跑。”

“如果你因处理真正的危机而不能出席，他们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转身问马尔科姆近有些什么危机呢？马尔科姆？”他很愁闷地摇摇头：“好像没有，首相。”

真叫人难信，没有危机倒对我们成了坏消息！我苦苦地思索着，可是我也是一个危机也想不出来。“随便哪个在遥远的将来会出现的危机也行啊！”马尔科姆和伯纳德都绝望地摇摇头。

我想从正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样的危机可以作为不出席的正当理由？”

伯纳德想得出一大堆。“英镑贬值，南大西洋的小规模战争，核电站着火等等……”

我叫他别说了。“伯纳德，”我温和地解释道，“我认为这些理由也都不能改善我的形象……”

“不，但这些借口都可成为您不出席的正当理由。”他说。他完全忘记了目的——如果不是改善我的形象的话——至少是防止进一步的丑

化。

伯纳德突然来了灵感：“我有了，说是一位内阁成员死了，这行吗？”

“这当然行！有人要死了吗？”我问，尽量不显露太多的希望。

“不。”伯纳德乐呵呵地说，他感到很荣幸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这可是您不出席的正当理由，而且不会损害您的形象，是不是？”

马尔科姆同意。“他说得对。但是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事在一天之内发生呢。至少这事不会偶然发生。”他阴沉沉地补充说。他是在作暗示？我真诚地希望他不是。我看得出我真是别无选择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将不得不去。”我决定了，“我得咬住上唇不说话。只是笑着忍受一切。”伯纳德说：“您如果咬住上唇可怎么笑呢？因为……”他还作了示范，“您看，上唇咬住了就展不开来了……”

要不是铃响了，我真会揍他一顿——响的是电话铃。汉弗莱爵士在外面，急于要和我讨论一下内阁会议的议事日程。

我请他进来。“啊，汉弗莱。先别去管这内阁会议的议事日程，我要请你帮忙。”

“您要我帮忙！”他马上把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盯住我看。“您要我帮忙？”我不能肯定，他是在问问题呢，还是在表示同意。

“我得发一次言。”我开始说，“我想这可能使我很窘。”

“喔，首相，您的发言不像以前那样令人发窘了。实际上……”这些文职人员们总是好为人师得怕人。“不，汉弗莱。我不是说我的发言会令人发窘。我是说这场合叫人很窘。”

“是吗？为什么？”

我尽量不带偏见地作了解释。“这次发言是面对一批心怀敌意，孤芳自赏，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的剧院酒鬼的。”

“下议院的议员们，您是说。”

我解释说，简而言之，这是在道彻斯特[\[1\]](#)的英国戏剧奖的颁奖盛宴上。作为一位荣誉贵宾如果不被他们尊敬就无荣誉可言。

汉弗莱马上就听懂了。“艺术委员会的赞助极小，您是说？那么，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要想影响国家剧院的总导演是很困难的。我是董事会里的一员。”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问他我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使戏剧界的人士认为我是他们中

的一员？

“当然，”汉弗莱酸溜溜地低声说，“您不想要他们把您也看成是孤芳自赏，装腔作势，自以为是剧院酒鬼吧？”

“他们很难不这么看。”伯纳德说。我想他是在暗指我在表演上的天才。归根结底，伟大的政治家本该就是伟大的演员。（哈克在这里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编者。）但是，电视台将要现场直播，我可不能冒险去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场面。

汉弗莱显然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请相信我对您的敬意，首相。身入虎穴，只能成为它们的美餐。”

“那么这就是您的忠告？”

“让他们干脆多吃一些。增加给艺术委员会的资助。再增加两百万左右；情况就会大大不同了。”

“两百万？他们这一美餐花费太大了。”汉弗莱笑了可是，这是在道彻斯特旅馆。”

这个提议不能算是毫无偏见的。作为那个爱惹事的机构的董事（指国家剧院，不是指道彻斯特旅馆——编者。）他是个既得利益者。这里面也有一个利害关系！是啊，他很可能想支持那个

鬼地方！可我又欠他们什么。他们老上演那些攻击我的戏。他们把《错误的喜剧》的背景设在唐宁街十号。我还提醒他，他们演出了一出穿现代服装的《理查二世》，在戏里我被演成一个愚蠢的、虚荣的国家领导人，后还因无能而被赶下台。“别想否认，汉弗莱！我明白那人是指谁。”

“我只是想说，首相，这仍比把《麦克佩斯》的背景设在十号要好。”

这理由站不住脚。事实上，他们恨我能置身于此。“他们用整整一出戏来攻击我们的核政策。”我提醒他说，“是一出闹剧”。

“指这个政策？”

“指这出戏，汉弗莱！”他很清楚我在指什么。我要问他他们干吗要这样，而为什么他一点儿也不担心。

“这原很正常，首相。”

“正常？”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正常。

“实际上谁也不会去看政治戏剧。”他在位子里间后一靠，还彬彬有礼地把腿一搁。“去的人中有一半根本看不懂。看得懂的另一半不同意他们。剩下还有七个人本来就是投票反对政府的。同时，这可使老百姓出出气，而您却可显得是一位很民主的政治家——还很有点幽默感——不是

还资助批评您的人吗？”

我还是看不出什么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他们要批评，那么他们就该自己为此付出代价，从票房里取钱。”

汉弗莱跟不上这逻辑推理。“首相，他们从来赚不到钱。自有戏剧以来，批评政府的戏向来是，在为乏味的剧种榜上名列第二。”

“名列第一的是什么剧种？”

“赞扬政府的戏。”

我私下里还一直以为这种戏有趣呢。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剧院一方面羞辱我，一方面还想让我给他们更多的钱。可是汉弗莱解释说艺术家们就是这个样。“不自重，是吗？他们跪着用双膝向政府走去，上面却在挥舞着拳头。”

“还用那只讨饭的碗来敲我的头。”

“呵，首相。”伯纳德说，“如果他们跪着，就敲不到您的头。除非您也跪着，或者他们的胳膊特长。”

我耐着性子忍受这种卖弄学问的嚼舌，这是我为了伯纳德工作上真正的高效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他纠缠于细节的癖好使他既叫人恼火又叫人少不了他。我等到他住了口，然后我又去和马尔科姆说话。

“是不是真的没人赞成我为艺术出钱资助？”“是的……但是如果您把钱抽回，许多宣传工具就会起而攻之。”

他说得对。可是这不公平。

汉弗莱又来为他的利益说话了。“不是真的那么不公平，首相。艺术剧院的大厅是属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这是他们享用他们缴的收入税的途径之一。另外的途径还有资产抵押以后的退税，大学对他们孩子的资助，整笔的退休金……以及在剧场、歌剧院和音乐厅里的由国家贴钱的便宜座位。您对他们不能吝惜这笔钱。”

我责怪了他：“汉弗莱，你离题太远了。”

“啊，”他板着脸说，“题目是什么？”

遗憾的是，我也记不得了。伯纳德该来提醒我。“怎么来阻止国家剧院的副总导演在他星期天的发言中对您进行批评。”

“这才对了！”我加强了语气对汉弗莱说。“既然你认识他，我建议你很快和他谈一谈。你可指出，他期望得到的爵位正在首相的考虑之中。”

汉弗莱并不为这计划所动。“老实说，首相，他一点儿也不在乎爵位。”

汉弗莱真蠢。人人都这么说，可爵位放在他们面前，谁会这么说？

（汉弗莱·阿普尔比真的和国家剧院的西蒙·芒克在一起吃了饭。他们是在屋前的那家餐馆碰头的。在那儿见面可保证他们的谈话是完全谨慎的，不会有人注意的，因为这家饭店供应的饭菜堪称独一无二。在西蒙·芒克自传体的畅销书《响声与愤怒》中提到了这餐饭——编者。）

我们在饭店里见了面。汉弗莱爵士事先给我打了电话，要我到一个不会被邻桌偷听到讲话的地方去。我自然就建议去我们的饭店，在那儿邻桌根本就不会有人。

汉弗莱爵士告诉我，首相又得了狂想症，是关于攻击他的那些戏。我要汉弗莱告诉首相，那是因为没人提供为他说话的戏。但是汉弗莱不能肯定这样说会有用。

哈克在执政。这很公平。我似乎觉得，他总得忍受一些攻击他的戏。从他的利益出发，汉弗莱对此倒也不很在意。“他能忍受一些责难。”他狡猾地微笑着说，“只要责难所指合他的心意。”

实际上，哈克的问题与我无关。他也从不为我担忧。我想知道本年度给艺术委员会的资助有多少。委员会需要得到它申请的三千万的额外资助。

但是汉弗莱却叫人捉摸不定。“我亲爱的西蒙！我事先不能透露数字。更不能向国家剧院的导演们透露。”

我并没想要他透露，并没想要他讲这么多话来透露。我拿起了桌上的一盘棍子面包，递给了他。“请吃几个。”我说。

汉弗莱仔细地拿了三个，又递还给我。

我吃了一惊。“就三个？”

我简直不能相信！但汉弗莱郁闷地点点头。“恐怕这不是我常吃的。三个是极限了。”

“总数三呢还是净数三？”我问。

“净数三。”

我得问下面一个问题，但是我怕听这个回答，“那么国家剧院能得到多少钱呢？”

汉弗莱把大约四分之一的面包掰下来递给我。

“只有四分之一？但是这简直是灾难！他们要我们拿这一百万中的四分之一去干什么呢？”

（请注意，这里讲的数目是增加一百万中的四分之一——编者。）

汉弗莱爵士看上去是茫然不知的样子。“我不明白您从何得来这个数字的。”他就喜欢玩这种把戏。

我求他帮忙。问题很严重——真的很严重。一百万的四分之一不光是比我们对报界说的要躲过灾难必不可少的小数字还要少——它比要躲过灾难必不可少**真的**数字还要少。

汉弗莱说他再也帮不了忙了。尽管他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他还是解释说，他对政府和首相的赤胆忠心是第一位的。但是，这原来又是他的一个花招。他继续说：“我把话说清楚了，我在这儿是代表首相的利益利益的。

现在，有些事会使他十分难堪。我得恳请您为了他别再想干这些事了。”我拿出了我的本子。事情有了希望。“好啊。”我说，“哪些事？”他微笑着，“听着，你将在颁奖宴会的发言中介绍他。有礼的做法是事先把发言稿先给十号看一看。”

“征求同意？”我很惊奇。

“我们这样说吧……征求一些信息。”我听出了话里的意思，“首相很担心您的发言会提到赞助的钱增加得少得

可怜。有些词他要您好避免用：吝啬啊，市侩啊，愚昧啊，小气啊，扫兴啊，等等，等等。”我尽快地做着笔记。汉弗莱说得很快。“他还要您别提别的国家给艺术资助多少钱。”

我问他数字是多少。他马上拿出一张纸条来，“您请看吧。您得肯定别无意中提到这些数字。”

“我一定不会无意中提到这些数字的。”我向他保证。

“为重要的是，”汉弗莱爵士总结说，“首相绝不要您把你们剧院需要增加的款项和政府去年在某些项目上的花费作比较。”他比平时更含糊其词。我请他说得更具体些。

“好吧，比方说您需要的数目是四百万。这仅仅是举个例子而已，您懂吗？去年政府花了五百万英镑为现在已经废弃的战斗机配备了雷达，能源部已储备了可供一千年用的归档标签，另外一个部门储存了几百万罐的威姆饮料。首相恳切地希望您别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事上。更不要去提起把一亿英镑的钱花在计划安装宁录早期警报系统上面的事。”

“我们还可做什么呢？”我一面飞写着，一面问。

“这些是您不可做的事。”他假惺惺地提醒我说，“您可做的是……可能是为首相安排一次奖吧？并事先就让他知道？”

这要求过高了。给哈克安排一次奖？该是什么奖呢？**本年度的佳市侩**是我想得出的唯一可以奖给他的头衔。我指出他从来就不上剧院。

令我奇怪的是，汉弗莱爵士却在为他辩护。“他真的是去不了。他怕为卡通画家和花边新闻的栏目提供攻击他的武器。他不能去看《国内一月》，因为这出戏会引起一些有关大选的谣言，他不能去看《对手》，因为有那么多的内阁臣大们已对他的职位垂涎三尺了，他也不能看《丑闻学校》，因为怕提醒选民们想到教育大臣被人看到和小学女校长上床的那件事。”

我差不多要为哈克感到难过了。

“至于您导演的易卜生的那出戏，《人民的公敌》……”我已经听懂了，“所以如果您能给他挂上个好听的名誉头衔，他的形象就会得以改善，这

正合他自视甚高的心意……”

汉弗莱的心里究竟有什么主意了呢？本年度佳演员？就为了他出色地掩盖了在后台发生的一个接一个的灾祸？我把这说了出来。

“非常滑稽，”汉弗莱格格地笑着说，不，我想**本年度佳滑稽表演**更合适些。”

我的主意更胜他一筹，“**本年度佳悲剧表演**！”

“两个都是！”汉弗莱说：我们都笑得东歪西倒。

12月4日

和尼克·艾弗里特作了一次面谈。他是艺术大臣。他显得有点紧张。有人对他施加了压力。他显得很不安！他参加了给艺术委员会资助的讨论——喔，不，他没有。我忘了他不在内阁，但这是一个自由国家，如果他不支持它，他完全可以辞职！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政府的决定，集体的决定，他是政府的一员，他就得接受这个决定，不管这是不是他的决定。这就是民主。

“吉姆，”他说，“我想当他们得知这笔增加的资助金额这么少的时候，事情会很麻烦的。”“我们就得严厉一些，”我说，“你行吗？”

他看上去并不乐意，两眼不安地从宽大的长方形的镜片后竭力往外看。作为一个年轻的、认真的格林德邦剧院的常客，他不想被人指责是个市侩。“我真的觉得我们得想法多给一点钱。”

我告诉他这一切都已成定局。他摇摇头：“我们董事会还没认真讨论过演员的就业问题呢！”

我叹了口气。不管这些演员多么出名，多么有影响，演员的就业问题总不能超越国家财政政策之上吧！我对尼克说他们就得在剧院外找活儿干。

“这不行。演员们在剧院外哪有活儿干？许多演员连在剧院内也没活儿干呢！”

这句话他是百分之百地说错了。安妮告诉我，她乘坐的出租汽车的司机中有一半是丢了饭碗的演员。

尼克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的出租车驾驶员说他们是丢了饭碗的演员。这比把自己说成是‘月夜巡夜人’有光彩得多。”伯纳德伸起食指朝我的方向看着。显然他觉得有一个很有见地的意见要发表。“呃，巡夜人不一定是在月夜出现的。月夜他们要出现，雨夜也得出现。”

尼克再说了一遍财政部已经驳回的所有理

由。“剧院引来许多游客。”他激情满怀地声言道。

“那很好。”我仍旧很冷静，“那就请英国旅游局来赞助吧。”

“可是他们不会来赞助的。”他怨恨满腔地说，“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他们说他们另有更好的办法来吸引游客。”

“那么说，”我总结了一下，“你要我们用一个不好的办法来吸引游客。”他想要打断我的话。“不，尼克，我在艺术上已浪费太多的钱了。”

他退缩了一下。接着，他又弹起他那关于艺术具有教育意义的老调来。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干吗要把国库的钱给那些人去做攻击我这么毫无教育意义的事呢？

“我们总得用这笔钱啊！”尼克在要他的最后一招，“这笔钱暗中也用来保护了这些古老的建筑。”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所有那些剧院、画廊和博物馆以及歌剧院都是点名保护的建筑物。”他请求说，“我们反正要保护它们的。在其它方面，它们是一点用也没有的。那么我们就给它们装上中央空调，安置一位馆长，列上捐助名

单，这样我们就好像在支持艺术事业了。”

对了一半，但是还不够有说服力，我的办法更简单。把它们都卖了。

12月5日

这个艺术委员会的危机正在变得叫人讨厌。今晚在十号我们开了冷餐会。有一两百位客人。许多人是戏剧工作者——我们经常这样来让人们制造好评的，但是今晚的晚会是几周前组织的。早知道如此，我会去邀请一批更可尊敬的客人。比方说，后座普通识员，他们在社交场合从不和我争辩。他们通常多是无伤大雅地激动一阵子。《安妮禁令》[\[2\]](#)中没有这一条。

实际上，我经常想我们得让议员们作呼气测酒醉的试验——那得在他们立法的时候，而不是在驾车的时候。我猜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到了下午七点就都超过了合法的酒精限度。请想一想，用他们被损坏的判断力和可怜的记忆力，他们会对这国家作出多大的永久的损害啊！

反正，今晚我们得将就着面对这一批喝醉了
的戏剧界人士了。

还有，更糟的是，清醒的人士！安妮——她没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祝贺我能不嫌麻烦地宴请这些“可爱的戏剧界人士”，尽管他们并非要

人。

我解释说他们非常重要。倒不是指他们有选票，因为他们的票数实在不多，而是指他们的影响。

她很奇怪他们也有影响。

“安妮，”我耐心地解释说，“新闻媒介就热衷于报道演出界的人和事。您只要有一次在《伦敦东区人》这出戏里演个喝了两品脱酒的人，报界就会要你对一切发表感想：英国的学校，保健设施，法律和条令……一直到欧洲寺院制度。他们比我的内阁更有曝光度。”

当然，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编辑总想人们来读他们的报纸呵！所以如果有一篇文章用上一幅下流的丹恩[3]的照片，人们就会读它。但是谁会去读一篇附有贸易工业大臣的照片的文章呢？

安妮说：“所以所有这些演员在十号内喝上两杯以后就成了你的支持者了？”

“有些是的。”我告诉她，“但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授一两个爵位的原因。这可以使他们抱有希望。下一次他们在华得[4]节目中就不大会攻击政府了。”

（西蒙·芒克有幸成为这次晚会的客人。他的

自传记录了他和汉弗莱的私下谈话。后者一直焦急地等在大转梯的顶上，盼望汉弗莱爵士的到来——编者。）

汉弗莱爵士把我领到一边，走进一间在豪华的接待室外面的有护墙板的厅里。他避开了一些站在一旁的人，在我耳边轻声说话。他要我那天晚上和哈克谈谈。实际上，他在暗示我，我几周前就被邀请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宣布资助金额的日子在几周前就定了。

“但是等数字公布后再谈不是更好吗？”我问。那天晚上和哈克交锋非我所愿。

汉弗莱爵士很吃惊：“那是为什么？”

“如果我事先向他提，他什么也不会说，不是吗？”

汉弗莱爵士解释说：“当然，他什么也不会说，您并不要他说什么。您要的是他做什么。”

我开始争辩。接着我意识到我从这位国内有办法的政治实干家那里免费地得到了忠告。“如果您再等下去的话，”他在我耳边低声细语地说，“数字就会被公布，人人都会对此承拒义务。

为了面子，他们也只能坚持说这个数。如果您要改变政府的决定，您得在人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决定之前就去
做。”

这是条重要原则。但是，我问：“这在具体做起来时会很困难吗？”

“是的。”汉弗莱回答说，“文职部门就是做这种事的。”

“来改变政府的决定？”我意识到我对此一窍不通。

“是的。”他微笑着说，“那是指改变坏的决定。但是，当然，多数决定都是坏的。”

我问了汉弗莱他要我做什么。很简单，他要我帮忙对哈克强调：资助增加不多会使他十分难堪的……在星期天的领奖宴会上便见分晓。

伯纳德·伍利爵士的回忆[5]:

人人都因个人利益而变得激愤不已。汉弗莱把西蒙·芒克拉到一个角落去。一批男女演员把首相拉到另一个角落去。哈克竭力使这批演员们相信他深爱戏剧。恐怕，收效不大。

“您真的相信英国的戏剧吗，首相？”一位年轻的、多疑的女演员说。

无论是从字面意思来看，还是比喻的说法，她都已经可以被形容为怒发冲冠了。

“当然，绝对是。”

“为什么？”

哈克说的大意是，“那个，呃，这是英国的一大光荣。”

“您是指莎士比亚？”一位举止高雅的老年人说，显然他是想助一臂之力。

“是的。”哈克感激地说，“绝对是，莎士比亚。”

“还有谁？”这位高雅人士问。他的声音很淳厚。我在皇家喜剧协会里见过他。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是，我很喜欢他。

“**还有**谁？”哈克重复说。在他苦苦思索的时候，他在绝望地挣扎着。

“那个，呃，莎士比亚，当然。还有，呃，谢里丹，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所有的伟大的英格兰剧作家。”

“他们全都是爱尔兰人。”那位不饶人的年轻女演员说。

哈克想用一笑来迷惑她，这真是白费蜡。“是的，我知道这个。但是，爱尔兰，英格兰，现在不都是一回事吗，

不是吗？”

“萧伯纳死于1950年。”在人群边上的一位瘦长的年轻人说。他显然是在全神贯注地欣赏一幅庚斯博罗新作的肖像画，所以他甚至都没有回过身来看看首相。

“喔，我真遗憾。”哈克回答得很不得体。一位高大的中年女演员，嗓子低沉而沙哑，这显然是三十年烟酒生涯的结果，正在向他盈盈微笑。她问他是否常去剧院。

哈克闪烁其词：“那个，当然，我很想去——你明白我的工作有多忙。”

那位长得丰满的老演员又说了。他引用了首相刚说的话：“您不觉得一位首相应该常去吗？这不是英国的一大光荣吗？”

首相的回答不太有策略：“喔，是的，”他说，“但是艺术大臣常去。说真的，这是他的工作。”

“为什么？”这位丰满的演员问。

“因为，首相总不能一切都自己动手干。他得把工作分下去。”

嗓音低沉的女演员像是在进攻：“上剧院是工作？”

“是，不。”哈克决定不了如何回答，“但我不想伸手去管另一位大臣的领域。”

“这是不是说，”多疑的年轻女演员微笑着问，“您不请卫生大臣检查一下，您就不能感到不舒服？”

“说得对。”哈克说，接着他马上意识到他说了什么，“不很对。”他补充说。他在妄图把他的观点说清楚。

在人群边上的一位瘦长的年轻人转过身来问他，他在在野党的时候是否常去剧场。哈克开始解释说，即使是那时候，他也顾不得去剧场。

“那么，您说您相信戏剧，”年轻人说，“就像您说您相信上帝一样。您是说您相信它是存在的。”

哈克急忙否认。我想他明智一些的话该承认事实，因为他愚弄不了谁。

“您近去看的一出戏是什么？”年轻的女演员问。脸上一副不屑的神情。这种人根本不懂尊重人，你明白。

“去看？”首相重复说，好像他整天坐在家中只是读剧本。“近的一出戏？”他重复说。他心烦意乱地看着时间在流过。“啊，那是，可能是《汉姆

莱特》。”

“谁的？”丰满的老头儿问。

“莎士比亚的。”首相很自信地说。

“谁演的汉姆莱特？”在人群边上的瘦长的年轻人问，“亨莱·欧文。”

“是的，”哈克说，“我想这大概是他的名字。”

这帮演艺界的同仁们面面相觑。他们不能理解首相怎么会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在他的文艺的殿堂里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看到汉弗莱爵士离开了西蒙·芒克。所以我就离开了哈克和演员们，把内阁秘书拉到一边说起悄悄话来了。我解释说，首相现在很难打发这局面。

“他该料到的。”汉弗莱回答说，“应付在十号内举行的鸡尾酒会就是令人发怵的难题。”

“可人们在向他发问。”我说。

“他早该习惯了。”“但这些问题事先又没有递交我们安排，所以他也没有听到过情况简介。”

“但是他的话没被录下来。这有什么要紧？”我解释说，晚会上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市侩。

“谢天谢地！”汉弗莱说。

我要他别说笑话。我强调说，我的意见是该去救他。汉弗莱说他会去办的。

当我们向站在演艺界人群中的哈克走近时，我们走过安妮身边。这位首相的夫人，正在和一位小个子的衣冠楚楚的音乐家谈话。他近被委任为伦敦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客席总指挥。安妮可能喝得太多了。

“我对高保真音响也很感兴趣。”她说，“我的丈夫就是一位高保真的丈夫。”

“那很好。”指挥家说，他是以语词的反意而闻名于音乐界的。

“在某种意义上。”她心怀叵测地嘻笑着说，“高保真，低效率。”这位指挥家显然觉得哈克夫人很迷人，他似乎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了，“您是说，有点像斑和奥洛夫森？”[6]

“有点，像斑和奥洛夫森。”哈克夫人说。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我和演艺圈里的人相处得很好。老实说，我确实对戏剧了解不多。但是我肯定他们根本没注

意。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们都知道对艺术委员会的资助数额将随时会被公布。当然，他们逼得很紧。但是我已习惯于被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了。我提醒他们，还有许多别的部门也在向国库伸手，他们中还有些人认为他们更重要。

当然，这是自私自利的人群对人施加压力的基本原则！你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把自己的情况摊出来，却好像公众的利益倒是你所关心的唯一大事。教师们要求提高工资是因为对教育有好处。即使是在他们罢课的时候，他们的领导人还争辩说，他们这么做是有利于被他们赶回家去的孩子们。如果我们真相信他们的话，那么矿工们罢工是为了让老人们买得到便宜的煤。健康部门的工作人员——从大夫到看门的——把医院都关了，说是为了给那些当时得不到治疗的可怜的病人省下保建设施。

所以，很明显，这些非常令入愉悦的娱乐圈中的人需要完全陌生的人的爱和掌声，所以他们演出戏剧；因为穿上戏装在人前表演很有乐趣，也使他们感觉良好。以为了公众利益的名义——通常是指教育，他们也要求起资助来了。

所以我在反驳中指出，在真正的教育上面我们迫在眉睫地需要更多的钱。我相信这么一来，

他们不会说我没有按照事情的重要性来安排资助了。我还没有提医院，造肾机器……

“坦克和火箭，”一位女演员说，“是您花钱多的地方。”

“氢弹。”另一个插话说。

说得一点不错。但是我们不能用《亨利五世》的演出来抵御俄国佬的进攻啊！我这么说了。他们都被逗乐了。

汉弗莱来到我的身边。我离开这一小群人的时候，不无一点轻松感。

“这不是一个喝喝饮料的晚会，这是围攻。”我苦涩地抱怨说。

汉弗莱只是评论说人们对艺术很关心。他说错了。这些人们都很关心——可别的人全不在乎，如果他们在乎的话，他们就会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花在艺术上。干吗要政府把钱花在别人感到有乐趣的事情上呢，我问他。

“没人把这叫做乐趣。”汉弗莱说。他很感惊讶。他在内心是个加尔文[7]主义者。“关键是我们传统上的做法是支持艺术的。很少有人要去看电影，很少有人要去听音乐，很少有人要去看戏。不能因为没有人感兴趣，就眼看着它们消亡。”我感到好奇：“为什么不？”

“这就像英格兰教堂一样，首相。人们并不上教堂，但教堂在那儿使他们好过些。艺术也是一样。只要艺术还有人在搞，你就觉得你是属于文明民族的。”

这话并没有说错，但是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也很不现实。“在艺术里又没有选票。”我提醒他，“这样，就没有人**感兴趣**。”

他顽固不化地不肯接受这观点。“没有人对社会科学委员会感兴趣，或者对牛奶市场董事会，或者对牙病防治顾问委员会，或者对向海倾倒垃圾代表组感兴趣。但是政府仍旧给他们钱来支持他们。”

“他们没干什么好事吗？”我问。

“当然没有。他们几乎什么事也没干。”

“那么，”我提议，“我们来取缔他们。”

现在他又恐慌起来。他倒没预料到谈话会出现这一转折。“不，不，首相。他们是代表一种信号。您给他们钱并非要他们干活。您给他们钱只表明您赞同什么。大多数政府的花费是一种信号。艺术委员会就是一种信号。”

我告诉他这没用。我主意已定。他急忙建议和国家剧院的副总导演谈一谈，他碰巧没被邀请参加这次酒会。我可不想再遇见别的救世军。但

是汉弗莱告诉我，他一直在设法说服这位西蒙·芒克，要他在颁奖宴会上说话顾全大局。

“你真好，汉弗莱。”我感激地说。

“别这么说。但是您自己去说就会比我强。”这么看来，汉弗莱的说服工作并无成效。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把我的思路理清，我已面对着这位戏剧奇才了。实际上他倒是极有礼貌，也似乎有点不安。就像我经常在报上看到的那样，他长有一头稀疏的头发，却没有小胡子。他几乎很可以成为一位政客。

我自己也不安起来了。“在颁奖宴会上您将对我作介绍？”我这样开始说了。

“是这样的。”他回答说。说完又不作声了。我们都很不安地互相勉强地微笑着。时间长得像进入了永恒。这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不说话，对话就此告終了。

“你将说些什么呢？”

“我想这都得看情况而定。”

“看……呃……看……？”我问道。

“看资助有多少。”

正像有人警告我的那样。我知道他不清楚资助有多少。（首相不知道那场在国家剧院饭店里

汉弗莱和他关于棍子面包的谈话——编者。〉所以，我告诉他这事还在讨论中。

“当然。”他同意地说，“但是，如果资助丰厚的话，我就有可能说得使人看到政府把钱用在口上了，让人相信政府尊重英国的传统，尊重英国的一贯主张。”

我暗示他说，即使我无法说服艺术大臣多出点钱，他也该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表示，这就很困难了。

“你当然不想把宴会变成一个政治色彩浓郁的场合？”我大不以为然地说。

“我自己并不想，不。但是我对这一专业负有责任。”他倒真行！“对艺术负有责任。”他继续说，“我的同事们期待我说出他们的心里话。”

我想使他懂得钱得花在内地的城镇上，花在学校里，花在造肾机器上。他承认他明白我的难处，并说他要讲一席让政府出洋相的话来为我解难。

这消息确实使人觉得形势很严酷。难对付的是幽默的攻击。我不敢使自己看上去不够大度或没有幽默感——英国人民对此不能原谅。

（第二天早上，首相收到西蒙·芒克的一封来信。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把它保存在内阁办公室

的档案里。我们把它奉献给大家。这封信含有严重的威胁的意思——编者。）



NT国家剧院

受女王陛下眷顾

亲爱的哈克先生：

附上我发言的一部分，以供您消遣。您是否认为，这能成为使人轻松一下的电视好节目？当然，我希望我不必把它都说出来，因为我不想使您难堪。但是我确实希望您能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取得大额增加的资助金额，国家剧院

非垮不可——南方银行出钱建造的剧院
就会变成一个硕大的空关的建筑，成为
这个国家愚昧无知和日渐败落的纪念
碑。

另附有一篇短文

您的忠诚的
西蒙·芒克
奥利佛剧院
利台尔顿剧院
考台西奥剧院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你们今晚可以因政
府另一种花钱的方式而感到有趣。

政府对艺术花不起的这笔钱。

你们可知道在一年之内伦敦地区花了几百万英镑的钱，为已经有了四千幢空关着的政府提供的房屋的家庭，再建造一批旅馆？

你们可知道另外一个政务委员会每周把一百英镑付给一位修趾甲的人？可知道英国有一座城市，在后一盏煤气灯给换走以后的八年中，还在雇用四位点煤气灯的工人？这笔钱达二十五万英镑之多！

更不用说有个政务委员会花了七百三十英镑让人为两平方码的灌木地除草。还有一个政府办公大楼在建造起两周后就被计划拆除了。

最后，你们可知道所有英国地方政府在哪儿召开关于削减开支的会议？在皇家饭店！[\[8\]](#)

12月6日

今天早上我收到那个叫芒克的人的恶毒的带威胁性的信。这封信不光是写满了地方政府挥霍浪费的例子，它还威胁说，如果我不增加资助金额，国家剧院就会关门。这对我是一条灾难性的消息，报界会置我于死地的！

我召多萝西来讨论他的发言稿的事。她对此

的看法是：看电视的人不管是地方政府浪费还是国家政府浪费——认为反正用的都是公众的钱，是纳税人付的资助的钱。所以他们会同意芒克的观点，如果钱是那样地浪费掉了，那么由于财经原因而使国家剧院关门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我肯定她说的是对的。事实是，抬出国家剧院来是要我摊牌。

“您有什么牌可摊？”她问。

“我的牌是：我宁愿冒险让国家剧院摊牌。”

“他们什么牌？”

“他们的牌是他们认为我将摊牌，而……”

“而您是在逼他们摊牌！”她说。

我意识到我再也搞不清楚谁在摊牌了。多萝西认为这很清楚。我搞不清楚了。（可能这是一个瞎子摊的牌，或是心中一抹黑的人摊的牌——编者。）

我的盒式录音机就在桌上，因为我要为我的同忆录录下一点事和录一两封私人信件。伯纳德主动来为我分析形势。他说了几分钟，可是我依然懵懂。我就请他对我的录音机再解释一遍。

“首相。”他说，“您认为国家剧院认为您在逼国家剧院摊牌，而国家剧院认为您认为他们在逼

您摊牌，而您的牌是让国家剧院认为当您不在逼他们摊牌的时候在逼他们摊牌，或者是当您在逼他们摊牌的时候，您的牌是让他们认为您并没有在逼他们摊牌，因为如果他们不在逼您摊，他们就没在逼您摊牌。”

我谢了他，又恢复了和多萝西有意义的那部分谈话。她问我我的方针到底是什么？我是否真愿意不增加资助金额冒险让他们关门？

我万般无奈地回答说：“我看我已经说明了我的方针。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重复我说过我的话，一直到……到……”

“一直到您自己明白您的方针到底是什么为止？”伯纳德越帮越忙地问。

“问题是，这个形势十分棘手，会变得像热土豆一样烫手。如果我不采取些措施，就会变得像香蕉皮一样涩口。”

伯纳德插进来说：“对不起，首相。一个热土豆不可能变成香蕉皮。如果您对热土豆不采取措施，热土豆只会变成冷土豆。”我不知道伯纳德有否意识到有时候他是多么像个死人。

12月7日

多萝西给我带来了一份计划。并非好计划，并非伟大的计划，但却是很聪明的计划！

简而言之，她建议让他们摊牌。她说我应该把国家剧院卖了。也卖了国家影剧院。南方银行就成为可以俯视圣保罗教堂和大钟楼的景点了。

她建议说，这景点应该卖给房产开发者。她的信息是这在市场上值三千五百万英镑。这笔钱可放在艺术信托资金里，这样每年平均可产生百分之十的利息——也就是每年三百五十万英镑。

从信托资金中获得的三百五十万英镑的利息可以资助国家剧院，不是资助剧院本身，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卖了，而是资助那个买它的公司——这就是关键。

显然，现在的国家剧院的**建筑**吸收了公司资助的钱的一半，就是说，七百万英镑的资助中有三百五十万英镑是用来维修这建筑的。多萝西振振有词地说，这纯粹是浪费，这笔钱完全可以用在生产上的。西蒙·芒克毕竟在上星期还抱怨说他们不该把资助的钱这样花掉——“剧院该是指戏剧和演员，不是砖瓦和砂浆”。

那么，他们将在哪儿上演戏剧呢？回答是：伦敦有一大批剧场。全国各地都有剧场。国家剧院可以像别的剧团一样租用这些场地。这计划很周全。剧团甚至得巡回演出，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剧团——而现在它只为几个伦敦人和旅游者服务。这样，国家剧院的演出就能挣多得多的钱，

而政府能用三千万英镑的纯利润去投资，再赚上每年三百万英镑来总的资助英国戏剧。

我情绪高涨起来。“谁也不会指责我是市侩了！”她微笑盈盈地说：“除非他们认识您。”

12月9日

颁奖酒宴的那天晚上。我穿着晚宴的西服，挽着安妮，到达了道彻斯特，急切地盼望着针锋相对的那个场面。如果今晚会出现一人被击倒而抬出场地的话，我觉得我很可能是胜利者。

既然知道听众中大部分是有经验的演员，我只得不厌其烦地做些准备。我对着镜子排练过。多萝西看到过我近在电视中出现的形象，她对我有些忠告。

“手势总是要做得充分。您如果把做手势只局限于肘子上面，您看上去像一个美国地毯推销员。”

总的来说，看上去像一个美国地毯推销员也比像一个演员好。甚至比一位政客好。但是既然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位政治家，那就只能允许自己做一些有政治家风度的手势。坚决、有力的手势——但是只能在句子前，安妮对我说，永远不要在句子后！事后的手势看上去软弱无力，没有感染力。

当然，在发言前，我和芒克先生后作了一次小小的谈判。如果一切顺利，我就不必再说些引起争议的话了，这是好的结果。我记得，几年前，在我刚进内阁的如候，一位年老的同事对我忠告说如果您要留在内阁，您得学会怎么不说话。”

在吃饭前，在候见室里，汉弗莱找到了我和西蒙·芒克。西蒙现在已听说了有关资助的消息。我向他满脸堆笑，并和他真诚地握了手（还是相反？——编者。）

他没向我笑。“有关资助金额的消息很糟糕，首相。”

“肯定不会糟糕的吧？”我装作不知地说，“金额上升了。”

“根本不够。”

“可是够使你不要再在今晚提出让国家剧院关门了吧？”

“恐怕不行。”他语气阴沉，但很自信。

我拿起一把花生来。“因为明年，”我用不很清楚的声音说，“我想我们真的能做些有意义的事了。你记得你抱怨说资助的钱中有三百万英镑被用在建筑的维修上了吗？”

“是啊！”

“我倒有一个使你可摆脱这笔开支的计划。”他显得大受鼓舞。“真的吗？那就妙极了。”

“是的，”我热情洋溢地说，“不是这样吗？这还可使国家剧院真的成为是全国的。”

他马上就警惕起来。“您是什么意思？”“我想把它卖了。”我乐呵呵地解释说。

他听了大惊失色！他站在那里，张大着嘴巴，双眼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条凶猛的三头龙。我就乘机向他解释，这样我们就可省下维修的三百万英镑了。

他终于开腔了，“首相！这不行。”

“不，这很行，这很简单。”我向他保证。“曾有人愿出很好的价钱。”现在也有人出。

汉弗莱显然是大受刺激，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私下一直深信我对西蒙的关门王牌一定会让步就范的。“但是首相——国家剧院总得有个家啊。”

我解释说它会有家的。他们可以到处有办公室——比如说，在布里克斯顿或者托克斯特思，或者米德尔斯布勒。

西蒙问及演出场地和制景工场。

我解释说，可以租用，就像别的剧团一样。

实际上，由于管理不善和开支过高，国家剧院的许多工场已经关闭了。

“像别的剧团一样，”我规劝他说，“去西部演出。或去老**维克**。还有省城的各个剧场。再成为跑码头的演员，而不是文职人员。你不是说过吗：剧院是指演员和戏，不是砖瓦和砂浆？”

正在他震惊得趑趄趑趄的时候，我又给他致命的一击。我提出了多萝西的第二号计划——她今天早上带给我的。如果有人抱怨说国家剧院该有一个长期性的家，我们就把英国**所有的**地方剧场都命名为国家剧院。比方说，在莱斯特的海马凯特剧场就成为莱斯特国家剧院；克罗西勃就称为谢菲尔德国家剧院；公民剧场就可是格拉斯哥国家剧院。等等。“你，”我对西蒙解释说，“就管理国家剧院的伦敦分部。”

这描述很真实。我提醒他，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方法来管理的。有受董事会指派的艺术指导和行政人员管理，并受艺术委员会和地方当局的资助，再加上票房收入。为什么国家剧院的伦敦分部就该受到特别恩宠？我们可以用这三千五百万英镑，或三百万英镑一年的收入来帮助它们所有这些剧场了。“这办法会受这圈中的人热烈欢迎的，你说是吗？”

汉弗莱事先也没听说过这一计划，他现在真

的是无言以对了。

他的双眼突出。“首相，这很粗暴！”他喘着粗气说。

“把钱用在演员和作家身上，而不是建筑上，这叫粗暴？”

“是的，”他戛然止住。“不。”当他睁大双眼意识到他自己在说什么时，他又补充说。

“不管怎么说吧，”我下着结论，“这只是供人选择的一个办法。我也可以决定不用这办法。我也可以用。我能在我的发言中透点风声。说真的，这得看情形了。”西蒙终于开了口。“看什么来决定呢？”

我亲切地向他微笑着。“换一个题目吧。西蒙，你决定在发言中说什么了吗？”

他汗流满面。“还没后决定。”他明白他已经输了。

“你看吧，”我解释说，再考虑一下。我想那些政府浪费的例子并不那么有趣。但是，当然，这由你来决定。”我等他开口，他无限悲愁地望着我。“我肯定你懂我的意思。”我说完离开他俩而去。

好了，不管有哪一种结果，我都赢了。但是我在后一刻到来之前还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结果。

我们吃了炸土豆丸子——我真诚地提议干杯。瘾君子们被允许抽烟。颁奖的时刻转眼就到了。酒宴主人用宏亮的声音介绍了芒克：“首相，哈克先生，爵爷们，女士们和先生们，请静下来听国家剧院的前总导演西蒙·芒克先生讲话。”

他站起身来答谢大家的鼓掌。“女士们，先生们，”他说，“今天早上你们一定已经得知给艺术委员会和国家剧院的资助金额。我知道我们中许多人对此很失望。”

宴会厅中响起一片轻轻的含有敌意的低语声。有几个人在说“听下去，听下去。”许多人同意地敲起桌面来了。西蒙停顿下来朝我看着。我向他回视。他两颊升起了红晕，然后又回头看他的发言稿。

“当然，我们都希望金额能大些。但是显然这是国家手头拮据的时候，我们考虑问题得从国家利益出发。有许多部门申请要用我们国库的钱……”这是我喜欢说的话之一，就是这句话！

“……如教育，内地的城镇，保健的设施，制肾的机器。”

我像个智者一样地点着头。又是一片低语声在屋内响起，这次是充满着失望。很清楚，西蒙，芒克不会来攻击我了。实际上，就在这时，他从发言稿中挪走了几页，并且把这几张纸塞到

他的口袋里。这是明智之举。可能他知道那句老话：“生气时候别说话，免得将来后悔大。”

西蒙的发言是出乎意外地短。发言中剩下的部分就是“我想我们应该高兴的是资助毕竟是增加了，这是我们的荣誉贵宾极力为我们争来的。”

我向他微笑着。我知道，照相机正对着我。“女士们，先生们。”芒克说着拿起他的杯子，“请为我们的荣誉贵宾，艺术的资助者，首相干杯。”

在一片稀疏和并不热情的掌声中，他坐了下来。他的听众不知道内情，但是他却在说了唯一可能说的话以后很聪明地提议干杯。

我让他看到我也把该去掉的几页从我的发言稿中拿了出来，我对汉弗莱耳语说：“发言很精彩，是吗？”

他似乎和演员们一样愤怒。“是的，首相。”他说，却是咬牙切齿地说的！但是，我得说，我的老汉弗莱自己的举止总是有点戏剧化的。

[1]旅馆。

[2]许多下议院的禁令之一。

[3]丹恩·华特是《伦敦东区人》中的一个
人物，在二十世纪后期，这个肥皂剧很引人瞩目。

[4]八十年代著名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台
利·华根主持谈话，来宾们就听他的。

[5]和编者的谈话

[6]这是一个专门制造高保真音响设备的公司
的名字——译者。

[7]加尔文是基督教加尔文派的创始人——译
者注。

[8]一家奢侈华丽的饭店，在伦敦的摄政王
街。

8. 国民教育

12月11日

从艺术到教育——真正的教育。我们的党在地方当局和教育制度上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但是今天是因为别的原因而使人欣喜不已的。在我处理英国中小学的小儿科式的问题前，我一天都以一种政治家的风度来运筹着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到未来的大事，事实上是影响到人类存亡的大事，或者用我们更为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所谓的教育家们的话来说，影响到个人的存亡。

在圣诞节以后，我得出访美国，此举将有利于我在大选中的地位。接着我将去莫斯科，这将向我的选民们表明我是能给他们带来和平的人。

当然，在短时期内我是做不到的——我们还得为此举办好几个工作葬礼才行。但是这对形象的树立绝对有利。

所以今天早晨，我在写着对在纽约的联合国机构作专访时的发言。我认为，我的第一稿很好。我是根据联合国本身的宪章写的。外交部给我送来了一份副本，附有一份说明。这说明解释道：这宪章的导言被看作是英国语言的**无条件投降**[\[1\]](#)。

我的第一稿提到了英国对和平、自由和公正的信念。它谈到在绝大多数成员国内还有政治犯的时候，**公正**是谈不上的；在多数成员国中还是一党制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你的党正好领导这个政府，你倒也会欣然接受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当大家都盲目地投票选举特殊利益集团，而不选我们的时候，世界和平的希望就不大。（很有趣的是，哈克在政府中任职这么久以后，居然在心中还是个道学家。尽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很少能彻底贯彻他的道德信条——编者。）

外交部看了一下我的发言。他们在星期六才拿到。今天，他们快速而有效地否决了它。狄克·华顿[2]打电话给我说，看在上帝份上，这种话一句也不要说。

“因为这些话错了？”我问。

“因为这些话对了。”他回答。

我告诉他我不想再用些老生常谈、陈词滥调来搪塞。（这句话本身就是陈词滥调——编者。）我又重申我想说些有关和平和自由的话。狄克·华顿说如果我坚持要这样说，我可以说些关于联合国内和平的话，但不要提自由——这太易引起争议了。我告诉他我不怕引起争议。争议给报纸提供更妙的大标题。

午饭后，我在自己房中准备在下议院回答问

题时[3]的讲话。议会提问秘书认为反核武器集团会对今天报上发表的美国导弹的新传言提出问题。有人似乎害怕苏联对我们大部分导弹用集成电路制造地区的渗透行为。

“是指在加利福尼亚吗？”我问伯纳德，“西利肯山谷？”

“是指台湾。”他回答。

我感到很吃惊。“台湾？”

伯纳德点点头。“好像我们为大约一千五百万集成电路次品付了钱。”

“什么叫次品？”我审慎地问。

他无望地耸耸肩。“谁也不清楚，首相。我们不敢问。可能这些导弹根本不能用。可能它们一有人按电钮就会爆炸。”

“天哪！”我说。我感到恐怖极了。我问还会发生什么。伯纳德耸耸肩。“可能它们像飞镖一样。射出后在世界兜一圈又会落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我无言地注视着他。我沸腾的胸中正想梳理出这份恐怖的全部含意。

伯纳德又说话了。“有可能好避免彻底地揭露这件事。”伯纳德请来参加这次讨论的马尔科

姆·华伦[4]用力点着头表示同意。

我突然想到一点，这比飞镖式的导弹更可怕。我的嘴唇因恐慌而发干。“我们什么时候买来这些导弹的？”我问。我完全被吓呆了。

伯纳德让我放心了。“在您上任以前，首相。您就不必担心这个了。”

谢天谢地！我不必负责真是大幸。但是我现在上任了，我现在还知道了！“不必担心”这句话来对待自行其事的导弹倒不失为一种怪论。“不必担心？”我不相信地重复说。

“不，我是说，不必为个人的原因担心。”他说，“除非它们飞回落到怀特霍尔。”他忧心忡忡地补充说。

“哪一个会不落回到这里？”马尔科姆咕哝着说。他是这么忧愁！

我问谁该负责。“国防部，”伯纳德说，“还有五角大楼。问题似乎出在对国防工业缺少控制上。”

“问题，”马尔科姆说，“似乎出在对导弹缺少控制。”

“问题，”我说，“似乎是国防部想象力太差。”

“好连这一点也别暴露出来。”马尔科姆建议说。

在这件事上，议会提问时间倒过去得很顺利。像往常那样，我事后就立即离开了会场。总组织秘书和党主席被领进下议院里我的房里。我命令伯纳德留下来听我们说。

他老大不愿意。“这是党务吧！首相？跟党主席和总组织秘书谈话是算党务吧？”

“这也是政府事务。”我坚定地对他说，“有关我们的教育方针。”

伯纳德对细节问题总是不肯放过。“到底是政府的？还是党务方面的？”

“这是一回事，伯纳德！”我对他渐渐不耐烦起来。

党主席耐尔看上去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而有点气喘吁吁。他傻乎乎地插话说：“请相信我的敬意，首相，这不是一回事。”

杰弗莱^[5]也加入了谈话。“所以我们要谈一谈。”

伯纳德又想溜出去了。“那么，看来这是党务了，所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

“坐下！”我命令他。他坐下了。他真是非常

顺从的。他早已被训练得从不出错了。“你得有圣人的耐性，伯纳德。”我对他说，

“现在，留下来！”

他留下来了。我转身向耐尔和杰弗莱，问他们问题在什么地方。

“教育。”耐尔简洁地说。

我觉得自己变得好斗起来。“那你究竟觉得我可干些什么呢？”

“您是首相。”杰弗莱说。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但是这又怎么办呢？首相对教育又不能直接控制。我又不能控制课程设置，考试制度，以及对教务长的任命——对这些都不能控制！但是选民们把一切出错都怪罪到我的头上。

“您的确能施加影响。”耐尔说。

“我对此已经烦透了，”我评论说，“我原以为我一旦成为首相，我就会有权。可我现在得到什么呢？**影响力**？该死的影响力，就剩这个了！我对警察，纳税，欧共体指示，欧洲法庭，英国法庭，法官，北大西洋条约，英镑贬值全无控制能力。那我**到底**有什么权力呢？”

耐尔目光晶莹地看着我。“您有在下次大选中失去我们的权力。”

“您会失去我们的，”杰弗莱深沉地点头说，“除非我们为教育采取些措施。”我怀疑他们是否在夸张这件事的严重性。可能不是。我告诉他们我在听着呢。

“选民们，”党主席说。他的额头上冒着汗珠。“要对学术上的造诣不高和社会上缺乏竞争精神采取些措施。”

“你是指初等教育的读写算三要素。”我打断他的话说。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他阴沉沉地点点头，“他们在教孩子们马克思主义，性别歧视，和平主义，种族歧视，异性恋主义……”

伯纳德插进来说：“所有的主义。这些主义引起分裂。”我想他想要我叫他走。但是我不这样做！

我们没听说过异性恋主义。耐尔解释说本意是想教孩子们不要不合理地偏向异性之间的恋爱。“这以前就有。”我评论说，“但是我发现这有问题。我们不要偏见。”

耐尔爆发出来了：“偏见！”他大叫起来。“您不能把教孩子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称为偏见。”他的脸涨成奇怪的猪肝色。我想他的心脏病要发作了。对你说一句老实话，我并不为此担心。我对

他说我将在下一次大选中落选的话感到烦透了。他是该死的党主席。可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批评我。大选后我可能连任——但是他可能只要我下次改组时就得滚蛋。

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正常”、“不正常”的话。我叫他别说了。“这得看情况，耐尔。”我解释说，“看你怎样给正常下定义了。我个人当然是反对有同性恋的教师的。我不反对性教育。现在请平静下来。”

他试着照办。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不反对在课堂里教孩子们懂得生活的真谛。可不是同性恋的手法。说到手法，我得说，也不是异性恋的手法。”

“那么他们得上哪儿去学这些呢？”我好奇地问。

“在自行车棚后面，”耐尔坚定地说，“就像我们一样！”这倒不啻是对耐尔的新的揭示。“你是那样学的？”我很感兴趣地问。

我们的总组织秘书杰弗莱对耐尔的成熟过程丝毫不感兴趣。

“不去管性爱技术吧。我们的学校教的印地语比英文还多。”

这就更棘手了。可能我在教育方面没有权力

倒是好事了。**我**同意英文比印地语重要。可是我不能在公众的场合这样说——我会被指责有种族歧视的。就在上星期，我接见了民族问题事务会的代表团。我在一位黑人女代表发言时看了看表，就马上有人指责我有种族歧视的举止，有性别歧视的行为。我只是因为太厌烦了才有此一看的。

但是，我仍旧不懂他们的话。我不明白我可干些什么。所以，我要他们说得更具体些。

“让佩屈立克[\[6\]](#)来控制教育部。”

“你知道这不行。”我回答说，“他们已经把佩屈立克驯服了。”

“那么叫他卷铺盖滚蛋。”

“我不能再来一次内阁动乱了，现在还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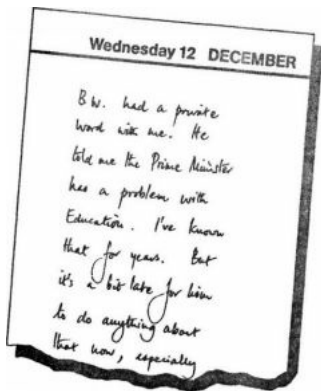
“那么，”党主席说，“请在野党的领袖夫人来十号。”

“为什么？她能干什么？”我迷惑不解地问。

耐尔的脸色不那么紫了，但神情依然严肃，“她可以开始丈量地毯和窗帘的尺寸了。”

（哈克想请汉弗莱爵士给一个忠告，因为他相信汉弗莱爵士信仰人的美德。但是汉弗莱爵士

有他自己的目的。他的私人日记中的这一部分说明了这一点——编者。)



伯纳德·伍利和我私下作了交谈。他告诉我首相在教育问题上遇到了问题。这我前几年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他还想对此采取措施，为时已晚，特别是他已经腹中空空地来到了十号。

但是显然我是错了。首相担心的不是他自己的教育问题（或者说缺乏教育的问题）。那是全然无望的事。不，他心中装的是教育制度问题——以我看来，想要对这件事采取措施也是为时太晚。

他认为，伯纳德告诉我说，教育问题会使他在下次大选中落选。这可能性倒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看这对国家来讲不算太坏。

更何况，又用不着担心什么事。我们的教育制度满足了家长们的大多数要求。他们上学时就不会再惹事。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是这样的。

正像伍利指出的，我们还得承认这制度并不培养出一批能面对工作的人来。但是如果真培养他们都能应付紧张的工作生活，我们的一些地方当局又不乐意了。

伯纳德引用了党主席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整个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在崩溃。我把他羞走了。他显然是受了敌人的影响——说得确切些，受了首相的政策总顾问[\[7\]](#)的影响。我可忍受不了让伯纳德·伍利站在我的办公室内，对我说，作为一种实验，综合性的教育应受法律制约。当然，教育该受法律制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废弃这个制度。

综合性教育的目的不是想提高教育水平。它是用来去除阶级区别的。但是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在形成，好像它是企

图去除孩子之间的阶级区别。

然而，在教育科学部中，没有人提到过孩子。他们从来不提。综合性的一套做法是用来去除教师这个行业中的阶级区分的。它是用来改善教师的生活的，而不是改善对孩子的教育。它旨在提高教师工会中的中小学教师工资，使它达到曾在中学里任过课的全国校长联合会里的人的水平。

当工党执行的时候，教育部的官方方针是：**综合教育废弃阶级区分**。当保守党执政的时候，教育部说：**综合教育是提供大众教育的廉价的方法**。这样一来，教育科学部的观点就是，选择性教育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你是工党的话）或是昂贵的（如果你是保守党的话）。

保持这个状态对文职部门很有利。总的来说，这使得教育科学部和政府跟全国教师工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而这对我们个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都在无依赖性^[8]地教育我们的孩子。

伯纳德·伍利顽固地坚持说政府需要改变。有时候他真是笨得可以。教师工会又不想要有什么改变——对任何政

府，我们只要应付四、五年就行了，而教师工会却永远在那里。

更何况，伍利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的任务是使教师工会接受政府的政策。有了这根本的观点，他才会受敌人的影响，被他们洗了脑子。温赖特女士可能相信，这样做是有利于政府的！她甚至可能已经说服了首相，但是她是错的！

我们文职部门的目的是和谐统一的，一贯亲善的。人人都会同意说，我们的目的是值得称颂的。既然政府老是改变政策，而教师工会却屹立不动，那么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应该使政策来符合教师工会的要求。教育科学部就是用来做这个工作的——让政府来接受教师工会的方针。

我遗憾地这么说了，伯纳德·伍利还是满腹狐疑。他只是又说，他的主人，首相非常担心，对有些事不能改变，他负有责任。

我肯定他是负有责任的。我称此为**没有权利的责任**——各个时代的阉人的特权。

12月13日

一吃完早餐，我就和汉弗莱像往常一样碰了头。他提起了教育问题。

“我的理解是，首相，您很为地方教育当局而担心吧？”

“不，”我对他说，“我是担心教育科学部。”

很看得出来，他感到奇怪了。“我的看法是，教育科学部干得很出色。”

他不可能相信这句话！**没有人**会相信。“我不相信你相信这句话。”我说。

“您不相信？！”

“对不起，不相信。”我意识到，现在，他感到受到了侮辱。我想我还随口地叫了他“骗子”。但是我对他还是诚恳的。“你不相信我不相信你相信这句话？”

他很坚定地强调说：“我相信您不相信我相信这句话。但是我必须请您相信，虽然您不相信我相信这句话，但是我是相信这句话的。”

我觉得我得接受他的说法，特别是因为要弄懂，他意思颇费周折。“别的不去管它，”我继续说，“看看这个国家里的教育现状吧。”多萝西向我提供了有关学校考试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材料。你愿意要什么——原子弹还是慈善事业？还有一道数学题——连数学题也有了政治性：如果维持

英国核国防力量每年要花费五亿英镑，而喂饱一个挨饿的非洲儿童每年要七十五英镑，那么放弃核国防力量只拯救多少非洲儿童。

汉弗莱立即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很容易。一个也救不了。国防部会把这些钱都花在造传统武器上。但是这道题目只要用五亿除以七十五就行。”

“你能够否认，”我对他大发雷霆，“他们甚至不去教孩子们基本的算术？”

“不，”他小心地回答，“但是地方教育当局无疑地会争辩说，他们不需要——孩子们都有袖珍计算器。”

“但是他们得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强有力地提醒他，

“我们都学了基本算术，是不是？”汉弗莱接着问我一大堆愚蠢的离题的问题，以向我证明一个严格的学校教育毫无价值！汉弗莱竟是这样的人！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接受的传统学校教育比谁都严格。不管怎么说，我驱散了他放出的烟幕——因为这实际上就是烟幕。

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说[\[9\]](#)：

读哈克的这篇日记使我乐不可支。他说到的问题既不愚蠢也不离题。

当首相断言说我们都学过基本数学时，汉弗莱爵士立即问他：“三千九百五十七除以七十三得多少？”

哈克推托说，他得有支笔有张纸才能算这道题。我把纸和笔给了他。谁也不感到奇怪的是，他拒绝拿过这纸和笔，口中只是评论说在他中学毕业时他就一定能算这道题了。

“现在您得用计算器？”汉弗莱问。话中的意思我听懂了。但是哈克否认汉弗莱爵士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相反，他暴戾地评论说现在也几乎没有人懂拉丁文了。

“*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汉弗莱很得体地回答说。

哈克迷惘地看着他。这时稍有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他又一次屈尊请他翻译一下。

“时间在变化而我们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我说。

“说得一点不错。”首相说，就好像这句引语证实了他的观点——而随便哪个傻瓜都看得出这句话支持了汉弗莱爵士的论点。

汉弗莱爵士继续用拉丁文讲话。“*Si*

tacuiſſes, philoſophus mansiſſes,”他说。

哈克一点不明白。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汉弗莱爵士责无旁贷地翻译说：“如果你闭上嘴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你很聪明。”

哈克看上去像中了风。我看他马上就会要患冠心病了。汉弗莱爵士急忙解释说：“不是说您，首相。那是翻译。

哈克接着痛斥汉弗莱爵士竟会否认学校教育的价值，而汉弗莱爵士回答说——我的看法是太过于无礼了——如果他个人在和夫兰克林的首相谈话时竟不能用上它的话，他就看不出它有何价值可言。

我心中无疑地感到，汉弗莱爵士在盛气凌人地决心赢这场争论的时候，已经忘光了他自己的政策目的。他如此向哈克挑衅和使他感到屈辱，他是在逼哈克不肯罢休——这是一大失策。

（下面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汉弗莱在根本上拒绝承认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一场灾难。我告诉他：“他们在教孩子们说，服从是一句废话。以至在课堂里毫无纪律。”

汉弗莱根本就不承认事实。他总是这样进行

诡辩的。比方说：

“如果课堂毫无纪律，他们怎么会知道有人在教他们说，服从是一句废话。他们也自然学不到任何东西。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只知尊重自己的孩子会相信教师教他们的任何东西。”

我对这种滑稽可笑、毫无意义的回答感到很生气，“我们要教育他们来承担起生活中必须的工作。可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他们却感到厌烦得不行。”

“我倒觉得四分之三的时间感到厌烦是使他们承担起生活中必须的工作的好准备。”这是他的油滑的回答。

“汉弗莱，”我坚决地说，“我们把中学毕业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就是为了让他们多学一些。而他们却学得反而少了。”

突然他很严肃地回答我说：“我们把中学毕业的年龄提高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多学一些。我提高年龄是为了把十几岁的孩子们拦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减低失业率。”

他说得对。但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谈下去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的其他方面。我问他是否想说我们的教育制度一点问题也没有。

“当然不是，首相。这是一个笑话。它一直

是一个笑话。只要让地方政务委员会来管，教育仍旧会是一个笑话。他们中的一半总会是您的敌人。另一半倒是您的朋友！可是他们使您宁可要敌人。”

我终于看出来在这场讨论中，他的观点是基于什么了。他相信只要教育是操纵在市政厅里的大笨蛋们的手里，它就好不了。他正确地观察到我们从来也不会把像国防这样重要的事委托地方当局来管——如果我们给他们每人一亿英镑，并要他们保卫好自己，那么我们就不必再为俄国佬担心了。三周之内我们就会有内战了。

他声称这些就是我们在教育方面做的事，所以没有人会以对待国防部那样的认真劲儿来对待教育。

这当然是真话，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民防，所以才由政务委员会来管。但是我让汉弗莱确信，我是十分认真地对待教育的——它影响到我的下一次选举。

“啊，”他带有优越感地微微一笑。“在我的天真想法里，我原以为您是担心我们孩子们的未来呢。”

可是，我是为他们担心的呀！这又不矛盾。归根结底，孩子们一到十八岁就能选举了。

汉弗莱对教育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有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由中央控制！把责任和权利从地方政务委员会手中夺回来，并且让它由教育科学部来管理。那么我就可以有所作为了。

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这听起似乎太简单了一点。但是.....我又有了希望。

“汉弗莱，”我说，“你认为我行吗？我真能手握鞭子，把这头牛牵着鼻子走？”伯纳德第一次开了口：“首相，如果您手握鞭子，就无法再把这头牛牵着鼻子走。”

我真不能相信，这就是伯纳德对教育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发表的唯一有见地的意见。我坐在那里只能瞪眼看着他。他一定是认为我没有听懂。他开始解释了：“我是说，如果您一手握着鞭子，那就只能用另一只手牵牛绳，这样是牵不动这头牛的。只用一只手牵牛绳是很危险的，因为.....”

我又清醒了过来。“伯纳德.....”我说。他停住了。可能他是忍不住这样说的。注意细节本是好事，但是这种样子真是！我让汉弗莱给我的思想喂一点粮食。

“这样的话，”他心满意足地回答，“bon appetit.”[\[10\]](#)

12月14日

明天我将去西北部作一次圣诞节前的简短旅行访问。多萝西为我安排了日程表，包括对学校 and 医院的一些首相级参观访问。

“在边缘选区争取选票。”我兴高采烈地对伯纳德评论说。

“不，首相。”他说。

开始，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

“我和您一起去的话，”他审慎地解释说，“这就是一次政府的访问。但如果这包括在边缘选区的游说活动，这就是党务了，我就不能和您一起去了——而且，财务部也不能付这笔钱了。”

他的迂腐有时候也有用！多萝西马上把这事办得很清楚，在记录上，我们是对西北地区作政府访问，但又纯属巧合，所有我们的停靠站都是边缘选区。伯纳德对此感到满意了。

我对教育还是耿耿于怀。我问多萝西对此有何良策。快一点！

“您是要真干，还是要显得在干？”她想知道这一点。

问得真蠢。“显得在干，这是很明显的。我根本不可能干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接着她建议我在电视上露面，讲一些教育上的成绩什么的。

我很高兴有这种类似成绩的事可提。她把手伸进她的提箱，递给我一份有关圣玛格利特学校商业企业组的详细报告。她认为我在旅行访问中该去参观一下这所学校。显然，这活动可以塞进我的原来日程表里的。

这所学校建立起它自己的制造和贸易公司。他们制造干酪板、镇纸和烤面包架等等东西。然后他们再把这些货物售出去。还有，在他们的数学和商业课里，他们就根据全过程安排教学内容。他们还请来当地的商人和家长们帮忙。

这听起来真好。更何况，这不花教育科学部一分钱——他们却有利润。

我不知道是否有不足的一面。有关他们的批评意见是，孩子们会变得很贪财？但是不——多萝西告诉我，他们把钱用在当地的慈善事业上。

在对西北部的访问中，显然，非得去参观一下这所学校了。我对多萝西说，要安排足够的时间能使摄像机好好地把这所学校都摄入镜头。我还补充说“在电视新闻中，让我的发言能在镜头中延续二十秒。这一切都有利于夺回一些选票的。”

伯纳德的身子在椅子上很不舒服地扭动着。他清了清嗓子，

“嗯，首相……”他坚决地提醒我。

“我是说，伯纳德。”我换了一种口气说，“这会给那些该对国民教育负责的人一点启发的。”

“当然，首相。”他微笑着说。

（哈克对西北部的访问非常成功。他对圣玛格丽特学校的参观也确实在国内新闻中播出了。录像片没能保存下来，但是我们有幸找到了文字稿。我们在**独立电视新闻部**的允许下，把文字搞复印于下——编者。）

独立电视新闻有限公司

下面的文字稿是根据录音打字记下来的，并非是原稿的复印件。由于有听错的可能，它不能保证完全精确。

“十时新闻”

播出日期：十二月十七日

纪录片：

新闻播音员（镜头外）：后，在今天上午，首相在他对西北部的访问中参观了威德尼斯的圣玛格丽特学校。

吉姆·哈克的镜头，后面站着伯纳德·伍利。周围是许多报界新闻记者。他们

正走进一间学校办的木刻工场，在那儿，穿着整洁的校服的男女孩子们正忙于他们的工作。

新闻播音员（镜头外）：这所学校办起了自己的小型加工企业，孩子们在校的木工车间制造出各种货品在当地出售。孩子们自己经营和出售货品。

镜头切入：

吉姆·哈克和一群学校的孩子们站在一起，看他们包装货物，贴标签和堆放。

新闻播音员（镜头外）：他们用在企业中得来的经验作为基础来学他们的数学和商业课。

切入：

广角镜——学校大厅。哈克首相站在讲台上。一位高年级的女生递给他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他们握了手。闪光灯在拍照时闪着光。

新闻播音员：首相接受了学校的一件产品。

切入：

首相的中镜，他在学校讲话。

哈克：我必须为你们的努力工作，你们企业的纪律和成功，向你们祝贺。

你们为英国的教育树立了榜样。其它学校完全可以学习。我们需要更多像圣玛格丽特这样的学校。我当然会非常珍惜你们的礼物——只要做得到，没有一位首相肯失去他的座位的。

切入：

学校大厅的广角镜。笑声和掌声。

切入：

首相，微笑着走下讲台，一面频频挥手。

12月17日

我看了今晚十点报道我参观威德尼斯的很成功的新闻片。安妮和留下来吃饭的多萝西和我一起看的。我们都认为一切都拍得很好，特别是在我简短的发言的后，我说的笑话。

实际上，多萝西声称这笑话是她的。她真小气。如果她说“她的”是指她**想出来的**，那么我想，她是对的——但是这几乎没什么关系。

它比英国广播公司提到的范围要大得多。英国广播公司没有把这说成是“首相对西北地区的访问”。他们说这是“吉姆·哈克参观边缘选区”。

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这表明了英国广播公司对我存有偏见。我想对安妮解释这一点，她却看不出为什么是这样。

“他们为什么不想报道事实呢？”她问。

我解释说他们不必要报道**所有**的事实。何况，参观边缘选区又有什么错，但是他们想暗示这里面有问题。

安妮**还是**不懂，“你是说，报道事实中的大多数倒没什么，但不能报道大多数的**事实**？”这种自作聪明的评论真的使我大为光火。关键是，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在早些时候的九点钟新闻中，英国广播公司对我也是这样。他们报道了我跟法国人的一场辩论：“哈克先生声称这样的行为是允许的，但法国政府却说这是违反条约的。”

“这不对吗？”

“当然是对的！”我都要爆炸了，“但是听起来好像我本人被整个法国击垮了。这使我显得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但是法国认为你是做错了事。”

“这又不是关键！”我叫道，“他们完全可以说：‘杜鲍艾先生声称这次行动是违反条约的，但英国政府却说这行动是可以允许的。’那样的话，听起来——本来就该这样——好像我们大家都把法国佬击败了。但是他们没这么说！喔不！他们在跟我过不去！”安妮显然没有因为英国广播公

司明显的偏见仇恨、狭隘和腐败而不安。“但是他们说的话仍是真实的。”她顽固地重复这层意思。

我因愤怒和沮丧咬紧了牙关。我咬牙切齿地咆哮着：“这么说，它还是有偏见的！！另一种说法也是真实的！！”

在多萝西面前，我不想发脾气而显得有失身份。她一直保持平静。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平静地走到酒台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斯考奇酒。

安妮仍是平静得很。“吉姆，”她说，“我对你的妄想狂不感兴趣，我对那所新学校感兴趣。”

现在不必在家庭大战中选择站在哪一边了，多萝西感到舒了口气，她开口了：“是的，如果家长们排了长队想把孩子送进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一定不错。”

“遗憾的是孩子们不能都进去。”安妮说，一面给我们两个各倒了一杯咖啡，“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念书呢？”

“没地方了。”我解释说。

多萝西纠正了我实际上是有地方的。吉姆，学校在减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她说得对。“但是，这样做就成了从别的学校口袋里挖

钱了。”我向她指出。

安妮抬起头来说：“那又怎么样呢？”

“这是很明显的。别的学校就会缺少学生。他们就得关门了。”

“那好啊。”安妮说，“圣玛格利特就可以把它们的房子接过来。”

我想对安妮解释，他们不能那样干，这不公平。

“对谁不公平？”她想弄清楚。

“对那些得关门的学校里的老师。”

“但是其中的好教师就会被受欢迎的学校所接受。有人需要他们的。”

“那么差的教师呢？”我争论说，“对他们就不公平了。”

“那又怎么对孩子们公平呢？”安妮说，“或者说是差的教师的工作更为重要些？”

我啜了一口咖啡，又把我的脚搁在皮面的脚凳上。“这不行，安妮。”我尽量容忍，“谁来说哪些是差的教师呢？这办不到。”

“为什么办不到？”

我确实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肯定是有

理由的。那时，令我吃惊的是，多萝西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办不到？”这难住了我，令我奇怪的是，我真的无言以对了。

多萝西却争辩起来了。“如果把学校比作大夫，”她一面作沉思状，一面自己拿了一块薄荷奶油巧克力，“归根结底，在国民保健制度里允许你找任何一位你喜欢的大夫，是不是？”我点了点头。“大夫是以看过的病人数来取得公平待遇的，”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学校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呢？国民教育制度就得允许家长们选择他们喜欢的学校。学校就按学生数来领钱。”

“有人会不满的。”我回答。

“家长？”多萝西说。她这是明知故问。

“不。”我不得不承认，“教育部。”

“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接着她又明知故问了：“哪一面占更多的选票，家长，教育部？”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她也明知道这一点！“教育科学部会禁止这样做的。”我提醒她。

接着，她却说了一些这么有革命性，这么鼓舞人心，这么刚烈的话。她使我震惊得人都发僵了[11]。（哈克在激动的时候，经常显示出，可能是下意识的，在运用头韵方面的天才——编

者。)

“好极了，”多萝西说，“把他们摆脱掉！”

我一时还没听懂她的话。我想我当时只是茫然地看着她。摆脱教育部？我没真正听懂这意思。

“摆脱它！”她重复说，“取缔它。把它搬开。”我问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去掉它。废了它。把它连根拔掉。”她解释说。

我开始理解她想干什么了。但我仍请她继续解释。

她显得有点慌乱。“嗨……我不很清楚还得怎么……好吧，让我这么说吧。”她踌躇片刻，小心翼翼地思考着恰当的措词，“我的意思是，”她终于说，“摆脱它。”

“摆脱它？”我问。

她证实了她的意思是让我摆脱它。

“我不能那么干。”我说。我很感到惶惑。

“为什么？”她问，“它干了些什么？”

突然，我意识到我可以那么干！地方当局就可以管理一切需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国民学校监察委员会，把教育科学部的其他功能都

让环境部来完成。我可以把被人驯服的白痴佩屈立克派到上议院去。

“天哪！”我在惊恐中感到怀疑，“汉弗莱会怎么说呢？”

多萝西却嫣然一笑。“不管他怎么说。”她高兴地说，“当您告诉他的时候，我得在场。”

“你可亲眼看到政治家的愿望和行政官的愿望之间的一场冲突？”

她若有所思地在座位里向后一靠。“我想这将是一场政治家的愿望和行政官的失望之间的冲突。”

12月18日

今早九时左右，我就把汉弗莱召来了。多萝西和我在一起。当我漫不经心地告诉他我想对他说一个新的想法时，我竭力掩盖我的激动之情。

“新的”这个词通常总使汉弗莱警觉到麻烦就在前面了，但是这次当我告诉他我已意识到如何来改革我的教育制度时，他似乎很放松，还确实格格地笑了笑。

那么我就对他说了：“汉弗莱，我要让家长们把孩子们从学校全领走。他们将可以把孩子送到他们想送的学校里去。”

他仍是漠不关心。“您是说，在经过申请、调查、裁决和上诉等手续以后？”这次轮到我格格发笑了：“不，汉弗莱。他们可以直接送孩子，把他们送到他们想送的任何学校去。”

“对不起，首相。我没听懂。”我看得出他是真的没听懂。

多萝西无情地为他说明了：“政府，汉弗莱爵士，将让家长们自己来决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哪一所学校。”

突然，他听懂了我们意思，爆发出他的抗议声来了：“首相，您不会是认真的吧？”

我慈爱地点点头：“我是认真的。”

“但是这很粗暴！”

“为什么？”多萝西问。

他根本不去理会她。“您不能让家长们作此选择。家长们凭什么知道哪所学校更好？”

我静静地打量着他，“你上的是哪所学校，汉弗莱？”

“温彻斯特。”

“学校好吗？”我彬彬有礼地问。

“当然，很好。”

“谁的选择？”

“自然是我父母。”我向他微笑着。“首相，那是不同的。我的父母是有眼力的人。您不能期望普通人知道把孩子往哪儿送。”多萝西显然是被汉弗莱的势利眼和血统论所震惊，“为什么不能？”

他耸耸肩。对他来讲答案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们怎么会看得出好坏呢？”

自己也是一位母亲的多萝西觉得要回答这问题是太简单了。

“他们自然知道他们的孩子能不能读书、写字和算题了。他们自然知道他们的邻居对学校是否满意。他们自然知道考试成绩是否令人满意。”他又竭力地不去理会她。“考试又不是一切，首相。”多萝西站起来，离开内阁会议桌，并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坐下来。这样，汉弗莱就再也不能避开她的眼睛了。“这是事实，汉弗莱——那些不喜欢学校教育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进步学校去[\[12\]](#)。

我看得出，就汉弗莱而言，我和多萝西两个人都在说古语。他根本就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他又一次解释了他的观点，他变得越来越激动了。“家长们有什么资格来作这些选择。教师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实际上，家长没有资格来培

养孩子了，他们又没有这方面的证书。我们从不允许没有受过训练的教师来教书。按照理想的话，对家长，这一条也应适用。”

我第一次，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汉弗莱的理想之梦和我的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你是说，”我平静而缓慢地问，“家长们在受到训练之前就不许有孩子？”

他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显然我没有抓住要点。“不，不。有孩子并没有问题。他们都受过有孩子的训练，现在性教育课早就上了正轨了。”

“我明白了。”我说，一面转身面对多萝西。她正睁大了眼睛，不相信我们高的文官会主张建立一个奥威尔式[\[13\]](#)的协作国家。

“可能，”我提议，“我们能改进一下性教育课了？在他们有孩子以前，我们可以考考他们。书面的或实践的。或者可能两样都考吧？然后我们才可以发给他们养孩子证书。”

汉弗莱一点也乐不起来。他责备我说：“没有必要说笑话，首相。我是认真的。现行的做法使不合格的家长们的孩子也有人在为他们安排着。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把孩子往哪儿送。这行不通。”

多萝西在我面前欠身向前，去看他的眼睛。“那么保健制度是怎么实行的？人们没有医学文凭也在选择他们的家庭大夫。”

“啊，”汉弗莱说，这样他可赢得一些时间来考虑。“是的。”他迷惘地说，“那是不同的。”他下着结论说，好像他真的说出了什么似的。

“为什么？”多萝西问。

“因为，大夫们是……我是说，病家并非家长。”

“真的吗？”多萝西公然而然地嘲笑着他，“您是怎么会这样想的呢？”

他越来越暴躁了。“我是说，**就他们本身而言**，不是一回事。不管怎么说，实际上我认为让人自选大夫也不是件好事。这把事情搞得很乱。把人们交给普通医师分管就有条理了。也公平了，我们还可以减少每位大夫照看病人的数目，每个人都同样有可能遇到蹩脚的郎中。”

我私下里为汉弗莱——文官——对“公平”两字的理解而暗暗发笑。

我从没见到过汉弗莱讲得这么流畅，这么热烈，这么激动，这么尖锐，这么坚定。“但是，我们不在讨论保健制度，首相。我们在讨论教育问题。请相信我对您的敬意，首相，您该明白教

育科学部对这份全新的建议会很谨慎地作出反应的。”

这是宣战！汉弗莱已经磨霍霍了。我从未听到过如此恶毒的语言。

我仍不为所动。“那么你认为他们会禁止实行这方案的？”

“我是说，”他说，接着又愤怒地紧闭嘴唇，“他们会马上慎重地考虑的，但是会坚持对一切建议都作出彻底、严格的调查，结合可行性和预算分析。然后再把一份可供参考的文件递交给各有关部门，请他们作出评论和进行推荐。他们的意见又会被吸收进给一系列的工作组阅读的简介里。这样，组里的每个成员都得各自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就组成一份更大规模的文件。他们据此可决定，这建议能否进入下一个步骤。”

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会禁止的！但是这不成问题。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就像我对他说的，我有办法。“那么我们就取缔教育科学部！”我漫不经心地提到这点。

他以为他听错了，“请再说一遍？”

“我们将把它废除了。”我很愿意地重复了一遍。

“废除？”他一时不懂这个词的意思。

“为什么不？”多萝西倒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理由。

“为什么不？”他说。在山穷水尽时，他的音调竟提到巴西尔·福尔梯的高度，“废除教育和科学？我们的文明也将末日来临了。”我对着他摇摇头。他变得非常歇斯底里。“不，我们只废除这个部门。教育和科学将会兴旺发达的。”

“没有一个政府的部门，也能兴旺发达？”他惊恐万状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已经被诊断为精神不正常了。“不可能吧？”

多萝西差不多有点为他难过了。她设法解释：“汉弗莱，政府部门是墓碑石。工业部门标志着工业的坟墓。就业部标志着就业的坟墓。环境部标志着环境的坟墓。而教育部就标志着英国教育的尸体掩埋于此。”

他瞪眼看着我们两个像哥特人和汪达尔人[14]那样的野蛮人。他没有回答。所以，我问他，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科学部。它又干了些什么？它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想镇静下来给我解释。“我……我几乎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他开始说了，“它制定指导方针，它集中钱款，又把它分发给地方教育局和

大学奖学金委员会。它确立各种标准。”我问了他一连串的问题。“它也设置课程吗？”

“不，但是……”

“它选择教研组长吗？”

“不，但是……”

“它维修学校建筑吗？”

“不，但是……”

“它选择学生吗？”

“不，但是……”

“那么，这位大臣怎么才能够，”我很想知道，“影响我的孩子在她的学校里的学习呢？”

对汉弗莱来说，答案是再明显不过的。“他提供百分之六十的现金！”

这就是了。我们想得对。多萝西作了进一步的调查。“为什么钱不能从财政部直接发到学校呢？或直接发到大学奖学金委员会？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一批有两千之众的文职人员只是把钱从甲手上发到乙手上呢？”

他几乎是绝望地摇摇头叫道：“教育科学部也为教育建立合法的规章制度。”

他在说什么？现在几乎就不存在什么法。所

有的一切，环境部就可解决——环境部也处理别的一些地方政府的事项。

汉弗莱在绝望地打着一场必输的仗。“首相，您**不可能**是认真的。谁来计划事先评估，职工变动，学生更换，在城乡的学校密度

.....谁来保证一切**都有条不紊**呢？”

“现在就不是有条不紊，”我指出，“我们来看看，去掉官僚机构，我们是否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些。”

“但是谁来为未来制定计划呢？”我笑了。但是我不光是笑了，我还是捧腹大笑了。我控制不住一阵子发笑。这还是我当首相以来第一次。我的眼泪从两颊流下来。“您是说？”我终于能气喘吁吁地说话了，可一面还在笑出眼泪来，“今日英国之教育都是教育部计划出来的？”

“是，当然，”汉弗莱说，接着又马上毫不犹豫地直接走向反面，

“不，当然不。”

多萝西对这场谈话已经厌烦了。她站起身来。“有两千五百所私人学校天天在解决着这些问题。”她简洁地评论说。

“他们只需对日益变化的情况和供求起落作出反应。很简单。”我想给汉弗莱后一个机

会。“教育部还做些什么事呢？”

他的眼光飕飕地扫着，他一面在竭力想出话来：说：“唔……呃

……唔。”

我也站了起来。“好了，”我说，“就这样了。我们并不需要它，是吗？Quod erat demonstrandum”[\[15\]](#)

（在她的《首相的耳朵》一书中，多萝西·温赖特饶有兴味地企图解释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对国家教育的复杂态度。她的书现在不再印刷出版了。但我们节选一部分刊登于下，以飨读者——编者。）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家长式的态度可能也不会是玩世不恭的。他显然真相信权力的集中是解决一切国家问题的办法。可能他把国家教育的目的看成是把孩子们从未受过教有的家长的不良影响中挪开。他无疑地感到，大多数的家长只是把学校看成是在他们工作时间可以托管孩子的地方。简而言之，他真诚地相信只有怀特霍尔的人才明白事理。因为在这场有关教育的激情洋溢的辩论的根子里，可以看到一场怀特霍尔人和威斯敏斯特人的一场原始的部落之

间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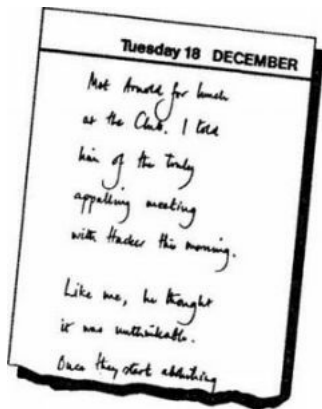
汉弗莱爵士并不真的反对给家长们在管理学校上被委婉地称作为“发言权的权力。实际上，他可不在乎家长参与管理，因为只要家长们总的来说不能把孩子从他们看不上的学校里领走，那他就可以很安全地不去理会这些家长们。如果一位感到不满意的家长不让孩子去上学，主管学生上学率的官员马上就可警告家长将向法庭起诉。

结果，是那些收入颇丰的中产阶级从这制度中获利。这批中产阶级从这个福利国家里叼走的块块肥肉，不光是在教育方面，还有住房和医疗。好处都不可避免地落到那些善于提出他们主张的能言善辩的人头上。他们能搬到有好的学校，好的大夫的好地区去住，他们会提出住房抵押以取得免税资格，他们能享受国家资助的艺术。

然而，汉弗莱爵士紧抓住一条在政府部门工作三十年后仅剩的信念：如果他更有权控制的话，他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切社会上的不良现象都可以作为证明，来证实：他的权力不够。令人难过的是，他坚定不移地抱有这一信念，

一直到他死于圣丁姆娜敬老院的那一天。

（在那一年中，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私人日记中的最后一篇记录了和阿诺德·罗宾逊爵士的谈话。罗宾逊爵士是他的前任内阁秘书。地点是在他们常去的雅典娜神殿俱乐部——编者。）



我和阿诺德在俱乐部里吃了饭。我告诉他今天早上和哈克那场真正惊人的谈话。

他和我一样觉得此事不可思议。一旦他们开始废除各个部门，文明的基础就会随之而塌。他说得对极了。野蛮生

活已在眼前了。黑暗时代[16]又卷土重来了。

我问他，当他在怀特霍尔街七十号的时候，有没有人提过这样惊人的建议。显然是没有。当然，阿诺德曾让他们把各部门合并，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合并是意味着，你保留全部的合作人员，再另外在高处加一层合作管理的领导机构。

但是他同意，不管上天入地，我也得阻止他们废除教育科学部。他问我是否已设法去毁坏提出建议的人的名声。

当然，在这件事上，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温赖特这个女人是肇事者，所以哈克把这作为他自己的意见提出来。

阿诺德有两个别的老办法。

1. 使人不相信这建议所根据的事实。

不可能。这是一个政治主张，所以跟事实无关。

2. 把数字变动一下。建议中没提任何数字。

我问他到底有什么主意。他羞答答地从他的扶手椅的一边偷偷地张望着，看有没有人在偷听。接着，他欠身向

前，低声在我耳边作了惊人的供认：他的看法是，这建议确实是个很好的主张。

我从没想到过会是这样的：在一阵疯狂的思潮翻滚中，我怀疑我们是否应该试着照它做做看，为了全国的孩子，暂时虚与蛇委。

但是这不是阿诺德的意图。他看出我在动摇了，就来鼓舞我，给我勇气。“别去管全国的孩子！想想我们在教育部的事吧！”我为我的疏忽道了歉。我是为此才感到紧张不堪的。

事实是：唯一喜欢这计划的人就是家长和孩子。有关的人却个个都反对它，举些例子吧：

- i) 教师工会
- ii) 地方当局
- iii) 教育界的报纸
- iv) 教育科学部

我们决定了暂时的实施性策略：

1) 依靠工会来瓦解分裂学校。他们的领导人将上电视去说，是政府引起这次分裂的。

2) 地方当局将威胁要使选民区的党派起来反对政府。

3) 教育科学部就来拖住每一个步骤，把事事都泄漏出去，以使政府难堪。阿诺德从信息自由运动的角度来助一臂之力。

4) 教育界的报纸把我们提供的一切乱七八糟的消息全登出来。

我们放松了一下，又叫了两杯白兰地。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还没定下我们的论据是什么。阿诺德提议我们可说这条新建议会摧毁我们的教育制度。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人人都知道教育制度早就被摧毁了。所以我们决定说

（阿诺德爵士的意思是说：报界说——编者）

政府的干预已摧毁了教育制度，而这计划将使整个形势更为严峻。

我很怀疑。我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阿诺德让我放心，他说以前都是这么干的。当然，这没说错。但这一次的政治压力要大得多。

我们没有了办法。阿诺德强调说我必须找到一样政治武器来打赢这一仗。毫无疑问，这样做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即使和政府的政策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政府的政策，”阿诺德若有所思地说，“几乎总是和国家的利益有冲突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国家的利益获胜。而政府终也是会感激的。”

他可能说得对。但是我心中还没有想到一种政治武器可以使用，他心中也没数。而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证明我能当得起这份爵高位显的工作的。

（但是汉弗莱爵士却福星高照。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当内阁秘书在第二天早上拖着沉重的步子，兜着更沉重的心，脑中却仍无良策地来到七十号怀特霍尔街的时候，伯纳德·伍利爵士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呢。伯纳德·伍利爵士回忆[\[17\]](#)起那天早上的重大事件，可谓是史无前例的转折点——编者。）

我在他的镶有橡木贴板的办公室里等汉弗莱爵士。他迟到了。是首相派我来找他的。

汉弗莱要看看议事日程表——这太简单了。就是废除教育科学部。

他评论说这真该死！我同意。

在去内阁会议室的路上，我请他对我认为紧急但却次要的问题提些忠告。

这是关于：威德尼斯的圣玛格利特学校，这星期开始时首相参观的那所企

业学校，那所给他一张凳子的学校，现在有了法律上的麻烦了。

现在发现，在木工车间里所用的木料都是偷来的。实际上，是偷了政府的，偷了青年训练车间的。是在那儿干活的前几年的学生偷的。

汉弗莱的反应叫我吃惊。他在长长的漆黑的长廊中间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死死地盯着我，接着又心花怒放地一笑。“多么惊人啊！”他笑容满面地说。我把档案给了他。这档案说由于偷窃行为是在学校发现的，就业部已把此事交到教育科学部去处理了。

我向汉弗莱爵士道了歉，因为我不该用这样的小事来打扰他。那时我没意识到这一报道的重大意义——但是在五分钟以后，一切都清楚了，我是帮他在哈克的教育改革计划上投了一颗原子弹。

12月19日

这一天真叫人烦闷。我的伟大的，根本的改革计划得放弃了。这倒不是因为教育科学部在怀特霍尔街上为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成为彻底，浓缩的官僚主义的代表——这是一个根本不必要存在的部门，它不光是全然无用，而且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改革的阻力。

会议开始得很好。“今天的日程表上只列举一件事——废除教育科学部。”我兴致勃勃地说。

我注意到汉弗莱的兴致比我期待的要高得多。“如果只讨论一件事，就不能说列举。”他一面傲慢地纠正我的话，一面在我对面的会议桌旁坐了下来。

伯纳德跳出来为我辩护。“首相说一件事总没有错。”他说。至少，我**认为**他是在跳出来为我辩护。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是绝对地宽容，甚至还很和蔼。“我不在乎你在辩论中的廉价的胜利，汉弗莱，”我说，“既然你在教育科学部的一仗上已经输光了。”可是，小心，骄傲使人失败！

“教育科学部会很失望的，首相。”汉弗莱回答说，可我注意到他轻松得叫人担忧。

“这有什么关系，”我问，“既然他们将不再存在？”

汉弗莱给我一切机会来硬挣面子。但是他就是不说出他已到手的至关重要的信息。我看出他把一张王牌藏在袖子里不摊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这张王牌是什么。

同时，我们争辩起来了。他告诉我废除教育科学部的过程将延续一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会以死相拼的。

我问他们能对我怎么样。他说的话叫人费解。一切都藏在隐隐约约的威胁里，比如：“他们是个令人生畏的部门。”

“我是个令人生畏的首相。”我反驳说。

“喔，这倒是确实的。”我的内阁秘书同意地说，“但是您也许仍需要他们的合作。”

实际上，这个想法本身让我觉得好笑。教育科学部和政府合作？荒唐。但是当我坐在那里发笑的时候，斧子落下来了！

“那好。”汉弗莱说，“如果您不需要他们的合作，我将叫他们只管去起诉。”

开始我还以为我是听错了。“起诉？起诉什么？”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看看伯纳德。伯纳德竭力把眼睛盯在鞋带上。我没有办法，只能问汉弗莱他在说什么？

他又笑了。我立即知道我有麻烦了。“好吧，这不太值得来打扰您，但是这星期您参观那所企业学校的时候，电视作了采访。”他停下了。他显得风度优雅，可让我继续受罪。

“是啊？”我说。

“这学校是教育界好的榜样。”他引用了我说的话。“是啊？”我重复说，可是我的心已跳到喉咙口。

“其它学校都应仿效它的做法。”我开始觉得他将把我的发言再重演一遍。

“说下去！”我厉声说。

“可是……只是它的利润显然是来自偷窃行为。”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偷窃？”

“我是说，”他高高兴兴地解释说，“在物主不知道或不许可的情况下取走物品，并企图永远夺走物主的拥有权。”

“是的，汉弗莱。”我越来越咬牙切齿了，“我知道偷窃是什么意思，但是你是什么意思？”

好了，一切就可概括为，他们呈献给我的那张凳子是用偷来的木头做的。是两个去年的学生从当地的青年训练车间偷出来的。伯纳德说他们是一对小偷，妄想使空气活跃一些。

青年训练车间要对此起诉。而教育部可以阻止他们——只要把木料还给他们，叫他们不要声

张就行了。

汉弗莱说教育部的看法不同。真叫人奇怪，真叫人奇怪！我想对此来硬的一手。我说教育部显然可以把木料还给他们，并把这事忘掉。我争辩说，这是他们的职责——否则，我会显得那么可笑，因为我曾在电视里面对几百万选民说这所学校是英国的榜样。

“这是一种榜样。”汉弗莱恶毒地同意说。

“但是这不是企业学校的典型。”我坚持说。他恶意地微笑着，“它是在办企业。”

“他们不准起诉！”我命令他，不容他争辩。

他显得很奇怪：“这是您的指示吗？”我点点头。他很快地吸了口气，“那好，我希望教育部不泄漏出您在袒护偷窃行为这一事实。”

讹诈，前所未闻的大讹诈。我马上改变做法。

“你误会了，汉弗莱。”我很大度地说，“这不是我的指示。只是要他们别起诉。”

“啊，”汉弗莱若有所思地说，“那就得需要他们的合作了。”将死了。一局结束，重新布局。在这局我输了。我想象得出，报上的标题会是：喜欢犯罪的首相！或者是吉姆的有事业心的学生们。

轮到我来求他了。“汉弗莱，”我说，“你必须劝说他们住手。”他不肯妥协。“要劝说一个人和判他死刑的人合作，”他拖长了调子说，“是相当困难的。”

我别无办法，只能说谎。“死刑？”我用很吃惊的口气问。

“我想您是要废除这个部门。”

“废除？”我说，“喔，那件事！”我尽量装得像真的一样地笑起来，“不，不，汉弗莱，那还只不过是成熟的想法。我根本不是认真的。你连我在开玩笑都看得出来吗？”

“您肯定吗？”

“我肯定我是开玩笑。”

我还给自己留一个攀手可抓。但汉弗莱马上把它摘掉了。“您肯定您不再废除教育科学部？”

“是的。”

“您能保证，首相？”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是的。”我平静地说。我的计划已化为灰烬。和我所有的计划一样。突然，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看到，虽然我也可能在改革方面取得一些偶然的胜利，或者实行一些改革，或者废除一些小部门，但是从根本

上来讲，什么也**不会**改变。

汉弗莱现在的心情好极了。我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首相？首相？您没事吧？”我想看清他的脸。“没事。”

“那很好。我们还继续讨论日程表上的问题吗？”

“日程表上的问题？”我微笑了。我已无须再战了。“不，汉弗莱，我们已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会议结束了。行了吗？”

“是，首相。”他满眼同情地望着我。他看得出我终于真的明白了。

[1]导言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联合国人决定为了免除下一代人遭受战争的灾难，这种灾难已经给人类带来两次难言的痛苦，也为了坚定对基本人权，对人身的尊严和价值，对男女平等和大小不同民族平等的信念，也为了给公正地对待和尊重维护条约和其他国际法要求义务创造条件。也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活水平，为了以上的目的 我们要做到忍耐，和睦邻一般和平共处，要团结我们的力量来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以接受原则和确立总一套方法，一定来做到，除非为了共同的利益，不用武力。来使用国际机器来促进全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们决定集中我们的力量来完成这些目标。

[2] 联邦外交事务部常任秘书。

[3] 议会的提问时间。

[4] 新闻秘书。

[5] 杰弗莱·皮阿森，党的总组织秘书。

[6] 佩屈立克·斯瑙德格拉斯，教育部大臣。

[7] 多萝西·温赖特。

[8] 私人

[9] 和编者的谈话。

[10] 意为“祝您胃口好”——译者注。

[11] 革命性，鼓舞和刚烈三个词在读音上全以拼音G开始——译者注。

[12] 这种学校强调课程的开设要适合学生的能力和兴趣，而不应要求学生适应学校的课程——译者注。

[13] 乔治·奥威尔，曾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后鼓吹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作品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反乌托邦政治的讽刺小说——译者注。

[14] 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均为日耳曼族一支，分别入侵过古罗马和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后

人用这两个词比喻野蛮人，尤指破坏艺术品和文物的人——译者注。

[\[15\]](#)拉丁文，字面意义——译者注。

[\[16\]](#)欧洲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愚昧的时代——译者注。

[\[17\]](#)和编者的谈话。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